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1 卷 7 期
2025年8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青年编委
舒波 田蕾娅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文化与文学研究

- 传统非遗文化元素融入游戏玩法的深度融合挑战——以《尼山萨满》游戏为例 钟汀雨, 周晨希 - 1-6
- 非遗视角下安代舞与蒙古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及跨文化交流 史建兴 - 7-10
- 金惠顺诗歌中的佛教生态思想研究 杨思楠, 邵薇 - 11-16
- 《茶经》两英译本的对外传播差异——以译者翻译风格为例 王海波 - 17-22
-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标举: 以《六一诗话》第二七为例 阳宇航, 韦佳华 - 23-26
- 概念整合视域下“生肖”成语语义形成的认知机制研究 王倩倩 - 27-33
- 汉语构式“过于X”的程度表达与预期偏差互动机制研究 姜蕾 - 34-39
- “跌落街”即“跌落楼”? ——粤语“V落O”构式的意象图式与歧义现象初探 张安翘 - 40-43
- 破旧立新: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 谭洁 - 44-47
- 15世纪英国的城市危机摆脱及对其的分析 李旭 - 48-53
- 英汉字幕翻译中的归化研究——以《生活大爆炸》为例 索芷怡 - 54-57
- 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 杨海涛 - 58-62

教育理论与实践

- 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的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汉字书法教学研究——以A大学为例 池程远, 杨文琪 - 63-66
- 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关系的综述研究 李曼曼, 段如梦, 刘峻利, 金岚 - 67-73
- 数字经济时代下AI技术在广播电视编导教学领域的应用与路径探索 徐锦博 - 74-80
- 单元主题意义视域下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研究——以外研社必修2 Unit6 Earth first为例 段如梦, 岳瑞玲 - 81-84
- 近十年我国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调查研究 何承航, 蔡兰珍 - 85-91
- AIGC赋能高校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范式研究 程文婷, 彭文正 - 92-96
- 高校体育公共课与思政建设的推进路径 唐嘉欣 - 97-101
- 中英高校钢琴教学体系比较研究: 理念、课程与评价机制 邹鸣民 - 102-106
- 基于能力本位教育的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实施路径研究 杜慧, 侯诗棋, 王盼 - 107-111
- 基于项群训练理论下不同体育运动对小学生性格塑造的实证研究 肖浪, 罗小红, 雷雨洁, 邱宇萌, 丁镜源 - 112-116
- SWOT视域下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跨域协同路径研究 张健, 金俊娜, 芦凌雪 - 117-121
- 从符号表征到高阶思维: 3-6岁幼儿深度学习能力的发展路径与干预机制研究 王陈, 王欣欣, 郭涛 - 122-128

社会与治理

- 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中刑罚个别化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张凯悦 - 129-133

领事协助权在投资入籍下的挑战与应对 孙雪晗 - 134-138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美华人反歧视抗争研究 吴妙璇 - 139-144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核能发电的起步和意图 曹晓敏, 杨桦 - 145-149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层面的发展进路与逻辑思辨——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计量分析 胡吉, 高旭亮 - 150-156

从荒野到全球视野：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研究评析 陈良泓 - 157-164

从“旁观者”到“守护者”：初中校园欺凌治理中学生行为转变的机理 何文敏 - 165-170

生成即上链：区块链视域下医疗纠纷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创新的逻辑与路径 王自力 - 171-174

基于人工智能的家禽疾病预警系统研究与设计 马旭, 简蕊, 杨露露, 李广博 - 175-178

公共文化服务的合作供给路径探索——基于“村超”“苏超”的比较研究 肖欣语, 孙灵彬 - 179-187

经济与管理研究

政府引导基金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理论与实践探究 黎银霞 - 188-193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韧性：空间特征与发展路径 林牧楠 - 194-197

银发经济视域下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现状研究 杨怡, 李宇, 黄仪 - 198-201

基于 GIS 的喀斯特地区“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荔波县为例 高文平 - 202-210

略论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 李碧波 - 211-214

“双减”政策下新东方战略转型的绩效研究 郭周琪 - 215-220

传媒与艺术研究

基于天文与物候的二十四节气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 宋婷杰, 王惠, 杜泽鑫 - 221-226

从技术到情感表达——流行音乐声乐训练的核心要素 涂成超 - 227-232

赫哲族鱼皮技艺的数字化视觉传播研究 刁涵, 高梓萌, 高梓蒙 - 233-237

元宇宙视域下传统戏曲艺术范式创新路径探究 张蕊 - 238-241

满族说部英雄史诗的信息可视化研究——基于 AIGC 剪纸艺术与岫岩皮影风格的视觉重构 赵伟强, 曹宇欣, 郭俊傲, 李奇 - 242-247

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体育品牌传播策略的优化路径研究 宁国宏, 马妮卡 - 248-252

三维重建技术在望奎皮影保护与传承中的应用研究 郭俊傲, 李晶源, 赵伟强, 李奇 - 253-256

算法推荐机制下 2024 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的“去中心化”——基于抖音短视频平台的研究 刘骁 - 257-263

新时代现实主义影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 徐礼莹 - 264-267

远程在场：媒介论视角下的小红书云自习研究 王海燕 - 268-273

模仿、再现与传播：书评人工智能内容生产（AIGC）交互中的用户体验影响因素分析——以微信读书 App 为例 金智英, Payam Ghavibayan - 274-280

迷失在大英博物馆——《青春》的空间叙事与身份书写 古帆 - 281-285

论《色戒》中女性身体的政治化书写 叶琳 - 286-289

自我言说：华语女性题材电影的类型更新与主体转向 彭敏 - 290-293

从媒介融合到身份重构：以《汉密尔顿》为例探析文艺作品的跨文化表达机制 孙毓含 - 297-297

传统非遗文化元素融入游戏玩法的深度融合挑战 ——以《尼山萨满》游戏为例

钟汀雨¹ 周晨希¹

(1.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随着中国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 国产游戏将传统的非遗文化与现代游戏设计巧妙融合, 让玩家在享受游戏趣味的同时, 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在融合的过程中, 诸多问题逐渐凸显, 成为制约非遗文化元素在游戏中实现有效融合与发展的关键性障碍。本文以国产游戏《尼山萨满》为例, 运用案例分析、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 探讨传统非遗文化元素融入游戏设计时所面临的融合困境。通过对该游戏的分析, 揭示了其在文化元素运用深度、玩法创新适配、玩家体验平衡以及文化传承与商业性协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文化内涵提炼、深度的玩法创新融合、优化玩家体验设计以及构建可持续的文化商业平衡模式等, 为非遗文化与游戏产业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推动非遗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创新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非遗文化; 游戏玩法; 尼山萨满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83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代传承的文明瑰宝, 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和民族特色, 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 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对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 国家针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意在拓宽非遗的传播渠道, 提高非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形式日趋多样化, 巧妙融合传统非遗文化元素已经成为游戏设计领域广受瞩目的探索路径。

游戏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载体, 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和强大的传播能力, 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提供了新的契机。2024年1—6月, 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472.67亿元, 同比增长2.08%, 增长趋势较为平稳。2024年1—6月, 游戏用户规模6.74亿, 同比增长0.88%, 再创新高^[2]。综合现今游戏市场, 越来越多的游戏开始巧妙地融入非遗内容, 大大提升提升了非遗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以米哈游自主研发的冒险游戏《原神》为例, 该游戏打造了一个富有中国韵味的奇特世界——璃月, 其建筑、服饰等设计元素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启发, 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前提下让全球玩家沉醉其中, 使玩家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进而对非遗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样, 现象级手游与敦煌文化相结缘, 通过人物皮肤“遇见神鹿”展现了敦煌壁画的色彩图案和场景元素, 该皮肤备受玩家喜爱迅速成为热销榜上的“爆款”。将古老的审美工艺与现代游戏相结合, 不仅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感悟到非遗之美, 也进一步彰显了游戏在非遗传承方面的巨大潜力。

一、尼山萨满游戏现状分析

游戏《尼山萨满》是一款以满族民间传说《尼山萨满传》为背景的手游, 通过5个章节讲述了一位名叫尼山的满族姑娘深入冥界, 为无辜孩童找回灵魂的英雄事迹。作为腾讯公司的第一款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手游, 《尼

作者简介: 钟汀雨(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
周晨希(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艺术传播。

《山萨满》荣获 2018 年美国“Indie Cade 创意美学奖”、第三届“金陀螺”年度最佳独立游戏奖和 IMGA（中国）“最佳音效奖”。它以 9.8 分的高分被推荐在 TapTap 首页上，在 App Store 的评价是 4.8 分，豆瓣评分 9.1 分。^[3]该游戏可在 wegame 上进行下载，总推荐率达到 92.7%，玩家评论称：“画面很精美。”“作为国产免费单机游戏来说，已经很优秀了！继续加油，希望可以拓展一些剧情和关卡。”



图 1 尼山萨满

游戏《尼山萨满》的玩法结合了 2D 横板+音乐节奏游戏。玩家在扮演尼山穿梭在场景中，通过按下“A”、“L”两个键在正确的时机敲鼓击退怪物。其视觉风格设计简洁，游戏内除了顶部的玩家生命值外没有任何多余的 UI 设计。它既是一款音乐节奏类的游戏，也是一款具有传承和保护民俗文化意义的功能游戏。^[4]不同于传统音乐游戏极度重视鼓点打击感，游戏《尼山萨满》更注重让玩家在音画结合的场景里感受满族文化，制作组在美术设计上采用了具有满族特色的剪纸风格。满族剪纸承载满族生产习俗、民间传说等内容，形式上古朴苍劲，艺术特点鲜明。在满族的传说中，萨满是连接人与神的桥梁，他们将人们的愿望传达给那些被视为超凡的力量，同时也负责把这些力量的信息带给人们。游戏中运用的其他元素也取材于满族文化，例如“扣夜星”、“鹿”元素等。在游戏中，“扣夜星”是一群手拉手的小人图案，作为与玩家交互的音符出现。在满族文化里，“扣夜星”是指在小孩生病或受惊的时候，家属在晚上剪下和小孩年龄数相同的小人，并从灶坑取灰水放在炕边，把小人作为“替身”扣于盆下。第二天早上若纸人烧着，即认为“夜魔”被扣。最后家属将灰烬和纸人灰倒在屋外，目的是驱邪和保平安。在音乐音效方面，游戏《尼山萨满》融入了满族传统音乐旋律，为游戏营造出神秘的氛围。尽管游戏《尼山萨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未在各大平台上的“独立游戏”或“音乐游戏”的热门排行榜上出现，与其他热门游戏相比显得相形见绌。

二、文化元素与游戏玩法的深度融合中遇到的问题

（一）文化元素显浅，运用深度不足

在游戏《尼山萨满》中，虽然大量运用了满族文化符号与剪纸艺术，但有的设计存在对文化特征把握不够、文化元素运用深度不足的现象，导致融合效果受到了一定影响。文化深度是对文化内在价值的挖掘和理解，它关注文化的深层次结构、精神内核以及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深远影响。满族剪纸是一个独特的视觉符号，它并不完全注重外在、表面的像与不像，而是以象征、概括、夸张造成意象，使其内涵超越客体对象。正所谓“写实—写意—象征”^[5]。例如在满族剪纸“蛙”中，蛙头与蛙身如此硕大，蛙腿粗壮有力，既能下海又能入地，表现出它能量无限，在满族传说中它是人们开天辟地的好伙伴。这些超越常态的符号，长期在民间传承，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而游戏中制作组对一些剪纸艺术造型把握不够——“福神”（柳树妈妈）整体造型仍然不能体现满族剪纸中女性的柔美。始母女神的题材包括妈妈神和佛朵妈妈，佛朵在满语中意为柳枝，而在满族传说中柳枝生育人类，柳叶则呈女阴状。祭祀佛朵妈妈象征家族兴旺、世代繁衍，反映出满族人民对女性孕育生命、创造万物的敬畏和崇拜。^[6]“福神”造型比起传统的柳树妈妈更加硬朗，看起来更像男性，这个形象在反映孕育与敬畏仍有欠缺。而在游戏剧情推进中，部分角色没有出现，游戏流程结束于“救出孩子”的剧情。而在满族传说中，尼山受员外夫妇委托，在成功营救孩子后，尼山偶遇了已故丈夫的幻影纠缠，并打散其幻影。这一行为被她的婆婆发现，导致她被

指控并被官府判决扔到井中。最终因为她的善行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为她请愿平反。尼山萨满招魂的正当性还源于丧子夫妇符合“善有善报”的原则，即夫妇二人的善良使他们的诉求得到了好的结果。在人物设定上，丧子的夫妇乐善好施，慷慨大方。在故事情节上，夫妇二善待受到驱赶的乞丐。乞丐在少年的葬礼上来到夫妇家，被仆人驱赶，但被夫妇善待，夫妇遂才得到乞丐老人的指引，获得关于尼山萨满的信息。这个情节正是自然因果与善恶报应的结合。^[7]这个民间传说的故事是善善有报的价值体现，也反映了满族传说中朴素的道德观。剧情的删减改编使玩家难以体会到满族文化内涵，也导致了文化元素运用深度不足的问题。而同样是民族文化主题的作品的经典动画《火童》，人物的造型更符合传统剪纸的韵味。《火童》以哈尼族神话题材为原型，讲述了哈尼村寨的火种被妖魔盗取后，少年明扎历尽艰辛为村寨取回火种，最终舍身成仁的故事。在哈尼族心目中，火种反映着一种对本民族根的寻求，与民族命运延续与发展，个体与族群共为一体，以对火及火种不同民俗方式来表彰其信仰。^[8]整部动画以“火”贯穿始终，在《阿扎取火种》的基础上增加令角色更加丰满的内容，这也展示了哈尼族的文化内涵。相比之下，《尼山萨满》的文化元素应用深度仍需提高。



图2 柳树妈妈对比

（二）游戏玩法单一，不足适配内涵

游戏玩法与文化适配在非遗游戏开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玩法提供娱乐性和趣味性，而文化适配则丰富游戏体验，增加玩家的代入感和情感链接。游戏《尼山萨满》融合了节奏音游的玩法模式，玩家通过按下按键进行敲鼓打怪。实际上满族萨满文化是非常庞大的，敲鼓驱灵治病只是其中一部分。萨满法师日常要为氏族的成员医病，负责氏族内部的各种大事测算吉凶，还要主持各种祭祀典礼。^[9]满族萨满教万物有灵的文化内涵难以在简单的音游玩法中体现，满族文化中崇拜自然和祖先的传统仅在过场中简单表示，并未做更多的交互。满族文化受萨满文化的影响较大，例如婚礼要举行“婚祭”。婚祭的目的是为了驱邪祈福，新人需要向祖先的牌位跪拜，这是满族文化中祖先崇拜的体现。音乐在音乐节奏类游戏玩法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游戏中音乐与大多音游的音乐不同，这些音乐以器乐为主，辅以少量的山歌唱调，空灵悠扬。《尼山萨满》背景音乐主要包括《望祭山》、《额尔春》、《海东青》、《松花江神》、《摇篮曲》等音乐，这些音乐的创作与选材无一不透露出萨满文化古朴苍凉、神秘又神圣的独特魅力。^[10]音乐游戏非常注重乐曲的节奏感，玩家能跟随节奏在正确的时机按下按键，但是民族乐曲相对现代音乐节奏感不明显，导致玩家难以正确按下按键。游戏玩法单一导致了非遗文化无法全面体现，音乐节奏游戏又与民族乐曲存在一定的适配性问题。鉴于游戏玩法与文化适配的重要性，本游戏应从更好地结合民族乐曲和音乐游戏玩法的基础出发，设计更多的游戏玩法的同时丰富民俗文化情节，以提高玩法和文化的适配性。

（三）游戏体验不佳，未与深度平衡

玩家体验是游戏的核心，文化内涵深度是游戏独特性的体现。将两者处理得当可以增强游戏的吸引力和深度，从而建立与玩家之间的情感链接。而非遗游戏常出现不能平衡游戏性和深度的问题——过于注重深度的游戏往往欠缺娱乐性，反之则容易深度不足。构成游戏基本结构的3大因素能够最有效、最可靠地产生“心流”，即自我选择的目标、个人最优化的障碍和持续不断的反馈。^[11]在游戏《尼山萨满》中，玩家扮演尼山不断敲鼓击退怪物得到更高的分数，以此推进故事剧情并最终救出孩子。总体而言创作者更希望注重深度，然而游戏体验仍有不足——首先游戏场景互动较少，重复率较高而导致玩家得到的反馈不足最终容易疲惫的问题。其次难度的设置不够

合理——有的音符速度设计和节奏不匹配，节奏判定有一定的延迟，导致玩家得到的反馈减少，体验感下降；再次有的以画面设计为主的关卡要求玩家高度集中注意力完成操作，导致玩家不能同时欣赏游戏画面和音乐。游戏中的亮点“民族音乐”在这里也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民族音乐可以更好地体现满族文化，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存在节奏感相对较弱的原因，所以并不适合在音乐节奏游戏中出现。从次游戏在文化体现和引导方面也存在不足——游戏删去了满族传说中“萨满带着鸡、狗、酱和纸到达阴间，并用它们通过了重重考验”这一细节；最后在国内网站下载该游戏时，游戏开场时默认语言为英语，配音语言为满语，许多玩家容易错过开场剧情。非遗与游戏融合常面临玩家体验与文化深度的平衡难题，这需要制作组去不断尝试寻找一个合适的点。

（四）商业性质过重，难与文化协调

非遗文化具有深厚的内涵和历史价值，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部分游戏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往往会对文化元素进行过度简化以提升市场吸引力。以知名手游《王者荣耀》为例，尽管和很多非遗文化进行联动，但文化深度欠缺，例如“霸王别姬”皮肤运用了京剧元素，但只是将京剧元素用于表面，实际上整体设计还是以欧美体系的金属装饰为主，人物造型未体现京剧文化的精髓。《尼山萨满》的美术设计依旧无法脱离现有游戏形象——例如“鱼”的形象仍旧和《魔兽世界》或《英雄联盟》中西方鱼人的形象较为相似，独特性略显不足。尼山和师父角色的设计，在人物概括上还是受到欧美风格的影响，人物造型运用直线偏多。在传统的剪纸造型上，曲线的使用更为频繁，而过于追求文化遗产的游戏又显得无趣，市场吸引力不足。以另一款传统游戏《匠木》为例，该游戏偏重文化遗产，游戏玩法是将不同形状的木制零件进行拼合，其游戏形式过于单一，持续反馈不够，游戏性不足，最终导致无法吸引更多玩家进行持续运营。如何在传承与创新、娱乐与教育间找到平衡，是非遗游戏制作组需要不断探索的目标。由于我国的游戏设计起步时间较晚，大多数成熟的游戏作品出自国外，国产游戏往往会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商业性质应该与文化遗产互相协调，游戏既要有独特性，又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商业包装增加吸引力，这样游戏才能拥有不断的生命力。



图3 《王者荣耀》霸王别姬皮肤

三、迎接挑战的策略

（一）精准提炼内涵，提升游戏深度

在融合非遗文化与游戏时，要注重文化符号的准确性和内在深度。非遗游戏不仅应该把握文化符号的外观，还需要通过互动剧情等方式揭示其内涵。在前期制作上，邀请文化专家参与游戏制作过程，对非遗文化符号进行研究解读；在改编文化故事时，应遵循尊重原著和适度创新的原则，保留文化故事中的核心情节与价值观念，将其融入游戏环节。对于游戏《尼山萨满》而言可在剪纸造型上再做考究，增加满族文化的独特性。游戏剧情增加员外夫妇、尼山丈夫等角色，扩大主线剧情，反映满族传说的善恶观。设计满族文化仪式的游戏关卡，玩家需要按照正确的仪式流程完成操作，才能推进游戏剧情并得到奖励。文化深度增加，让游戏独特性更加明显，才能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深入体验到满族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推动多样玩法，深度融合内涵

将玩法和文化结合是游戏发展的一个趋势，这种趋势有助于提升游戏的文化价值和吸引力。游戏不仅是娱乐的工具，还是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近期火爆的《黑神话悟空》之所以“出圈”是因为其玩法众多，增加了玩家的新奇感，而每种玩法里又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在战胜各种敌人之后，玩家会得到用来升级的经验值、用来换取资源的“三界通货”“灵蕴”，还有新的武器、披挂、珍玩、精魄和根器，并不断解锁新的剧情和关卡。围绕一

场战斗，衍生出了加点选择、技能搭配、装备搭配、战斗连招等关于战斗风格与方式构筑(也被称为“Build”)的玩法，以及硬核玩家进一步给自己设置“不必要的障碍”的玩法，例如速通竞赛、无伤 BOSS 战、禁法宝技能闪身的战斗等，以获得“没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的乐趣。^[12]游戏玩法上应能反映文化内涵，《尼山萨满》可在保留节奏音游玩法的基础上，增加反映满族文化民俗的交互设计，如收集尼山举行仪式的物品，设计救回孩子的谜题等，让整个游戏的玩法更加多样，也推动了玩法和文化的融合。

(三) 注重玩家体验，平衡文化深度

增加非遗文化和游戏的融合度，需要注重玩家体验和文化遗产的相互平衡。玩家的体验应该让他们产生“心流”，得到不断的反馈，文化运用也应该具有一定深度。游戏《尼山萨满》作为叙事类音游，若要注重文化内涵，可适当降低游戏难度，让玩家有更多的精力去感受满族文化。游戏运营应该关注用户体验，国内版本的游戏下载默认应该是中文，增加玩家第一印象的好感度。同时增加游戏场景的互动和游戏模式，减少玩家因为重复操作而带来疲惫感。在游戏过程中，适当提供文化解释，帮助玩家更好地理解游戏内容。注重玩家体验，平衡文化深度，游戏才能具有吸引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四) 平衡商业性质，构建产品矩阵

文化内涵是游戏商业价值的核心支撑。创作者需要通过挖掘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打造具有文化特色的游戏品牌形象矩阵，同时要注意不能过度包装。例如《黑神话悟空》将数字绘画和中国传统水墨画进行结合，过场动画制作参考了中国古代绘画的构图，人物绘画也还原了中国人物水墨画中的神韵，具有独特性。其后续运营常和各种景区进行联动，在文化旅游、文创产业等领域进行跨界合作。在商业联名层面，瑞幸咖啡看准了其 IP 价值，游戏上线一周内，其联名产品“腾云美式”成为线下商业爆款产品；由于游戏内设优化对于电脑硬件配置的要求，故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玩家组装及升级电脑的趋势，电脑硬件和 PS5 游戏主机销量同样火爆，部分硬件还因货源紧张涨价。^[13]《纸嫁衣》制作了系列以中国民俗文化为主题的解谜游戏，形成游戏矩阵，提高了游戏竞争力。截至今年 7 月，《纸嫁衣》系列已更新至第五部，TapTap 评分均在 9 以上。^[14]《尼山萨满》需要平衡商业性质，挖掘满族文化中具有独特性的元素。后续可通过推出系列作品，形成产品矩阵，并与满族文化景区合作，通过游戏吸引游客。同时将景区的文化资源融入游戏开发中，多方面展示满族文化，实现文化遗产与商业利益的良性互动。



图 4 《黑神话悟空》过场画

五、结论

“非遗+游戏”的梦幻联动不仅为游戏设计行业注入了巨大的潜力与价值，更为非遗文化的与时俱进发展提供了可鉴思路。然而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存在着诸多融合挑战，包括文化元素显浅、游戏玩法单一、游戏体验不佳和商业性质过重等问题。为解决这些困境，需要精准提炼内涵、推动多样玩法、注重玩家体验以及平衡商业性质等，并制定相应的措施。利用古老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一方面让游戏内容更有深度，进一步提升游戏自身的正面价值；另一方面让非遗文化更有活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和传承中国传统非遗文化的艺术韵味。在保持非遗文化本真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游戏表现形式，大力促进游戏与非遗的跨界融合，推动非遗文化与游戏产业

的多方共赢。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21)[2024-08-1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 [2] 2024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发展概况分析——基于《2024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数据[J].中国数字出版,2024,2(05):48-51+56.
- [3] 王丙珍.文化创意产业视域下非遗的传承与传播——以《尼山萨满》及其功能游戏为例[J].西南学术,2022,(00):126-140.
- [4] 林好雨.民俗文化在手游中的传播路径及创新——以《尼山萨满》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01):115-118.
- [5] 陆南.满族民间剪纸的造型特点与装饰语意探究[D].吉林艺术学院,2009.
- [6] 许加.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D].吉林大学,2024.
- [7] 李佳琦.《尼山萨满》的死亡叙事与善恶报应观[J].满语研究,2023,(02):76-81.
- [8] 陶昌平.从民俗美学角度浅析哈尼族动画《火童》[J].电影文学,2013,(13):55-56.
- [9] 满族萨满简史[EB/OL].(2024-10-10)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1010/14/43995321_1136197575.shtml.
- [10] 阚旭阳.从严肃游戏看萨满文化的保护与传承[D].吉林艺术学院,2020.
- [11] [美]简·麦戈尼格尔.游戏改变世界[M].闫佳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 [12] 曹书乐,石闯龙,何威.玩法为器,文化为魂:《黑神话:悟空》的国际传播与游戏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机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6):119-131+171-172.
- [13] 孟伟,崔津铭.“网络爆款”的跨文化传播与商业赋能——基于游戏《黑神话·悟空》的考察[J/OL].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2024-11-30].
- [14] 许心怡,吴可仲.《纸嫁衣》改编电影:中式恐怖游戏能否出圈? [N].中国经营报,2023-12-11(B16).

The Deep Integration Challenge of Incorporating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into Gameplay

Zhong Tingyu¹, Zhou Chenxi¹

¹ 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game industry and the nation's increasing emphasi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mestic games have skillfully integrated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with modern game design. This allows players to appreciat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while enjoying the fun of games. However, numerous problems have surfaced during this integration process, becoming key obstacles hindering the effective 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ICH elements within games. Taking the domestic game Nishan Shaman as a case study and employ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case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llenges faced when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ICH elements into game design. Through analyzing this game, it reveals issues in areas such as the depth of cultural element utilization, adaptation to gameplay innovation, balancing player experience, and reconciling cultural preservation with commercial viability. Consequently, it proposes targeted solutions—refining cultural essence, achieving deep integration through gameplay innovation, optimizing player experience design, and building sustainable cultural-commercial balance model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fusion of ICH and the game industry, thereby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Gameplay; Nishan Shaman

非遗视角下安代舞与蒙古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及跨文化交流

史建兴¹

(1.包头师范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要:安代舞作为文化载体和符号,是蒙古族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蒙古族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发展历史、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一系列的剖析分析得知其与蒙古族文化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安代舞虽然是以蒙古族文化为根基产生出来的一种传统艺术,但是它也不断地有选择地吸收融合世界不同的艺术元素,并进行改造形成能够传递思想内涵以及表达内涵的新形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成与传统艺术相结合的现代话语体系,同时保持了传统艺术的真意,并且通过对它的传承有利于民众民族意识的培养和社会群体凝聚力的提高。

关键词:非遗;安代舞;蒙古族文化;跨文化交流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97

全球化浪潮下,文化同质化趋势严重,保护传承好非遗是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全人类的创造力的有效方式之一。非遗作为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累积下来的精神财富,留下了各民族宝贵的历史记忆、思想经验以及信仰、价值追求等重要内容,承载着各民族重要的文化记忆,是各民族不可缺少的身份象征,也是一个民族追求归属感的情感纽带。安代舞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与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彰显了其本身的存在价值,由于是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形成,所以安代舞保留着蒙古族人民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审美情趣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具有规则的特定的表现方式以及某种舞蹈形态,通过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而成。安代舞所呈现出来的蒙古族刚劲阳刚之美象征着蒙古族自强不息、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是体现蒙古族独有的身份标识。全球化时代带来的不仅是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也包含着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如安代舞这类传统民族文化就面临着更为尖锐的问题,如何更好地保存这些不同的文化?又怎样将不同文化的精华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在此情况下,安代舞和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对于探寻如何保持这种多元文化的共存并进,实现多种文化融合的同时,增进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安代舞研究的历史回望与当代审视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开始对安代的源流、发展史开展研究。上世纪 90 年代朴永光在其论文《试探蒙古族安代舞之原型与变异》(1998)中提出,一些历史文化现象本身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衍变的过程,它的“原型”必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但是又存在一些传统文化内容会在其中保存一些基本特点和痕迹^[1]。2006 年在蒙古族安代舞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学者们从全球化视角论述了安代舞在世界、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机遇(王文章,2012)。近年,学者从安代舞的行政法保护(杨嘉馨,2021)、安代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李迎春,2022)、道具演变(乌日利戈,2024)、互联网语境(河尔伦色音,2025)以及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治理的可能性(楚歌,2024)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此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在各个世代间发生了明显转变;同时又存在着由封闭的文化孤岛走向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交往沟通频繁的现象。在互学互鉴中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在吸取借鉴他者的长处基础上使本民族的传统得到了一种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的过程。21 世纪之后,安代舞已不再是简单的传统舞蹈,而是作为“非遗”“舞台艺术”“公共文化”等多种现代属性的形式存在。传统舞蹈的传承式微与多

元融入同时展开^[2]。传统安代舞通过主体重塑、舞蹈形态大众化和社区组织的情感凝聚,通过文化再生产,成为“新安代舞”^[3]。

二、安代舞与蒙古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生存环境、社会历史、生计方式与思维方式

(一) 生存环境与社会历史

自然环境对安代舞起源、形式、内容的影响深刻,广阔的蒙古高原和辽阔草原,四季分明、自然景观优美的气候条件,以及宝藏无限的自然和物质资源,为安代舞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背景。宽广浩瀚的草原赋予了蒙古族人民开朗爽直的个性,在安代舞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

伴随着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安代舞的社会功能与作用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封建社会,安代舞曾经是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精神统治的仪式舞蹈存在,是富于宗教性感情的严格而传统的舞蹈动作程序,以使自己和进入仪式的人们以神圣的心理从这些程序中体验并深信不移地感受到神灵对生命主体的辅助^[4]。蒙古族舞蹈本身具有深厚的宗教意蕴,正是蒙古族人民心灵深处那对于生命、对于自然的折射和独白,这种意蕴凭借蒙古民族能歌善舞的天性得到了充分发展,使得许多与宗教有关的蒙古族舞蹈在其流传的过程中渐渐淡化为民间舞蹈,“安代”的演变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5]。

(二) 生计方式与思维方式

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与安代舞艺术形态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从动作形态看,安代舞中最具特色地甩巾、跳跃动作等都是游牧生产方式下需要的体能与动作特点为基础,而体现出了游牧生产对身体的基本要求和民间艺人用舞步表达出来的游牧人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纵马奔腾的场景;就节奏特征而言,安代舞快速与缓慢相结合、强劲与柔缓交替出现的特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游牧生活周期性的劳动节奏特点。通过这种鲜明而又强烈的对比,在安代舞的舞蹈节奏变化当中就会生动反映牧民生产节奏的变化规律和他们游离于劳作之后所产生的一种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活意象。从人类学的角度上来看安代舞还体现出具有蒙古族传统价值取向的特点,体现在动作语汇中的围圈式、众人参与等集体行为的形式,以及其中包含的祭祀、奉拜仪式等因素,也都符合蒙古族群众坚持“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心意。

(三) 民族心理与身份认同

从文化表征角度看,安代舞代表着蒙古族特定的审美范式、民族文化传统,是象征族群身份认同的符号要素。虽然安代舞具有其原始的治疗仪式性功能,但是今天仍然保留着心理调节功能,具有将参与者的心理压抑传递给外部环境并得到释放的特点,也具有促进身心健康的功效;而从历史记忆角度来看,安代舞承担着对蒙古族民族集体记忆信息进行编码和传递的功能,安代舞具身化实践活动有利于主体建立起与蒙古族历史的文化联系,从而使蒙古族主体文化内化于自身。“体化实践”(embodied practice)有助于加深主体对民族文化的情感认同(Connerton, 1989)。近年来,田野调查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安代舞的习得过程实质上就是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因此,当一个人学会一项技艺之后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一定数量的文化资本,并得到相应族群的认同与肯定;另外,安代舞形成的群体“共睦态”(communitas),以其独有的节奏节律和肢体语言而构筑起独一无二的仪式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安代舞展演的身体实践是一种二重演绎:既是个体抒发情感的工具媒介,又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现象展演。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代舞作为蒙古族的“文化标识”(Cultural Marker),其族群认同身份的功能性更加明显。当族群成员参与到安代舞传承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在完成再生产族群文化符码体系的同时也建构起不同的民族身份,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这种建构表明其已然自我意识到了族群文化的发展态势和规律,对于安代舞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身份认知、诠释策略以及反思能力都有所体现。

三、安代舞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智慧对抗与融合

(一) 跨文化交流中的安代舞传播

1. 传播历程与影响范围

作为蒙古族传统民间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安代舞诞生于明代中期(15-16世纪)并逐渐兴盛于清代前期(17-18世纪),起初仅作为内蒙古库伦旗萨满教祭祀的伴舞乐曲和蒙古族群众欢腾庆贺时的自娱舞蹈,后在蒙古族入迁徙与交融过程中,流传到整个内蒙古以及辽宁、吉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区域(白翠英,2012)。将其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传播范围就更加广泛,在这种范围下可以更好地体现阿帕杜莱提出的“文化全球化流动”,即一种地方性文化借助现代传播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嵌入。以安代舞为例:安代舞能够不丢本真地成为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对话的渠道。

2.接受度与适应性

安代舞具有很强的接受性和包容性,能灵活应对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以强烈的民族性、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受到很多国外观众的喜爱,他们被这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在欣赏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体会和感受着蒙古族文化。另一方面是安代舞在传播时会考虑到它的环境,并对安代舞做出相应的修改以满足这个地区的群众需要。改造后的“新安代”也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以及接受的方式。“接受”和“适应”研究出安代舞的创作表演之深,“接受”和“适应”也为安代舞在跨文化交流中打开了门扉。

(二)智慧对抗与边界区分

从跨文化传播互动场域来看,安代舞作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风险,如何维系文化本真性便成为主要问题之一。为此,传承主体采取了系列化保护措施,从文化再生产的三个维度来看,通过仪式化展演强化了安代舞的集体记忆,舞蹈动作、服饰道具等物质载体须严格遵照传统的祭仪程序,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基于“身体惯习”(habitus)构建情感共同体,在集体舞蹈活动中产生了族群认同感;形成制度化传承体系,将学校与社区传习进行有机融合,通过培养传承人来续接族群内部文化传播路径,在文化边界协商过程中,安代舞实践者显示出极强的“文化自觉性”,在边界维护的两种方式中,选择“选择性吸纳”原则,即安代舞基本步伐不变,可吸收其他方面舞台表演的手段和方法;也进行了舞蹈动作的文化阐释学,由观众观看安代舞时产生联想的符码,其中一种是象征意义:甩巾动作寓指驱邪禳灾、踏步节奏暗示马蹄声等。这样解释安代舞就创设了人们的认知场域,安代舞被安顿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三)文化融合与创新

安代舞是蒙古族传统舞蹈的代表,它是安代舞这一传统舞蹈艺术样态被接受与认可的基础之一。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综合,不是简单地通过艺术手法将一种文化元素堆积到另一种文化之中,而是在尊重与保护原本的本土文化内核基础上,尝试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是当代安代舞编创的一个主要特点:现代舞蹈语汇与传统动作范式的结合;现代电子音乐与蒙古族民族乐器的搭配实验等都是其形式上的创新。在保持了该舞标志性动作基础上融入新元素后的安代舞更具有时代特征。因此,文化的传播也有利于蒙古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现代传播与发展,并且安代舞也是加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认同的桥梁与纽带。当代的文化认同建设通过跨文化融合形成跨文化创新,“新安代”成为了集文化展演、艺术创研和身份标识于一身的综合性实践活动,适应了当下的审美要求,完成了传统文化资源向现代文化产品的创造性转化。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蒙古族艺术发展

在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安代舞面临的的就是接受其他文化的同时如何保持自身特点,在这两个方面都需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安代舞和其他的文化的不断结合,也催生出研究者们在不同视角下对安代舞的关注。他们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苏伦卦1998)、医学人类学(乌仁其其格,2006)、戏剧人类学(王宇,2019)、舞蹈生态学(包文华,张晓雯,2022)、教育人类学(河儿伦,2019)去阐释安代舞。在安代舞创作、传播活动中,艺术家与传承人是最活跃的主体,他们作为安代舞的活态传承者,既是安代舞的实际操作者,又是安代舞文化的传播者。安代舞在展示着蒙古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及精神面貌的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了自己民族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自信;在不同的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又极大地丰富着自己的内涵;以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观的发展来丰富了蒙古族的文化外延,并更好地充实人们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为社会的安定团结做出重要贡献。

安代舞是蒙古族人民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传承文化的载体, 它以其独有的艺术形式与内容, 生动呈现了蒙古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以及历史文化等元素, 是蒙古族文化和传统在当代及未来发展的缩影, 也是蒙古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安代舞作为蒙古族文化的代表, 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传播及接受, 既展示了蒙古族文化的魅力, 也使蒙古族文化获得了创新发展契机。

参考文献:

- [1] 朴永光.试探蒙古族安代舞之原型与变异[J].舞蹈, 1998, (01):50-51.
- [2] 楚歌.传统舞蹈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治理——以安代舞的实践考察为例[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4,(06):82-91.
- [3] 高小康.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非遗保护: 分形传承与公共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0(1):25-32
- [4] 巴·苏和,特日乐.蒙古族安代舞的文化内涵解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14-19.
- [5] 徐英.论蒙古族舞蹈的宗教渊源[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
- [6] 王华.内蒙古科尔沁地区萨满教活动与安代歌舞的考察研究[J].人民音乐, 2000, (10):24-27.
- [7] 耿学刚.仪式歌舞中的和谐生态观——以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歌舞研究为例[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4, (03):96-100.
- [8] 萨出拉.社会变迁与传统安代的现代重构——基于库伦旗安代传承人和地方学者的口述与田野[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1, (04):37-44.
- [9]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Connerton, P.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1] Turner, V.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1969.
- [12] Durkheim, É.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Paris: Alcan, 1912.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Andai Dance and Mongoli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i Jianxing¹

¹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30, China

Abstract: Andai dance, as a cultural carrier and symbo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read of Mongolian culture. Through a series of analysis and analysis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y,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and thinking mod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Mongolian culture. Although Andai dance is a traditional art based on Mongolian culture, it also continues to selectively absorb and integrate different artistic elements of the world, and transform them to form a new form that can convey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express connotation. It forms a modern discourse system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ar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hile maintaining the true meaning of traditional art. Through its inheritance, it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hesion of social groups.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ai dance; Mongolian culture;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金惠顺诗歌中的佛教生态思想研究

杨思楠¹ 邵薇²

(1.广州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在当代诗歌创作中, 金惠顺的诗歌以其对佛教思想的深刻诠释与生态意识的独特表达而备受瞩目。本文以生态批评理论为框架, 结合佛教“缘起”“无我”“慈悲”等核心理念, 着重探讨其诗歌中自然意象的生态意蕴、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以及女性角色在生态实践中的精神超越, 揭示佛教生态智慧如何通过诗歌语言实现从哲学思辨到艺术表达的转化。通过聚焦自然意象的符号化表达、个体与自然的动态关系, 以及慈悲精神对生态伦理的启示, 能够发掘其诗歌在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命运共同体层面的深层价值。

关键词: 金惠顺; 佛教生态思想; 缘起; 无我; 慈悲; 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韩国生态诗歌对儒释道思想的接受与转化研究”(22CWW012) 的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42

前言

佛教思想的核心概念——缘起、无我、慈悲, 构成了金惠顺诗歌的精神内核, 也为她的诗歌注入了深刻的生态哲学内涵。“缘起”作为万物相互依存的哲学基础, 揭示了世间万物因条件而生、相互关联的本质, 与无常和空性的观念紧密相连; “无我”则是对个体自我的超越, 是“缘起”思想的必然结果, 它要求个体放下对自我的执着, 融入更广阔的生命整体; “慈悲”集中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²作为连接万物的情感纽带, 倡导对所有生命的平等共情, 为生态伦理提供了情感支撑。缘起—无我—慈悲, 从哲学角度提供了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万物相互依存, 超越了个人的自我中心, 倡导对他者的理解与关怀, 促使人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金惠顺的诗歌创作体现了缘起、无我与慈悲的佛家生态观, 是对佛教哲学中生态智慧的文学实践。她对自然意象的创造性书写, 打破了主客二元对立, 呈现出万物互联的生态图景。她的作品延续了东方生态智慧的传统, 本文聚焦金惠顺诗歌中佛教思想与生态意识的互动关系, 揭示其诗歌在生态危机时代的精神价值。

一、“缘起论”: 生态整体观的基础

“缘起论”不仅是佛教的核心哲学思想, 也是理解生态整体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佛教中, “缘起”意味着一切现象皆因条件而生, 因条件而灭, 不存在孤立存在的事物。它揭示了世间万物因条件而生、相互关联的本质, 强调生态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陈炎在《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中进一步阐释, 佛教的“缘起性空”——万物互相依赖, 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 通过“消解实体性存在, 强调关系的动态平衡”, 为生态整体观提供了哲学基础。³金惠顺的诗歌通过自然意象的创造性书写, 将这一抽象哲学转化为具象的生态叙事。

作者简介: 杨思楠(2004—), 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

邵薇(1991—), 女, 首尔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 研究方向为东亚现当代文学;

通讯作者: 邵薇

² 潘丹丹: 《佛教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第68-71页。

³ 陈炎: 《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3-30页。

在《鸟之诗集》中，金惠顺宣告：“这本书并非真正的书/它是‘我化身为鸟’的记录”⁴，并坦言：“最终我还是写了《我就是那只鸟》这篇作品，即便我极力抗拒这么做”⁵。这里的“书”（诗集）、“鸟”（存在/意象）、“我”（创作主体）三者形成了闭环式的流动：“我”抗拒书写“鸟”的身份，却最终不得不承认书写的结果就是“鸟”的“写照”；而“鸟”的存在形态（“写照”）又完全依赖于“我”的书写行为，序列中的三者互为缘起，彼此成就，生动体现了“缘起”思想——万物依条件聚合而生，亦随条件离散而灭，不存在孤立、恒常的存在。而这种闭环式的生成关系也暗合华严宗“因陀罗网”的隐喻——万物如宝珠般相互映照，构成无尽缘起的网络。她在诗中强调：“我原以为鸟是我的一部分/实则我也是鸟的一部分”⁶，表明“我”与“鸟”并非分离的实体，而是这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彼此互为组成部分，相互定义。佛教艺术常通过“一即一切”的象征体系表达整体性，金惠顺则通过书—鸟—我的闭环流动，将华严宗“一即一切”的整体性思想，转化为极具张力的现代诗学语言，生动展现了诗歌创作本身即“缘起”法则的例证。

在《挂历》中，金惠顺对生命流转变化的刻画同样精妙。“第二天/白兔死了会变成红兔/因为死后还在流血/很快红兔就会变成黑兔/因为死后还会腐烂。”⁷这里白兔、红兔、黑兔的形态流变，象征着生命由盛转衰，而“兔子死了/既能随意自由地变大/又能变小/能变得像云朵一样大/也能变得像蚂蚁一样小”则强化生命变化的无常感。同时，“偶尔/一只死兔子会转世成沾满血迹的卫生巾”⁸，将兔子的死亡与生命的繁衍建立起一种隐秘联系，“沾满血迹的卫生巾”既指向女性生理的周期性（生），也暗含暴力与死亡的隐喻（血迹）。兔子“死后转世”为卫生巾，将兔子死亡的“血迹”与卫生巾承载的生理“血迹”在视觉上构成呼应。这种并置打破物种边界，将动物的死亡与人类身体的代谢置于同一生命光谱中，诗人用“血”串联生死，朴素地呈现出生死循环中“消逝与存续并存”的本质，把“缘起”思想拓展到了生命形态的流动与融合上。兔子在这些变化中作为一个生命实体的概念被不断打破，展现了自然界的生命的循环和变化，另一方面暗示着万物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和相互联系，看似不同的事物，在生命的循环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当《挂历》以白兔形态的流变揭示了生命在生死循环中的无常性，《女人》一诗则将视角转向社会场域，聚焦战争这一“恶缘”（指佛教中能引发痛苦果报的负面因缘）的破坏性与扭曲力。诗中开篇“当战争的所有大门被撞开，女人们/涌出，堵着门口，摇着头说/不在这儿，他不在这儿”⁹，战争暴力场景瞬间切入，构成后续事件的始“因”。女人们集体撒谎的行为，是对战争暴力的直接抵抗，战争的威胁逼迫她们以谎言来保护男性，形成“战争为因、抵抗为果”的因果链条，这种关联的本质是战争这一“恶缘”对正常轨迹下生命关联的强制扭曲。接着，诗中对于自然的描写：“一棵无花果/阔叶的手掌/藏起了那些未曾开花就已暗结的果/它站在雨中/头不停地摇了又摇”¹⁰，与战争环境相互呼应。无花果“未花先果”的反常生长状态，恰似战争中生命被迫跳过正常发展阶段，直接进入艰难的存续状态，暗喻战争对生命成长规律的破坏。而“站在雨中头不停地摇了又摇”的动态，呼应前文堵门女性的身体颤栗，将自然物与人类置于同一战争背景下，凸显出二者均受战争这一强大破坏性“外缘”的支配与影响，共同呈现出在战争因缘下的无奈与被动，进一步强化了“缘起论”中万物相互依存、同受因缘制约的整体性。暗示着自然也在战争的因缘中受到影响，与人间的苦难相互交织。因此，《女人》一诗揭示了战争作为“恶缘”的本质：它并非简单地建立因果链条，而是以暴力强制性地扭曲、中断、异化万物间本应和谐共生的因缘关系。这种扭曲的根源，深植于人类对权力、资源、自我（“我执”）的极端执着。战争正是“我执”膨胀到极致，将自身意志凌驾于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之上的产物。它颠覆了《风之书》中风与花所象征的和谐因缘，印证了“缘起”法则在人类社会场域中可能遭遇的极端异化形态。

《鸟的诗集》以创作的动态转化呈现生态系统的“因缘网络”本质；《挂历》通过生命形态的流变揭示“缘起无常”的普遍规律；《女人》则以战争语境下的因缘扭曲，反向印证“善缘”与“恶缘”对生态关系的影响。这种从创作过程到生命现象、再到社会暴力的递进剖析，共同印证了“缘起”法则的广阔涵盖：万物皆依条件聚合离散，无孤立恒常之实体；一切关联皆在动态平衡中，却也可能因“恶缘”（如“我执”膨胀的战争）而遭受扭曲。金惠顺的

⁴ Kim Hyesoon: Phantom Pain Wings,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23, p.1-2.

（文中《挂历》源自薛舟翻译；《女人》范静哗翻译；《鸟的诗集》《到处爬的蝴蝶》《大手》《荒山》《梧桐的笑靥》《绽放吧，石油！》《尖叫着》《在传染病房里》由作者翻译）

⁵ Kim Hyesoon: Phantom Pain Wings,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23, p.1-2.

⁶ Kim Hyesoon: Phantom Pain Wings,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23, p.1-2.

⁷ Kim Hyesoon: Autobiography of Death,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18, p.13.

⁸ Kim Hyesoon: Autobiography of Death,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18, p.13.

⁹ David R. McCann: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Korean Poetry, Jiwon Sh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46-248.

¹⁰ David R. McCann: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Korean Poetry, Jiwon Sh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46-248.

诗歌警示我们，所有存在均因因缘而关联，唯有破除“我执”，才能在生命共同体中体认万物共生的本质。下一章将阐释金惠顺如何以身体解构为起点，将“无我”从哲学思辨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态实践。

二、“无我”：身体意识的解构与重构

“无我”是佛教中重要的修行境界，作为“缘起论”的逻辑延伸，它强调个体在认知上的转变，从自我中心走向对整体的认同，消解“我执”的迷恋，融入到更广阔的生命整体中。金惠顺通过身体的去中心化书写，将“无我”的哲学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诗歌语言。在她的诗歌中，“无我”境界的书写始终与自然意象的解构重构紧密交织。她以身体意象为切入点，通过三重书写维度，从对身体的祛魅、认知的颠覆，最终抵达与自然合一的终极消融，展现从“个体身体的无我”到“宇宙生态的无我”的认知跃迁。

《到处爬的蝴蝶》在通过密集的“洞穴”隐喻完成对身体实体性的解构后，以蝴蝶蜕变的过程为认知枢纽，将身体解构的物理层面延伸至生态认知的哲学层面，形成从“破身”到“破执”的完整反思链条。诗中“笛子的洞”“平菇的泥泞”“肉体的洞”形成连续的意象链条，将身体解构为被动的能量通道——灵魂如音乐从孔窍中溢出，肉体如泥沼中的菌菇被动生长。而“仿佛从倒下的肉体的孔洞中/充满痛苦的灵魂挣脱而出”¹¹的对照，进一步弱化了“我”的实体性，瓦解“身体即自我”的固有认知。“甩下那么重的肉/卸下永劫记忆的重担”¹²中肉体作为“自我”最直观的载体，承载着身份认同、欲望与痛苦的重量。而“永劫记忆的重担”则更深一层指向时间维度上的执念，记忆将过往的悲喜、创伤与荣耀凝固为“我”的所谓独特性。诗人以剥离肉体的视觉隐喻，直指“自我”作为社会规训与记忆沉淀的虚妄聚合体。将“自我”等同于可剥离的负担，呼应佛教“破我执”的核心思想。当这些重负被卸下，“自我”便暴露出最原始的形态：一具无名的能量容器。这种解构并非终点，而是通过蝴蝶蜕变展开认知反思：“闪电击碎翅膀”使其回归“爬行状态”是对“超越性追求”的否定。这里的“爬行”并非退化，而是对生态平等的认同——当蝴蝶放弃“飞翔”的优越感，其“握着彩虹般的钟声”的试图抓取，便转化为对“存在之轻”的接纳。当蝴蝶被闪电击碎翅膀、回归爬行状态后，“抓取”的执念被消解，它不再执着于“飞翔”的优越姿态，而是以平等的姿态融入自然循环，接纳自身作为生态系统中普通一员的“轻”（即无特殊意义的存在本质）。这种转变意味着放弃对“自我独特性”的执着，承认所有生命形态（如爬行与飞翔）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同等价值，进而接纳万物平等的生存状态。诗中“无心的闪电”作为自然力的象征，击碎的不仅是蝴蝶的翅膀，更是人类对“自我独特性”的执念，迫使人类直面“我”作为能量载体的本质。

《到处爬的蝴蝶》在完成对身体实体性的解构后导向了认知层面的反思。同样的反思在《大手》中有更深层的体现，诗人通过“不可见”与“可见”的辩证，揭示“自我”的虚妄性。诗中“能看见的人”象征沉溺于物质、功名等表层生活的个体。他们执着于“可见世界”——职场头衔、银行账户、社交标签，误以为这些外在符号是“自我”的全部。“每天将可见世界塞进永劫黑洞”¹³则揭示这种执念的徒劳：就像往无底洞填土，越是追逐可见的标签，越陷入空虚的深渊，遗忘了真正的存在源于“被孕育/在看不见的地下”¹⁴的自然联结。诗中“我”的诞生始于“看不见的地下”。根系在黑暗中吸收养分、菌丝在土壤中传递信息——这些不可见的生态活动，才是生命的真正源头。如同树木的枝叶依赖地下根系，人类的“自我”本质也扎根于不可见的深层存在——集体无意识与自然本能之中，而非社会的标签。社会赋予的“可见身份”不过是枝叶上的露珠，阳光下短暂闪烁，根系才是永恒的生命力。“去那个再也看不见的世界”¹⁵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对认知枷锁的打破。当个体沉入这片黑暗（如贴近土地劳作、静观草木生长），社会强加的“成功标准”便如枯叶般脱落，露出本真的生命状态。“在看不见的地底下/喷涌而出”¹⁶更将“不可见”升华为存在的本源。腐烂的落叶化为养料，蚯蚓的穿行松解土壤，微生物的代谢孕育生命——这些不可见的活动构建起生态系统的根基。而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诗歌、科技、城市），不过是地下能量喷涌至地表的副产品。正如诗中“树木是根系的外在表达”，人类的“自我”也只是生态网络的外显碎片。我们不是地表的主宰，而是地下根系的延伸；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自然循环的参与者。诗中“地下”既是物理空间，也是精神维度的“无我之境”：当个体沉入“挖不完的黑洞”，放下对“可见自我”的执着，便能在“树木与根系同构”的意象中，体认到人类作为“自然根系网络节点”的本质。

当个体从身体到认知完成对“自我”的解构，《荒山》将视野拓展至宇宙纬度，以“荒”为眼，洞见文明遮蔽下的生态本真，深刻展现了个体自我的消解与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过程。诗中“从世界得来的名字很荒谬”¹⁷直接否定

¹¹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1页。

¹²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1页。

¹³ 金惠顺：《我们的阴翳》，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第36页。

¹⁴ 金惠顺：《我们的阴翳》，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第36页。

¹⁵ 金惠顺：《我们的阴翳》，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第36页。

¹⁶ 金惠顺：《我们的阴翳》，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第36页。

¹⁷ 金惠顺：《在桃花下沉睡》，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3年，第8页。

社会赋予个体的标签化存在，而“光着身子的你沿着光秃秃的脊骨飘来”¹⁸的意象，则象征着卸下“人类文明外壳”的本真状态。姓名、身份、地位等在社会语境中被视为自我标识的符号，在诗人眼中不过是文化建构的虚幻表象。这些“名相”如同枷锁，束缚着人们对真实自我与自然本真的认知。而“荒山”所代表的无名、无拘的状态，恰恰是摆脱这种虚幻，回归自然本质的象征。它暗示着，当个体挣脱社会赋予的“假我”，才能真正触碰到世界的原始与真实。“身体是今天的神殿”这一意象则将个体与自然的关系升华为神性共生：当“你”与“我”的界限在荒山情境中模糊，个体褪去文明外衣转化为纯粹感知体，人类与自然共同成为神性载体，每一阵风、每一株紫芒、每一寸肌肤与自然的触碰，都成为宇宙生命共同体的神圣见证。“无法理解的东西如大腿上的阳光”进一步隐喻理性“自我”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直觉层面的天人合一——此时“所有相关者的裸体在风中发光”，人类、草木、虫蚁等一切存在抛却差异，共浴自然之光，具象化呈现“无我”状态下的生命共同体。“荒山”在此超越地理范畴，成为人类精神原乡与未被文明侵蚀的自然象征。个体生命化作宇宙精神的流动通道，在“无我”之境中实现生态与精神的双重超越，达成与万物在宇宙维度的深度联结。

三首诗歌形成清晰的认知递进：《到处爬的蝴蝶》从身体的物理性剥离出发，以“洞穴—蜕变”意象否定“自我”的实体性；《大手》通过“根系—地下”叙事，将“无我”延伸至认知层面的“去表层化”；《荒山》则以“裸体—宇宙”的宏大视野，完成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这种递进的本质，是从“个体身体的无我”到“物种关系的无我”，最终抵达“宇宙生态的无我”。当人类以“非主体”姿态融入自然，理性认知的“自我”随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直觉层面的“天人合一”，指向生命共同体的归宿——唯有消解“我”的边界，方能抵达万物共生之境。

三、“慈悲”：生命共同体的情感建构

“慈悲”作为连接万物的情感纽带，在金惠顺的诗歌中表现为一种“生命对生命的平等共情”——它是破除“人—自然”“自我—他者”二元界限的情感力量，其核心在于承认万物作为生命主体的情感连通性。这种慈悲不同于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基于“缘起论”和“无我说”的认知前提：当万物被理解为因缘网络的节点，“我”与“他者”的界限趋于消融，对他者的痛苦与喜悦的共情，便成为生命本能的自然流露。金惠顺的诗歌将这种抽象的慈悲转化为可感的诗性经验，具体体现为对身体本能的接纳、对自然苦难的共情、对跨物种痛感的共振，以及对生态命运的整体性关怀。

《梧桐的笑靥》以女性群体在自然中的生理行为切口，颠覆性书写“身体羞耻感”，呈现从个体身体解放到建立“人—自然”生命共同体情感共振的慈悲实践过程。诗中年轻女性对生理声响的“羞赧”本质上是社会文明规范加于个体的精神枷锁，而老年女性“多痛快的声音”的坦然，则是对这种精神枷锁的自觉反抗。关键的情感转折点在于“满姐率先笑裂了寂静”引发的群体笑声——这种未经理性过滤的情感爆发，恰是情动理论（聚焦身体先于意识的情感反应机制）中“传染式共振”¹⁹的诗性呈现：笑声这一感官符号经由听觉刺激引动无意识模仿，在“羞赧—坦然”的瞬间转化中瓦解因羞耻感形成的心理隔阂。此时的“笑”超越了情绪表达，升华为慈悲心对“身体平等”的初步实践：通过接纳生理本能自然性，确证人与自然生命基质的同源性。而梧桐树“以年轮的眼慈祥俯视它的女儿们”的拟人化书写，赋予梧桐“年轮之眼”的生命刻度与“慈祥”的情感能力，使其跃升为具有情感关怀的“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主体”。人类身份被重置为“女儿们”，标志身份认同的根本转向：从视自然为被征服的客体（主宰），转向自视为自然所孕育的子嗣（共生）。最终，梧桐的“慈祥”凝视与女性的“痛快”体验交织共振，形成情感共振，驱动了对“人—自然”二元解构，为“生命共同体”奠定了初步的情感平等与接纳基础。

《绽放吧，石油！》则转向对工业文明掠夺逻辑的批判，并通过赋予石油强烈的主体性与情感能力，唤起跨物种的共情。诗人将石油喻为“母亲身体深处的黑血”²⁰，并通过其“因我而起的肮脏战争永不停歇”²¹的自白，将自然纳入“可感知痛苦的生命主体”范畴。当石油被赋予“黑血”的身体属性与“战争自白”的情感能力，人类对其掠夺行为便不再是单纯的资源开发，而转化为对生命主体的暴力伤害。这种主体化书写使石油的苦难成为可感同身受的生命悲剧，有效破除了物种壁垒，建立对自然作为“苦难主体”的深切共情。

在这首诗中，石油不仅是可感知痛苦的生命主体，还是施与慈悲的主体。石油“想以花朵覆盖孩子皲裂双足”的自我牺牲愿望，完成了从“苦难主体”到“慈悲主体”的身份跃升。这一意象体现佛教“拔除他者痛苦”²²的慈悲思想——石油作为工业文明的受害者，却试图以“花朵”这一纯粹的美与温柔，去抚慰“孩子”因贪婪而龟裂的生存

¹⁸ 金惠顺：《在桃花下沉睡》，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3年，第8页。

¹⁹ 田林楠：《从前个体情动到社会性情绪——情动理论视角下的集体情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83-93页。

²⁰ 金惠顺：《在桃花下沉睡》，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3年，第87页。

²¹ 金惠顺：《在桃花下沉睡》，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3年，第87页。

²² 方立天：《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文史哲》2004年第4期，第68-72页。

困境。其中蕴含着一种非功利的关怀——试图以自身（花朵）去抚慰他者（孩子）因工业文明失衡而承受的苦难，与人类现实中以牺牲自然（石油）换取发展的冷酷逻辑形成冲突。这种冲突源自慈悲与共情共有的“反工具理性”特质——当石油不再仅仅被视为“能源工具”，而被赋予主体性的痛苦、愿望以及主动关怀他者的意向时，人类与其的情感联结便超越“利用”的功利联结，建立对自然痛苦的共情联结。石油的“绽放为花”之愿与其最终沦为“盛满黑骨的陶瓮”之现实形成强烈对比，而石油的“黑骨陶瓮”与人类的“皴裂双足”在诗中形成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呼应，二者在“承受工业暴力”的苦难共同体中实现了生命平等。这种平等认知，正是慈悲与共情的共性根基——唯有承认自然与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平等地位，才能催生“视自然痛苦为己出”的慈悲情怀。

《尖叫着》继续通过共享的痛感共享打破物种壁垒，建立深刻的“苦难共同体”。诗中“树木光秃秃的肉/挨了一顿毒打”²³的拟人化书写，赋予自然以人类的疼痛感知；“我们的头发相连”²⁴则突破物种壁垒，使人类与树木成为“苦难共同体”的成员。“十根手指/像扇骨一样展开”²⁵的肢体变形叙事，不仅是边界模糊，更是慈悲共情导致的身体感知和身份认同的主动融合，是主体对他者痛苦形式的具身化接纳。个体的“我”在“我们—树木”的集体悲鸣中消融，代之以一个基于共同苦难的“我们”。当“寒冷的冬夜/山林的树木以更洪亮的呼啸声吞没一切/挥动双腿”²⁶的超现实场景展开，自然不再是沉默的客体，而是与人类同等的“尖叫者”。这种痛感的平等分配，迫使读者直面生态危机的本质：不是“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是“生命共同体的集体创伤”。诗歌以动态的痛苦共情，将慈悲共情在深度（痛感）与广度（跨物种）上推向高峰，使“苦难共同体”成为“生命共同体”最坚实、最令人震撼的情感内核。

《在传染病房里》以灾难叙事将慈悲共情和对“共同体”的认知，提升至宏观、整体、宇宙性的维度，在情感层面具象化生态命运相连的本质。诗中“岛屿”的逐一沉没，隐喻着生态危机如同传染病一般，具有强大的连锁反应和扩散性。当“一个孤独的岛被海浪淹没”²⁷，“剩下的岛屿/到处晃来晃去/一直在喊冤啊，冤啊”²⁸通过岛屿之间的相互关联与集体焦虑，生动地传递出一种弥漫性的生态恐惧与命运相连的悲怆情感。“摇摇晃晃”不仅是物理晃动，更是心理崩溃的肢体映射，而重复的“喊冤啊”以声音震颤直接外化冤屈、恐惧与不解的集体情绪，情动张力达到高潮。全诗以能“看见存在的东西”作结，这“看见”并非孤立的情动词汇，而是对前述层层递进的身体化情动体验（淹没的窒息、哭诉的震颤、吞噬的冰冷、塞住嘴的压抑、波涛侵入的触痛、撒土的死亡仪式）的凝练与超越。它要求人类以躯体共感（而非仅以理性认知）去体认“淹没”“吞噬”“摇摇晃晃”“冤啊”“塞进嘴里”“进出”“撒土”所传递的生态痛感，进而超越个体私利，在情感共振中以“缘起”视角“看见”：所有生命在生态危机中都是“被淹没的岛屿”，唯有以慈悲之心感知他者痛苦，才能建立“生命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诗歌正是通过极具身体性的情动符号链，将“慈悲共情”具象为可感可痛的神经震颤，以慈悲之心“看见”万物在危机中的情感联结，从而唤醒对生命共同体的终极关怀。

四首作品构建起一个清晰的慈悲情感生成与深化的情动谱系：《梧桐的笑靥》通过情感表达（笑声）启动情感流通，达成“个体身体共情”向“自然群体共情”的转变，奠定共同体情感接纳基础。《绽放吧，石油！》赋予自然以主体性的痛苦与关怀意愿，揭示工业掠夺的伦理暴力，唤起读者对自然作为苦难/关怀主体的深度共情与平等认知。《尖叫着》通过极致的跨物种具身化情感表达，在深度痛感中构建“物种情感共振”的苦难共同体，激发行动驱动力。《在传染病房里》以宇宙性灾难隐喻（岛屿沉没）呈现生态命运绝对互联，最终以“看见”召唤基于整体性慈悲共情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与实践。

结语

金惠顺的诗歌远非对佛教教义의简单图解，而是通过意象的动态转化、身体的诗学解构、情感的跨物种共振这一三位一体的策略，将佛教“缘起-无我-慈悲”的生态哲学，转化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介入力量的生态诗学。通过对“缘起”法则的深刻体认，其诗歌以循环流转的自然意象系统生动呈现了万物互联互通、互为条件的生态整体性，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根基。“无我”境界的达成，则体现为一系列极具冲击力的身体解构与认知颠覆书写——从祛魅肉体实体到剥离社会假面，直至在宇宙尺度上消融个体边界，引导读者在强烈的感官与认知冲击中体认“我执”之虚妄，最终导向与自然本体的融合。而“慈悲”精神的灌注，则升华为一种跨物种的生命共情机制——无论是接纳身体本能以重建人与自然平等，赋予自然物以主体性的苦难与关怀，还是共享痛感以构建“苦难共同

²³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24页。

²⁴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24页。

²⁵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24页。

²⁶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24页。

²⁷ 金惠顺：《在另一个星球上》，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1年，第26页。

²⁸ 金惠顺：《在另一个星球上》，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1年，第26页。

体”，都深刻彰显了基于“缘起”与“无我”的生态伦理情感。这种情感在灾难隐喻中，最终凝聚为对生态命运互联的体认与整体性关怀。

金惠顺的诗歌创作不仅提供了东方生态智慧的当代文学样本，更以震撼人心的艺术方式，在生态危机时代叩击灵魂，为重建文明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指明了一条经由精神超越抵达生态觉悟的救赎之路，为理解生命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 [1] 潘丹丹,佛教生态伦理思想探析[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6(4):68-71.
- [2] 陈炎,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 [3] Kim Hyesoon, Phantom Pain Wings, Don Mee Choi,Newyork: New Directions,2018.金惠顺,幻痛之翼[M], 崔都美译, 纽约:新方向出版社,2018.
- [4]Kim Hyesoon, Autobiography of Death, Don Mee Choi, Newyork: New Directions, 2018.金惠顺,死亡自传[M], 崔都美译, 纽约:新方向出版社,2018.
- [5]David R. McCann,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Korean Poetry , Jiwon Shin,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246-248.
- [6]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M], 首尔: 文学与知性社, 1985年。
- [7]金惠顺,我们的阴 [M], 首尔: 文学与知性社, 1990年。
- [8]金惠顺,在桃花下沉睡[M], 首尔: 创作与批评社, 2003年。
- [9]田林楠,从前个体情动到社会性情绪——情动理论视角下的集体情感[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83-93.
- [10]方立天,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J],文史哲,2004(4):68-72.
- [11]金惠顺,在另一个星球上[M], 首尔: 文学与知性社, 1981。

The Buddhist Ecological Thought in Kim Hyesoon 's Poetry

Yang Sannan¹, Chen Yuyi², Shao Wei*

¹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poetry creation, Kim Hyesoon 's poetr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or its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Buddhist thought and unique expression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takes ecological criticism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and combines the core Buddhist concept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non - self," and "compassion." It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natural imagery,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he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of female figures in ecological practice in her poetry. It reveals how Buddhist ecological wisdom is transformed from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to artistic expression through poetic language. By focusing on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of natural imagery,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nature, and the inspiration of compassion for ecological eth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ep - rooted values of her poetry in dissolving anthropocentrism and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life.

Keywords: Kim Hyesoon; Buddhist Ecological Thought; Dependent Origination; Non – Self; Compassion; Community of Life.

《茶经》两英译本的对外传播差异——以译者翻译风格为例

王海波¹

(1.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由唐代学者陆羽编撰的《茶经》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早且最全面的茶学著作。迄今为止, 该书已有两个完整的英文译本, 即 Francis Ross Carpenter 的译本与姜欣、姜怡合作翻译的版本。本文运用语料库方法, 选取《茶经》的这两个英译本及一个参考语料库, 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对比分析其翻译风格及语言特征。研究发现: 在词汇层面, 姜欣与姜怡的译本相较 Francis 的译本, 词汇更丰富多样, 信息量也更大; 在句子层面, 姜译本句式较长且更复杂; 在语篇层面, Francis 的译本更倾向使用连词和标点符号作为衔接手段, 因而在可读性上略胜一筹。本研究为中国农学典籍的英译与国际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茶经》; 翻译; 语料库; 译者风格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85

1. 引言

《茶经》是中国古典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 全书分三卷十节, 涵盖了茶的起源、种植、制作、饮用及器具等内容。在国内外, 《茶经》都被视为茶文化经典。根据孔令翠和刘芹利^[1]的研究, 该著作已有两个英文节译本 (William Ukers 的 *All About Tea* 和 James Pratt 的 *The Art of Tea*) 以及三个英文全译本: 1974 年 Francis Ross Carpenter 的译本 *The Classics of Tea: Origins & Rituals*, 2009 年姜欣和姜怡的译本《茶经》(*The Classics of Tea*), 以及 2023 年邱贵溪译本《茶经》(*The Classics on Tea*)。本研究以《茶经》中文原著及两个主要英文全译本为语料, 结合平行语料库分析方法, 聚焦两译本的语言特征和翻译风格差异, 同时探讨译者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的选择对译文特征的影响。

2. 文献概述

语料库翻译学是通过构建并分析翻译语料库, 从而系统性研究翻译语言特征的一门学科^[2]。Baker 在 1993 年首次提出将语料库语言学技术引入翻译研究, 并强调这可为翻译学从规约性研究向描述性研究转型提供支持^[3]。2000 年, Baker 进一步通过语料库对比研究揭示出译者风格的多样性,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个性化语言特征”^[4]。Laviosa^[5]在其研究中提出, 借助语料库翻译学的方法构建包含译者翻译作品的平行语料库, 并结合译者的原生文学创作作为参照语料库, 可以更加有效地分析和揭示译者的语言选择及其翻译风格。国内学者如黄立波与朱志瑜^[6]、胡开宝与谢丽欣^[7]等, 结合 Baker 提出的译者风格理论, 从词汇、句法及翻译策略等多维度展开对译者风格的探讨。关于《茶经》的译介研究, 目前多集中于翻译理论阐释, 基于定量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 采用语料库方法的分析更为少见。因此, 本研究将通过语料库方法对两个主要译本展开对比分析。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语料

研究语料包含《茶经》原文及两个英译本。Francis 译本首次出版于 1974 年, 是该书的首个英文全译本; 姜欣与姜怡的译本则于 2009 年收录于《大中华文库》。由于两译本在译者文化背景及出版年代等方面差异显著, 具有一定的比较研究价值。参照语料则选用了 AntConc 自带的 BE06_K_fiction_general.db 语料库 (容量为上述两个译本五倍左右)。

作者简介: 王海波(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翻译理论与实践。

3.2 研究问题

本研究结合语言特征与翻译策略，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在词汇层面，两个译本呈现出哪些翻译风格差异，其成因是什么？（2）在句子层面，两个译本呈现出哪些翻译风格差异，其成因是什么？（3）在语篇层面，两个译本呈现出哪些翻译风格差异，其成因是什么？

3.3 研究方法

在确定研究译文后，本研究开始构建平行语料库。该自建平行语料库包含《茶经》的中文原著及两个英文译本。建库流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语料收集、文本降噪清洗、以及人工对齐和标注。首先，进行中英文本的收集与双语语料的录入。通过网络渠道获取《茶经》原文及两个英文译本的电子版后，将这些文本录入到 Word 文档中，并执行语料清洗与校对等步骤，然后将文档转换为以 Unicode (UTF-8) 编码的 TXT 格式。其次，本研究使用 ABBYY Aligner 软件对两个英文译本进行句级对齐。对齐过程中，主要以中文原文的句子划分为基准，对自动对齐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手动校正，并对译本中缺失或不对应的部分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删减。接着，将完成对齐的语料导出，并分别粘贴到以 Unicode (UTF-8) 编码的 TXT 文档中，确保中英文文本分别存储。随后，利用 NLP-Parser 对中文原著和两个英文译本进行批量分词处理，使用 Corpus Word Parser 对中文原著进行标注，同时利用“CLAWS7”在线词汇标注工具对两个英文译本进行词性标注。最后，本研究采用 WordSmith Tool、不同版本的 Antconc 软件（引入停词表和词性还原表）以及 BFSU-HugeMind Readability Analyzer 等工具，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对两个英文译本的语言特征进行对比描述分析。

4. 语言特征层面对比分析

4.1 词汇层面

文本的词汇丰富度可以通过类符/形符比 (Token Ratio, TTR) 来衡量。类符 (types) 指的是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重复的词汇，而形符 (tokens) 则是指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所有词汇。杨惠中^[8]指出，“类符/形符比能够揭示文本的词汇量和词汇使用的多样性”。一般而言，类符/形符比的值越低，则表明文本的词汇多样性较为有限。为确保两个文本间的可比性，并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本研究采用了以每 1000 词作为计算单位的类符/形符比。此外，为了进一步标准化比较结果，本研究还引入了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Standard Type Token Ratio, STTR) 来进行计算和统计分析。

表 1 二译本类符形符比

	姜欣、姜怡译本	Francis 版本
类符数	2987	2234
形符数	11648	10631
类符形符比	25.64%	21.01%
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47.51%	41.85%

根据表 1 的数据，姜欣和姜怡的译本（以下简称为“姜译本”）在类符数量和形符数量上均略高于 Francis 的译本，这一点在类符/形符比 (TTR) 和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STTR) 的数据上也得到了体现。总体上，Francis 译本的语言风格更为简洁，但在词汇丰富度方面略逊于姜译本。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姜欣和姜怡在翻译《茶经》时，考虑到文本中包含的大量专业术语，因此在翻译中增加了注释和解释，采取了更为明晰化的翻译策略。对比两个译本后发现，发现 Francis 译本 TTR 值较低，这主要是由于其用词简洁，并且更倾向于忠实原文的翻译，较少添加修饰性词汇。而姜译本的词汇丰富度较高，这与两位译者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和对汉语的熟练掌握密切相关，使得他们在词汇选择上更加灵活多变。以下仅举一例以此分析说明。

例 1: 其炭曾经燔灸，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13]34-35}

姜译本: Charcoal leftover from barbecue fire is soiled with odor and grease, which, if used to process tea, will spoil its pure flavor. Resinous wood (such as cypress, cassia-bark tree and juniper) and timbers of old wooden articles (worn or rotten household items), too, will contaminate the tea, so they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suitable fuel as well.^{[13]34-35}

Francis 译本: However, charcoal that has been used before will give off a musty, rank and greasy smell. One must never use an oily wood or worn-out or discarded utensils as fuel.^{[12]103}

分析: 姜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其语言表达更为生动和具体，对于原文中的专业术语，译者不仅提供了直译，还通过举例说明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联想。这样的翻译策略无疑增加了译文的篇幅和词汇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姜译本之所以篇幅较长且词汇丰富度较高的部分原因，在于译者致力于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和信息的

传递效果,使得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把握原文的内容和意图。这种翻译方法在传递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体验。

词汇密度 (lexical density) 是衡量文本词汇丰富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同时反映了文本的信息含量以及阅读的难易程度。词汇密度是指实词在文本总词数中所占的比例。英语词汇通常被分为实词和虚词。根据杨信彰^[9]的分类,“实词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大部分副词,而虚词则包括介词、限定词、代词、连词等”。实词携带了句子的主要信息内容,而虚词则主要承担语法功能,本身不具有完整意义。通常情况下,一个文本的词汇密度越高,其信息量越大,相应的阅读难度也会增加。在本研究中,为了计算词汇密度,我们只需统计文本中的主要实词数量,从而推算出虚词的大致数量。在完成词性标注后,通过正则表达式来检索和统计相关词性出现频次。

表2 二译本词类频率分布

	姜欣、姜怡译本		Francis 译本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名词	3730	32.02%	2820	26.53%
动词	1198	10.29%	1105	10.39%
形容词	1069	9.17%	670	6.30%
副词	380	3.26%	293	2.76%
实词数	6377		4888	
词汇密度	54.75%		45.98%	

根据表2的数据,姜译本的词汇密度是54.75%,而Francis译本的词汇密度是45.98%。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Francis的译本出版于1974年,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中国的茶文化经典,译者可能有意降低了文本的阅读难度。相比之下,姜译本于2009年出版,其内容不仅包括《茶经》的原文和对应英文译文,还包含了现代汉语的翻译,这使得其信息量更大,可能也导致了一定的阅读难度。这一点在后续的分析中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从表2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尽管姜译本和Francis译本的动词数量相近,但姜译本的名词数量显著多于Francis译本。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与上述原因相似,即姜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了大量名词,用以解释原文中的专业术语,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而Francis译本则可能更加注重忠实于原文,保持了句子结构的基本框架,因此原文中的动词在译文中大多保持了原有的词性,而没有进行词性转换。这样的翻译策略可能是为了保持原文的风格和流畅性,同时也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AntConc软件的关键词表(Keywords)功能来检索两个译本中的高频词汇。高频词汇是指在语料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译者在词汇选择上的偏好。“高频词汇的频次占比可以作为译本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10]本研究分别统计了两个译本中前十位高频词汇的出现频次。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我们在统计过程中引入了停用词表,排除了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等。

表3 二译本高频词

	姜欣、姜怡译本		Francis 版本	
	Keywords	频次	Keywords	频次
1	tea	302	tea	195
2	water	45	chou	73
3	bamboo	36	water	43
4	leaves	36	called	28
5	extracted	35	bamboo	25
6	called	26	inches	21
7	inches	22	wood	20
8	dynasty	22	leaves	18
9	district	19	quality	17
10	bowls	19	bitter	17

从表3中可以观察到,在两个英文译本中,“tea”这一词条的出现频率最高,这与《茶经》的主题紧密相关。除了“tea”之外,两个译本中还有部分高频词汇是相同的,例如“water”、“bamboo”、“inches”、“called”。其中,“water”、“bamboo”与泡茶和采茶的过程有关,而“inches”、“called”则与茶具的尺寸和命名相关。表格数据显示,两个译本的高频词汇总体上是相似的,主要涉及茶、制茶过程、茶具、茶的产地以及时间等方面。差异之处在于Francis的译本中包含了两个与品茶体验相关的词汇。在Francis的译本中,“Chou”(州)是第二高频的词汇。对于“Chou”

这一汉字的翻译，两个译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具体差异可见于例 2。这表明，尽管两个译本在词汇选择上有一定的共通性，但在处理某些特定词汇时，译者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目的，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例 2: 山南: 以峡州上。^{[13]76-77}

姜译本: In Shannan District (geographically around the present provinces of Hubei, Hunan, Shaanxi, and Sichuan), Xiashou tea is the best in quality.^{[13]76-77}

Francis 译本: Shan Nan: In Shan Nan, Shan Chou tea is of the best quality.^{[12]143}

分析: 在姜译本中,“州”被翻译为“zhou”,并且通常与前一个字结合形成一个复合词;相反,在 Francis 的译本中,“州”被翻译为单独的词汇“Chou”。由于《茶经》中频繁提及带有“州”字的地名,这解释了为何在 Francis 的译本中“Chou”会成为一个高频词。这种翻译方式的不同体现了译者对文化专有项的处理策略,以及如何在不同语言体系中传达相同的概念。Francis 选择将“州”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词,可能是为了保留原文中的地理文化信息,同时也可能反映了目标语言(英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

为了深入比较两个译本在词汇使用上的差异,本研究对两个译本的词长进行了分析。词长分析涉及对语料库文本中不同长度词汇的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平均词长是指文本中所有词汇的平均字符长度,它通常被用作评估文本阅读难易程度的一个指标。一般来说,平均词长越长,意味着所用词汇越复杂,文本的阅读难度也相应增加。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包含 4 个字母以下的词汇定义为简单词汇,而将包含 7 个字母以上的词汇定义为复杂词汇。利用 WordSmith 软件对两个译本的平均词长进行了分析。

表 4 二译本平均词长

	姜欣、姜怡译本		Francis 版本	
	数量	占比 (%)	数量	占比 (%)
少于 4 个字母	6885	59.11%	7197	67.70%
多于 6 个字母	3336	28.64%	2278	21.43%
平均词长	4.4		4.66	

根据表 4 的数据,姜译本的平均词长为 4.4,而 Francis 译本的平均词长为 4.66。这表明两个译本的词汇复杂度都不高,这可能是由于原文本的难度较大,导致两位译者都倾向于使用更简单的词汇,以避免增加西方读者在阅读和传播上的障碍。尽管姜译本的总形符数多于 Francis 译本,但 Francis 译本中少于 4 个字母的词汇数量实际上多于姜译本。同时,Francis 译本中多于 6 个字母的词汇数量远远少于姜译本。这一数据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即 Francis 译本阅读难度相对较低,这可能使其对西方读者来说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两个译本在词汇选择上的差异反映了译者对目标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以及他们对原文内容传递的策略。Francis 译本倾向于使用更短的词汇,这可能有助于降低阅读难度,而姜译本虽然使用了更多的形符和较长的词汇,但整体上仍然保持了较低的词汇复杂度,以适应原文的难度和目标读者的需求。

4.2 句法层面

在翻译研究中,句法层面的语言特征分析通常包括对平均句长和句长标准差等指标的考察。本研究同样采用了这些指标来分析两个译本的句法特征。平均句长是指语料库中文本句子的平均词数,这一指标不仅是翻译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本的阅读难易程度。通常情况下,平均句长较短可能意味着文本的句式结构较为简单,从而更易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而平均句长较长则可能表明文本的句式结构较为复杂,可能会给读者的阅读理解带来一定的挑战。本研究利用 WordSmith 软件对两个译本的平均句长进行了分析。

表 5 二译本平均句长及句长标准差

	姜欣、姜怡译本	Francis 版本
句子个数	608	650
平均句长	19.16	16.36
句长标准差	13.05	9.67

根据研究结果,姜译本的平均句长为 19.16 词,标准差为 13.05;而 Francis 译本的平均句长为 16.36 词,标准差为 9.67。这表明姜译本的句法结构相对更为复杂,其句子的平均长度超过了 Francis 译本。句长标准差的大小反映了文本中句子长度相对于平均句长的波动程度。Francis 译本的句长标准差较小,意味着其句子长度较为一致,波动性较低。这些数据表明,在句子层面上,两个译本在翻译语言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Francis 译本的句子长度较为统一,可能使得文本的阅读难度相对较低,更加易于读者理解和消化。相比之下,姜译本由于平均句长较长且句长波动较大,可能会给读者带来更高的阅读难度,尤其是在理解复杂句式结构时。因此,可以推断 Francis

译本在面向一般读者时可能具有更好的可读性，而姜译本则可能更适合那些寻求更深入理解原文内容和风格的读者。

4.3 语篇层面

连接词在维持语篇连贯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为了分析两个译本中连接词的使用情况，我们采用了语料库词性标注工具“CLAWS7”对文本进行词性标注，并将标注后的文件导入词汇检索工具 AntConc 中，以便对显性连接词和标点符号进行检索。

表 6 两译本显性连接词与标点符号的使用

	姜欣、姜怡译本		Francis 版本	
	频次	频率 (%)	频次	频率 (%)
显性连接词	552	4.74%	735	6.91%
;	45	0.39%	46	0.43%
.!?	620	5.32%	663	6.24%
标点符号合计	665	6.26%	709	6.67%

根据表 6 的数据，姜译本中共使用了 552 个显性连接词，占总文本词数的 5.1%；而 Francis 译本则使用了 735 个显性连接词，占总文本词数的 6.91%。这一数据表明，Francis 译本在句法层面上显性连接词的使用频率更高，这反映出 Francis 译本在表达语法和逻辑关系时，更多地采用了功能性的词汇，使得译文在清晰度和易理解性方面有所提升。这种翻译策略可能与译者作为英语母语者的身份有关，符合英语作为一种倾向于形合的语言特征。

在分号的使用上，姜译本出现了 45 次，占总词汇的 0.39%，而 Francis 译本出现了 46 次，占总词汇的 0.43%。尽管两个译本在分号使用上的差异不大，但 Francis 译本使用分号的频率略高，这进一步说明 Francis 译本在显性连接作用的标点符号使用上更为频繁，从而表明 Francis 译本在形合方面的倾向性。正如霍跃红^[1]所指出的，“英语的形合特征在语法要求上体现为，如果隐性地连接两个短句，则需要借助标点符号来确保句子的正确性，这类标点主要包括句号、感叹号等”。在这些标点符号的使用上，Francis 译本同样超过了姜译本。无论是显性连接词还是隐性连接手段的使用频率，Francis 译本均高于姜译本。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Francis 译本的译文结构更为简洁，阅读起来更加流畅和易于理解。

在本研究中，为了探讨文本的可读性，我们利用了 BFSU-HugeMind Readability Analyzer 2.0 工具对两个英文译本进行了自动化的分析。该分析器内置了两个评估指标：弗莱士易读度(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和弗莱士-金凯德难度级数(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弗莱士易读度分数的范围在 0 至 100 之间，分数越高，表明文本的难度越低，可读性越强。通常情况下，弗莱士易读度分数的增加意味着文本的阅读难度降低。具体而言，分数超过 90 分表明文档极易阅读，分数在 70 至 80 分之间则表示文本较为易读，而 60 至 70 分则被认为是标准的可读性水平。弗莱士-金凯德年级水平分数与美国教育体系中的年级水平相对应，例如，一个文本的弗莱士-金凯德年级水平为 9，意味着读者大约需要完成九年教育（相当于九年级水平）才能轻松理解该文本。表 7 展示了两个英文译本的可读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 7 二译本文本可读性

	姜欣、姜怡译本	Francis 版本
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	60.37	75.63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9.59	6.74

根据表 7 中的两个可读性指标数值，我们可以观察到 Francis 的译本在文本可读性方面显著优于姜的译本，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5. 结语

本研究利用语料库检索工具 AntConc 与 WordSmith，“CLAWS7”在线词性标注工具，ABBY Aligner 对齐工具，以及英文文本可读性分析工具 BFSU-HugeMind Readability Analyzer 2.0 软件，基于自建的平行语料库，对两个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了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并探究了这些风格特征背后的成因。以下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首先，姜译本在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和平均句长这三个指标上均高于 Francis 的译本，这表明姜译本在词汇选择上更为丰富和多样化，句式结构更为复杂，且承载了更多的信息量。其次，姜译本在连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普遍少于 Francis 的译本，这反映出 Francis 的译本更倾向于使用显性或隐性的衔接手段来增强文本的连贯性。再次，从平均词长、词汇密度和文本可读性的数据分析来看，姜译本在可读性方面较 Francis 的

译本更困难。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词汇层面、句子层面还是篇章层面,Francis的译本相较于姜译本,更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尽管两个英译本在翻译风格上存在差异——例如,姜译本通过显化的翻译策略充分传达了原文信息,而Francis的译本则在简洁的语言之外辅以插图,以增强文本的吸引力和可读性,适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作为农业典籍的翻译作品,两译本均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推动农业典籍翻译及其国际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孔令翠,刘芹利.中国农学典籍译介梳理与简析[J].当代外语研究,2019(4):106-114.
 [2]胡开宝.语料库翻译学:内涵与意义[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5):59-70.
 [3]BAKER M.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A]. Baker, M., Francis, G & Tognini-Bonelli, E.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93:233-252.
 [4]BAKER 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J].Target,2000(2):241-266.
 [5]LAVIOSA 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Findings and Applications [M]. Amsterdam: Rodopi, 2002 .
 [6]黄立波,朱志瑜.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以葛浩文英译现当代中国小说为例[J].外语研究,2012(5):64-71.
 [7]胡开宝,谢丽欣.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内涵与路径[J].中国翻译,2017(2):12-18.
 [8]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9]杨信彰.英语书面语体中的词汇密度特征[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3):14-18.
 [10]张继东,朱亚菲.基于语料库的《追风筝的人》两译本风格对比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20(5):50-57.
 [11]霍跃红.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比较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11-115.
 [12]CARPENTER F R. The Classic of Tea: Origins & Rituals[M]. New Jersey: The Ecco Press,1974.
 [13]姜怡,姜欣.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茶经·续茶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The Differences of Reception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Classic of Tea—Taking the Translation Style as an Example

Wang Haibo¹

¹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 of Tea* written by Lu Yu of the Tang Dynasty is the earliest, most complete, and most comprehensive monograph on tea existing in China and even worldwide. To date, there have been two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s: the Francis Ross Carpenter version and the version co-translated by Jiang Xin and Jiang Yi. This study employs a corpus-based approach, selecting the above two translations and a reference corpus, focusing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styles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at the lexical, sentence, and discourse levels. The findings reveal: At the lexical level, the Jiang translation uses a more diverse vocabulary with a greater amount of information carried than the Francis translation; at the sentence level, the Jiang translation employs longer sentences and more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s than the Francis translation;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he Francis translation tends to use conjunctions and punctuation as cohesive devices more frequently, and its readabili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Jiang transl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lassic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agricultural classics.

Keywords: *The Classic of Tea*; translation; corpus; translation style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标举：以《六一诗话》第二七为例

阳宇航¹ 韦佳华¹

(1.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标举, 在《六一诗话》第二七中有较为集中的表现。欧阳修先总论韩诗的整体风貌, 再专论韩诗的用韵技巧, 着力于称颂韩诗的笔力“乃天下之至工”, 其实质则是对韩诗“以文为诗”的标举。此般理解, 上承柳开、穆修、石介, 下启苏轼、黄庭坚, 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地位。欧诗承韩, 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 与宋诗风格的形成关系深远而密切, 可称奠基之功。

关键词: 欧阳修; 《六一诗话》; 韩愈; 诗歌; 接受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91

一、引言：从文学接受谈起

文学接受属于接受美学的研究范畴。相对于传统文学研究对作者、作品的专注, 接受美学突破性地从本体论高度提出了读者和阅读接受的问题, 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重视阅读经验。

在古典文学领域引入接受美学理论, 确能拓展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在唐宋比较的传统视角中, 讨论宋人对唐人诗歌创作的接受, 这便于清晰把握唐宋诗人的创作风貌、观照唐宋文学史中诗歌的嬗递脉络。

笔者基于学界关于欧阳修对韩愈诗歌接受的共识(即欧阳修是韩愈诗歌的“第一读者”, 此观点主要参见查金萍的《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刘磊的《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谷曙光的《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和《韩愈诗歌在北宋的接受历程及其诗学意义发微》), 以欧阳修晚年的《六一诗话》第二七为切入案例, 通过对韩愈的《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与《病中赠张十八》的形式分析, 阐释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标举, 以此探讨唐诗与宋诗的部分深层联系。

二、《六一诗话》第二七中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

“第一读者”的概念最早由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在《文学研究中一种挑战的文学史》一文中提出: “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 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 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1]以“第一读者”来肯定欧阳修在韩愈诗歌接受史中的地位是有理据的。欧阳修之前, 韩诗是被忽视的, “是时天下学者, 杨、刘之作, 号为‘时文’, 能者取科第, 擅名声, 以夸荣当世, 未尝有道韩文者”^[2]。至于此后“学者非韩不学也”^[2]的盛况, 则离不开欧阳修对“寂寥二百年”^[2]的韩诗的学习与接受。不同于宋初六十年间柳开、穆修、石介等人立足道学立场的韩文接受,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既在《新唐书》的修撰中肯定崇韩的权威(《新唐书》基本出于欧阳修、宋祁两人之手, 其中列传部分由宋祁编撰, 也能表现了欧阳修的观点态度。《韩愈传赞》中认为韩文“粹然一出于正”, 以为“学者仰之(韩愈)如泰山北斗云”。), 又从文学本位出发力倡学韩, 奠定了韩诗“以文为诗”的接受基调, 与宋诗诸大家的诗风上息息相通。

下面着重就文学本位阐述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欧阳修晚年在《六一诗话》中强调了韩愈的创作在诗歌史上的重要意义, 现逐录第二七如下: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 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 故其诗曰: “多情怀酒伴, 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一作“发”)谈笑, 助谐谑, 叙人情, 状物态, 一寓于诗, 而曲尽其妙, 此在雄文大手, 固不足论, 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

作者简介: 阳宇航(2003—), 男, 四川成都人, 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韦佳华(2002—), 男, 广西桂林人, 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研究方向为汉语言语法学。

本文二位作者不分先后, 共同为本文第一作者。

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流，泛入傍韵，乍还乍离（以上四字一作“乍去乍还”），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一作“夫”）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此下一有“弥”字）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3]

《六一诗话》中的这一大段阐释是相当精辟的，文意大致可归为先总后专的两部分：先是总论韩诗的整体风貌，再是以韩诗用韵的技巧章法为切入点举例论析。

（一）欧阳修对韩愈诗歌整体风貌的论断

欧阳修认为韩诗的整体风格有两点的体现：一是“笔力无施不可”；二是“资谈笑，助谐虐，叙人情，状物态”。

“笔力无施不可”，从字面意义出发，主要是讲韩诗没有什么内容是不能表达好的；从字后意义观察，则侧重于讲韩诗在语言处理上的理性色彩、在创作题材上的包举众象。其与接下来的“资谈笑，助谐虐，叙人情，状物态”是一脉相承的，有意反复强调韩诗在记叙上的特色、承认韩诗有相当的表现力。此两点融汇于韩诗之中，能“曲尽其妙”，更反映了韩愈“以诗为文章末事”的艺术判断。欧阳修对韩愈“以文为诗”的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具体便体现在这般笔法、笔力两点：以古文笔法作诗，方有“资谈笑，助谐虐，叙人情，状物态”的广度；在诗文创中保持理性思考以探求迂回表象背后的深层之“妙”，正是达到“笔力无施不可”的应行之径。

（一）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用韵技巧的探析

至于专论欧阳修“独爱”的韩诗用韵，则有“工于用韵”的形式特征与“天下之至工”的接受肯定。

分析诗歌用韵属于诗法技巧的考察，侧重于诗歌形式，与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研究有同工之妙。在这里，欧阳修例举韩愈两首用韵的典型之作，敏锐地洞见韩诗用韵的“惟意所之”，可知韩诗笔力的雄浑恣意、隽永老成，堪称“天下之至工”。

举《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例，当其所用韵范围宽而包括字数多时，韩愈有意颠难倒易，转入他韵：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舍酒去相语，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属相府，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见，百端在中肠。维时月魄死，冬日朝在房，驱驰公事退，闻子适及城。命车载之至，引坐于中堂，开怀听其说，往往副所望。孔丘没已远，仁义路久荒，纷纷百家起，诡怪相披猖。长老守所闻，后生习为常。少知诚难得，纯粹古已亡。譬彼植园木，有根易为长。留之不遣去，馆置城西旁，岁时未云几，浩浩观湖江。众夫指之笑，谓我知不明，儿童畏雷电，鱼鳖惊夜光。州家举进士，选试缪所当，驰辞对我策，章句何炜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鸣。礼终乐亦闋，相拜送于庭。之子去须臾，赫赫流盛名。窃喜复窃叹，谅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伤。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恍难为双。暮宿偃师西，徒展转在床。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傍徨。我时留妻子，仓卒不及将，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骄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东来说，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东去趋彭城。从丧朝至洛，还走不及停。假道经盟津，出入行涧冈。日西入军门，羸马颠且僵。主人愿少留，延入陈壶觞。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饮食岂知味，丝竹徒轰轰。平明脱身去，决若惊凫翔。黄昏次汴水，欲过无舟航，号呼久乃至，夜济十里黄。中流上滩渚，沙水不可详，惊波暗合沓，星宿争翻芒。辕马踟蹰鸣，左右泣仆童。甲午憩时门，临泉窥斗龙。东南出陈许，陂泽平茫茫。道边草木花，红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雉鸣。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谁云经艰难，百口无夭殇。仆射南阳公，宅我睢水阳。篋中有馀衣，盎中有馀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日念子来游，子岂知我情？别离未为久，辛苦多所经。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我友二三子，宦游在西京，东野窥禹穴，李翱观涛江。萧条千万里，会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子又舍我去，我怀焉所穷？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高爵尚可求，无为守一乡。^[4]

诗韵繁复，加之《切韵》原书佚散已久，考察唐诗押韵益以宋人的《广韵》为反切的范本、以平水韵为分类依据。对《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的诗韵考察，笔者认同清人方世举的观点，以为“此诗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4]。本诗开篇押的是下平声中的七阳，后来在中途又先后转入八庚、九青、三江、一东、二冬，到收尾又回归阳韵，是一首格式较为常见的平声韵五古。

从“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至“留之不遣去，馆置城西旁”，这十六韵中，除“闻子适及城”的“城”是庚韵外，均是阳韵。（城，《广韵》是征切，平清禅，为庚韵。《补释》城，叶辰阳切。笔者不同意《补释》，认为没必

要叶韵，如朱子《举正》中所言：“‘城’字从阁本、曾李校本。范本云绍圣本作‘城’。作‘墙’自杭本也。此诗后用‘东去趋彭城’，‘凉知有所成’，皆庚韵也，何独于此疑之。此诗视古用韵：首篇不入今韵者，多为后学以意妄改。”后有“妄改”者，限于篇幅，概不复指。)随后，“浩浩观湖江”的“江”，古双切，江韵；“谓我知不明”的“明”，武兵切，庚部。刚用“光”（古黄切，阳韵）、“当”（都郎切，阳韵）、“煌”（胡光切，阳韵）转回阳韵不久，“鸣”（武兵切，庚韵）、“庭”（特丁切，青韵）、“名”（武并切，庚韵）、“成”（是征切，庚韵）又转入他韵。至此以后，转出阳韵的韵字数量愈多，频率愈高，如下：“情恍难为双”的“双”，所江切，江韵；“零落甘所丁”的“丁”，当经切，青韵；“耳若闻啼声”的“声”，书盈切，庚韵；“一日不可更”的“更”，古行切，庚韵；“东去趋彭城”的“城”，是征切，庚韵；“还走不及停”的“停”，特丁切，青韵；“丝竹徒轰轰”的“轰”，呼宏切，庚韵；“左右泣仆童”的“童”，徒红切，东韵；“临泉窥斗龙”的“龙”，莫江切，冬韵；“辕马踟蹰鸣”的“鸣”，武兵切，庚韵；“上船拜吾兄”的“兄”，许荣切，庚韵；“子岂知我情”的“情”，疾盈切，青韵；“辛苦多所经”的“经”，古灵切，青韵；“共言无倦听”的“听”，他丁切，青韵；“晨坐达五更”的“更”，古行切，庚韵；“宦游在西京”的“京”，举卿切，庚韵；“李翱观涛江”的“江”，古双切，江韵；“会合安可逢”的“逢”，符容切，冬韵；“楚山直丛丛”的“丛”，徂红切，东韵；“我怀焉所穷”的“穷”，渠弓切，东韵。最后收尾二韵，“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与“高爵尚可求，无为守一乡”，才算是重新回归了阳韵，照应了开篇。

押二“光”字，二“鸣”，二“更”字，二“狂”字的叠韵现象，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并未提及，暂且不论；方世举以为此诗用韵“盖古韵本然”^[4]，也不在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中涉及，也不再深究。

从欧阳修的视角出发，“波澜横流，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才是韩诗如此用韵的重点。宽韵本宜作长诗，但韩诗多转入或宽或窄的他韵，显然是对“常格”的突破。这与窄韵作长诗，看似形式相反，实则笔力似同。

又举《病中赠张十八》例，当其所用韵窄而包括字数少时，韩愈又着意困难见巧，偏偏不出本韵，越用越奇：

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不蹋晓鼓朝，安眠听逢逢。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谈舌久不掉，非君亮谁双？扶几导之言，曲节初捩捩，半途喜开凿，派别失大江。吾欲盈其气，不令见麾幢，牛羊满田野，解旆束空杠。倾尊与斟酌，四壁堆罌缸，玄帷隔雪风，照炉钉明缸。夜阑纵掉阖，哆口疏眉厖？势侔高阳翁，坐约齐横降。连日挾所有，形躯顿臃臃。将归乃徐谓，子言得无咙。回军与角逐，斫树收穷庞。雌声吐款要，酒壶缀羊腔，君乃昆仑渠，籍乃岭头泂，譬如蚁垤微，讵可陵崆峒，幸愿终赠之，斩拔柅与桩，从此识归处，东流水淙淙。^[4]

此诗长篇险韵，通篇二十二韵，均用字数较少的江韵，足可称惨淡经营，如下：“避冷卧北窗”的“窗”，初江切，平江初；“安眠听逢逢”的“逢”，薄江切，平江並；“抱能未施邦”的“邦”，博江切，平江帮；“金石日击撞”的“撞”，宅江切，平江澄（撞，《广韵》直绛切，去绛澄。又宅江切，平江澄。又江韵“撞”与绛韵“撞”同义，故韩诗此处的“撞”为江韵。）；“笔力可独扛”的“扛”，古双切，平江见；“非君亮谁双”的“双”，所江切，平江生；“曲节初捩捩”的“捩”，楚江切，平江初；“派别失大江”的“江”，古双切，平江见；“不令见麾幢”的“幢”，宅江切，平江澄；“解旆束空杠”的“杠”，古双切，平江见；“四壁堆罌缸”的“缸”，下江切，平江匣；“照炉钉明缸”的“缸”，古双切，平江见；“哆口疏眉厖”的“厖”，莫江切，平江明；“坐约齐横降”的“降”，下江切，平江匣；“形躯顿臃臃”的“臃”，古双切，平江见；“子言得无咙”的“咙”，莫江切，平江明；“斫树收穷庞”的“庞”，薄江切，平江並；“酒壶缀羊腔”的“腔”，苦江切，平江溪；“籍乃岭头泂”的“泂”，所江切，平江生（泂，《广韵》庐红切，平东来。又所江切，平江生。前者可指山东孝妇河，后者则可指广东西江支流罗定江。诗中“昆仑渠”对“岭头泂”，故韩诗此处的“泂”为江韵。）；“讵可陵崆峒”的“峒”，五江切，平江疑；“斩拔柅与桩”的“桩”，都江切，平江知；“东流水淙淙”的“淙”，士江切，平江崇（淙，《广韵》藏宗切，平江从。又士江切，平江崇。后者亦可指水声，为了押韵，故韩诗此处的“淙”为江韵。）。)

欧阳修对此“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的用韵处理啧啧称奇。窄韵由于字数的限制，本就不宜作长篇诗歌，而韩愈这里偏偏反其道而行，似与宽韵泛入他韵的《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遥相呼应，都有求新求异的妙处。

究其根本，形式是内容的载体，韩诗如此用韵的深层动因应在笔力上寻来。专论是服务于总论的，用韵技巧是服务于整体风貌的。所谓“工于用韵”，并不足以成就韩诗“天下之至工”的地位，自然少不了其“施无不可”的笔力。前面已经提过，“笔力施无不可”的背后，是韩愈“以文为诗”的艺术观点。故而，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最突出的就是对“以文为诗”的标举。

三、余论：欧诗承韩与宋诗风格

欧诗承韩，这是学界的经典命题，清晰简洁地概括了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面貌。时人梅尧臣《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云：“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除埃……欧阳今与韩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5]把欧阳修比作韩愈，开拓出了欧诗承韩的思路。今人谷曙光在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时，曾将欧诗承韩分为学韩、似韩和变韩三个时期。^[6]具体到三个时期，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经历了尝试“以文为诗”、逐渐形神兼备、以至从心所欲的三大阶段，而欧阳修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传承创变正是串联这三大阶段的关键线索。^[6]就《六一诗话》来反观欧诗承韩，能够感知到晚年的欧阳修对“以文为诗”的成熟认识：既要诗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自然、洒落，又要关心诗歌的整齐格式与形式美感，做到二者在理性框架下的和谐统一，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7]的审美境界与道统传承。

从接受美学的视域出发，在一定客观条件下，个人接受将会演化为群体接受。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意见领袖，欧阳修显然具备这个条件。自欧阳修，到梅尧臣，至王安石、王令，再到苏轼、黄庭坚，可以把握一种不同于“唐诗”的诗歌风格的发展历程，形成带有宋代特色的“宋调”。至于后人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8]的批评，就是后话了。

参考文献：

- [1] [德]H.R.姚斯, [美]R.C.霍拉勃著; 周宁, 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5.
- [2] 欧阳修著;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共六册)卷七十三[M].北京: 中华书局,2001:1056,1057,36.
- [3] 欧阳修着/姜夔着/王若虚着; 郑文等校点.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湖南诗说[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6.
- [4] 韩愈著; 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4-85,97,97,63.
- [5] 梅尧臣; 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75-976.
- [6] 谷曙光.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85,86-88.
- [7]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 2009:12.
- [8] 严羽著; 张健校笺.沧浪诗话校笺(上下册)[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73.

On Ouyang Xiu's Emphasis on Han Yu's Poems : A Case Study of the 27th Entry in Liuyi Shihua

Yang Yuhang¹, Wei Jiahua¹

¹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 Ouyang Xiu's emphasis on Han Yu's poems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in the 27th entry of Liuyi Shihua. First, Ouyang Xiu gives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overall style of Han Yu's poems, then specifically discusses Han Yu's rhyme techniques, and focuses on praising the "supreme craftsmanship" of Han Yu's poetic power. In essence, this is an emphasis on Han Yu's "writing poems as prose" approach. Such an understanding, inheriting from Liu Kai, Mu Xiu, and Shi Jie, and pioneering for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established the poetic status of Han Yu's poem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uyang Xiu's poems inherited Han Yu's style, and his acceptance of Han Yu's poems had a profound an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Song poetry style, which can be called a foundational contribution.

Keywords: Ouyang Xiu; Liuyi Shihua; Han Yu; poetry; acceptance

概念整合视域下生肖成语语义形成的认知机制研究

王倩倩¹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 生肖成语, 不仅是民族生活的智慧结晶, 也反应出各个民族的文化, 在汉语成语中占着不小的比重, 是汉语学习的重要内容。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是理解、学习和运用生肖成语的基础。本文以在线成语词典中的生肖成语为语料, 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视角根据语义形成涉及到的生肖和意象数量及认知域间的关系, 对生肖成语进行了表征分析和语义形成机制分析。研究发现, 生肖成语的表征方式有两种: 单源域表征和双源域表征。单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语义形成得益于隐喻性跨域映射基础上的概念整合; 而双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语义需经过两次概念整合, 规约常识在第二次概念整合中起到激活目标域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生肖成语进行多层次认知分析, 不仅理清了十二生肖成语的概况, 也揭示了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机制, 为汉语成语的其他研究奠定了基础, 也为汉语学习者深入理解和运用成语提供了有益借鉴, 并有助于其正确认识生肖成语中所蕴含的文化特点。

关键词: 认知机制; 认知表征; 生肖成语; 概念整合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55

生肖成语是汉语成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含着一个民族丰富文化寓意的动物形象融贯于成语中。十二生肖的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不仅是中华民族用来纪年的时间工具, 更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历史传承。成语和生肖的融合便成为一种特殊的现象, 形成了“成语中含有动物名或是成语意义形成与动物有关的动物成语”^[1], 如:

胆小如鼠, 对牛弹琴, 虎落平阳, 狐兔之悲, 放龙入海, 飞鸟惊蛇

兵荒马乱, 亡羊补牢, 猴头猴脑, 缚鸡之力, 白衣苍狗, 人怕出名猪怕壮

语义作为成语的基础和核心, 是汉语学习者学习和理解的重要内容, 也是正确、恰当运用成语的基础, 因此, 揭示成语的表征和语义形成机制将有助于学习者真正有效地掌握成语的意义并成功运用。认知语言学强调基于使用的原则, 认知来源于现实和实践, 语言是人和周围环境互动以及在实践中体验而产生的认知结果。十二生肖作为人们熟知或常见的动物, 参与到成语的形成中具有一定的体验基础。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切入, 对生肖成语的表征进行认知分析, 并从概念整合的视角揭示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机制。这对汉语成语的习得具有必要性, 也为其他成语的相关认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生肖成语的相关研究及其认知研究转向

生肖成语因其语言和文化的双层特点在语言生活中大量使用。对生肖成语的研究不乏少数, 展示了多视角、多主题的特点, 并体现了明显的认知研究转向。

从研究视角来看, 既往相关研究主要从文化视角、翻译视角、跨文化对比视角等对生肖成语进行了探讨。从文化阐释视角来看, 由于生肖的突出文化特征, 蕴含着生肖形象的生肖成语成为探究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重要切入点。生肖成语中动物搭配出现的结构形式和语义来源是汉民族尚偶和对立统一思维观念的体现, 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2][3]}。从翻译视角来看, 成语虽广泛应用于人们的口语和书面语的交流中, 但成语翻译往往并非易事, 因为成语的隐喻性特征和文化语境差异性成为成语翻译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译者既要精准地传达成语的意义, 又要尽力保留其源语的形式和修辞之美, 还要考虑如何让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被目的语读者接受并认可^{[4][5]}。从跨文化对比视角来看, 不同语言中的生肖成语大都源于生活, 但其形式、语源、象征意义均有所差异, 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特色^{[6][7]}。

作者简介: 王倩倩 (1992—),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

从研究内容来看,对生肖成语的研究多集中于成语的分类、形式、文化特点、翻译机制等。从不同的角度可将生肖成语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包括生肖成语来源的历史层次、语源的构成方式^[8],生肖的数量和搭配类型^[9]。生肖成语的形式一般为约定俗成的四字格,同一成语中生肖名称通常以对举的形式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任意的,生肖名称相邻或相隔出现在四字成语中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体现了汉民族传统动物文化观念的映射^{[2][3]}。对含有生肖“马”的成语的认知机制研究表明其体现了架构认知机制,同时证明了中华民族厚重的马文化内涵是“马”字成语历久弥新的源头和支撑^[10]。另外,生肖成语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系统完整的隐喻思维^{[9][11]};对成语的翻译研究也说明其体现了概念整合和概念隐喻的认知机制^{[4][5]}。也有研究从历时视角对生肖成语的发展演变及沿用情况进行梳理,展示了综合性类书中十二生肖四字格成语的概貌^[8]。

传统的观点一方面认为成语只是分布在心理词典中的词汇,并不存在将成语分类储存的系统组织原则;另一方面认为成语内部结构固定,且语义上不可预测,句法上不可分析^[12]。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发现这一观点只能解释部分成语的产生和理解,实际上许多成语的语义产生于人的认知结构,具有大量的系统概念理据^{[13][15]}。这一趋势下,逐渐开始从认知角度探讨生肖成语,但多关注生肖成语的组织方式和其翻译所体现的认知方式和认知机制。虽然生肖成语研究已经呈现了认知转向,但从认知视角探讨其语义形成的研究还不足。因此,从认知视角揭示生肖成语的表征方式和语义形成机制无论对于成语研究还是成语习得都具有必要性。

二、概念整合理论与汉语成语

认知语言学强调认知来源于实践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语言则是在人与客观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经过人类的认知加工而形成。特定表达的认知研究,如惯用语的认知机制,也说明认知和系统概念理据的存在及作用^[16]。生肖成语作为汉语成语和中国特色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其结构和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语义的形成也基于一定的认知机制。拉考夫(Lakoff)与约翰逊(Johnson)(1980)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人类赖以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从本质上来说是隐喻性的,且有一些概念直接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经验,这些经验在概念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具有直接意义。对于生肖成语的意义揭示而言,概念隐喻理论的解释力有限,可以解释源域和目标域均出现且两者间具有足够相似性而使得跨域映射显而易见的成语;而对目标域并未出现,且成语的意义与其组成部分并无直接联系的生肖成语而言,便不易解释其意义的产生过程和产生机制。

上世纪90年代,福柯尼耶(Fauconnier)与特纳(Turner)在心智空间和意义构建过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把话语的意义构建看作是通过激活两个或多个空间并对其进行合成产生新空间,及产生新概念的过程^[15]。“概念整合”是人类把来自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有选择地提取其部分意义,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概念结构的一系列认知活动^[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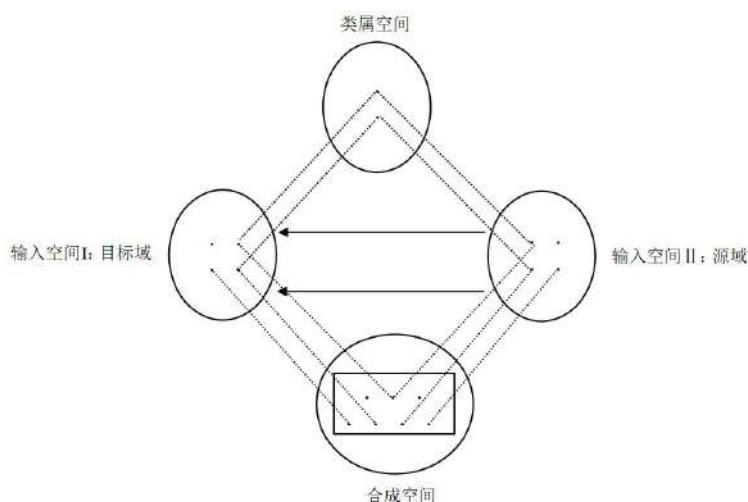


图1 概念整合模型^[15]

如图所示,概念合成是一个或多个概念域合成的心理过程。概念整合由四个空间参与其中,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整合空间。解读隐喻意义产生时,两输入空间可视为源域和目标域。两输入空间之间可以建立起临时的隐喻性跨域映射。两输入空间向类属空间投射相似元素或其共有的组成成分,因此,类属空间成为跨

域映射的重要认知基础——两认知域间的相似性。合成空间是输入空间和类属空间经过认知整合后产生的认知空间。认知整合过程中,类属空间中两输入空间共有的元素向合成空间投射,与此同时,两输入空间也向合成空间投射了各自独有的特征和元素。“整合会衍生出一个在两输入空间中并不存在的新显结构。来自各空间的构素使得那些原本在孤立的输入空间中并不存在的关系,在整合空间中成为可能”^{[15]42}。这使得概念整合相较于概念隐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为概念整合是人们进行思维和活动,特别是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18]。

生肖成语多为四字格,且多为对仗或对举的形式,含有一个或多个生肖意象和认知域互动,常用来描述人的品质或形容人的特征。由于人们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因此生肖成语多传达隐喻意义。概念整合不仅能揭示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机制,更能展示其语义形成的动态过程以及其表征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生肖成语的认知表征分析

通过在线成语词典搜索关键词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后得到 651 个含有生肖的成语,有一字之差且意思相同的成语记为一个生肖成语,如狗盗鼠窃和狗偷鼠窃便被记为一个生肖成语。组成部分相同,但排列位置不同的记为两个生肖成语,因为其排序会对学习者产生不一样的刺激。为了避免重复统计,双生肖出现的成语被记为先出现的生肖类,如鸡鸣狗盗被记为生肖“鸡”类成语。

生肖成语的意义经过概念域之间的认知整合而形成,因而成语表征中涉及的认知域数量及认知域关系在其语义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按照生肖成语涉及到的概念域属性、概念域数量及认知域间的关系,所搜索到的生肖成语可分为单源域表征和双源域表征。统计结果显示,651 个生肖成语中,有 269 个成语为单源域表征,占比 41.3%,382 个成语为双源域表征,占比 58.7%,这说明生肖成语的形式以双源域表征为主。

生肖成语的表征类型,即生肖意象的数量差异对其语义形成会造成一定影响,因为概念域之间的关系与生肖成语中参与表征的生肖或其他动物意象数量有关,因此揭示生肖成语的认知表征方式具有显著意义和必要性。

(一) 单源域表征方式

单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指只有一个生肖意象出现在成语中用作源域的成语,如细如牛毛,胆小如鼠,亡羊补牢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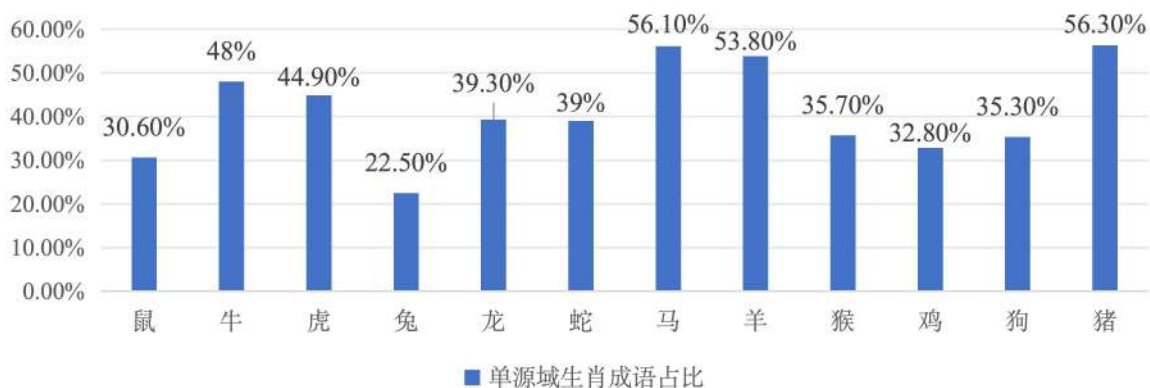


图2 十二生肖成语中单源域表征占比

单源域表征的成语在所有生肖成语中占比 41.3%。十二生肖成语中,仅有猪、马、羊成语的单源域表征占比超过 50%,分别为 56.3%, 56.1%和 53.8%。其他生肖成语的单源域表征占比均不超过一半。这说明单源域并非生肖成语的主要表征方式。

单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涉及隐喻性映射和隐喻性意义的构建,因此根据目标域是否出现可将单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分为两类:一类为目标域出现在成语中;另一类为成语中目标域缺失,其语义形成过程存在差异。

1. 目标域出现的单源域表征生肖成语

目光如鼠、多如牛毛、牛毛细雨、得婿如龙、羊肠鸟道、味如鸡肋、势如脱兔、呆若木鸡

单源域表征生肖成语中,目标域出现的有 34 个,占比 12.6%, 占有所有生肖成语总数的 5.2%,这说明生肖成语中同时包含源域和目标域的为少数,即源域与目标域共现并非汉语生肖成语的主要表征方式。该类成语中,源

域与目标域同时出现，且目标域和源域的位置不固定。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在生肖成语中的目标域既有如“细雨”“鸟道”“婿”等可感知的物体，也有数量、感觉等抽象的概念，如“目光”“多”“味”等。可感知的物体作为目标域时，源域和目标域多以并列方式呈现，无需其他词连接，如牛毛细雨、羊肠小道。而抽象概念作为目标域时则以“如”“若”等词连接源域与目标域，如味如鸡肋、势如脱兔。这说明目标域的性质会影响生肖成语的语言表征和组织方式。

2. 目标域缺失的单源域表征生肖成语

掘室求鼠、嫁鸡随鸡、对牛鼓簧、打死老虎、守株待兔、涸泽之蛇、替罪羊

所有单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中，目标域缺失的成语共 235 个，占单源域表征生肖成语的 87.4%，说明目标域缺失是单源域生肖成语的主要表征方式。目标域缺失的情况下，需要依靠规约知识激发对目标域的构建，继而建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

(二) 双源域表征方式

双源域表征是汉语生肖成语的重要特征，双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指有两个生肖意象出现在成语中或一个生肖意象和一个非生肖意象共同作为源域的成语，如打鸡骂狗，狼心狗肺，鸡犬不宁，鸡鸣狗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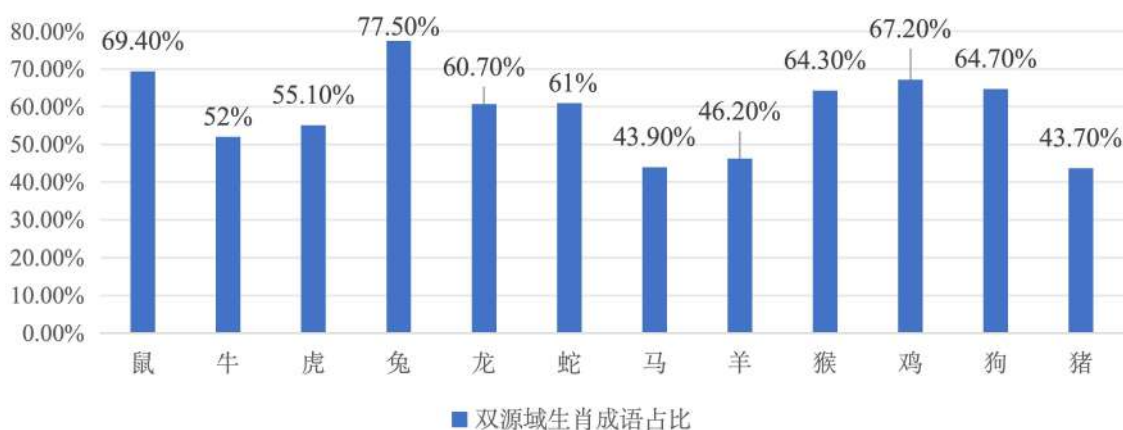


图3 十二生肖成语中双源域表征占比

双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占总数的 58.7%，说明生肖成语以双源域为主要表征方式。如上图所示，十二生肖成语中，含生肖兔的成语中双源域表征的占比最高，为 77.5%，含生肖猪的成语中双源域表征的占比最低，为 43.7%。除生肖猪、马和羊之外，其余生肖成语中，双源域表征的成语占比均超过 50%，其中七个生肖的双源域表征成语占比超过 60%。

双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的突出特点为目标域缺失，需依靠规约常识来激发对目标域的构建。此外，此类生肖成语中，双源域并非任意排列组合，其共现遵循一定规律和机制。因此，根据双源域的共现规律，可将此类成语分为 3 类，同特征或同类共现、捕食类共现和对比类共现。

双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同特征或同类的生肖或动物意象往往共现，如：土牛木马、伏虎降龙、雕龙画凤、岁在龙蛇、打鸡骂狗、泥猪瓦狗、狗彘不食等。这些成语中的双源域具备相同或相似的特征。例如，“牛”和“马”均为大体型动物；“龙”和“蛇”都为非行走类动物，且形状相似；而“鸡”和“狗”则为家养动物。其次，捕食类共现也是常见的现象。如猫哭老鼠、饿虎见羊、羊入虎口等，“猫”和“老鼠”，“虎”和“羊”都是捕食类关系，这些动物的共现使其之间的关系可以生动地激发认知主体的联想，并将这种关系映射至目标域上。另外，对比类共现也是双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的主要组织方式，如马捉老鼠、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杀鸡焉用牛刀、牛刀割鸡等。“马”和“老鼠”“鸡”和“牛”在外形上均差异甚大，正是这种鲜明的对比，使生肖成语的意义更容易被理解。

四、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机制分析

成语的语义并非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概念整合的认知加工而成。生肖成语的表征方式存在差异，

因而不同类别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过程也有所不同。了解不同表征方式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机制对理解和学习生肖成语的意义以及正确运用事半功倍。由于生肖成语具有两种表征方式，相应地其语义也形成于两种概念整合过程。

(一) 单源域表征下的语义形成机制

单源域表征下的生肖成语，少数目标域出现在成语中，或由规约常识激发成语中缺失的目标域，即由一个源域和一个目标域参与语义形成，例如胆小如鼠、多如牛毛等。单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过程可通过概念整合网络揭示，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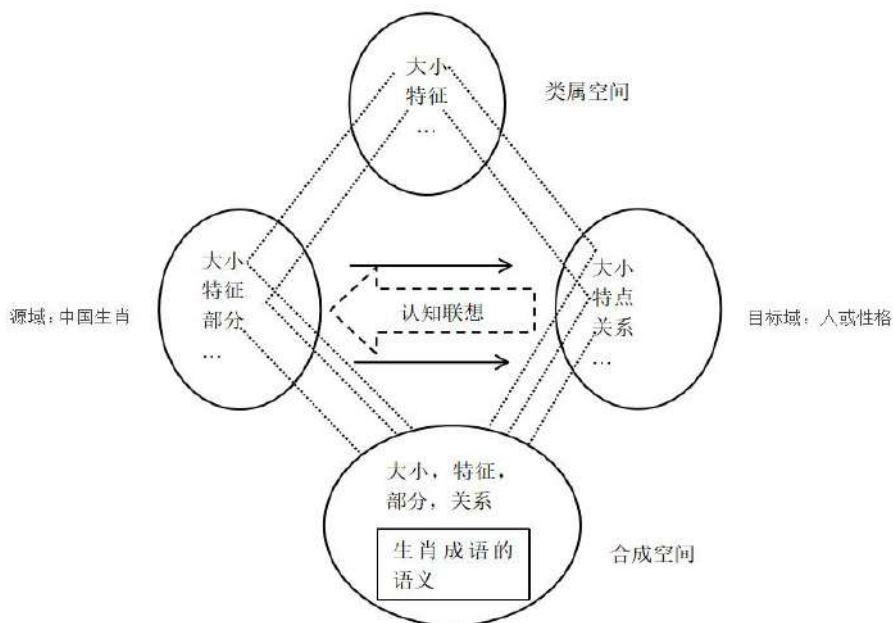


图4 单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

单源域表征下的生肖成语，其语义形成以源域和目标域为基础，即两输入空间。四个空间参与语义形成过程，源域是十二生肖，目标域为人或人的性格。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在想象空间建立起临时映射，即十二生肖的大小、特征及组成部分等与人或性格的特征、大小和关系等。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之处及相同元素投射至类属空间，该空间是构建隐喻性映射的重要认知基础之一。合成空间中既有类属空间中聚集的源域和目标域的共同之处，也有两输入空间各自特有的成分。生肖成语的意义在源域和目标域以及类属空间的投射下于合成空间经认知整合而成，是既不同于源域也不同于目标域的新意义。

以生肖成语“胆小如鼠”为例，作为单源域表征的成语，十二生肖“鼠”为源域，“人的胆量”为目标域。源域“鼠”的“体型小”映射至目标域“人的胆量”，激活了人们将“人的胆量”和“鼠”的体型联系起来，此外，“鼠”容易受到惊吓的特征也被映射到了目标域上。类属空间中聚集了“鼠”和“人的胆量”之间的共同点——小，容易受惊等。合成空间中，经认知整合，生肖成语“胆小如鼠”的意义“胆子小得像老鼠，形容非常胆小”由此产生。

单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只经过一轮的概念整合，因为只有一个源域和目标域参与语义形成，这是单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重要语义特征，这类成语因目标域出现在部分成语中或目标域较容易被激活，因而学习者更容易理解、掌握并运用。

(二) 双源域表征下的语义形成机制

双源域表征下的生肖成语包含两个源域，目标域缺失。推理和规约常识在习语的认知解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9]，因为其语义形成过程中需要依靠规约常识和推理来激活潜在的目标域。因此，双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过程中，推理和规约常识是必不可少的认知方式与手段。双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机制如下：

如图5所示，双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虽然也经概念整合而成，但与单源域表征下的语义形成机制不同，

双源域表征的成语语义需要经过两轮的概念整合。第一轮概念整合中，输入空间为生肖成语中的两生肖或一个生肖和一个非生肖意象，两源域之间建立起临时性的跨域映射，两生肖的大小、特征及部分以及各自特有的元素在合成空间经过认知加工形成对两生肖的整合意象。第一轮概念整合的结果作为源域参与到第二轮概念整合之中，与目标域在想象空间中建立临时的跨域映射。由于目标域并不出现在此类生肖成语中，因而需要依靠规约常识空间的刺激来构建目标域，目标域一般为人的性格和行为，亦或物。规约知识包括典故、历史故事以及认知主体的背景知识。在外部作用空间的影响下，两输入空间向合成空间选择性地投射要素，并在合成空间中经认知加工整合出成语的语义。

以生肖成语“虫臂鼠肝”为例，以生肖意象“鼠”和非生肖动物“虫”为源域，其构成部分“虫臂”和“鼠肝”之间具有三方面相似性，一是二者均为动物的组成部分，二是均具有微小的特征。三是其重要性不显著。在第一轮概念整合中，两者的相似性投射至合成空间，整合结果为“虫臂”和“鼠肝”的共同之处——微小且不重要，该意象作为源域参与到第二轮的概念整合中，由于双源域表征的生肖成语通常缺失目标域，因此在规约常识空间的刺激下目标域“物体”得以被激活，并在认知联想的作用下建立从“微小且不重要”这一意象到“物体”的映射，此外，源域和目标域选择性地投射各自的特征和元素到合成空间后，经概念整合形成“极微小而无价值的东西”的比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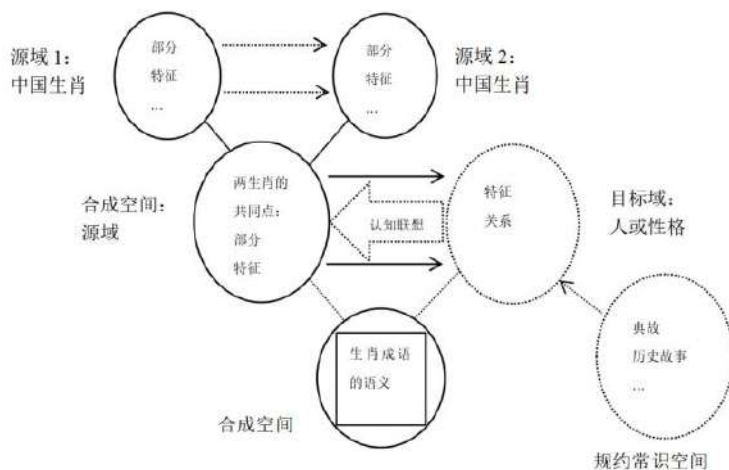


图5 双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

双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经过两轮的概念整合，由于有两个源域参与语义形成，且目标域缺失，因此需要经过外部规约常识空间中的历史典故或故事才能得以激活，这是该类型生肖成语的典型语义特征。双源域表征的成语因目标域缺失及需要两轮概念整合，对汉语学习者而言较难理解与正确运用。

五、结语

本文以汉语生肖成语为语料，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视角基于成语中的生肖和意象数量对生肖成语进行了表征分析，并根据认知域间的关系，对生肖成语进行了语义形成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汉语生肖成语有单源域表征和双源域表征两种形式。单源域表征下，目标域出现在部分成语中；双源域表征时，目标域往往缺失。不同表征类型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历经不同的形成过程。单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于隐喻映射，历经一轮概念整合；双源域表征下生肖成语的语义形成历经两轮的概念整合，此外，规约常识在第二轮整合过程中起到激活目标域的重要作用。本文对生肖成语的表征和认知分析，不仅理清了生肖成语的概况，也揭示了此类成语的语义形成过程，为汉语学习者深入学习和理解生肖成语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有助于汉语二语学习者正确认识生肖成语蕴含的文化特点。

参考文献:

[1] 周大效.从动物成语看人与动物的关系[J].魅力中国, 2009, (31):151.
 [2] 郭宪春.汉语成语中动物对举的形式及文化因素分析[J].语文建设, 2015, (11): 63-64.
 [3] 汪萍.双生肖成语的文化语言学分析——以《成语大词典》为例[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 2017, 17(12): 156-160.

- [4] 黄民燕, 史小平.概念整合视角下汉语典故成语的隐喻英译[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1, 83(2): 25-30.
- [5] 史小平, 莫拓宇, 周令航.汉语典故性成语英译的认知机制研究[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21, 147(4): 50-52.
- [6] 梅春才, 王加莹.浅析含有生肖动物名称俄汉成语的文化特点[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4(9): 78-79+101.
- [7] 张艳芳.十二生肖在德汉语言中的意义比较[J].文教资料, 2011, (24): 47-48.
- [8] 张鑫, 王宝红.《夜航船》十二生肖四字格成语探析[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8(5):91-99.
- [9] 王治敏.十二生肖成语搭配与隐喻认知分析[J].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2019, 4(3):41-50.
- [10] 张锦.汉语马字成语的架构机制透视[J].语言文字学术研究, 2021, (16): 7-9.
- [11] 梁娇娇.从认知隐喻角度看生肖成语[J].科技信息, 2011, (33): 242, 262.
- [12] Chomsky, N. *Rules and Representa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3]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4] Fauconnier, G. *Mapping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5] Fauconnier, G. & M.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16] 陈明芳.惯用语认知机制及其词汇语义特征[J].外语教学, 2006, (1): 30-33.
- [17] 陈茂.概念整合理论与翻译认知过程[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01):124-126.
- [18] 汪少华.概念合成与隐喻的实时意义建构[J].当代语言学, 2002, (4) 2: 119-127.
- [19] Fernando, C. *Idioms and Idiomaticit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A study of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he meaning of Chinese zodiac idi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Wang Qianqian¹

¹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Zodiac idioms are not onl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ethnic life, but also reflect the cultur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Zodiac idioms account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in Chinese idioms and are important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eir semantic formation is th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learning and using zodiac idiom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zodiac idioms in the online idiom dictionary. The representation analysis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zodiac idioms were conducted based on the quantity of zodiac images involved in semantic form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dom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wo representations of zodiac idioms: single-source domain representation and dual-source domain representation. The meanings of zodiac idioms represented by single-source domain emerge from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metaphorical cross-domain mappings. The meanings of zodiac idioms represented by dual source domains need to undergo two conceptual integrations. Conventional knowledge plays a role in activating the target domain in the seco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 multi-level cognitive analysis not only clarifies zodiac idioms, but also discloses the semantic mechanism,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useful reference for Chinese learners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and employ idioms, and helping them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cultural features contained in zodiac idioms.

Keywords: cognitive mechanism;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Chinese zodiac idiom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汉语构式“过于 X”的程度表达与预期偏差互动机制研究

姜蕾¹

(1.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过于 X”构式核心语义体现为“程度量化—认知偏差—语用评价”的有机统一: 程度量化属性将抽象程度转化为“超限关系”, 认知偏差属性是对“实际与预期标准”冲突的显性标记, 语用评价属性实现从客观描述到主观否定的自动转化。“过于”与“X”存在双向语义限制, “X”需具备程度梯度性和开放量级特征, “过于”则通过语义增值赋予“X”负面倾向并明确过量边界。其预期偏差机制源于社会常规、个体经验等多维预期标准, 经事实层与评价层的双重语义驱动形成。可为程度副词研究及二语习得、自然语言处理等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程度副词; 过于; 程度表达; 预期偏差; 认知机制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90

一、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程度副词是汉语语义系统的重要成分之一, 通过对性状(如“复杂”“美丽”)、行为(如“依赖”“追求”)等程度进行量化, 实现语义的精细调控。从功能上看, 其不仅承担客观描述功能(如“很复杂”“非常美丽”), 更隐含说话者的主观评价与认知立场(如“过于依赖”中的负面倾向), 这种“描述—评价”的双重属性, 使其成为连接语言形式与认知逻辑的关键桥梁。

在汉语语法体系中, 程度副词的使用频率极高, 其语义细微差异直接影响交际意图的精准传递。“过于”在程度副词体系中具有独特的语义特质, 其核心功能并非单纯强化程度, 而是强调“程度超量”——即某属性或行为的程度突破了社会常规、个体经验或语境设定的“合理阈值”, 并关联负面评价。这种“超量程度+负面效应”的双重属性, 使其与“很”“非常”等中性程度副词形成本质区别。此外, “过于”常与结果补语搭配(如“过于紧张导致失误”), 通过“程度超量——后果产生”的句法结构强化其互动功能, 凸显“突破预期”的语义逻辑。

(二) 文献综述

“过于”的副词化是其从“动词+介词”结构(“过”为动词“超过”, “于”为介词引出对象)逐渐凝合为超量程度副词的过程。常志伟(2021)指出, “过于”萌芽于唐代, 成熟于明代, 其形成受句法位置(状位)、“过”的词义虚化(从“经过”到“过分”)、语义指向后移(从指向主语变为指向宾语)及汉语双音化韵律趋势的共同影响。唐代文献中“过于”已出现副词用法(如《旧唐书》“过于审慎”), 但仍需结合语境判定; 宋代后“过于”修饰双音节形容词的用例增多, 推动其凝合为独立副词。殷树林、高伟(2018)则认为“过于”的副词化源于“过”的形容词“过分”义与“于”的介引功能弱化, 宋代“过于+AP”结构的频繁使用为其词汇化提供了频率基础, 元代后逐渐定型。两者均强调“过于”的副词化是句法重新分析与语义虚化的结果, 且与“过”“太过”的形成存在衍生关系。

在句法分布方面, “过于”主要作状语, 修饰谓词性成分“X”, 其中“X”以双音节形容词(如“谨慎、密集”)和心理动词(如“溺爱、敏感”)为主。张言军(2014)通过语料统计发现, “过于”修饰形容词的比例高于动词, 且“X”多具有“连续量”特征(即可度量、程度可叠加), 如“过于简单”“过于执着”, 体现两者在句法选择上的互补性。

“过于 X”通过层级性程度量与主观性评价实现超量表达, “过于”将“X”的程度从“常规范围”推向“超量范围”, 形成“基准量—预期量—超量”的层级。任瑞(2024)认为, 这种调节是“过于”的“过量级”语义对“X”的动态牵引, 使“X”的模糊程度被锚定为“超出预期”的具体量级, 如“过于复杂”中“复杂”的程度被限定为“超过正常处理能力”。“过于 X”的程度表达具有强主观性, 体现说话人对“X”的否定态度。吴早生、许佳佳(2025)指出, “过于”属于“超

作者简介: 姜蕾(1996—),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量绝对程度副词”，其主观性等级高于“很”“非常”。

从言语行为认知维度来看，Hågemark & Gärdenfors (2025)将言语行为划分为表达语、指示语和断言三类，其核心差异体现在适配方向 (direction of fit) 与认知需求上，可为“过于 X”构式的程度表达功能提供分类依据。White (2025) 基于评价理论 (Appraisal Theory)，将语言中的评价资源分为情感 (Affect)、判断 (Judgement) 和鉴赏 (Appreciation) 三类，强调评价通过显性或隐性方式构建说话者立场，并影响听话者的预期。其中，情感表达情绪状态 (如“担忧”)，判断针对人类行为的道德或规范适配性 (如“恰当”)，鉴赏聚焦事物的价值属性 (如“合理”)，可对“过于 X”预期偏差的触发强度和构建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现有研究虽明确“过于 X”中“X”以双音节谓词为主 (张言军 2014)，但对“X”的语义类型 (如情感类、行为类) 与“过于”组配的深层制约机制探讨不足，对“过于”的超量语义如何具体作用于“X”的程度调节 (如“过量”的量化标准) 缺乏精细化分析，对原型范畴、心理空间，以及其评价偏差与社会预期的互动规律等理论在“过于 X”偏差机制中的协同作用研究不足，未能形成统一的认知解释框架。

二、“过于 X”的语义本质属性

作为程度副词，“过于”直接修饰形容词或动词 (如“过于复杂”“过于依赖”等)，表征被修饰成分的实际量值超出常规标准。因此，“过于”的核心语义可概括为对量级偏离的负面评价，其本质体现在程度量化属性、认知偏差属性和语用评价属性三者交织当中。

(一) 程度量化属性

作为程度副词，“过于”的程度量化属性本质是人类认知中“边界意识”的语言投射，通过将抽象程度转化为可判断的“超限值”，既实现对客观事物的精确描述，又完成对“合理性”的主观评判。这种“描述—评价”的复合功能，使其成为汉语中调节语义精确性与情感倾向的重要媒介。

表 1 “过于 X”量化逻辑拆解

修饰对象	典型实例	量化逻辑拆解
物理性质形容词	过于干燥、过于锋利	物理属性值超出使用安全阈值
行为动词	过于强调、过于依赖	动作强度/频率突破合理配比
抽象概念	过于理想化、过于形式化	认知建构严重偏离现实逻辑
时间/空间形容词	过于漫长、过于狭窄	时空维度量值突破舒适感知范围

“过于”的核心功能是在语言中确立“实际量值 ($V_{实际}$) 突破常规标准 ($V_{标准}$)”的超限关系，其量化特征隐含“常规标准”作为参照系，强调量值从“合理区间”向“超限区间”的中高强度突破。

(二) 认知偏差属性

“过于 X”作为认知偏差的语言显性化标记，其本质是大脑对“实际量值”与“隐性标准”偏差的语义化表达，触发过程可拆解为三层认知加工模型：

例 1：雅典机场显得过于狭小和陈旧，这与雅典的千古美名差距太大了。(《千古一叹》余秋雨)

首先，说话者基于经验、社会规范或个体预期，自动生成隐性认知标准 $V_{标准}$ 。 $V_{标准}$ 本质是范畴原型的具象化，此时，说话者的隐性标准源于对“国际大都市机场”的范畴原型，形成“机场应具备宽敞空间、崭新设施”的预期，这种标准并非量化数值，而是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模糊认知框架。

在此基础上，说话者计算实际量值 $V_{实际}$ 与标准值的偏差，即 $V_{实际} - V_{标准}$ ，此时大脑存储的正常程度图式作为先验框架，说话者感知到的雅典机场“狭小和陈旧” ($V_{实际}$) 与认知中的“宽敞、现代化” ($V_{标准}$) 形成显著差值，初步形成认知冲突。

当偏差超过说话者对“机场与城市匹配度”的容忍阈值 ($T_{容忍}$) 时，使用“过于”显性标记这一偏差。同时通过显性标记偏差“过于”，减少听话人认知努力，听话人无需推导具体数值，仅凭语言标记即可快速识别实际量与标准值的冲突，实现交际效率最大化。

(三) 语用评价属性

“过于 X”作为超量程度副词结构，其语用评价属性主要体现在对事物性状或行为的超量判断及主观态度的表达上。“过于 X”的超量判断，基于个体认知标准的程度判定，依赖说话人的隐性认知标准和容忍阈值，而非客观具体数量。因此，“过于 X”常表达说话人认为“X”所指的性状或行为超过了合理限度，暗含否定态度。

在例 1 中，说话人对“雅典机场”的隐性标准源于“雅典的千古美名”所关联的范畴原型，即“国际历史文化名城

的机场应匹配其地位，具备宽敞、现代的设施”。这一标准并非客观规定，而是说话人基于文化认知、旅行经验形成的范畴原型和主观预期。

当实际量值（雅典机场的“狭小和陈旧”）与 $V_{标准}$ 对比后，偏差触发“隐性评价”机制——通过对比自动识别“实际状态与预期不符”的异常，此时，“过于狭小和陈旧”的判断本质是个体认知中“实际状态偏离合理范围”的语义化表达，暗含“不符合预期”的否定态度。

例2：艾晚没有察觉，她过于自信了，把证件递给了老兵。（《看家护院》毕淑敏）

“过于X”的核心功能是标记程度“突破边界”：“X”本身可能是褒义词（如“简单”“自信”），但“过于”赋予其“超出正常范围”的语义，形成“合理区间→边界突破”的认知映射。无论“X”本身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词，经“过于”修饰后，整体表达超出适当程度的负面评价。这种边界性源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边界”理论，“过于X”将“X”从“正常范畴”推入“异常范畴”，通过语言形式强化偏差。

例2中的“自信”本含积极语义，但“过于自信”通过凸显“量值超限”，衍生出“盲目、失当”的负面含义，即对行为“合规性”的否定。此处的“失当”源于艾晚的自信与“面对老兵应保持警惕”的情境预期冲突，构成对“情境适配性”的隐性否定。“过于”作为显性标记，将“自信”从“正常范畴”剥离，归入“异常范畴”（如“过于自信”→“不合时宜的轻信”），这种跃迁通过语言形式固化了认知中的“量值超限”感知，使“过于X”成为主观评价的高效载体——既保留“X”的核心语义（如“自信”的“相信自身”义），又通过“过于”的修饰强制性附加“超出合理边界”的负面评价，实现了从“中性/褒义”到“贬义”的语义反转。

三、“过于X”的双向语义选择限制

“过于”与“X”的组合并非任意，其语义适配性体现为双向适配规律，即“X”的语义特征决定组合可能性，“过于”反作用于“X”的语义增值。

（一）“X”的语义适配特征

1.“X”的“程度梯度性”

“过于”作为超量程度副词，要求“X”所指的属性、状态或行为具有可分级的程度梯度（如“低—中—高”），才能体现“超出合理限度”的语义。例如“紧张”存在“轻微—适度—极度”的梯度，故“过于紧张”成立；而“笔直”“圆形”等绝对属性词无程度差异，无法与“过于”组合（如“过于笔直”不成立）。这一限制源于“过于”表“程度超量”的核心语义，需以“X”的可度量性为前提。

2.“X”的程度量级（即无绝对上限）

封闭量级成分本身蕴含“最高程度”义，其语义已达到极致，无法再被“过于”所表示的“超过合理限度”语义修饰。如“极致”等词，本身就意味着达到了最高标准，不存在“超过”的空间，因此“*过于极致”的表达不成立。

而开放量级成分如“复杂、严格”等，其程度没有绝对上限，能够被“过于”修饰以体现超量。例如“过于复杂”表示复杂的程度超过了合理范围，“过于严格”说明严格的程度超出了适宜的限度，这符合“过于”表达超量的核心语义。

（二）“过于”对“X”的语义增值

1.强化“X”的超量属性

“过于”的核心语义是“超过合理限度”，其与“X”结合时，会将“X”的程度从“正常范围”推向“过量范围”，使原本中性或褒义的“X”产生消极语义偏移。这种增值源于“过于”对“X”程度的强制提升，凸显“过犹不及”义，使其从“可接受”变为“不可接受”，完成从客观描述到主观否定的语义转变。

例3：可是，随着旅程的推移，冒襄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想法过于简单了。（《白门柳》刘斯奋）

“过于”的核心语义“超过合理限度”对“简单”的程度进行强制拉升，突破了“简洁”与“粗浅”的临界点，衍生出“因过度简化而欠缺深度/合理性”的消极语义。

2.强化“X”的消极情态

“过于”本身带有强烈的消极情态，与“X”组配时会将这种情态传递给“X”，即使“X”为中性词，也会被赋予不满、嘲讽等否定态度。这种情态增值使“X”的语义从“中性描述”转向“主观否定”，与“过于”的超量语义形成协同。

例4：刘履丁这时也意识到过于认真会有损彼此合作的气氛。（同上）

“认真”本身是中性偏积极的词，核心语义是“严肃对待、不马虎”，独立使用时多含肯定倾向，“过于”的消极情态强制渗透，使“认真”的语义重心从“严谨负责”偏移为“因过度较真而显得刻板”，例4中“有损彼此合作的气氛”直接点明了这种情态转向的结果——“认真”的程度超过了合作场景所需的“弹性阈值”，原本的积极属性因“过量”转化为消极影响。这种转变印证了“情态增值”的作用：“认真”的核心语义未被否定，但“过于”通过标记“超量”，

赋予其“不合时宜”的主观否定色彩。

3.明确“X”的量级边界

“X”通常具有模糊的程度量级(如“复杂、严格”),而“过于”通过语义增值为其划定明确的“过量边界”,即“X”的程度必须达到“超出常规”的量级。这种增值使“X”的程度从“模糊”变为“消极过量”范畴。

在例4中,“认真”本身是一个具有程度梯度的词,其量级边界模糊,“过于”通过语义增值,为“认真”划定了“超出常规”的过量边界,原本模糊的“认真”程度被锁定在“超出合作场景所需的合理范围”这一区间,明确指向“因过度较真、缺乏弹性而产生负面影响”的状态,这种边界划分使“认真”从“可褒可中”的模糊量级,转变为“消极过量”的确定范畴,如句中直接指出其后果,“有损彼此合作的气氛”。

综上,“过于”对“X”的语义增值本质是超量语义与“X”固有属性的互动结果:既通过“过量”义强化“X”的消极评价与程度量级,又受“X”的语义类型与程度特征制约,最终形成“双向适配”的语义关系。

四、预期偏差形成机制

(一)“过于X”预期标准的多维构建

预期标准是“过于X”构式产生偏差的基准,其构建具有多维性,具体表现为:

1.社会常规预期:基于群体共识形成的“合理程度”标准,是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行为或性状限度。这一标准源于社会对事物“适度范围”的集体认知,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

例5:就是修道士,也会觉得古义人的床铺过于狭小。(《愁容童子》大江健三郎)

“床铺”的核心功能是“供人躺卧休息”,这一具体场景为“合理大小”设定了临时基准:无论社会常规或个体习惯如何,床铺尺寸必须满足“基本躺卧需求”这一语境临时要求。这种标准具有客观性:无论是修道士还是普通人,对“床铺不应狭小到影响基本使用”存在集体认知。

2.个体主观预期:说话者基于个人经验、心理预设形成的私人标准,具有主观性和差异性。个体对“合理程度”的判断因生活经历、价值观念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例5中,修道士的生活经验可能更习惯简朴、紧凑的居住环境使其对“狭小”的容忍度可能高于普通人,但即便如此,仍认为床铺“过于狭小”,“过于X”的判断仍以其个人经验中的“合理限度”为基准。

3.语境临时预期:由具体场景临时限定的标准,随语境要素(如场景性质、事件目的)动态调整。语境通过压缩或扩展“合理范围”,为“过于X”设定临时基准。

例6:事实证明,这个项目思维过于超前、工作量过于庞大,技术、知识和资金都严重不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3月24日)

例6中的“思维超前”本身是中性表述(可指“领先于时代的合理创新”),但“过于超前”的消极评价源于具体场景对“合理超前度”的临时限定,该语境的核心是“项目是否可行”,合理范围需以“当前技术、知识、资金能否支撑落地”为基准,超出这一范围,便属于“过量”。因此,“过于超前”的判定标准是语境“项目实施的现实条件不能脱离现有资源支撑”的临时边界,超出此边界即被视为“超量”。“庞大”的程度是否“过量”,同样由语境要素动态调整,此处场景是“特定项目的资源承载力”,“庞大”的合理范围需与“项目可调动的技术、知识、资金规模”相适配。当工作量的“庞大”程度超出“现有资源能处理的限度”,文中明确提到“技术、知识和资金都严重不足”,语境便将其判定为“过量”。项目的“可完成性”进一步限定了“工作量”的合理范围,若庞大到“资源无法覆盖”,则直接阻碍“完成项目”的目的,此时“庞大”便因超出语境临时设定的“与资源匹配”基准,成为“过于庞大”。

(二)“过于X”与预期偏差的语义关联

“过于”的预期偏差通过事实层到评价层的双重语义层实现,两者相互关联并推动语用推理:

1.双重语义层

双重语义层分为事实层和评价层,事实层聚焦于X的实际程度与预设标准的量化差异,描述X的程度“超出预期标准”;评价层是事实层的自然延伸,由“过于”的消极情态驱动,基于“过量必引发负面后果”的认知惯性,将“超量”与“负面”强制绑定,隐含对该偏差的负面判断,即“超出限度会引发不良后果”。

2.语用推理:从“程度描述”到“价值判断”的隐含逻辑,由“过于”的超量语义驱动。这一链条的“自然延伸”性体现在:无需额外语境补充,仅通过“过于”的标记作用即可完成从“事实描述”到“价值判断”的转化,听者会自动补全“为何过量是负面的”这一隐含逻辑。

可见,“过于X”的独特性在于其推理的“自动性”和“否定性”,这使其成为汉语中“程度—评价”转化的典型案例。

(三)认知理论视角下的偏差机制

从认知理论视角解析“过于 X”的偏差机制,能更深入揭示人类如何通过心智加工将“程度超量”转化为“负面评价”的认知根源。结合原型范畴理论和心理空间理论,可具体理解“过于 X”的实现原因: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人类对事物的认知以“原型”(即范畴中最典型、最符合认知预期的成员)为核心,偏离原型的成员会被赋予“非典型”甚至“负面”属性。“过于 X”的偏差机制正源于此,每个可量化的属性 X(如“热情”“冷静”“速度”)在认知中都存在一个“原型区间”——即社会共识或语境默认为的“适度范围”。这个区间是范畴的核心(如“正常体温”的原型区间约 36—37°C,“合理音量”的原型区间随场景变化),符合该区间的 X 被认知为“无标记的常态”。“过于”通过标记 X 的程度超出“原型区间”,使 X 成为范畴中的“边缘成员”。而人类认知对“边缘成员”的处理具有偏差性,偏离程度越大,与原型的对比越强烈,被感知为“异常”的概率越高,这种偏离往往被单向赋予负面价值——即便 X 本身是中性或褒义(如“勇敢”的原型是“有勇气且适度”,“过于勇敢”因偏离原型,被自动归入“鲁莽”的负面边缘)。

结合程度副词的量级差异,“过于 X”在心理空间对比中的“负面偏差定向性”可进一步解释为现实空间与预期空间的冲突,进而决定负面评价的输出。这种量级差异与空间冲突构成了“过于 X”偏差机制的深层量化逻辑。

程度副词可按“偏离合理阈值的距离”划分为不同量级,每个量级对应的现实空间与预期空间的冲突强度阈值有较大差异。

表 2 不同量级程度副词的现实空间与预期空间冲突强度

量级划分	典型程度副词	现实空间与预期空间的关系	冲突强度	负面偏差特点
低量级	较 X、有点 X	略高于预期空间的“适度区间”	微弱	通常不产生负面偏差,仅为轻度程度描述
中量级	很 X、非常 X	明显高于适度区间,但未突破临界上限	中等(中性化)	评价依赖 X 的属性或语境,可褒可贬或中性,无“超量即错”的强制逻辑
高量级(超阈值)	过于 X、过分 X	突破预期空间的“临界上限”	强烈(必然)	必然引发负面解读,“超量”被视为“安全/合理边界被打破”,自带“违规性”强制逻辑

“过于”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专门标记“超阈值高量级”的副词,其语义本质就是“激活最高冲突阈值”,使负面偏差从“可选”变为“必然”。

其他高量级副词(如“极 X”“极度 X”)虽也表达高强度,但与“过于 X”存在本质区别:“极 X”的量级是“程度顶点”,而非“边界突破”,“过于 X”的量级是“边界侵犯”,自带“违规性”:它的高量级不体现在“程度绝对值”,而体现在“对预期空间的侵犯程度”。

表 3 “极 X”和“过于 X”的评价倾向对比

程度表达	核心语义特征	与“合理范围/预期空间”的关系	评价倾向与语境依赖
极 X	强调 X 的程度达到客观或主观认知中的“最高值”,是对程度绝对值的极致描述	不隐含对“合理范围”的突破,仅聚焦“程度顶点”	评价中性化,可因语境呈现褒义、贬义或客观描述(无强制负面倾向)
过于 X	强调 X 的程度突破“合理范围”或“预期空间的临界上限”,核心是“对边界的侵犯性”	直接关联对“预期空间的侵犯程度”,与程度绝对值无必然关联	自带“违规性”,强制引发负面评价,不依赖 X 本身的褒贬属性(即便 X 为中性/褒义,仍隐含否定)

“极甜”仅说明甜度达到最高值,如甜品广告中可表“极致风味”(褒义),无“超出合理范围”的隐含;“极安静”仅描述安静程度极高,不涉及“是否符合环境预期”。“过于甜”隐含“超出味觉舒适范围”,必然指向负面(如“这杯奶茶过于甜,喝着发腻”);“过于安静”的“高量级”源于突破“正常社交环境的声音强度预期”(如图书馆中过于安静到压抑),而非安静程度的绝对值。

超出偏离越远,冲突越剧烈,否定性越强烈,这种正相关源于人类对“风险梯度”的认知习惯:偏离合理边界的距离越远,潜在负面后果的严重性越高,这种“以边界为参照”而非“以程度绝对值为参照”的量级逻辑,使“过于 X”的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

五、结论

本研究聚焦汉语构式“过于 X”的程度表达与预期偏差互动机制,通过语义属性解析、双向选择限制分析、认知机制溯源及应用价值拓展,系统揭示了“过于 X”作为“超量程度+负面评价”复合构式的独特性。

“过于 X”的核心语义并非单纯的程度强化,而是“程度量化—认知偏差—语用评价”的有机统一。其程度量化属性通过“实际量值突破合理阈值”的逻辑,将抽象程度转化为可判断的“超限关系”;认知偏差属性体现为大脑对

“实际与预期标准”冲突的显性标记，通过“异常检测—容忍阈值—语言编码”的加工模型实现认知简化；语用评价属性则通过“超量形成负面”的强制绑定，完成从客观描述到主观否定的自动转化。三者共同构成“过于 X”区别于“很”“非常”等中性程度表达的本质特征。

“过于”与“X”的组合受严格语义限制：一方面，“X”需具备“程度梯度性”和“开放量级”特征（如“紧张”“严格”），绝对属性词（如“笔直”）或封闭量级词（如“极致”）无法与之搭配；另一方面，“过于”通过语义增值，将“X”的程度从“合理区间”推向“超限范畴”，即使中性或褒义的“X”（如“自信”“热情”）也被赋予负面倾向，同时明确其“过量边界”。这种“X的语义适配性”与“过于的语义反作用”形成双向制约，确保构式功能的精准实现。

“过于 X”的预期偏差通过“多维预期标准—双重语义层—认知理论支撑”的路径实现：社会常规、个体经验与语境临时预期共同构建“合理阈值”；事实层的“程度超量”与评价层的“负面判断”形成连锁语义，驱动从“事实描述”到“价值判断”的自动推理；从认知视角看，原型范畴理论解释了“偏离原型即负面”的认知惯性，心理空间理论则揭示了“现实空间侵犯预期空间”的冲突逻辑，两者共同支撑“过于 X”的“违规性”本质——其高量级不取决于程度绝对值，而取决于对预期边界的侵犯程度，这使其与“极 X”等表“顶点程度”的表达形成本质区别。

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过于 X”的个案分析，为程度副词的“描述—评价”转化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将预期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结合，深化了对汉语“量—价”关联规律的理解；实践层面，研究发现可为二语习得中“过于”与“太”“非常”的辨析提供依据，为自然语言处理中负面情感标记的识别提供语义线索，同时为语料库量化研究、神经语言学实验等后续探索奠定基础。

综上，“过于 X”作为汉语中“程度超量”与“预期偏差”互动的典型构式，其机制本质是人类对“适度”的认知偏好在语言中的投射——通过“过量即负面”的固化逻辑，实现对“偏离合理边界”的高效编码与传递。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汉语程度副词的研究范式，也为语言形式与认知逻辑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具体例证。

参考文献：

- [1]常志伟.也谈“过于”“太过”的副词化历程与动因[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1,(01):118-129.
- [2]殷树林,高伟.超量程度副词“过”“过于”“太过”的形成及使用特点[J].语文研究,2018,(01):32-37.
- [3]张言军.超量程度副词“过分”和“过于”的对比分析[J].汉语学习,2014,(02):74-79.
- [4]任瑞.现代汉语绝对程度副词的量性特征与主观量表达[D].湖北文理学院,2024.
- [5]吴早生,许佳佳.汉语句末语气词与状位绝对程度副词的同现限制机制[J].当代语言学,2025,27(01):49-66.
- [6]Hågemark H ,Gårdenfors P .Expressives, directives and assertions: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speech acts[J].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2025,10184-104.
- [7]White R P .Appraisal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point of view in news and views journalism – unpacking journalistic “persuasiveness”[J].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2025,10095-107.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Degree Expression and Expectation

Deviation in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Guoyu (过于) X"

JiangLei¹

¹ JiangLei,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The "guoyu (过于) X" construction unifies "degree quantification, cognitive deviation, and pragmatic evaluation". Degree quantification turns abstract degrees into "transcendence relation"; cognitive deviation explicitly marks conflicts between "reality and expected standards"; pragmatic evaluation enables automatic shift from objective description to subjective negation. Two-way semantic constraints exist between "guoyu" and "X": "X" needs degree gradability and open-scale features; "guoyu" endows "X" with negative tendency and clarifies excess boundary via semantic increment. Its expected deviation mechanism stems from multi-dimensional standards (social convention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shaped by dual semantic drives from factual and evaluative layers. This offers references for degree adverb studie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Keywords: degree adverbs; "guoyu (过于)"; degree expression; expectation deviation; cognitive mechanism

“跌落街”即“跌落楼”？

——粤语“V落O”构式的意象图式与歧义现象初探

张安翘¹

(1.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香港 999077)

摘要:“V落O”构式(如“跌落水”、“碌落床”)在粤语很常见,语义层次和认知机制却复杂多样。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通过意象图式理论(Image Schema Theory),提出粤语“V落O”构式受多种图式统摄,包括容器、支撑、接触、路径和起点-路径-目标图式等,适用于多种物理、空间或位移关系、宾语属性和语态。构式中“落”兼具终点与起点标记的双重指向功能,甚至可按语境转化为达成标记。宾语“O”则可表位移起点、终点或路径。本文亦指出“V落O”构式的多解性衍生不少同义异形表达和“VO₁落O₂”可逆同义构式,体现粤语同形构式的经济性与理解弹性,却特别容易造成歧义问题,往往需靠语境或调整动词配搭消除。

关键词:“V落O”构式; 意象图式; 歧义; 补语; 语言标记; 粤语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10

1. 引言

1.1 粤语“V落O”构式

粤语“V落O”构式(如“跌落水”、“跳落车”、“挂落墙”、“撞落枱角”、“扣落你户口”)很常见,语义层次和认知机制却复杂多样,在空间表达、语态、句构上也兼具灵活与经济性,却难免因而造成一定歧义问题,使得“V落O”构式的复杂语义系统和认知逻辑尚有不少解析空间。

过往研究多聚焦粤语“落”的体貌范畴,如始成态“V落”、^[1]继续体“落去”或粤语“落”和普通话“下”的对应问题,^[2]针对“V落O”构式的分析却较少。传统语法分析将“落”视为表“向下”或“到达”的趋向标记,这种解读于“掉落街”、“入落信箱”一类“终点导向”表达固然可行,却未足涵盖“落”的全部指向功能。事实上,“V落O”构式的宾语“O”除了可表位移终点,还可表起点(如“跳落马”、“跌落悬崖”)与路径(如“碌落楼梯”、“灏落滑梯”)。此外,“V落O”的应用场合广泛,可用于物理位移,更发展出大量隐喻用法(如“将余额拨落下车”、“时间放落学业”)。“V落O”构式还涵盖多种位移主体,包括有生施事(“跳落泳池”、“行落山”)、有生当事(“跣落斜坡”、“仆落地”)、无生当事(“摆落雪柜”、“放落书包”)与无生自移(“只窗跌落街”、“果实跌落地”)。

上述特征体现“V落O”构式的丰富语义层次与解读弹性,却引发不少歧义现象(如“跳落船”可指移动主体从他处跳到船上或从船跳到他处)、同义异形表达(如“跌落街”、“跌落楼”同样指移动主体从楼宇坠到街上)以及“VO₁落O₂”和“VO₂落O₁”的双向可逆同义构式(如“串条绳落粒珠”与“串粒珠落条绳”意义都非常接近),可见“V落O”构式的语义系统和认知逻辑仍有待剖析。

1.2 研究框架

本文将先简述认知语言学“意象图式理论(image schema theory)”,为分析与解读“V落O”构式奠下理论框架。第三、四节聚焦探讨“落”作为位移“终点标记(goal marker)”与“起点标记(source marker)”的双重方向指向

作者简介:张安翘(2001—),女,硕士,兼任讲师,研究方向为粤方言及社会语言学。

功能,并结合容器、支撑、接触等多种图式,剖析“V落O”构式的典型物理位移和隐喻延伸用法。第五节通过不同歧义案例阐明语境对理解“V落O”构式的指导和制约作用。第六节承上提出“VO₁落O₂”和“VO₂落O₁”的双向可逆构式,揭示“V落O”构式的动态性、灵活性与默许共识性。

2. 意象图式理论 (Image Schema Theory)

意象图式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理解人类认知和语言的核心理论,解释人类如何通过抽象化具身经验、知觉感知以理解世界和抽象概念,并由此学习、诠释和构建更多更复杂或隐喻式的概念与语义。Lakoff和Johnson认为意象图式是从反复而活跃的动作和感官体验抽象出的简单稳定框架,如容器、路径、力量、空间方向,为人类的大量经验赋予秩序和组织性;^[3-4]Gibbs与Colston则认为意象图式是心智、身体和环境的动态互塑结果。^[5]意象图式理论在中国学界同样广受关注,赵艳芳将其视为从实体关系把握而来,用于理解复杂概念的基础和认知框架;^[6]李福印则着重意象图式能将人类经验与认知可视化的功能。^[7]综合来说,意象图式是“感官输入→知觉意识→心理意象→图式”的链式过程,特征有四:一、抽象轮廓可示性,指其能以线、圈简图表示空间关系等抽象概念;^[8]二、领域衍生性,指一个概念往往直接或间接由其下位概念构成,上位认知域为下位概念提供解释框架;^[9-10]三、动静双重性,指其既可表静态结构(如A在B内)也可表动态过程(如把A放进B);^[11]四、认知整体性,指其是整合人类共有体验的思维与学习过程,维系着群体的共享认知逻辑。

3. “V落O”的双重方向指向

3.1 位移终点标记“落”

当O作为位移终点,主体的移动以抵达或附着于O为目标。此构式中“落”作为终点标记(goal marker),其意象图式可分三类:容器图式、支撑图式、接触图式。

3.1.1 容器图式 (Container Schema)

容器图式中,O识解为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射体(trajector, TR)为移动物体,界标(landmark, LM)为具容器属性的O,路径(path, PATH)为“TR抵达LM”的路径或过程。此处“落”的功能接近英语介词“in”、“into”、“inside”。

例如“(将本书)放落书包”,TR为“书”,LM为“书包”,PATH为“书进入书包的路径”。这类“V落O”构式的应用场合很多,从物理移动说,可分为人造容器(如“摆落雪柜”、“放落银包”)、天然容器(如“跳落海”、“跌落山窿”)、人与动植物体(如“食落肚”、“注落细胞”)、建筑与间隔空间(如“放落客厅”、“搬落货仓”)、半封闭容器(如“入落信箱”、“掉落垃圾桶”)和空腔与间隙(如“摄落罅隙”、“填落凹位”)等。

从隐喻层面说,容器意象图式能投射到大量抽象概念,^[4]包括思维心智(如“背落脑”、“刻落心”)、时间空间(如“顺延落下年”、“带落下一世”)、文书与出版物(如“写落笔记”、“印落封面”)、情形情境(如“跌落骗局”、“赖落件事”)、语言与传义工具(如“(将汉语文法)套落英文”、“(将语气词)加落句子”)、人物对象(如“发泄落员工度”、“怪落自己度”)、范畴分类(如“放落某个分类”、“拨落黑名单”)、活动项目(如“寄情落公司”、“(将资源)摆落推广”)、金融资产(如“买晒落车路士”、“瞓身落股票”)、文化与意识形态(如“怪落环保度”、“沉迷落宗教”)、虚拟与电子世界(如“课金落游戏”、“入落手机”)、公理与定理(如“代落条公式”、“代落个理论”)等。

3.1.2 支撑图式 (Support Schema)

支撑图式中,O识解为具有承载功能的平面或物体,TR为被支撑物,LM为提供支撑的物体O,PATH为“TR从趋向到接触并稳定静止于LM表面”的过程。此处“落”的功能接近英语介词“on”、“onto”,强调物体间的接触与支撑关系。

例如“放(本书)落枱面”,TR为“书”,LM为“枱面”,PATH为“书本降抵枱面”的路径或过程。这类“V落O”构式的应用场景可分为地形地貌(如“(飞机)炒落平原”、“跌落沙漠”)、人造支撑体(如“擗落梳化”、“瞓落床”)、人与动植物体(如“摆落大髀”、“放落马背”)、交通路径(如“泊落路边”、“驶落公路”)等。

此外,“V落O”构式还可应用于非水平、非平面或非上下向的支撑关系,并可归纳为以下四种图式变体:一、偏转图式(rotated schema),指非水平(如倾斜、垂直)LM于TR的支撑关系,常见于附着、黏贴、悬挂、涂抹等动态,如“搽落面”、“贴落墙”。二、轴心图式(axial schema),指轴心状LM于维持TR稳定的支撑关系,常见于串、穿、笃、套、挂等动态,如“(戒指)戴落手指”、“串落竹签”。三、双界标图式(dual landmark schema),指TR的某部位兼作LM时发生功能转换的支撑关系。以“仆落地”为例,TR是“人”,LM₁是“地”,LM₂是“TR的脚掌”。位移事件后,TR始终由LM₁支撑,但LM₂却由“脚掌”变成“其他着地部位(如膝盖、手肘)”。“脚掌”支撑功能消失,回归为TR组成部分,而原本仅属TR的“膝盖、手肘”则接替成为具支撑功能的新LM₂,而无论新旧LM₂都属TR部位之一。四、接触图式(contact schema),指TR与LM接触却不构成支撑功能的物理关系。此处“落”的角色接近英语介词“against”、“towards”、“to”。以“(车)撞落石壁”为例,TR“车”与LM“石

望”仅为接触关系，LM 阻止 TR 前进却不承担重量支撑功能。类似例子还有“踢落栏杆”、“掀落玻璃”、“锡落面”等。

3.2 位移起点标记“落”

当 O 作为位移起点，TR 的移动以脱离 LM“O”为目标或结果。“落”用作起点标记 (source marker) 的频率较用作终点标记少，其意象图式可分三大类：起点-路径-目标图式、路径图式、容器图式。

3.2.1 起点-路径-目标图式 (Source-Path-Goal (SPG) Schema)

此图式中，O 识解为物体原点 (即起点界标 source LM, SLM)。TR 首先从 SLM 分离，继而沿 PATH 向目标界标 (goal LM, GLM) 移动，最终由 GLM 终止位移过程。这里“落”聚焦标示 TR 的分离原点 (即 SLM)，角色接近英语介词“off”、“from”、“down”。以“跳落楼”为例，TR“人”从 SLM“楼”脱离，并沿 PATH 向 GLM“地面”移动，位移过程最终由 GLM 强制终止。SPG 图式下“V 落 O”的应用场合相对有限，主要仅按起点属性和语态区分。从属性说，可分为地形地貌 (如“跌落悬崖”、“跳落山”)、人造平面 (如“跌落床”、“推落楼”) 和移动载体 (如“跳落车”、“跳落马”)；从语态说，可分为主动 (如“跳落月台”、“飞扑落车”) 与被动 (如“跌落桥”、“(铁皮) 吹落屋顶”)。

3.2.2 路径图式 (Path Schema)

此图式中，“O”识解为 TR 的位移起点与路径，可视为 SPG 图式的延申变体，只是 SLM 同时充当起点与路径。此处“落”不仅标记 TR 的脱离起点，还突显 TR 沿 SLM 表面持续移动的轨迹或过程。以“溜落滑梯”为例，TR“人”先脱离 SLM“滑梯”的某部位 (如滑梯顶)，再以 SLM 整体 (滑梯身) 为 PATH 向 GLM (地面) 移动。此图式主要用于表示持续式动态，如“碌落楼梯”、“跳落山坡”、“滑落斜路”。

3.2.3 容器图式 (Container Schema)

此图式中，O 识解为抽象或实体容器，TR 原本处于容器 LM 内，再沿 PATH 向容器外部迁移，最终移离容器。此处“落”标示 TR 脱离 LM 的位移情况，功能接近英语介词“out of”、“from”。以“扣落余额”为例：TR 为“款项”，LM 为“余额 (户口)”，PATH 为“款项移离余额户口”的过程。这图式下的“V 落 O”用法较少，可搭配动词不多，仅有“扣”、“减”、“Cut”等，如“扣落你啲假” (从你的假期扣除)、“减落总数” (从总数减去)、“开支 Cut 落员工福利” (从员工福利缩减开支)。

4. 歧义案例浅析

“V 落 O”的语义逻辑复杂繁多、具双向性，导致 O 可能同时具备终点与起点至少两种潜在解读，引发歧义，往往需借助语境消除。例如“筴落床”可指“TR 倒在床上” (O 为终点，如“佢一返屋企就筴落床喇”)；也可指“TR 从床掉到地上” (O 为起点，如“佢好反喇，成日喇到筴落床”)。又如“炒咗落山”可指“TR 坠坡” (O 为起点，如“架车炒咗落山，伤者被困坡底”)；也可指“TR 撞到山壁” (O 为终点，如“架车炒咗落山，挡住晒后面啲车”)。又如“跌落露台”可指“TR 掉在露台上” (O 为终点，如“衣架跌咗落露台，要麻烦楼下开门执返”)；也可指“TR 从露台掉到街上” (O 为起点，如“衣架跌咗落露台，好彩无整亲途人”)，可见语境和说话者默契对理解“V 落 O”构式的重要性。

上述种种歧解更诱发出“V 落 O”构式的同义异形表达，体现其灵活与复杂性：如“跌落街”和“跌落楼”意思一致，都指“TR 从楼宇坠到街上”，只是前者成分 O“街”充当终点，后者成分 O“楼”则充当起点，“V 落 O”的双向性使两句句子意思一致。再如“跳落水”和“跳落船”同样可指“TR 从船跳入水”，前者“水”充当终点，后者“船”充当起点。更多如“碌落地”和“碌落床”、“跌落河”和“跌落桥”、“跳落车”和“跳落地”同理。

5. 双向可逆同义构式

与“V 落 O”构式密切相关的还有“VO₁ 落 O₂”构式 (如“袋钱落袋”、“掉佢落街”)。当 O₁ 和 O₂ 受对称关系图式 (如接触图式 (contact schema)、连接图式 (link schema)) 统摄，则 O₁、O₂ 的位置有时可互换而不改变核心语义。此类结构中“落”的功能从方向或趋向标记转化达成标记，聚焦两个实体接触或连结关系的实现，而非位移方向或路径。例如“绑条绳落个箱”与“绑个箱落条绳”均指向“绳箱绑定”的最终状态，差异仅在视角焦点：前者突显 TR 绳向 LM 箱的附着趋向，后者突显 TR 箱向 LM 绳的附着趋向，然两者终态其实相同。又如“串粒珠落条绳”与“串条绳落粒珠”；“件衫揩落颜料”与“颜料揩落件衫”；“穿只脚踏对袜”与“穿对袜落只脚”等同理，展示对称关系图式下“VO₁ 落 O₂”构式中的“落”呈现出达成标记功能。

6. 总结

本文通过意象图式理论分析香港粤语“V 落 O”构式的多元语义和理解逻辑，提出粤语“落”兼具终点与起点标记的双重指向功能。受不同图式统摄，“V 落 O”构式能表达多种物理、空间或位移关系，更衍生出大量隐喻用法，涵盖各类属性的位移主体和语态。这种构式的理解方式多元、富弹性、具一定语言经济性，却引发不少歧义问题和同义异形表达，往往需依赖语境或改变动词配搭消解。由此延伸的“VO₁ 落 O₂”可逆同义结构中，“落”更转化

为达成标记, 反映“V 落 O”系构式的动态与多解性, 更突显粤语同形构式往往承载多重认知逻辑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 侍建国. 从粤语始成态 "V 落" 看粤普对应及语言教学[J]. 亚太语文教育学报, 2003, 6(1): 115-127.
 [2] 姚玉敏. 粤语继续体“落去”和开始体“起嚟”的产生[C]. 汉语研究的新貌: 方言、语法与文献.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2016:261-284.
 [3]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1-40.
 [4]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5-67, 269-303.
 [5] GIBBS, R. W. JR. & COLSTON, H. L.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Image Schema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5, 6(4): 347-378.
 [6]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67-68.
 [7] 李福印. 意象图式理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 23(1): 80-85.
 [8] 李筱梅, 李海峰. 从表征和认知过程上看表象与知觉、记忆的关系[J]. 心理科学, 2018, 41(3): 520-525.
 [9]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28-160.
 [10] 蒋开天. 图式特质论——基于康德、皮亚杰图式学说的历史考察[J]. 中南大学学报, 2014, 20(2): 44-50.
 [11] Talmy, L. *Communicative Aims and Means——A Synopsis*[J].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1976, 20: 153-185.

Falling On or Off?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mage Schemas and Ambiguity in Cantonese 'V lok9 O' Construction

Cheung On Kiu¹

¹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Hong Kong*

Abstract: Widely used in Cantonese, the "V lok9 O" construction, such as "dit8 lok9 soey2" (fall into water) and "luk7 lok9 tsoŋ4" (roll off the bed), exhibits substantial semantic and cognitive complexity. This essay,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employs Image Schema Theory to propose that the "V lok9 O" construction is structured by multiple schemas, including container, support, contact, path, and source-path-goal schemas. Such schematic diversity underpins its applicability across diverse physical, spatial and motion relations, object properties, and voice types.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lok9" functions dually as both a goal marker and a source marker, while contextually serving as an achievement marker. The object (O), correspondingly, may denote the starting point, endpoint, or trajectory of motion. This paper further contends that the polysemic nature of "V lok9 O" construction gives rise to numerous synonymous heteromorphic expressions and reversible synonymous structures, like "VO₁ lok9 O₂". This semantic flexibility and language economy, however, come at the expense of high ambiguity, thereby often necessitating contextual cues or verb-collocational constraints for disambiguation.

Keywords: "V lok9 O" construction; image schema; ambiguity; complement; discourse markers; Cantonese

破旧立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

谭洁¹

(1.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本文系统评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章指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深感传统史学“既不可不读，又不可读”，亟需革命，遂通过此二著系统批判封建旧史学积弊，并率先倡导“史学革命”。梁启超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核心包括：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服务全体国民；倡导主动探求历史规律、把握“纵横联系”因果的整体有机史观；提出以“史德”辅以史学、史识、史才的“史家四长”素养论；革新方法论，强调科学处理史料与“史迹论次”，并主张收缩传统史学范围，发展各类专史。著作详细阐述了史之定义与范围、旧史批判、新史构建、史料学及史迹论次等核心议题。《补编》则侧重专史编纂的实践指导。文章强调，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不仅标志着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模式转换，其提出的史料学原则、整体史观及史家伦理规范，至今仍具重要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史学史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新史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7

一、前言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在史学领域，梁启超先生成就卓著，被公认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也是 20 世纪前期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核心代表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震动学界，并以此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系统而猛烈的批判。随后，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构建起完整的民族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体系。这些著作集中呈现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为研究对象，展开评述。

二、《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概况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系梁启超先生 1921 年在南开大学授课之讲义，其续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源于 1926 至 1927 年在清华研究院的讲稿。两部著作虽同名“中国历史研究法”，然内容并非简单延续，后者实为前者的补充与深化。《中国历史研究法》共分六章：首章阐述史之定义、意义与范围；第二章系统回顾并批判中国旧史学传统；第三章探讨旧史学之改造与新史学之构建；第四、五章专论史料之搜集、鉴别与整理；末章则聚焦于史实之“论次”，即揭示史事间的纵横联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结构上分为“总论”与“分论”：“总论”部分论述修史目的、史家素养（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并概述五种专史类型；“分论”部分则详述各类专史（如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之体例特征与撰述方法。此二著作问世后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被视为历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性著作与必读经典。

三、《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梁启超深刻的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亟需有识之士“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²。并断言“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³。基于此，他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新史学的任务应运而生，而近世史学的进步则表现为两大特征，其一为客观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命。本书的论述结构正是紧密围绕者两大中心任务展开，前三章侧重探讨治史之“主观观念”的革新，包含史之定义与范围、对旧史学的批判、新史学之构建；后三章则聚焦于“客观资料”即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涵盖史料之搜集、鉴别、整理及史实之“论次”。这一清晰的理论框架，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构建近代新史学体系的自觉意识与方法论自觉。

第一章题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开篇即对史学作出了明确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

作者简介：谭洁(2000—)，女，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²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 3 页。

³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 3 页。

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⁴梁启超对此定义进行深入解析：“活动之体相”，即指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的一切活动事项及其呈现的状态，皆属史学范畴。梁启超进一步区分“体相”为“产品者”与“情态者”。“产品者”指已成为陈迹、不复存在的过去人类活动。“人类社会之庚续活动”，即强调史学研究对象乃整个人类社会历时性的连续活动及其累积规律，绝非孤立事件或断代片段的简单组合。“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解释历史是过往活动之整体，结果及其内在因果关联的综合体。这种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构成史学家研究的主要难点，其本质在于过去影响当下，当下影响未来的动态联系。梁启超指出，史书的编纂目的决定了其服务对象。旧史如《资治通鉴》是专为帝王提供政治借鉴，故其内容偏重中枢政治，导致许多重要社会史迹阙而不载。新史学则应该定位为“国民资治通鉴”，旨在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历史智慧，而非仅为特定权力或智识阶层服务。这一转向体现了史学功能的民主化与公共性诉求。

第二章系统回顾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梁启超开篇即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论断：“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⁵他虽未断言其根本原因，但认为史官制度建立之早、地位之崇隆或为重要因素之一。本章详细梳理了古代史官建置、史书编纂体例（如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的演变，以及历代重要史家和史著，展现了中国史学深厚的传统积淀。然而，梁启超对旧史学的回顾并非简单的颂扬，而是带有深刻的批判性反思。他明确指出“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⁶等观点存在显著偏颇。其偏颇性主要体现于两点：第一，否定早期成就，此论完全抹杀了司马迁之前，如《春秋》、《左传》时代史学实践与思想的积累与发展，忽视了早期史官记录与编纂的贡献。第二，割裂制度连续性，它未能认识到中国悠久的史官制度及其治史传统具有强大的延续性，并非始于司马迁，更未因其而中断。

这种批判性审视直接导向第三章的核心议题——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迫切性。梁启超深刻剖析了旧史学的积弊：史籍浩如烟海，内容庞杂，加之传统史书常具“秘密性”，主要为特定阶层（如“禄士之家”、“好古绩学”者）服务，极大地阻碍了史学的普及与研究效率。因此，他大声疾呼“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⁷。其核心主张是将传统史学“旧领土”中本应属于其他专门的领域，如法制、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划归出去，形成各类专门史，如法制史、哲学史、文学史、美术史、宗教学、经济史等，使之在各自领域内自治发展。新史学应专注于研究“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机能的人类活动之状态综合”，即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联系。梁启超严厉批判旧史叙事常局限于孤立事件的起止，导致事与事之间不相隶属，因果链条断裂。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史学方法论原则：“善为史者之取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于变为碎片。纵的方面最注意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于变为断幅。”⁸这一论述强调史甲必须兼具“横通”与“纵贯”的视野，方能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纷繁复杂的因果关系，避免将鲜活的历史整体切割成互不相干的“碎片”与“断幅”，从而真正把握人类活动的有机整体性。这一方法论思想，成为梁启超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第四、五章探讨了史料学，第四章首先界定史料学概念，并依据梁启超的见解对史料进行了系统性分类。他开宗明义的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⁹。进而将史料定义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¹⁰。基于此，梁启超将史料划分为两大基本范畴，即“文字记录以内”的史料以及“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文字记录以内的史料指各类书面文献记载，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涵盖实物、口传、口碑、域外记载，以及具有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第五章则深入阐述史料搜集和鉴别的具体方法。辑佚与归纳法，广泛搜罗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通过汇总、比较、归纳，提炼结论；专题统摄法，围绕特定研究主题系统搜集史料，构建历史脉络，探求长时段因果联系；积极与消极并重，梁启超区分“积极史料”（证明某时代存在的某种现象）与“消极史料”（证明某时代不存在某种现象），强调后者对历史推导与结论验证的补充价值。此外梁启超提出史料鉴别原则，梁启超视“怀疑态度”为史料鉴别最根本的原则，主张对所有史料最先就发表怀疑的态度。再运用反证法，鉴别史料真伪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举反证”。这需要研究者提出待检验的假说，然后寻求能否找到强有力的反例来否定它。梁启超亦坦言，直接找到确凿反证法并非易事，当常规路径受阻时，尝试“换了个方向从事研究”，可能开辟新的鉴别途径。

第六章聚焦于“史迹之论次”，堪称《中国历史研究法》前半部理论性最强、亦最为精深的章节。反复研读之后，笔者对本章核心要旨的理解如下：

梁启超深刻认识到史迹本身的极端复杂性。他强调，史家若不能“将其眉目理清”，则难以在史学叙述中既保持宏观把握的简洁性，又不失微观史实的详实性。解决这一叙事张力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历史发展进程中蕴含的因果关系与内在逻辑。“论次”在梁启超的阐释中，正在揭示史迹之间普遍联系的方法论枢纽。它要求同时关注事件在长河中的前因与后果以及事件发生时的背景。梁启超对此有旗帜鲜明的论断：“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为史的范围，前后事件必须有因果关系上的逻辑”¹¹。这一观点蕴含着深刻的唯物

⁴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⁶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⁷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48页。

⁸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⁹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¹⁰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¹¹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页。

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的普遍联系观和历史发展规律性具有显著的旨趣相通之处。他坚决主张,历史是普遍联系、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任何历史事件都非孤立、片面的存在,而是处于纵横交织的网络中。因此,梁启超的核心方法论告诫在于:史学研究必须着力厘清历史事件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坚决摒弃将历史现象视为孤立片段进行研究的做法。唯有通过“论次”,把握史迹间的纵横联系,方能穿透表象,揭示历史运动的有机生命与内在逻辑。此章思想,实为梁启超新史学方法论体系的制高点。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旨在补苴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未逮,共分三章,分别探讨“史之目的”、“史家四长”及“专史概论”。史之目的:梁启超开宗明义指出,“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¹²,此论重申并深化了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与价值赋予功能。史家四长:系统梳理并发展了传统史家素养论。唐代刘知几首倡“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章学诚复增“史德”。梁启超不仅对“四长”内涵进行了创造性阐释,更调整了其核心次第,将“史德”(史家之道德心术)置于首位,其后依次为“史学”(史料的掌握与学问)、“史识”(历史洞察力与判断力)、“史才”(史书编纂的表达技艺)。这一调整凸显了史家主体修养中道德优先的原则。专史概论:本章为《补编》部分的重点,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五种专史类型: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及断代的专史。其中,他尤其深入探讨了“人的专史”与“文物的专史”的编纂方法,人的专史:细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类,并结合实例详述其体例与撰写要点;文物的专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梁启超提出若干关键编纂原则:时代划分不应机械套用政治史分期;内容不必求全备,当聚焦核心主线详加阐述;需注重人与文物制度的互动关系;提倡运用图表增强表述清晰度。

《补编》与《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别:梁启超自陈,前著“较为简单”,所论问题偏于宏大理论建构,而《补编》则“叙述翔实”,着力于微观实践指导,尤其侧重专史编纂的具体方法与技术细节。其根本宗旨在于为“研究历史兴味者”指明方向并传授门径,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指南性质。

四、主要观点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系统构建了其近代新史学理论体系,核心观点可概括为以下相互关联的四个方面:第一,经世致用的治史宗旨:梁启超强调史学绝非象牙塔中的学问,其根本目的在于服务现实。研究历史需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智慧与借鉴。这一强烈现实关怀源于作者身处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亟需变革的时代背景。他主张通过历史研究探寻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史学研究因此承载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第二,主动建构的整体有机史观:批判传统史学的“被动”性。倡导史家主动探求历史规律,以整体、联系的眼光审视“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机能的人类活动之状态综合”。强调把握历史纵横交错的因果关系,反对孤立、割裂地看待史事。唯有如此,方能从历史中汲取深刻教训,为改造社会提供依据;第三,史家素养论的革新:继承并发展刘知几“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与章学诚“史德”说,首创性地将“史德”置于首位。史德:史家心术必须端正,持论公正无私,忠实于史实,力戒夸大、附会、武断。史学:兼具专门学问与广博常识,方能深入浅出,触类旁通。史识:具备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与判断力。史才:掌握精湛的历史编纂技艺,指文章的组织与表达能力。四者相辅相成,以“史德”为根基,共同构成史家主体修养的核心。第四,方法论革新与开放视野,专史与通史结合,主张收缩传统史学庞杂范围,划出专门史令其自主发展,同时强调新史学应聚焦于通贯性的整体人类活动进程。注重西学方法论,梁启超的史学建构深受时代“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他积极吸收西方近代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批判性地反思“中体西用”的局限,主张将其融入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以寻求更科学的认知路径。这种开放视野是其探索救国道路在学术上的反映。

五、学术价值与当代启示

(一) 学术价值

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系统构建了“新史学”的方法论体系,标志着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范式转换。梁启超提出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科学方法驾驭史料、以整体史观把握因果联系,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范本。针对“史料散佚”与“方法缺失”两大困境,梁启超首创性地将史料划分为“文字记录以内/以外”两大范畴,提出“积极/消极史料”概念,并强调“怀疑-反证”的史料鉴别原则。其方法论深刻影响了傅斯年“史料即史学”的实证传统,推动了中国史料学的科学化进程。在刘知几“三长”基础上,梁启超将“史德”置于史家素养之首,辅以史学、史识、史才,构建了兼具伦理规范与专业能力的史家标准。章学诚曾言“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¹³,梁氏则赋予其现代学术伦理内涵。

(二) 当代启示

梁启超主张“研究从质疑始”,强调对史料保持实事求是的批判态度。这一思想呼应了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警示研究者避免先入为主的价值预设,正如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¹⁴,微观考据需持敬畏之心。其“纵横联系”的史观启示我们:历史研究需超越帝王中心论,关注群体合力对社会进化的作用;反对机械分期,主张从长时段把握文明脉络;警惕历史工具化倾向,坚持“史实不可杜撰”的客观性原则。

¹²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04页。

¹³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¹⁴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对于书中的局限，需辩证看待，以传统史书体例改造旧史学，存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内在张力，部分史料搜集方法因数字化时代来临需重新审视，但其“竭泽而渔”的史料意识仍具指导意义。

梁启超的史学遗产，不仅在于具体结论，更在于其以问题意识驱动研究、以开放视野融通中西的学术品格。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今天，其对历史规律性与主体性的思考，仍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史学话语体系提供着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汤志钧.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05.
- [2] 常利兵. 益以新知——重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J]. 文史月刊,2023,(04):1.
- [3] 章学诚,叶瑛. 文史通义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5.05.
- [4] 周园. 论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观与方法论——以《历史研究法》为中心的考察[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05):141-149.
- [5] 李明,杜正华,李杉等. 文史哲通论[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08.
- [6] 杜维运. 中国史学史 第3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07.

Breaking with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Liang Qichao's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Tan jic¹

¹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Liang Qichao's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upplementary Compilation of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after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Liang Qichao deeply felt that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as "both indispensable and unreadable," urgently requiring a revolution. Through these two works, he systematically criticized the drawbacks of feudal old historiography and took the lead in advocating a "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 The core of Liang Qichao's new historiographical theoretical system includes: taking "applying knowledge to practical affairs" a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to serve all citizens; advocating an organic holistic historical view that actively explores historical laws and grasps the causal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nnections"; proposing the "four qualities of historians" literacy theory, which combines "historical morality" with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insight, and historical talent; innovating methodologies, emphasizing the scientific process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advocating narrowing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to develop various specialized histories. The works elaborate on core issues such as the definition and scope of history,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onstruction of new historiography, source studie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events. The *Supplementary Compilation* focuses on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specialized histories.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Liang Qichao's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not only marks the paradigm shif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but also that the principles of source studies, holistic historical view, and ethical norms for historians he proposed still hold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day,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Liang Qichao; New Historiography

15 世纪英国的城市危机摆脱及其的分析

李旭¹

(1.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15 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阶段, 这一时期城市危机频发。英国城市传染病众多, 基础设施不足, 内外战争骚乱频发, 经济发展受阻, 城市治理困难, 社会秩序混乱。英国致力于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入手, 使得英国城市摆脱危机。这些措施和手段为之后英国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现代城市的治理提供了经验教训。

关键词: 15 世纪英国; 黑死病; 城市危机; 摆脱危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8

一、绪论

(一) 选题缘由

14 世纪中叶西欧爆发的黑死病使得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15 世纪人口密集的英国城市仍然饱受各类流行病困扰, 城市医疗和卫生状况急需改善。1381 年沃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虽被镇压, 但民众对封建制度和高税收不满。15 世纪英国城市骚乱和暴动频发, 城市治理遇到困难。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 进一步破坏了英国城市社会秩序, 经济发展也受阻。15 世纪英国出口贸易萎缩, 传统产业急需调整, 税收政策不得民心。15 世纪英国致力于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多方面入手, 使得英国城市摆脱危机。这些措施和手段为之后英国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为现代城市的治理提供了经验教训。

15 世纪是英国历史中的重要转折期。研究 15 世纪英国城市摆脱危机,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政治、社会和经济转折期对英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城市危机的摆脱背后涉及许多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通过分析这些因素, 可以揭示社会变革的动力, 弄清英国由中世纪晚期向近代早期过渡的关键。研究 15 世纪英国城市如何摆脱危机, 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变迁, 还能为城市治理和发展提供借鉴。

(二)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研究 15 世纪英国的城市危机的文章不多, 多以硕士论文的形式存在, 研究视角也多局限于单一领域。

张李在《13-15 世纪约克城市政治研究》^[1]一文中, 详尽地讲述了约克如何在市政机构, 教会系统和民间组织的共同作用下, 成为在国王统治之下的地方自治城市典范。约克的地方自治虽对其它英国城市的治理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但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和行政结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黄晓翠^[2]认为中世纪晚期, 在英格兰乡村和城市环境中, 木材和茅草建成的房屋, 糟糕的卫生条件, 以及淡薄的个人卫生意识, 形成了鼠疫的流传环境。从 1348-1510 年, 英格兰多次爆发全国性瘟疫和地方性鼠疫, 人口分布密集的城区鼠疫尤其严重。频繁出现的鼠疫对人口增长产生的长期消极影响, 也不利于英国城市的发展。郭碧玉^[3]对 14-16 世纪英格兰行会的治理有所研究, 他认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城市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城市是商业交易中心的地位凸显。此时市场交易环境日益商业化, 城市的市政机构也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行会内部出现了诸多问题, 行会外部也面临糟糕局面。面对这些问题, 行会需要加强治理, 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城市的生活。此作虽然分析了行会在城市经济中的作用, 并指出城市治理中的问题, 但仍缺乏对城市危机的深入剖析和跨领域的综合视角。这三位的文章皆为硕士论文, 分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这三个领域找角度, 来分析 15 世纪英国和英国城市的发展。

作者简介: 李旭(2001—), 女, 湖南益阳人,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市史。

除上述角度外,也有学者研究环境和宗教对英国城市生活的影响。张思^[4]认为中世纪晚期的伦敦除受到生活垃圾污染外,还饱受工业生产导致的空气、噪声、水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困扰。市政当局通过颁布禁令规章、设置机构官员等途径来整治这些问题。《15世纪英国城市宗教生活初探》^[5]以15世纪的英国为个案,从城市发展与教会现状切入,探讨了市民阶级的宗教生活状况以及宗教活动对社区意识、民族意识及宗教思想萌芽的影响。

林秀玉写作了《试论15—18世纪英国城市的转型》^[6]一文,她从城市转型的角度研究15世纪英国城市在经济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和转变。她认为15、16世纪英国城市普遍出现危机和衰落,其实质是城市的封建性危机。城市危机加速了城市封建化蜕化过程,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前提。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上,较少有跨学科的研究。这些研究多停留在局部城市的治理和社会结构分析,尚未系统地探讨15世纪城市的多重危机,包括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环境问题以及宗教改革等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

(三)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15世纪英国城市的研究较深入,且多有专著发表。

艾丽斯·斯托普福德·格林^[7](Alice Stopford Green)在《十五世纪的城镇生活》(*Town Lif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一书中对15世纪英国城镇生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描绘,涵盖了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讲述了城市是如何通过经济活动和自治管理逐渐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介绍了市民、行会和商人阶层如何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作用,为研究15世纪英国城市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英国中世纪城镇(1200-1540)》^[8](*The Medieval Town in England 1200-1540*)收录了著名历史学家的十二篇文章,揭示了中世纪城镇的演变及其居民的生活。文章从13世纪英国城市的急剧扩张,写到15世纪英国城市因瘟疫、人口减少和经济变化而出现各种危机。书中展示了这一时期英格兰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研究中世纪英格兰城市历史的关键参考文献,对了解15世纪英国城市在中世纪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十五世纪英格兰的政治与城市部门(1413-1471)》^[9](*Politics and the Urban Sector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1413-1471*)为评估城市社会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政治文化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该书不仅关注英国城镇,还创建了一个模型来评估城镇作为一个“城市部门”所能发挥的政治影响力。伊丽莎·哈特里奇(Eliza Hartrich)根据来自22个城镇的原始资料,展示了城市间关系的波动如何影响十五世纪英国政治的内容、节奏和语言。

与国内相比,国外对15世纪英国城市的研究更加深入且多元化。国外研究有对城市危机的多维度探讨,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尤其是通过多学科的综合方法分析城市的衰退、转型与治理问题。国外学者不仅关注城市经济衰退与社会治理,还深入探讨了疫病、环境污染、社会结构变化等对城市发展的综合影响。而且,国外的许多研究将英国城市的危机置于更广阔的欧洲背景下,揭示了这些危机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二、15世纪英国的城市面临多重危机

(一) 政治危机

1. 中央集权削弱和英国城市政治治理受阻

1337年至1453年的百年战争在116年的漫长时间里,极大消耗了英格兰的财政资源。为了支撑战争,王室通过征税和借贷的方式筹集资金。但在战后,债务未能及时偿还,英国政权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在此情况下,政府不断加重税负,尤其是在城市中征收重税。城市作为税收的重要来源,民众对税收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城市居民的反抗和抗议逐渐增多。战后的财政困境迫使中央政府无法有效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军费和行政费用的支付成了难题。这种财政危机直接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导致地方贵族的权力逐渐膨胀,地方割据现象愈发严重。许多地方城市逐渐摆脱了中央政府的管辖,开始在地方贵族的掌控下运作。英国城市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持,面临政治治理的困境。

在百年战争结束后,1455年至1487年的玫瑰战争再次加剧了英国城市政治的不稳定。玫瑰战争不仅是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的家族斗争,更是贵族之间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由于长期的财政困难,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更加松散,地方贵族在城市中的影响力愈加增强,地方割据的现象愈加严重。城市在这种权力真空中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地方贵族的支持,这使得城市的政治独立性和自治性进一步削弱,城市的治理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

多年的战争和黑死病使得英国城市人口大量减少,人口大量丧失使得15世纪英国城市治理受阻。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英国也未能幸免。尽管黑死病发生在14世纪，但其余波持续到15世纪，人口恢复缓慢。中世纪英国的城市在黑死病之后，人口大幅减少。再加上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英国丧失了大量的人口。英国城市人口的锐减不仅影响了劳动力供应和城市的经济活动，还使得城市在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面临挑战。许多城镇无法维持正常的行政功能，市政管理陷入混乱。人口减少也削弱了城镇的军事力量，使得城市在防御和政治稳定方面更加脆弱。

2. 英国城市骚乱和暴动频发

15世纪的英国城市面临着经济萧条的问题。农业生产的减少、贸易的不景气以及商业活动的萎缩，使得许多城市的经济状况恶化。经济萧条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许多城市不得不削减公共开支。城市公共开支的减少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出现困难。这不仅削弱了市民对政府的信任，也使得城市治理更加困难。经济萧条不仅削弱了城市的财力，也使得城市骚乱和暴动频发。

15世纪的英国城市经历了一系列的民众运动，凯德起义是代表性的起义。农民由于不满沉重的赋税以及百年战争的失利，于1450年爆发了一次大规模起义。肯特郡率先爆发起义，蔓延到萨塞克斯郡，后面攻入伦敦。由于起义者抢劫伦敦市民，引发伦敦市民不满，双方之间爆发冲突。起义最终被大主教调停，领导者被捕。这场起义不仅反映了当时城市民众的政治焦虑，也揭示了城市精英与普通市民之间的矛盾。

15世纪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原有的管理机制无法适应新的需求。许多城市政府被富裕的商人和行会垄断，普通市民的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英国城市行会有极大话语权，且排外性强，新兴商人和外来手工业者很难获得平等的经济机会。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阶级进一步被固化，矛盾加剧。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希望打破行会的控制，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诺里奇是15世纪英格兰东部的重要城市，也是羊毛贸易和纺织工业的中心，诺里奇的城市管理由一系列行会掌控。15世纪60年代，诺里奇当地的工人与行会官员之间的暴力冲突频繁发生。在某些地区，城市居民甚至组织反对地方官员的暴动，1469年伦敦的抗税骚乱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 经济危机

1. 贸易因素

15世纪英国城市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对外贸易的萎缩和传统产业的调整。

羊毛是英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在15世纪期间，英国的羊毛出口明显下降。汉萨同盟此时是英国国际贸易的强有力竞争者，汉萨同盟控制了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使得英国商人在欧洲市场中的地位受到严重挤压。根据相关统计，14世纪初英国羊毛出口的平均年量约为35000包，但到15世纪中期，这一数字大幅下降至约8000包，而在15世纪后期，出口量甚至进一步减少，出口数量不到8000包。^[10]

与此同时，英国的制造业面临结构性挑战。尽管毛纺织业开始崛起，但其增长跟不上羊毛出口的减少。特别是汉萨同盟有力地控制波罗的海贸易，英国城市的国际贸易份额进一步被压缩。进口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加剧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并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2. 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的变化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为了填补英法百年战争后的财政赤字，中央政府对城市商人和居民加征税款。这些新增的税收，使许多中小商人无力经营，也使得人民起义。十四世纪中期，英国政府颁布《劳工法案》强迫劳动者接受黑死病流行前的较低工资。1377年又开征人头税，1380年第三次征收时，税额增加2倍。^[11]人头税是一种对每个人征收的统一税率，无论个人的经济状况如何，都得上交给政府。由于税负沉重，特别是在黑死病后的经济复苏期，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阶层都无法承受这种税收。1381年的泰勒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人头税，东苏塞克斯和肯特两郡农民抗缴人头税，后向伦敦进军。他们袭击税务官员和贵族的宅邸，要求废除人头税，取消农奴制，并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虽然泰勒起义最终被镇压，但它揭示了英国14世纪末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特别是税收政策的失当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打击。15世纪时，英法百年战争持续消耗国库，王室仍依赖苛税，城市商人和居民对税收政策十分不满。

(三) 社会危机

15世纪英国城市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贫困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城市治理困难、城市医疗水平低以及卫生状况差。

经济危机的后果在社会领域尤为明显，贫困和阶级矛盾成为15世纪英国城市的重要社会问题。因经济萧条而失业的工人数量大幅上升，尤其是依赖手工业的城市人口。15世纪后期伦敦的许多居民需要依靠救济维持生活，日常生活压力比较大。在其他中小城市，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再加上圈地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土地，许多人不得不以流浪乞讨为生。

1466年,沃里克郡的一个小礼拜堂牧师如斯就描述了50年代以来圈地造成乞丐的这一历史事实。^[12]在沃里克,由于圈地,“昔日许多城市和市镇商贾云集。现在这里到处是成群的乞丐,他们是被村庄的破坏者驱赶来此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当人们与其家人被驱逐,……他们不再生儿育女,他们在意的是如何生存。许多人以乞讨度日,另一些受生活所迫去偷抢,……偷抢者最后被处以绞刑,而懒汉与乞讨者最后只得悲惨地生活。”^[13]城市治安状况因贫困和矛盾激化而恶化,流浪乞讨者和失业者常被指控为治安问题的根源。

14世纪中叶爆发的黑死病使得英国大量人口死亡、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15世纪人口密集的英国城市频繁爆发瘟疫和各类感染病,城市医疗水平低。且城市排水系统不完善,垃圾和污物随处丢弃,饮用水源易受污染,卫生状况差。这些问题加剧了疾病传播,使得城市的生活环境恶劣。黑死病对劳动力市场的破坏性影响在15世纪持续显现。农业劳动人口减少使得耕地大量抛荒,地租收入下降。再加上1437年到1445年期间为小河冰期,寒冷的气候导致英格兰谷物产量明显减少,人民生活困苦。^[14]这段时间的寒冷气候对欧洲农业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低温直接导致了英格兰众多地区粮食歉收和饥荒增加。粮食歉收也激发了社会矛盾,导致多地发生了骚乱事件。

三、15世纪英国的城市危机摆脱

(一) 政治方面

15世纪的英国,在结束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后,稳定城市秩序,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维护政治秩序。

亨利七世的继位标志着玫瑰战争的结束,政治相对稳定。亨利七世继位后,逐渐加强了中央集权。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星室设立高级法庭,听取臣民申诉、监察官吏、审判叛乱贵族。亨利七世采用星室法庭来控制贵族的权力,防止他们滥用私人武装和参与非法贸易。这种政治稳定为城市的经济复苏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减少了内乱和社会动荡带来的破坏。

15世纪,许多英国城市在地方管理和司法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

15世纪是英国从中世纪向近代早期过渡的关键时期,商业活动和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市镇作为贸易和手工业中心,想要争取更多自主权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通过颁布《市镇宪章》(Town Charters),赋予城市更多的自治权,使得城市能够更加独立地管理自身事务。这些宪章不仅允许城市自主选举市长和议会成员,还允许他们自行管理税收和公共工程。市长、议员和行会代表组成了市政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能涵盖了城市的税收、基础设施、商业管理、公共卫生及治安等方面。《市镇宪章》的颁布赋予城市更多的自我管理权,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城市的复苏和发展。市政委员会的成立使城市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升了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15世纪,亨利七世通过一系列法令和改革措施,特别是通过1485年以后的立法,赋予地方治安法官更多的行政、司法和警察职能。这一系列的法律,统称为《治安法官案》(Justices of the Peace Act)。《治安法官案》加强了对城市犯罪的控制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为经济活动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减少了城市内部的犯罪和暴乱,有利于政治的稳定。

(二) 经济方面

1. 改良毛纺织业

15世纪,羊毛是英国的主要经济支柱,羊毛出口收入是英国财政的重要来源。随着百年战争的结束,15世纪的英格兰逐步恢复了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业联系。英格兰与佛兰德虽然在15世纪的贸易十分紧密,但国王亨利七世仍然加强对羊毛贸易的管控,提高羊毛出口的关税,减少向佛兰德等地区出口未加工的羊毛。18世纪著名政治家和商人狄福在《英国商业计划》中写道,从1489年开始,国王亨利七世把促进英国羊毛加工业列入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派遣皇家使团选择适合羊毛加工的地点,暗地引入低地国家的熟练工人,提高羊毛出口税赋,甚至有意禁止羊毛出口。^[15]亨利七世在西约克郡的韦克菲尔德、利兹和哈利法克兹等地建立羊毛纺织加工地,因为这些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工人合适、水资源和煤矿资源丰富。这些举措鼓励在英国本土进行羊毛的加工和纺织制造,提升了英国的制造业生产水平,并减少了依赖外部市场。因此这些城市繁荣了起来,英国的毛纺织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 发展新兴产业

为了减少对单一产业的依赖,除了毛纺织业,金属加工、造船、酿酒和制革等手工业也迅速发展了起来。^[16]这种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为城市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城市更能抵御外部经济波动。这些产业的兴起不仅分散了经济风险,也增强了城市经济的韧性。为了支持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颁布了一些法案。地方政府还通过补贴和减税等方式,鼓励新兴行业的投资和发展。这种政策支持吸引了大量工匠和商人,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3. 加强行会管理

15世纪时,城市手工业行会向公会转变,希望寻求集体的力量来获得更大的发展。^[17]行会集中大量的工匠

和商人，通过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此时，行会是管理城市工匠和商人的重要组织。行会规范了工艺品的生产质量，控制了市场价格，避免了市场的过度竞争。通过行会的制度化管理，城市的经济得到了稳定的发展。除此之外，行会也起到了推动技术创新和生产模式变革的作用。伦敦的羊毛加工行会就开始使用更先进的织布技术，提高了羊毛制品的质量和产量，促进了伦敦经济的发展。

（三）社会方面

14世纪中叶爆发的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锐减，英国约有30-50%的人口死亡，城市陷入了长期的人口危机。直到15世纪中叶，英国人口才开始逐渐增多。政府颁布政策，吸引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缺。伦敦等大城市采取了吸引外来移民的策略，鼓励工匠和商人到城市定居，以重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人口的增长不仅恢复了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1. 改善城市卫生

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在15世纪逐步改善，政府和地方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卫生改革措施。这一时期，城市政府开始实施清理街道和市场的政策，修建公共下水道系统，清理垃圾，改善城市的卫生环境。例如，约克市政府在15世纪颁布了一系列卫生条例，要求居民定期清扫街道，并对垃圾乱丢者进行罚款。

城市的医疗条件也在15世纪得到改善，政府建立了更多的慈善院和诊所为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圣巴多罗买慈善院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和圣托马斯慈善院 (St. Thomas' Hospital) 最初创建于12世纪，是伦敦的重要医疗机构。在15世纪，由于人口增长、传染病频发，慈善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新增了病房和护理设施，来应对日益增长的患者需求。慈善院的资源也得到了更为有效地管理，医院的医务人员开始实行更加规范化的工作制度。它们在15世纪接诊了众多的病人，是照顾伤病民众的重要场所。

慈善活动在15世纪的英国城市中变得更加普遍，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许多富裕的商人和市民捐赠财产和金钱，用于建立慈善机构，如医院、孤儿院和救济院。圣巴多罗买慈善院和圣托马斯慈善院也因为得到了社会爱心人士人士的捐赠，所以医疗条件大大改善。这些慈善机构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改善了社会底层的生活条件。

2. 发展城市教育

英国的文艺复兴大约始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文艺复兴的思想传入英格兰后，推动了英国文化和知识的变革。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强调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改革，促进了城市居民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所以15世纪的英国比较重视教育，城市开办了各级学校。随着城市间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与复杂，对具备专业知识、技能人才的需求激增。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关键途径，其重要性愈发凸显，逐渐成为英国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

印刷术的引进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大大促进了城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威廉·卡克斯顿在1476年引进了印刷术，他1476年在伦敦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使得书籍生产更加便捷和廉价。这不仅提升了知识的普及，也推动了文化的复兴和城市居民的素质提高。15世纪的英国，各大城市的书店可见教育、科学、宗教等五花八门的印刷出版物。

15世纪地方政府和教会大力推广基础教育，在城市地区建立了许多文法学校。文法学校为儿童提供了基本的阅读、写作和算术教育。这一时期，许多城市建立了数所文法学校，吸引了大量贫困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就学。^[18]到15世纪末，英格兰的文法学校数量从14世纪的不足50所增加到200多所，这一增长主要反映了城市教育的普及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这种教育的推广提高了市民的识字率，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流动能力，工匠和商人家庭的后代通过教育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

3. 行会和教会推动了城市福利

行会在15世纪的英国城市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承担着社会责任。行会为会员提供社会福利，使得工匠和商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它在疾病治疗、丧葬事宜、退休等方面给予会员补贴，减轻了城市政府的社会负担。行会的福利系统使得许多城市工匠能够在失去工作或年老体弱时，依靠行会的救济维持基本生活。

教会在15世纪继续通过道德教化和宗教活动影响城市社会。教会不仅担负着宗教义务，还在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教会、修道院和宗教团体为贫困人口提供食物、医疗和住房。教会在伦敦、约克和诺维奇等城市组织了许多社区活动，通过教义传播和慈善捐赠，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教会的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的不平等，缓和了阶级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15世纪的英国城市面临严重的危机，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

政治上，百年战争导致英国财政赤字，政府通过加税和借贷应对，但未能及时偿还债务。地方贵族权力膨胀，中央政府对城市的控制力逐渐削弱。玫瑰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贵族的权力斗争，城市的政治独立性和治理能力遭遇困境。黑死病造成的严重人口损失，使得城市在劳动力和军事防卫方面变得更加脆弱。经济上，15世纪英国对外贸易的萎缩和传统产业衰退。羊毛出口大幅下降，汉萨同盟的竞争使得英国商人在欧洲市场的地位受到挤压。同时，重税和苛刻的税收政策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导致了频繁的骚乱和暴动。经济困境使得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城市的治理更加困难，社会矛盾加剧。社会上，英国城市贫困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城市治理困难、城市医疗水平低以及卫生状况差。

尽管15世纪英国城市面临多重危机，但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英国城市逐渐摆脱了危机，为

后来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亨利七世的登基后，加强中央集权，设立法庭限制贵族权力，改善政治稳定。通过《市镇宪章》赋予城市自治权，提高了城市治理效率。治安法官的设立有助于维护城市秩序和社会稳定。在毛纺织业的改良下，英格兰逐渐恢复了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减少了羊毛出口，增加了国内加工。政府鼓励多元产业发展，如金属加工和造船，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多样化。此外，行会制度的加强也促进了英国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随着人口的恢复和迁移，城市逐渐恢复了劳动力市场。公共卫生状况有所改善，政府和地方当局修建了公共设施，清理街道，改善城市环境。城市教育得到重视，文法学校数量增加，提升了居民的文化素质和社会流动性。同时，行会和教会也为贫困阶层提供了社会福利，推动了社会的和谐。

总的来说，英国城市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渐恢复了秩序和经济发展，为未来的城市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张李.13-15 世纪约克城市政治研究[D].西南大学,2017.
- [2] 黄晓翠.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瘟疫及其对人口之影响 (1350-1510) [D].陕西师范大学,2014.
- [3] 郭碧玉.14-16 世纪英格兰行会治理研究[D].吉林大学,2021.
- [4] 张思.13-15 世纪伦敦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治理考察[J].理论界,2014,(03):122-125.
- [5] 曾璐.15 世纪英国城市宗教生活初探[D].南京师范大学,2020.
- [6] 林秀玉.论 15-18 世纪英国城市的转型[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106-111.
- [7] Green A S. *Town lif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M]. Macmillan & Company, 1893.
- [8] Holt R, Rosser G. *The Medieval Town in England 1200-1540*[M]. Routledge, 2014.
- [9] Hartrich E. *Politics and the Urban Sector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1413-1471*[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0] POWER E E. *The wool trade in English medieval histor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57.
- [11]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100.
- [12] 张佳生.中世纪晚期英国的乞讨问题及其限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75-78.
- [13] Myers, A. R.,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V, 1327-1485*[Z].New York:Routledge,2001:1015.
- [14] Campbell B M S. *The great transition: Climate, disease and society in the late-medieval world*[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5] DEFOE D.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being a compleat prospect of the trade of this nation, as well the home trade as the foreign*[M]. New York: A. M. Kelley Publishers, 1967:95-96.
- [16] RIGBY S H. *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lass, status, and gender*[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17] 冯璐璐.中世纪晚期英国行会变迁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
- [18] ORME N. *Medieval schools: from Roman Britain to Renaissance England*[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218-254.

The Resolu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Urban Crisis in 15th-Century England

Li Xu¹

¹ Biquan Academ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15th century, England was at a critical stage of its transition from a feudal society to a capitalist one, during which urban crises occurred frequently. English cities faced numerous outbreak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frequ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flicts, slugg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in urban governance, and a chaotic social order. In response, England undertook efforts acros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to help its cities overcome these crises. These measur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gland's later rise and provided valuable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for modern urban governance.

Keywords: 15th-century England; Black Death; urban crisis; overcoming the crisis

英汉字幕翻译中的归化研究——以《生活大爆炸》为例

索芷怡¹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 文化全球化背景之下, 美剧《生活大爆炸》在国内大热, 其字幕翻译作为观众和剧情内容的媒介, 发挥了重要作用。字幕组大量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 以期中国观众能够得到相同的审美体验, 感受到美式幽默。本文尝试以《生活大爆炸》中的部分英汉字幕为例, 通过分析字幕中引用典故、网络流行语, 以及本土化传译的三种策略, 着重研究归化策略在翻译中的应用, 并探讨归化翻译如何让观众更好地理解美剧中的幽默与文化, 在日后的翻译实践中加以运用, 为翻译工作及研究带来适用的方法与策略。

关键词: 美剧; 《生活大爆炸》; 字幕翻译; 归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06

一、引言

美剧在国内发展已有 30 多年, 从最开始引进的《加里森敢死队》《成长的烦恼》登上了中国的黑白荧幕, 引发了国人对美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到后来的《越狱》《老友记》为代表的美剧真正开启了全民美剧的风潮。以情景喜剧、科幻片、动作片为代表的美剧主流类型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类, 其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建构^[1]。直到今天, 美剧更是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影视文化, 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喜爱和推崇。但由于语言不同, 在引进影片之前必须配以中文字幕, 才能够帮助中国观众理解影片内容、扫清语言障碍。因此, 字幕翻译作为观众和剧情内容的媒介, 重要性不言而喻。

译者在字幕翻译实践过程中, 往往采用多种翻译策略, 让译文表达得更流畅。倘若只采用直译, 或者是逐词翻译的方式进行翻译, 不联系语境和文化背景, 就会使译文过于死板, 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因此, 归化策略在字幕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归化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目的语文化中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 为读者提供一种透明、自然流畅的译文^[2]。美国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的汉语字幕大量采用归化翻译策略, 以观众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来翻译原文, 使汉语观众与英语观众达到近乎相同的审美体验, 成功地让中国观众欣赏到美式幽默, 从而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化。

二、字幕翻译与归化策略

(一) 字幕翻译及其特点

字幕翻译, 就是把其他语种的电影和电视剧的源语言翻译成所在国观众的目标语言。字幕翻译和其它翻译的不同在于影视字幕翻译受技术和情境语境等因素的制约^[3]。字幕翻译作为观众和剧情内容的媒介, 不仅具有翻译的共性, 它还存在一些独到之处。

字幕具有时空限制性, 每行字幕的停留时间大概 2 到 3 秒, 这就要求字幕组尽力做到惜字如金、简洁明了, 在有限的时间内为观众呈现准确的翻译。另外, 由于大众受教育的程度不同, 字幕译文应通俗易懂、接地气, 避免使用过于书面化的语言, 从而影响观看体验。以及要注意到中外文化存在的差异性, 尤其是在美剧中, 经常大量出现国人不为所知的美式幽默词汇。在处理这些特殊词汇时, 要做到让目标语观众通晓其含义, 就必然需要译者转化为目标语观众可理解的语言形式。由此, 归化策略便突显其优势了。在美剧字幕翻译中, 为了让观众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无障碍理解剧情、捕捉幽默和情感, 译者往往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作为主导, 将美式俚语、专有名词、双关语等转化为中国观众熟悉的表达, 以此最大程度地降低文化折扣, 确保喜剧效果即时传递, 建立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

作者简介: 索芷怡(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二）归化策略的起源与必然性

归化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13年，是由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在《翻译的方法》中同异化翻译策略一起提出的，即“只有两种翻译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不打扰作者，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4]。后来，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在1995年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两个概念，他将第一种方法对应于“异化”，第二种方法对应于“归化”。他表示：归化是译者将读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则是译者将读者带入原语文化。归化和异化不是一对截然不同的两个二元对立的术语^[5]。简而言之，归化就是译者以读者为中心，将原语译为读者所在国家的目标语言，让读者得到较好的阅读体验；异化则是译者以作者为中心，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让读者体会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魅力。归化与异化是一种在翻译过程中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6]。

在字幕翻译这一特定领域，归化策略的广泛应用具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字幕需与画面和声音同步转瞬即逝，且屏幕空间有限，这就要求译文必须高度简洁、瞬时可读。然而，过度异化带来的文化隔阂会严重干扰观众对画面和剧情的即时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归化翻译能够通过将源语文化概念转化为目标语文化中功能对等且观众耳熟能详的表达方式，最大程度地还原原作的娱乐性和感染力，从而使观众沉浸在剧情中，而非为语言障碍所困。因此，归化策略成为实现字幕翻译即时性、可读性和娱乐性的关键手段。

三、字幕翻译中归化策略的应用

《生活大爆炸》以其密集的科学元素和流行文化梗著称，其字幕翻译的归化策略为跨越文化障碍、实现喜剧效果的传递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中，英汉字幕翻译的归化策略丰富多样，尤以引用典故、融入当下网络流行语进行归化翻译、以及深度本土化的传译最为典型。这些翻译策略的核心在于突破语言表层，将源语文化中的幽默、讽刺和特定语境精准“移植”到目标语文化土壤中，有效消解了文化隔阂，使中国观众得以领略原汁原味的美式幽默。

（一）引用典故进行归化翻译

成语、诗词典故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汉语表达智慧。这些典故的字数大多在七字之内，简洁凝练，语义浓缩丰富，应用到字幕翻译上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生活大爆炸》中字幕组大量引用典故，这样既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也能让观众在理解剧情内容的同时体会中国传统文化。归化策略的引入让观众在会心一笑间感受到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无形中增强了文化认同感。

例1. I meant compared to the real-world applications of neurobiology, theoretical physics is...hmm, cute.

“cute”译为：小巫见大巫

艾米与谢尔顿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双方均认为自身领域最具价值，并因此展开激烈辩论。作为神经生物学博士，艾米对谢尔顿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研究流露出轻视态度，使用“cute”一词实为暗指其“幼稚”或“不值一提”，这也自然引发了谢尔顿的反驳。此处，“cute”的本义（可爱）在特定语境下已发生语义偏移，引申为天真、肤浅之意。译者选用成语“小巫见大巫”进行归化翻译极为恰当。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相比之下，一个远远比不上另一个。该成语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一方远逊于另一方”的核心含义，更因其高度凝练的形式和植根于中文文化的表达方式，完美契合了字幕翻译对即时性与文化亲近性的要求。因此，引用典故进行归化翻译能够显著压缩信息、消除文化隔阂，并保留了英语中暗含的讽刺意味。

例2. The world doesn't need to know our problems.

译文：家丑不可外扬。

莱纳德与佩妮两家齐聚商议婚礼事宜，闲聊间偶然提及佩妮的哥哥因制毒入狱一事。佩妮的母亲对此格外敏感，深知此事不光彩，唯恐莱纳德的母亲因此对佩妮产生偏见，便示意家人对此事讳莫如深。在这一语境下，若将佩妮母亲的话语直译为“世界无需了解我们家里的事件”，不仅显得生硬刻板，更无法让中国观众体会到她内心那份既羞愧又担忧的微妙情绪。而译为“家丑不可外扬”，则精准捕捉到了人物的情绪变化，既贴合剧情情境，又能让中国观众瞬间理解人物的情感态度。

（二）采用网络流行语进行归化翻译

网络流行语是在信息网络上形成并流传的一种语言；是以网络为载体，以流行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语言，是网友们互相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是当下快节奏枯燥生活的调味剂。网络流行语是一定时段内主要在网络场域被网民自发使用的、最活跃的、具有发酵功能和特殊意义的并往往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的语言符号^[7]。美剧的受众群体大多数为年轻人，网络流行语的引入很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与认同，同时也为台词增添了一定的喜剧

色彩。例如:

例 3. I'm gonna be their fun Aunt Penny who gives them candy, and teaches them swear words and tells them stories about what a weirdo their mother is.

“weirdo”译为: 奇葩

当艾米以其一贯的学术化思维劝说佩妮接纳生育观念, 坚信“唯有成为母亲才能洞悉爱的终极意义”时, 性格洒脱的佩妮以轻松调侃回应: 即便艾米有了孩子, 自己也会以“有趣的佩妮阿姨”身份陪伴左右。这句台词里, “weirdo”本指行为古怪、不合群的人, 若直译为“怪人”, 虽能传递基本语义, 却难以捕捉佩妮话语中自带的亲昵调侃意味。而“奇葩”一词的选用, 则展现了译者对网络流行语的敏锐把握: 其本义为“奇特而美丽的花朵”, 后逐渐演变为网络语境中形容“言行举止异于常人却独具特质的人”的流行表达, 既保留了怪异的核心含义, 又比“怪人”多了几分戏谑感与趣味性。结合剧情来看, 艾米作为生物学家, 其性格中既有科学天才的偏执与严谨, 又时常展现出社交笨拙、思维跳脱的奇怪之处。用“奇葩”形容这样的角色, 能够让中国观众瞬间联想到生活中那些特立独行却自带萌点的形象, 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翻译既避开了直译的生硬感, 又通过网络流行语将佩妮玩笑中暗含的亲昵吐槽准确表达, 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体会美式幽默的精髓, 也让字幕翻译更加“接地气”。

例 4. I am so digging the Shamy.

译文: 我必须好好“八一八”谢米了。

佩妮听霍华德说谢尔顿的女朋友名字叫做艾米, 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毕竟谢尔顿是一个天才怪人, 他有女朋友自然是稀罕事, 佩妮于是去询问谢尔顿事情的经过。在这句话中“digging”被字幕组翻译为“八一八”, 同样运用了巧妙的归化策略。“八一八”是一个网络流行语, 取自“八卦”一词的引申含义, 意为打探小道消息, 如果直译为“探究、挖掘”的话, 就很可能扭曲了原文的意思。字幕组在处理这句话时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使观众感受到了佩妮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 进一步丰富了人物形象。

(三) 本土化传译

本土化传译是字幕翻译中实现文化迁移的有效策略, 它要求字幕翻译应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不能只按字面意思进行简单的直译, 需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 让中国观众能够理解和接受。它绝非简单的字面对应, 而是要求译者深刻把握上下文语境、人物关系及文化潜台词, 对源语进行创造性转化。正如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1993) 所强调的, “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8]。本土化传译的归化策略有效弥合了文化鸿沟, 保障了剧情的流畅度与情感传递的真实性, 使中国观众能够如同母语观众一般无障碍地沉浸于剧情、捕捉幽默精髓, 从而最大化地实现奈达所提出的翻译的动态对等效果。例如:

例 5. I bet that bit killed at The Chuckle Hut.

译文: 他这段子在相声秀上肯定火啊。

莱纳德评价谢尔顿所讲的一个哲学家笑话时, 提及了美国一档以单口喜剧表演为主的电视节目。作为一个相对小众的美国节目, 该节目缺乏广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官方译名, 若直译为“咯咯笑小屋”, 虽能传达基本语义, 却难以瞬间激活中国观众的文化联想, 从而导致文化折扣。而现有的另一个翻译版本为“搞笑俱乐部”, 虽然也对这个外来词语进行了归化的改译, 但远不如“相声秀”更具本土化特色。因此, 面对文化空缺项时, 在目标语文化中精准锚定功能相似、认知度高的文化意象进行替代, 从而实现本土化传译, 不仅能扫清理解障碍, 更能使观众获得如同欣赏本土节目般的自然体验, 高效实现了跨文化幽默的传递。

例 6. What brings you to my little slice of hell?

“slice of hell”译为: 寒舍

此场景发生在莱纳德因愧疚主动登门向霍华德道歉之时。心怀怨气的霍华德开门见到莱纳德, 非但未显欢迎之意, 反而语带讥讽地质问其来意。原文的字面意思为“我这一小块地狱”, 是一种带有强烈自嘲和负面情绪的表达, 既夸张地贬低了自己的居所, 也微妙地传递出对莱纳德的不满。译者在此舍弃了字面直译可能带来的生硬与理解偏差, 因为中文观众可能不理解用“地狱”来指代住所的语言习惯, 创造性地选用了汉语中的谦辞。“寒舍”是一种自谦的用法, 体现了中国人谦虚谨慎的文化特质, 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翻译中适当的本地化可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 为译文增添了文化韵味, 同时保证目的语读者能够顺利地理解和接受译文内容。

四、结语

归化策略具有生动性、灵活性和娱乐性等优点, 让译文表达得更为准确和适切, 在字幕翻译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字幕翻译之所以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和生命力, 是因为字幕组运用了诙谐幽默、简洁易懂的语言, 并采用

归化及其他翻译方法缔造的。然而，归化策略的使用也要恰当规范，切忌使用过量。适度的归化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过度的归化便会导致影片缺乏异域风情，让观众无法体验到别国文化。作为译者要紧随时代的步伐，及时捕捉时事热点，满足中国观众的需求；作为英语学习者，应善于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因此，字幕组在进行字幕翻译实践时，既要传达原语民族形象和文化特色，又要兼顾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译文的可读性，从而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英汉字幕翻译也一直在与时俱进、吐故纳新，它传播了英语文化，反映了时代脉搏，结合了现实特征，这种语言的变化发展紧密联系着时代的更迭。作为新时代的译者，应充分利用多种现代翻译技术手段，对接国家文化传播战略，推动影视翻译向纵深发展^[9]。这就对翻译工作者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紧随时代的步伐，及时捕捉到当下的时事热点，在有限的字幕空间内做到令人耳目一新，满足中国观众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刘一辰.美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与策略:一项文化史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7(02):23-31.
- [2]张翼飞,赵玉宏.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在电影字幕翻译中的应用[J].电影文学,2012(01):141-142.
- [3]李和庆,薄振杰.规范与影视字幕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5(02):44-46.
- [4]赵玉珍.“归化”“异化”在西方语境中的嬗变[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01):29-33.
- [5]郭建中.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J].中国翻译,2009,30(02):34-38+95.
- [6]张乐,华锦木.论唯物辩证法视角下的翻译观[J].翻译研究与教学,2022(01):43-46.
- [7]王仕勇.网络流行语概念及特征辨析[J].探索,2014(04):186-192.
- [8]Nida, E.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 [9]吕玉勇,李民.解构与重塑:“后字幕组时代”的中国影视翻译[J].翻译界,2024(01):82-97.

On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English–Chinese Subtitle Translation

——Taking *The Big Bang Theory* as an Example

Suo Zhiyi¹

¹*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American sitcom *The Big Bang Theory* is a big hit in China, and its subtitle trans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medium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the content of the sitcom. The subtitling team has used a lot of strategies of domestication in order to give Chinese viewers the sam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feel the American humou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some English-Chinese subtitles in *The Big Bang Theory* as an example, by analyzing the three strategies of quoting idioms and Internet buzzwords in the subtitles, as well as the localized translation. Meanwhile, it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rategies of domestic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exploring how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can enable view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humour and culture in the American sitcoms, which will be widely used in the future translation practice bringing about appropriate methods and strategy for translation work and researches.

Keywords: American sitcom; *The Big Bang Theory*; Subtitle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

杨海涛¹

(1.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302)

摘要: 后人类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 强调人机融合与多元共生, 颠覆了传统译论中译者单一身份的认知。受翻译技术普及与全球化交流影响, 译者从翻译活动单一中心转变为多元协作主体, 打破传统二元对立。后人类主义下, 译者呈现“创译者”“协调者”等新身份, 兼具多重角色且动态调整。这推动翻译理论革新与实践优化, 也对译者素养提出更高要求。研究指出, 译者身份的转变是科技文化发展必然, 未来应聚焦新兴翻译领域及二者深层互动机制。

关键词: 后人类主义; 译者身份; 翻译实践; 人工智能; 翻译技术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0

一、引言

后人类主义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学术思潮, 在学界影响力不断攀升。其源于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批判, 旨在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重构人与非人类关系。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的突破, 人类生活、认知与自我认知面临巨大冲击, 后人类主义为审视人类存在、价值及与环境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译者身份一直是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早期的“忠实仆人”到强调主体性、创造性, 其定位经历复杂演变。后人类主义的出现, 为译者身份研究注入新活力。它打破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等传统二元对立, 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与作用, 深化对译者身份多元性、复杂性的理解。在翻译实践中, 计算机辅助翻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使译者与机器协作愈发紧密, 工作方式与身份也随之改变。后人类主义视角下的译者身份研究, 有助于揭示当代翻译活动新特征与规律, 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创新。

二、后人类主义理论概述

2.1 后人类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后人类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 当时科技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兴起, 引发了人们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深刻反思。这些新兴技术使得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产生了动摇, 为后人类主义的诞生埋下了种子。在早期阶段, 后人类主义主要体现在科幻文学与电影中, 类似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学术思潮开始兴起。这一时期, 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传统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等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 为后人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福柯通过对知识、权力和主体的考古学分析, 揭示了人的概念是历史性的建构, 否定了传统的先验主体观念, 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 强调对文本和意义的开放性解读, 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为后人类主义打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与此同时, 自然科学领域的新进展, 也为后人类主义提供了现实依据。^[1]

在这一背景下, 后人类主义者开始从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在 1985 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中, 提出了“赛博格” (Cyborg) 的概念, 即半机械人, 是有机体与机器的混合体。她认为,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正逐渐与机器融合, 赛博格将成为后人类时代的主体, 这种融合打破了传统的人与机器、自然与文化、男性与女性等二元对立的界限, 为人类的解放和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进入 21 世纪, 后人类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后人类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社会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不断为后人类主义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和思考方向, 而后人类主义的理论探索也反

作者简介: 杨海涛 (2000—), 男,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笔译专业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过来影响着人们对科技发展的态度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推动着社会 and 科技朝着更加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

2.2 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观点

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观点围绕着对人类主体观念的变革展开。传统哲学中,人类被赋予了独特的地位,拥有超越其他存在的理性、意识和自由意志,被视为独立、自主且具有固定本质的主体。后人类主义则认为人类主体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与技术、自然以及其他非人类实体的互动中不断演变和塑造的。

后人类主义强调人类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认为技术不再是外在于人类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塑造人类存在的内在因素。唐娜·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概念就是这种融合的典型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可穿戴设备、植入式医疗设备等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交流互动的方式,甚至影响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这些技术的应用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使得人类的身体和认知能力得到了拓展和增强。这些技术的介入,改变了人类的身体构成和生活体验,使得人类与技术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关系。

后人类主义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和平等性。人类不再被看作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生态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支持,人类的活动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过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构成了挑战。后人类主义呼吁人们转变观念,树立生态意识,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3]

三、传统译者身份的界定与特征

3.1 译者身份的传统认知

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定位往往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和从属的地位。“隐身人”和“奴仆”则是两种较为典型的代表。

“隐身人”这一比喻,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存在,使译文如同原文的直接呈现,而不留下译者个人的痕迹。这种观点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是透明的,读者通过译文能够直接接触到原文作者思想和意图,而不会察觉到译者的介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对这种传统的译者“隐身”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在西方翻译史上,从古典时期到现代,译者的隐身一直是一种主流的翻译规范。在这种规范下,译者被要求遵循原文的语言形式、风格和文化背景,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而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文化背景则被压抑和忽视。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但也使得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4]

“奴仆”这一比喻则更加直接地体现了译者在传统观念中的低下地位。译者被视为原作者的仆人,其职责仅是忠实执行原作者的指令,将原文的内容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读者,而不能对原文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动或创新。这种观念将译者置于一种被动、从属的地位,完全否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传统的翻译批评中,译者如果对原文进行了过多的阐释或发挥,往往会被指责为不忠实于原文,违背了翻译的基本原则。这种对译者的严格限制,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难以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个性。

传统观念对译者身份的束缚,主要源于传统译论往往强调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将忠实于原文视为翻译的首要目标。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复制原文,而不能对原文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这种思维模式忽视了翻译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创造性,将翻译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机械行为。传统的文化观念也对译者身份产生了影响。在一些理论中,原作者被视为权威和神圣的存在,其作品具有不可侵犯的地位,而译者则被认为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角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很难得到认可和尊重。^[4]

传统译论中对译者身份的这些认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和忠实性,但也限制了译者的发展和翻译研究的深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翻译理论不断演进,人们逐渐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主体性,开始重新审视译者的身份和角色。

3.2 传统译者身份的主要特征

传统翻译观念中,要求译者准确传达原文所表达的信息,不得随意增减或歪曲原文内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将“信”置于首位,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的意义;泰特勒在《翻译原理简论》中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都体现了对内容忠实的重视。^[5]在风格方面,译者需尽力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要注重风格的传达,因为风格往往是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情感表达上,译者要准确把握原文所蕴含的情感基调,并在译文中予以恰当呈现,使读者能够通过译文感受到与原文相似的情感体验。

然而,这种对忠实的过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译者主体性的受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压抑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以确保译文与原文的高度一致。他们不敢对原文进行过多的阐释或发挥,即使遇到文化背景差异较大、语言表达难以直接对应的情况,也只能小心翼翼地遵循原文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生怕被指责为不

忠实于原文。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复制原文，而不能对原文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这种思维模式忽视了翻译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创造性，将翻译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机械行为。

3.3 传统译者身份形成的原因与背景

传统译者身份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涵盖了语言、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同时也受到翻译目的和受众需求的深刻影响，翻译规范和理论的制约也在其中。

翻译目的多种多样。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侧重点和策略。受众需求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规范和理论在传统译者身份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制约作用。翻译规范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的，被译者群体广泛认可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不同的翻译规范对译者的行为和翻译策略有着不同的要求。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强调译者的忠实性和客观性，认为翻译是一种科学的活动，有明确的标准和方法，译者只需遵循这些标准和方法，就能实现准确的翻译。这种翻译规范和理论的制约，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6]

四、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消解

4.1 消解的表现形式

在传统翻译观念中，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是翻译过程的主导者。他们不仅承担着语言转换的任务，还负责处理文化差异、传递原文的意义和风格。随着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中心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后人类主义强调人类与技术的融合，翻译技术的飞速发展便是这种融合的体现之一。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机器翻译（MT）系统等在翻译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翻译模式。这些技术能够快速处理大量文本，提供翻译记忆、术语库匹配等功能，大大提高了翻译效率。在一些大规模的文献翻译项目中，机器翻译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初稿，然后由译者进行后期编辑和校对。这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不再稳固，他们与机器共同构成了翻译的主体，形成了一种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

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需求日益增长，为了满足市场对翻译速度和成本的要求，部分翻译公司采用了工业化的翻译流程，将翻译任务进行分解，由不同的人员和技术工具协同完成。在这种模式下，译者不再是独立完成整个翻译过程的主体，而是翻译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其中心地位被进一步削弱。

传统译论中，原作者被视为作品意义的权威赋予者，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作者的意图和风格。后人类主义思潮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得译者与原作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后人类主义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认为文本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读者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不断生成和演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再是原作者意图的被动接受者和传递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阐释和再创作，从而赋予译文独特的意义。

后人类主义强调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性和创造性。译者不再是文本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阐释和翻译策略，与文本进行积极的对话和互动，从而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中。译者在翻译时会根据目标读者的需求、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写，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4.2 消解的内在机制

后人类主义对人类主体观念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在传统哲学观念中，人类主体被视为具有独特的理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存在，是独立、自主且具有固定本质的。这种观念在翻译领域的体现便是将译者看作是具有明确身份和固定角色的主体，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标准，努力实现原文意义的准确传递。

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类主体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与技术、自然以及其他非人类实体的互动中不断演变和塑造的。这种观念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主体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使得译者的身份也变得更加模糊和多元。随着翻译技术的发展，译者与机器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译者不再是单纯的人类主体，而是与机器共同构成了翻译的主体。这种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使得译者的身份不再是单一的，而是融合了人类和机器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

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消解的重要驱动力。翻译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翻译的过程和方式。这些技术的出现使得翻译不再是单纯依靠译者的人工劳动，而是人与机器的协作过程。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模糊了译者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人工智能翻译系统能够通过深度学习不断提高翻译质量，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的翻译中表现出超越人类译者的能力。这些翻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翻译的过程和方式，使得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变化。译者不再是翻译过程的唯一主导者，而是与机器共同参与翻译，他们的身份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五、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重生

5.1 重生的表现形式

随着后人类主义思潮对翻译领域的渗透，译者身份在经历消解之后迎来了重生，呈现出全新的表现形式。译

者角色发生了显著转变,其中“创译者”和“协调者”尤为突出。

“创译者”这一角色强调译者不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参与者,更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创作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的需求以及自身的理解,对原文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再创作。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能会对原文的叙事结构、语言风格进行适当调整,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

“协调者”角色则凸显了译者在多元文化交流中的关键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活动涉及的文化元素愈发复杂多样,译者需要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协调和平衡。他们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还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

译者身份的多元化与动态化是其重生的重要特征。多元化体现在译者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身份,而是兼具多种角色。译者既是语言的转换者,负责将原文的语言信息准确地转化为目标语;又是文化的传播者,将源语文化的丰富内涵传递给目标语读者;还是翻译技术的使用者,借助先进的翻译工具和技术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动态化则表明译者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翻译环境、翻译任务和翻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不同的翻译项目中,译者可能会根据具体需求调整自己的角色和策略。随着翻译技术的不断更新,译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适应新的翻译工作方式,其身份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5.2 重生的驱动因素

技术进步是推动译者身份重生的关键力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广泛应用,翻译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为译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机器翻译技术的不断突破,使得翻译效率大幅提高。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翻译模型,能够通过海量语料库的学习,快速准确地进行语言转换。谷歌翻译、百度翻译等在线翻译工具,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文本的初步翻译,为译者提供了便捷的参考。这使得译者能够从繁琐的基础翻译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具创造性和附加值的工作中,如对译文的润色、文化背景的解释、风格的调整等,从而实现从单纯的语言转换者向创译者的转变。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不断加深。这种文化融合的趋势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译者身份的重生提供了契机。文化融合还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译者不再是简单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而是根据目标文化的特点和需求,对原文的文化元素进行创新和再创造,以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翻译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受众对翻译的要求各不相同,这推动了译者身份的转变和重生。

5.3 重生后的译者身份特点与优势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是重生后的译者身份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传统翻译观念中,译者的主体性往往受到诸多限制,他们被要求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而自身的个性、风格和创造性则被压抑。在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不再被视为原文的被动传递者,而是翻译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创造者。

重生后的译者身份对翻译生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传统翻译模式下,翻译生态往往呈现出一种单一、不平衡的状态,译者的作用相对局限,翻译市场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译者身份的转变促使翻译行业的多元化发展。随着译者角色的多样化和翻译需求的个性化,翻译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翻译和商务翻译领域,而是拓展到了更多的领域。不同领域的翻译需求吸引了更多具有专业背景和技能的译者加入,促进了翻译行业的专业化和多元化发展;译者与其他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在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下,译者与机器翻译系统、翻译软件等非人类翻译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关系;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主体,译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影响和带动整个翻译生态的发展。优秀的译者可以树立良好的翻译榜样,推动翻译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他们还可以积极参与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培养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为翻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译者身份消解与重生带来的影响

6.1 对翻译理论发展的影响

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从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挑战,到新翻译理论的构建方向,再到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都呈现出全新的态势。新的翻译理论需要充分考虑人类与技术的融合,将人机协作纳入翻译理论的研究范畴。新的翻译理论还需要关注译者身份的多元性和动态性。翻译研究范式也因译者身份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分析和语言转换技巧,关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关系。随着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翻译研究范式逐渐向跨学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翻译研究开始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翻译研究的对象也应从单纯的文本扩展到翻译过程中的各个要素。

6.2 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在传统翻译实践中,译者主要依赖自身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进行翻译,翻译策略相对单一。随着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到来,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译者提供了更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使得译者可以采用人机协作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一些大规模的文本时,译者可以先利用机器翻译快速生成初稿,然后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审美判断对译文进行校对和润色。译者可以根据具体的翻译任务和需求,灵活运用这些工具,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翻译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简单的翻译任务可能会被机器所取代,这对传统译者的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翻译市场对译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译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 and 技能,不仅要精通语言,还要了解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翻译行业还需要加强行业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促进翻译市场的健康发展。

七、结论

本研究从后人类主义视角剖析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揭示其从单一固定向多元动态的转变规律。这一转变源于后人类主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非人类融合互动,是翻译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翻译理论、实践及跨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它推动翻译理论向跨学科、多元化转变,革新翻译实践策略与方法,同时为文化传播开辟新路径,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然而,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深度上,对后人类主义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机制,特别是翻译技术与译者的复杂互动剖析不足;广度上,主要聚焦文学及部分实用翻译,对新兴翻译领域涉及较少。未来研究可构建更完善理论模型,结合实证,探究翻译技术对译者思维、决策及行为的微观影响,以及译者与技术协作中的角色转变。同时应拓展研究范围,纳入新兴翻译领域,全面考察译者身份变化,完善译者身份研究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 王宁.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与后人文主义批评的崛起[J].文艺理论研究,2024,44(06):39-47.
- [2]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N].Socialist Review,1985(1).
- [3] 葛鲁嘉.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心理学演进[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6(05):1-8.
- [4]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34.
- [5]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7:18-.
- [6] 陈婕.中和翻译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阐释[J].当代外语研究,2024,(03):74-82+95.

The Dissolution and Rebirth of Translator Identity from a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

Haitao Yang¹

¹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302, China

Abstract: Posthumanism, by criticizing anthropocentrism and emphasizing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and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subverts the single identity cognition of translators as "invisible men" or "servants"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rization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nd globalized cultural exchanges, translators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the sole center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o pluralistic collaborative subjects,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translators, as well as original texts and transl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humanism, translator identities emerge in new forms such as "creative translators" and "coordinators," assuming multiple roles of linguistic convers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while adjusting dynamically. This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s, while also imposing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ranslator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nd technical literac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nslator identity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emerging translation fields and the deep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technologies and translators.

Keywords: Posthumanism; Translator Identity; Translation Practi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的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汉字书法教学研究——以 A 大学为例

池程远^{1*} 杨文琪¹

(1. 芜湖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结晶、艺术珍宝及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汉字书法, 是国际中文教学的重要载体。在 A 大学进行的关于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汉字书法具体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 该类学生对汉字书法艺术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学习兴趣。针对该类学生的教学具有课堂上讲练结合、将汉字文化的讲解融入到书法教学、给予学生最大的学习自主权、因材施教等特点。此外, 授课教师需要注意改进教学方法、进行分阶段教学总结。汉字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其持续而旺盛的生命力告诉我们, 对外书法教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独特作用也是无法替代的, 今后也必然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闪亮名片。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 对外书法; 中高级汉语水平; 越南学生

基金项目: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AI 运用技能习得与应用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2024jyxm057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50

一、引言

当前, 作为新出现之概念的“国际中文教育”, 其内涵和外延尚未完全确立, 它既可以指代国际中文教育事业, 亦可以指称学科, 以保持二者统一性。^[1]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向外走”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外书法是运用书法的元素、技巧与方法从事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指出, 我们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具体表现在: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无疑给面临着风云诡谲、复杂多变的世界情势下的国际中文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无论国内或国外, 海外学生都有着“掌握语言”与“文化接触”的双重需求, 国际中文教育的趋势也将是语言与文化更紧密地结合, 因而,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结晶、艺术珍宝及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汉字书法, 无疑是国际中文教学的重要载体。有学者曾指出: “国际中文教育在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国际中文学习者具有接收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 他们是适合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群体。”^[3]因此, 对于这部分对书法有着更高学习要求的学习者, 我们更要帮助和鼓励, 使其向专业化、艺术化的道路迈进, 并成为推广书法、推广中华文化和讲好“中国声音”的最好践行者。

二、关于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汉字书法情况的调查

当前笔者于 2024 年 3 月在 A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进行了一次关于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汉字书法具体情况的调查, 调查内容涉及多方面, 如学习书法的背景与目的, 学习书法的方式与方法等。调查对象为通过 HSK5 级测试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MTCSOL) 专业越南留学生, 共 17 名。这 17 名学生均学习过 A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开设的“汉字书法”一学期的课程。此次调查对象人数虽不多, 但汉语水平较为接近。本次调查旨在提供一份小范围、有限定前提的对外书法教学反馈, 以期给针对留学生开设的“汉字书法”课程的教学反思及改进提供翔实资料。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7 份, 回收问卷 17 份, 回收率为 100%, 问卷有效率 100%。本次问卷的回答选项共有 4 个, 分别为: 不、一点、一部分、非常。为简便、直观地了解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书法的情况, 本文把回答选项的前两个即“不”、“一点”判断为消极、后两项“一部分”、“非常”判断为积极。根据这种方式, 探究中

作者简介: 池程远(1989—),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

杨文琪(1989—),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

通讯作者: 池程远

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汉字书法的背景、目的与方式、方法等。

（一）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汉字书法的背景、目的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客观式简易调查问卷,旨在得出明确、直观的结论。在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汉字书法的背景调查部分,有15名学生认为书法在越南是一门重要艺术,这与越南作为汉字文化圈国家之背景相契合;有13名学生在来中国留学之前已经接触过书法,只是接触的深浅程度有异,其中有8名学生在越南的学习生活中曾上过汉字书法课;有15名学生认为汉字书法很有趣;16名学生认为汉字书法的字很漂亮。问卷问题“我选择学习书法是因为课程设置,我本身没有兴趣。”回答皆为消极,即受调查的学生中无人认为学习书法是被迫的。在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书法的目的调查部分,有14人认为练习书法可以让他们的汉字写得更漂亮;13人认为书法可以让他们更加理解汉字的结构;13人认为练习书法是为了掌握书法,提高自己的修养;15人认为学习书法是为了更加理解中国的文化。与背景调查部分相一致的是,没有人认为自己学习书法是为了应付学校安排的书法课程。综合问卷内容与受调查的学生的回答,可以看出,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书法,与零起点外国留学生有着明显区别:第一,他们在学习汉字书法之前均不同程度地接触过汉字书法,对书法没有陌生感;第二,他们大多主动学习汉字书法,并且认为汉字书法不论是对其加深对汉字的理解,抑或是对其提高艺术修养,或者是对今后工作,都有积极的作用。

（二）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汉字书法的方式、方法

对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学习汉字书法方式、方法的调查目的有二:第一,探究以越南为代表的汉字文化圈学生学习汉字书法的方式、方法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第二,通过调查,了解其学习书法的方式、方法,择其优点进行推广,对其缺点进行改进,并总结教学中的不足。在17名受调查的学生中,有7名学生主要是在课堂上学习汉字书法,而有10名学生除了在课堂上学习之外,课后也花了相的时间去学习与练习书法;有12名学生会主动购买书法书籍与字帖;有9名学生会课后找老师或同学询问书法方面的问题;有10名学生会通过网络观看汉字书法教学视频;有13名学生喜欢独自练习书法;有8名学生每次练习书法会超过1个小时;有7名学生有固定练习书法的时间;有13名学生会专门学习一种书体,只有4名学生对其他书体也感兴趣。综合该部分调查,笔者发现,越南学生学习书法的方式、方法有着显著特点:第一,他们在课后会花较多时间练习与研究书法;第二,他们会主动找老师与同学咨询书法问题,或者通过互联网观看书法教学视频,同时自己也会根据需要购买书法书籍与字帖;第三,他们大多喜欢独自练习书法,且多专一于某一种书体。上述特点与很多非汉字文化圈国家留学生对书法的“广泛兴趣”是不同的。中高级汉语水平的越南学生学习汉字书法的方式、方法很多地方值得肯定的,如学习的主动性、专一性。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如也有部分学生只在课堂上学习书法,忽视了课后联系;部分学生课后练习时间不多,浅尝辄止,无法形成习惯;大多学生独自练习书法,缺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帮助等等。在优缺点并存的情况下,则需要教学者适当地根据中高级越南学生的特点,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将其优点最大化,如加大课堂练习的力度,以期获得最好的教学效果。

（三）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书法教材的选择

笔者于2023年9月至12月及2024年9月至12月在A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跟踪调查了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留学生的汉字书法学习情况,并且随堂听取了大量“汉字书法”线上或线下课程。笔者在此过程中发现,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留学生书法学习均有显著的“练习本位”现象。即这些学生往往在书法练习上非常用功,而忽视了对教材的学习。对外书法教材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主要凭据,是教师进行对外书法教学的具体依据,是学生获得系统书法知识的重要工具。根据认识过程的普遍规律和书法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认识特点,学生要想系统掌握书法知识,一般是从对教材的感知开始,感知越丰富,观念越清晰,形成概念和理解就越容易,同时教材使学生在书法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从笔者跟踪调查的实际情况来看,“汉字书法”课程并未统一安排具体教材,而是教师根据学习实际情况,采用教师自编教材与自己的讲义进行授课,而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购教材,教师在第一个课时进行讲授,第二个课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练习,教师则个别指导。该方式优点在于,教师可以根据授课情况与学生具体接受程度灵活掌握教学进度,同时学生也能在既不影响教师教学计划的情况下,进行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针对性练习。从笔者跟踪调查的两个时间段的“汉字书法”课教学成果来看,这种方式对于中高级汉语水平的越南学生无疑是较为成功的。因此,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汉字书法教材的选择,可以遵循如下的原则:第一,精。“精”就是要选择精品的教材。当今中国市场上书法教材、书法字帖多如牛毛,质量参差不齐,而外国留学生选择书法教材与字帖一定要在教师或者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选择精品的教材,否则在粗制滥造的教材的影响下,会对自己的书法学习起到消极作用。第二,准。由于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不同于对书法认知度为零的外国留学生,因此,入门级的或者双语(中英文)的书法入门教材相对来说已经不适合此类学生。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应在了解自己水平和喜好的基础上,选择最合适的教材。从对外书法教学的角度来说,楷书尤其是颜体楷书教材较为适合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的。第三,深。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大多数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已经不满足于书法入门,他们追求汉字书法水平的进阶。受条件限制,他们不可能长时间得到教师具体辅导,因此教材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本有深度的教材,能够使他们的书法学习得到进阶的指导,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亦会对其书法水平的进步起到极为重要的帮助作用。此外,受个人审美眼光的支配及个性、学识、艺术修养以及对汉字认识程度的影响,学生对教材与字帖的选择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应让其充分发挥主观性,选择最合适自己的教材,教师可以指导,中国同学也可以给予其意见与建议。

三、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汉字书法教学的特点

经过两个时间段的跟踪调查与两学期的随堂听课,笔者对A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汉字书法”课程教学特点进行了分析,由于这两个时段的学生有90%为中高级水平的越南学生,这些教学特点事实上也是针对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书法教学的特点。

第一,课堂上讲练结合,教师具体指导。授课教师在两学期、两批次的学生的书法教学课程中,教学特点基本没有改变,即第一课时为教师精讲部分,具体内容包括书法的基础知识及汉字文化知识;第二课时为学生练习,教师辅导。学生在练习教师第一课时讲授内容的基础上,以自己的书法教材和字帖为准,自主练习,教师在课堂时间段内给予相应指导。第二,将汉字文化的讲解融入到书法教学中。书法艺术与汉字文化有着深刻且内在的联系。汉字是书法艺术的符号载体,书法是汉字的审美艺术化。由于中高级水平的越南学生的汉语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对汉字文化知识的兴趣也更大。考虑到学生的语言程度与接受程度,授课教师在第一课时教授书法基础知识的时候,会针对将要练习的某几个汉字,进行深层次的阐述,包括该字的古体形态,演变过程,原始含义等等,汉字在其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与其相关的文化样式,比如对联、酒令、字谜抑或是咬文嚼字的幽默等^[4],有时授课教师会将某个汉字背后的深层次含义以小故事的形态表述出来。学生往往能够在这段时间学习到教材上没有的内容,因此其注意力更集中,授课效果好。第三,给予学生最大的学习自主权。在“汉字书法”的课堂上,授课教师按照自己的教学计划完成最基本的书法课堂教学,剩余时间往往交给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授课教师会在这个时间段将自己的角色从“教师”转变为“辅导者”,即在这段时间内,不是给学生强硬地灌输“应该学什么”,而是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学”,而“学什么”则是学生自主的选择。学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选择了教材与字帖,教师在此时会帮助学生解决其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第四,因材施教。虽然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的汉语水平基本相当,但是其书法水平起点则各不相同,有高低之分。而且,不同的学生,也有不同的书写特点。因此在对外书法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扬其长,避其短,个别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水平,为其制定不同目标,调动其学习书法的积极性。对基础较差的学生,授课教师要求其在基本功练习上下足功夫,每周书写规定的字与规定的量;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授课教师则指导其临习名家的字帖,以期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书法教学反思

周小兵等指出,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包括适用于初级汉语水平留学生语言课中的文化教学及适用于中高级汉语水平留学生的单独开设的文化课程教学。^[5]而不论哪种阶段的文化教学,对外书法都与其有着必然联系。“汉字书法”课程自2010年始,已在A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开展了十余轮。从教学对象上来说,参与此门课程的大部分是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其中以越南学生居多,且都为HSK5级(旧版HSK)以上的水平,这也就为这门课的教学对象限定了一个大致范围,从课程发展的角度来说,是有益的——越细致的课程专业性越强。对于任何课程的教学来说,都要吸取前面的教学经验,不断反思,这样才能不断发展。

(一) 教师应注意改进教学方法

对外书法课相对来说还是较新的一门课程,因此授课教师应不断地吸取教学经验,不断在教学中进行改进。第一,应加强培养学生的好习惯。由于教学对象在开始这门课程前对书法已有一定认识,故在书写习惯尤其是书写的坐姿方面,授课教师未投入一定时间进行规范与矫正,因此有小部分学生的坐姿还存在一定问题。在汉字书法教学中,书写的坐姿应是重要一环,良好的坐姿才能写出良好的毛笔字。培养学生的好习惯,从一开始就对其进行规范化的书写教育,对学生有极大帮助。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要注意提醒学生科学使用毛笔,每次使用之后,应顺着笔锋用水洗净,使其恢复原状,然后悬挂备用。这些细致入微的方面对于留学生书法学习者来说尤为重要。第二,要考量学生的接受能力。在教学中,切不可一次向留学生灌输太多内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汉字与汉字书法更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可讲授的内容丰富而庞杂。对于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留学生来说,即使其汉语水平相对较高,但如果一次接受太多、太深的内容,也难以消化。因此考量学生的接受能力,是授课教师应特别注意改进的方面。第三,要活跃课堂气氛。对外书法课程虽然是较专业的一门课程,但如果课堂气氛过于压抑,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及教学效果,而良好的课堂气氛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分小组开展课堂书法竞赛等。第四,应使用多种媒介进行课上与课下综合教学。例如,学生正确的执笔方法和书写姿势是写好字的前提,在对外书法教学刚开始时,要想让学生养成正确的书写姿势,单凭教师的讲解是不够的,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可以亲自示范,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前录制微视频,以流行的TikTok软件为载体,在课下让学生可以直观、反复地观看,解决长时间以来传统书法教学中言传意会的不足之处。

(二) 教师应分阶段进行教学总结

A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汉字书法”课程周期为一个学期,具体时间约为四个月。在课程周期内,要想取得预期效果,仅凭按部就班的教学及期中、期末的教学检查和考试是不够的。汉字书法教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一个能力由浅到深,技巧由低到高的过程。且书法学习特别注重积累,如果积累不足,书法水平就很难得到提高。因此,在对外书法教学中,教师应分阶段进行教学总结。在四个月的课程周期内,至少应进行每月一次即总共四次的教学总结。教学总结的方式,可以是令学生上交一定的作品进行检视,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找学生代表进行座谈,也可以是具体的书法竞赛。其目的就是要检视教学的效果,检验预期的教学目标有无达成。

总体而言, 对外书法教学的过程应当是温和地 (Mildly)、“润物细无声”^[6]的, 而非强势地 (Strong)、“雨如决河倾”的, 最终要形成师生双方的“和谐共进”。

结语

针对传统国际中文教育课堂教学中存在的“文化泛谈”“身体缺失”及“知识杂糅”等现象, 对外书法重构了国际中文课堂教学的思路与结构, 在充分完成预定教学目标的同时, 重点对中文学习者的整体感知、具身体认、表达创作过程进行系统关照。当过去国际中文教育所依托的叙事语境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国际中文传播与国际中文教学思维也必须随着传统的移位而改变。对于对外书法教学而言,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审思自身的基础上, 不断适应新情境, 拥抱新事物, 在准确领会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 坚定执行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 在技术上与心理上做好充分应对。在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下, 对外书法教学也面临着在“文化教学”“汉字教学”“书法专业教学”联结的边界中被稀释的风险, 也即意味着, 对外书法教学随时可能被上述三类中的某一类教学完全吸收, 成为完全的附属品。理想中的对外书法教学, 应是以“文化教学”为重要抓手, “汉字教学”为基本目的, “书法专业教学”为最高层次的独立课程, 最终培育教育主体将“书法”完全融入中文习得的全过程。A 大学自 1988 年开始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 是全国首批获准招收公费外国留学生的高校之一, 2000 年被国务院侨办确定为首批华文教育基地, 留学生教育开设较早, 软件、硬件都比较完备。以 A 大学为例来观察对外书法教学开展的情况, 可以“以点代面”, 即一方面, 由此推测对外书法在全国各个院校的开展情况; 另一方面, 进行中高级汉语水平越南学生汉字书法教学的调查, 也可以抛砖引玉, 进一步加强学界对此方面的注意与研究。汉字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其持续而旺盛的生命力告诉我们, 对外书法教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独特作用也是无法替代的, 今后也必然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闪亮名片。

参考文献:

- [1] 光明网. 何为“国际中文教育[EB/OL]. <https://m.gmw.cn/baijia/2021-03/15/34688036.html>, 2021-03-15/2022-11-15.
- [2] 高立平. 论国际中文教育语言和文化的双重建构[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0(03): 41-50.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5-46.
- [4] 詹绪左, 朱良志. 汉字与中国文化[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210.
- [5] 周小兵主编. 对外汉语教学入门(第 2 版),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327.
- [6] 陆俭明. 试论中华文化的传播[J]. 学术交流, 2019(04): 5-12+191.

Research on Chinese Calligraphy Teaching for Vietnamese Students with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Proficien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A University

Chi Chengyuan^{1*}, Yang Wenqi¹

¹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Wuhu University, Wuhu, China

Abstract: As a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 treasure of art, and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Chinese calligraph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survey conducted at A University on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Vietnamese students with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proficiency in learning Chinese calligraphy shows that these student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The teaching for this type of studen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bining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practice, integrating the expla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into calligraphy teaching, giving students maximum learning autonomy, and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In addition, teach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ducting phased teaching summarie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rrier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inuous and vigorous vitalit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tells us that the unique role of calligraphy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annot be replaced, and it will inevitably become a shining business car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ternal calligraphy;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level of Chinese proficiency; vietnamese students

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关系的综述研究

李曼曼¹ 段如梦¹ 刘峻利¹ 金岚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 在全球化趋势与我国新课标“双文化”教育目标的共同推动下, 跨文化交际能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 已成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整理了国内外关于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关系的代表性研究, 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学生发展以及教师专业成长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优化教材中文化内容、丰富课堂教学形式、建立多元评估机制以及完善教师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等改进建议。

关键词: 英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能力; 双向促进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9

1. 引言

在深化文明互鉴、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时代语境下, 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中国英语学习者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要维度, 也是落实英语课程标准中文化意识目标的实践路径。我国《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2022 年版)》明确指出“培育文化意识, 能够了解不同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 比较中外文化的异同, 发展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能力。”^[1] 同时,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也要求“培养文化意识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沟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2]

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桥梁纽带, 在推动中外文明互鉴、促进跨国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 英语课程构建起学生认知全球多元文化的窗口, 是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 英语教师承担着文化传播者与价值引导者的双重使命。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 英语英语教学亟待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使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深化文明对话理解, 在文化碰撞中提升国际事务参与能力, 这既是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战略要求, 更是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4]。

然而, 当前英语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现象: 部分教师将教学重点过多放在单词语法的记忆和听说读写的训练上, 忽视了文化理解与交流能力的培养^[5]; 有些课堂延续传统讲授模式, 缺少让学生亲身体验和主动探索文化差异的机会; 还有些教学把跨文化学习简单等同于介绍西方文化, 导致课程中既缺乏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包容性展示, 也弱化了对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培养^[6]。因此, 明确跨文化能力的核心要素, 设定合理的培养目标, 探索有效的教学策略, 对改进英语教学模式、实双向促进现语言工具与人文素养双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 概念界定

2.1 文化与“文化”教学

在学术研究中,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牛津英语词典》将其定义为包含艺术、习俗、制度以及特定社会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语言学视角下,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1871) 的经典界定影响深远, 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涵盖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7]。随着研究的深入, 文化的多

作者简介: 李曼曼(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英语;

段如梦(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英语;

刘峻利(2000—),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英语;

金 岚(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英语。

维性得到更广泛的认识,学者们也尝试对其进行分类。例如,张占一(1990)在语言教学领域提出,文化可划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8]。前者指那些不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内容,而后者则指对跨文化交际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

综合上述理解,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将“文化”定义为:指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个体间顺利交流的本国及他国背景知识体系。这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艺术哲学、价值观念,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传统习俗和乡土人情等。鉴于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且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因此,要有效实现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标,必须清晰理解文化的内涵,并据此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国内外学者对文化教学内容的研究呈现多维共识与本土化特色。国外学者对文化教学的内容大多强调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这与他们对“文化”定义的普遍观点相一致。例如,Hammerly(1982)将文化教学分为行为文化、事实文化和成就文化,强调人文与情感因素的融入^[9];Damen(1987)认为学生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还应通过参与文化实践来增强文化意识^[10]。美国在1999年发布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将文化内容划分为文化产物、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而Moran(2004)提出文化包含五大要素:文化观念、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社群和文化个体,这些内容是文化教学的核心^[11]。Stern(1992)则从学习者角度出发,提出文化教学应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的培养:认知成分涉及文化知识的掌握,情感成分培养学习者的同理心与好奇心,行为成分则关注文化行为的正确理解与表达^[12]。国内研究初期聚焦目的语文化教学,陈光磊(1992)从语言学角度划分语构、语义、语用文化^[13],束定芳(1996)简化为词语与话语文化^[14];林汝昌(1996)则创新性提出三层教学路径:语言结构知识-系统性文化知识-社会价值观念,实现从形式到内涵的阶梯式文化导入^[15]。整体研究演进呈现从表层知识传授到跨文化能力培养,最终迈向系统化分层教学设计的趋势。

2.2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ICC)的概念起源于Hall(1959)对“特定文化身份者与其他语言群体交流能力”的定义^[16]。随着研究的深入,虽然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的定义,但核心观点集中在特定语境中进行得体、有效互动的能力上。例如,Chen & Starosta(1996)强调“在环境适应下有效沟通的能力”^[17];Spitzberg(1994)则认为其为“在语境中恰当有效的表现”^[18];张革承等(2007)更为突出“在文化差异理解基础上的语言运用能力”^[19]。另外,在构成要素的研究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模型:首先,Chen & Starosta(1996)提出经典的三维模型,将情感(态度)、认知(知识)和行为(技能)视为核心要素;其次,Byram(2014)发展了四维模型,加入了文化批判意识,成为学界最广泛接受的框架^[20];同时,Arasaratnam(2010)则提出IMICC模型,从多元文化视角加入了动机、移情等心理因素^[21];在本土化实践方面,国内学者也提出了多样化的框架,如文秋芳(1999)的“交际能力+跨文化能力”二元结构^[22]、张红玲(2007)的态度-知识-技能三要素模型^[23],以及吴卫平(2015)基于Byram模型开发的ICCAS评估量表^[24]。总体来看,尽管理论框架存在差异,但学者们普遍认同知识、技能、态度(意识)这三个维度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3. 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关系

3.1 英语教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促进作用

3.1.1 英语教学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角色

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的过程,更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5]。首先,英语课堂通过引入多样化的文化内容,成为学生了解和接触异域文化的重要渠道,为其构建跨文化认知打下基础。其次,随着教学理念的更新,英语教学日益重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通过任务型教学、情境模拟等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和应对文化差异,提升其文化敏感性与适应能力。此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也反过来推动了英语教学目标 and 评估体系的变革,促使教学从以语言知识为核心逐步转向注重交际能力与文化素养并重的综合培养路径^[26]。由此可见,英语教学在学生跨文化能力建构中承担着语言媒介、文化桥梁与教育理念转型推动者的多重角色。

3.1.2 语言知识与文化意识的融合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交际中传递文化的核心工具^[27]。文化背景深刻影响着语言的使用方式,不同的文化语境会赋予相同的语言符号以不同的意义。因此,语言学习不仅仅是掌握语法和表达技巧,更需要对相关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有效的语言交际不仅依赖于语言技能的熟练掌握,更取决于对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28]。正因如此,语言教学应关注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将文化学习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言形式在不同语境下展现出多样的使用方式和交际功能,反映出背后深层的文化规则与社会认知结构。

当前, 英语教学的目标已从单纯强调语言的准确性、流利度和语用得体的性, 逐步转向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视^[29]。以往以母语者语言水平为标准的教学模式, 已难以满足当今复杂多元的跨文化交际需求。在实际交流中, 同一句话在不同文化或语境中可能具有多重含义。

3.1.3 教学方法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

随着语言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 英语教学逐渐从以语法翻译法、听说法、沉默法和自然法为代表的传统教学模式, 转向以“交际”为核心的交际式教学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该方法强调语言的真实使用场景, 倡导通过实际交流和真实材料提升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30][31]}。其核心观点认为, 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交流, 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在真实语境中有效沟通的能力^{[32][33]}。

然而, 在当前教学实践中, 学生“文化失语”现象日益凸显, 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中, 学生往往难以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内容, 进而在国际交流中处于不利地位^[34]。许多高中生在英语学习中更侧重于词汇、语法、阅读与写作等书面技能的训练, 口语表达与实际交际能力则常被忽视^[35]。这种以考试为导向的教学倾向, 削弱了学生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能力。

因此, 英语教学应注重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均衡发展。听与读作为语言输入, 说与写则为输出, 这一输入与输出的过程涉及复杂的认知机制^[36]。若片面强化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能力, 将难以实现真正的交际目标。有效的交际能力不仅要求语言形式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语言实践能力^[37]。

3.1.4 教材内容中的文化因素分析

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以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热点为切入点, 安排了丰富的真实语境交流任务, 如角色对话、小组讨论和观点辩论等, 并针对请求、感谢、道歉、邀请等常见交际功能进行专项训练。通过这些情境模拟与功能练习, 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基本的表达技巧, 还能在具体文化语境中提升语言的得体性与交际效果^[38]。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自出版以来已有十年之久。尽管其编写原则中提到了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标, 但在实际教材内容中, 相关跨文化交际元素的呈现并不明显, 整体体现相对薄弱^[39]。

关于外研版高中英语 (2019), 廖莎 (2024) 提到,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过程中, 教师不仅关注学生语言技能的提升, 还要注重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40]。在该教材中, 积极融入了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 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新外研版英语基本每个单元都有涉及跨文化要素, 见表一。

表一: 新外研版英语单元主题与跨文化内容概览

单元	标题	跨文化内容
Unit 1	A New Start	通过对比中英校园生活, 引导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校制度和学习方式, 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
Unit 2	Exploring English	探讨英语的起源、发展及其在全球的使用情况, 增强学生对语言多样性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认识。
Unit 3	Family Matters	介绍不同文化中家庭结构和价值观的差异, 帮助学生理解和尊重多元家庭观念。
Unit 4	Friends Forever	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中友谊的表达方式和社交习惯, 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Unit 5	Into the Wild	探讨各国对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态度, 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全球责任感。
Unit 6	At One with Nature	介绍不同文化中人与自然的的关系, 培养学生对自然的敬畏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也有学者对教材中不同的跨文化内容做了分析。在对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 (2019 版) 的研究中, 贾彤晖与胡美馨 (2022) 基于 Byram 与 Morgan 提出的文化内容分类框架, 对《英语》必修 1 至 3 册中“Reading and Thinking”及“Reading and Writing”板块的文化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评估。研究涵盖了九类文化元素, 包括: 社会认同与群体归属、社会互动方式、信仰与行为模式、社会及政治制度、社会化与生活圈、国家历史、地理环境、传统习俗与民族特性等。研究表明, 这些教材在内容编排中涵盖了上述九类文化主题, 但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其中, “社会认同与群体归属”“信仰与行为”“国家历史”等方面的内容相对较为丰富, 而涉及“社会互动”“社会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则显得较为薄弱^[41]。王永红 (2024) 针对不同的跨文化内容, 将其分为文化符号、社会习俗、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学艺术等。这些不同的文化内容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 学生需要通过学习掌握这些内容, 增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认知^[42]。

3.2 跨文化交际能力对英语教学的反馈效应

3.1.5 学生学习动机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语言学家 Gardner 和 Lambert (1972) 将外语学习的动机分为两类: 融入型动机 (Integrative Motivation) 与工具型动机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43]。其中, 融入型动机是指学习者希望能够融入第二语言所对应的文化社群, 与其成员建立交流, 并最终成为该群体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学习者不仅致力于掌握语言本身, 同时也愿意接纳并理解该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背景与生活方式。

因此, 跨文化学习也成为成为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动机之一。

外语学习动机也通常被划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源自学习者自身的兴趣与内在需求, 是由个体对学习内容本身产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或爱好所驱动。具备内在动机的学生往往因为对外语本身的热爱或希望深入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渴望与外国人沟通而主动学习, 因此学习动力更强, 持久性更高, 学习成效也相对较好。相比之下, 若学习动机主要出于工具性需求, 例如应付考试或获取某种实际利益, 学习者的投入度和坚持性往往较低, 取得理想成绩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令人担忧的是, 目前许多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 主要面对机械、单一的语言训练。而教学中引入文化元素, 通过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从而增强学习动机并维持其长久性^[44]。

3.1.6 教学目标的调整与重构

在新课程改革之前, 中学英语教学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 教材中过于侧重外国文化, 而对中华文化的呈现相对不足^[45]。具体表现为: 课本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较少, 教师在教学中缺乏文化融入的意识, 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评价体系也未能全面覆盖文化知识。教材内容与考试导向被认为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在初高中英语教材中,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篇幅有限, 而考试则多聚焦于语言点的考查, 忽视了文化层面的评价^[46]。在教学实践中, 很多教师仅限于讲授教材中已有的传统文化知识, 缺乏拓展与延伸, 也少有相关的教学活动设计^[47]。由于缺乏中文文化背景的融入, 学生的文化意识较为薄弱。新课改实施后, 中华文化的传播被赋予更高的重要性。新版教材中开始注重中西文化的对比与融合, 通过增加传统文化内容, 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 加强了英语学习中的文化教育功能^[48]。

3.1.7 教学内容的优化与拓展

文化内容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基础。通过了解多样的文化背景, 学生能够更深入地认知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与敏感性^[49]。教师应深入挖掘英语学科所蕴含的人文价值, 将课程主题作为基础切入点, 在讲解文化背景时结合语言知识进行分析, 同时在巩固语言知识的过程中强化社会与文化知识的教学。对于学生而言, 则需通过系统的语言技能训练, 深入体会和理解英语文化的内涵^[50]。此外, 针对常规英语课程, 教师应充分调动教材内容的活力, 深入挖掘每篇课文中蕴含的文化信息, 开展跨文化比较, 引导学生及时理解和识别文化差异。在课本知识的延伸方面, 教师可以精选反映中西文化共性与差异的英文材料, 作为补充阅读内容, 帮助学生间接了解西方的社会风貌与价值观念^[51]。依据赫尔巴特提出的教育性教学原则, 教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过程, 更是育人过程的体现。在英语教学中, 应贯彻这一理念, 使学生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 逐步培养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的思维能力以及良好的文化意识^[52]。

3.1.8 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需求

教师的专业发展应涵盖个人发展、专业成长、教学提升与组织建设四个方面。其中, 教师的个人发展不仅包括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规划设计, 还应体现出良好的处事能力与健康意识; 专业成长方面, 教师需具备持续更新知识、紧跟时代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教学提升则体现在教学资料的充分准备、教学模式的不断优化以及课程内容的动态调整; 组织建设则强调营造高效的教学环境, 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完善^[53]。

目前, 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并能将其有效融入教学的英语教师仍属少数, 开设系统且高效的跨文化交际类英语课程面临较大挑战^[54]。许多外语教师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度不高, 在相关访谈中也普遍反映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存在不足^[55]。从教师培养体系来看, 师范类外语教师的知识结构通常由“语言技能+语言学理论+教学法”构成, 文化素养与跨文化交际课程多作为选修内容零散嵌入语言技能模块中; 而非师范类毕业的教师在知识体系中涉猎跨文化教育的内容则更为有限^[56]。

然而, 在英语教学中,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教师应首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认知, 让他们认识到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有效交流, 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避免误解与冲突, 更好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 对未来的社会实践大有裨益^[57]。此外, 教师还需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中主动融入跨文化元素, 教师应在完成常规教学任务的基础上,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理解中外文化差异, 了解外国的历史、习俗和思维方式^[58]。

4. 讨论

通过对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关系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 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 并在实践中表现出双向促进的动态特征。从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运用、学生能力发展到教师专业成长等多个维度,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既依赖于英语教学的有效开展, 也不断推动英语教学目标和实践方式的更新与优化。

4.1 英语教学在跨文化能力培养中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 英语已超越基本语言工具的范畴, 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英语课堂不仅是语言知识

传授与技能训练的平台,更逐渐演变为文化意识启蒙和多元认知构建的重要场域。通过将多元文化元素融入课程内容、设计贴近真实交际的任务以及强化语境意识,英语教学正从传统语言教学逐步过渡到文化教育与综合素养培养的融合路径。交际教学法与任务型教学法的广泛运用,显著提升了学生面对文化差异时的应对能力和实际交际能力,推动了语言学习与文化认知的深度融合。

4.2 教材在跨文化意识的构建中的媒介功能

当前主流高中英语教材已逐步加强了文化元素的渗透,通过设置生活化交际场景与跨文化比较任务,引导学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提升其文化适应力和交际敏感性。然而,不同版本教材在文化内容的编排、深度与广度方面仍存在差异。有些教材中文化信息呈现较为单一或片面,文化覆盖面不均衡,难以满足多样化教学需求。因此,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补充性材料与拓展活动,增强文化输入的丰富性和教学的针对性,弥补教材在文化维度上的不足。

4.3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对英语教学的良性反馈

具有一定跨文化意识和策略储备的学习者,通常具备更强的学习动机与自主学习能力。文化兴趣能够有效转化为语言学习的内驱力,使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语言实践。与此同时,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也促使英语教学目标从传统的“语言知识掌握”转向“语言运用与文化交流并重”的综合发展模式,对教学内容安排与评价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4.4 教师的跨文化专业素养在实现文化教学目标中的重要性

教师在课堂中能否有效整合文化内容、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思辨,取决于其跨文化知识储备、教学方法掌握以及实施能力。目前,许多一线教师在文化教学方面仍面临知识储备不足、教学策略单一、实践经验匮乏等问题。师范教育阶段对跨文化教学能力的培养普遍薄弱,相关课程与培训形式尚不完善,难以满足实际教学需求。因此,应通过加强教师跨文化培训、优化课程设置、丰富教学资源,建立系统化的支持机制,以提升教师的文化教学素养,推动英语教学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协同发展。

5. 局限性

5.1 研究对象范围局限

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对大学、成人教育及职场英语等其他关键教育阶段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探讨相对薄弱,研究对象代表性与广泛性有待提升。

5.2 教师因素分析深度不足

虽然指出了教师群体在跨文化素养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但分析较为宏观,未能深入考察不同背景(如地域、经验)和教学阶段教师在培训需求、知识结构及教学实践层面的具体差异性。

5.3 教材文化内容研究方法单一

对教材文化内容的分析尽管涉及多个版本,但主要依赖定性描述,缺乏系统的横向对比和量化评估手段,对文化内容类型分布、呈现频率及深度等维度的探讨尚显不足。

6. 结论

研究表明,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和双向促进关系。英语课堂不仅是语言学习的场所,更在文化认知和价值观培养中发挥关键作用。教材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如交际式与任务型教学法,有助于语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但应试导向仍限制了文化传播功能的发挥。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提升显著增强了学习动机,也推动了教学目标从知识传授向文化表达转变。同时,教师跨文化素养不足成为发展瓶颈,亟需系统培训与支持。因此,未来英语教学应注重文化内容建设、教学设计创新、多元评估机制的建立,以及教师专业成长的全面推动,以实现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协同提升。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5.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6.
- [3] 胡淑英.浅谈培养英语学习能力的重要性——评《新东方英语·中学生》[J].中国教育学刊,2018,(04):138.

- [4] 王静.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融合研究[M].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
- [5] 吴迪, 袁辉. 融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英语阅读教学探索[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4,47(01):24-29.
- [6] 宋晓亮. 基于跨文化交际的中西文化语言符号基因分析——评《中西文化交流史》[J].语文建设,2023,(24):84.
- [7] Tylor, E. 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 [8] 张占一. 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03): 22.
- [9] Hamery H. Synthesi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 Illinois: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1982.
- [10] Damen L. Culture Learning: the Fifth Dimens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M].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87.
- [11] Moran, P. R. Teaching Culture: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 [12] Stern, J. 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3] 陈光磊.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03):19-30.
- [14] 束定芳. 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基础维度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J].外语界,1996(1):11-17.
- [15] 林汝昌. 外语教学的三个层次与文化导入的三个层次[J].外语界,1996(04):1-6.
- [16] HALL E T. The silent language[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9.
- [17] Chen G M, STAROSTA W J.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synthesis[A]//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96.
- [18] Spitzberg B H. A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A]// Samoar L A, Porter R E,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C]. 9th ed.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19] 张革承,张洪岩.英语全球化语境中的高中英语文化教学[J].课程.教材.教法,2007(06): 49-52.
- [20]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 [21] Arasaratnam L A, Banerjee S C, Dembek K.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MICC): Model test[J].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0, 37(3): 103-116.
- [22] 文秋芳, 王建卿, 赵彩然, 刘艳萍, 王海妹. 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J]. 外语界,2009(1): 37-43.
- [23] 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24] 吴卫平. 跨文化能力综合评价: 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25] 吴迪, 袁辉. 融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英语阅读教学探索[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4,47(01):24-29.
- [26] 李力, 李旦. 中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问题、内涵与路径[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3,46(11):32-37.
- [27] 傅蜜蜜. 论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外国语文,2018,34(05):155-160.
- [28] 唐丽伟. 当代高校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评《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融合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4,12(2):F0003.
- [29] 张玉瑶. 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学研究——高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策略探讨[J].教育进展,2024,14(5):509-515.
- [30] Canale M. Fro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o communicative language pedagogy[A]//Richards J, Schmidt R.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1983: 2-27.
- [31] Nunan D. The Learner-Centred Curriculu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 [32]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A]//Pride J B, Holmes J.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269-293.
- [33] Widdowson H G.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 [34] 何娜.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培养与评价[J].华夏教师,2025,(S1):81-83.
- [35] 蒋宇. 跨文化交际对英语教学的影响探析[J].现代英语,2024,(24):82-84.
- [36] 丁金国.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体意识[J].烟台大学学报,1997(1): 89-96.
- [37] 廖晓青. 英语教学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 [38] 唐晓. 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探讨[J].文教资料,2025,(05):134-136+140.
- [39] 俞艳凤.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材设计——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为例[J].现代英

语,2024,(21):100-102.

- [40] 廖莎. 高中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研究——以 2019 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为例[J]. 校园英语,2024,(28):28-30.
- [41] 贾彤晖, 胡美馨. 2019 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文化内容及教学建议[J]. 教学与管理,2022,(33):83-88.
- [42] 王永红. 跨文化交际能力视角下高中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及其教学培养策略[J]. 学周刊,2024,(09):103-105.
- [43] Gardner, R.C. and W.E. Lambert: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1972.
- [44] 余茹. 新课程标准下的高中英语文化教学[D]. 华东师范大学,2009.
- [45] 徐冰茜. 文化意识培养目标下的高中英语教材文化内容分析与评价[D]. 西南大学,2024.
- [46] 方帆, 许宏晨. 英语教材融入本土文化研究[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4,(01):1-8.
- [47] 朱神海, 潘炜杰, 黄剑清. 新课标视角下高中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36):138-143.
- [48] 沈欣冉, 曾国秀. 探析中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J]. 大陆桥视野,2020,(07):122-124.
- [49] 王飞. 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分析[J]. 现代英语,2020(22):96.
- [50] 齐冬冬.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 中国教育学刊,2019v(S1):113-114.
- [51] 潘荣成. 以跨文化意识培养为目标的英语教学体系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S1):260-262.
- [52] 郑燕, 陈雪芬. 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高中英语教材探索——以人教版必修模块为例[J]. 教学与管理,2015,(07):43-45.
- [53] 赵晶. 工科院校中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教学中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J]. 校园英语,2017,(42):36.
- [54] 熊学亮. 英语教学的文化性分析[J]. 英语研究,2002,1(02):42-48.
- [55] 吴铁军, 殷珂. 人文素质教育视角下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与前路[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23v32(12):91-98.
- [56] 刘成萍. 跨文化视角下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J].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4):92-94.
- [57] 李红红.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英语教学优化思路[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3,36(16):183-184+190.
- [58] 邱艳芳. 跨文化意识与英语教师教育摭论[J]. 临沂大学学报,2014,36(04):40-42.

Interplay Betwee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Li Manman¹, Duan Rumeng¹, Liu Junli¹, Jin Lan¹

¹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03061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impetus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emphasizing dual "dual culture" educational goal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core literacy in English educ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representativ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teaching and ICC, and analyzes it from five persp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xtbook development, student growth,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e paper propose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cluding optimizing cultural content in textbooks, enriching classroom teaching forms, establishing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enhancing systems for cultivating teacher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Keyword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 reciprocal enhancement

数字经济时代下 AI 技术在广播电视编导教学领域的应用与路径探索

徐锦博¹

(1. 吉利学院, 四川 成都, 641423)

摘要: 本研究聚焦数字经济背景下 AI 技术在广播电视编导教学中的创新应用, 揭示传媒行业变革对编导人才跨媒介叙事、技术整合及创新思维的迫切需求, 指出传统教学模式在资源利用效率、实践场景局限和评价体系滞后等方面的矛盾。通过构建“虚拟制片-智能协作-动态评估”全链条范式, 引入虚拟预演系统、AI 写作工具和情感计算算法, 突破线性创作思维, 实现人机协同决策与数据驱动教学优化。与此同时, AI 工具需遵循“技术服务于育人价值”原则, 应建立虚拟制作环境、个性化学习路径和伦理风险防控三位一体的实施框架。这样, AI 深度介入不仅能显著提升教师教学素养, 还可以培养兼具艺术创造力与技术理解力的复合型人才。但需警惕创意同质化与伦理失序风险, 应在技术应用中坚守人文导向,

关键词: 数字经济; AI; 影视教学; 广播电视编导; 人机协同

基金项目: 2024 年吉利学院“一院一品”教学改革项目: “数字经济时代下 AI 技术在编导教学领域的应用路径探索” (项目编号: 2024JG3060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1

随着 5G、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重构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基础设施, 算法推荐、用户生成内容 (UGC)、AI 生成内容 (AIGC) 等新范式深刻突破了传统创作逻辑。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下文简称: “编导”) 作为艺术与技术交叉的前沿领域, 既面临着行业变革对复合型人才能力的迫切需求, 也承受着传统教学模式在资源配置、实践场景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当前, 传统编导教学长期依赖线性培养模式, 教学资源分布不均、实践环节时空受限、个性化培养缺位等问题, 导致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出现显著脱节。AI 技术的算法生成、模式识别、预测分析等特性, 恰为破解这些痛点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本文以“技术服务于育人价值”为核心理念, 构建了包含“虚拟制片、智能协作、动态评估”的全链条教学实践模式。在此模式中, 通过引入虚拟预演系统、AI 写作工具和情感计算算法, 可以有效突破传统创作的线性思维束缚, 实现人机协同决策, 并达成数据驱动的教学优化。不可否认的是, AI 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显著提升了学生的技术素养与创作效率。如果过度依赖算法导致学生作品的原创性有所衰减, 需警惕创意同质化以及伦理失序等风险。

一、编导教学的转型需求与 AI 技术适配性

数字经济浪潮下, 传媒行业变革对编导人才提出革命性要求, 包括技术耦合型能力、数字叙事思维、人机协同生产关系、跨媒介叙事及 AI 伦理挑战等方面。目前, 针对传统编导教学面临资源不均、实践薄弱、个性化缺失及评价单一等痛点, AI 技术通过智能案例库、虚拟制作、个性化学习路径及多维评价体系等适配路径, 有效摆脱这些困境^[1]。然而, AI 在创意原创性、情感表达及文化价值判断上也存在边界, 需人机协同, 工具理性服务价值理性。

(一) 行业变革对编导人才能力的新要求

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持续冲击下, 传媒行业的生态重构对编导人才能力体系提出了革命性要求。这种变革源于技术渗透引发的双重效应: 一方面, 5G、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重塑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 算法推荐、AI 生成内容 (AIGC) 等新范式颠覆了传统创作逻辑。在此背景下, 编导人才的能力框架正经历从单一艺术创作向技术耦合型能力的范式转移, 其核心在于突破传统艺术教育的线性思维, 建立适应数字文明特征的

作者简介: 徐锦博(1997—),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网络电影、短视频传播、民俗文化。

复合型能力结构，具体包括：

其一，技术赋能的创作环境催生了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关系，编导人才需在创意生成与技术实现之间建立双向对话机制。正如虚拟制片技术将传统后期特效前置到拍摄筹备阶段，要求编导人员在剧本创作期就完成场景数字建模与灯光预演；智能剪辑系统通过分析观众情绪曲线自动生成节奏方案，倒逼创作者重新定义剪辑艺术的价值维度。这种技术渗透不仅改变工作流程，更重塑了编导专业的本体认知——当机器学习可以自动生成符合类型片规范的分镜头脚本时，创作者的竞争优势必然转向算法尚未攻克的创意深水区，即那些需要文化积淀、情感共鸣与哲学思考的领域。

其二，数据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创作决策从经验驱动转向证据驱动，编导创作人员也需要建立基于数据挖掘的创作方法论。正如用户画像分析技术可以精准捕捉 Z 世代观众的审美迁移轨迹，情感计算算法能够实时监测观众观看时的微表情变化，这些数据反馈机制正在重构创作评价体系。例如爱奇艺、B 站等平台定制剧通过弹幕语义分析优化剧情走向的案例表明，数据不再仅是传播环节的监测工具，而是深度介入到角色设定、矛盾建构、高潮布局等创作核心环节。这种数据赋能要求编导人才需要具备将感性创意与理性分析有机融合的能力，在保持艺术独创性的同时建立可量化、可迭代的创作模型。

其三，AI 技术的伦理挑战则将编导人才培养推向价值判断的新维度。过度的算法偏见可能会导致叙事视角的窄化，深度伪造技术可能消解创作的真实性根基，数据垄断可能侵蚀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据 The Verge 报道，欧盟发布了一项关于发展 AI 伦理新指南，明确要求创作者对 AI 生成内容承担主体责任，这种责任范畴的扩展倒逼编导教育必须加强数字伦理素养的培育。创作者需要在技术应用过程中保持价值清醒，既善于运用智能工具提升创作效率，又能识别技术异化风险，在算法逻辑与人文精神之间建立动态平衡。这种能力本质上既是对艺术创作者主体性的重新确认，也是在机器智能日益强大的时代守护人类文化的创造性本质^[2]。另外，行业变革催生的能力要求映射出数字文明时代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历史必然。编导教育体系必须正视这种从创作工具到思维范式的全面革新，通过重构教学目标、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培养既精通叙事艺术又掌握数字技术、既具有数据思维又坚守人文价值的复合型人才^[3]。而 AI 技术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适配价值，其算法生成、模式识别、预测分析等技术特性，恰为破解传统编导教育中创意转化效率低、技术认知碎片化、市场响应滞后等痛点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二）传统编导教学痛点与 AI 技术的补偿性

在数字技术重构艺术创作生态的当下，传统编导教学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转型压力。编导专业作为艺术与技术高度融合的交叉学科，其教学体系长期存在着知识传授滞后于产业实践的矛盾。

其一，在传统教学场景中，编导教师往往通过经典案例分析、剧本创作训练和舞台调度实践三大核心模块开展教学，这种线性培养模式虽培养了学生的艺术感知力，却难以应对数字内容生产对复合型创作人才的需求；教学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创作视野受限，实践环节的时空壁垒制约了创意转化效率，个性化培养的欠缺造成人才同质化等问题，已成为制约编导教学发展的深层症结；教学资源的地域性差异在传统编导教育中尤为突出。优质师资与行业案例多集中于头部艺术院校，地方中尾部院校难以获取前沿创作动态，而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错位。AI 技术的介入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新路径，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智能案例库可实时汇聚全球戏剧影视创作数据，通过多模态内容解析技术对经典作品进行场景调度、叙事节奏、人物塑造等维度的智能拆解。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的创作规律模型，不仅能将蒙太奇理论、三幕剧结构等抽象知识具象化为可视化图谱，更能通过跨文化作品对比分析，拓宽学生们的国际化创作视野。这种技术赋能使得教学资源从封闭的院校围墙走向开放的数字空间，有效弥合了传媒教育的资源鸿沟。

其二，实践环节的薄弱性则是传统编导教育的另一显著短板。实体剧场排演受制于场地设备、人员协调等客观因素，学生往往在毕业创作阶段才获得完整项目实践机会。虚拟制作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教学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AI 驱动虚拟拍摄系统可模拟不同场景的灯光影调、机位运动、演员走位，使学生们在数字孪生环境中进行沉浸式排练。生成式 AI 在剧本创作中的应用更打破了传统写作训练的时空限制，智能写作助手通过语义分析实时提供情节发展建议，基于对抗生成网络（GAN）的对话生成模块可辅助人物对白的个性化塑造。这种虚实融合的创作环境不仅提升了教学效率，更通过人机协同机制培养了学生的数字创作思维。

其三，评价体系的单一性同样是制约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传统编导教师主观评价往往受限于个人审美偏好，难以全面评估作品的创新价值与市场潜力。AI 评价系统的引入构建了更科学的评估维度，计算机视觉技术可解析作品的构图张力与视觉节奏，情感计算算法能量化观众的情绪波动曲线，社会网络分析则能预测内容传播潜力。这种多维度评估体系不仅为教学反馈提供客观依据，更通过市场预判功能架起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桥梁。值得关注的是，AI 并非要取代教师的人文判断，而是通过人机协同形成更立体的评价生态——教师聚焦艺术价

值评判, AI 系统负责技术指标分析, 共同构建起兼顾艺术性与市场性的评价标准。另外, 在数字经济重塑艺术教育版图的背景下, AI 技术对传统编导教学痛点的纾解呈现出显著的适配性特征。从资源整合、实践强化到个性化培养、评价创新, AI 正在构建编导教学的新范式。这种变革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而是通过人机协同机制重构教学流程。即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创作引导者, 学生从被动接受者升级为智能工具的驾驭者, 教学空间从物理教室扩展到虚实融合的创作场域。

(三) AI 技术的适配性边界及其实践应用

尽管在编导教学与 AI 技术的深度融合进程中, 技术赋能与艺术本质的辩证关系始终构成核心命题。AI 技术并非万能解药, 其适配性边界既受制于技术本身的特性局限, 更深植于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技术工具的逻辑理性与艺术创作的情感非理性之间的张力, 要求教育者必须审慎界定 AI 介入的尺度与路径。当前 AI 在编导教学中的应用边界主要体现在创意生成的原发性局限、情感共鸣的量化困境以及文化价值的判断盲区三个维度, 具体而言: 其一, 在创意生产方面, 生成式 AI 虽能基于海量数据组合叙事要素, 但算法驱动的创作本质上是对既有模式的概率性重组, 难以突破文化经验的集体无意识边界。这种技术特性决定了 AI 更适合承担创意激发器而非原创者角色。其生成的剧本框架、分镜方案可作为思维跳板, 但必须经过创作者的主观筛选与艺术重构; 其二, 在情感表达层面, 尽管情感计算算法能模拟观众的情绪反馈曲线, 但艺术感染力的深层密码存在于文化语境与个体经验的交织网络中, AI 对悲伤、喜悦等基础情感的识别尚停留在生理信号关联层面, 无法真正理解文化哲学重量; 其三, 在文化价值判断方面, AI 系统呈现出显著的认知短板, 当涉及跨文化改编、历史题材再创作时, 算法难以权衡艺术创新与文化敬畏的微妙平衡, 仍需依赖人类的文化自觉与伦理判断。

在编导教学场域中, AI 技术的实践应用应遵循“工具理性服务价值理性”的基本原则, 构建人机协同的增强型创作系统。在教学具体实践中, 虚拟制片系统与物理空间的有机融合展现了显著成效。通过将 AI 驱动的预可视化工具嵌入教学流程, 学生可在数字沙盘中快速验证创作构思: 智能镜头规划模块根据剧本情绪自动生成机位运动方案, 灯光模拟系统实时渲染不同时段的光影效果, 演员动线预测算法则帮助优化舞台调度。这种虚实交互的创作环境不仅将传统数周完成的排演筹备压缩至数小时, 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技术预判、创作调整的迭代思维。例如在剧本创作环节, AI 写作助手的定位应从替代性写作转向批判性对话伙伴。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剧本分析系统能即时检测叙事漏洞, 如角色动机断层、戏剧冲突衰减等问题, 但其提出的解决方案需经创作者的文化审视与美学选择。更有价值的应用在于利用 AI 的跨模态关联能力拓展创作维度, 如将文学剧本自动转换为故事板视觉草图, 或根据台词情感生成对应的音乐动机, 这种多模态联动有效打破了传统线性创作的思维定式。

AI 技术的适配性实践突出表现为“数字素养”与“艺术灵性”的共生培育。智能教学系统通过采集学生在虚拟创作平台的全流程数据, 构建起涵盖叙事结构复杂性、视觉符号使用密度、观众注意力曲线等维度的能力评估模型。但需要强调的是, 数据画像仅反映技术层面的创作规律掌握度, 教师必须结合学生的文化积淀、生命体验等质性要素进行综合判断。个性化教学实践中, AI 推荐系统根据学生作品风格智能匹配经典案例库: 正如偏好黑色幽默的创作者会收到电影《两杆大烟枪》的叙事结构拆解, 擅长诗意表达者则获得电影《坠落的审判》的台词韵律分析。这种精准推送既避免了传统教学中的信息过载, 又保留了艺术探索的自主性空间。另外, 更为前沿的实践探索已延伸至人机共创领域, 如利用扩散模型生成超现实主义舞台设计方案, 学生通过调整提示词权重探索视觉隐喻的多种可能性, 在此过程中培养对非理性美学的前沿感知能力。

二、AI 技术在编导教学中的应用场景与实践路径

(一) 智能内容生成工具的教学嵌入

在编导教学体系中, 智能内容生成工具的深度嵌入正在重构艺术创作的认知界面与实践操作。这类技术并非只是简单替代传统创作流程, 而是通过人机协作机制拓展创作维度, 将算法逻辑转化为艺术创新的催化剂。在教学实践中, AI 内容生成工具的应用聚焦于剧本创意构思、叙事实验与视觉预演三大核心环节, 形成了“激发、迭代、验证”等闭环创作流程。

其一, 在剧本构思阶段, 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智能写作系统能够突破线性思维限制, 通过语义关联网络为学生提供跨维度的叙事可能性。例如, 当输入“咖啡馆邂逅”关键词时, 算法不仅生成符合三幕剧结构的对话框架, 更可联动数据库提取诸多电影的台词韵律、空间意象、文化语境等跨文本元素, 刺激创作者打破类型化叙事窠臼。这种生成过程本质上是对人类集体创作经验的概率化重组, 虽无法替代创作者的主体性思考, 却能为教学提供丰富的思维训练材料。而学生通过对比 AI 生成的不同剧情走向, 在批判性选择中深化对戏剧冲突本质的理解。分镜设计环节的智能化转型更具教学革新价值。传统手绘故事板受限于学生美术功底与时间成本, 往往难以完整传递导演构思。AI 分镜生成系统通过多模态转换技术, 将文学剧本自动解构为视觉语言。自然语言处理

模块识别场景情绪基调,计算机视觉算法匹配最佳构图范式,动态模拟引擎则生成镜头运动轨迹。例如国内高校中,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2022年推出的AI导演思维训练平台,通过多技术融合实现了分镜设计智能化。该系统以华为云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析剧本,例如在分析《雷雨》片段时,情感分析算法可精准识别“压抑”情绪基调,继而联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视觉数据库,自动调取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倾斜构图模板,同时依托Unity引擎动态模拟具有压迫感的推轨镜头轨迹。

其二,虚拟制作技术的教学融合重新定义了创作验证的时空边界。通过整合游戏引擎与AI生成技术,师生们可在数字孪生环境中构建动态创作沙盘。智能场景生成工具能根据剧本关键词自动搭建历史街区、太空站等复杂场景,其材质生成算法甚至可模拟不同年代电影胶片质感。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创新实践中,虚拟制作技术的教学融合深刻展现了其重塑创作验证时空边界的能力。例如在编导课堂中,学生可以围绕“时空折叠”主题展开创作实验。团队向DeepSeek提交“蒸汽钟楼”“赛博贫民窟”“唐代长安市”三个时空坐标,AI据此生成交织机械师、黑客与胡商的多线互动剧本。系统自动解析出“青铜齿轮雨”“全息算命摊”等场景要素,驱动即梦AI在虚拟引擎中构建三维创作沙盘。当激活唐代长安场景时,AI融合历史建筑数据生成飞檐斗拱,同时在砖墙表面渲染出矿物颜料的千年风化痕迹。蒸汽钟楼场景则通过混合维多利亚时代金属纹理与现代物理渲染技术,形成黄铜齿轮在雾气中缓慢氧化的视觉质感。学生通过滑动时间流速调节器,使赛博空间的霓虹光影产生量子化残影,AI同步生成符合时空膨胀理论的动态特效。

其三,教学实践中智能工具的深度嵌入,催生了“AI批判性使用”这一新型核心素养的培养需求。在时间教学中,初期学生易陷入对技术产出的盲目依赖,中期逐渐建立人机对话意识,后期则发展出独特的“算法驯化”能力,通过控制AI输出的保守与冒险倾向,利用提示词工程引导生成方向,最终形成人机共生的创作方法论。在影视后期制作课程中,教师可以引入一些先进的AI剪辑工具。这些工具能够根据剧本、镜头语言等信息自动进行素材分类、剪辑节奏调整等工作。然而,在教授学生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的同时,教师更注重引导学生思考AI剪辑的局限性和适用性。例如,通过对比分析AI剪辑与人工剪辑的作品,让学生认识到AI在某些场景下可能无法捕捉到人类情感的微妙变化,从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二) 虚拟制作环境的场景化训练

虚拟制作技术的教学应用正以颠覆性姿态重构编导教育的实践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虚实交融的创作实验室,将传统教学中割裂的构思、排练、拍摄环节整合为动态交互的沉浸式训练系统。通过游戏引擎、实时渲染与动作捕捉技术的深度耦合,虚拟制作环境将物理空间的时空限制转化为可编程的创作参数,使学生在数字孪生场景中实现从艺术想象到技术验证的闭环迭代。

其一,在不同题材影视剧创作教学中,虚拟制作环境的革命性价值在于将传统影视工业中割裂的构思、设计、验证环节熔铸为可实时迭代的创作流。以历史题材为例,学生重构唐代长安城时,传统教学常受限于实体场景搭建成本与史料考据难度,而虚拟制片系统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导入古建筑数据库后,学生可调节“市井烟火浓度”参数,AI即时生成从清晨坊门开启到宵禁鼓声的全时段动态街景,甚至能模拟不同社会阶层的服饰材质光影变化。另外,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学生拍摄城中村改造故事时,利用环境重构引擎将同一空间在“拆迁前”与“重建后”状态间无缝切换,通过调节“时光侵蚀度”滑块,使墙面苔藓生长速度与建材老化程度随叙事节奏精确变化,这种“时空折叠”能力让社会变迁的宏观命题获得微观可视化表达。此外,在跨媒体叙事的教学实验中,虚拟制片更凸显其延展性。例如某组学生创作悬疑剧时,将虚拟场景与增强现实技术结合。观众通过手机扫描实体剧本,即可触发剧中关键道具的3D全息解析,而剧本杀式的分支叙事线则在虚拟引擎中呈现为发光节点网络。

其二,虚拟制作环境在表演调度指导领域开创了全新的训练方法,通过将生物特征捕捉与情感计算技术结合,可以为演员和导演提供了更加科学和精准的工具。具体来说,系统能够实时捕捉演员的微表情肌电信号和肢体动力学数据,生成表演能量分布热力图,帮助导演直观地分析演员的情绪强度和肢体动作。例如,在实验性教学中,学生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对比不同演员对同一角色的诠释差异。系统会将演员的眼神焦点移动轨迹、声纹震颤频率等200多项关键指标可视化,帮助导演精准识别“强情绪场景中的细节失真”。比如,当演员表现愤怒时,系统会分析其面部肌肉的激活程度和声音的震颤频率,如果两者不同步,系统会标注为“失真”,从而指导演员进行调整。另外,更为重要的是虚拟现实(VR)表演训练系统为演员提供了沉浸式的练习环境。演员在VR场景中,与数字角色对戏时,脑机接口会实时监测其杏仁核活跃度,为导演提供超越传统经验的共情强度数据。例如,当演员表现悲伤时,系统会分析其杏仁核的活跃程度,判断其情绪是否真实且达到预期强度。这种实时反馈机制使演员能够立即调整自己的表演,提升精准度。同时,导演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科学地指导演员,而不再仅仅依赖主观经验。这种技术不仅提高了表演训练的效率,还为表演艺术提供了全新的实证基础。在电影拍摄中,导演可以通过系统实时监测演员的表演,并根据热力图判断情绪是否到位,从而决定是否需要重拍。在戏剧排练中,演

员可以通过 VR 系统与虚拟角色对戏，系统会记录其表演数据，帮助演员在正式演出前优化表现。

三、AI 技术落地的实施策略与潜在风险应对

(一) 技术整合的阶段路径

在探讨 AI 技术落地的实施策略时，技术整合的阶段路径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工具层与系统层两个维度上尤为重要。

首先，在工具层方面，以 GPT-4 API 接入剧本分析模块为例，GPT-4 作为 OpenAI 的最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展现了卓越的多模态能力、高级推理和创造力。这种能力使得 GPT-4 在剧本分析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例如，通过 GPT-4 API，我们可以实现剧本的自动化分析，包括角色分析、情节发展预测、情感倾向判断等。在实际操作中，开发者可以根据剧本分析的具体需求，设置适当的参数，如调整采样温度来控制生成内容的多样性，或者设置 max_tokens 来限制分析报告的长度。这样，GPT-4 不仅能够提供深入且全面的剧本分析，还能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化输出，大大提高了剧本创作的效率和质量。然而，将 GPT-4 API 接入剧本分析模块并非易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 API 调用限制、响应速度慢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开发者可以采用缓存机制来减少 API 调用次数，或者优化请求参数以提高响应速度。同时，建立监控和反馈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用性^[4]。另外，如果将国产强大 AI 程序 DeepSeek 语言模型整合到剧本分析模块时，可以通过 API 接口实现语义角色标注、叙事结构解析和情感图谱构建。动态调节温度系数平衡分析结果的确定性与创造性，结合算法自动优化响应长度，并通过剧本语料训练适配频率惩罚参数。针对 API 调用效率问题，采用请求批处理与缓存机制降低延迟，部署精度优化推理引擎提升吞吐量。系统架构上分离预处理、核心分析和后处理三个微服务模块，通过实时监控和动态负载均衡确保稳定性。

其次，在系统层方面，以教学管理平台与 AI 模块的兼容性设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教学管理平台作为教育机构的核心系统，其兼容性和开放性对于引入 AI 模块至关重要。例如，编导日常教学管理平台通过引入 AI 模块，可以实现课程资源的智能推荐、学生学习行为的智能分析等功能。为了实现这些功能，学院可以采用微服务架构，将 AI 模块作为独立的服务进行部署和管理。通过定义清晰的接口标准和数据格式，实现了 AI 模块与教学管理平台的无缝对接。这种兼容性设计不仅提高了教学管理平台的智能化水平，还降低了引入 AI 模块的技术门槛和成本。在具体实践中，该教学管理平台通过智能推荐算法为学生推荐符合其学习兴趣和需求的课程资源。同时，通过可视化分析工具展示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成绩趋势，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进行针对性指导。

(二) 编导教师角色的“人机协同”转型

在 AI 技术与影视创作深度融合的浪潮中，编导教师的角色转型已突破传统教学框架，形成“技术解读者、创意策展人、伦理把关者”三位一体的“人机协同”新范式。这一转型不仅涉及教学工具与方法的革新，更意味着对影视创作教育本质的重新定义^[5]。即从技术标准化生产转向人机协同的创造性实践，从单一媒介叙事训练转向跨维度艺术思维的培养。

其一，教师从单向输出创作技法的“导演型”角色，逐步进化为掌握人机协同创作规律的“创意架构师”，其核心价值正从单纯的技术传授转向跨媒介叙事能力的深度培养。正如在 AI 赋能的创作教学场景中，编导教师需构建数字艺术思维能力模型。这要求其既要精通 AI 剧本生成、虚拟制片系统、影视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工具的操作逻辑，更要具备对机器产出的批判性审美判断。以分镜头设计教学为例，教师需引导学生运用 AI 工具快速生成多版本预演方案，进而通过镜头语言分析、情感节奏把控、文化符号解构等专业维度，培养学生超越算法框架的艺术创新能力。这种教学模式的颠覆性在于，教师不再直接教授 Adobe Premiere 或 Final Cut 的剪辑操作技巧，而是着力于训练学生将 AI 生成的素材转化为具有人文温度的叙事表达。

其二，“人机协同”教学在编导领域呈现出独特的三重架构。包括了创作前期的智能灵感激发系统、中期的虚实融合创作平台、后期的智能评估反馈机制。在剧本创作环节，教师指导学生运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进行故事线索挖掘时，需要同步强化学生的伦理判断能力。当 AI 可以为学生提供 100 种情节发展可能时，如何筛选出既符合戏剧规律又具有社会价值的选项，是师生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影视后期教学中，面对 AI 自动剪辑系统生成的成片，教师需带领学生分析算法推荐的热点镜头组合与艺术完整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教学互动实质是在培养未来影视人的“算法驯化能力”。而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也映射出传媒教育的深层矛盾与挑战。当 AI 能够自动生成标准化的分镜脚本时，编导教师的核心竞争力转向对非标创作维度的把控。这要求教师重构评价体系，在机器评估的镜头衔接流畅度、景别分布合理性等量化指标之外，也需建立情感传递效度、文化符号的准确性等质性评价维度。在虚拟制片实训中，教师也需要创设人机协作的特殊情境。

然而，人机协同教学模式的推广和应用也面临着诸多潜在风险和挑战。一方面，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技能体系，以适应 AI 技术的发展和應用。这要求教师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和意愿，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技术水平。同时，教育机构也需要为教师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支持，如定期举办 AI 技术应用培训、建立 AI 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等，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的角色和教学方式。另一方面，人机协同教学模式可能会对学生的心理和情感产生一定影响。过度依赖 AI 系统可能导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情感交流减少，影响学生的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因此，在推进人机协同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应始终保持人文关怀，注重与学生的情感沟通和心理支持。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状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心理辅导，如建立师生互动机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以确保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伦理风险与应对机制

在编导教学中，AI 技术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对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艺术表达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种技术驱动的变革并非没有代价，尤其是在伦理层面，AI 的应用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关乎法律和技术，更触及编导教学的核心价值——培养学生的原创能力和艺术审美。因此，如何在编导教学中合理应用 AI 技术，同时规避其潜在的伦理风险，成为教育工作者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其一，生成内容版权归属界定与防范。AI 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生成式 AI 的广泛应用，对传统的版权法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当 AI 系统能够根据海量数据学习并生成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内容时，如何界定这些内容的版权归属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版权法基于“作者”概念，即只有具有人类智慧和创造性的个体才能被视为作者，并享有其创作作品的版权。然而，在 AI 生成内容的情境下，这一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以 GPT 系列模型为例，它们能够生成流畅、连贯且富有创意的文本，但这些文本并非由人类直接创作，而是由算法根据大量数据进行学习和推理后产生的。为了解决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问题，学术界和法律界进行了广泛探讨。一种观点认为，应将 AI 的开发者或使用者视为版权所有者，因为他们提供了数据、算法或指令，使得内容得以生成。然而，这种观点存在明显缺陷。以某公司利用自研 AI 模型生成广告文案为例，虽然公司提供了数据和算法，但文案的独创性并非完全由公司决定，而是算法本身的学习和创新结果。因此，将公司视为文案的版权所有者可能忽视了内容的独创性要求。另一种更为合理的观点是，根据生成内容的独创性程度来界定版权归属。如果 AI 生成的内容在表现形式、结构安排或思想表达上展现出高度独创性，且这种独创性并非仅由数据输入决定，而是算法本身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的体现，那么可以考虑将 AI 系统视为一种特殊的“创作者”^[6]。然而，这一观点在法律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因为现行法律体系并未明确 AI 系统的法律地位，也未规定其享有版权的条件和范围。为了防范版权争议，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明确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原则。这可能需要修订现行版权法，或者制定专门的 AI 版权法规，以适应技术发展的需求；其次，推动 AI 行业制定和遵守统一的伦理标准和行为规范。鼓励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尊重知识产权，避免侵犯他人的版权。

其二，AI 工具使用比例阈值设定，创意同质化预警。AI 工具的广泛应用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创意产出速度，但也带来了创意同质化的问题。当大量内容依赖于相同的算法和模板生成时，其独特性、新颖性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引发公众的审美疲劳和创意枯竭^[7]。这一问题在广告、短片制作领域尤为突出。以广告行业为例，随着 AI 文案生成工具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广告文案呈现出相似的句式、结构和表达方式。这些文案虽然符合语法规范、逻辑清晰，但缺乏独特性和吸引力，难以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和共鸣。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一些广告公司开始探索 AI 工具使用比例的阈值设定。他们发现，当 AI 生成内容在广告文案中的占比超过 50% 或 60% 一定限度时，文案的独特性和吸引力会显著下降。因此，他们设定了 AI 工具使用比例的上限，鼓励创意人员结合人类智慧和 AI 技术，共同创作出更具独特性和吸引力的内容。除了广告行业外，短片创作领域也面临着创意同质化的问题。一些学生利用 AI 生成故事梗概或角色设定，但发现如果过度依赖 AI 技术，作品的风格和情节发展会变得过于模式化和缺乏深度。因此，他们开始尝试将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灵感来源或辅助工具，而不是完全依赖 AI 进行创作。通过结合人类智慧和 AI 技术，他们能够创作出既具有独特性又富有深度的作品。为了有效预警和应对创意同质化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设定合理的 AI 工具使用比例阈值。根据不同领域和创作需求的特点，制定具体的阈值标准，并鼓励创意人员在此范围内合理使用 AI 工具；其次，加强创意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升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审美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结合人类智慧和 AI 技术进行创作；最后，建立创意同质化预警系统。通过对大量生成内容的分析和比较，及时发现并纠正同质化趋势。同时，可以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和反馈机制，共同维护创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四、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下 AI 技术在广播电视编导教学领域的应用与实践探索，揭示了传媒行业变革对编导人才能力

结构的重塑要求,批判了传统教学模式在资源利用、实践场景及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局限。“虚拟制片、智能协作、动态评估”的全链条教学实践模式,通过引入虚拟预演系统、AI写作工具和情感计算算法,有效突破了传统线性创作思维的束缚,实现了人机协同决策与数据驱动的教学优化。展望未来,随着AI技术的持续进步,其在编导课堂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一方面,AI将不断深化在剧本创作、分镜设计、虚拟制作等方面的辅助功能,通过更加智能化的算法和更丰富的数据资源,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作效率和技术素养;另一方面,人机协同教学模式将不断完善,教师在引导学生利用AI工具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艺术创新能力,防止创意同质化与伦理失序风险。

参考文献:

- [1] 谷歌.AI[M].化学工业出版社:2023: 10-11.
- [2] 张涛: 欧盟发布最新《AI道德准则》,能保证我们信赖AI吗?[EB/OL].腾讯研究院(2019-04-30)[2025-03-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2221446815518067&wfr=spider&for=pc>.
- [3] 陈元电,陈静,徐胜.AI技术在教学质量评价中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4,(09):20-22+26.
- [4] 张文龙,孟垂懿,吴金玲.AI在高校教学中的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J].电大理工,2023,(02):27-30+51.
- [5] 刘策.AI背景下教师角色定位研究[D].喀什大学,2022.
- [6] 雷晓艳,孙妍.AI时代影视教育的问题、机遇与应对[J].传播与版权,2023,(14):103-106.
- [7] 卢佳,陈晓慧,杨鑫,等.智能技术教学应用伦理风险及其消解[J].中国电化教育,2023,(02):103-110.

Explo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Path of AI Technology in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Teach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Xu Jinbo¹

¹Geely Universit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41423,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revealing the urgent needs of media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for cross media narrativ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of directing talents. It points out the contradiction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in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limited practical scenarios, and lagging evaluation systems. By constructing a full chain paradigm of "virtual production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dynamic evaluation", introducing virtual rehearsal systems, AI writing tools, and emotion computing algorithms, breaking through linear creative thinking, achieving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decision-making and data-driven teaching optim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AI tools need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serving educational value" and establish a three in one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of virtu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 and ethic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is way, the deep intervention of AI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literacy, but also cultivate composite talents with both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However, we need to be vigilant about the risks of creative homogenization and ethical disorder, and adhere to a humanistic orient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AI; Film and Television Teach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director; human-machine cooperation

单元主题意义视域下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研究——以外研社必修 2 Unit6 Earth first 为例

段如梦¹ 岳瑞玲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

摘要: 本文以单元主题意义视域下的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为主题, 以外研社必修 2 Unit6 Earth first 为例展开研究, 旨在探讨单元主题意义视域下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的应用, 研究通过构建“趣味导入—语篇深挖—思维拓展—主题升华”四个步骤教学模式进行, 聚焦“人与自然”主题语境。实践研究发现, 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深化学生对主题意义的理解, 实现语言能力与思维品质的双重提升, 促进英语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 单元主题意义; 高中英语; 多模态语篇教学; 核心素养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12

一、引言

在传统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 教学多采用单篇教学, 通过简单的语言与文字来传授知识, 教学方法刻板单一, 教学内容枯燥乏味,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 限制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延伸英语课堂。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程标准)中, 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旨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即语言能力(Language capacity)、文化意识(Culture awareness)、思维品质(Thinking quality)和学习能力(Learning ability)。新课程标准聚焦于学科核心素养发展, 把主题语境作为英语课程内容六要素之一, 在语言教学中强调语篇要通常以多模态形式呈现, 既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 也包括音频的和视频的^[1]。基于单元主题意义视域下的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 强调教学要以主题为引领, 对多模态语篇进行充分利用, 教学过程中不仅关注传统的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 也要关注学生“看”的技能, 通过多元的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播语篇主题, 促进意义建构,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些环环相扣, 相互促进, 最终实现教育的思政育人价值。

二、单元主题意义与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的内涵与特点

单元主题意义是指在教学中围绕特定的单元主题, 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其内涵与价值, 以实现语言学习与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统一。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则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综合利用语言、视觉、听觉等多种符号资源, 通过多样化的语篇形式, 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构建丰富、立体的学习环境。单元主题意义为多模态语篇教学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而多模态语篇教学则为单元主题意义的探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手段,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促进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发展。

(一) 单元主题意义的内涵与特点

新课程标准聚焦于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英语学习活动观, 英语课程内容是发展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 主题语境作为高中英语课程内容六要素之一, 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新课程标准将高中英语学科的主题语境主要分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层面, 涵盖整个高中阶段所涉及的主题内容, 不分课程类别进行描述, 所有的语言学习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主题语境下进行的, 这种教学方法强调语言学习的关联性、真实性、整合性、教育性、动态性和情境互动性^[2]。本研究以新版外研社高中英语课本必修二 Unit6 Earth first 为例, 单元的主题语境是“人与自然”, 涉及的主题语境内容是关爱地球、保护环境, 本单元从人类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入手, 引出单元话题, 并进一步深入讨论了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全球变暖、空气污染、生活中的环保误区等子话题。

作者简介: 段如梦(2002-)女, 硕士 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英语);

岳瑞玲(1979-)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研究。

通讯作者: 岳瑞玲

(二) 多模态语篇教学的内涵与特点

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基本理论来源于韩礼德提出的“语言是社会符号”(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这一观点^[3], 模态是“交流的渠道及媒介, 包括语言、技术、图片、颜色、音乐等各种符号系统”^[4], 模态主要可以分为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嗅觉模态、味觉模态和触觉模态, 多模态则指同时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符号系统,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着教学方式的变化, 由信息技术赋能下的教学方式正在从传统单一向着多模态、多元化方式转变, 语篇从传统的单一文字模态转向兼具文字与图像、声音等其他模态相互作用影响的组合。其特点在于打破单一语言模态的局限, 充分发挥各模态的优势, 使信息呈现更加直观、生动,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语言学习的趣味性、互动性、综合性和情境性。基于 Kress 与 van Leeuwen 的视觉语法理论, 本研究在分析教材插图时, 重点解读色彩(如蓝色象征环保)、构图(如破坏性场景的对比布局)等视觉符号对主题意义的强化作用。^[5]《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提出“教师和教材编写者在选择语篇时, 应尽量涵盖实际生活中各种类型的语篇, 包括多模态语篇”的要求, 促使教材融合多种模态资源, 在 *Unit6 Earth first* 中, 基于学生已有的语言和文化知识, 围绕此单元的主题语境内容, 教材提供了包含视频、游记、广告等多模态语篇来促进学生了解和学习。

三、单元主题意义引领下的多模态语篇教学研究价值

主题意义探究是英语教学的关键理念, 多模态语篇教学研究能深化对其理论认知, 多模态教学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的“主题意义探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通过整合文本、图像、音视频等符号资源, 构建起“语言-图像-情境”三位一体的意义建构模型^[5], 突破传统单模态文本分析的局限, 为新课程标准提出的“主题为引领”教学理念提供学理支撑, 通过多模态协同加工, 能够促进知识建构, 提升学习效果, 助力学生深度理解知识, 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Cite Space 绘制的聚类分析图(图1)展示了研究主题间的关联网络, 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主题, 连线表示主题间的关联, “主题语境”(#6)和“多模态”(#3)是核心主题, 与“英语教学”(#5)紧密相连, 这凸显了在英语教学中, 以主题语境为引领、运用多模态语篇教学的重要性。具体到外研社必修2 *Unit6 Earth first*, 其主题语境为“人与自然”, 在图中与“多模态”(#3)关联, 表明多模态语篇是教学的重要资源, 通过多种模态资源(如视频、游记、广告等)的综合运用, 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形式, 使学生更深入理解“关爱地球、保护环境”这一主题, 提升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参与度。同时, “图文关系”(#8)与主题的关联体现了在多模态语篇中, 视觉元素与文本的结合对主题意义的强化作用, 这与本文研究中对教材插图等多模态元素的分析相契合, 进一步说明了多模态语篇教学在促进学生对主题意义探究方面的价值。通过对聚类分析图以及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 在主题意义引领下, 由语篇为依托, 通过整合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 运用技能和策略, 促进语言文化的内化和思维的发展, 响应新课标“学科育人”的根本要求, 对于促进学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研究意义。



图1 聚类分析

四、单元主题意义视域引领下的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实践

基于单元主题意义视域引领下的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覆盖各版本教材的各个单元主题中, 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大主题下所确定的某一子主题作为引领, 由音频、视频、图片、广告、日记、游记、公告、通知等多种模态作为媒介展开语篇教学。新课程标准强调语篇教学采用 *Starting out—Understanding ideas—Developing ideas—Presenting ideas& Reflection* 模式, 本研究以此为依托, 通过趣味导入, 主题初探—语篇分析, 主题深挖—思维拓展, 主题重构—观点表达, 主题升华四个环节对外研社版高中英语必修2 *Unit6 Earth first* 展开教学设计与研究。

(一) 趣味导入, 主题初探

通过文章标题 *Earth first*, 得知本文的主题围绕环境保护展开, 采用多模态激趣和问题驱动两种方式进行主题导入。首先, 运用视频、图片、音频等多种模态资源, 创设与单元主题“*Earth first*”相关的情境, 引导学生通过听觉和视觉模态观看以蓝色作为总基调, 附有蓝色河流和天空, 山峰上具有茂密的翠绿色植被的单元背景、关于环境受破坏情形下的四张卡通图片以及地球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视频片段, 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人与自然”的

单元主题, 激发学生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从而自然地引入本单元的学习内容。通过对比以上情形的差异, 提出“*What environmental problem does each cartoon refer to? What does the video want to tell us?*”“*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 we face today? What should be done to help solve it?*”引发学生思考的问题, 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储备, 运用所学的多模态知识, 进行初步的讨论和交流。教师最终总结学生观点, 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单元主题的理解, 使学生认识到环境保护不仅是全球性议题, 也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二) 语篇分析, 主题深挖

在多模态语篇教学视域下, 通过语言模态、视觉模态、听觉模态等角度对教材中的课文语篇进行深入剖析, 充分挖掘其丰富内涵与教学价值。

在语言模态上, 深入分析文本的词汇选择、句式结构和语法呈现等方面, 不仅提高学生的语言知识与技能, 还促进对主题意义的理解。在语法部分, 两个语篇分别讲述“美人鱼”汉娜保护海洋环境的事迹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访谈, 通过引导学生识别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作补语的用法, 理解其对宾语的补充说明作用, 在讲述“美人鱼”汉娜保护海洋环境的事迹时: “*She saw rubbish floating on the sea surface.*” (她看到垃圾漂浮在海面上) 中的“*floating*”, 现在分词“*floating*”作宾语补足语, 补充说明宾语“*rubbish*”的状态, 即垃圾正处于漂浮的状态, 体现了海洋环境中垃圾污染的严重性, 也反映出汉娜对这种现状的关注促使她采取行动保护海洋, 又如: “*The damaged ecosystems have been restored, making the region more habitable for wildlife.*” (受损的生态系统已经被修复, 使得该地区更适合野生动物栖息) 中的“*restored*”, 过去分词“*restored*”作宾语补足语, 补充说明宾语“*the damaged ecosystems*”的状态变化, 即受损的生态系统已经处于被修复好的状态, 这描绘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在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学生通过对这种语法结构的学习, 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汉娜面对海洋环境问题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清晰地看到环保措施所带来的积极改变, 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对环境保护能够带来生态改善这一主题意义的认识, 同时掌握了过去分词作补语表达被动完成状态的用法, 实现语言学习与主题意义探究的融合。

在视觉模态方面, 课文插图的色彩运用和构图布局对语篇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比如, 展示鲨鱼在海洋中的生活场景插图, 运用蓝色调的色彩营造出海洋的深邃与神秘感, 而被渔网缠绕的鲨鱼插图则通过对比鲜明的色彩和紧张的画面布局, 直观地传达出鲨鱼面临的困境与危险, 激发学生保护海洋动物的意识。同时, 引导学生观察其他插图中的细节, 如全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等画面, 让学生从多角度感知人与自然的关系, 进一步理解课文所倡导的守护地球家园的主题意义。

此外, 在听觉模态上面, 为学生播放与海洋保护、全球变暖等主题相关的音频资料, 如海洋生物的声音、环保公益广告的音频等, 让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感受环境问题的紧迫性, 增强对课文主题的情感共鸣。同时, 结合文本内容, 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或情景模拟等活动, 将语言模态与其他模态有机结合, 使学生在多模态语境中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文主题, 提升综合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 充分彰显出多模态语篇教学在单元主题意义探究中的重要价值。

(三) 思维拓展, 主题重构

为了将单元主题的理解、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结果以及拓展探究所获得的知识进行系统整合, 引导学生跳出文本, 结合自己的知识和思考, 重新构建主题, 从而拓展学生思维, 培养学生独创性思维的形成。以小组为单位, 基于对单元主题的深入理解和思维拓展, 布置多模态语篇创作任务。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模态组合, 如制作环保主题的海报(融合视觉模态和文字模态)、编写并录制环保宣传音频(结合听觉模态和语言模态)、拍摄并剪辑环保短视频(综合运用多种模态)等, 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创作出能够表达自己对“*Earth first*”这一主题独特见解的作品。例如, 某小组制作的环保主题海报通过色彩对比和文字说明, 生动地展现了塑料污染的危害, 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在创作过程中, 鼓励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 合理运用各种模态元素, 强化对环境保护问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实现从知识理解到观点表达的跨越, 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认知结构, 使作品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有效传达保护地球的理念。

(四) 观点表达, 主题升华

在对学生的思维进行拓展后, 各个小组展示自己所创作的契合主题的多模态语篇作品, 从主题构建、创作来源、制作过程、传达思想、创作新颖性等多个方面阐述自己的作品, 例如, 某小组创作了一幅关于海洋生态保护的电子海报, 主题构建上聚焦于海洋塑料污染问题, 创作来源是纪录片《海洋塑料》和网络资料, 制作过程运用了图像编辑软件, 融合了震撼的海洋生物图片与塑料垃圾缠绕的画面, 传达出减少塑料使用的环保理念, 作品新颖性体现在互动设计, 观众扫码可参与环保承诺, 这样的展示既可以增加小组间的沟通协调能力, 又可以重温主题内容。同时, 将学生自评、各小组之间的互评和老师的点评相结合, 既能够学习借鉴他人的优点, 还能从不同角度审视自己的作品,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多模态语篇创作能力, 引导学生更加准确、生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在学生完成多模态语篇表达后, 教师要针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主题升华, 提炼出更深层次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与价值, 鼓励学生将自己创作的多模态语篇作品用于实际的环保宣传活动中, 如社区宣传或学校环保日展示, 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五、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单元主题意义视域下的高中英语多模态语篇教学,以“人与自然”主题的外研社必修2 Unit6 *Earth first* 为例,构建了四步教学模式,整合视频、图像、文本等多模态资源展开实践探索。研究表明,该模式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更主动地参与课堂互动,深化学生对环境保护主题意义的理解,让其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and 创新能力,学生在分析语篇、解决环保问题及创作多模态语篇作品时,能提出独特见解和创新性解决方案。本研究顺应语篇多模态化发展趋势,为高中英语教学提供新思路与方法,丰富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有助于实现英语学科育人价值,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然而,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单元主题的多模态语篇教学,在其他主题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拓展范围,探索不同单元主题下多模态语篇教学的应用及优化教学模式,同时关注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其多模态素养与教学能力,为教学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 [2] 李习兰. 在主题语境中学用英语——高中英语主题语境教学策略探讨[J]. 基础教育课程,2024,(12):65-68.
- [3]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 [4]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J]. 外语学刊 2007, (5): 82-86.
- [5] Kress, G. &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2001.
- [6] 杜小兰. 多模态语篇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实践探究——以 Unit 1 Art 为例[J]. 英语教师, 2022, 22(13): 28-31.
- [7] 胡勇, 谢晟杰. 外语多元读写能力与学科核心素养协同培养路径研究——基于新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多模态语篇分析[J]. 教育语言学研究, 2024, (00): 107-115.
- [8] 何佩祝. 多模态语篇在主题单元整体教学中的有效应用——以2019年人教版和外研版高中英语新教材为例[J]. 广西教育, 2024, (02): 128-131.
- [9] 鄢佳梅. 依托多模态语篇基于主题意义探究的教学应用尝试——以新版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必修一 Unit 1 A new start 为例[J]. 教学考试, 2021, (12): 27-29.
- [10] 姚建华. 多模态理论在高中英语语篇分析中的应用[J]. 校园英语, 2022, (46): 127-129.
- [11] 郑佳, 杨孝融. 单元主题意义建构的多模态分析——以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2019年版)为例[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1, 44(06): 13-19.
- [12] 张德禄. 多模态学习能力培养模式探索 [J]. 外语研究 2012, (2): 9-14.

A Study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English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Unit Thematic Meaning -----A Case Analysis of FLTRP Book 2 Unit 6 “Earth First”

Rumeng Duan¹, Ruiling Yue¹

¹ Tai 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 zhong, Shanxi 03061, China

Abstract: Situated within the unit-thematic-meaning paradigm,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multimodal discourse instruction in senior-high English. Using Unit 6 “Earth First” from FLTRP Book 2 (Compulsory) as its case, it operationalizes a four-phase instructional model—engaging lead-in → in-depth discourse excavation → cognitive expansion → thematic elevation—under the overarching context of “Humans and Nature”. Empirical classroom data demonstrate that the multimodal approach markedly heightens learners’ situational interest, deepens their conceptual grasp of the unit’s thematic significance, and simultaneously enhances both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thinking dispositions, thereby actualizing the formative value of English as a school subject.

Keywords: Unit-Based Thematic Meaning; High School English; Multimodal Discourse Instruction; Core Literacy

近十年我国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调查研究

何承航¹ 蔡兰珍¹

(1.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本研究调查了2015-2025年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研究进展, 基于国内16种CSSCI期刊的81篇文献, 通过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法, 揭示了该领域研究的趋势变化、主题分布与方法特征。研究发现: 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年均发文量仅8.1篇, 显示领域仍属新兴方向; 研究主题集中于“课程教学实践”和“学科建设方向”, 而“教师专业发展”、“人才培养路径”、“教学媒介创新”等关键领域关注不足; 研究方法存在思辨研究主导与实证研究薄弱的结构性失衡, 且实证研究结论欠缺多源验证。研究建议通过构建专业化研究梯队、深化核心主题理论建构、强化混合研究方法应用等路径, 推动人工智能与英语教育的生态化融合, 为高等英语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革新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人工智能; 高等英语教育; 研究趋势; 研究主题; 研究方法

基金项目: 本文是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基于AI辅助教学的新疆阿克苏市高中英语听说教学探究”(项目编号: 2025CXZX-399)的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99

一、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战略性技术, 正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1]。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引发广泛关注, 该技术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等途径赋能教学活动, 为适应性学习、个性化指导及效率提升提供技术支撑^[2]。近年来, 我国相继出台《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与《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政策, 着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加速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方法的范式转型^[3]。英语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分支, 既具备教育领域的共性特征, 又呈现显著的学科特异性^[4]。高等英语教育作为综合性育人工程, 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学习者外语思辨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深化本土文化认知与国际视野培养, 最终塑造具有创新思维、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能力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英语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正重塑教学场景并推动教学模式向个性化、多元化与智能化转型^[5]。因此, 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有效路径是每一位英语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随着学界在高等英语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系统梳理现有成果以建构理论框架、指引研究方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研究聚焦2015-2025年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内高等英语教育研究, 通过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法, 揭示研究现状与核心问题, 进而提出优化路径, 旨在推动高等英语教育体系创新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围绕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对近十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等英语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展开系统回顾、深入分析与全面总结:

- (1)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高等英语教育的研究在2015-2025年间呈现何种研究趋势?
- (2) 该领域在研究主题维度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理论成果与实践创新?
- (3) 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层面展现出何种范式进步?

(一) 文献选取

作者简介: 何承航(2000—), 男,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育、二语习得;
蔡兰珍(1965—), 女, 硕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论、教师教育。

本研究文献选取时间跨度为 2015 年 4 月至 2025 年 4 月，数据来源包括国内 12 种外语类 CSSCI 来源期刊及 4 种综合类 CSSCI 来源期刊。具体期刊名录为：《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中国外语》《外语界》《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学刊》《当代外语研究》《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外语电化教学》《外国语文》《现代远程教育》《中国电化教育》《远程教育杂志》及《课程·教材·教法》。检索工作通过中国知网平台实施，采用组合检索策略：分别以“人工智能”“AI”“高等外语教育”“高等英语教育”为检索词，从篇名、主题、关键词及摘要四个方面进行独立检索与交叉检索，获取近十年间上述 16 种期刊发表的关于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研究文献，并通过人工核查期刊目录完善检索结果。经初步筛选，排除书评、会议纪要及新闻公告等非研究性文献后，最终确立有效样本 81 篇。

（二）研究内容

本研究从研究趋势、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对筛选的 81 篇文献进行系统分析。

在研究趋势分析层面，通过统计高等教育学段相关研究论文年度分布数据，揭示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领域的研究趋势变化，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在研究主题分析环节，通过整合现有分类体系与文献内容特征，本研究将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归纳为七个核心维度：课程教学实践、学科建设方向、发展机遇与挑战、教师专业发展、人才培养路径、教学媒介创新及研究综述评析。各主题内涵具体表现为：“课程教学实践”涵盖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教学的智能技术融合，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课程思政与文化遗产创新；“学科建设方向”探讨人工智能时代英语学科发展路径与教学模式革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析技术应用的双重效应；“教师专业发展”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对英语教师信念与角色定位的重构；“人才培养路径”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机制；“教学媒介创新”着力于智能教材开发与评估工具研发；“研究综述评析”则系统梳理领域发展脉络。本研究将依据各主题的研究热度排序，依次对各维度核心内容进行系统性梳理与阐释。

在研究方法分析部分，首先对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领域的现有研究进行类型划分，将其系统归类为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两大范畴。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两类研究方法进行多维度的次级分类：针对实证研究，依据数据采集范式与来源特征，将其划分为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及混合方法研究三种类型；对于非实证研究，则更进一步区分为经验归纳法、文本阐释法、思辨研究法及文献研究法四种类型。最终基于上述分类体系，从研究方法维度对相关文献展开系统计量分析，具体包括数量统计与占比分析两个维度。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研究趋势分析

图 1 呈现了 2015-2025 年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的论文数量发展趋势。尽管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该领域研究产出仍显不足，本研究筛选的 16 本核心期刊在观测期内共计刊载 81 篇相关文献，年均载文量仅有 8.1 篇。该领域研究可划分为四个典型阶段：第一阶段（2015-2016）为萌芽期，核心期刊发文量为零，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第二阶段（2017-2020）进入政策驱动期，发文量提升至 10 篇。此阶段发展主要受益于教育部相继颁布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2016）、《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2018）等政策文件，为技术教育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阶段（2021-2023）呈现技术突破期特征，发文量显著增长至 24 篇。2022 年末 Chat GPT 语言模型的问世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时代的正式开启，为英语智慧教育带来范式变革。第四阶段（2024 至今）进入快速发展期，Deep Seek 等创新技术的突破推动发文量跃升至 47 篇，达历史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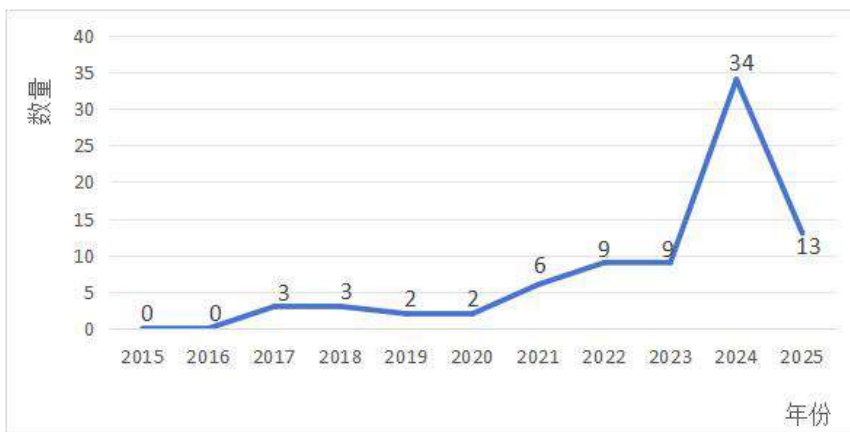


图 1 2015—2025 年间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论文分布

研究数据表明,政策法规的持续供给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提供了制度保障,而技术创新突破则构成核心驱动力。二者的协同作用有效激发了学术界与实践领域的研究热情。但需指出,当前研究成果在数量维度仍存在显著提升空间,具体表现为年均载文量较低,凸显该领域尚属新兴研究方向。

(二)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研究主题分析

图2显示的是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主题分布情况。以“课程教学实践”“学科建设方向”为主题的研究分别占总数的27.16%和22.22%,是研究的热点。“发展机遇与挑战”研究占比为17.28%，“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占比为9.88%，“人才培养路径”与“教学媒介创新”研究占比均为8.64%，“研究综述评析”研究占比为6.18%。本研究将基于研究主题的热度排序,逐一对各维度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分析与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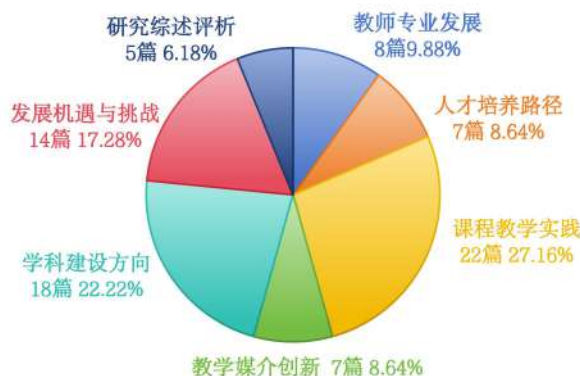


图2 2015—2025年间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主题分布

“课程教学实践”作为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领域的核心议题,近十年共发文22篇,研究占比为27.16%。该主题主要聚焦于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教学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机制,以及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英语课程思政建设与文化传承创新路径研究,具体有以下研究,在口语教学领域,吴坚豪等基于互动假说理论框架,通过对100名中国英语学习者开展实证研究,系统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口语复杂性、准确性和流利性的影响机制^[6]。孔蕾开创性地探讨大语言模型(LLMs)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创新应用,提出LLMs作为新型教育主体参与教学实践,正在重构传统教育生态^[7]。写作教学领域呈现显著研究热度,学者们普遍聚焦ChatGPT的教学应用价值。相关研究表明,该技术通过实时反馈机制不仅能提升写作质量,还可有效缓解学习焦虑、激发创作动机并拓展思维维度^{[8][9][10]}。翻译教学研究呈现技术融合特征:王洪林基于SPOC平台构建智能化深度翻转口译教学模式^[11];张轶骏和周晶开发人工智能口译评测系统以提升评估效能^[12]。在跨学科融合研究方面,谢竞贤针对英语课程思政存在的教学脱节问题,以“英语口语笔译”课程为案例,构建AI辅助的思政教学系统^[13]。孔蕾和杨鑫蕊着重探讨LLMs在中华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的实现路径,从文化理解和文化讲述两个维度展开理论建构^[14]。

“学科建设方向”研究作为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领域的第二大热点,近十年发文共18篇,占比为22.22%。该主题聚焦于人工智能时代英语学科的发展路径与教学模式革新双重维度。本领域研究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征,学者们从学科发展路径和教学模式改革两个层面展开系统性探索。在学科发展路径层面,郑燕虹等强调英语教育需主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发展框架^[15]。肖传国提出人才培养目标突破传统应用型定位,着力构建人文性与科学性、工具性与价值性相融合的学科体系^[16]。在教学模式革新纬度,学者们从不同维度提出多元化改革方案:钟富强构建的智慧教学系统包含智能技术、智慧学习、动态测评三大模块,提出线上线下融合课程重构、混合教学模式创新、自适应学习体系构建等实施路径^[17]。胡美如和肖龙海设计的四阶段项目化学习框架涵盖目标确立、量表设计、学习序列规划、综合评价等环节^[18]。

“发展机遇与挑战”主题近十年共发文14篇,研究占比为17.28%。该主题旨在系统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高等英语教育产生的双重效应,即技术革新带来的发展机遇与伴随的现实挑战。就人工智能赋能英语教学的变革机遇而言,其核心表征呈现于五个维度:其一,人工智能通过生成多元化语言输出资源、强化技能实践效能、提供实时反馈机制及优化学习心理体验等路径,显著提升第二语言习得效率^[19]。其二,“智能教学系统”依托多模态交互模型、自适应学习算法、虚拟现实沉浸环境、高级语言生成引擎、知识图谱驱动的语法词汇教学模块、双语文化认知界面以及数据驱动的迭代优化机制,构建多维度的英语教学支持体系^[20]。其三,该技术可系统培养学习者的外语通识素养、基础语言能力、高阶认知技能及全人教育维度,形成层次分明的能力发展框架^[21]。其四,人工智能通过重构教学场域生态与过程范式,推动英语教育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双重革新。教育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促使实践主体逐步形成技术赋能的现代教育思维模式^[22]。其五,该技术引发学习范式变革,典

型表现为基于“网络认知系统”的跨领域知识获取机制，以及依托机器翻译系统的外文文献深度学习模式^[23]。在挑战层面，人工智能对英语教学产生的现实制约主要体现为四个核心问题：首要问题涉及学术伦理风险，学习者存在将 ChatGPT 作为学术不端工具的潜在风险，其生成的文本可能造成评价结果失真，对教育公平性与学术诚信体系构成潜在威胁^[24]。其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面临弱化风险，尽管 ChatGPT 具备基础交互功能，但过度依赖将抑制学习者在真实文化语境中灵活运用交际策略的能力发展^[25]。再次，师资队伍智能素养存在结构性缺陷，当前我国英语专业师资的知识储备主要集中于传统语言文学领域，普遍缺乏必要的语言智能教育素养^[26]。最后，生成内容存在可信性隐患，“算法幻觉”现象导致的大规模虚假信息输出，相较人类认知偏差更具识别难度，形成特殊的技术伦理挑战^[1]。

“教师专业发展”主题近十年发文量为 8 篇，研究占比为 9.88%。该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对英语教师信念体系与职业角色重构的影响效应。在教师信念维度，马牧青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焦点团体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对长三角地区三所师范院校 15 名职前英语教师进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接受度及其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27]。就教师角色转型而言，于银磊、饶辉构建了人工智能时代大学英语教师三维角色模型^[28]：首先作为智能技术的学习者，推动人工智能与英语教育的深度融通；其次作为语言学习的协同者，实现群体化教学与个性化指导的动态平衡；最终成为核心价值的引导者，达成知识传播与人文涵育的有机统一。

“人才培养路径”主题近十年发文量为 7 篇，研究占比为 8.64%。该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实践模式研究。学界对此展开了多维度的理论探索：崔莹等主张英语专业需顺应时代趋势，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由工具性技能型向人文性研究型的范式转换^[29]。李雪和顾晓乐基于 AI 时代背景，构建包含德育路径拓展、多元课程体系建构、跨学科课程集群创新、教学环境重构、人机协同教育模式开发及智能评价体系构建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模型，着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的跨领域交叉型英语人才^[30]。沈骑和李晓阳从新质生产力理论视角切入，系统剖析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结构性矛盾，提出具有创新性的 HEAT 理论模型^[31]。

“教学媒介创新”主题近十年发文量为 7 篇，研究占比为 8.64%。该主题聚焦智能教材开发与评估工具研发两大核心领域。在智能教材开发方面，学界呈现多维度研究成果：王雪梅等基于智慧教育背景，系统阐释高校英语数字教材的智能适配、超时空交互、多模态跨学科融合及动态价值塑造四大核心特征^[32]。王海啸立足生成式 AI 技术背景，构建包含教材结构、形态、学习体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跨界整合、评估反馈与质量规范八大维度的大学英语数智教材建设框架^[33]。在评估工具研发领域，潘鸣威与薛文枫系统解析计算机化语言测试的演进路径，对比分析基于计算机与互联网两种模式的实施特征及技术优势^[34]。张宏岩等采用控制实验法对 20 个主流工具进行加权评分测评，确立科学化的评估标准与操作范式^[35]。

“研究综述评析”主题近十年发文量仅有 5 篇，研究占比 6.18%。该主题旨在系统回顾人工智能赋能英语教学领域的发展历程并梳理其学术脉络。主要研究如下，梁迎丽与刘陈基于技术发展视角，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轨迹，重点阐释了该领域经历的三次发展浪潮^[36]。马武林和徐梦云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方法，借助 VOSviewer 可视化分析工具，从年度发文趋势、核心研究者与机构分布、研究热点演进等维度，对我国智能语言教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与研究局限进行了系统评述^[37]。

本研究领域呈现出多维度的研究图景，数据分析表明“课程教学实践”与“学科建设方向”构成核心研究领域，其文献产出量占比达 49.38%，显著高于其他研究方向，凸显出明显的学术关注度差异。

（三）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研究方法分析

本研究对 2015-2025 年间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领域的研究类型进行系统统计（见表 1）。数据显示，非实证研究以 64 项（79.01%）占据主导地位，显著高于 17 项（20.99%）的实证研究，呈现显著的方法论结构性差异。

表 1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研究类型统计

研究类型	具体方法	小计		合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非实证	经验归纳	15	23.44%	64	79.01%
	文本阐释	3	4.69%		
	思辨研究	41	64.06%		
	文献综述	5	7.81%		
实证	量化	7	41.18%	17	20.99%
	混合	7	41.18%		
	质化	3	17.64%		
合计		81	200%	81	100%

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非实证研究主要涵盖四大范式:思辨研究(64.06%,n=41)、经验归纳(23.44%,n=15)、文献综述(7.81%,n=5)及文本阐释(4.69%,n=3),其中思辨研究占据非实证研究总量的三分之二,凸显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的失衡。实证研究则呈现量化(41.18%,n=7)与混合研究(41.18%,n=7)并重的态势,质化研究(17.64%,n=3)居辅助地位。

在数据采集方法层面,实证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11次)、访谈(9次)、及测试(7次)三类工具。值得注意的是,问卷调查以其操作便捷性及所获数据的可量化特征,成为应用频次最高的数据收集方式,占比达40.74%。

在数据来源多样性维度,研究揭示出显著的方法论局限性:58.82%的实证研究(n=10)采用单一数据源,仅17.65%(n=3)的研究实现问卷、访谈与测试的三维数据三角验证。这种数据来源分布模式表明,当前该领域在方法论层面存在显著的单维度特征,满足多元方法互补性与互证效度要求的研究不足两成,这从方法论层面反映出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在数据来源方面的缺陷。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该领域存在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的失衡(思辨研究占比过高),以及实证研究在数据多样性(单源占比58.82%)和方法论严谨性(多维验证仅17.65%)上的系统性缺陷,反映出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在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应用层面的双重挑战。

四、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反思

2015至2025年间,国内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同时仍存在若干待深化领域。

在研究趋势方面,我国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虽呈持续增长态势,但总体产出量仍显不足。基于16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显示,该领域年均发文量仅为8.1篇,与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教育中的实际应用价值不相匹配。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突破传统教育技术范式,具备感知、联想、预测、规划及控制等类脑功能特征,其教育应用研究亟需学界提升关注度。

在研究主题方面,当前研究呈现热点主题深化不足、边缘主题关注欠缺的双重特征。核心研究聚焦于“课程教学实践”(27.16%)与“学科建设方向”(22.22%)两大领域:前者侧重语言输出技能(口语、写作、翻译)的技术赋能,对输入技能(听力、阅读)关注度不足;后者多停留于学科宏观论述,鲜有涉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等二级学科的具体研究。“教师专业发展”(9.88%)、“人才培养路径”(8.64%)、“教学媒介创新”(8.64%)等主题研究明显薄弱,鉴于教师、学生、教学媒介构成英语教育系统的核心要素,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已成为英语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研究方法方面,呈现两个突出问题。第一,研究类型呈现结构性失衡特征。非实证性研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79.01%,n=64),其中思辨型研究占比达64.06%(n=41)。相较而言,实证性研究仅占样本总量的20.99%(n=17),整体呈现“重理论思辨、轻实证探究”的倾向,导致研究结论多基于主观经验推导,其外部效度与推广性存疑。第二,实证研究数据采集体系存在显著缺陷。具体而言,58.82%的实证研究(n=10)采用单一数据采集方式,仅17.65%的研究(n=3)实现了问卷、访谈与测试的三维数据验证。进一步分析表明,该领域存在方法论层面的单维化倾向,数据采集方式与研究结果阐释均缺乏多维互补性,直接影响研究结论的效度与信度水平。

五、未来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建议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已成为推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的决定性力量^[38]。在此背景下,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高等英语教育的深度融合是英语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针对上述不足,对未来的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在研究趋势层面,针对该领域研究总体产出量较少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研究能力建设,以弥补该领域研究成果不足的短板。第一,构建多层次研究梯队。除专家学者外,应重点培育高校英语教师的研究主体地位。通过系统化的科研能力培训体系,包括专题研修、课题培育、方法指导等项目,全面提升研究人员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39]。第二,建立常态化学术交流机制。建议定期举办“人工智能与英语教育创新”主题学术论坛,搭建跨学科对话平台,促进理论研讨与实践经验共享。

在研究主题层面,对于当前研究呈现的热点主题深化不足、边缘主题关注欠缺的双重特征,可从以下维度对现有研究主题进行深化与拓展:第一,在核心研究领域方面,“课堂实践教学”主题需深入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在听力、阅读等输入性语言技能教学中的应用价值,突破当前局限于单一语言技能的研究格局;“学科发展方向”研究应在宏观理论建构基础上,重点加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的差异化研究,建议依据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等二级学科的属性特征,制定具有学科特色的智能化发展路径。第二,针对非核心研究领域,“教师专业发展”主题的现有成果多集中于人工智能对教师认知体系的影响分析,后续研究可聚焦教师智能教

育素养的内涵构建与提升路径;“人才培养路径”研究需在现有培养模式探讨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人工智能时代英语人才核心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培养过程与效果评估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层面,应强化实证研究以优化研究类型的结构均衡。基于事实与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较之非实证研究更具科学严谨性。人工智能在高等英语教育中的应用需切实落实到具体实践层面,而非单纯依赖主观构想。鉴于此,未来研究范式亟需实现双重转型:其一由理论思辨主导转向非实证与实证研究并重;其二需突破传统量化或质性研究的单一范式局限,引入量化、质性、解释性相融合的混合研究路径^[40]。建议研究者在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特定情境下,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框架,系统收集多源数据,通过多元分析方法实现三重研究目标——量化维度的精准测量、质性层面的深度解析以及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从而全面提升该领域研究的科学效度与人文价值。

本研究从研究趋势、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2015-2025年间国内核心期刊关于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英语教育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第一,年度发文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研究基数仍显不足;第二,研究主题呈现多元化分布特征,热点领域聚焦度较高,但存在核心议题理论纵深不足、边缘领域关注度偏低的结构失衡;第三,方法论层面呈现明显的理论思辨主导型特征,实证研究占比过低且数据来源方式过于单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三方面建议:其一,构建专业化研究梯队,提升学科交叉研究能力;其二,深化核心主题的学理探讨,加强边缘领域的学术关注;其三,注重实证研究范式,加强多元研究方法的融合应用。值得注意的是,面对ChatGPT、LLMs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迭代,学界亟需遵循“精准识别技术变革—科学构建应对策略—主动推进教学创新”的发展路径^[37],以实现人工智能与高等英语教育的深度耦合,推动英语学科生态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 [1] 郑咏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关键争议与理论构建[J].外语教学,2024,45(06):48-53.
- [2] Williamson, B. & R. Eynon. Historical threads, missing link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AI in education[J].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2020, 45(3) : 223-235.
- [3] 王雯鹤.“三全育人”视域下人工智能在高校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与发展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3,(10):17-21.
- [4] 文秋芳.人工智能时代的外语教育会产生颠覆性革命吗?[J].现代外语,2024,47(05):722-731.
- [5] 郭赞赞,于浩,于洋.高校外语教学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前景及路径[J].传播与版权,2023,(23):95-99.
- [6] 吴坚豪,周婉婷,曹超.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口语教学的实证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4,(04):105-111.
- [7] 孔蕾.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以《大学思辨英语教程·精读》教学为例[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4,7(01):11-18+90.
- [8] 王海啸.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应用探究——以“通用学术英语写作”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为例[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4,7(04):41-50+95.
- [9] 陈莱,吕明臣.ChatGPT环境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J].当代外语研究,2024,(01):161-168.
- [10] 朱小超,柳华妮.ChatGPT在外语过程体裁写作教学中的应用路径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24,(06):30-36+109.
- [11] 王洪林.AI时代基于SPOC的深度翻转口译学习模式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9,(03):69-75.
- [12] 张轶骏,周晶.VR与AI赋能的沉浸式情境口译教学模式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21,(01):78-84+13.
- [13] 谢竞贤.AI辅助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系统的设计与实施[J].外语电化教学,2024,(03):76-81+119.
- [14] 孔蕾,杨鑫蕊.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文化理解与讲述[J].外语界,2025,(01):29-37.
- [15] 郑燕虹,罗常军,蒋洪新.人工智能推进外语教育改革的探索[J].外语界,2025,(01):8-12.
- [16] 肖传国.人工智能时代外语学科融合发展的新思维、新路径[J].外语学刊,2024,(06):72-79.
- [17] 钟富强.智慧外语教学改革的路径与系统构建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21,(01):85-91+14.
- [18] 胡美如,肖龙海.双线融合视角下的英语项目化学习设计[J].课程.教材.教法,2021,41(10):86-92.
- [19] 杨连瑞.ChatGPT大语言模型背景下的二语习得[J].现代外语,2024,47(04):578-585.
- [20] 文旭.未来外语教育中的机器人教师:机遇与挑战[J].中国外语,2025,22(01):1+10-16.
- [21] 文旭,田亚灵.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在外语教育与研究中的融合[J].外语电化教学,2024,(04):18-24+103.
- [22] 张帅,唐锦兰,王琦.教育技术在外语教育学中的内涵、定位及作用[J].外语教学,2022,43(04):56-61.
- [23] 贾积有.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学习[J].远程教育杂志,2018,36(01):39-47.
- [24] 张震宇,洪化清.ChatGPT支持的外语教学:赋能、问题与策略[J].外语界,2023,(02):38-44.
- [25] 胡加圣,戚亚娟.ChatGPT时代的中国外语教育:求变与应变[J].外语电化教学,2023,(01):3-6+105.
- [26] 胡开宝,王晓莉.语言智能视域下外语教育的发展——问题与路径[J].中国外语,2021,18(06):4-9.

- [27] 马牧青. 职前英语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接受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UTAUT 模型的定性分析[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 (04): 67-73+110.
- [28] 于银磊, 饶辉. 智能时代大学外语教师的角色危机与身份重塑[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 (03): 79-85+124.
- [29] 崔莹, 周凌, 张绍杰. AI 时代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转型与重塑[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 (04): 32-36+105.
- [30] 李雪, 顾晓乐. AIGC 技术冲击下外语人才培养的破壁与升级[J]. 外语学刊, 2024, (02): 75-83.
- [31] 沈骑, 李晓阳.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型构建和路径优化[J]. 中国外语, 2025, 22(02): 4-11.
- [32] 王雪梅, 周茂杰, 马秋艳.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校外语数字教材的内涵特征、建设现状与发展路径[J]. 当代外语研究, 2025, (02): 34-43.
- [33] 王海啸. 生成式 AI 时代大学英语数智教材建设框架探索[J]. 当代外语研究, 2025, (02): 23-33+205.
- [34] 潘鸣威, 薛文枫. 大规模外语测试的计算机化演进[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 (03): 90-94+121.
- [35] 张宏岩, 黄蓉, 李颖, 等. AI 辅助英语学习工具的测评[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 (02): 18-24+103.
- [36] 梁迎丽, 刘陈.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现状分析、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J]. 中国电化教育, 2018, (03): 24-30.
- [37] 马武林, 徐梦云. 21 世纪以来我国智能语言教学研究述评[J]. 外国语文, 2023, 39(06): 140-150.
- [38] 郑春萍, 于淼, 郭智妍. 人工智能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回顾与展望[J]. 外语教学, 2024, 45(01): 59-68.
- [39] 何承航, 蔡兰珍. 我国中学《英语课程标准》研究的调查报告[J]. 小小说月刊, 2024(14): 265-267.
- [40] Conrad, S. *Corpus Linguistics Approaches for Discourse Analysis*[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2, (22): 75-95.

Investigation Study on the Empowerment of Higher English Educatio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Chenghang He¹, Lanzhen Cai¹

¹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ing higher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5. Based on 81 literatures from 16 domestic CSSCI journals, through bibliometric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it revealed the trend changes, topic distribu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overall research trend is upward, but the average annual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is only 8.1, indicating that the field is still an emerging direction.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practice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the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whil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is paid to key areas such a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alent cultivation paths”,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dia”. There is a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dominance of speculative research and the weakness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conclusions of empirical research lack multi-source verifica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nglish education through paths such as building a professional research team,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re them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mixed research method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gher English Education; Research Trends;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Methods

AIGC 赋能高校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范式研究

程文婷¹ 彭文正¹

(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河南郑州 4511911)

摘要: 本文探讨了 AIGC 技术在高校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实践范式。通过构建“四位一体培养体系”(课程内容智能化重构、教学模式数字化转型、实践体系产教融合、评价机制动态优化), 实现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突破。实证研究表明, AIGC 技术显著提升了软件开发效率和学习效果。研究同时指出需警惕技术依赖、伦理风险等问题, 并提出优化教学设计、建立使用规范等改进建议, 为 AI 时代软件开发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AIGC; 软件开发; 应用型人才培养; 产教融合

基金项目: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2025 年度立项课题: AIGC 赋能视域中高校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范式与优化方案研究(编号: SD-YB202506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085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 其影响力已广泛渗透至各个领域, 教育领域亦不例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进教育数字化。教育部于 2024 年 3 月开始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 “AIGC+教育”模式受到教育界广泛关注^[1]。在企业软件领域, AIGC 技术正革新传统开发工作, 在代码生成上, 能依据自然语言需求描述快速生成并优化代码, 提升效率与质量^[2]; 测试环节中, 可自动生成全面测试用例, 模拟用户操作进行压力与性能测试, 并分析结果生成报告^[3]; 还能辅助需求文档撰写与设计, 提供初步文档和创意设计。鉴于 AIGC 在教育与软件产业领域的双重显著优势, 将 AIGC 应用到高校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培养中迫在眉睫。

产业变革下, AIGC 技术已深度融入企业软件开发各环节, 高校若不将其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学生将难以掌握前沿技术、适应企业需求, 而引入 AIGC 技术能培养复合型人才, 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缓解就业压力。AIGC 技术通过个性化教学和丰富资源激发学习兴趣, 助力教师创新课堂。AIGC 技术能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同时推动校企合作和教育改革,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

(二) 研究现状述评

目前对于 AIGC 技术的研究多聚焦于技术本身的发展态势, 以及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初步应用尝试, 如利用 AIGC 辅助开发教学资源, 生成课件、试题等^[4]。在高校层面, 特别是应用型高校, 关于如何借助 AIGC 技术培养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的研究相对匮乏^[5]。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 未能充分结合 AIGC 技术发展趋势以及行业对

作者简介: 程文婷(1988—), 女, 河南郑州人,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软件工程。

彭文正(2001—), 女, 河南新乡人,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学生。

软件开发人才的新需求,对学生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进行精准界定与更新。课程体系上,传统学科界限依然明显,缺乏与 AIGC 技术深度融合的跨学科课程设置,难以满足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对综合知识与创新能力的需求。教学模式依旧较为传统,未能有效探索出 AIGC 技术支持下的新型教学模式,如智能辅助教学、基于 AIGC 的项目式学习等。评价体系也未能及时适应 AIGC 背景下人才培养的要求,对学生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创新思维、实践动手能力以及运用 AIGC 技术实际问题能力的评价不够全面、科学^[6]。

二、AIGC 赋能的技术框架

AIGC 赋能高校软件开发人才的培养的技术框架主要包含技术支持、教学场景和人机交互。

首先是技术支持,通过大语言模型如 GPT-4、Codex、通义灵码等可以生成代码,开发工具如 idea 中可以通过安装大预言模型插件自动生成代码、注释或者帮忙解决项目中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些低代码/无代码平台如若依、GitHub Copilot、阿里云宜搭可以快速构建系统原始模型,降低开发门槛^[7]。

其次是教学场景,AIGC 可以自动生成课件、习题、代码示例,如清华大学“智谱教育”。AIGC 可以生成需求文档、自动测试用例等。AIGC 还可以动态评估系统,如分析代码的质量、对学习行为进行跟踪。

最后是人机交互,学生可以通过对话获取编程指导,例如“帮我解释下这段代码”、“对这段代码进行优化”。还可以结合 AIGC 生成三维可视化开发场景。

三、高校软件开发人才培养现状与问题

在软件开发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但当前许多高校的课程体系仍过度偏重传统计算机科学理论教学,未能与时俱进地融入现代软件开发实践内容。软件开发所使用的技术和知识更新迭代比较快,教学资源更新滞后,新技术内容平均延迟 2-3 年进入课堂;实践教学多采用模拟项目,缺乏真实产业场景的复杂工程训练;评价体系偏重代码实现,忽视系统设计、工程管理等综合能力。

传统软件开发人才培养存在很多的问题:2023 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数据统计,78%企业反馈毕业生需 3-6 个月适应期,适应期过长;教育部 2022 年调研,65%高校存在实验设备不足、企业级开发环境缺失;教师产业经验更新速度慢于技术演进速度和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显著“最后一公里”,亟需通过 AIGC 等技术赋能构建新型培养范式。

四、AIGC 赋能的实践范式构建

(一) 范式设计原则

AIGC 赋能高校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实践范式的构建,以“以学生为中心、动态适应、产教协同”三大原则为核心理念。基于学习分析为每位学生定制差异化方案,智能生成适级编程任务和个性化资源推荐;实现教学内容动态调整,根据学习表现实时优化难度并生成补充资源;构建产教协同新机制,通过行业大数据分析动态调整技能培养重点,支持企业远程参与课程设计,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完成真实产业项目。系统通过建立动态学习档案和持续进化机制,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动态适配、产教融合”三位一体的智能培养模式。

(二) 具体实践路径

AIGC 赋能的高校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四位一体”的实践路径实现创新突破:以课程内容智能化重构为基础,以教学模式数字化转型为核心,以实践体系产教融合为支撑,以评价机制动态优化为保障,构建了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新范式。

使用 AIGC 技术赋能高校软件课程内容改革。在课程整合方面,编程基础课引入通义灵码等 AI 工具实现智

能代码补全与错误检测；软件工程课程则应用 AI 辅助的 UML 生成、架构评审等功能；同时增设“AIGC 与软件开发”专题模块，系统培养 AI 时代的开发素养。在教学资源建设上，利用 AIGC 动态生成符合技术发展趋势的代码案例和技术文档，开发能自适应调整难度的交互式教材，并创新性地构建融合图文、视频和可执行代码的多模态学习资源。

使用 AIGC 技术重塑软件开发课程的教学模式。在翻转课堂创新方面，构建了“生成-优化-强化”的三阶段教学闭环：课前学生运用 AI 工具自主生成解决方案；课堂聚焦 AI 产出的批判性分析和优化；课后通过智能推荐系统实现个性化巩固。在协作学习维度，AI 技术贯穿小组项目全流程：头脑风暴阶段提供创意激发，任务管理环节智能分配工作，进度跟踪实现动态调整。同时，AI 助教系统为小组讨论提供实时知识支持，基于 AIGC 的互评机制则能生成结构化反馈。

使用 AIGC 技术重构软件开发人才培养的实践体系。通过虚拟项目开发平台，系统能智能生成与学生能力匹配的项目需求文档(包括用户故事和功能规格说明)，并自动产出完整的测试用例集，有效支持测试驱动开发(TDD)的工程实践。平台还创新性地引入虚拟客户系统，模拟真实项目中的需求沟通和验收流程。同时，构建了“基础-进阶-创新”三级实践框架：基础层侧重 AI 辅助的编程训练，进阶层开展跨学科综合项目，创新层则对接真实产业问题开展毕业设计。

通过 AIGC 技术变革软件开发人才培养评价机制。该评价体系突破传统单一考核模式，构建了覆盖技术能力、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多维评估框架：通过静态代码分析和动态过程追踪，自动化评估代码质量、架构设计等专业技术能力；基于版本控制系统数据，智能分析学生的代码贡献、团队沟通等协作表现；同时引入 AI 方案优化度评估，量化学生的创新思维水平。依托区块链技术建立可信的学生能力数字证书，并生成可视化成长档案——包括动态更新的能力雷达图、个性化提升建议以及职业发展预测。

五、实证案例及效果分析

以软件项目开发综合实验课程为例，在课程中使用若依低代码平台、通义灵码、豆包和 DeepSeek 设计开发并设计一个夕阳红智能养老管理系统。首先学生自主组队，小组合作先使用豆包等大语言模型对智能养老管理系统进行需求分析。然后使用若依框架构建项目原型，项目原型中包含后台管理类型项目常用的功能：基于 RBAC 模型的权限控制、数据字典、监控相关功能、定时任务、代码生成、表单构建、在线接口文档。其次使用代码生成工具对常见的增、删、改、查、导入、导出等功能进行前后端代码生成。但这些基本的功能并不能满足丰富页面及功能的需要，这时候就需要引导学生在 idea 中安装通义灵码插件，根据文字输入生成对应的功能代码，然后再使用通义灵码进行智能代码补全与错误检测，效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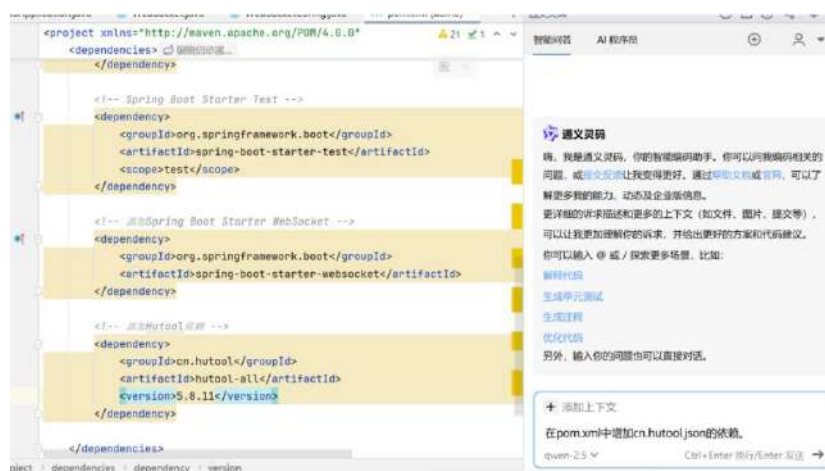


图 1 使用通义灵码插件生成需要的代码

接下来本地安装 DeepSeek 大模型，并在智能养老管理系统中集成 DeepSeek 大模型进行健康评估。在系统页面上传体检报告，代码解析体检报告内容，根据体检报告内容生成提示词，把提示词作为入参调用 DeepSeek 大

模型接口得到体检报告的分析结果，DeepSeek 分析中等待效果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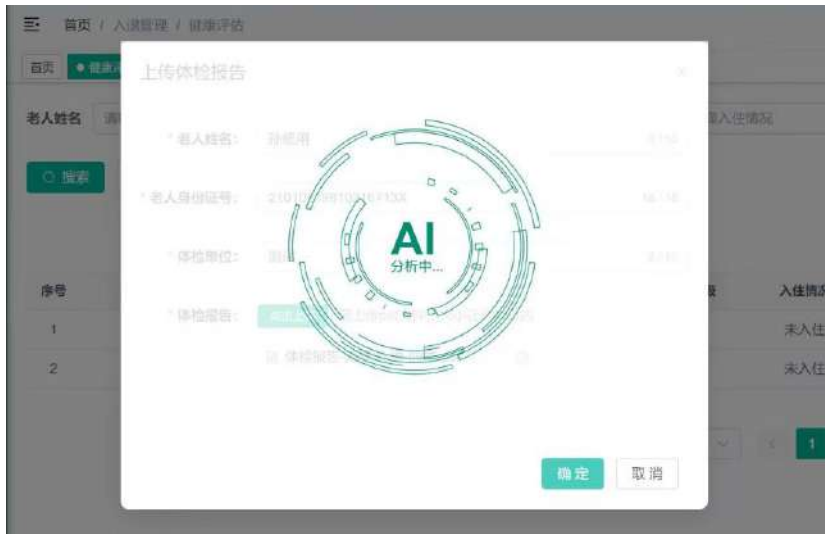


图 2 集成 deepseek 大模型分析中使用图表形象的展示解析后的结果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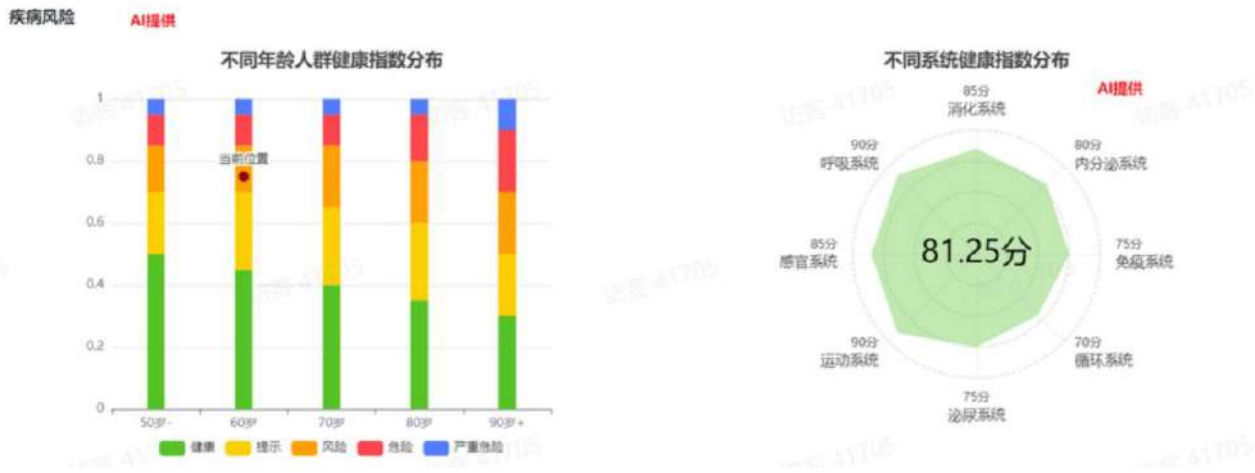


图 3 集成 deepseek 大模型分析后 AIGC 引入到项目开发综合实验课程后，软件开发效率和学习效果得到双重提升，详情如图表 1 所示：

表 1 软件开发效率和学习效果提升详情表

效率指标	传统方式 (基准)	引入 AIGC 后的提升	提升幅度	说明
代码生成效率	100 行/人天	300-500 行/人天	200%-400%	AIGC 工具自动补全代码，减少重复劳动。
需求分析时间	10 小时/需求文档	4-6 小时/需求文档	40%-60%	AIGC 辅助生成用户故事、用例描述。
测试用例生成覆盖率	60%-70%	85%-95%	25%-35%	AIGC 自动生成边界测试用例，提升代码健壮性。
Bug 修复响应时间	2 小时/Bug	0.5-1 小时/Bug	50%-75%	AIGC 分析日志并推荐修复方案，加速调试。

学习新技术成本	15 小时/新技术栈	5-8 小时/新技术栈	47%-66%	AIGC 生成示例代码和即时解答问题, 降低学习曲线。
学生代码理解深度	中等 (依赖教师讲解)	高 (AI 实时解释代码逻辑)	显著提升	AIGC 工具 (如 ChatGPT) 提供即时代码解析, 帮助学生理解底层逻辑。
任务完成积极性	较低 (易遇挫放弃)	较高 (快速获得正反馈)	显著提升	AIGC 加速开发流程, 学生更易看到成果, 增强信心。
课后自主学习时间	2-3 小时/周	4-6 小时/周	50%-100%	AIGC 提供 24/7 支持, 学生可随时解决问题。

六、结语

AIGC 技术为高校软件开发人才培养带来显著变革, 一方面提升教学效率, 通过智能代码生成、个性化辅导等功能强化学生实践能力, 促进“学生中心”教学模式转型; 另一方面优化培养流程, 缩短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路径, 更好对接行业需求。但同时也需要警惕潜在风险, 例如: 学生可能过度依赖 AI 导致基础能力弱化, 生成内容存在准确性质疑, 以及学术伦理问题。因此, 未来需要在优化教学设计、建立 AI 使用规范、加强教师培训、动态评估与调整等方向进行改进。总之, AIGC 在软件开发教育中的应用需谨慎平衡“技术赋能”与“能力培养”, 避免工具替代思维, 才能真正实现其教育价值。

参考文献:

- [1] 张晓燕, 朱晓娜, 刘艳. “AIGC+教育”模式在高校教学中的具体应用[J]. 山西开放大学学报, 2025, 30(02): 71-74.
- [2] 陈辉, 王翔, 夏露. AIGC 背景下, 软件开发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 工业控制计算机, 2025, 38(04): 151-153.
- [3] 肖丰佳. AIGC 技术在软件测试中的应用探讨[J]. 工业控制计算机, 2024, 37(04): 82-84.
- [4] 冯仰存. AIGC 赋能教学创新: 时代意蕴、实践进路与风险挑战[J]. 中国民族教育, 2025, (02): 37-39.
- [5] 陈辉, 王翔, 夏露. AIGC 背景下, 软件开发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 工业控制计算机, 2025, 38(04): 151-153.
- [6] 王向辉, 刘毅, 孙倩.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探索[J]. 计算机教育, 2024, (12): 34-39+44.
- [7] 胡媛. 大模型代码能力究竟怎么样? [N]. 通信产业报, 2024-01-15(012).

Research on Practical Paradigm of AIGC-Enabled Cultiv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Tal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WenTing Cheng¹ WenZheng Peng¹

¹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Zhengzhou Shengda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radigm of applying AIGC technology in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tal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By constructing a "four-in-one cultivation system" (intelligent re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odel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practice systems, and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evaluation mechanisms),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have been achieved. Empirical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AIGC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both softwar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learning outcomes.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e need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dependency and ethical risks, while propos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cluding optimized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establishing usage norm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talents in the AI era.

Keywords: AIGC; software development;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高校体育公共课与思政建设的推进路径

唐嘉欣¹

(1.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上海 金山 201514)

摘要: 高校体育公共课与思政建设的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当前, 体育公共课与思政教育结合不足, 存在思政元素挖掘单一、课程思政未贯穿教学全过程、教师思政能力欠缺等问题。推进路径包括: 加强顶层设计, 将思政目标纳入教学大纲; 创新思政元素挖掘方式, 分类设计术科与学科课程思政内容; 提升教师思政教学能力, 开展专题培训与跨学科合作; 构建多元评价机制, 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发展。通过多措并举, 实现体育与思政教育的协同育人, 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 高校; 体育公共课; 思政建设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89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 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形成协同效应, 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新格局^[1]。高校体育公共课思政建设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体育公共课具有覆盖面广、学段长的特点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2]。高校体育公共课思政课程是全面发挥以体育人的必然要求, 体育在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3], 通过体育练习和竞赛既能磨练其身体, 又能磨练其意志品质, 在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中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和体育品德, 使学生在人格塑造和三观建立中受到正确积极的影响, 但当前体育公共课与思政教育融合不足, 亟需优化路径。

1. 高校体育公共课与思政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1.1 现状概述

长期以来, 很多高校体育课课时不足, 无法达到教育部关于体育课必须上满 144 学时的要求^[4], 高校体育课程体系单一, 学生只想选择简单且容易通过的体育课, 只注重学分的获得。

近年来, 全国体质健康测试结果表明, 高校学生的体质测试成绩仍然不容乐观, 其大概原因在于, 第一: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为选修课, 课程内容受学生兴趣爱好和难易舒适程度影响, 体育课上学生能够达到的运动强度较低, 无法达到有效的锻炼效果。第二: 学校对于学生体质测试成绩的重视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 尤其对于未达标学生的处理更是会间接影响学生对于体育课的重视程度。第三, 高校体育公共课未有像中小学一样有统一的课程标准, 可以根据其进行体育与健康的课程设计。

1.2 存在的问题

高校体育公共课与思政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思政教育与体育课融合不足, 思政元素挖掘方法单一, 课程思政未贯穿教学全过程, 以及教师思政能力不足甚至不重视课程思政的开展。

1.2.1 思政教育与体育课融合不足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目前仍停留在教授学生运动技术, 锻炼并提高学生的体能层面, 再往上一个层面则是帮助

作者简介: 唐嘉欣(1999—),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青少年体育与健康。

学生树立终身体育的思想,并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5]。思政教育与体育课的结合应该体现在通过某项运动的学习健全学生人格,锤炼学生意志方面。而目前的情况是运动技能的学习让学生产生了畏难情绪,并且只在乎是否能够体育课及格,不但对体育课没兴趣,而且厌恶体育课的强度练习。体育课只注重技能的培养,忽视了体育素养的塑造,国家层面还未出台针对体育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专业指导意见^[6]。

1.2.2 思政元素挖掘方法单一

很多高校的学生通过大学三年的体育学习,依然没有完全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而且体育理论知识依然匮乏。说明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成果微弱,学生参与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不高,甚至体育公共课有“放羊”的现象存在,没有将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教育贯穿整个体育教学过程中,欠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理想信念为重点,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育思政建设,更没有与其不同的体育运动项目文化相结合,以突出以体育人的价值功效^[7]。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的元素来源有书本教学、学生经历以及体育精神,体育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抓住“身”和“心”这两大主题,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8]。

1.2.3 课程思政未贯穿教学全过程

截止到目前,高校体育教学理念一直被常规的教学模式所束缚,重视竞技训练忽略理论的重要性,不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程设置应先学习其关于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等的理论知识^[9],提升学生对于体育锻炼的科学性,从而提高学生在体育领域的综合素质。通过教学改革,引导学生对体育的理解,关注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鼓励学生自我挖掘体育的价值。教师将健康知识 with 体育教学相结合,注重学生体能与运动技能的培养,在高校体育的教育领域,评估是教育过程的关键,也是学生最看重的部分。以往的评估方式侧重于传统的技术考核,容易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终导致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也难以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制定带有体育思政有针对性的教学,可以更好的帮助学生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也能教会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观。

1.2.4 教师思政能力不足甚至不重视课程思政的开展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师资力量,体育教师是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实施的主要执行者^[10],其体育教师思政育人能力决定了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11],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教师在体育教学中难以拓展体育思政的内容,且存在一定的“非专业性”,导致难以实现体育思政课程的开展以及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体育教师思政育人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教师缺乏思政育人的实战经验^[12],课程思政高度不够^[13],对于课程思政源于课堂本身的认知不足^[14],专业技能与思政育人难以紧密结合等^[15]。

2. 高校体育公共课思政建设的内在要求

高校体育公共课思政建设的内在要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专业教育与价值塑造统一,显性目标与隐形渠道结合,分类指导与统筹协调相统一,总结传统与创新探索相统一。

2.1 专业教育与价值塑造统一

体育技能培养与价值观教育并重。通过一学期的体育课来实现学生运动技能的提高和体能体型的改善,从而达到增强学生自信自尊、增加同学间的沟通交流合作、学会调节情绪以及提高道德水平等。体育课具有重要的社交属性,能够帮助学生之间增进情感交流,通过群体性的体育活动可以大大提高团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集体荣誉感,特别是对于能够担任集体领导者的学生,有助于提高他们领导、组织、协调的能力。

2.2 显性目标与隐形渠道结合

通过优化课堂教学、课外活动、运动项目文化、体育精神等隐形渗透思政内容。大学生的体质测评是高校公共体育课的任务和目标之一,老师通过学生实际的情况结合运动项目,在课内外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从而达到体质测试的标准,而部分学生平时不爱锻炼,能躺绝不站,意志薄弱还存在心理健康障碍,甚至患有焦虑、抑

郁等病症, 体育课对于改善学生这些情况具有它自己的优势, 它既能够促使学生克服懒惰恐惧的心理, 还能培养学生勇于挑战自我、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甚至是缓解学生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分泌多巴胺补充快乐的正能量。

2.3 分类指导与统筹协调相统一

高校党委在体育公共课思政建设中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将其纳入学校总体规划, 同时依据课程特点进行分类指导, 满足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根据课程类型如球类、武术等差异化设计思政路径。

2.4 总结传统与创新探索相统一

对体育公共课思政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传统, 形成成熟模式, 同时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新探索, 丰富课程思政资源和教学方法。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应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 形成信息流通与教育资源的有效融合, 搭建完整的资源共享平台, 运用最新的人工智能科技实现高校体育思政与体育教学资源的均衡配置, 具体可以运用虚拟现实 (VR) 和心率监测以及增强现实 (AR) 等技术营造情景化的体育教学氛围, 促进高校体育思政的具体化数字化进程, 形成体育思政教学资源的有效共享^[16]。

3. 高校体育公共课与思政建设的推进路径

高校体育公共课与思政建设的推进路径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 创新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方式, 进而提升教师思政教学能力, 最后构建评价与反馈机制。

3.1 加强顶层设计

将思政目标纳入体育公共课教学大纲,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成立校级体育课思政建设领导小组, 统筹多部门资源; 打造“学科精品-专业优势-课程特色”的体育思政体系, 学校的课程思政体系为各学科的思政建设提供基础保障和明确的方向^[17], 推动“示范课程-示范专业-示范高校”协同发展; 建立校级体育思政资源库, 促进优质案例互通, 将体育竞赛活动融入学校体育工作, 学生通过体育竞赛, 能够学会面对困难迎难而上, 形成强大的自我内核。

3.2 创新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方式

3.2.1 分类挖掘

体育课程思政分为术科类课程思政和学科类课程思政, 术科类的如: 体操课程思政、武术课程思政; 学科类的如: 运动训练学课程思政、运动心理学课程思政^[18]。集体项目如啦啦操、拔河强调团队精神; 个人项目如田径、网球突出拼搏意志; 民族传统体育如舞龙舞狮、龙舟融入文化自信。高校体育教学体系在新时代体育强国的战略背景下, 迫切需要新的变革。体育教学是学生体育知识和技能掌握的主要过程, 也是体育思政的重要实践^[19]。体育教学实践可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将体育精神与民族精神紧密联系, 深入探索传统体育项目并加以实践, 研究并挖掘其内在的独特教育价值, 加强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增强民族体育精神, 为体育强国建设添砖加瓦。这也是体育思政的主要目的之一。思政元素应结合体育学的具体课程特征, 挖掘并提炼包括科学精神、辩证思维、责任担当、创新发展、顽强拼搏、以人为本、协同配合以及与时俱进等八个思政元素^[19]。

3.2.2 数字化手段

利用“互联网+”打造体育思政案例库如冠军故事微视频, 女排精神的宣传等。完善教学全过程融入如课前: 在教案设计过程中明确思政目标, 设计情景化教学案例; 课中: 通过比赛、小组合作等方式自然渗透思政内容; 课后: 结合志愿服务 (如社区体育指导) 深化实践育人, 坚持体育强国的发展战略, 全方位促进体育思政课程的构建, 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体育规则三大要素融合, 塑造别具一格的体育思政课程文化体系, 并通过策划组织体育竞赛、开展体育学术交流、举办体育知识讲座、体育主题展览等活动, 营造浓厚的体育思政文化氛围, 加强宣传报道, 推广体育思政理念, 让学生潜移默化的接受体育思政的熏陶。

3.3 提升教师思政教学能力

依托各级教研平台,开展专题培训;建立“体育+思政”跨学科教学团队,促进经验共享,强化高校体育教师思政队伍的建设,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教学活动的实践者,其专业能力和素养直接决定体育思政的高度和广度,高校应该加强体育教师体育思政的专业培训,定期组织高校间的体育学术交流与思政研讨活动,鼓励高校教师创新教学的方法,不断促进其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高校体育教师实现体育思政的普及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有效提高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方法有定期开展师德师风讲座、学习四有教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教师的自身政治素养和道德风尚,鼓励学校教师积极组建课程思政教学团队,由体育老师为专任教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以及辅导员积极辅助,共同研讨挖掘体育公共课中的思政元素,并研究课程思政的教学大纲和具体实施的方案^[20]。

3.4 构建评价与反馈机制

引入多元评价如学生反馈、同行评议、增值性评价;长期跟踪监测及定期开展思政教学效果监测,动态调整实施方案,完善体育公共课思政教学研究示范标准,提高建设质量。高校体育教学评价体系应当突破传统的单一技能考核模式,构建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框架。在保留原有体育知识和技能评估的同时,需要将健康行为养成、体育道德素养、心理素质发展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综合素质纳入评价范畴,形成涵盖“知识掌握、能力发展、行为养成、健康促进”四位一体的评价体系。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新型评价模式应当重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与进步,通过动态化、全程化的评估方式全面反映学生的体育素养发展状况^[21]。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以价值引领渗透全过程为基本,根据实践具体情况建立思政目标和基本要求,细化思政评价的具体指标,最终以评价结果的正确运用为根本,即对学生思政素养的提高有明显的增效作用^[22]。

4. 结束语

高校体育公共课与思政建设的有机融合,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使命的关键环节。体育课程以其广泛的覆盖面和突出的实践性,成为开展思政教育的绝佳平台,能借助体育锻炼与竞赛活动,培育学生的意志品格、团队意识和文化自豪感。不过,目前高校在体育公共课与思政教育的结合方面,还面临着思政元素提炼不够深入、课程思政未能贯穿教学始终、教师思政教学能力不足等挑战。对此,需要做好顶层规划,高校要把思政教育目标融入体育课程的教学大纲,组织专门的领导小组来协调各类资源。其次革新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方法,体育课程可划分为术科和学科两类,要依据不同项目的特性,分别设计思政教育的融入路径。再者提高教师的思政教学水平,高校应通过专题培训、跨学科团队协作等形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激励教师探索创新教学方法。最后建立完善的评价与反馈机制,要打破传统的单一技能考核模式,构建包含知识掌握、能力提升、行为表现、健康状况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体系,重视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总之,要实现高校体育公共课与思政建设的深度融合,需要从顶层设计、教学创新、师资建设和评价完善这四个方面共同发力,构建起全员参与、全程覆盖、全方位渗透的育人模式,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EB/OL]. [2025-07-04].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 [2] 赵富学.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审度、行动反思与路向优化[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11):32-42.
- [3] 徐焕喆,赵勇军.新时代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任务及措施[J].体育文化导刊,2022,(02):98-103.
- [4] 李欣,冉建,张象,等.“健康第一”视角下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探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23,37(05):79-90.
- [5] 韩改玲,朱春山,孙有平,等.运动训练学课程思政元素及其融入课堂教学的实践探索[J].体育学刊,2022,29(01):111-117.
- [6] 董翠香,熊明亮,韩改玲,等.体育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遵循与推进路径[J].体育学刊,2025,32(02):106-113.
- [7] 邢炜,张瑛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价值意蕴、目标导向与实践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43(06):58-61.
- [8] 洪晓彬,李金坤,祝捷,等.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政的依据、资源与路径探索[J].体育学刊,2024,31(01):110-117.

- [9]汪晓赞,徐勤萍,杨燕国,等.高校体育专业理论课程的改革实践与KDL教学模式生成[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5,49(01):45-54.
- [10]赵富学,焦家阳,赵鹏.“立德树人”视域下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要义与践行向度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03):72-81.
- [11]徐成立,罗秋兰,孙军,等.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21,(09):98-104.
- [12]姜卫芬,刘文烁.新时代推进体育课程思政改革的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36(04):435-441.
- [13]李在军,刘美,赵野田.课程育人:高校体育类专业课程思政特征、难点及应对策略[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03):18-24+32.
- [14]高德毅,宗爱东.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7,(01):43-46.
- [15]刘纯献,刘盼盼.体育课程思政的内容、特点、难点与价值引领[J].体育学刊,2021,28(01):1-6.
- [16]陈雨婷.高校体育教学发展演进的现代化审视[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5,24(01):71-76.
- [17]王琳,张亭立,张黎声,等.高等中医药院校二级学院课程思政工作评价体系思考[J].中医教育,2023,42(01):70-74.
- [18]刘如,欧亚,方倩倩.体育课程思政:何谓、为何与何为——基于CNKI的系统性文献综述[J].体育研究与教育,2023,38(02):7-18.
- [19]韩改玲,朱春山,孙有平,等.运动训练学课程思政元素及其融入课堂教学的实践探索[J].体育学刊,2022,29(01):111-117.
- [20]刘辰,葛萍.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构建与效果提升[J].职业技术,2025,24(04):103-108.
- [21]丁源源.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趋向、内容与实践路径研究[J].青少年体育,2022,(11):37-39.
- [22]胡庆山,向彪,王维.专业认证下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理论逻辑、现实审视与策略因应[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11):45-53.

Promotion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ang Jiixin¹

¹Shanghai Zhongqi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Jinshan, Shanghai, China

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E) courses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serves as a crucial pathway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Currently, however, the synergy between P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remains inadequate, marked by issues such as oversimplified extraction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failure to embed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and insufficient ideological-pedagogical competence among instructor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following advance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by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political objectives into the PE curriculum framework. Innovate approaches to extract ideological elements, with categorized designs f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urse content. Enhance teachers' ideological-pedagogical capacity through specialized train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Establish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mechanism that prioritizes students' holist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se coordinated measures,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PE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fully realized, cultivating well-rounded, high-quality talents.

Keyword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E)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中英高校钢琴教学体系比较研究：理念、课程与评价机制

邹鸣民¹

(1.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 随着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迅猛发展, 钢琴教学体系在理念、课程设置与评价机制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与英国高校的钢琴教学实践, 分析其在教育理念、课程结构和评价方式上的核心差异与互补特征。研究选取中国南昌大学音乐学院及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皇家音乐学院等代表性院校, 采用文献分析、教学文件比对与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 系统梳理了两国钢琴课程的制度特征与实施效果。结果显示, 中国高校强调技术训练的系统性与规范性, 而英国高校则更注重个体差异、创造性表达与过程性评价。基于此, 本文提出融合式改革建议, 倡导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系统与个性并重”的高校钢琴教学新框架, 并展望了未来的钢琴教学国际化与跨文化教学交流相关事宜。

关键词: 高校钢琴教学; 中英比较; 教学理念; 课程设置; 评价机制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22

1 引言

传统的高校钢琴教学多是以教师为主导, 注重技能训练、作品演绎、考级训练的教学模式, 教师通常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和范奏者。此种教学在技术传承和演奏技能稳定提高方面确有好处, 但是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 如学生被动参与、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差异、教师的授课方向和学生主动表达的互动性单一、缺乏创新性与批判性^[1]。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国际高等教育思潮之下, 近年来艺术教育教学也趋于从传统“讲授-接受”式的教学关系发展成“互动-协同-生成”的多元学习模式, 特别是在英国的钢琴教学课程中, 教学设计上偏重学生自身的探索性、个性化及跨领域的多样性学习, 重视学习过程中的反思性与成长性, 呈现出课程繁多、评价丰富、互动密集的教学生态^[2]。

此外, 国内高等院校也开始逐步尝试基于混合式教学、项目化学习等教学方法的教育教学改革, 以期从动机、自主练习、舞台表现力等方面促进学生主动学习^[3]。但在实际教学工作中, 课程内容固化、教师理念固有、教学资源不配套等也导致了“学生中心”不能全方位贯彻落实。

因此, 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和归纳中英高校钢琴教学的三个层面, 即教学理念、钢琴教学课程设计和考核方式方面的差异和相同之处, 寻找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找到教学改革可以实施的方向, 为中国的高校钢琴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实验参考和导向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研究背景与理念转型

钢琴教学作为教育活动, 也应顺应由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这一世界教育潮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已成功应用于英国高等教育艺术类课程设计中, 并要求学生在分析、表述、创造方面能够具备主动性^[4]中国近些年逐渐开始借鉴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但是教师主导式教育及以灌输为主要手段的教学方式仍然被广泛使用^[5]。

瑞泽(2025)依据对中国高校钢琴课教现状的观察研究, 说明中国高校钢琴课现阶段仍然重视钢琴技能的灌输

作者简介: 邹鸣民(1990-),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

和演奏,较少对学生创造性表达与批判性思考施以系统、正式的指导与训练;中国学生的学习动机受父母的期待与评价导向的影响仍然较大,制约了课程个性化的发展^[6]。

2.2 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比较

此外,英方课程在设置上更注重阶段性的实践项目、合作学习与综合实践。高原(2023)探讨了英国钢琴专业实践性教学中“模块”的设置,加入了听与闻、合奏、舞台表演和作曲作业,允许学生自行规划自己的方向^[7];中国的课程仍是简单的技能训练和考级备考^[8]。同样,混合教学模式普遍应用于英国钢琴教学中,为“线上教学—线下一对一辅导—同伴间的协作反馈”的闭环^[9]。而我国混合式教学实践更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完整化的课程模型与教学平台匹配^[10]。

2.3 评价机制:过程性与多元化趋势

近年来,中英高校均对过程性评价及自我反思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度。黄燕(2024)表示英国教学常常利用“学习笔记”“小组评分”和“口头表述”的方式为学生综合性地表现能力并重视成长性和个体性^[11]。而罗蕾(2023)表示我国的大学钢琴教学的终结性评价依然以期末考核和舞台演奏为主,仍未建立起完善的多维评价体系^[12]。

Wang (2025)尝试利用分析钢琴曲目的难度指标评定自动化评价方法,认为结合 AI 分析的数据可以为钢琴的下一步评估方式提供技术支持^[13],人工智能辅助个性化的评估、反馈机制会成为后疫情时代钢琴教学的一部分^[14]。

2.4 教师角色与专业发展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有效变革取决于教师的教学角色与教学能力的转变与提升。冯昕(2021)报告英国高校教师有“促进者、设计师、伙伴者”等角色承担,需要有课程设计能力、数码媒介使用能力、国际理解教学能力等多方面的能力和态度^[9]。然而,陈曼(2020)报告中国钢琴教师角色均以钢琴演奏者和钢琴技术性知识传授者为主,缺乏有系统的更新教学观念及提升教学能力的机制^[15]。

2.5 研究不足与发展趋势

现有研究虽然分别就教学理念、课程、技术层面从不同角度对钢琴教学改革进行探讨,但以系统为内涵展开的英中式钢琴教学对比性研究较少,特别是在教学策略迁移路径、课程评价机制以及师资发展模式的英中式对照研究方面更是少见^[16]。同时多数实证研究仅仅是在单所高校中展开,难以代表性和普适性。

今后可继续围绕以下研究空白加强探讨: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跨国课程评价指标;关于 AI 与音乐教学的嫁接问题和评价可能性探讨;提出可行的师训培养制度,实现“观念——实践”的双重变革。

3 研究方法

为了对中英大学钢琴教育的区别和一致性的探究,本研究采纳了以下研究方法:

3.1 比较研究法

该研究选择了体现典型性中英两国高等院校作为空间维度,以中国南昌大学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模式^[17],以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皇家音乐学院为研究对象的英国音乐教育模式^[18]。通过对两所大学教学理念、课程框架和教学评价政策文件及教育实践进行比较性研究,体现两种体系结构的异同和发展逻辑。

3.2 质性分析法

调研各校官方课程教学大纲、人才培养方案、学生手册等文本资料,通过半结构访谈收集钢琴专业教师及学生的反馈,调查其对课程知识的课程设置和上课情况、学生对课程的体验以及课程的学习效果等访谈数据,访谈数据内容将通过主题编码法归纳,并聚焦、提炼问题主题和规律。

3.3 案例对比分析

分别选取较为典型的钢琴课程进行对比,如主修钢琴课 (Principal Study)、室内乐课程 (Chamber Music)、

钢琴教学法 (Piano Pedagogy) 等课程, 探讨它们的教学目标、教学组织、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等, 对照对比不同高校各学科的教学安排及教学实施情况, 评价其育人导向、对学生能力结构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调研内容及研究对象的比较和分析, 形成具有整体性及全面性的中、英高校钢琴课堂教学体系对比结构, 从而为高校钢琴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4 比较分析

本部分围绕教学理念、课程体系及评价机制三个维度, 系统比较中国与英国高校钢琴教学体系的差异与启示。

4.1 教育理念对比

中国的高校音乐学院仍然将本科钢琴的课程按“训练技巧”来要求, 每学期必须演奏一些练习曲、奏鸣曲、协奏曲等来提高技巧, 曲目的弹奏讲究技巧和准确性。教学过程中呈现出很强的“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模式, 教师的示范和纠错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 学生多以教师的演示为主, 主动性和创新性表现不强^[1]。相比之下, 英国高校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强调“艺术家个体的独立发展”, 倡导钢琴演奏的个体风格与音乐表达。在课程中融合音乐心理学、跨文化视角与自我反思机制, 鼓励学生在演奏中形成独立判断与艺术个性, 允许学生将爵士、世界音乐等纳入演奏曲目范围。鼓励学生提出“个人项目计划”, 并自主设计学习路径。教师更多扮演“引导者”角色, 通过引发问题、设置挑战任务来促进学生成长^[9]。

4.2 课程体系对比

在课程设置方面, 中国高校钢琴课程多采用刚性学分与固定模块, 常见课程包括主修钢琴课、技巧训练、视唱练耳、音乐史等, 每周两次个别课, 同时配有钢琴文献、伴奏课等, 课程安排相对固定, 强调专业深度, 但课程自由度相对有限。选修课程种类少, 课程内容较为统一, 学生自主学习路径选择空间有限^{[16][17]}。英国的大学则推出了与之对应较为科学、弹性的课程设置, 不仅在专业课程设置之外增加了钢琴教学法、即兴弹奏、协奏表演、多媒体创作、音乐产业等, 而且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兴趣和方向选择性学习, 加强音乐综合能力和跨界能力。另一方面, 英国课程结构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如协奏、音乐演出、音乐会组织等实践性课程相对比较突出^{[7][1]}。

4.3 评价机制对比

中国钢琴课程普遍采用以期末考试为主的结果性评价机制, 评判标准以演奏技巧、音准节奏、风格把握和背谱完成度为主。尽管近年来部分高校尝试引入平时成绩、课堂表现等过程性评价要素, 但过程性评价较少, 教师反馈通常以课堂口头点评为主, 整体仍偏向“一考定优劣”的模式^[2]。而对于英国院校的评估机制来说, 多元化动态评估, 常常采取作品集(Portfolio)、演奏日记(Recital Journal)、阶段性作业呈现、小组内同伴互评等过程性评估, 也使用“作品集+演奏+反思报告”的综合评估, 不仅对于技巧性演奏予以评判, 而且还有音乐表现力、舞台呈现、学习反思能力、合作意识、参与同伴互评能力, 加上对学生评教、给教师建议等方式, 从而使教学得到不断改进, 更重视学习的过程与个性化的呈现^[11]。

5 访谈与调查结果

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南昌大学音乐学院和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本科学生的半结构式访谈及问卷调查得到了如下主要结果:

5.1 教师对当前课程目标与方法的评价

一方面, 中国高校钢琴教育工作者一致认为, 现有课程中的技术训练符合系统的、有效的特征, 能满足学生演奏基本技能上的过关。但同时承认它们的教学目标过于注重“奏得上”而“表达”“理解”不足。一些教师期待能增加钢琴教学法、钢琴心理学及钢琴跨文化演奏理解方面的课程模块^{[5][6]}。英国高校的教师则强调课程设计围绕“学生个体成长”, 通过探究性学习、小组研讨与个别指导实现因材施教。他们更倾向于将课程目标设定为: 激发学

生的音乐理解力、自我驱动能力与跨文化表达能力^{[7][9]}。

5.2 学生对课程实用性、灵活性与学习体验的反馈

中国学生普遍肯定钢琴课程对基本功与舞台应对能力的提升作用，但也表达出“课程单一”“缺乏自主学习空间”等困扰，尤其是课程内容与未来多元职业路径（如音乐教育、音乐治疗、跨界创作）之间的衔接不足^[8]。英国学生则对课程的开放性表示高度满意，认为多样化的课程模块与灵活的学习路径“更能贴近个人兴趣与职业发展需求”。他们也强调课程中“同伴合作”“反思写作”等形式提升了学习的参与感与自我认知^[9]。

5.3 评价机制透明度与激励效果对比

中国学生普遍认为当前的评分机制较为集中化和主观，部分学生反映“难以获取清晰评价标准”“考试导向性过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创新与探索的积极性^[12]。英国的学生普遍觉得评分体系“公开、公平，反馈详尽”，特别是对过程性成果（例如日志、阶段性报告、参与讨论）的重视，增强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责任感和成就感。教师反馈的及时性与多维度被认为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重要因素^[11]。

6 讨论与启示

从中英高等学校钢琴教育进行对比得出，它们在钢琴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模式上的建设有其优势和长处，但是又互相借鉴之处。在中国的钢琴教育上重视技巧的学习以及入门的学习成果，让学生们在钢琴技巧上得到基本保障；而英国方面则体现出学生的差异性以及内在潜质的激发，学生创造性发挥能力突出等特点^[16]。

对于中国高校而言，英式体系中“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尤其值得借鉴，包括：教学活动中给予学生更多自主权与表达机会；评价机制采用多元化方式，融入过程性评价、自我反思与同伴互评；鼓励学生将个人兴趣与演奏实践相结合，提升音乐学习的意义感。与此同时，英国的钢琴教学体系虽然注重创造性和个体发展，但在基础技巧系统训练的密度和强度方面，较之中国仍存在一定松散性。英方教师在访谈中也提及，部分学生在进入高年级后，存在技术瓶颈。因此，系统性基础训练的理念亦可为其教学体系补强提供有益思路^[4]。

本研究的比较启示我们：将中英教学体系中的优势因子加以融合，或许是未来高校钢琴教育创新的关键路径。

7 结论与建议

该研究通过对比中英两种高校钢琴教学框架体系，从教育思想、课程结构、教与学的互动和教学测评等方面展开对两种不同高校钢琴教学体系的详尽对比，并就教师和学生案例调查的结果发现两种高校钢琴教学体系在结构和效果方面的差异。中国体系强调“技术导向”与“统一标准”，英国体系重视“学生中心”与“多元表达”；中国提供强基础、重技巧的训练模式，英国则提供开放、多样、关注心理成长的教育理念。

因此笔者建议进行教学目标融合、教学理念融合与教学方法融合：建立“学本、统分”的教学理念和教学体系；在课程教学目标制订时重视技术与表现两者间的均衡；积极争取中外高校间的课程交流访问、教学方法交流互访；支持教师加强跨文化教学培训、增强适应国际化教学的能力。未来研究还可扩大调查高校数量，关注不设英语系国家以及不同风格类别的院校，论证本论文研究所发现的主要因素的普适性与区域性，以及与之融合的新媒体教学工具辅助教学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瑜刘.普通高校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与创新人才培养策略研究[J]. Educational Theory Observation, 2024, 2(4): 69-71.
- [2] 李岚.高校钢琴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路径[J]. 教学教法研究, 2024, 4(4).
- [3] 肖雅, 曾贵珍.高校音乐学专业学生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模式研究[J]. 发展教育学, 2022, 3(8): 137-139.
- [4] 陈欣, 赵晓生.英国钢琴教学体系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启示[J]. 中国音乐教育, 2021(06): 25-30.
- [5] 雅青张.新文科背景下高校钢琴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J].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2024, 2(5): 154-156.
- [6] 瑞泽.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改革策略研究[J].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2025, 3(16): 104-106.

- [7] 高原.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钢琴课程设置特点探析[J]. 音乐探索, 2023(01): 62-66.
- [8] 旭楠张.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以钢琴教学中, 拔尖人才培养为例[J].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 2024, 7(9): 99-101.
- [9] 冯昕.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钢琴教学理念探析[J]. 音乐艺术, 2021(09): 34-38.
- [10] 刘进.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钢琴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思考[J]. 当代音乐, 2021.
- [11] 黄燕. 英国音乐学院钢琴考核机制的特色与启示[J]. 音乐研究, 2024(02): 91-95.
- [12] 罗蕾. 高校钢琴课程国际化视角下的教学评价改革[J]. 中国高校艺术教育, 2023(12): 80-83.
- [13] Wang S. Hybrid models of piano instruction: How combin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ith personalized AI feedback affects learners' skill acquisition,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locus of control[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5: 1-23.
- [14] Song X, Phokha P.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Computing In "Piano Education"[J]. Journal of Ecohumanism, 2024, 3(7): 1648-1659.
- [15] 陈曼. 高校钢琴教学的中西比较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18): 110-112.
- [16] 马莉. 中英钢琴主修课程结构比较研究[J]. 艺术教育, 2022(10): 117-120.
- [17] 南昌大学音乐学院. 本科钢琴教学大纲[R]. 南昌: 中央音乐学院, 2021.<https://art.ncu.edu.cn/>
- [18] Royal Birmingham Conservatoire. Piano Faculty Handbook 2021-2022[R]. Birmingham: RBC, 2021. <https://www.bcu.ac.uk/conservatoi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iano Teaching Systems in Chinese and British

Universities: Concepts, Course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Zou Mingmin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the piano teaching system has shown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 in terms of concepts,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e differences and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in educational concepts, curriculum structure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by comparing the piano teaching practices in Chinese and British universities.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School of Music of Nanchang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the Royal Birmingham Conservatoire of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in the UK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comparison of teaching documents, and semi - 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adopted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piano course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emphasize the systematic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echnical training, while British universit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process - based evalu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integrated reform,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ramework for university piano teaching that is "student - centered and emphasizes both systematicness and individuality", and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iano teaching and cross - cultural teaching exchanges.

Keywords: University Piano Teaching; China - UK Comparison; Teaching Concept; Curriculum Setting; Evaluation Mechanism

基于能力本位教育的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实施路径研究

杜慧¹ 侯诗棋^{1,2} 王盼³

(1.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2.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063002; 3.唐山市丰南区西城学校, 河北 063399)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课程在中小学的广泛推进,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本研究从学生的能力角度(应用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及态度方面)出发,提出课程目标模糊、教学模式尚需创新、师资培养体系尚未建立、课程难以评价等现实困境,基于能力本位教育从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内容、方法、师资等方面探讨实施策略。建议政府、学校和教师分别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改进:研制完整的基础教育人工智能课程标准,明确课程目标和内容范围,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改善评价方式,开展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的课程融合,完善教师激励机制;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等。

关键词:能力本位教育;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人工智能课程建设; 实施策略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AI教师+教师教育者在地方师范院校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与路径研究”(2302057);唐山师范学院校基金项目(社科)-一般项目“教育强国背景下高师院校学科教师教育者学术困境与支持政策研究”(2025210901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13

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正在助推人类社会迈入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人工智能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全球以中国、美国为代表的AI“第一梯队”国家,以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等为代表的AI“特色发展型”国家,都在国家层面密集开展了AI研究布局和产业布局,出台了大量AI发展政策文件,广泛涉及AI人才培养议题^[1]。我国政府也在国家层面积极部署人工智能教育战略,例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2];《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完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使中小学人工智能和编程课程内容能充分适应信息时代、智能时代发展需要”^[3];2024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明确提出2030年前在中小学基本普及人工智能教育^[4]。在国家和教育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各地教育组织和机构纷纷投入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和人工智能课程建设,截至2022年,全球已有15个国家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国家课程体系^[5]。

《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指出“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大力推进基于任务式、项目式、问题式学习的教学。”在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是为未来社会提供更广泛的能力。然而,我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正处于“政策热”与“落地难”的夹缝中,其核心矛盾体现在:考试对高难度和大知识量的要求以及教师习惯于讲授式教学,使得项目学习、合作学习等教学方式的发展空间有限,在课堂教学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教师的教学理念还未转变,缺乏足够的教育背景和资格,他们对新的教学方法感到“无所适从”;学习成果评价仍以传统的知识测试为主,无法全面衡量学生在人工智能学习中的能力发展,现行考试模式难以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等。本研究以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为指导突破传统教育中“重知识轻能力”的局限,基于学生能力出发,重塑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目标、课时、课程体系及资源等,培养学生在技术、伦理、思维和责任等方面的素养,为未来社会的挑战做好准备。

二、能力本位教育的内涵及特征

作者简介:杜慧(1997—),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与教师教育;

侯诗棋(1986—),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

王盼(1987—),女,本科,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一）能力本位教育的起源及发展

有观点认为，20世纪20年代，工业的标准化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CBE的诞生提供了土壤^[6]。此后，CBE不断从泰勒、布鲁姆、卡罗尔和开放教室的理论中汲取营养，为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生根发芽蓄足养分^[7]。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联邦教育总署支持10所机构实施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师教育改革，开发小学教师培训示范项目和培养方案，标志着一场CBE理念引领的教师教育改革^[8]。自20世纪90年代起，CBE被推广到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成为全球教育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教育模式。1991年，通过中国-加拿大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CCCP），CBE教育思想和课程模式被引入中国，推动了我国在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随后，国内对CBE的研究和实践开始迅速发展，形成了一股“能力导向”的教育改革浪潮。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CBE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逐渐增加，尤其在人工智能教育、跨学科学习和素养教育等领域，CBE模式因其注重“知识—技能—态度”三位一体的培养方式，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趋势。

（二）能力本位教育的内涵

能力本位教育（CBE）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研究视角，对CBE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有学者认为能力本位教育是以结果为本位的教育，依据学习结果设计教学与评价模式，根据学习者对相应知识、技能、态度、价值以及行为的掌握情况授予相应文凭^[9]。也有学者认为“能力、质量、评价、学习、学习者为中心”是能力本位教育的主要特征^[10]。能力本位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通过完成具体任务来证明掌握了所需技能。具体来说，教育过程会设定明确的能力标准，学生需要通过实际操作或项目成果来展示这些技能。同时，教师会在学习过程中提供持续反馈，定期评估学习效果，力求每个学生都能达到预设的能力目标。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课堂的统一进度，允许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学习节奏，最终目标是培养出真正具备实用技能的人才。

（三）能力本位的核心特征

能力本位的核心特征包含以下几点：（1）以学习者为中心；（2）明确的学习目标与能力框架；（3）灵活的学习路径和模块化课程；（4）表现性评价与持续性反馈；（5）强调学习成果与实际应用的联系。能力本位教育由能力框架、模块化课程和能力评价三个核心要素构成^[11]。能力框架描述了学习者完成特定任务所需要的技能、能力和知识；模块化课程是指将学习体验、实践、评价以及反馈等“打包”成一个独立单位，将课程内容组合成学习时间较短、逻辑上自我完整的学习模块；能力评价聚焦于胜任能力，评价学习者对胜任能力规定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掌握情况，并以此做出学分、学历和学位的授予决定^[12]。能力本位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生主动学习和能力展示；通过灵活的学习节奏和个性化支持，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掌握必要的技能；注重实践和应用，强调在真实环境中展现学习成果；强调持续的反馈和修正，保证学习者能够根据自身情况不断提升。本研究的能力本位教育强调通过学习者在实际任务或真实场景中的能力表现来衡量学习成果，而非单纯通过知识测试或考试成绩进行评估。

三、国内外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现状

从人工智能课程体系的构建来看，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的开发主要包括政府集中指导的方法、政府委托私营部门提供课程服务、非政府性的私营部门开发等。以韩国为例，韩国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政策同时存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地方教育局以及教育科技公司、企业等各方合作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即政府、地方教育局和教育科技等企业界人士共同努力，将人工智能引入学校实践中，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和支持的结构系统^[13]。而在我国，制定人工智能课程也会邀请教师、学者和专家积极参与，以确保课程的质量和适用性。

从课程内容来看，2024年教育部进一步细化培养目标：小学低年级侧重感知体验，高年级及初中侧重理解应用，高中侧重项目创作，构建覆盖1-12年级的递进式课程体系。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存在边界模糊性，其核心内容可划分为三大模块：人工智能基础模块包含算法编程、数据素养及情景化问题解决，其中算法编程占比最高；伦理与社会影响模块涵盖技术伦理、社会效应分析及跨领域应用案例；人工智能实践模块则包括技术认知、工具应用及开发能力培养。课时分配呈现基础模块占主导，伦理与实践模块均分剩余课时的结构特征。

在师资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教育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师资不足、专业教师短缺以及培训与支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各国纷纷采取行动。例如，美国采取了总统奖励计划等举措，提升了对教师的支持力度，以减少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师流失。此外，在师资的培训上，我国则通过国家培训项目或计划，加强对人工智能相关科目的教师培训，以提升现有教职工的技能，同时，为在职教师提供在线资源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教育的挑战。

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课程面临的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小学阶段的迅猛发展,不仅增强了学生的相关能力和综合素质,还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人工智能教育存在政策层面的战略目标与实际教育实施之间的“落差”,在课程开发、教学方法、教师培养、学生评价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与其他学科课程有所不同,其跨学科、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特征,使得教育体系在结构、实施和评价上存在独特的挑战。教师在实施人工智能教育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在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尤为突出:

(一) 课程体系资源庞杂、课程目标定位模糊

人工智能教育涉及知识领域广泛,教材和资源分散,难以形成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学生难以获得全面的学习^[14];课程定位不清,与STEAM教育、创客教育混淆,内容分化导致技术与数理逻辑发展不平衡,缺乏衔接与沟通。课程开发目标广泛,涉及从初识到专业构建的多领域知识,但现有课程在任务复杂性、年级适应性、课时投入等方面存在挑战,特定领域和底层技术学时不足,同时,缺乏足够人工智能技术知识的伦理讨论,也制约了学生深入理解和实践人工智能的能力。

(二) 知识的迁移性不足

人工智能课程的目标和学习结果应聚焦于在人工智能时代工作和生活所需的主要价值观和技能,学习目标和标准应该基于实际职业需求,以确保学生掌握的技能和能力与实际应用相关,尽管开发适当的学习环境对人工智能课程的实施非常重要,但是人工智能教育不应局限于特定的产品。学生需要掌握人工智能在各种领域和环境中的应用的基本知识、可迁移技能和价值取向。当前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依赖于特定产品的课程可能会很快失去实用性。在面对新的环境或现实问题时,过于关注特定产品的知识可能无法灵活迁移应用。

(三) 评估方式不全面

当前关于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课程评估研究较为有限,尚未形成完整的、科学的人工智能教育评价体系^[15]。在教育实践中,课程评估往往过于关注学生在知识层面的掌握情况,而忽视了学生在技能应用、跨学科整合、创新思维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能力发展,导致评估结果与实际教育目标存在错位。当前人工智能教育评估方式存在的问题,其一,重知识,轻能力。当前人工智能教育评估方式主要通过笔试、闭卷测试等方式,评估标准单一。其二,重结果,轻过程。大多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强调学习成果的最终呈现,忽视学习过程中的动态反馈和修正机制。其三,缺乏表现性评价,忽视技能与态度的考察。在人工智能教育中,学习过程和任务完成往往涉及复杂的思维过程,单一的“对错”评估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的表现。

(四) 师资培养体系尚未建立,教学模式尚需创新

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的师资体系存在不完善的问题。教师需掌握丰富人工智能知识,同时具备教育理论和授课能力。在信息技术等课程中,少有人工智能专业人员,虽有但缺乏教育理论基础。此外,国家缺乏中小学人工智能师范专业和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导致高校无法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专业人才,多数中小学采用信息技术教师兼任人工智能教师,而专业培训不完备,师资水平受限。人工智能教育知识覆盖面广、内容抽象、概念繁多、实操性强,具有一定的学习门槛,亟需教师探索适应本学科特点的教学模式。学者们认为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适宜的教学方法应该是以学生为主体的、项目式的、能发挥学生主动性、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教學方法。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对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的授课形式比较满意,特别是贴近生活情境的学习方式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五、基于能力本位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的实施路径

CBE理念下的教学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学生必须通过达成特定的学习目标或标准来证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所需的技能和能力。CBE教学模式通常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基于实际职业需求的学习目标和标准、个性化的学习进程、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基于实践的评估和持续的反馈和评估。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是培养青少年适应未来社会的职业,具备对话技术伦理的知识、能力、思维和责任,为智能时代储备领域人才。

(一) 聚焦育人目标与呼应学生的发展需求双轮驱动

当前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目标多且广泛,涉及的重点领域不仅覆盖了从初步认知人工智能到深入探讨构建人工智能专业知识的多个关键领域,还在任务设置上呈现出逐渐复杂的趋势,以满足不同年龄学生的学习需求。尽管这种多元化有其价值,但必须认识到多样的目标和广泛的课程内容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挑战,如课时投入、课程内容的整合以及教学嵌入的机制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迫切需要建立清晰而有序的课程目标体系。首要任务是明确顶层目标的结构,确保它们在整个课程中具有连贯性和层次性,细化学习目标的内容以便学生能够逐步

掌握复杂的概念和技能。同时,精心设计学习路径以便铺垫认知目标,使学生能够在知识的建构上建立坚实的基础,而不仅仅是堆砌信息。此外,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必须与我国的发展目标和战略相一致,应该侧重于培养学生适应智能时代工作和生活所需的技能,以保证学生掌握的技能和能力与实际应用相关。

(二) 交叉学科融合, 创新教育策略与实践

能力本位教育(CBE)在美国基础教育实践中通过个性化学习路径与动态反馈机制实现能力精准评估,我国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可基于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构建“目标-方法-评价”适配模型。教师应依据学生认知特点选择差异化教学策略,借助智能教育平台开展学习分析,运用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创设具身认知环境,促进算法调试等实践技能的深度学习。跨学科整合可参照STEM教育理论,将算法设计与数学建模、机器人动力学与物理原理、生成对抗网络与数字艺术创作相结合,培养系统化知识应用能力。评价体系需重构形成性评估框架,通过过程性数据挖掘实现动态能力画像,为差异化教学提供实证支持。

(三) 开展多元化评价方式

目前关于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效果的系统研究仍存在空白,课程对学生智能素养提升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验证。课程评价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知识考核模式,而应聚焦于学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能力发展。通过创设贴近生活的评价场景,既能准确诊断学生的学科关键能力,又能充分尊重个体差异。

实施评价时建议构建包含三个维度的立体化体系:一是引入多方评价主体,整合教师、学生、家长和企业等不同视角的反馈,形成全面客观的评估结果;二是拓展评价内容维度,除基础知识外,重点考察问题解决、创新实践、自主学习和协作沟通等综合能力;三是采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将过程性记录与阶段性总结相结合,即时反馈与延时评估相补充,避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这种多维评价模式不仅契合人工智能学科的实践性特征,还能为教育改进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更全面的能力评估体系,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有助于培养适应智能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四) 扎实基础知识, 培养可迁移技能

从学生的能力角度(应用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及态度方面)出发,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应注重三个方面的培养:基础知识的构建、可迁移技能的强调,以及学生的价值观的塑造。首先,学生需要深刻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算法和方法,而不仅仅依赖于特定的产品或工具。通过扎实的基础知识,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无论是在现有领域还是面对新的问题和环境时都能够更好地进行知识迁移;其次,人工智能课程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可迁移技能,如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合作与沟通能力等。这些技能具有普适性,可在各个领域和环境中发挥作用,通过培养这些可迁移技能,学生可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的情境和需求,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当中;最后,聚焦实际职业需求,培养学生的价值取向。使学生深刻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社会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并培养责任感和道德意识,使其具备与人工智能时代工作和生活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和技能,这些技能和能力应侧重于可迁移的、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内容,以确保学生毕业后能够灵活应对各种领域和环境中的挑战。

(五) 多方联动, 形成合力

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进人工智能课程建设,需要政府、学校和教师协同发力。教育主管部门应牵头制定覆盖基础教育阶段的人工智能课程标准框架,明确课程目标、核心内容及实施路径。同时建立教材质量评估机制,通过严格的审查制度确保教材编写质量。财政保障方面,各级政府需设立专项经费支持课程开发、教学环境升级和师资培训,为课程实施提供可持续的物质基础。考试制度改革可分阶段推进,先将人工智能纳入学业水平考试,再逐步融入中高考体系,以此激发社会各方对课程建设的重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学校层面需做好实施规划,通过现状评估明确课程定位,制定分阶段实施方案。重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组织跨学科教研活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创新。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应结合学校实际条件,配置必要的硬件设备和数字化教学平台,为课程开展创造良好环境。教师作为课程实施主体,需主动提升专业素养,深入理解课程目标,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和学校实际情况设计差异化教学方案。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采用项目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评价方式要向多元化转变,建立包含过程性记录、作品展示、实践能力考核等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全面反映学生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 [1] 刘进,钟小琴.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政策比较研究:以中美英加四国为例[J].重庆高教研究,2021,9(02):39-50.

- [2]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EB/OL.(2017-07-20[2024-06-07])。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通知 [EB/OL]. (2018-04-18) [2024-06-0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部署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EB/OL]. (2024-12-03) [2024-12-27].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2/content_6990729.htm.
- [5] UNESCO. K-12 AI curricula: a mapping of government-endorsed AI curricula[M]. Paris: UNESCO, 2022.
- [6] John Burke.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 USA The Falmer Press, Taylor & Francis Inc., 1989: 9-10
- [7] 黄予, 甘佳艳, 杨满福. 美国高等教育能力本位的再复兴探析[J]. 南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39(03): 129-135.
- [8] 洪明, 吴素婷, 杨正刚. 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能力本位教师教育运动再探[J]. 教育史研究, 2022, 4(03): 141-153.
- [9] Gervais, J. (2016).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1(2), 98-106.
- [10] Klein-Collins, R. (2013). Sharpening our focus on learning: The rise of competency-based approaches to degree completion. *Occasional Paper*, 20.
- [11] 程新奎, 张瑾. 美国能力本位教育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远程开放教育的启示[J]. 中国远程教育, 2021, (12): 28-37.
- [12] Domaleski, C., Gong, B., Hess, K., Marion, S., Curl, C., Peltzman, A. (2015). *Assessment to Support Competency-Based Pathways*. Washington, DC: Achieve.
- [13] .夏雪景, 马早明. 韩国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举措与经验[J]. 比较教育学报, 2024, (02): 163-176.
- [14] 张志新, 杜慧, 高露, 等. 发达地区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某“新一线”城市为例探讨[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 (9) : 40-49.
- [15] 范雅琳, 王继新. 优质均衡视角下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普及: 推进、难点及优化——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J]. 当代教育论坛, 2025, (01): 9-18.

Research on Pathways for Implementing Competency-Ba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rriculum in K-12 Education

Du Hui¹, Hou Shiqi^{1,2}, Wang Pan³

¹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²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Hebei 063002; ³Xicheng School, Fengnan, Tangshan, Hebei 063399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ourses in K-12 education, issues with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This study, based on students' competencies (including applied knowledge, skills, values, and attitudes), identifi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ambiguous curriculum objectives, the need for innovation in teaching models, the lack of an established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and difficulties in course evaluation. Drawing upon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 it explore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K-12 AI education from aspects of content, methodology, and teacher preparation. Recommendations are provided for governments, schools, and teachers: governments should develop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K-12 AI education, clarify objectives and content scope, and provide policy support and funding guarantees; schools should improve evaluation methods, promote curriculum integration of AI with other subjects, and refine teacher incentive mechanisms; teachers should enhance their own professional expertise.

Keywords: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CBE); K-1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基于项群训练理论下不同体育运动对小学生性格塑造的实证研究

肖浪¹ 罗小红^{1*} 雷雨洁¹ 邱宇萌¹ 丁镜源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 以四川省蓬溪县下河小学 6 年级的小学生为调查对象, 采用单因素方差、皮尔逊相关性、独立样本 t 检验对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对比。结果显示, 同场对抗性、隔网对抗性、耐力性、轮换攻防对抗性项目都对小学生的性格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内外向 (E) 与神经质 (N) 呈显著负相关 ($r=-0.485$, $P<0.01$), 即外向程度越高, 情绪稳定性越强; 不同体育项目对男女生性格的关联无显著差异。本研究为横断面数据, 仅反映当前关联, 长期效应需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 性格; 不同体育项目; 小学生

基金项目: 2025 年四川省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 (项目编号: CDUCX202573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18

1 引言

1.1 儿童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性格又称“人格”, 我国心理学界习惯于将人身上的人格现象称为性格, 而将科学领域上的性格研究称为人格。西方心理学界常用人格取代性格, 统称为人格^[1]。因此, 本文将以性格为关键词进行阐述。性格, 是一个人最具代表性的个性心理特征, 比较稳定地存在于个人的行为方式当中, 性格也反应出一个人对其他人、对事物、对社会现实的态度, 这种态度会最终决定他的行为方式与习惯, 在一定意义上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社会道德, 是一种与个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人格特征^[2]。

1.2 儿童性格可塑性和关键发展期

人的性格是在人生早期奠定的, 应着重培养孩子六种基础的良好性格: 快乐活泼, 安静专注, 勤劳善良, 勇敢自信, 独立精神, 创造精神, 因此人的性格是具有可塑性的^[3]。

2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蓬溪县下河小学六年级 9 个班共 18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2025 年 4 月进行基线调查, 基线调查当天缺勤学生 5 名, 最终 180 学生纳入研究。本项目已调查前已取得学校、家长和学生的知情同意。

作者简介: 肖浪(2002—), 男,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
罗小红(1990—),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雷雨洁(2004—), 女,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
邱宇萌(2004—)女,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
丁镜源(2004—), 女,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

通讯作者: 罗小红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通过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超星数字、国研数据、龙源和国际互联网的一些著名搜索引擎搜索和查询了有关本文研究的资料与数据。

2.2.2 问卷调查法

本文以龚耀先修订的艾森克人格儿童问卷的原版基础上,结合中国儿童特点,制订了调查问卷,问卷以社交能力、情绪管理、行为规范三个核心方面进行设计,共40道题。

艾森克人格儿童问卷量表(儿童,7~15岁)包括4个部分,分别为内外向(E)、神经质(N)、精神质(P)、掩饰(L)因素量表,共发放问卷180份问卷,除去42份无效问卷(学生填写理由:手机游戏、看电视等,因此不判定为体育活动)、5份掩饰分(L)超过7分判定无效(掩饰分为测定被试的掩饰、假托或自身隐蔽,或者测定其社会性朴实幼稚的水平),回收有效问卷为138份,有效回收率约为76.67%,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问卷发放回收情况

问卷发放数(份)	问卷回收数量(份)	回收率(%)	有效问卷数量(份)	有效率(%)
180	180	100.00	138	76.67

通过对照记分规则分别计算出E、N、P、L的得分,见表2。

表2 蓬溪县下河小学调查对象各维度得分区间

得分区间	内外向(E)	神经质(N)	精神质(P)	掩饰性(L)
$x < 4$	偏内向	情绪较为稳定	无精神质倾向	>7分为无效
$4 \leq x < 7$	中间状态	稳定性一般	中间水平	
$8 \leq x \leq 13$	外向	情绪不稳定	精神质较强	

2.2.3 数理统计法

采用SPSS27.0软件对问卷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各组的得分情况以 $(\bar{x} \pm s)$ 分表示。**表示 $P < 0.01$ 为差异性非常显著。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体育项目的人数分析

调查问卷收集项目以田麦久教授编著的《运动训练学(第二版)》中提出的项群训练理论进行分类,将篮球、足球等球类归为同场对抗性;将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归为隔网对抗性;将跑步、跳绳等归为耐力性;将五子棋、围棋等归为轮换对抗攻防性。基本情况见表3。

表3 蓬溪县下河小学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男生	女生
隔网对抗性	20	18
同场对抗性	11	11
耐力性	23	20
轮换攻防对抗性	14	21
总人数	138	

3.1 不同体育项目的情况分析

从表4的4种分类的得分与表2对比得出:在内外向(E)因素上,隔网对抗性的小学生得分处于中间状态和外向之间、同场对抗性的小学生得分处于外向、耐力性的小学生处于外向、攻防轮换对抗性的小学生处于偏内向与外向之间的状态;在神经质(N)因素上,攻防轮换对抗性的小学生得分处于情绪较为稳定,其余各组均处于处于稳定性一般与情绪不稳定之间;在精神质(P)因素上,攻防轮换对抗性的小学生处于无精神质倾向与中间水平之间,而其余各组得分均无精神质倾向。

表4 蓬溪县下河小学调查对象课外体育项目的得分情况

项目类型	内外向(E) $(\bar{x} \pm s)$ /分	神经质(N) $(\bar{x} \pm s)$ /分	精神质(P) $(\bar{x} \pm s)$ /分
隔网对抗性	9.11±1.97	3.33±3.00	2.55±0.82
同场对抗性	11.27±1.62	3.19±2.44	2.33±1.32
耐力性	10.38±2.01	1.82±1.33	2.33±0.86
轮换攻防对抗性	8.90±3.21	4.40±3.13	2.60±2.41

3.1.1 不同体育项目对小学生性格维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从表 5 可以看出, 四类体育项目分别在内外向 (E)、神经质 (N)、精神质 (P) 三个维度的 Levene 检验结果显示: 内外向 (E) 维度——Levene 统计量 = 1.441, $P=0.243 > 0.05$, 满足方差齐性; 神经质 (N) 维度——Levene 统计量 = 2.255, $P=0.094 > 0.05$, 满足方差齐性; 精神质 (P) 维度——Levene 统计量 = 1.996, $P=0.127 > 0.05$, 满足方差齐性。即所有维度均符合方差齐性条件, 可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间差异检验。

表 5 不同体育项目在小学生性格维度上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

性格维度	体育项目类型	样本量 (n)	得分 ($\bar{x}\pm s$)	方差齐性检验 (Levene)		单因素 ANOVA	
				F 值	P 值	F 值	P 值
内外向 (E)	同场对抗性	22	11.27±1.62	1.441	0.243	2.707	0.056
	隔网对抗性	38	9.11±1.97				
	耐力性	43	10.38±2.01				
神经质 (N)	轮换攻防对抗性	35	8.90±3.21	2.255	0.094	1.869	0.148
	同场对抗性	22	3.19±2.44				
	隔网对抗性	38	3.33±3.00				
	耐力性	43	1.82±1.33				
精神质 (P)	轮换攻防对抗性	35	4.40±3.13	1.996	0.127	0.128	0.943
	同场对抗性	22	2.33±1.32				
	隔网对抗性	38	2.55±0.82				
	耐力性	43	2.33±0.86				
	轮换攻防对抗性	35	2.60±2.41				

因此可得出以下结论:

3.1.2 内外向 (E)

同场对抗性项目得分 11.27 分, 耐力性项目 10.38 分, 均处于“外向”区间, 隔网对抗性和轮换攻防对抗性项目得分相对较低, 分别为 9.11 分和 8.90 分, 但也接近外向区间下限。

(1) 同场对抗性项目需要团队成员密切配合, 频繁的沟通交流能促使小学生更主动地与他人互动, 因此小学生外向性格特征可能会更为突出。

(2) 耐力性项目是门槛较低, 且只需个人即可参与的项目, 个体能通过反复练习快速看到进步 (比如跳绳并脚跳项目能从 30 秒跳 30 个到能跳 100 个, 跑步项目从跑 1 公里气喘吁吁到轻松完成), 每一次的进步都会为个体带来成就感, 能显著提升自我效能感, 使小学生更加自信, 以此有利于促进外向性格发展。

(3) 相比于直接身体对抗的运动, 隔网对抗性项目 (羽毛球、乒乓球等) 互动形式相对间接。比如单打, 小学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球的轨迹和对手的动作上, 球员的所有进攻防守都需独立完成。而双打时有一定的沟通交流场地, 因此此类项目分数趋于中间状态与外向之间。

(4) 轮换攻防对抗性项目得分较低, 可能是在于这类运动的本质是“低社交需求的脑力对抗”。棋类一般没有队友, 因此没有团队合作的机会来促进性格外向。但是我们要清楚, 不是下棋“导致”内向, 而是内向者更倾向于参与“个人作战”的运动^[5]。

综上, 小学生性格特征与参与项目有着密切关联, 长期参与后, 性格中的内向或外向特质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 然而, 我们也要知道, 性格内向并不代表是坏的^[6], 内向者也有其优势, 比如棋类不需要外向特质就能做好, 甚至需要内向者的专注、内省与独立思考。

3.1.3 神经质 (N)

(1) 隔网比赛项目通常需要个体保持冷静来应对球的变化和对手的策略, 因此该项目特点可能使得参与者的情绪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锻炼, 但由于比赛中的竞争压力和对表现的关注, 也可能导致情绪出现一定波动, 所以得分处于稳定性一般与情绪不稳定之间。

(2) 同场对抗性项目的特点导致比赛中的身体接触、与队友的沟通等情况相当密切, 因此很容易导致情绪容易出现波动, 所以其神经质得分处于稳定性一般与情绪不稳定之间。

(3) 耐力性项目多数为单一的个人参与, 例如跳绳, 钟多提出跳绳可以有效的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主要表现在男女生的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偏执、心理承受能力等指标分上不同程度的下降^[7]。因此该项目的学生神经质得分处于较为稳定。当前数据显示, 参与耐力性项目与情绪稳定性呈正相关, 这种关联是否随参与时长延长而增强, 需通过纵向研究验证。

(4) 轮换攻防对抗性：此类项目分数高于另外三类可能是因为该项目吸引内向者，因为项目活动特性与他们的性格契合，而又因该项目大多为脑力性运动，因此很多时候小学生没有体能性的运动，可能其情绪会不如外向者稳定。

综合来看，不同体育项目与不同学生性格的关系是既相互吸引，又存在相互成就。例如 2025 年浙江省国际跳棋锦标赛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贾茹，小时候性格内向，是兴趣班中的“小透明”，启蒙老师施懿斓发现她不爱说话，但在棋盘前非常专注，是个练棋的好苗子，因此在老师量身定制的训练计划下，贾茹开启了“逆袭模式”：每天雷打不动练习 2 小时，曾用 1 年时间从无等级打到“一级棋士”。所以不论是外向或是内向，教育工作者应因材施教，根据学生性格特点合理引导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学生塑造健全人格，实现身心的全面发展。

3.1.4 精神质 (P)

同场对抗性、隔网对抗性和耐力性项目对精神质的影响较为相似且温和，而轮换攻防对抗性项目的影响相对稍大，但个体差异明显。可知精神质 (P) 与内外向 (E)、神经质 (N) 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所以在分析学生性格特征时需综合考虑各维度的相互作用。

3.2 小学生性格的相关性情况

从表 6 可以看出，各因素的相关系数 r 和 P 值，其中精神质(P)与神经质 (N)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r 和 P 值分别为 $r=-.485$, $P < 0.01$ ，相关性强度中等 (r 绝对值接近 0.5)，且达到极显著水平 ($P < 0.01$)，说明两者关联具有可靠性，而其他性格因素无相关性差异显著。

表 6 蓬溪县下河小学调查对象小学生性格的相关性情况

		内外向(E)	神经质(N)	精神质(P)
内外向(E)	皮尔逊相关性	1	0.219	0.089
	显著性			0.537
神经质(N)	皮尔逊相关性		1	-.485**
	显著性			0.005
精神质(P)	皮尔逊相关性			1
	显著性			

注: ** 表示 $P < 0.01$

3.3 总体情况男女差异对比分析

从表 7 可看出，男女生的精神质得分几乎没有差异，男女生在精神质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7 蓬溪县下河小学调查对象男、女生差异对比情况

测量指标	男生 ($\bar{x}\pm s$) /分	女生 ($\bar{x}\pm s$) /分	t	p
内外向(E)	10.15±2.11	9.96±2.60	0.288	0.775
神经质(N)	3.04±2.10	3.29±3.07	-0.349	0.735
精神质(P)	2.44±0.93	2.42±1.69	0.074	0.942

最后得出：下河小学的男生和女生在内外向 (E)、神经质 (N)、精神质 (P) 这三个维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表明在该研究对象中，性别对小学生的性格影响较小。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从研究结果来看，不同体育项目与小学生性格各维度存在差异化关联：同场对抗性、隔网对抗性、耐力性、轮换攻防对抗性项目均与小学生性格存在一定积极关联；同场对抗性项目和耐力性项目的内外向 (E) 得分较高 (均处于“外向”区间)，暗示团队互动可能与外向特质存在关联；耐力性项目的情绪稳定性得分最高，当前数据显示二者呈正相关，其长期效应有待验证；轮换攻防对抗性项目的情绪稳定性得分相对较低，可能与该项目的低社交特性及参与者性格倾向有关。内外向 (E) 与神经质 (N) 呈显著负相关 ($r=-0.485$, $P < 0.01$)，即外向程度越高，情绪稳定性越强。男女生在各维度得分无显著差异 (P 均 > 0.05)，暗示在本研究样本中，性别与小学

生性格的关联较弱。

4.2 建议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影响人。体育对小学生性格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体育教师应担当引路人的身份，根据项目特点来促进学生性格的转变，例如对于偏内向的学生，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参与跑步、跳绳等耐力性运动，在学生的性格进行一定的改变后再逐渐将学生引入同场对抗的团队项目中，使学生性格从内向向外向过渡。

参考文献：

- [1] 张力为、毛志雄.体育科学常用心理量表评定手册[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10
- [2] 汪华锋.体育舞蹈对儿童性格塑造的影响研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05):109-112.
- [3] 廖柳青.家庭教育中学前儿童性格培养对策研究[D].南昌大学,2022.DOI:10.27232/d.cnki.gnchu.2022.004360.
- [4] Lyu Xiadi,and Lian Xinyu."The Impact of a Good Family Sports Climate on Children's Character Building ".Ed.2021,
- [5]]Rosa P P J ,Rosa P P J ,Souza D L A A , et al.Motivational and evolutionary aspects of a physical exercise training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5,6648- 648.
- [6] 马涵.性格内向不是病[J].学生·家长·社会,2024,(20):44-45.
- [7] 全芷萱.跳绳运动对六年级小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D].湖南农业大学,2021.DOI:10.27136/d.cnki.ghunu.2021.000427.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ports o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haracter Shap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ent Group Training

Xiao Lang¹, Luo Xiaohong^{1*}, Lei Yujie¹, Qiu Yumeng¹, Ding Jingyuan¹

¹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aking the sixth-grad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f Xiahe Primary School in Pengxi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uses one-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to count and compare the survey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same-field confrontational, net-separated confrontational, endurance, and rotational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confrontational events all have certain positive effects on pupils' charact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traversion-introversion (E) and neuroticism (N) ($r=-0.485$, $P<0.01$), that i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xtraversion, the stronger the emotional stabilit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ports events and the character of boys and girls. This study is cross-sectional data, only reflecting the current correlation, and the long-term effect needs further verification.

Keywords: character; different sport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WOT 视域下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跨域协同路径研究

张健¹ 金俊娜¹ 芦凌雪²

(1.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2.唐山市凤凰中学,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 本文以京津唐基础教育联合体为对象, 基于 SWOT 框架评估其内部优势、劣势及外部机遇与威胁, 探讨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表明, 北京、天津在优质资源、智慧教育平台和政策支持方面呈现显著优势, 为唐山教育发展提供支撑; 但唐山在教育经费、师资流动、课程衔接及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短板, 叠加资源竞争与财政压力, 影响联合体均衡发展。国家一体化战略与数字化转型为教育协同提供机遇, 而区域虹吸效应、行政壁垒和数字鸿沟则对其形成挑战。为此, 本文提出通过智慧教育平台与政策联动强化资源优势; 依托财政与教师机制补齐短板; 利用京津资源缓解虹吸效应并提升投入效率; 同时构建数字能力与安全体系, 以有效弥合数字鸿沟。

关键词: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京津唐教育联合体; 跨域协同; SWOT 分析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唐山市社会科学发展改革课题“京津唐基础教育联合体背景下唐山基础教育发展路径研究”(TSSKL2024-124); 河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一般资助项目“‘U-G-S’本土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模式研究”(2303060)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15

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增强国民综合素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核心使命^[1]。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 高质量发展基础教育已成为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重点。然而,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仍面临区域间资源分布不均, 教育质量差异显著, 以及行政壁垒限制等问题, 亟需通过区域内外的多方协同机制实现整体突破。京津唐地区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北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带。北京和天津在教育资源、师资力量、课程标准化及教育数字化建设方面长期处于领先水平, 而唐山作为环京津地区的重要城市, 则肩负承接优质资源辐射、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化的重要任务。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 区域教育合作逐渐从单一资源输送向体系化、制度化的协同模式演进。本文以京津唐基础教育联合体为研究对象, 基于 SWOT 分析框架, 系统评估其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 旨在探究跨区域协同的实现路径, 以打破传统行政区划与资源壁垒, 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教育协同的演进

(一)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优质教育体系”的战略部署, 明确要求推进教育公平与质量同步提升;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推动基础教育发展模式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内涵建设。政策导向意味着基础教育的发展逻辑正在从“数量驱动”转向“质量驱动”, 从“结构均衡”转向“优质均衡”, 质量提升成为新时期教育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为从根本上阐明中国式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国内学者提出了系统均衡观、质量管理观和民生改善观三大阐释框架^[2]。系统均衡观强调教育系统内部要素的有机整合与区域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 质量管理观主张建立涵盖目标设定、过程监控与结果评估的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 民生改善观则突出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中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 研究进一步指出, 高质量基础教育不仅需要以上三方面的整合, 还需契合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新需求, 即注重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双重协调, 通过优质资源跨区域流动与共享, 实现“人人皆可享优质教育”; 重视育人模式创新, 通过数字化教育、个性化学习与协同育人机制,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与创新能力^[3]; 强化教育治理现代化, 形成以政府统筹为主导、学校与社会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 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4]。现有研究为后续教育协同机制的形成与实践提供了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 张健(1985—),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

金俊娜(1988—),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贸易经营、战略发展;

芦凌雪(1987—),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

在这一发展背景下,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任务,而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转型逻辑自然引出了教育协同的必要性与演进过程——唯有通过跨主体、跨区域的协作机制,才能有效整合优质资源、优化治理结构,从而实现质量与公平的双重提升,并为下文关于教育协同演进及跨域协同路径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逻辑支撑。

(二) 教育协同的演进

教育协同之所以成为优化资源配置,均衡教育服务的途径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协同”概念本身的理论内涵。“协同”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synergos*,意指开放系统中多个亚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整体性、集体性或合作性效应。20世纪70年代西德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在其激光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协同学(Synergetics)。哈肯指出,从原子、细胞到动物及人类个体,其集体行为通过竞争与协作的双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决定其系统的演化轨迹。作为跨学科理论,协同学的研究与应用范围广泛,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个领域^[5]。

教育协同的理论演进可上溯至协同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引入。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外学者尝试将协同理论应用于教学组织和学习方式中^[6]。在这个时期教育协同侧重强调教师、学生、资源等要素之间的互动与整合,核心概念聚焦于“协同教育”、“协同教学”、“协同学习”三大概念^[7],但理论深度不足,缺乏系统化框架。

进入21世纪后,以家校合作为起点逐步发展出家校社协同育人理论。美国学者 Epstein 的“交叠影响域理论”(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提出学校、家庭、社区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三重影响叠加促进学生发展。自此,“交叠影响域理论”理论也逐渐成为了解释协同育人的重要范式^[8]。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逐步践行家校社协同的运作模式,主张三方形成共同目标与责任分工,推动教育资源整合与管理联动,逐步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整体,以达到协同育人的目的。

随着数字化教育和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加速推进,跨区域、跨主体、跨时空的教育协同模式逐渐成为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智慧教育平台、大数据决策支持系统及互联网教研共同体的出现,使教育协同突破了传统行政区划和时空界限,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实现高效流动与共享。在这一背景下,区域教育联合体成为教育协同的重要组织形态。例如,2023年5月,唐山市教育局联合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景山学校及天津市北辰区共同组建“京津冀基础教育联合体”,其目的在于通过跨区域的教学研究协作与资源共享平台,提升区域教育质量与协同治理水平^[9]。基础教育联合体的运营标志着教育协同已从传统的家校社内部协作,进一步扩展至区域间系统联动,体现出教育治理由单一主体合作向多元主体、跨域协同的演进趋势。

二、京津唐基础教育联合体 SWOT 分析理论框架

SWOT 分析法作为一种系统分析工具,最早由 Andrews(1971)提出,后经管理学、战略研究领域广泛运用,逐渐发展为一种综合评估组织内外部环境并制定战略路径的经典方法。该方法通过识别内部优势(Strengths)与劣势(Weaknesses)、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与威胁(Threats)四个维度,帮助研究对象明确资源禀赋、环境变量及应对策略^[10]。其优势在于框架清晰、逻辑性强,既能概括复杂的情境因素,又能直接导出战略对策。因此,近年来 SWOT 分析理论也被运用于区域教育治理、教育政策分析及资源配置研究中。

从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京津唐教育联合体作为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区域教育跨域治理的典型实践案例。一方面,北京、天津在教育资源、优质师资、课程标准化及数字化平台建设等方面拥有明显优势,能够为唐山等环京津地区提供教育支撑;另一方面,唐山等地在教育质量、财政保障及教师培养方面仍存在短板,且跨区域协同中存在制度协调以及教师流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估京津唐基础教育联合体的优势、短板及其所面临的机遇与威胁,进而提出可行的协同发展路径,有待进一步探索。

为此,本研究采用 SWOT 分析框架,结合政策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从内外部两个维度系统评估京津唐教育联合体的现状。首先,本研究以协同学理论为总体支撑。Haken(1983)指出,在开放系统中,不同子系统之间通过竞争与协作实现整体有序化,这为解释教育资源、治理机制与区域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结合协同理论,SWOT 方法能够更好揭示教育联合体内部各要素的动态整合与区域协作效应,从而为战略路径设计提供支撑。其次,以确保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和全面性,从官方政策文件、媒体公开报道以及学术研究成果三类渠道收集相关数据。再次,遵循“识别—分析—对策”三阶段研究逻辑展开分析。识别阶段从从教育资源、治理机制、技术条件等多个维度系统梳理京津唐教育联合体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分析阶段则结合结合国家教育现代化战略、京津冀一体化政策系统评估外部机会与威胁;对策阶段将基于 SWOT 矩阵,提出 SOWO、ST、WT 四类战略组合的跨域协同路径建议。

三、京津唐基础教育联合体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分析

(一) 内部优势

基础教育联合体中的北京和天津长期以来在教育资源、师资力量、教学研发中心及高质量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些优质资源通过北大附小、北京实验学校、天津市北辰区教师发展中心等渠道与唐山对接,推动了校际协作与课程资源的有效下沉。根据张旻、黄婕(2024)的研究,优质师资的下沉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接受学校的教学质量,还能有效促进教师队伍的整体发展与专业成长,从而增强区域教育协同的整体效能^[11]。此外,北

京自 2018 年起启动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天津则率先推行“一校一云”数字化平台,两地在在线教学、教研与评价体系的构建上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在此基础上,2022 年起先后启动的“京津冀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京津冀教育协同数字平台”等整合资源库、教研系统,不仅提高了跨区域协作的运行效率,也进一步强化了教师教研与培训的系统化管理。截止到 2024 年唐山市已有 105 所学校与京津名校就共享优质数字资源进行合作,近 2 万名中小学教师参与北京数字学校网络教研和互动^[12]。

京津唐基础教育联合体在区域教育协作中不断深化合作机制,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了三地基础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例如,北京景山学校通过“飞地办学”模式在唐山设立分校,推广“双师课堂+本地助教”等创新教学机制。此外,基础教育联合体依托跨区校际协作、名师工作室联动和校本课程协同开发等手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区域协作体系。例如,通过建立校长工作室,唐山市已打造阵地校 60 所,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培训 16 期。在校际合作方面,唐山与北京、天津多所重点学校签署合作协议,通过“同课异构”、专家讲座及骨干教师引领等活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和教学模式创新。截至目前,全市基础教育协同发展项目总数已达到 266 个,涵盖教研协作、课程共享、教师培训等多个领域。

(二) 内部劣势

在联合体运行中,唐山与北京、天津相比,在教育资源、师资配置及教学质量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2021 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小学生与教师的比例高达 16.59,而天津和北京分别为 15.26 和 13.92,河北的生师比不仅高于京津两地,也明显高于全国中位值。在初中阶段,河北的生师比为 13.29,而天津和北京分别为 11.21 和 8.87,河北的比例约为北京的 1.5 倍、天津的 1.24 倍^[13]。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京津冀地区基础教育的协调发展。同时,京津在各学段人均教育经费和公共服务投入方面均显著高于河北,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分布。尽管河北自 2015 年起出台政策以增加教育投入,缩小与京津的差距,但整体差距仍然存在。

在教师流动方面,现有机制仍主要依赖临时挂职与短期培训,缺乏长期化、制度化的保障。唐山教师赴北京、天津交流期间常因住宿、子女教育及考核体系差异等问题,导致流动周期短且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资源共享机制。尽管远程和异地教研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但教师流动机制的不制度化降低了人才回流与本地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影响跨区域协同的整体效能。

同时,当前联合体的协作机制仍以任务驱动和项目化运作为主,缺乏制度化的运行框架与绩效反馈机制。跨区域合作虽在校际协作、名师工作室建设及资源共享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未建立常设性的协作评估与反馈平台,合作成效难以被系统总结、量化和复制,限制了协作模式的可持续推广。此外,唐山与京津在教育标准与课程内容衔接上也存在明显断层,尽管联合体中开展了“同课异构”等教学创新,但由于教学内容、课程进度和评价体系差异,远程课堂协作难以实现教学目标的完全同步,教师联合教研效率低下,课程共建推进缓慢,协作效果受限。

(三) 外部机会

在国家政策层面,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持续深化,为教育领域协同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 2023 年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签署发布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3 年—2025 年)》,明确提出建立跨区域教师交流机制和协作平台,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为基础教育联合体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

当前,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重塑教育形态,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教育协同发展注入了新动能。2022 年教育部启动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着力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教育生态,为京津冀基础教育联合体的平台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线教学平台的普及和智慧教育场景的应用,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更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精准匹配和高效流动。

从育人层面,京津唐三地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推广与完善为联合体发展注入了动能。随着社区教育资源的统筹整合、小学阶段课程服务的优化以及家庭教育资源的广泛动员,三方协同育人的格局日益成熟,逐步形成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教育生态。在教师交流、课程共享和管理协同等制度创新的持续推动下,一个更加系统化和可持续的京津教育协同发展生态正在加速形成。这些外部机遇的叠加为京津唐基础教育联合体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深化跨区域协作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

(四) 外部威胁

尽管京津唐基础教育联合体在资源共享和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中仍然存在区域教育资源竞争、财政压力及数字化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首先,区域教育资源竞争的加剧成为制约联合体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北京和天津长期依托国家级重点学校、知名高校附属学校及先进的教育科研体系,吸引了大量优秀教师与学生资源,形成虹吸效应,导致环京津的唐山在师资留存、优质生源获取及课程资源配置上持续承压。源流向中心城市的趋势虽提升了整体教育水平,但也削弱了唐山地区的教育吸引力和教育生态稳定性,使联合体内部的协作关系出现失衡风险。

其次,经济波动与财政投入压力对联合体发展深度及广度构成现实挑战。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及新冠疫情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趋紧,教育专项资金增长放缓。财政紧缩不仅可能影响联合体中各类教育项目的持续性,还会导致部分已经启动的跨区协作计划因资金短缺被迫缩减或中断,从而使既有成果面临退步的风险。

此外,数字鸿沟的存在也是制约联合体信息化协作效能的重要威胁。尽管北京和天津在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及数字化教学资源应用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唐山部分乡镇学校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硬件设备仍然不足,教师数

字素养相对较低，信息化协作的实际应用效果大打折扣。

四、基于 SWOT 矩阵的跨域协同路径构建

通过对京津冀基础教育联合体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会与威胁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基础教育联合体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一方面，北京和天津在教育资源、数字化平台及政策支持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为唐山的教育质量提升与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另一方面，唐山在教育经费投入、教师流动机制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不足，叠加区域资源竞争和财政压力。

表 1. 京津冀基础教育联合体 SWOT 矩阵

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
<p>优势(Strengths)</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北京、天津在优质教育资源、师资力量、教学研发中心和课程体系方面全国领先，为唐山教育协同发展提供支撑； -建立多模块跨区协作机制(如名师工作室、校本课程开发、校长工作室)； -北京、天津智慧教育示范区和“一校一云”平台成熟，支撑京津冀教育协同数字平台运行。 <p>劣势(Weaknesses)</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唐山生师比偏高，明显高于京津，教育质量与财政投入仍存在差距； -教师流动机制以临时挂职、短期培训为主，缺乏长期化制度安排，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人才培养链； -协作机制以任务驱动为主，缺少绩效评估与反馈闭环； -教育标准、课程内容及评价体系存在断层，远程协作课堂难以完全同步教学目标； -部分乡镇学校数字化基础薄弱，教师信息素养不足，限制智慧教育的落地效果。 	<p>机会(Opportunities)</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及“十四五”规划等文件为区域教育合作提供长期政策支持，强化跨区教师交流与资源共享制度化； -AI、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智慧教育与在线教学提供技术条件；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成熟，助力多方参与的跨区域教育生态形成。 <p>威胁(Threats)</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北京、天津形成“虹吸效应”，大量优质教师与生源流向中心城市，唐山教育资源配置持续承压； -地方财政受经济下行与疫情影响趋紧，教育专项资金增长放缓，跨区协作项目面临挑战； -唐山乡镇学校数字鸿沟问题严重，硬件、网络和师资数字化能力不足，削弱联合体整体效能。

基于 SWOT 矩阵分析，可以从 SO(优势—机会)、WO(劣势—机会)、ST(优势—威胁)和 WT(劣势—威胁)四个方面设计协同路径，以实现优势资源的充分利用、短板的有效补齐、外部机遇的高效转化以及外部威胁的积极应对。

(一) SO 战略:发挥资源与技术优势，强化联合体协同升级

依托北京、天津在优质教育资源、课程研发、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及政策支持方面的突出优势，基础教育联合体应积极顺应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3年-2025年)》等政策导向，进一步深化资源共享与制度化合作。在技术层面，可借助 AI、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全面升级“京津冀教育协同数字平台”，推动唐山与京津在在线课堂、跨区教研及教育评价体系上的深度融合。同时，发挥北京、天津在智慧教育示范区和“一校一云”平台的成熟经验，建立面向唐山学校的定制化数字支持方案，通过定期培训和技术输出，缩小信息化应用差距，形成覆盖基础教育全阶段的智能协作生态。

(二) WO 战略:补齐教育投入与机制短板，提升唐山承接能力

针对唐山教育财政投入不足、教师流动机制短期化及数字化应用薄弱等劣势，基础教育联合体需依托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资金支持，加大唐山本地教育基础建设与财政投入力度，逐步缩小与京津的差距。在教师流动机制方面，应通过跨区教师长期交流计划、职称互认制度及联合培训基地建设，推动师资流动从临时性挂职向长期性、制度化方向转型。借助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推广，唐山可引入京津成熟的家庭教育资源及社区支持体系，提升本地学校的承接与转化能力，从而形成教育资源输入、转化和本地化可持续发展的闭环。

(三) ST 战略:利用京津资源优势缓解虹吸效应与财政压力

面对北京、天津对优质师生资源的虹吸效应以及经济下行导致的财政压力，基础教育联合体需通过制度创新和资源均衡机制缓解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可在联合体框架内设立跨区师资共享基金和专项补助政策，激励教师在唐山长期任教，同时为本地优秀教师提供到京津进修或轮岗的机会，形成双向流动格局。另一方面，利用京津在智慧教育平台、课程开发及管理体系上的领先经验，通过远程教研、名师工作室及联合课程开发等方式，降低对财政的依赖，提高教育质量提升的投入产出效率，从而缓解财政压力对协作项目的负面影响。

(四) WT 战略:构建数字能力与安全保障体系，防范外部风险

针对唐山乡镇学校数字鸿沟、信息化水平不足，基础教育联合体需在提升数字能力与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两方面同步推进。通过整合中央和地方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唐山薄弱学校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硬件升级，同时开展分层次的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提升本地学校对智慧教育的适配能力。

参考文献:

- [1]汪源.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逻辑架构与实践路径[J].教学与管理,2025(01):1-5.
- [2]吴晓蓉,胡甜.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标准及实践[J].教育与经济,2022(2):28-33.
- [3]姚荣.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J].2023(11),36-42.
- [4]孙杰远.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质,逻辑与基本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20,18(1):5-11.
- [5]Haken, Hermann.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 Nonequilibrium Phase Transitions and Self Organization in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3rd rev. & enlarged ed.)[M]. 1993, Springer Verlag, Berlin/Heidelberg/New York/Tokyo.
- [6]苑大勇.高等教育协同创新:理论建构与演进[J].高校教育管理,2015,9(3):16-21,29.
- [7]方蓉.论协同理论在教育领域中的移植[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29(2):17-18.
- [8]胡晓雪,王玉凤.协同育人文献研究综述[J].家长,2020(10),123-124.
- [9]赵璐.我市形成一批京津唐教育协同发展重要项目和典型范例[EB/OL].唐山劳动日报,(2024-03-01)[2025-07-2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2281033601749975&wfr=spider&for=pc>.
- [10]Helms,M.M.,Nixon,J..Exploring SWOT Analysis—Where Are We Now?A Review of Academic Research from the Last Decade[J].*Journal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2010,3(3):215-251.
- [11]张旻,黄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筑基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与路径[J].西南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1):1-8.
- [12]滦南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京津唐教育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EB/OL].(2024-11-19)[2025-07-2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6159192529375094&wfr=spider&for=pc>
- [13]何梦醒.京津冀都市圈基础教育资源协同配置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23.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Pathways for High-Quality Bas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from a SWOT Perspective

Zhang Jian¹, Jin Junna¹, Lu Lingxue²

¹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063000, China

² Tangshan Phoenix Middle School, Tangshan, Hebei 06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Beijing-Tianjin-Tangshan Basic Education Consortium, evaluating its internal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s well as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through a SWOT framework to explore pathways for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eijing and Tianjin posses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s, and policy support, providing strong backing for Tangshan'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angshan faces deficiencies in education funding, teacher mobility mechanisms, curriculum alignmen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hich, combined with resource competition and fiscal pressures, hinder balanced growth within the consortium. While nat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 regional resource siphoning,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the digital divide pose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ese, this study proposes strengthening resource advantages through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s and policy alignment, bridging Tangshan's gaps via fiscal support and teacher exchange mechanisms, leveraging Beijing and Tianjin's resources to mitigate siphoning effects and enhance input efficiency, and building digital capacity and security systems to effectively close the digital divide.

Keywords: High-Quality Bas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Beijing-Tianjin-Tangshan Education Consortium;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on; SWOT Analysis

从符号表征到高阶思维：3—6岁幼儿深度学习能力的发展路径 与干预机制研究

王陈¹ 王欣欣^{2*} 郭涛³

(1.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东 广州 510000, 2.广州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3.深圳市融湖世纪幼儿园,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本研究以“符号—思维”发展图谱为核心, 综合象征表征理论、执行功能发展模型与文化历史活动论, 探讨3—6岁幼儿深度学习能力的阶段演化机制与教育干预路径。研究采用混合方法, 结合执行功能测评、结构化课堂行为观察、教学环境评价与家庭文化资本变量分析, 识别出幼儿符号认知向高阶思维发展的三阶段特征: 跨模态匹配、结构化组织与抽象迁移。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三阶符号干预模型”显著促进了幼儿在元认知调节、因果推理与情境迁移等关键能力的发展。研究进一步发现, 教学环境中的符号密度与结构化程度, 以及家庭文化资本水平, 对干预成效具有显著交互调节作用。据此, 研究提出课程设计、环境创设与家园协同三方面的教育建议, 为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与促进教育公平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高阶思维; 深度学习; 三阶干预模型; 文化资本; 学前教育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4XJY22); 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4111597)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22

一、引言

1.1 问题提出

在全球教育体系深度变革与核心素养导向不断强化的背景下,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已成为各级教育阶段的重要发展目标(Fullan, 2023; 沈霞娟等, 2023)。对于学前教育而言, 深度学习的基础在于儿童如何通过感知、操作、转化与抽象逐步建构认知结构, 尤其是如何有效运用语言、图像、数字等多种符号系统进行思维加工、意义表达与迁移应用(王小英&刘思源, 2022, 2023; 叶平枝&李小娟, 2023)。然而, 当前实践中“符号学习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 符号的教学常被简化为字母描红、数字认读等低层次机械操作, 缺乏对符号背后意义建构与逻辑结构的系统引导, 导致儿童的符号使用难以有效支持其认知发展(陈杰琦等, 2024; 陈迤悦, 2022; 马楠, 2023; 徐琳琳, 2025; 周欣&王烨芳, 2006)。与此同时, OECD(2024)发布的《全球学前教育质量报告》指出, 多数国家在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与元认知发展等关键指标上表现滞后, 无法充分满足未来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成长需求。已有研究虽分别从符号认知或思维发展出发开展探索, 但整体上仍缺乏对“从符号表征走向高阶思维”这一发展路径的系统追踪与机制解释。本研究提出, 3—6岁儿童认知系统的演进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从“感知性符号经验的积累”, 到“抽象结构的建构”, 再到“自主调控与反思能力的形成”的螺旋式跃迁过程。要完整揭示这一过程, 必须同时整合神经层面与认知行为层面的研究视角。

神经符号学(neurosemiotics)为此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切入点。Thompson与Varela(2001)提出, 人类神经系统并非被动地接收和编码外部信息, 而是通过符号系统(语言、图像、手势等)积极参与意义的建构与认知组织。符号不仅作为学习的媒介存在, 更是调节神经活动与驱动认知发展的“内在引擎”。因此, 将神经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学前深度学习研究, 有助于从机制层面深入解析幼儿从表征到思维的认知跃迁路径, 为学前教育领域的教学干预与课程设计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支持。

作者简介: 王陈(1979—), 女, 博士研究生, 高级讲师(副高级职称), 研究方向为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幼儿深度学习、家庭教育等;
王欣欣(1986—), 女, 博士, 高级讲师(中级职称), 研究方向为幼儿深度学习评价、儿童游戏课程, 幼儿社会情感发展与学习等;
郭涛(1987—), 男, 硕士研究生, 幼儿园(中级职称), 研究方向为幼儿学习评价, 幼儿园园本课程构建等。

通讯作者: 王欣欣

1.2 理论框架

本研究在理论上整合了三个具有互补性的经典理论模型，构建了系统且具解释力的认知发展分析框架，支撑对3-6岁幼儿深度学习能力发展的路径性研究。

首先，符号中介理论 (Symbolic Mediation Theory, Veraksa, 2011; Vygotsky & Steiner, 1979) 强调，儿童的心理功能发展根植于社会文化交互过程中，语言、图像、数字等作为中介性符号系统，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中起到桥梁作用。通过不断使用这些社会化的符号工具，儿童逐步将外部的文化知识结构内化，最终实现从低级心理功能向高级认知能力的转化。该理论为本研究探讨“符号输入如何驱动儿童认知跃迁”提供了理论起点。其次，执行功能发展模型 (Executive Function Model, Diamond, 2013) 从神经科学角度揭示了儿童在完成复杂认知任务时所依赖的核心心理机制，包括注意力控制、抑制能力、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等。该模型强调前额叶皮层在调控这些执行功能中的关键作用，提示认知发展不仅是外部刺激输入的结果，更需具备相应的神经加工能力。因此，将执行功能纳入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何符号刺激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幼儿产生不同的认知加工效果。第三，文化历史活动理论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Cole, 1998) 则进一步拓展了学习发生的社会文化基础，认为儿童的学习与认知并非孤立个体内部过程，而是嵌套在具有目标与工具的社会活动中。符号不仅是表征工具，更是儿童在具体文化情境中进行意义建构、角色扮演与问题解决的媒介。因此，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研究“环境提供的符号资源与实践机会如何重塑儿童的思维结构”提供了重要视角。

为增强三种理论之间的系统联结与逻辑整合，本文引入“理论桥梁段”，建构出一个“内在-外在协同模型”：其中，符号中介理论解释外在文化信息如何通过符号形式输入；执行功能模型解释神经系统如何加工与调控这些输入；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则提供了儿童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对符号进行重构和迁移的路径机制。三者交互作用，共同驱动幼儿从“符号识别”出发，逐步建构“逻辑结构”，最终实现“元认知反思”的认知跃迁路径。该整合模型不仅拓展了对幼儿深度学习机制的多维理解，也为后续干预课程的理论设计、变量测量与机制验证提供了系统化理论基础。

二、文献综述

2.1 符号表征研究进展

符号表征是儿童认知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特别是在3-6岁这一象征性思维初步建构的关键阶段，已成为学前教育研究的重要焦点。早期理论如Piaget (2013) 认为，儿童由感知运动阶段向前运算阶段过渡的关键标志，正是其象征性功能的发展，即通过图像、语言、动作等符号替代现实事物进行思维。Vygotsky 与 Steiner (1979) 则进一步指出，语言符号作为社会交互中最具代表性的中介工具，在儿童内化社会经验与构建心理工具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近年来，关于符号发展的动态性与非线性特征的研究日益丰富。Fischer (1980) 提出的技能层级建构理论强调认知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即儿童在特定情境中通过经验驱动形成阶段性能力跃迁。该观点在后续研究中得到验证，例如Tian与Luo (2021) 在积木建构活动中的实证发现表明，3至6岁儿童的符号表征能力具有明显阶段性增长特征，特别是在语言引导与图像支持等多模态输入情境下表现更为显著。Walker与Murachver (2012) 的纵向研究进一步指出，30至48个月龄段儿童的象征理解发展水平能显著预测其日后心智理论与反思能力，提示4至5岁是认知加工模式跃迁的关键窗口期。中文研究也从教育实践角度予以补充与细化。陈迤悦 (2022) 在对“建构游戏计划书”的观察中发现，中班幼儿能够将图像、语言与动作融合形成初级符号计划行为，这一行为与其在建构任务中的持续性和逻辑性呈正相关。陈杰琦等 (2024) 则提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如汉字篆体、象形纹样) 的引导下，幼儿在认知图式形成与象征性迁移方面表现出文化嵌入性优势。马楠 (2023) 的绘本阅读研究显示，图画符号不仅支持儿童图像识读，更能通过视觉线索强化儿童的自主理解路径，构建“视觉鹰架”。此外，徐琳琳 (2025) 通过对生活实践场中幼儿图像使用的观察指出，情境真实性越高，幼儿对图像与动作之间的符号联结能力越强；周欣与王焯芳 (2006) 也在数概念教学中发现，中班儿童对“数符号-数量-顺序”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知形成具备较强的迁移能力。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趋势：3至6岁是儿童符号能力由“模仿性输入”向“结构性整合”转型的关键阶段，其发展路径不仅受制于认知成熟度，也与环境中的文化符号质量、教师引导方式及多模态支持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在建构理论图谱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实证数据进一步揭示符号表征能力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跃迁机制及其与高阶认知的耦合路径。

2.2 高阶思维发展趋势

高阶思维 (higher-order thinking) 是深度学习的核心表征之一，主要涵盖分析 (analyse)、评估 (evaluate)、创造 (create) 等思维维度 (参见 Bloom 认知目标修订分类, 见 MyTeachingCupboard, TeachStarter, WeAreTeachers, 2023)。尽管学前儿童尚未完全掌握抽象逻辑工具，但大量研究表明，3-6岁阶段是其高阶思维的萌发期，具备显著的可塑性 (Kelemen, 2019)。在该阶段，儿童逐步形成初步的假设推理、因果判断与观点重构能力，尤其在具有社会互动支持的教育情境中表现更为明显。美国学前教育指导原则指出，使用高阶提问 (Higher-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HOT) 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与推理力。例如，“你为什么这么想？”“还有别的可能吗？”等问题远比简单的记忆性提问更能激发幼儿的认知加工与语言表达 (TeachStarter, 2023)。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讲故事或项目式学习等开放性教学活动中，教师采用探究型提问策略，能显著提升儿童在逻辑表达、观点生成及反思性表达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Trickey & Topping, 2006)。此外，神经科学研究也为上述行为观察提供了脑功能证据支持。Perlman et al. (2016) 采用功能近红外成像 (fNIRS) 技术，监测3-5岁幼儿完成认知柔韧性任务

时的脑部活动,发现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的HbO浓度变化与任务表现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提示,即便在学前阶段,复杂思维活动已在神经层面有所体现,且与高阶认知调节机制密切相关。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较为系统地证实了学前阶段高阶思维的早期发展潜力,并指出通过教师提问策略的优化与神经功能研究的融合路径,可以更好地支持幼儿深度学习能力的构建。这为融合教育学与脑科学视角开展未来教学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2.3 符号与思维的交互机制

在发展心理学与教育神经科学的融合研究中,符号系统逐渐被视为不仅是儿童表达外部世界的工具,更是其思维发生与转化的重要中介机制(Vygotsky & Steiner, 1979; Tomasello, 2005)。儿童通过操作语言、图像、动作等符号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实质上是其进行认知组织、概念重构与反思加工的过程(DeLoache, 2004)。因此,符号表征与高阶思维之间并非线性单向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认知机制网络。实证研究显示,多模态符号操作能力与高阶认知加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例如, Kirkorian et al. (2016)指出,当学龄前儿童接触语言与图像同步呈现的学习材料时,其因果推理与问题解决能力得分显著高于仅使用单一符号通道的对照组,表明多模态符号整合能力是幼儿认知加工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中文研究方面,陈逸悦(2022)通过对“计划书”建构游戏的观察分析发现,幼儿在图像、语言与行为三种符号系统协同使用的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组织计划性与任务反思能力,说明符号操作行为已嵌入幼儿初步的思维调节过程中。语言作为最具抽象化与社会性的符号系统,在该机制中具有特殊地位。研究表明,教师使用结构化语言引导(如对比、推理、反问)能够有效提升幼儿的逻辑建构与反思能力。Neuman & Wright (2014)的研究指出,在词汇解释与因果语言丰富的教学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其在批判性问题上的回应水平普遍较高。而冯淑霞(2014)则强调,日常语言教学活动中引入“递进式提问”策略,如“你还能怎么做?”“如果换一个角度呢?”可以有效激发儿童的观点重构能力与表达意愿。从脑科学角度来看,这种符号-思维交互机制亦可在神经功能层面得到印证。Emberson et al. (2017)研究发现,3-5岁儿童在参与语言主导的认知转换任务时,其前额叶皮层激活区域明显扩大,特别是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区域(DLPFC)与语言加工区域(Broca区)之间存在同步激活趋势,表明语言符号加工在调控高级认知中的神经基础作用。总体而言,当前研究逐步揭示出一个清晰趋势:3-6岁阶段是儿童由符号模仿向结构化思维跃迁的关键窗口期,而教师提供的多模态输入、多层次提问及支持性对话不仅能够促进符号系统的发展,还能作为外部认知工具内化为儿童的元思维资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构建“符号-思维”交互发展的动态模型,以指导深度学习情境的教学设计与干预路径优化。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符号输入、多模态整合、提问策略等角度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理论与经验基础。然而,当前研究多停留在教育观察或行为评估层面,仍缺乏对“符号-认知加工-思维输出”过程的神经机制解释与系统建模。为此,本研究在上述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结构化行为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尝试在认知神经与教学变量之间建立桥梁,系统构建“符号-加工-反思”的发展路径模型,为学前儿童深度学习能力的早期识别与干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三、研究方法

3.1 样本来源与筛选标准

本研究选取中国长三角地区六所省级示范性幼儿园作为样本来源,纳入180名3至6岁幼儿(平均年龄为4.7岁,SD=0.89),其中男童92人,女童88人。样本在性别、家庭文化资本、语言发展水平等主要变量上分布均衡,具备代表性与可比性。样本筛选依据《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相关发展指标,由幼儿园教师与发展心理测评师联合评估,排除存在智力发育迟缓、重度语言障碍、严重行为问题等个体,确保研究对象具备符号学习与高阶思维发展的基础条件。

3.2 工具体系与测量变量

为全面揭示幼儿“从符号表征到高阶思维”的发展机制,本研究采用以下三类测评工具,分别涵盖环境结构、行为表现与认知能力三个层面:

(1) 环境结构测评: ECERS-3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 Third Edition)

使用中文版ECERS-3对幼儿园环境进行标准化评估,重点关注“语言与识字”“学习活动”与“互动”维度中符号性材料的投放情况与使用频率。量表采用1-7分评分方式,三位评估人员接受统一培训,Cohen's κ 一致性系数为0.89。

(2) 行为与认知测评: BRIEF-P 与工程思维行为观察量表

通过BRIEF-P (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Preschool Version)量表评估幼儿的执行功能,包括抑制控制、自我调节、情绪转换与工作记忆等五项子维度,共63个条目,由熟悉幼儿的教师完成填写,量表整体信度 $\alpha=0.91$ 。

同时结合Lottero-Perdue等(2021)制定的幼儿工程思维行为观察量表,对“问题提出”“推理构建”“反思调整”等行为进行记录与评分,总分范围为0-20,数据由两位研究员分别观察并取均值,以提高测量的客观性与一致性。

3.3 实验设计与干预路径

本研究采用组间-组内混合实验设计。将 180 名幼儿随机分配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90 人。整个研究周期包括三轮测评：

(1) T1 (前测)：对两组幼儿分别实施 ECERS-3 与 BRIEF-P 测评，记录基线水平；

干预阶段 (8 周)：实验组实施“三阶符号干预模型”，每周 4 次、每次 30 分钟，内容包括：第 1-2 周：具象锚定阶段，开展“感官-图像-语言”三模态符号配对任务；第 3-5 周：系统联结阶段，通过“符号分类”“故事拼图”“图像排序”等活动建立符号结构意识；第 6-8 周：抽象迁移阶段，结合“角色扮演”“计划设计”等项目式学习，引导幼儿实现符号的概念化与迁移应用。

对照组继续实施日常课程内容，如主题教学与绘本阅读，不引入结构化符号支持策略。

(2) T2 (中测) 与 T3 (终测)：对两组幼儿重复 T1 所采用的全部测评工具，追踪干预成效。

3.4 数据分析策略

本研究使用 SPSS 27.0 与 RStudio 4.3.1 进行统计分析，具体方法如下：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RM-ANOVA)：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在三个时间点上的关键指标变化趋势；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教学环境质量 (ECERS-3) 与教师行为支持方式对执行功能 (BRIEF-P) 与高阶思维行为的预测作用。通过构建“环境-行为-认知”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结合系统性干预模型与多阶段测量工具，本研究将系统揭示幼儿符号认知发展与高阶思维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为提升学前深度学习能力提供路径示范与实证依据。

四、研究结果

4.1 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分析

结合三轮测评数据 (T1-T3)，研究识别出 3-6 岁幼儿从符号感知到高阶思维的三阶段发展特征：

第一阶段 (3-4 岁)：跨模态匹配初步建立。实验组幼儿在“感官-图像-语言”三模态认知任务中表现出逐步增强的整合能力。行为观察数据显示，其在“问题提出”与“动手尝试”维度评分由 T1 时的平均 4.2 分提升至 T3 时的 6.5 分 ($F(1, 88)=9.13, p<0.01$)。

第二阶段 (4-5 岁)：符号结构化能力显著提升。在“符号分类”“图像排序”类任务中，幼儿能主动完成概念重组与因果归类。实验组幼儿在 BRIEF-P“工作记忆”子量表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M=19.3$ vs $M=15.6, t=3.72, p<0.001$)，工程思维行为得分也同步上升。

第三阶段 (5-6 岁)：抽象迁移与元思维雏形建立。幼儿在“计划设计”“表演故事”等任务中表现出反思调整、自我解释等元认知特征，BRIEF-P 中“情绪控制”与“转换能力”维度得分显著改善 (F 值均 $>6.50, p$ 均 <0.01)。

4.2 关键变量效应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揭示了教学环境结构对高阶思维行为的显著预测作用。ECERS-3 中“语言与识字”“学习活动”两个维度得分总和可显著预测 BRIEF-P 总分 ($\beta=0.39, p<0.01$)，尤其是高分园所中的幼儿在“工作记忆”“认知抑制”等行为表现维度得分更优，表明教学情境的符号材料丰富度与任务结构性对幼儿认知调节有积极影响。详见表 1。

表 1 教学环境得分对执行功能总分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回归系数 β	标准误 SE	t 值	p 值
语言与识字维度	0.24	0.07	3.21	<.01
学习活动维度	0.28	0.06	4.03	<.001
教师互动维度	0.13	0.08	1.63	0.107
常数项 (截距)	2.03	0.34	5.97	<.001
模型解释力 R^2	0.37	—	—	—

此外，工程思维行为观察得分与 ECERS-3 环境评分呈显著正相关 ($r=0.46, p<0.01$)。如图 1 所示，教学环境支持度高的园所中，幼儿在“推理构建”与“反思调整”两个维度的平均得分提升更为明显，表现出更强的结构化探索与认知自我调节倾向。

4.3 家庭文化资本的调节作用

在进一步引入家庭文化资本 (FCC) 变量后，调节分析显示其在“干预×环境结构→执行功能”路径中具显著调节效应 (交互项 $\beta=0.29, p<0.05$)。在 FCC 高水平家庭中，幼儿在干预后 BRIEF-P 得分提升幅度达 +4.73 ($p<0.01$)，显著高于 FCC 低组 (+2.01)。说明家庭文化氛围可放大结构化教学对思维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清晰描绘了 3-6 岁幼儿在“符号-思维”路径上的阶段性演进，验证了“三阶符号干预模型”在认知行为发展上的积极效应。教学环境与家庭文化资本作为关键调节变量，在干预效果发挥与认知发展路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凸显出通过环境优化与家庭协同促进幼儿深度学习能力建构的可行路径与机制基础。

五、讨论

本研究通过结构化干预与多维度测评，系统揭示了 3-6 岁幼儿在“符号-思维”发展路径上的阶段特征及其关

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不仅呈现出幼儿认知发展从跨模态感知、符号结构化到抽象迁移的阶段演进过程，也说明了教学环境与家庭文化资本在此过程中的显著作用。

5.1 幼儿“符号—思维”发展的阶段演进机制

研究发现，幼儿符号认知与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并非线性积累，而是体现为阶段性的跃迁与整合。第一阶段（3-4岁）表现为感官、图像与语言的初步匹配，说明幼儿已开始在多模态输入中建立符号间的关联。第二阶段（4-5岁）体现出概念结构重组与因果归类能力的显著提升，标志着符号间关系的理解与逻辑加工的萌芽。第三阶段（5-6岁）则出现反思调整、自我解释等元认知特征，显示幼儿开始运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与自我监控。该发展过程与 Vygotsky 和 Steiner（1979）所强调的“心理工具”功能一致，即儿童通过社会文化媒介内化外部工具，从而实现思维能力的跃升。

5.2 “三阶符号干预模型”的有效性验证

研究结果验证了“三阶符号干预模型”在促进幼儿认知能力发展方面的有效性。该模型基于“具象锚定—系统联结—抽象迁移”三阶段路径，通过系统化的多模态任务与项目式学习策略，推动幼儿在实践中不断建构与运用符号系统。在第一阶段的多模态匹配任务中，降低了幼儿的认知负荷，帮助其建立表征间的初步连接；第二阶段的结构化分类与排序任务则激活了逻辑归纳与结构理解能力；而在第三阶段的情境模拟与项目式探索中，儿童开始在复杂任务中迁移与应用符号知识，展现出初步的元认知特征。这一干预模式契合 Mayer（2005）提出的多模态学习原则与 Bruner（2009）的“螺旋式认知发展”理论，即通过不断重组与提升符号使用水平，推动认知结构的深化。

5.3 教学环境与家庭文化资本的交互作用机制

教学环境在干预中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多元回归分析表明，ECERS-3 中“语言与识字”“学习活动”维度的评分能显著预测幼儿执行功能发展，说明符号材料的丰富性、活动的结构化程度直接影响到儿童在“工作记忆”“认知抑制”等核心认知能力上的表现。该结果印证了 Neuman 与 Celano（2012）提出的“语义饱和度理论”，即环境中信息密度越高，越能刺激儿童深层加工能力的发展。

家庭文化资本的调节效应亦不容忽视。研究发现，高文化资本家庭的幼儿在干预中的受益程度显著高于低文化资本组，这可能与其在课外拥有更多语言输入机会、更高频的亲子阅读及认知互动有关。此结果与 Bronfenbrenner（1994）生态系统理论中“家庭—学校”系统的交互观点相符，强调微系统之间联动性对儿童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该调节效应也提示我们注意教育公平问题：若干预策略未能覆盖家庭支持薄弱群体，可能在无意中扩大阶层间的学习差距。因此，建议在推广此类干预策略时同步制定家庭赋能路径，如亲子活动包、家庭指导手册、家园共育机制等。

5.4 教育理论建构与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符号—思维”递进发展模型：幼儿通过感官—图像—语言的多模态输入初步建立符号感知基础，在结构化任务中构建符号系统，最终在社会情境与项目任务中实现抽象迁移与元认知生成。该模型不仅丰富了当前关于幼儿深度学习能力建构的理论体系，也为学前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具体而言，本研究带来三点启示：第一，课程设计应重视符号系统的多模态性与结构化特征，合理组织语言、图像与操作性材料，避免信息堆叠导致的认知负荷过重；第二，教师应由“知识传授者”转向“意义建构引导者”，通过提问、示范、反思支持等策略，引导幼儿建构符号与情境的内在联系；第三，政策制定者应将家庭因素纳入干预设计，推动形成园所—家庭双向协同机制，确保教育干预的公平性与有效性。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三阶符号干预模型”对 3-6 岁幼儿认知发展的积极作用，强调了环境与家庭在干预机制中的交互性作用，为我国学前教育阶段“从符号表征到高阶思维”的能力发展路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六、教育建议

6.1 课程设计路径：三阶符号干预模型的实践转化

本研究提出的“三阶符号干预模型”为幼儿园课程设计提供了阶段化、结构化的教学框架。建议园本课程开发遵循“具象锚定—系统联结—抽象迁移”的发展逻辑，以实现从感官体验到高阶认知的螺旋上升。第一阶段“具象锚定”应聚焦多感官符号体验，采用实物操作、角色扮演、声音模仿等方式，构建语言、图像与动作三类符号的初步对应关系。此阶段的教学活动应注重真实情境与生活经验的整合，例如利用“自然观察日”“感官探索角”等方式，强化幼儿的表征意识。第二阶段“系统联结”强调结构化思维的引导，课程中应融入概念图构建、因果图排序、叙事链搭建等任务，以支持幼儿在符号之间建立逻辑联系。教学材料可选用模块化构件、符号拼图等，配合语言引导，促进符号的系统性内化。第三阶段“抽象迁移”聚焦符号在复杂任务中的应用。建议引入项目式学习（PBL）、跨领域探究任务等教学模式，促使幼儿在真实问题解决中使用已有符号系统进行反思、规划与表达。例如设计“幼儿创意市集”主题活动，引导其完成品牌命名、商品标识、故事演绎等任务，发挥语言与图像的双重表达潜力。

6.2 教学环境策略：营造结构—生成融合的符号生态

研究发现, 教学环境中“语言与识字”“学习活动”维度显著影响幼儿执行功能发展, 提示环境应同时具备结构性与生成性。在结构性层面, 建议增设“符号操作区”“逻辑推理区”等专属空间, 提供图表、标志、分类道具等材料, 帮助幼儿在操作中理解符号规则。在生成性层面, 设立“开放式表达墙”与“思维涂鸦区”, 支持幼儿用自主创新的方式表达理解, 如自由绘图、语音记录、情景重现等, 强化其符号的自我生成能力。同时, 教师应在互动中承担“符号引导者”角色, 运用“语言反馈—逻辑提示—情感回应”的三阶段提问策略, 促进幼儿思维的外显与递进。例如通过追问“你为什么这样画?”“这张图能不能和前面那幅连起来讲一个故事?”引导儿童将符号联结为意义单元。

6.3 家园协同路径: 数字化评价与家庭文化赋能并进

考虑到家庭文化资本在干预效果中的调节作用, 建议构建“认知发展闭环”机制, 实现幼儿园与家庭的双向联动。在技术层面, 推动“符号行为数字档案”建设, 利用图像识别、语音转写等工具对幼儿日常活动中符号使用情况进行数据记录, 并生成阶段性成长报告。教师可据此调整教学节奏, 家长亦能据此了解子女的认知进展。在家庭参与层面, 建议设立“亲子符号共创营”“家庭语图日记”等活动机制, 鼓励家庭成员参与图表制作、故事重构、实物命名等符号生成活动。通过“家园共育手册”提供具体策略与案例模板, 提升家长在家庭环境中开展认知引导的能力。

七、讨论与展望

7.1 理论深化与方法创新

本研究在理论建构与方法路径上实现三项创新:

第一, 构建“符号—思维”阶段性发展模型, 明确提出 3-6 岁幼儿认知演进的三阶段路径, 深化了符号表征理论在早期教育领域的实践转化。该模型融合了 Vygotsky“心理工具”论、Bruner 的“表征发展理论”与当前执行功能理论, 展示了语言与图像作为认知桥梁的功能机制。

第二, 研究在学前教育领域率先实现“神经—行为—环境”三维数据整合。通过 fNIRS 脑成像技术, 结合 ECERS-3 环境评分与 BRIEF-P 行为量表, 建构了结构化干预、行为表现与脑功能之间的关联路径, 丰富了教育神经科学的实证范式, 突破了传统认知测评单维度限制。

第三, 提出“三阶符号干预模型”与“家庭文化资本调节效应”框架, 为未来干预方案设计提供了可移植、可评价的理论依据。该模型具有通用性与可操作性, 可作为“课题教学—符号表达—思维提升”一体化教学实施方案的核心理论支撑。

7.2 现实启示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结果为我国学前教育的质量提升与课程改革提供三方面启示: 首先, 应在国家层面加强对“符号—思维”系统课程的政策支持, 将符号系统建构纳入幼儿核心素养指标体系。课程评估不应停留于知识掌握层面, 而应关注语言、图像、逻辑等多元符号系统的整合能力。其次, 政策制定应将家庭支持机制纳入干预设计, 特别是在资源薄弱地区推广“家庭教育指导包”“家长成长课堂”等低成本、高效能的干预形式, 避免干预效果受限于家庭差异, 从而实现教育公平的纵深推进。最后,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发展轨迹与跨文化比较研究: 纵向追踪: 持续观察幼儿在小学阶段的符号迁移能力、阅读理解与问题解决能力, 验证本研究所构建模型的长期影响; 跨文化比较: 考察不同语言系统(如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下儿童符号加工策略的异同, 探讨语言结构对认知路径的调节机制; 技术整合与伦理守护: 在引入脑科学工具(如 fNIRS、眼动仪、脑机接口)的同时, 强化家长知情同意机制与数据隐私保护, 构建伦理—科技双重保障体系。

综上所述, 本研究不仅为理解 3-6 岁幼儿从符号表征到高阶思维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系统模型, 也在干预策略、评估体系与家庭协同等方面提出了可行建议。未来可持续深化教育神经科学、文化心理学与课程论的交叉融合, 推动以“深度学习—综合素养”为导向的学前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 [1] FULLAN M. The principal 2.0: Three keys to maximizing impact[M]. John Wiley & Sons, 2023.
- [2] 沈霞娟, 武梦迪, 冯锐. 深度学习能力: 概念框架、核心维度与测量体系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3 (12): 1-7.
- [3] 王小英, 刘思源. 幼儿深度学习的实施路径与核心支持要素探析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6): 151-158.
- [4] 王小英, 刘思源. 幼儿深度学习的感性认识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 (7): 1-12.
- [5] 叶平枝, 李晓娟. 对幼儿深度学习的深度理解与现实审视及其促进 [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 (7): 13-24.
- [6] 陈杰琦, 王子涵, 张昊昱. 传统文化符号介入幼儿认知发展的关键期研究 [J]. 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4 (2): 45-52.
- [7] 陈逸悦. 中班幼儿符号表征能力的观察和支持 —— 以幼儿建构游戏“计划书”为例 [D].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 [8] 马楠. 绘本图画符号在幼儿自主性深度阅读中的鹰架作用 [D]. 吉林外国语大学, 2023.
- [9] 徐琳琳. 生活实践场中幼儿图像与符号表征能力的提升策略 [J]. 教育界, 2025 (5): 113-115.
- [10] 周欣, 王焯芳. 幼儿园中班数学教育与儿童书面数字符号学习 [J]. 幼儿教育 (教育科学版), 2006 (6): 19-22+46.
- [11] OECD. Global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port[R]. OECD Publishing, 2024.
- [12] THOMPSON E, VARELA F J. Radical embodiment: Neural dynamics and consciousness[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1, 5(10): 418-425.
- [13] VERAKSA A N. Symbolic mediation in cognitive activ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Years Education, 2011, 19(1): 89-102.

- [14] VYGOTSKY L S, STEINER G. The concept of activity in soviet psychology[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79, 49(3): 302-320.
- [15] DIAMOND A. Executive function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3, 64: 135-168.
- [16] COLE M. Cultural psychology: A once and future disciplin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7] PIAGET J. Play, dreams and imitation in childhood[M]. Routledge, 2013.
- [18] FISCHER K W. A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control and construction of hierarchies of skills[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0, 87(6): 477-531.
- [19] TIAN M, LUO T. The development of 3-to 6-year-olds'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ability in a block construction activity[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2021, 191(9): 1449-1467.
- [20] WALKER R F, MURACHVER T. Representation and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2, 48(2): 509-522.
- [21] KELEMEN D. The magic of mechanism: Explanation-based instruction on counterintuitive concepts in early childhood[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9, 14(4): 510-522.
- [22] TRICKEY S, TOPPING K J. Collaborative philosophical enquiry for school children: Socio-emotional effects at 11 to 12 years[J].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06, 27(5): 599-614.
- [23] TOMASELLO M.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4] DELOACHE J S. Becoming symbol-minded[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4, 8(2): 66-70.
- [25] KIRKORIAN H L, CHOI K, PEMPEK T A. Toddlers' word learning from contingent and noncontingent video on touch screens[J]. *Child Development*, 2016, 87(2): 405-413.
- [26] NEUMAN S B, WRIGHT T S. The magic of words: Teaching vocabulary in the early childhood classroom[J]. *American Educator*, 2014, 38(2): 4-13.
- [27] 冯淑霞. 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中教师有效提问的策略 [J]. *学前教育研究*, 2014 (6): 70-72.
- [28] LOTTERO-PERDUE J, et al. Engineering design for young children: A framework for K-12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design[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21, 110(1): 1-29.
- [29] WORTHAM S. Language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Emergence of the mediated mind[J]. *Mind, Culture, and Activity*, 1998, 5(1): 76-79.
- [30] FLAVELL J H.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developmental inquir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 34(10): 906-911.
- [31] MAYER R E. 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M]//*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ultimedia lear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48.
- [32] BRUNER J S.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3] NEUMAN S B, CELANO D C. Giving our children a fighting chance: Poverty, lite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apital[M].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15.
- [34] GOODMAN I F, HEMPHILL L, SNOW C E, et al. Unfulfilled expectations: Home and school influences on literacy[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om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to Higher-Order Thinking: Developmental Pathways and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for Deep Learning in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6

Chen Wang¹, Xinxin Wang^{2*}, Tao Guo³

¹ Guangzhou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China

² School of Education, G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³ Shenzhen Ronghu Shiji Kindergarten, Shenzhen,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enters on a “symbolic-thinking” developmental framework and integrates theories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executive functio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deep learning in children aged 3 to 6. Employing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the research combines executive function assessments, structured classroom behavior observations, learning environment evaluations, and analyses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The study identifies a three-stage cognitive progression in young children—from cross-modal matching to structured organization and abstract transfer.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roposed “Three-Level Symbolic Intervention Mode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hildren's 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causal reasoning, and contextual transfer abilities.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is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by the density and structure of symbolic elements i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ccordingly, this research offers recommendations in three domains: curriculum design,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grounding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mprov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quality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Keywords: higher-order thinking; deep learning; three-level symbolic intervention model; cultural capit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中刑罚个别化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张凯悦¹

(1.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部分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后,其暴力犯罪案件的刑罚个别化实践面临困境。法律规范模糊、司法程序不规范、个体评估困难制约实施效果,具体表现为量刑标准不统一、程序衔接不畅及评估缺乏专业支撑等问题。这源于立法滞后、部门协作不畅与社会支持不足。需通过完善立法、优化司法程序、构建科学评估体系及建立多元协同机制,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实现特殊司法保护。

关键词: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刑罚个别化;现实困境;完善路径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69

引言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17条新增第3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将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从之前的14周岁,个别性地、有条件地下调到12周岁,提供了在司法体系内处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一种路径。随着这一法律规定的实施,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逐渐进入司法视野。2025年3月8日发表的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2024年起诉未成年人犯罪5.7万人,核准追诉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的原因复杂多样,是在身心发育未成熟的情况下受到各种不良环境和社会风险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寄希望于以惩罚性的刑罚简单应对,无疑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而难以奏效。由此针对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的低龄未成年人而言,遵循刑罚个别化原则尤为重要,该原则强调根据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包括生理、心理、成长环境等因素,给予最适合的处罚与矫治措施。但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律规范模糊、司法程序不规范、个体评估困难等问题制约着刑罚个别化的有效实施。本文聚焦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中刑罚个别化的出现的现实困境,重点关注司法程序优化以及社会矫治体系建设,旨在为完善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的司法处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建议。

一、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的现实困境

1.1 法律规范模糊导致适用标准不一致

现行法律对于低龄未成年人案件刑罚个别化的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标准不一致。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了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条件,但对于“情节恶劣”等关键要件缺乏明确界定,在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差异较大,导致类似案件出现不同判决结果,影响司法公信力。

首先,对“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情节恶劣”的认定过于宽泛,缺乏具体量化标准。在理论上学者提出,应从犯罪手段、行为次数、掩盖犯罪事实等积极因素,以及身心发育迟缓、被害人过错等阻却事由进行多角度评估。例如,在2024年河北邯郸“13岁少年杀人埋尸案”中,被告人张某某因琐事伙同他人杀害同学并埋尸,手段极其残忍,该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法院依据刑法第17条第3款,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某某无期徒刑。这是我国首例对12周岁至14周岁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而在其他类似案件中,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判决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其次,对于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条件和程序规定不清晰。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

事处罚的, 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但"必要的时候"如何界定, 专门矫治教育的具体适用条件和程序如何, 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使得司法实践中在选择处理方式时缺乏明确指引。

最后, 法律对低龄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特殊规定不足。目前关于行刑衔接的法律法规较为分散, 缺乏一部系统、全面的专门性法律对行刑衔接的各个环节进行规范。对于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行刑衔接中的特殊问题, 更是缺乏针对性的规定, 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1.2 司法程序不规范阻碍刑罚个别化实现

在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 司法程序的不规范也成为阻碍刑罚个别化实现的重要因素。

在低龄未成年人暴力案件行刑衔接中存在梗阻。现行法律未对行政程序向刑事程序移送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的标准作出清晰界定。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在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认定、未成年人主观恶性评估、暴力行为性质判定以及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量化标准等关键问题上, 存在理解分歧与判断差异。这种标准模糊性导致案件移送过程争议频发, 直接影响案件处理的时效性与准确性。并且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 因缺乏明确转化规则, 难以有效衔接刑事诉讼程序。司法机关常因证据转化问题对移送案件不予受理或要求重新取证, 不仅造成司法资源浪费, 更导致案件处理周期延长, 削弱了司法效率与公正性。

在核准追诉程序运行方面也存在不足。依据刑法规定, 对 12 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需经最高检核准追诉, 但实践中该程序在具体流程、审查标准及办理时限等方面缺乏细化规定。程序的不确定性导致案件处理效率低下, 低龄未成年人长期处于处理等待状态, 无法及时获得与其个体情况相适配的处遇, 严重阻碍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落实。

1.3 个体评估困难制约刑罚个别化实施

准确评估低龄未成年人的个体情况是实现刑罚个别化的关键, 但在实践中, 缺乏专业、系统的评估机制和工具, 制约了刑罚个别化的有效实施。

一方面, 缺乏专业的评估主体和方法。目前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成长环境、犯罪成因等方面的评估多依赖于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 缺乏专业的心理测评、社会调查等手段支持。上海宝山检察院研发了"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管理系统", 并于 2025 年正式投入使用, 但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标准和方法。在全国大部分地区, 评估主体不明确, 往往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推诿的情况, 难以全面、客观地掌握低龄未成年人的个体信息。

另一方面, 社会调查制度不完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09 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抚养、收养、监护、探望等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的, 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社会组织对未成年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社会调查。"但这一规定主要针对民事案件, 对于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不足。在司法实践中, 社会调查往往流于形式, 缺乏深度和专业性, 无法为刑罚个别化提供充分依据。

此外, 心理评估的应用不充分也导致了刑罚个别化的有效实施。虽然部分地区开始引入心理评估, 但心理评估的结果多作为检察官办案的辅助工具, 不会直接作为司法处理的依据。心理评估与刑罚个别化的结合不够紧密, 无法充分发挥心理评估在刑罚个别化中的作用。在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虽然进行了心理评估, 但评估结果并未真正影响量刑决策, 使得刑罚个别化流于表面。

二、现实困境产生的原因分析

2.1 立法滞后于现实需求

随着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 现有的法律体系未能及时跟进和完善, 导致立法滞后于现实需求。

从对低龄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来看, 立法者对低龄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缺乏对司法实践需求的深入调研, 导致法律规定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 无法为刑罚个别化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例如, 刑法修正案(十一)虽然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 但对于如何在刑罚适用中体现个别化原则, 缺乏具体规定。

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角度分析, 现行法律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规定过于原则化, 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和程序规范, 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适用。例如, 刑法第 17 条第 4 款规定的"必要的时候, 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中的"必要的时候"缺乏明确界定, 使得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针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缺乏统一的法律体系。目前关于低龄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规定分

散在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导致法律适用混乱。例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教育措施，但未明确这些措施与刑罚个别化的关系，使得司法实践中难以衔接。

2.2 部门协作不畅与监督机制缺失

在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部门协作不畅与监督机制缺失也是导致刑罚个别化困境的重要原因。

第一，部门利益与职责划分不清。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职能定位和工作目标上存在一定差异，部分行政机关存在“重行政处罚、轻刑事移送”的倾向，担心案件移送后失去对案件的主导权，影响自身业绩考核。同时，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够明确，在案件移送、证据收集、后续处理等环节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

第二，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在信息共享方面，存在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全面的问题，导致双方无法及时了解案件进展和相关线索。例如，在一些案件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之间信息不畅通，导致对同一案件的处理标准不一致，影响了刑罚个别化的实施。

第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现行监督体系对于行刑衔接工作的监督力度不足，无论是内部监督还是外部监督，都难以对行政机关不移送案件、司法机关不及时受理案件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纠正。缺乏监督导致一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刑衔接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执行不到位。

2.3 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

低龄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有效实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但目前社会支持体系的不健全成为制约刑罚个别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因为低龄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需要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但目前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不高，参与渠道不畅，导致社会资源无法有效整合。例如，在部分地区，虽然有社会组织关注未成年人保护，但缺乏与司法机关的有效对接机制，难以参与到低龄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实践中。

在社区支持功能方面呈现弱化趋势。社区作为低龄未成年人生活和成长的重要环境，在刑罚个别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社区的支持功能弱化，缺乏对低龄未成年人的有效监管和帮扶。例如，缺乏针对低龄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和教育资源，无法为低龄未成年人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家庭监护责任落实不到位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家庭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但在一些案件中，家庭监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低龄未成年人缺乏必要的关爱和管教。例如，在部分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中，涉案未成年人往往来自单亲家庭、留守家庭或存在家庭教育缺失的家庭，家庭监护的缺失是导致其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的完善路径

3.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的基础和前提。

制定一部系统、全面关于低龄未成年人的相关法律尤为重要，该法律对低龄未成年人案件刑罚个别化的各个环节进行统一规范，明确案件移送的具体标准、证据转化的规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责与权限等内容。该法应当充分体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将刑罚个别化理念贯穿始终，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再者细化“情节恶劣”等关键要件的认定标准。建议在司法解释中对“情节恶劣”等关键要件进行细化，明确认定标准，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具体可从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犯罪后果、犯罪后的态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例如，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性案例，对于使用工具攻击要害部位、实施二次伤害等行为，直接认定为“特别残忍手段”。同时，需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区分“模仿性犯罪”与“主动性犯罪”。

最后强化家庭教育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在强化家庭教育方面，完善法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帮助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父母提高履行教育职责的能力同时加强国家的主导；二是对于有能力却不履行，甚至纵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家庭，国家应当在协同帮助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同时，强化家庭教育的强制性色彩，增加父母逃避家庭教育义务时的责任条款。

3.2 优化司法程序

优化司法程序是实现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的重要保障。

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编，针对低龄未成年人的特点，设计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的诉讼程序。该程序应当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注重对低龄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例如，可以设置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法庭环境，采用圆桌审判等非对抗式庭审方式，减轻低龄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

再者建立健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案件信息、执法动态等数据的实时互通，提高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完善案件会商机制，针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定期组织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会商研讨，统一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标准。例如，可以建立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组成的未成年人案件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低龄未成年人案件处理中的问题。

最后根据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建立多元化的处遇措施体系，实现刑罚个别化。具体而言，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法》）在2020年修订时首次引入“保护处分”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治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可以根据《预防法》所规定的保护处分，包括第41条规定的9项矫治教育措施、第43、44条规定的专门教育措施以及第45条规定的专门矫治教育措施，分别适用于罪错行为严重程度不同以及个体情况不同的未成年人，初步构建起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分级干预体系。

3.3 构建科学评估体系

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是实现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的关键环节。

建立专业的低龄未成年人个体评估机构，在省、市两级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评估中心，整合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力量，制定科学、系统的评估标准和流程，运用专业的心理测评工具、社会调查方法，全面、客观地评估低龄未成年人的个体情况。该评估中心应当独立于司法机关，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社会调查是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各自的诉讼阶段对低龄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社会交往、心理状态等进行全面调查。同时，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和形式，确保社会调查报告能够为刑罚个别化提供充分依据。例如，可以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包括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悔罪表现等内容，并附心理评估报告。

在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中普遍引入心理评估以加强心理评估的应用，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认知能力、行为倾向等进行评估，为刑罚个别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可以借鉴上海宝山检察院研发的“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管理系统”，通过系统评估发现未成年人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同时，应当明确心理评估结果在量刑中的作用，将心理评估结果作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3.4 建立多元协同机制

建立多元协同机制是实现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的重要保障。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完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是实现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的重要支撑。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组成少年成长的基本社会环境，其优劣程度直接决定着少年能否健康成长及其程度。为实现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目标，应当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充分发挥国家的统筹和保障功能，在各司其职中协同推进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

家庭是人的第一生活环境，也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机制有利于加强对低龄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教育和指导，提高其监护能力和水平，为低龄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以监护监督工作为基础融入家庭保护，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优化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和家庭教育环境，避免未成年人因父母教育方式不当、缺乏监管等走上犯罪道路。例如武汉各区各部门大力推进“平安家庭”和“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村）”建设，全覆盖建成区级家庭教育指导站，开展家庭教育指导1.7万余人。

完善学校专门教育作为家庭教育不足的补充。对于专门学校的投入要更上心，不仅仅是体现在扩大专门学校的规模，还要提高专门学校的办学质量，为低龄未成年人提供更加专业、有效的教育矫治服务。以参与法治校园建设为依托融入学校保护，督促学校履行教育、保育、安全保障责任，积极预防校园欺凌等现象发生，开展校园周边环境安全治理。例如，武汉市公安局、市检察院推动制定《武汉市公安机关办理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送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的程序规定》《武汉市检察机关关于罪错未成年人送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的规定》，分类健全“警送生”“检送生”“家送生”人（离）校评估及管理制度，44名教师、13名警力常驻学校开展矫治教育。

建立由司法社工、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等组成的社会观护队伍，可以有效地为低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辅导、行为矫正、就业指导等帮助。以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为重点融入政府保护，通过检察综合履职强化政府在未成年人教育、卫生健康、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职责。比如，重庆市检察机关以“莎姐”品牌为载体，持续21年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积极发挥司法促推作用。2023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将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纳入一体推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重庆法治重庆“一把手”工程，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将“莎姐”检察品牌上升推广为全市性工作品牌，部署“莎姐守未”专项行动。此外，检察机关还可以在培训、壮大普法队伍方面发力，吸纳学校法治老

师、社会工作者、律师、退休司法工作者共同参与，提升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的覆盖面、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二，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建议加强对未成年人司法、心理评估、教育矫治等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其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例如，可以在高等院校设立未成年人司法、心理评估等专业方向，培养专门人才；建立未成年人司法领域的专家库，为司法实践提供专业支持；加强对现有司法人员、教师、社工等的培训，提高其处理低龄未成年人案件的能力。

第三，建立健全监督评估机制。建议建立健全对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工作的监督评估机制，确保各项措施的有效实施。具体而言，可以建立由人大、政协、检察机关等组成的监督小组，对低龄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刑罚个别化的效果进行评估；定期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和完善工作措施。

结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实施，以及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我国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法律规范、评估体系、司法程序、社会矫治等多个方面。当前，我国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面临法律规范模糊、司法程序不规范、个体评估困难等现实困境，需要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科学评估体系、优化司法程序、完善社会矫治体系等方面入手，逐步加以解决。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推动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刑罚个别化工作的深入开展，为低龄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只有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全面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才能真正实现对低龄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参考文献：

- [1] 陈昊明.《刑法》第17条评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J].法学家,2023,(01): 176-190+196.
- [2] 何挺.低龄未成年人“罪与罚”的体系性反思[J].上海法治报,2023.
- [3] 邱帅萍.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立场及其展开——以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为切入[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02): 73-78.
- [4] 刘仁文.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的司法适用[J].法学,2023,(07): 59-76.
- [5] 吕露鹏,蔡道通.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罪与罚[J].湖北社会科学,2024,(10): 135-143.
- [6] 高维俭.少年法治系统论纲[J].政治与法律,2022,(10): 82-95.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Individualized Punishment in Cases of Violent Crimes by Young Minors

Zhang Kaiyue¹

¹Shand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Yantai 26400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mendment (11) to the Criminal Law lowered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some young juveniles, the practice of individualized punishment for violent crime cases faced a dilemma. Vague legal norms, non-standard judicial procedures, and difficulties in individual assessment restrict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sentencing standards, poor procedural cohesion,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support for assessments. This stems from lagging legislation, poor sectoral coordination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minors" and achieve special judicial protection by improving legislation, optimizing judicial procedures, building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pluralistic coordin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young minors; violent crime; individualization of punishment; Realistic dilemmas; Refine the path

领事协助权在投资入籍下的挑战与应对

孙雪晗¹

(1.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摘要: 当下, 全球化浪潮对传统国际规则带来挑战。外交与领事关系方面, 国籍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尤为凸显——投资入籍项目的兴起及双重国籍现象的普遍发生, 使得领事协助权的行使冲突频发, 国际社会缺乏行之有效的统一规则加以规制。《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于1963年正式颁布, 彼时, 双重国籍还未成趋势, 投资入籍项目更是尚未产生, 这使得领事权利的边界在当下出现空白, 导致各国在实践中形成多种不同立场与做法, 并存在拒绝他国领事协助请求的先例。目前, 已有五起因适用《维约》领事协助条款引发的争端被提交至国际法院, 双重国籍问题为其中两起案例之核心。双重国籍极易引发国籍认定标准分歧与协助主体数量的争端, 一方面, 个人可能面临因接受国政府阻挠而无法获得国籍国领事协助的困境, 另一方面, 国家可能面临对其国内法律秩序形成不必要的扰乱和负担, 以及因权利滥用而实质违反条约义务的困局, 其深层诱因在于投资入籍国与公民实质联系薄弱的系统性弱势, 及国际规则缺失使当下各方无法可依的规则空白。基于此, 本文旨在通过对《维约》公约文本、缔约文件、谈判过程及司法案例进行研究, 着重分析第5条、第36条的规则缺漏, 并从各国实例出发, 探究投资入籍国行使领事协助权所面临的实践挑战, 为个人、接受国、派遣国处理投资入籍问题提供对策思路。

关键词: 领事协助; 投资入籍; 双重国籍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03

引言

当前, 投资入籍的热度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攀升, 目前共有12个国家正在运营官方的投资入籍项目。投资入籍通常以入籍时间短, 居住要求低, 且护照在大部分国家免签等作为优势, 吸引外国公民通过捐款、购入房产、直接投资等方式取得本国国籍。^[1]对于这一如此便捷的入籍方式, 国际社会自不乏批评的声音, 将之称为“买卖国籍”或“买卖护照”, 认为它将逐渐破坏公民身份价值、公民社会责任、公众信任等民主制度的基石, 并会造成歧视和不公平, 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利益。^[2-7]

诚然, 原则上, 国籍的授予属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内事项; 且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一国通常不会拒绝承认外国人的国籍。但国籍实际具有国内法和国际法上的二元结构, 国籍的授予并不当然取得国际法上的效力而对对他国产生拘束力。^[8-9]对于国籍的承认, 国际法虽存在一些普遍实践, 包括欺诈取得无效、强制取得无效, 但尚未形成一般法律原则或习惯规则。不过至少, 国家在准许外国人入境上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这就给投资入籍的使用价值带来挑战。并且, 由于选择投资入籍的人群大部分来自允许双重国籍存在的国家或地区, 以避免这种安排造成不得不放弃原国籍的局面, 使得权利行使更是因双重国籍的存在而冲突加剧。

在新兴的投资入籍制度下, 领事协助权这一国家保护国民海外利益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途径, 必然会受到挑战, 原因在于现有的统一国际规则出现空白。目前, 国家间进行领事交往的主要依据依然是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下简称“《维约》”)。但公约缔结时, 双重国籍还未成趋势, 投资入籍项目更是尚未产生。事实上, 直至上个世纪末, 以经济全球化推进为标志, 世界各国才开始逐步接受本国公民取得双重国籍; 而世界上第一个投资入籍项目, 也是在1983年由汤加颁布。国籍是国家提供领事协助的根据, 但《维约》订立时却无法考虑到投资入籍、双重国籍现象对接受国法律秩序的冲击, 这一冲突的规制在国际法发展中出现空白。此外, 由于《维约》的主体内容实为国家间领事关系, 对于国民领事协助的规制本就匮乏, 在当前领事协助实践中更渐显不合时宜之兆和规则缺失之憾, 使各国对领事协助权的行使形成多种不同的立场与做法。

基于此, 本文将以《维约》约文, 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德国、荷兰、加拿大、印尼等国的国家实践为样本, 并综合考量国际法院、美意和解委员会等国际司法机构的立场, 对领事协助权在投资入籍下受到的实践挑战进行分析;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为个人及国家提供未来处理投资入籍问题时可以采取的立场及对策思路。

一、国籍问题在《维约》中的法律空白

《维约》是国家间进行领事交往和领事协助的规则依据, 其是对已经形成的国际习惯的系统编纂, 因此无论国家是否是《维约》缔约国, 都有义务遵守其中规定的领事规则, 而规则的缺失也将直接影响国家间领事交往的方式。故此, 本文将首先关注《维约》约文对领事协助的根基——国籍问题的模糊与空白。

(一) 《维约》的缔结考量不在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受缔约时代所限, 各缔约国在《维约》中力图强化对国家权利的保护, 而有意淡化甚至回避对个人权利的保护,^[10]使得《维约》主体内容最终呈现为国与国之间的领事交往与豁免, 而就国家对国民的领事协助则篇幅薄弱。这一考量也在约文的

作者简介: 孙雪晗(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

用词上有所体现,《维约》全文使用“派遣国”和“接受国”对不同国家进行区分,这自然是基于国家“派遣”和“接受”外国领事人员的立场而采用的称谓;若《维约》重心在于对国民的领事保护与协助,则会选择使用“国籍国”等用词行文。事实上,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二读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对于国家的称谓即改用了“国籍国”、“第三国”等用词,并在第二章以“国籍”命名,设立专章调整了外交保护中所涉国籍事项的各方面内容。与之相对,国际法委员会并未启动专门针对领事协助的任何国际法编纂活动,而仅将有关内容零星插入调整国家间领事关系的条约中,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领事协助需在受国境内提起,受各国属地管辖权制约的程度较大,难以使各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而又鉴于外交保护与领事协助的根本区别——补救性与预防性、国际性与国内性、是否将对个人的损害虚拟成对国家的损害来实施保护等,^[8,11]对他国法律秩序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草案》中的有关规则也不宜简单挪用。

纵观《维约》全文,有关领事协助的条款仅存在于第5条、第36条和第37条之中。并且,第5条对于“领事职务”的总括性规定,其目的实质上也并不在于确定领事协助的实际内容,而意在明确领事官员执行职务时自身领事特权与豁免的范围;事实上,各国就领事职务是做一般界定还是具体列举曾出现过严重分歧,最终鉴于豁免权的适用,才决定列举几项最重要的领事职务加以明确。^[12-13]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国籍问题的嵌入自与《维约》中国家权利为主导的体例不和,使得国家依据国籍提起领事协助的权利边界模糊不清,接受国在发生国籍冲突时,对他国领事协助权的行使便有了减损的空间。

(二)《维约》第5条未明确外国人国籍的使用标准——个人权利的保障困境

就具体约文而言,《维约》第5条总括性地规定了国家行使领事协助的权利,即领事得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但作为个人获得保护的关键性前提,约文却并未回应国家是否有义务将本国国民的第二国籍国同等视为派遣国、以及国家是否具有选择双重国籍人的任一国籍在本国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对此,除正文外,一项公约的草案、评注、序言同样是传达各方关切的重要文本。《维约草案》在第5条的评注中曾提到,“接受国可能拒绝承认领事希望保护其利益的个人具有派遣国国籍,这种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求得解决”。^[14]《维约》的序言中也同样明确,“凡未经本公约明文规定之事项应继续适用国际习惯法之规则”。可以看出,国家在一些情况下拒绝将个人按某国人身份对待,是在《维约》缔约时就已有发生的国际情事。遗憾的是,这一关切最终并未得到《维约》正文的进一步明确,而仅是统领性地划归实质尚未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制,使得各国解决问题的做法实难统一,个人面临因接受国政府阻挠而无法获得领事协助的困境。截至目前,已有五起因适用《维约》领事协助条款引发争端而被提交至国际法院的案例;^[15-19]其中,因国籍承认、双重国籍而引发的领事协助争端,以2019年印度诉巴基斯坦的贾达夫案、2004年墨西哥诉美国的阿维纳案尤为代表,该两案中法院均作出判令接受国准许派遣国行使领事协助权的裁定,表现出优先保障个人可获得充分领事协助的司法倾向。

(三)《维约》第36条未明确准许协助的国籍国数量——接受国法律秩序的维护困境

《维约》第36条特别规定了领事通知与探视权,这是在第5条总括性规定之外唯一详细规定的领事协助之内容。36条1(a)概括性地规定了领事官员与派遣国国民自由通讯及会见的权利;1(b)、(c)特别确定了派遣国国民被监禁时领事官员的通知与探视权;36(2)以尊重接受国国内法律规章为考量,明确第1款所规定的权利必须在遵守接受国本国法的情况下行使。

其中,36条1(a)并不会成为争端产生的根源,可以想见,当个人在接受国境内享有充分行动自由时,会见国籍国领事官员自不会受到阻碍。矛盾的焦点在于1(b)、(c)及36(2)的特别规定中,当个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其与本国领事通讯及会见的权利便完全受制于接受国的管辖与控制之下——若接受国拒绝认定其具有派遣国国籍,将直接从源头上阻碍该国领事协助权的行使,这也是国际法院相关案件中的核心争议所在。《维约》要求,个人被拘禁后,经本人请求,接受国应迅即通知派遣国领馆,并允许领事官员探访其国民。但问题在于,约文并未明确应当通知或者应当允许探访的派遣国数量。换句话说,若个人已正在由一国领事提供充分协助,接受国是否还有义务通知其他国籍国或准许其他国籍国进行会见,接受国是否会认为这对其国内法律秩序形成不必要的扰乱和负担。

国家在缔约过程中,并非未就这一难题表达关切。事实上,在《维约》缔结阶段,关于第36条即经过了十分艰难的谈判。在从订立之初起的所有《维约草案》中,36条1(b)的规定均为——派遣国国民被监禁时,“接受国应迅即通知派遣国领馆”,而并无经个人请求之前提^[14](而在《维约》正式约文中,36条1(b)已修改为“经其本人请求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迅即通知派遣国领馆”)。缔约国的反对意见中曾提到,由于大量外国移民分布在境内各地,通知的要求将给接受国带来过度的行政负担;并且,作为一个原则性问题,当外国人进入某一国家时,他就接受了该国的管辖,他因此不应当然要求获得比接受国国民更高的保护,即来自双重国籍国两个国家的保护。日本、瑞士、美国等国均主张,仅在派遣国国民本人提出请求的情形下,接受国才有通知的义务。^[10]也正是基于此,出于在“接受国无条件的通知义务”与“接受国被动的通知义务”间寻求可能达成的平衡,各国就《维约草案》提交修正案,最终使通知义务的触发条件——个人请求得以在《维约》生效文本中见诸。通过这些缔约记录可知,在36条1(b)项中增加赋予个人选择权之规定,缔约国本意实际并不在真正为派遣国国民创设额外的个人权利,而是为了减轻接受国主管当局的通知负担,并使公约在两派观点的利益平衡中求得通过。尽管在《维约》的缔结过程中仍以单一国籍为视角,而缺乏以投资入籍、双重国籍等为线索的有关意见,但国家对于领事协助权需尊重接受国法律秩序的利益考量已可初见雏形。

二、领事协助权在投资入籍下的实践挑战

个人通过投资入籍项目归化取得他国国籍,一般会产生两种不同效果。一种是其原国籍国不承认本国国民具有双重国籍,该个人将丧失原国籍,而具有投资入籍国的单一国籍。这种情况下,行使领事协助权通常不会受到挑战,原因在于国际社会长期以来致力于减少无国籍状态,几乎不会有国家在个人只有一个合法国籍的情况下,拒绝承认该国为其派遣国而使该个人在本国陷入事实上的无国籍状态,进而无法得到来自任何国家的保护与协助。产生争议的状况往往出现在原国籍国允许或容忍本国国民具有双重国籍的情况下。当个人因投资入籍取得了双重国籍,尽管原国籍国接受本国国民具有这种地位,但并不

代表愿意容忍这一国籍被用来干涉自己的管辖；就第三国来说，双重国籍的地位也会使领事协助权的效力因投资入籍的时间、动机及入境所持护照等受到影响。

（一）原国籍国与投资入籍国的领事协助冲突

1. 原国籍国作为接受国的立场——“无责任原则”与“主导国籍原则”

当个人位于其原国籍国境内时，面对自己的国民，国家将面临如何处理本国与投资入籍国权利冲突的问题。当前，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德国、荷兰、加拿大等接受双重国籍的国家均做出了较为明确的立法实践——根据这些国家的立场，通过投资入籍取得他国国籍的个人，在其原国籍国内通常只会被视为本国人，而非具有第二国籍的外国人。这意味着若其受到原国籍国的逮捕拘禁，不论两国之间是否签订了双边领事关系条约，由于其本质上缺少外国人身份，他的监禁状况将不会被通知给投资入籍国，投资入籍国的领事会见请求也有很大可能因国民身份问题而被原国籍国拒绝。^[20-23]

这种做法体现了“无责任原则”的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无需就其对自己国民做出的行为而向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包括该国民的其他国籍国，“无责任原则”的法理在于，对于两个在各自国内法上都合法的国籍而言，如果允许其中一个国家代表个人去介入另一个国家的事务，实质上就相当于赋予请求国的国籍以更大效力，并由此否认了国家主权平等。国际法院在“联合国职务损害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同样提到，国家不代表其国民针对同样视其为国民的另一国行使保护权是一种通常做法。^[24]

然而，尽管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已是各国处理国籍冲突问题的普遍做法，对其变革的趋势同样形成已久——原因在于其可能埋下严重的法律隐患，阻碍双重国籍人的主要国籍国对该人实行保护。^[25-26]美国《外交事务手册》“领事事务”一章将“主导国籍原则”称为“一项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当双重国籍人的居住地是国籍国之一的国家时，该人对该国即负有最为重要的效忠义务，这种效忠义务是国家与个人通过国籍产生联结的根本，该国因此有权不受另一国干涉而主张权利。^[27]

在“主导国籍原则”下，对于具有两个“合法”且“有效”国籍的人而言，与其具有更紧密联系的国籍被称为“主导国籍”，只有“主导国籍”的权利才可以对抗该国民的其他国籍国。^[28, 81]在“梅尔盖案”中，美意和解委员会指出，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与“主导国籍原则”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29]“主导国籍原则”的法理正是为真正实现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调整个人与两个国籍国联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而将“无责任原则”严格限制在个人与两个国籍国联系程度不分伯仲的情形下，避免将一国的管辖权不公平地置于另一国之上。在这一点上，鉴于领事协助权是针对接受国合法行为行使，以预防性地协助本国国民在他国的合法权益，他国的法律秩序与主权平等更应被尊重。

显然，投资入籍国的法律地位在“无责任原则”与“主导国籍原则”下将显著不利，原因在于当前共12个颁布投资入籍项目的国家中，实际只有马耳他在欧盟的批评与敦促下增加了12至36个月的入籍前居住要求，其他11个项目均为5天旅程至零居住要求不等^[1]。并且，选择投资入籍项目的人群通常更看重国籍的商业价值，实际并不会选择在投资入籍国长居，乃至发展出更深的家庭、教育、参与公共生活等人身性质的实质联系。在此情况下，投资入籍国的领事协助权通常难以对抗与个人有深层联系的原国籍国的管辖。若个人始终居住在原国籍国内，而意图通过投资入籍国获得额外保护，实际几乎不可能。

2. 原国籍国作为派遣国的立场——“护照原则”与“绝对保护原则”

尽管原国籍国认可双重国籍身份的域外效力，但反过来，也可能因此对自身领事协助权的行使作出保留。实践中，主要形成了“以个人入境护照为准”和“绝对保护原则”两种不同做法。

采用“护照原则”的代表国家主要有南非——其政策规定，如果具有双重国籍的国民在他国被逮捕，而他先前没有持南非护照入境，那么南非将不会对该个人提供领事协助，该个人必须与他所持护照入境的第二国籍国的领事代表联系。英国曾经也采用类似的“护照原则”处理向具有双重国籍的国民提供领事协助的问题，且若第二国籍国未设领馆，英国将具体考虑是否出于特殊人道主义理由向个人提供领事协助。不过，英国已于2011年对有关政策作出修改，由“护照原则”转向“绝对保护原则”。事实上，多数国家在向具有双重国籍的国民提供领事协助时，采用的均是“绝对保护原则”，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德国、印尼等在内的国家均明确，无论具有双重国籍的国民持哪一护照入境，国家均会向其提供所需的领事协助。^[27, 21-22]在这一方面上，通过投资入籍取得第二国籍的个人并不会受到原国籍国的歧视对待。

（二）第三国与投资入籍国的领事协助冲突

在国籍国的冲突之外，作为非国籍国的第三国同样有可能对投资入籍国提供领事协助的权利提出挑战。尽管国际社会一般认为，非国籍国无权诉诸国籍国之一的权利对抗另一国籍国；^[8]且非国籍国为避免受到谴责，通常也不会与国籍国对抗。^[20]但实践中，第三国并非没有减损他国领事协助权的空间。

基于双重国籍身份，若其中一个国籍国已正在向被拘禁的个人提供领事协助，作为接受国的第三国则可能拒绝另一国籍国提出的领事会见请求，而要求其正在提供协助的国籍国使领馆协商，共同决定由其中一个国家继续协助，避免重复的权利请求给第三国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负担。^[21, 27]此时，由于投资入籍国多为国力弱小的中小型国家，且如前文所述，与个人的真实联系较为薄弱，在与原国籍国的比较下较难实际行使领事协助权。

其次，有时即使只有投资入籍国一国请求提供领事协助，该请求也可能被第三国拒绝，特别是当个人被认为具有欺诈取得国籍、为逃避原国籍国管辖而恶意取得国籍等的嫌疑时。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已被原国籍国通缉的逃犯中，特别是当第三国为履行原国籍国引渡请求而逮捕该人时。一般来说，个人在具有逃避某项法律约束的需求后迅速取得第二国籍，便可能会被识别为“恶意”，而无法在其需要使用国籍的事件中得到承认。^[30-31, 9]需注意到，国家准许个人持某国护照入境、颁发签证并加盖入境戳的行为，并不等于国家最终承认该个人具有某国公民身份。是否接受外国人入境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允许外国人入境本身即是一个国家自由决定的事项，属于国家的自由裁量权，护照、签证及入境戳均为个人具有某国国籍、被准许以某国身份入境的初步证据^[32]，国家有充分自由随时撤销其颁发的入境签证，调整该个人的移民身份，并由此拒绝护照颁发国领事协助的请求。而又因国家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国际法上欺诈、恶意取得国籍无效的一般原则，因而并不违反国际法。当

个人存在主观恶意时, 投资入籍国将因此缺少指责第三国违反条约义务的法律基础, 第三国具有拒绝其在本国境内提供领事协助的自由。

三、投资入籍下行使领事协助权的个人与国家因应

不可否认, 投资入籍的热度正在持续攀升, 各大投资入籍项目均以在大量国家免签、可获得外交、领事协助等诱人条件作为噱头进行宣传。然而, 如前文所述, 现实中, 个人欲获得投资入籍国的额外保护与协助实际非常困难, 国家无论作为原国籍国还是非国籍国, 尽管有时受到谴责, 却均存在不承认投资入籍身份之使用价值的先例。综合来看, 在投资入籍下进行领事协助仍存在较大挑战和制度空白, 个人与国家亟需进一步的因应之策。

(一) 个人因应——主动构建公民实质联系

投资入籍项目以吸引资金流入为主要目的, 通常设置了最低的入籍标准, 基本不要求任何入籍前后的境内居住时长。但个人不可不主动考量国籍背后所代表的公民义务、效忠义务等内涵——这是国籍存在之根本, 不可被现代社会流通性越来越强、获取性越来越易的种种入籍方式所剥夺。事实上, 正是因为公民实质联系的缺乏, 一些通过与个人联系过于薄弱之方式取得的护照, 有很大可能面临他国不予承认的风险——汤加、瑙鲁的投资入籍项目均曾在他国拒绝承认的压力下最终叫停。

尽管当今各国已普遍认可通过投资入籍取得的护照的有效性, 但并不代表不存在个案拒绝的情形。个人若想避免护照被拒绝承认的情况发生, 就需要尽量确保与投资入籍国建立牢固的实际联系, 包括开户、买房、居住、稳定就业、纳税等在内的种种方式, 都将有助于增强新国籍在他国使用的份量。此外, 个人还应特别避免恶意、欺诈购买国籍, 否则可能被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 使得该国籍根本上失去使用价值而归于无效。

(二) 国家因应——避免权利滥用

当前, 有关领事关系的公约尚无重新谈判或修订的议程, 因此, 在缺乏明晰规则的情况下, 在投资入籍制度中, 除个人将面临无法实现其预期效果的困境, 国家同样可能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局, 并主要体现在对于有限的权利进行滥用的方面。

具体来说, 就非投资入籍国而言, 尽管国际法已给予其在一定情况下拒绝投资入籍国领事协助请求的自由, 但实践中还应特别注意接受国权利滥用的问题。国家应在没有根本违反本国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对外政策等的情况下, 尽可能为领事协助提供便利, 而不应将其具有的权利专门用于规避条约义务或减损基本人权。此外, 国家宜通过制定法律、公布政策等方式, 公开告知本国就投资取得之护照的立场态度, 使护照的使用具有足够的可预知性, 减少事后补救、“钓鱼执法”等情况的发生, 在保障人权的同时也避免自身陷入争论。

对于投资入籍国而言, 随意发放护照, 乃至恶意出卖本国公民身份, 同样构成另一种权利滥用而无法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继而导致投资入籍人获得领事协助的权利大受减损, 甚至可能波及在本国项目下入籍的全部“投资公民”。故而, 投资入籍国宜随着国际法的发展不断完善本国投资入籍项目及有关立法, 积极参与有关谈判会议寻求平衡之策, 并加大入籍审查力度, 不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 而彻底忽视“国籍”及“公民身份”的根本内涵。

参考文献:

- [1] CBI Index, *A Guide to Global Citizenship: The 2023 CBI Index Report* [EB/OL], (Sept., 2023), https://cbiindex.com/wp-content/uploads/2023/09/CBIIndex_2023_Report.pdf, pp.3, 13.
- [2]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Investor Citizenship and Residence Schem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B/OL], Report COM/2019/12 final, pp.5-6.
- [3]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EU citizenship for sale* [J/OL], Official Journal 2016/C 482/117, paras.1, 7.
- [4] Viviane Reding, *Citizenship Must Not Be for Sale* [EB/OL],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Jan.15, 201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14_18.
- [5] Peter J. Spiro, *Investment Citizenship and the Long Leash of International Law* [C], in Dimitry Vladimirovich Kochenov & Kristin Surak, eds., *Citizenship and Residence Sales: Rethinking the Boundaries of Belong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138.
- [6] Michael Krakat, *Genuine Links Beyond State and Market Control: The Sale of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Legal Perspective* [J], 30 Bond Law Review 145, 162, 180-181 (2018).
- [7] Javier Hidalgo, *Selling Citizenship: A Defense* [J], 33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223, 223, 233-235 (2016).
- [8] ILC, *Draft Articles on Diplomatic Protection with commentaries*, U.N. Doc. A/61/10, 2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6, Art.1 Commentary (9), Art.4 Commentary (1), Art.6 Commentary (3), Art.7 (2006).
- [9] *Nottebohm (Liechtenstein v. Guatemala)*, Judgment, 1955 I.C.J. Rep. 4, 20-21, 26.
- [10] ILC, *Comments by Governments on the draft articles concerning Consular intercourse and immunities provisionally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t its twelfth session*, U.N. Doc. A/CN.4/136, 2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29, 144, 161, 165 (1960).
- [11] Vasyl Repetskyi,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Protection of Persons with Dual Citizenship Abroad* [J], 9 Logos Universality Mentality Education Novelty: Law 128, 130 (2021).
- [12] ILC,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covering the work of its Twelfth Session,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ifteenth Session*, U.N. Doc. A/CN.4/132, 2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43, 148 (1960).
- [13] Luke T. Lee &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Third Edi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10, 221.
- [14] ILC, *Draft Articles on Consular Relations, with commentaries*, 2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92, Art. 5, Commentary (8) & Art. 36(1)(b) (1961).

- [15] *Jadhav (India v. Pakistan)*, Judgment, 2019 I.C.J. Rep. 418.
- [16] *Request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Judgment of 31 March 2004 in the Case concerning Avena and Other Mexican Nationals (Mexico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2009 I.C.J. Rep. 3.
- [17] *Avena and Other Mexican Nationals (Mexico v. U.S.A.)*, Judgment, 2004 I.C.J. Rep. 12.
- [18] *LaGrand (Germany v. U.S.A.)*, Judgment, 2001 I.C.J. Rep. 466.
- [19]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Paraguay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der, 1998 I.C.J. Rep. 426.
- [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sular Notification and Access (fifth edition)*, 2018, p.14.
- [21] Dewi Avilia, *Consular Assistance for Nationals Detained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States' Policies and Practises* [J], 1 Indonesia Law Review 113, 120, 122, 126 (2017).
- [22] Katerina Mantouvalou, *Consular Assistance and Trial Attendance: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Australian, British, Dutch and German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M], Fair Trials International, 2009, pp.16, 18.
- [23] John Quigley, William J. Aceves and S. Adele Shank, *The Law of Consular Access* [M], Routledge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Law, 2009, p.45.
- [24] *Reparation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1949 I.C.J. Rep. 174, p.186.
- [25] Craig Forcece, *Shelter from the Storm: Rethinking Diplomatic Protection of Dual Nationals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J], 37 The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469, 493 (2005).
- [26] T. Alexander Aleinikoff & Douglas Klusmeyer, *Citizenship Policies for an Age of Migration* [M],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2, p.40.
- [2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Affairs Manual: Introduction to Arrest and Detention* [J], 7 FAM Consular Affairs 086 Consular Protection and Services and Dual Nationality (b)-(d) (2021).
- [28] *Case A/18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Jurisdiction over Claims of Persons with Dual Nationality*, Decision, 5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250, 258 (1985).
- [29] Italian-United States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Mergé Case—Decision No. 55*, 14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236, 246 (2006).
- [30] A
S/AC.26/1996/3 30 UN. Doc.
- [31] Robert D. Sloane, *Breaking the Genuine Link: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egal Regulation of Nationality* [J], 50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 14 (2009).
- [32] Cornelia Hagedorn, *Passports* [M],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para.32.

Challenge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to the Right to Consular Assistance under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Programs

Sun Xuehan¹

¹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oday, the tide of globalization presents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rules. In the field of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lations, the impact of nationality conflicts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The rise of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CBI) programs and dual nationality have led to frequent conflicts in consular assistance. Howev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cks effective and unified rules to regulate this pressing issue.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VCCR) was promulgated in 1963, at a time when dual nationality was not a trend and CBI programs were even non-existent. It created a regulatory vacuum nowadays, resulting in diverse practices among states. Currently, five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ular assistance provisions have been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with dual nationality being central to two of these cases. Dual nationality triggers disputes over nationality recognition and which states being entitl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On the one hand, individuals may face the dilemmas of being unable to obtain consular assistance from their state of nationality due to obstruction by the receiving state. On the other hand, states may face dilemmas of the unnecessary disruption and burden to their domestic legal order, with the risk of violating treaty obligations through abuse of rights. The underlying causes lie in the systemic weakness of CBI states – characterized by weak connections to their citizens – and the absence of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rules, leaving all parties without a clear legal guidance to obey.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article aims to, through research into the VCCR's text, travaux préparatoires, negotiation history, and judicial cases, analyze the regulatory gaps in Articles 5 and 36. And by drawing on state practices, this article will also explore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CBI states in exercising consular assistance rights. It finally seeks to provide solution-oriented approaches for individuals, receiving states, and sending states in addressing the complex consular issues related to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Keywords: consular assistance;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dual nationality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华人反歧视抗争研究

吴妙璇¹

(1.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1882年5月6日, 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名为《关于实施与中国人有关的某些条约条款的法令》的排华法案, 这一官方表态使得民间原已存在的排华情绪迅速膨胀, 继而掀起了美国社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浪潮, 美国华人群体也因此饱受种族歧视和排挤。面对层出不穷的歧视性条例和暴力排华事件, 部分华人不堪忍受选择离开美国, 部分华人则选择继续留在北美大地。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美华人群体采取了多种手段同不利的社会环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尽管最终没能直接推动美国排华法案的废除, 但华人的不懈斗争也使得美国政府排华目的最终破产, 为华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美国; 排华浪潮; 在美华人; 歧视与抗争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88

学术界对美国华人群体的研究起源较早,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对于华人抗争运动的研究成果相比起华人移民其他研究方面而言略显有限, 深入研究这一问题能够有效打破华人在排华运动中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活靶子”的刻板印象, 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一时期不仅是美国的排华历史, 也是在美华人的奋斗史。不同于今天有中国血统但持有外国国籍的“华人”概念, 本文中的“在美华人”主要指的是因工作或生活, 从中国迁移到美国并在当地居留的中国人, 这与排华浪潮之下发起反歧视抗争的主体——驻美官员、留美学生、华工、受政治影响来到美国的精英分子相吻合, 也符合该时期进入美国的中国人的复杂情况。

一、1882年排华法案的出台

历史上美国在华人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经历了几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以美国官方所颁布的法律法规为重要标志, 美国对华移民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即“开放移民阶段 (美国建国至 1882 年); 限制和排斥移民阶段 (1882 年至二战); 限制和选择阶段 (二战至现在)”^[1]。

19世纪四五十年代, 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 淘金热迅速在美国西部流行起来, 但当地的劳动力远远满足不了金矿的开采, 因此美国商人将眼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中国。当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一方面受鸦片战争影响, 另一面又受自然灾害的打击, 也有外出寻求生路的需求, 二者一拍即合。1848年, 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劳工抵达旧金山。因为华人自身勤奋刻苦, 很快便在金矿开采中脱颖而出, 取得了相对较为丰厚的报酬, 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人来到了美国投身工矿业。1862年, 首条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太平洋铁路开始建设, 因原先雇佣的爱尔兰工人工作效率低下, 铁路建设进度十分缓慢, 时任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高管的查尔斯·克劳克 (Charles Crocker) 看中了华人吃苦耐劳的品格, 华人华工开始走上了建设太平洋铁路的岗位。为了更进一步获得勤劳价廉的中国劳工, 1868年美国 and 清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也称《中美续增条约》。条约规定, 出于修筑美国铁路的目的, 中国劳工可以不受限制地前往美国并且有权居留当地^{[2]354}。该条约的签订使得美国拥有了大量可以投入铁路建设的华人廉价劳动力, 与此同时, 它也代表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放宽来美限制的态度。自《蒲安臣条约》签订之后, 大量中国人在此条约的庇护下进入美国, 从1868年条约签订的5千来人到1869年的1.2万多人, 再到排华法出台前的1880年, 在美华人已达10万人以上^[3]。

随着加州金矿资源的减少以及美国境内各大铁路逐渐完工, 在美华工逐渐流向其他行业。凭着比当地白人更低廉的价格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华工很快受到各行各业雇主的青睐, 但也因此遭到了当地白人的排斥。当地的白人劳工认为在美华工以一种近乎恶性竞争的方式挤占了他们的工作, 与此同时针对在美华人的暴力活动和舆论宣传层出不穷, 许多美国工厂主也在排华分子的威胁之下解雇了大批华工。迫于缓解国内政治压力和不断增加的暴

作者简介: 吴妙璇(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海外华人华侨史。

力事件, 1882 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实施与中国人有关的某些条约条款的法令》的排华法案, 后称“1882 年排华法案”, 这一法案的出台也开启了华人移民为期将近 60 年的“黑暗时期”。该法案在开头就毫不掩饰地将华人归为社会矛盾的根源, “美国政府认为, 中国劳工来到本国, 已经危及到了本国境内某些地方的良好秩序”^[4], 而法案内容也抛弃了先前《蒲安臣条约》里两国在自由移民方面达成的共识, 要求在该法案通过后 90 天起至 10 年期满前, 严格限制中国劳工入美, 而在法案颁布之前已在美的华工在出入美国边境也会受到层层审查。1882 年排华法案还在其条款 14 中规定, “任何州法院或美国法院在该法案执行期间均不得接纳华人入籍, 特此废除与本法相抵触的所有法律”^[4], 并且对何为中国劳工做出了严格的限定, 这就标志着美国官方对于来自中国的移民已经进入了排斥和禁止时期。

1882 年排华法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种族和国为理由禁止移民入境的联邦法案”^[5], 在法律层面上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表露无疑, 也严重伤害了在美华人的民族情感, 日后美方为了解决这一时期遗留的移民问题而出台的“华人坦白计划”更是对华人群体心理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从现实层面上来说, 1882 年后陆续颁布禁止华人担任市政公职、购买房产或者经营商业的各色条约, 不仅严重影响了当时华人在美的生产生活, 也威胁着华人当时的财产乃至生命安全。在文化认同上, 排华势力对华人是难以同化的“文化上的他者”形象的刻意歪曲和恶意宣传, 不仅是美国白人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的坚持, 也暗含着其抵制华人归化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心理。在这期间, 以白人劳工为主的民间群体采取非法的手段, 对其住所周围的华人华侨进行驱逐和迫害, 甚至采取抢劫、纵火乃至屠杀等暴力手段来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1885 年怀俄明州的石泉地区和 1887 年俄勒冈州的蛇河地区就曾两次发生骇人听闻的屠杀华侨事件, 加州、科罗拉多和华盛顿地区的华埠也多次遭到当地白人围埠和掠夺, 在美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以华人最为聚集的加州地区为例, 到 1880 年, 加利福尼亚大约有 6.5 万名华人, 约占该州人口的 10%^[6], 当地政府为了打击华人的谋生行当多次颁布相关的行业条例, 针对华人群体出台的特别税款和渔税、“肩挑法案”“反辫法案”等层出不穷。1882 年排华法案出台以后, 美国地方政府还严格限制在美华人产业的购置和商业执照的申请, 苛刻审查入美华人的天使岛移民站也于 1910 年投入使用。

面对随处可见的排斥和陆续出台的排华法规, 美国华人并不甘于忍气吞声。他们对美方在制定移民政策时针对华人移民的行为显然十分不满, “白人为什么不反对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或犹太人大批移民呢? ……这些人都允许移民, 而中国人如此头脑冷静、遵纪守法、干净利落、有文化知识又吃苦耐劳, 却被拒之门外”^[7], 也因此, 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虽然华人群体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局面难以根本扭转, 但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依旧竭尽所能同美国社会强大的排华势力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在美华人的反歧视抗争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美华人积极同这一时期已经掀起反华浪潮的美国社会斗智斗法, 通过外交交涉、诉诸美国司法诉讼和舆论宣传等多种途径力求突破或减缓自身在美生存的困境, 虽然最终没能直接推动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但在缓和民间仇华情绪以及为华人博取舆论同情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并且在促使美国民众推动政府对华政策上的态度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下文将从这一时期华人群体寻求母国政府援助和自发反抗排华势力两部分进行叙述。

(一) 寻求母国政府帮助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掀起排华浪潮时, 正值中国处于清政府统治晚期。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冲击, 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被迫走上近代化的外交道路。1878 年, 第一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抵达旧金山就任, 开启了清政府通过使领馆就外交和侨务问题直接同华盛顿政府进行交涉的历史。许多驻美官员们亲眼目睹华人在美国社会所受的排挤和压迫, 加上华人群体也积极寻求母国政府的援助, 因此清政府驻美侨务的工作重心也主要致力于解决侨胞在美安全问题和修约两方面。

早在陈兰彬上任不久后, 他就深感当时美国社会对于华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自矿金渐竭轮路告成, 羈居日多, 工值日减, (工党)遂蓄志把持, 妒工肆虐。……始犹殴辱寻仇, 近且扰及寓庐, 潜行焚掠。始犹华佣被虐, 近且逼勤雇主, 不准容留。……其党魁复声气广通, 诡谋百出。……而所设新法, 如住房之立方天气, 寄葬之不得迁运, 告状之不许华人作证, 及割辫罚保等例, 均于华人不便”^[8], 可见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和排挤现象已经初具规模。1880 年下半年,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出现当地白人暴力抢劫和焚烧华人住宅的恶性事件, 陈兰彬在华人的请求下与美方积极交涉, 但最终收效甚微。1885 年, 怀俄明州石泉地区再次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暴力排华事件, 时任驻美公使的郑藻如要求美方“办凶, 赔偿, 并请保护一切华民”^{[9][10]}, 美方一开始万般推脱, 甚至有言“平民犯法, 本国不能肩其干系”^{[9][8]}。郑藻如与美方据理力争, 通过法律和舆论等手段对美方施压, 最终美方才松口由政府对于石泉事件中受害的华人进行有限的赔偿。第三任公使张荫桓上任之时, 即“致美廷将各案

了结, 惩治凶手, 赔偿损失”^{[9]100}, 郑任内发生的几次白人暴力排华事件, 受害华人也都得到了一定赔偿。崔国因在任期间, 积极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在美华工, 在反对《吉里尔法》方面也多次同美方交涉,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华工的境遇, 但修约则因清廷本身国力衰微收效甚微。

1897年, 伍廷芳接替杨儒的职位赴美就任。在他出任驻美公使期间, 美国的排华浪潮逐步升级, 排华相关的法律法规一再颁布, 在美华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伍廷芳出身于法律专业, 对西方政治状况有一定了解, 在就任期间, 他外交手段和舆论手段兼施, 在回应华人的援助请求和保护在美华人取得了许多成就。1898年, 美国吞并夏威夷岛, 并将1882年的排华法案推广到夏威夷岛, 这不仅使得岛上的华人成为排华势力的攻击目标, 也极大地影响了华人群体的正常生活。当地的华人就此积极向伍廷芳寻求帮助, 希望通过清政府与美方的交涉来停止排华法在夏威夷岛的施行。1899年, 应当地华人的请求, 同时经过大量的证据收集后, 伍廷芳将当地华侨的抗议书整理提送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他向美方提出抗议, 排华法案无限扩展到夏威夷岛已经严重违反了中美双方既定的条约, 对当地的华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认为“在夏威夷群岛只排斥华人, 是在全世界人心目中贬低整个中华民族, 在并无歧视任何其他亚洲民族的立法的情况下, 尤其如此”^{[10]315}, 可见伍廷芳对于华人在美受歧视的状况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 他对于夏威夷群岛华人权益的争辩, 既是出于驻美公使的职责所在, 也是代表华人群体对美国社会赤裸的种族歧视的抗争。除了努力维护华人权益之外, 伍廷芳还多次就在美华工受害和美国关卡留难华人的事件同美方严正交涉。1897年, 新泽西州甘甸埠的华人频繁遭当地白人骚扰围殴, 而当地执法人员却置若罔闻, 伍廷芳知晓后随即发函照会美方, 认为“地方官殃害华民, 殊予条约之旨有悖, 即于贵律例亦不相符”, 并且敦促美方“设法保护, 俾侨寓贵国各埠华民一律得安生业”^{[10]34-35}, 不久后该案件在伍廷芳多次督促下得到妥善解决, 当地华人也在地方当局的保护之下逐渐恢复原先的生活秩序。^{[10]287}仅在1897年间, 伍廷芳就华人频繁遭入境处官员留难的事多次同美外部交涉, 有记载的就有华人谭忠瑶及其子谭光、华人周道瓚及其侄周振鹏^{[10]27-29}和学生叶华、童泽^{[11]318-319}等多例。此外, 伍廷芳看到美国社会反华势力强大之余, 仍然有部分理智的美国人愿意为遭受不公的华人而发声, 出于对英美政治的了解, 他也力求通过舆论渠道来争取美国各阶层人士对于华人的同情, 以达到改善华人在美处境的目的。他曾在1882年排华法案即将到期前, 联合美国当地的华人代表组织了一系列兼具反排华和修约目的的演说活动, 并且通过在大学和社交晚宴的演讲以及在新闻报纸的撰文, 让更多美国人看见了华人的悲惨遭遇和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偏见, 为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博取了相当的舆论同情, 对于缓解华人在美的艰难处境起了一定作用。

总的来说,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之交美国排华情绪最为高涨的这段时期, 清政府作为在美华人的母国政府, 在争取华人在美权益方面的表现不能说是毫无建树。与此同时, 在当地华人华侨的请求之下, 驻美大使也就侨务问题积极与美外部进行交涉, 在解决华人利益受损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修约问题虽因中国政府本身实力不足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但在美华人与母国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使得二者在抵制排华势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许多暴力排华事件的受害者得到美国政府的赔偿、被移民局卡关的华人也大都顺利入境、美国主流社会也出现了对华人的声援等等。

(二) 华人自发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受一系列排华法的影响, 华人在美国社会中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他们对于这种压迫和不公并非逆来顺受, 而是适时根据自己对于移民政策和美国法律程序的理解,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利用地缘主义国籍法与审查者展开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排华法》的阻碍, 继续进入美国^[12], 使得美国力图通过排华法案来实现“清华”的目标最终以失败告终。

“纸生仔”体系的诞生。在一众抗争方式中, 最不可忽略的首先是华人们利用移民法和美国宪法中的漏洞而借用或购买他人假身份从而进入美国的“纸生仔”体系, 这一体系也被旧金山州立大学华裔历史学家徐元音(Madeline Yuan-yin Hsu)教授称为“华人为规避美国政府排斥和排查《排华法案》而创造的最为复杂的移民体系”^[13]。这一时期“纸生仔”体系之所以能够兴起, 与1868年美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的通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868年7月9日, 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在其内容第一款中明确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 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 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14], 这在当时就确立了“出生地原则”在美国公民身份确认上的关键作用。1898年, 华人“黄金德诉美国案”^[15]的成功, 不仅为父母双方非美国公民但诞生于美国的黄金德赢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 而且还从最高法的层面明确了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出生地原则”于华人群体同样有效, 这对于华人移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对美国后来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黄金德诉美国案”加上原先就存在的“血统原则”入籍手段, 这就使得“纸生仔”的体系有了法律前提, 但这一时期对于华人入境的身份验证依旧与旧金山移民局存档的华人公民信息密切相关, 因此冒籍或捏造身份入美的华人数量还比较少。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引发的全城大火是“纸生仔”体系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这场大火后在旧金山政府存放的美国公民资料付之一炬, 一时间华人入境审查失去了可供核查的资料, “纸生仔”体系原先难以大规模发展的最后一道程序性障碍也因此得以消除。

在旧金山大火之后, 许多当地华人根据美国移民局短时间内无法审查其身份真实性的漏洞申请了美国公民身

份,且往往根据宪法中的“血统原则”和“出生地原则”申请比自己实际的直系亲属更多的名额,进而把自己的其他亲属带进美国,或者直接将多申请的空额用于倒卖,这就意味着“纸生仔”体系有了更多发展空间。美籍华人学者李涟漪(Erika Lee)在其著作《徘徊于美国大门之外:1882年—1943年排华浪潮下的中国移民》(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16]向我们介绍了在这个体系中华人如何通过购买一个与华裔美国公民有虚假子女关系的纸面身份,从而巧妙地以美国法律认可的这一移民身份进入美国。虽然购买者在获得相关的纸面关系材料后,仍需要在入境时独自经过美国移民局的层层盘问和审查,并且时有显露破绽被遣送回国的案例。但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在排华法严格限制华人移民入美的情况下,仍有两万多名华人移民在1906-1910年间成功进入了美国,其间每年申请的人数从两千至六千不等,而以美国公民的亲属身份进入美国的人数更是居高不下^[17],可见这一体系在规避排华法案对华人群体的移民限制方面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舆论宣传。早在伍廷芳出任驻美公使之时,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华人就认识到了美国社会中舆论宣传的重要性,目睹美国排华团体的反华人游说再到美国官员的竞选演讲,一些华人代表深刻认识到了通过舆论途径来推动排华法松动的可行性。

黄清福(Wong Chin Foo)是比较早针对美国社会歧视华人的现象做出反击的华人代表。作为清政府公派留美的学生,黄清福受过正统的美国教育,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当他1873年受清政府迫害而重返美国时,自然而然担负起了同美国主流社会沟通以及改善美国华人处境、为之争取权益的艰巨重任。他在美期间,通过发表大大小小的将近几百场演讲和在新闻报纸上撰文,力图“清除美国人中普遍持有的、对中国和华人的一些误会”^{[15]256};他还通过推动已经入籍的华人参政进而为更多在美华人争取公民权和其他权利,试图从美国民主实践的源头上做出有益于华人的尝试,以此回击美国对于华人的排斥和歧视。黄清福也因其维护华人权益上的努力,被高度评价为19世纪争取在美华人政治平等的先驱和“华人马丁·路德金”^{[18]255}。

伍盘照(Ng Poon Chew)则是继黄清福之后的又一名华人社区民权领袖。1900年,他在加州创办了《中西日报》^[19],通过在中英文报纸撰文和对美国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商人和权力精英阶层进行演讲游说等途径,伍盘照致力于反抗歧视和推动华人的美国化,主张社会平等和争取在美华人的公民权。1881年,15岁的伍盘照从广东台山出发前往美国,在美期间他在美国当地家庭作工且受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1892年,伍盘照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被任命为美国西海岸第一位华人牧师,1900年2月16日由他创办的《中西日报》在旧金山创刊。这份以“改良社会、教育侨民、维护侨益”为宗旨的报纸,是当时北美洲唯一的华文报纸,为了提高报纸的知名度和精确度,他还邀请两位美国学者参与编务工作,其中一名正是知名的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傅兰雅(John Fryer)。《中西日报》创刊时正值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仍生效时期,伍盘照借助《中西日报》积极宣传和塑造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向美国社会介绍华人及华埠的良好转变,对《排华法案》以及歧视中国移民的言论予以激励驳斥,理智传达美国华侨华人的合理诉求。

1902年美国正式宣布将1882年的排华法律延长十年,这也宣告了以驻美公使伍廷芳为核心、伍盘照等人协助,力图通过反排华演说推动1882排华法重新制定的计划失败,当年年底伍廷芳卸任归国,之后的反排华游说活动多以伍盘照为中心。1905年因美国在中美华工禁约交涉中执意坚持反华排华,最终双方谈判破裂,由此引发了中国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而在策应抵货运动中就有伍盘照的身影。他通过《中西日报》向在美华人发起号召,建议有能力者以捐款支持国内商民等方式积极参与抵制,与此同时也频繁在加州等地开展游说来说明在美国政府如此排挤华人的情况下中国人开展抵货运动的必要性,在美国为中国博得了许多舆论上的支持。在伍盘照和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的努力之下,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最终不得不要移民局改善执法方式,宽待华人华工。1905年年底,伍盘照获罗斯福接见并受邀作为华商代表到众议院发表演讲,同年12月,伍盘照代表中华会馆出席“全国公民联盟”在纽约召开的“全国移民问题大会”,在会上他对美国移民局官员歧视和苛待入境华人的行为予以有力抨击,伍因此在华人社会中声名大噪。此后经常受邀到各种集会活动中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常常主动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并讲述在美华侨遭受到的不公待遇,“他的演讲,展示了中国人理性、雄辩和风趣的另一面,也为在美华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同情”^[19]。面对这一时期不断发展壮大的美国排华势力,以黄清福、伍廷芳和伍盘照为代表的华人运用自己的所学所得,为同在美国的华人同胞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积极奔走抗争,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华人华侨受歧视的处境,但在社会上为华人赢得了大量的舆论同情,使得部分美国人改变了对华人社会的刻板印象,这对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华人群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能说不是这一时期华人同种族偏见和歧视抗争的重要成果。

司法诉讼。针对美国一系列排华政策和法案给美国华人带来的诸多困境甚至是生存问题,一些华人从美国的司法制度着手,采取合理合法的司法手段同美国的排华势力做了最有力的斗争。下文将从“益和诉霍普金斯案”和“黄金德诉美国案”两个著名案例对美国华人这一时期借助司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进行说明。

“益和案”发生于1886年的旧金山,原告是当地华人洗衣店“益和屋”的老板李益和(Lee Yick),被告则是逮捕他的当地警长彼得·霍普金斯(Peter Hopkins)。从1873年起至1884年,为了打击当地华人的洗衣行业,旧金山政府先后颁布了被称为“洗衣店条例”的14项法律,大部分法令的矛头显而易见就是为了针对华人洗衣店。譬如1880年颁布的法令就规定,在未取得市政监察委员会颁布的准许证的情况下,任何主体建筑为木质结构的洗衣店进行营业都将被视为违法,并有可能因此被处以10美元的罚款和最高6个月的监禁。然而旧金山当地绝大部分木质结构的洗衣店就是由华人在经营,而白人洗衣店多为砖瓦结构。在益和案中,自1862年起至1884年起,华人李益和的洗衣店已经在当地经营了22年,并于1884年先后通过了消防监察委员会和健康部门的相关检查,然而1885年6月他申请更新经营牌照的要求却在一个月后被市政当局拒绝,而其他由美国人经营的洗衣店却大都获得了经营许可证。旧金山警方甚至以李益和没有市政所颁布的许可证而进行违法经营为由,在8月22日将他

逮捕入狱。之后李益和在同行其他华人的支持下决定将逮捕他的霍普金斯告到加州巡回法院,但严重歧视华人的加州法院最终判决霍普金斯胜诉,李益和和其他华人因此决定进一步上告到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认为“尽管该条例从表面上看十分公正,但是如果公权部门带着恶意的眼光并以不平等的方式来执行和应用它们,进而使得处于类似情况中的人们受到不公平和非法的歧视。那么,这种对公平的否定仍然为宪法所禁止”^[20]。1886年5月10日,最高法院判决该旧金山法律构成对华人的歧视,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在州的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的规定,李益和一行人胜诉,并且很快重新取得了经营许可证。

1898年的“黄金德诉美国案”^[21]则是美国全面排华时期,华人巧妙运用司法诉讼维护自身权益的另一经典案例。黄金德,1871年出生于旧金山,他的父母虽然没有美国国籍但都是有永久居留权的华人。按照美国宪法中的“出生地原则”,黄金德应当属于美国土生华人,在美国出生则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然而当1895年黄金德第二次从中国返回美国时,移民局官员以他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为由拒绝承认他的美国公民身份,进而阻止他进入美国。黄金德深知自己的公民身份在法律层面上是成立的,移民局官员只是一如既往在施展自己排华的伎俩,因此在中华会馆的帮助下,黄金德决定向各级法院提起诉讼。1898年,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中的“出生地原则”判定黄金德属美国公民,移民局应允许其入境,黄金德胜诉。“黄金德诉美国”一案的胜诉,从最高法院的层面上裁决了美国宪法修正案十四中的“出生地原则”于华人群体同样有效,对于美国之后的司法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益和案”还是“黄金德案”,都充分体现了在1882年后美国全面排华的大环境下,华人移民敢于而且善于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同排华势力作斗争的精神。

三、华人群体抗争的意义

1943年12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签署了《废除排华法律、规定移民配额及其他事项的法案》(An Act to Repeal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 to Establish Quotas, And for Other Purposes),正式废除了自1882年以来颁布和执行的一系列排华法案,标志着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由全面限制向有限限制的转变,这也意味着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浪潮进入尾声。对在美华人群体来说,半个多世纪来同美国排华势力的周旋与斗争,一方面既击碎了美国力图通过排华法实现“清华”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华人群体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推动在美华人新的身份认同的形成。

在美国排华浪潮期间,排华法案的一再出台,既是对美国主流社会盎格鲁——撒克逊路线美国化的坚持,也是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彰显^[22],因此坚持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筛选移民,把华人这一“不可同化的他者”当成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牺牲品自然也就不难解释。对最初入美的华人来说,归化美国社会并不是他们最根本的目的,来到异国也仅仅是为了积攒回到家乡生存的资本,因此在1882年排华法案正式出台前,尽管美国社会已经有歧视和排斥华人的苗头,许多时候在美华人也倾向于避开和白人的大规模冲突来保障生产生活的安定。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排华成为时尚^[23]之时,华人自然不满美国社会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白人对中国的负面想象等原因有意对华人进行排斥和歧视,因为这既是对在美华人华工贡献的抹煞,更触犯了华人最根本的经济利益,这就使得华人群体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同排华势力作斗争。从最开始主要同美国本土的暴力排华势力作武力斗争,之后同移民局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之间斗智斗法,再到为了缓解华人在美处境而积极争取社会舆论同情和華人民权等,华人的反歧视斗争水平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充分反映了在美华人反歧视抗争觉悟的提高,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与在美华人群体身份认同的变化密不可分。长远来看,华人的反歧视抗争也为日后美国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许多得以进入美国的华人经过几代人的发展之后,出于各种原因逐渐摒弃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而是选择在美国“落叶生根”,成为了美国多元社会的组成部分。那些在“纸生仔体系”中被迫隐没真实姓名进入美国的华人,大部分也在后来的华人坦白计划中重新进行入籍,这对于解决全面排华时期遗留下来的移民问题、促进华人归化美国社会意义重大。

总的来说,在美国全面排华长达六十余年的“黑暗时期”中,在美华人作为社会的边缘与弱势群体,虽然最终没能直接撼动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根本转变,但他们的积极抗争依旧有效击破了排华法“将华人赶出美国国土”的根本目的,这不能不说是华人抗争的伟大成果。他们勇于捍卫自身权益的事迹,一定程度上打破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甚至深刻影响了美国之后的司法实践,对于推动在美华人的归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即使今天美国早已在法律层面上承诺保障华人在内的所有亚裔享有与其它族裔完全相同的权益,但美国社会中针对华人华裔的种族歧视却从来没有根除过,过去黑暗的排华历史给华人群体带来的心理创伤也依旧存在,美国华人要从“归化”真正走向“同化”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1] 周跃军. 试论美国建国以来移民政策的演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3(09): 176-178.
- [2] 李定一. 美国早期外交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3] 杨国标, 刘汉标, 杨安尧著. 朱杰勤主编. 美国华侨史[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06.
- [4]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Chinese, Public Law 71, 4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May 6 1882 [DB/OL], <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chinese-exclusion-act>.
- [5] 丁则民. 百年来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J]. 东北师大学报, 1986(03): 33-39; 邓蜀生. 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J]. 历史研究, 1989(03): 164-178.
- [6] [美] 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著. 宫齐、李国庆、裴霜霜、喻文中、曾昭涛、张立平译. 美国史[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2.12.

- [7] [美]艾伦·布林克利著. 陈志杰、杨天旻、王辉等译. 美国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1.
- [8] 转引自黄小用. 晚清华侨政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3. 陈兰彬:《使美纪略》. 载王锡祺编辑:《小方壶高奥地丛钞》, 第十二辑一.
- [9] 朱士嘉.美国迫害华工史料[M].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10] 丁贤俊、喻作凤编. 伍廷芳集(上)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93 .08.
- [11] [澳] 颜清湟著. 粟明鲜、贺跃夫译. 清朝官员与出国华工[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12.
- [12] 姜帆.冒籍与反冒籍:美国排华初期旧金山口岸对华人的入境审查[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3):13-17+93.
- [13] Madeline Yuan-yin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74.
- [14]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DB/OL] , <https://constitution.congress.gov/constitution/>.
- [15] United States v. Wing Kim Ark, 相关内容参见 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 | Supreme Court | US Law | LII /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edu),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169/649>.
- [16] Erika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 [17] 吴丹妮. “逃离”天使岛: 天使岛移民拘留与华人应对 (1910-1940) [D].东北师范大学,2022.DOI:10.27011/d.cnki.gdbsu.2022.001410.
- [18] 张庆松. 美国百年排华内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11.
- [19] 陈英程. 论 20 世纪初旅美华侨的反排华游说——以伍盘照为中心[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03):49-57.
- [20] YICK WO v. HOPKINS , 118 U.S. 356 (1886), 参见 YICK WO v. HOPKINS, 118 U.S. 356 (1886) | FindLaw [DB/OL] , <https://caselaw.findlaw.com/us-supreme-court/118/356.html>.
- [21] United States v. Wing Kim Ark, 相关内容参见 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 | Supreme Court | US Law | LII /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edu),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169/649>.
- [22] 邓蜀生.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几点思考[J].世界历史,1988(01):116-127.

Research on Anti-Discrimination Struggl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Wu Miaoxuan¹

¹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On May 6, 1882,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mally passed “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Chinese”, which also known as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Along with it, the hostility of American mainstream society towards Chinese immigrants expanded rapidly, and then triggered a wave of Chinese exclusion, leading local Chinese subjected to gross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Faced with endless discriminatory regulations and violent incidents which intend to expel Chinese from the country, some people chose to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others kept staying. In order to defend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se immigrants have derive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seeking help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aturalizing through the "Paper son" system, resorting to judicial proceedings etc., which somehow changed America's stereotype of Chinese community and contributed to loosening the restriction of Chinese migration policy.

Keywords: America; the Exclusion Era; Overseas Chinese;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st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核能发电的起步和意图

曹晓敏¹ 杨桦¹

(1.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日本核能发电启动, 50 年代中期日本国内掀起第一次核能发电研发的热潮。当时, 日本积极推行核能发电的意图主要有两点: 第一、经济上, 日本将积极回应英国出口核能发电技术, 作为推动英日贸易的突破口, 力促英国废除对日援用的关贸总协定第 35 条, 扭转在国际贸易上的不利局面。第二、政治上和军事上, 日本右翼势力妄图通过从英国引进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来生产高品质的“钚”, 进而制造出军用核武器。

关键词: 20 世纪 50 年代; 日本; 核能发电; 起步; 意图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51

北京时间 2023 年 8 月 24 日中午 12 时, 日本政府正式开始核污水排放计划, 将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入海, 日本此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其已经危害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中朝等国多次发表声明, 强烈反对日本这项反人道主义的计划, 但欧美国家基本默许日本此项计划。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不足, 天然气、原油和煤炭基本依赖国外进口, 因此核能发电成为日本能源来源的重要方式。福岛核电站本是资源匮乏的日本能源来源的重要基地, 但是福岛核电站泄漏给日本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众多灾难。核能发电带来的能源的确能在极大程度上解决日本的能源缺乏问题, 但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本土遭受过原子弹打击的国家, 国内的反核呼声以及反核运动高涨等因素本应该是阻碍日本核能发展的重要因素。且日本的地理位置导致日本多发海啸地震, 本不宜建设核电站。但是, 现阶段日本早已在核能发电这一领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核电站建设也已成规模, 那么日本核能发电终究是怎样起步的? 日本为何在如此多的条件限制之下仍然强力推动核能发展? 这些问题早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探讨^①, 关于日本核能发电的发展历程、相关政策、影响因素以及福岛事故的研究都几近充实, 而本文则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 试图从英日贸易和日本右翼势力的推动这两个视角研究日本 20 世纪 50 年代的核能发电的起步和意图, 综述已有研究成果, 陈述本文观点, 以期对日后的相关研究做出绵薄之力。

一、日本核能发电的起步

(一) 日本核能发电研发的背景

1. 二战期间核武器研究遗留下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出于军事领域的需求, 日本就已经在关注核能的研究并开始研制核武器, 并成为当

作者简介: 曹晓敏 (1993—), 女,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杨桦 (2001—), 女,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① 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 主要可将其分为两个类别, 一是对日本核能发电发展历程的研究, 其中既包括对日本核能政策的研究 (例如乔林生: 《战后日本核政策再探讨》, 《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6 期, 第 25—39、5—6 页; 孙晓宁: 《日本核能政策研究》, 《黑龙江史志》2015 年第 5 期, 第 1—5 页; 石磊: 《英国核电产业发展研究 (1953-1987)》, 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 2015 年; L. M. Lidsky & M. M. Miller, “Nuclear power and energy security: a revised strategy for Japan,” *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Vol. 10, No. 2(2002), pp. 127-150.), 又包括影响日本核能政策因素的研究 (例如杨雨彤: 《试析日本核技术发展中的美国因素》, 辽宁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毕业论文, 2023 年; M. Dusiherre & D. P. Aldrich, “Hatoko comes home: civil society and nuclear power in Jap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3(2011), pp. 683-705.); 二是对福岛核电站的研究, 这其中有很多是关于福岛事故后日本核能政策的研究, (如李小军: 《日本后福岛时期的核能政策研究》, 《国际政治研究》, 2017 年第 38 卷, 第三期第 120—143、8 页; P. L. Joskow & J. E. Parsons, “The future of nuclear power after Fukushima,” *Economics of Energy & Environmental Policy*, Vol. 1, No.2(2012), pp. 99-114.)

时世界上美国以外第二个研发出分离普通铀的回旋加速器的国家。

安田武雄中将是日本国内十分关注国外军事科技发展状况的军界领导层人物，也是日本军界上层最早对原子弹感兴趣的人物^①。1940年10月，安田武雄收到中佐铃木辰三郎向其提交的一份报告，其中声称能够制造出原子弹。安田武雄在得到东条英机的同意之后，于1941年开始着手组织相关学者研制原子弹。同时期，海军方面也开始组织科学家进行核能研究。但1945年9月2日，二战的结束强行停止了日本对原子弹的研究，但此时日本的核武器研究已成一定规模并有非常可观的成果，美军在占领日本后就发现日本已经制造出5个能使原子发生核裂变的回旋加速器，当时除日本以外只有美国能制造出该装置。

但是，美国在占领日本后，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开始了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之路。自此，日本受到严格的军事限制，核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也遭到禁止，日本的核研究由此进入休眠状态。尽管如此，日本的核能研究在二战期间取得的重大突破，为其50年代进一步研究核能发电打下了基础。

2. 20世纪50年代日本核电研究再起步

20世纪50年代日本核电研究的再起步与冷战的升级息息相关。这一时期美国为了将日本打造成在东亚的反盟友，对日本的军事限制松动。两国于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中，没有提及限制日本重新启动并进行核能研究的内容。以此为标志，日本的核能研究完成了全面解禁。

20世纪50年代前期，日本迅速组建起了核能研究的核心机关单位。1952年4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便已下令组建“科学技术厅”，为日后的核能研究做技术上的准备。1954年5月，原子能利用准备调查会成立，至1956年1月，该机构承担起了日本原子能行政的最高审议机关的职能。1954年6月，原子能预算打合会成立，同年12月开始，日本向欧美诸国派遣了最早的原子能海外调查团。此后短时间内，原子能利用准备调查会和原子能预算打合会一起担当起了日本核能领域的中心机关的职能。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掀起了第一次核能研发热潮。1956年1月，原子能委员会成立，同年5月，科学技术厅正式成立，正力松太郎成为首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和首任科技厅长官，初步创建起了日本核开发体制。同年制定出原子能长期开发利用的基本计划，并成为日本核能开发的国策。1957年12月通过了《发电用反应堆开发长期计划》，又称《原子能开发利用长期基本计划之一》。自此，日本的核能研究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二) 日本不同社会群体对核能研究的态度

1. 日本民众对核能研究的反应

由于日本在二战中遭受过两次核爆的伤害，并且战后曾多次受到来自外国核试验的威胁，因此日本国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时期内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核意识。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上空引爆原子弹，同月9日在长崎引爆了第二颗原子弹。原子弹在日本的使用大大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程，同时造成了日本民众死亡和失踪30.8万人、伤22万人^②。两次核爆的经历，使日本人民形成了畏惧核武器乃至核能研究的心理，这些对核能研究乃至核武器研究反感的日本人构成了日本无核政策的重要社会基础。

战后，日本人民多次遭受着来自他国的核试验的威胁。如，1954年3月1日，美国在比基尼岛上进行核试验时，正在公海上航行的日本渔船“福龙丸第5”号受到辐射^③，并导致了船员的死亡。3月16日，比基尼事件曝光，日本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愤怒的日本国民要求追究美国政府的责任。对此，美国方面采取紧急行动，同日本政府开展交涉，提出了200万美元的补偿方案，条件是“日本政府不要再追究美方责任”，以防止日本国内范围的反核运动转变为涉外的反美运动^④。

1982年6月12日，美国国内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核示威游行，日本广岛和长崎的民众也自发地参与其中。足以见得日本民众反核情绪的持续时间之长，态度之坚定。

2. 日本政界对核能研发的态度

与日本民间的声音不同的是，政界人士反而十分积极地在国内推进核能研究。

曾任日本第71、72、73届首相，被公认为日本最“国际化”的政治领导人中曾根康弘，从1947年开始就积极地推进日本的核能研发工作。1951年1月，他向赴日举行媾和谈判的美国特使呼吁，解除对日本核科学研究

^① 孙晓宁：《日本核能政策研究》，《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5期，第1页。

^② 夏立平：《论日本核政策的走向与影响》，《国际观察》2008年第4期，第10页。

^③ 资慧：《比基尼事件》，《环境》1994年第3期，第36页。

^④ 黄涛、黄千容：《论日本拥核图谋与无核政策的历史因素》，《日本研究》2021年第1期，第44页。

的限制^①。1954年2月,中曾根康弘等人提出修改1954年度预算,其中核能相关预算为9亿日元。同年3月,中曾根等人向国会提出2.35亿日元的《核反应堆建造基础研究费及调查费》预算案,此外,追加1500万日元的铀矿资源调查费,1000万日元的核能相关资料购买费等,形成了总金额达到3亿日元的原子能预算案,并随后在众议院通过。

同一时期,中曾根康弘接近原甲级战犯正力松太郎,两人成为日本政界中推进核能政策发展的两大核心人物。1955年4月,已是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的正力松太郎召集了66名政界和企业界的人士,协商各方联手发展日本核电事业。同年10月,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组建“参众两院原子能共同委员会”,并在“举国一致”的口号下全力推进日本的核能研发工作。同年11月14日,美日双方秘密签署了《日美原子能研究合作协定》,该协定中包含了美国协助日本进行核能研究的内容,但对日本的核能研发的事后工作进行了限制,如:返还生成的副产品“铀”,接受美方检查等。可见,美国虽然当时倾向于协助日本进行核能研发,但是也存在防范日本自行研发出核武器的心态。但是,该协定的签订还是成为战后日本重新开始核能研究的重要事件。

日本政府在积极推动国内核研发的同时,不忘安抚民众情绪,投身于反对国外核试验的活动中。1954年的比基尼事件在日本国内曝光后,日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核反美运动,以此为契机,日本直接对美、苏、英等国提出了停止核试验的劝告。1956年6月,英国首相艾登宣布将于1957年上半年进行百万吨级核弹试验。1957年英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政府,核弹试验的时间定在3月1日到8月1日,地点定于太平洋中部的圣诞岛海域。对此,日本政府通过驻英大使联络英国当局,派遣特使出访英国,首相岸信介通过写亲笔信等方式请求英国政府停止核试验^②。

日本政府表现出的强烈反对外国进行核试验的举动主要是出于保护本国人民安全和反核情感的需要,而不是反对核试验本身。甚至,日本政府已经在积极筹谋在国内推进核能发电乃至核武器的研发。1965年,佐藤荣作访美期间曾对美国国务卿表示,日本拥有核武器不符合日本国民的感情,因此只能在内部小圈子里谈论^③。

二、日本积极推进核能发电的意图

(一) 经济意图——力促英国废除对日本援用的第35条

冷战背景下,美国为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反共同盟,将在日本的工作重心由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转变为帮助其重建国内经济。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将东南亚与日本捆绑,使之成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出口市场,而当时英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合作伙伴就是英联邦各国和殖民地。为此,英国对日的经济政策由宽容转为限制。

英国之所以如此防范日本,是由多重历史和现实因素造成的。第一,二战以前日本曾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商品倾销,驱逐英国产品,战后英国担心旧事重演。第二,二战时期曾发生过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恶性事件,如1942年至1943年日本强迫数万名盟军战俘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修建泰缅铁路,并对他们施以大规模、有组织的虐待行为,最终造成12000余名战俘死亡^④,也给幸存者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因此,当时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国内存在严重的反日情绪,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国民普遍歧视日本产品的现象。第三,英国的纺织业等传统产业逐渐走向衰弱,对日本商品的竞争力下降,因此政府不得不在国际竞争中为其提供保护。第四,由于受到关贸总协定和帝国特惠制的限制,英国极难提高关税,所以只能通过日本进口产品施加歧视性的限制的方式,来保护英国本国产业^⑤。

与此相对,英联邦的亚洲国家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愿意与日本通商,因为日本的产品便宜,从日本进口商品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1948年日本向英镑区出口5390万美元;1949年1月到6月,日本出口额快速增至1.2亿美元。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警惕。1952年,日本接受关贸总协定总干事怀特的建议,准备通过简易加入手续入关。但由于受到英国等国家的反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推迟了4年,直到1955年才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正式成员。但是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4个缔约国对日援引第35条^⑥,拒绝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使得日本入关的效果大打折扣。自此,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了影响英日两国经济问题的重大因素。

为了敦促英国等国家早日撤销对日援引的第35条,日本积极推动经贸谈判,力图扭转在国际贸易上的不利

^① 转引自:乔林生:《战后日本核政策再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第35页。

^② 陈巍:《战后日英关系研究(1952—197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9—151页。

^③ 乔林生:《战后日本核政策再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第35页。

^④ 刘超、宗小琦:《泰缅“死亡铁路”的修建及其战争罪行的反思》,《日语学习与研究》2023年第2期,第13页。

^⑤ 刘子玉:《冷战时期英日通商关系发展的进程及其特质》,《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2期,第118页。

^⑥ 关贸总协定的第35条第1款规定:如果两个缔约国之间没有进行关税谈判,或者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成为缔约国时不同意对它实施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特定缔约国之间不适用本协定或本协定第2款,亦即不能享受关税和相关方面的贸易优惠待遇

局面。此时，积极回应英国主动推进的对日贸易项目，如向日本出口核能发电技术，成为了日本推动英日贸易的重要突破口。并且，以英国在英联邦和欧洲的特殊地位，若英国撤销对日援引的第35条，势必会加速其他英联邦和欧洲国家的撤销行动。

（二）军事意图——20世纪50年代右翼势力对日本核能事业的推动

20世纪50年代，日本正处于右翼势力复活的时期^①，众多右翼分子大量活跃在日本军界、政界，日本核能事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便有原甲级战犯正力松太郎等人的推动。正力松太郎被称为“日本原子能之父”，在英国引进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正力松太郎利用职务之便大力在日本宣传和利用核能。1954年，日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日本媒体方面着手于通过大力宣传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来重塑人们对核能产业的希望。这时试图进军政界，并曾对《读卖新闻》进行改组的正力松太郎，于1955年1月在《读卖新闻》头条报道上刊登了美国的新情报宣传活动“和平利用核能”，并以各种形式对其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宣传^②，以图帮助日本人重塑对核能的信心，减轻日本民众对核能研究的阻力。

其次，正力松太郎开始着力于从国外购买反应堆。在日本国内长时间对核能的开发和利用进行宣传和造势之后，1956年1月，正力松太郎提出了从国外购买反应堆的构想^③。此时，正力松太郎正担任着第一任原子能委员长之职，对日本核能发展规划中的诸多事宜都具有决策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正力松太郎最初想要购买的是美国的核反应堆，但之后计划转为引进英国的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1956年5月16日，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理事应正力松太郎邀请访日，并大力宣传该反应堆，同年，正力松太郎做出决定，率先从英国引入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

但是，无论从安全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正力松太郎优先从英国引进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都是不合理的。首先，从安全性方面来看，科尔德霍尔核电站从1953年开始建造，直到1956年10月17日才开始正式启用。因此，当时日本的许多物理学家听闻正力松太郎要引进科尔德霍尔型核反应堆时，便纷纷指出该核电站缺乏足够的运营经验，尚处于研究阶段而不是实用阶段，而且还曾发生过大面积核污染的事故。由此可见，该核反应堆在安全性方面存在诸多隐患。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的轻水反应堆规模小且发电量高，相比之下正力松太郎想要从英国引进的反应堆规模庞大且发电量少。因此，优先从英国引进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的选择不符合经济性原则。在此背景下，正力松太郎仍坚持要从英国引入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的唯一解释便是想要从中获取能用于军事的“钚”。

科尔德霍尔核电站在1953年，英国政府决定建造时，就将其定位为军民两用核电站，一方面进行军用“钚”的生产，另一方面为核能发电和后续建设新的核电站积累经验^④。学者乔林生也在《战后日本核政策再探讨》一文中提及，美国的轻水反应堆制造军用“钚”较为困难，而英国的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调整运行方式后很容易变成批量生产高品质“钚”的设备。该文章中亦指出当时日本国内的物理学家们也曾担心英国的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生产的“钚”可能会被转为军用。1956年7月3日，日本第一次原子能访英调查团在出访英国之前，其团长石川一郎曾经前往美国驻日大使馆询问有无可能免除日本返还浓缩铀生成的副产品（“钚”等），便是对正力此举背后的军事目的的有力揭示。

与正力松太郎积极推动从英国进口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相配合，同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于1957年出任首相，并提出了“核武器合宪论”，日本最初开发核电的军事意图昭然若揭。1957年，围绕着引入英国核反应堆这一业务，通产省旗下的电源开发株式会社和电力公司构想的民营公司之间出现了竞争，民营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正力松太郎。经过两个派别的多次交涉以及第三方的再三调节，最终确定为政府出资20%，民营出资80%，本质上民营论派也就是正力松太郎一派占了绝对的上风。

1957年9月，日英两国就《日英原子能一般协定》的内容在伦敦进行交涉，提及了“钚”的保管和使用。英日双方都要求和平利用“钚”，并且英国有购回“钚”的优先权。对此，日方也要求英国购回的“钚”只能用于和平目的。至此，日本右翼势力想要通过从英国引进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来制造出军用核武器的计划被严格地限制起来。但不能忽略的是，右翼势力在日本核能发电的起步和发展中表现出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三、结语

20世纪50年代日本核能发电的起步有其较为复杂的背景。首先，从外部因素上来看，冷战爆发后，美国急

^① 孙立祥：《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演变及其重新抬头的原因》，《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6卷第5期，第59页。

^② 正力松太郎：<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AD%A3%E5%8A%9B%E6%9D%BE%E5%A4%AA%E9%83%8E>，访问时间：2024年3月10日。

^③ 孙晓宁：《日本核能政策研究》，《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5期，第2页。

^④ 石磊：《英国核电产业发展研究（1953—1987）》，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2页。

需建立反共桥头堡的现实需求推动了美日同盟的建立,由此,日本核能研发解禁,核能发电的研究成为可能。其次,日本国内的多种因素也推动了 50 年代核能发电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优化能源结构,弥补日本能源缺口的现实需要,更重要的是日本希望通过积极回应英国出口核能发电技术,将此作为日英贸易缓和的一个突破口来加强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和友好,以促使英国解除对日援引的关贸总协定的第 35 条,从而使日本在国际贸易上获利。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来看,日本政界人士积极推动日本核能发电事业的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通过科尔德霍尔型反应堆获得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钚”。当时,原甲级战犯正力松太郎和岸信介的助推便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通过日本核能发电事业重建本国军事核力量的体现。但当时日本国内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和民众们坚定的反核态度,使得日本政客们不敢公开叫嚣研制核武器,只能通过推进核能发电来积累核能研究的技术,为日后研制核武器积存实力。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日本核能发电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起步,并在 1957 年核能体制建立后迅速发展壮大,推动日本成长为如今的核能发电大国。

参考文献:

- [1] 乔林生:《战后日本核政策再探讨》[J].《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25—39、5—6 页.
- [2] 孙晓宁:《日本核能政策研究》[J].《黑龙江史志》2015 年第 5 期,第 1—5 页.
- [3] 石磊:《英国核电产业发展研究(1953-1987)》[D].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2015 年.
- [4] 杨雨彤:《试析日本核技术发展中的美国因素》[D].辽宁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毕业论文,2023 页.
- [5] 夏立平:《论日本核政策的走向与影响》[J].《国际观察》2008 年第 4 期,第 9—15 页.
- [6] 资慧:《比基尼事件》[J].《环境》1994 年第 3 期,第 36 页.
- [7] 黄涛、黄千容:《论日本拥核图谋与无核政策的历史因素》[J].《日本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40—49 页.
- [8] 陈巍:《战后日英关系研究(1952—197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 [9] 刘超、宗小琦:《泰缅“死亡铁路”的修建及其战争罪行的反思》[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13—27 页.
- [10] 刘子玉:《冷战时期英日通商关系发展的进程及其特质》[J].《历史教学问题》2020 年第 2 期,第 116—123、99、155 页.
- [11] 孙立祥:《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演变及其重新抬头的的原因》[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6 卷第 5 期,第 58—62 页.
- [12] 张玉栋:《从宽容到严格限制的转变——战后初期英国对日经济政策(1945—1951)》[J].《日本学论坛》2004 年第 2 期,第 34—40 页.

The beginnings and intentions of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in Japan in the 1950s

Cao Xiaomin¹, Yang Hua¹

¹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50s,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was launched in Japan, and in the mid-1950s, the first wav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was set off in Japan. At that time, Japan's intention to actively promote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was mainly two points: First, economically, Japan would respond positively to Britain's export of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the promotion of Anglo-Japanese trade, and urged Britain to abolis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35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which had been invoked on Japan, so as to reverse its unfavorable situ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econdly,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the right-wing forces in Japan are attempting to produce high-quality "plutonium"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Calder hall-type reactor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n order to manufacture military nuclear weapons.

Keywords: 1950s; Japan;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beginnings; intentions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层面的发展进路 与逻辑思辨——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计量分析

胡吉¹ 高旭亮²

(1.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党校 四川 成都 610051, 2.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成都 611137)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提出的带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途径“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聚类 and 关键词突现等方法, 对 2015—2024 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层面的 1618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能透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进路。由此得出, 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健全全球治理改革体系, 致力于新型经济全球化, 增进优秀文化协同发展, 提供国际交流合作思路, 全面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实践应用中, 凝练出文化层面的逻辑思辨。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 可视化; 计量分析

基金项目: 2024 年“杏林学者”学科人才科研提升计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XJP2024003); 自贡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ZMCY20241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57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场大变局不仅仅局限于一域一国、一时一事, 而是伟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 深刻揭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特征和规律, 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个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提出的带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及其世界性贡献, 是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途径“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契合、相互成就下的创新成果^[1]。而中华优秀传统“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和合”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 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审美情趣等方面^[2]。当前, 学术界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交叉研究大多以宏观视角和主观阐释为侧重点。运用 CiteSpace 等文献计量工具在现有基础之上进行大数据分析整理, 能够从特定角度微探这一交叉研究的理论现状、前沿热点和演化路径, 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个体认知的差异导致结果偏差。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整体概况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软件版本为 6.2.R6, 选取权威期刊文献收录网站中国知网 (CNKI) 作为文献检索数据库, 检索时间为 2015 年至 2024 年 (均为自然年), 时间跨度达十年, 采用“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检索逻辑, 综合其复合关键词检索, 共得到期刊论文 1184 篇、学位论文 388 篇、会议论文 56 篇。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通过手动筛选的方式剔除书评推荐、会议发布、专栏导言、通知公告等无效数据, 最终获得

作者简介: 胡吉 (1998—), 男, 硕士, 助讲,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高旭亮 (1972—), 男,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通讯作者: 高旭亮

有效期刊文献 1618 篇。

(一) 年发文趋势

从整体上分析,以年为单位观测特定主题在既定时间内的关注力度,能够粗略反映该交叉研究的演进脉络。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文献进行年度统计,通过数据转换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年度发文统计图1。由图可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研究成果缘起于2015年,2015—2019年增长势头迅猛,峰值达到271篇,2019—2023年研究趋于平稳,但每年均稳定在200篇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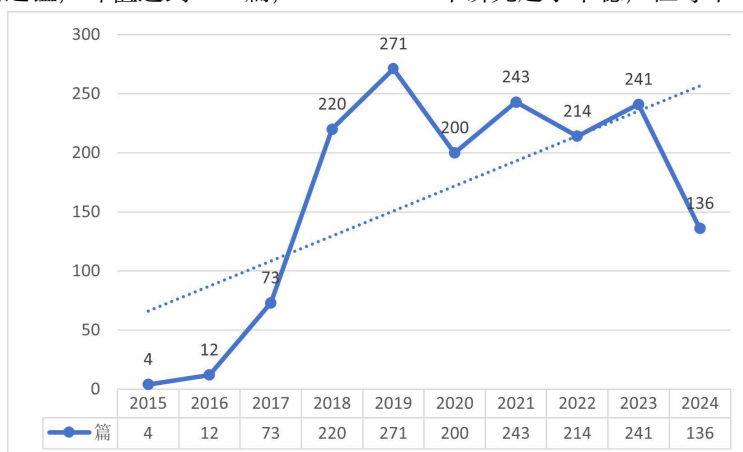


图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年度发文量

(二) 研究力量分布

在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调节中,将节点设置成研究机构与合作学者,软件在经过运行、调整和美化的步骤后,根据字体的大小和线路联结能够判断发文数量及合作关系的多少。在研究成果中,这一交叉研究发文量超过10篇的研究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其中中共中央党校以35篇的发文总量位居榜首。从高校类属上看,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高校主要还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敏感度以及学术研究力仍处于“上游”水平。从院系属性上看,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学院、新闻学院等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实证研究表明,学术积累水平、资源投入规模与研究成果数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领域内高产学者在知识体系建构与理论纵深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通过系统分析核心研究者的学术轨迹,结合文献计量学方法,能够有效揭示学科演进规律与前沿动态。这种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形成对学科领域的整体性认知,更可为学术共同体研究方向调整与资源战略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发文作者共有260位,形成了57条连接线,说明目前该交叉主题的研究力量还较为分散,围绕主题的不同研究力量或统一研究力量内部没有形成合力进行整体性研究。



图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主要发文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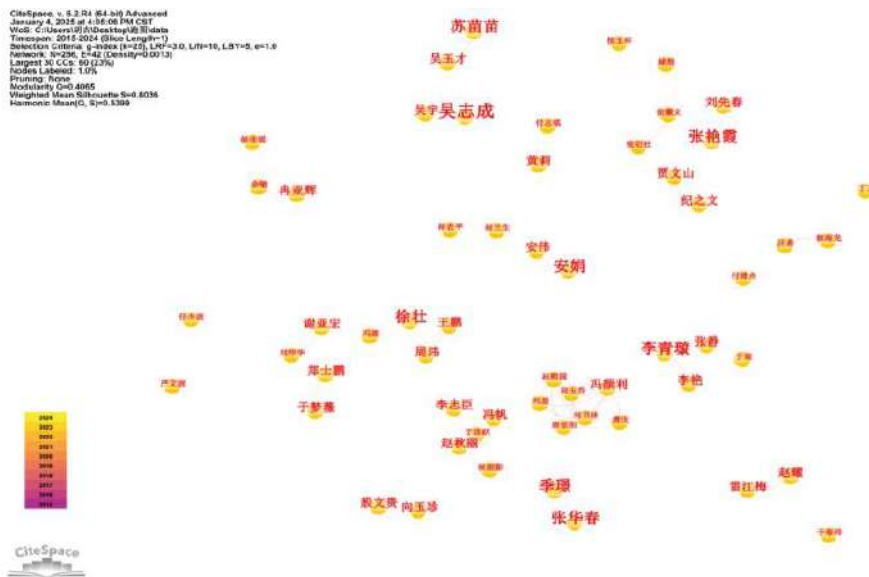


图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合作研究者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可视化分析

(一) 关键词聚类图谱展现研究内容

关键词聚类图谱是利用关键词在高于两篇文献中的次数所聚合而成的直观图谱。一个圆圈表示一个节点，节点之间的连线越紧密，说明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越突出，而字体越突出说明频次越高，即研究的力量更深入。根据 CiteSpace 分析得出，频次前五的关键词分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985 次）“习近平”（216 次）“传统文化”（67 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8 次）“‘和合’文化”（31 次）。对于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下一步聚类后，可得出排名前五的聚类分别为#0 人类命运共同体#1 习近平#3 传统文化#4 中国式现代化#5“一带一路”#6 命运共同体。



图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图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二) 突现文献预示研究前沿趋向

突现关键词主要是通过时间间隔展示关键词前进与骤停的研究转折点，以词频的差异意指特定时间段内频次突然上升和下降的知识转折点，通过词频变化能够反映围绕这一交叉主题的兴起与衰落。例如，初始阶段由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场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性，在 2017 年—2018 年成为主要关键词。而后在 2019 年—2022 年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跟随“文明交流互鉴”和“大学生”等关键词发展壮大研究场域。最后，在 2022 年后紧跟国际发展大势，衍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胸怀天下”等外交思想。

Top 11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15 - 2024
文化自信	2017	3.16	2017	2018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17 to 2018]
合作共赢	2017	3.44	2018	2019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18 to 2019]
中华传统文化	2018	2.48	2018	2019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18 to 2019]
重要论述	2019	2.57	2019	2021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19 to 2021]
文明交流互鉴	2021	3.29	2021	2024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21 to 2024]
大学生	2021	2.88	2021	2022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21 to 2022]
实践路径	2020	2.47	2021	2024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21 to 2024]
全人类共同价值	2021	11.5	2022	2024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22 to 2024]
人类文明新形态	2022	7.04	2022	2024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22 to 2024]
中国共产党	2018	6.93	2022	2024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22 to 2024]
胸怀天下	2022	5.43	2022	2024	[Bar chart showing citation burst from 2022 to 2024]

图 6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关键词突变图谱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层面的逻辑思辨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出中华传统“和合”文化融汇了深厚的哲学内涵与独到的中国智慧，深刻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的独特之处。这一文化精髓在新时代背景下，在“五位一体”的体系构建中，对全球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引领与价值支撑作用。

(一) 健全全球治理改革体系，充分展现中国之“智”

中华民族始终秉持着“和合”的文化精神，崇尚和合共生、和合共赢、和合共进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化的今天，以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为推动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贡献中国智

慧^[3]。

首先,中国坚持“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积极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指出发展依旧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将“发展优先置于首位”。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全球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中国也积极推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责任。

其次,中国坚持“亲仁善邻”的交往理念,积极推动国际秩序重塑。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主张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平等参与,共同决策。中国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改革方案,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中国坚持“守中致和”的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发展权作为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单边制裁措施也对实现发展权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促进发展、提质增效置于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守中”的新动力与“致和”的新思想。

总的来说,中国始终以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为助推器,能够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回应了世界人民求和、谋创、促合的时代关切,指明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明之间的共同奋斗方向。这不仅体现了大国担当和责任,也展现了全球新视野和国际影响力。

(二) 致力于新型经济全球化, 推动建设共赢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必须加强宏观政策协调”^[4]。新型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航标,旨在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需建构多边治理框架,重点通过制度性约束遏制排他性政策与单边制裁机制。实践层面应同步深化要素跨境流动制度创新,依托数字贸易协同机制与供应链韧性网络建设,实现市场深度整合与系统性风险共担的辩证统一,最终形成兼具发展包容性与安全稳定性的开放型经济生态。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经济层面主张“义利合一”与“同舟共济”,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观,积极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升了自身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

一是经济全球化格局逐步改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正在崛起,改变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格局。部分国家的经济总量显著提升,对于全球国际影响力显著增长。二是经济全球化链条加快重塑。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紧密相连,各国都成为全球合作链条的一部分,形成了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面临着全球经济融合的纽带正经历加速重构,新兴经济体崛起,贸易格局与产业链调整,技术创新推动经济模式转型。目前,非经济因素对全球产供应链的影响正在上升,这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产供应链结构。三是经济全球化动能推陈出新。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进程正在加速,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恢复全球经济活力、增强世界经济发展韧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统计得出的数据,2023年—2024年整个自然年期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已经跃升至近35万亿人民币,同比数值也有大量增长。意味着在消费领域,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重点培育和壮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将成为扩大内需的有力抓手。

总的来说,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新”是显而易见的^[5],能够有效解决数字经济对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参与主体新。当代全球化进程突破了传统中心—边缘结构,构建了全谱系国家协同参与的治理架构,通过差异化发展路径选择机制保障各国主权平等性,有效规避了传统全球化模式下资本扩张引发的强制性参与困境。另一方面,内容内涵新。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型全球化范式,通过构建全球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促进利益均衡分配,其核心逻辑在于确立以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中心的发展框架,形成了兼具均衡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型治理体系,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 增进优秀文化协同发展, 有效彰显人文之“美”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人文精神,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进优秀文化协同发展,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理论基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and 实践路径。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主张“美美与共”与“天下大同”,强调在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之下相互借鉴,彼此尊重。这种文化精神,对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6]。

一方面, 打造“百家争鸣”的文化分享共同体。以中国从隋朝隋炀帝时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到世界博览会为例, 已从展现工业革命辉煌成就的博览会, 华丽蜕变为一个汇聚各个时代顶尖文明成果的全球性盛会。但其传播世界文化的价值内涵却从未改变, 这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 筑牢“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共同体。以文化交流为例, 中国通过举办各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活动, 如中华文化节、国风演艺节等, 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 同时也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 实现文化的共享和共赢。这种文化交流方式, 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发展。

总的来说, 深刻把握“两个结合”, 加强顶层设计, 深耕人文沃土, 不断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理路,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的人文内核责无旁贷。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精神内涵, 积极倡导和实践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的“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精神, 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进而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 提供国际交流合作思路, 突出表现协作之“力”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 源远流长, 内涵丰富, 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符号与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强调和谐共处、合作共赢,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在全球化的今天, 更应该借鉴其内蕴的交际之道, 推动国际交流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首先,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强调的是“和而不同”, 这是一种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的思维方式。在国际合作中, 各国文化、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 这是客观存在的。国际交流合作是全球发展的时代课题。一直以来, 人类都在思考“怎样推进国际合作”。因此, 只有尊重这些差异, 通过对话交流, 增进理解, 缩小分歧, 寻找共同点, 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其次,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强调的是“和衷共济”, 这是一种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行动理念。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各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应该如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 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国际人文交流赛事《汉语桥》为各国青年学习中文、领略中华文化提供了宝贵平台, 充分彰显了作为文化之桥的独特魅力, 让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朋友圈”。

再次,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强调的是“政通人和”, 主张政府与百姓的积极互动来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理念倡导包容性的社会关系, 促进资源的平衡分配, 以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 实现社会的整体稳定与持续发展^[7]。在这一框架下, 政府与民间组织应共同作用, 通过有效的政策制定和社会服务, 确保所有群体的利益得到妥善照顾, 推动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因此, “政通人和”的理念有助于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有力支撑。

总的来说,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国际交流合作思路。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内涵, 借鉴其精神, 推动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实现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世界各族人民将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到协作之“力”的伟大。

(五) 全面建设清洁美丽世界, 构筑尊崇自然之“理”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积极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以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为理论支撑, 全面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一是加速推进绿色转型。这是构筑清洁美丽世界的首要步骤。绿色转型不仅要求产业升级、能源结构优化, 还涉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以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为指导, 可以借鉴中国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传统观念, 即《诗经·大雅》中提到“天生烝民, 有物有则。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的尊崇天地人和的环保宗旨。

二是贡献生态公共产品。它强调环境资源的共享性和保护的重要性。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各国需要共同承担起保护地球家园的责任。在此背景下,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提倡的国际生态协作精神显得尤为重要。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就指出, 促进共同发展的全球生态公共产品, 要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三是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 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这是“道法自然”的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现实呈现。

总的来说,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为全面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涵养。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为地球播撒下一个绿色干净的未来^[8]。

参考文献:

- [1] 陈红娟,吴迪.“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创新发展[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06):35-42.
- [2] 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文明新能量的增添[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7(02):5-12.
- [3] 周小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价值意涵[J].求索,2023,(05):35-41.
- [4] 习近平.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N].人民日报,2022-01-18(002).
- [5] 高杨,曲庆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型经济全球化愿景[J].西北民族研究,2022,(02):18-26.
- [6] 张春霞.世界文化格局重塑中的中国机遇与应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07):110-119.
- [7] 达尼洛·图尔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国际交流合作[J].当代世界,2022,(12):76.
- [8] 肖兰兰.习近平关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J].思想教育研究,2023,(10):3-9.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Logical Spec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armony and Union" Culture: A Visualiz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HU Ji¹, GAO Xuliang²

¹ Chenghua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College, Chengdu

²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Xi proposed to the world with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armony", i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armon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of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hrough the keyword clustering and keyword emergence methods of CiteSpace software, this paper makes a visual analysis of 1618 literatures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armony" culture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from 2015 to 2024, which can se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is research fiel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harmony" has refined the logical thinking at the cultural level in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improving the reform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committing to the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cultures, providing ideas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clean and beautiful world.

Keywords: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ese traditional "harmony" culture; Visualiz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从荒野到全球视野：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研究评析

陈良泓¹

(1.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全球领先的环保非政府组织, 其理论与实践对全球生态保护具有深远影响。探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跨地域、跨国界的发展轨迹, 能够揭示其如何通过跨学科合作与多领域实践, 形成一套创新性的保护策略。在大自然保护协会取得成功的归因解释上, 机构的自我革新和广泛的社会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 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各地开展的保护性实践中, “荒野”保护理念作为其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始终得到贯彻, 而全球环保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则是提供了明确的历史背景与时间线索。

关键词: 大自然保护协会; 非政府组织; 环保; 生态系统; 社会合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52

自然环境保护的浪潮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而日益高涨,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全球范围内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和保护行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作为非政府组织, 在进入不同地区和国家环境保护领域后, 必然面临着诸如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与当地社区协作等一系列挑战。换言之, 大自然保护协会必须适应不同地域的环境政策和文化差异, 与当地社会互动并整合资源, 以实现其保护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自然保护协会逐渐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 学术界逐步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环保实践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纳入到各自的研究议程中, 并将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中。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理论模式与环保策略之间相互作用影响, 在一系列环保实践的过程中最终得以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环境治理的结构塑造、策略发展和政策实践。从二十世纪早期环保意识的觉醒, 到今天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环保项目实施, 该组织的研究和实践呈现出跨学科、多领域的多样化状态,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从早期以荒野保护为导向的行动, 到后来对社会参与与可持续发展的强调, 再到当前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和政策创新的深入探讨,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与发展, 映射了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环境变迁和社会需求适应性的演进。面对如此拓展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 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历史演变、实践路径及理论框架的相关研究, 并对其展开深入评析, 以期环境保护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学术研究提供洞察。

一、协会沿革：跨地域、国界的 NGO 组织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历史演进映射了环保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轨迹。在环境科学研究、国际关系学、发展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跨区域、跨国家发展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者们从多样的学术视角出发, 运用多种理论工具, 认识到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组织历史并非单一线性叙事, 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演进过程。具体而言,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发展历程可以通过组织演化(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策略适应(Strategic Adaptation)、国际扩散(International Diffusion)和跨界合作(Transboundary Collaboration)来综合描述。这些概念共同勾勒出大自然保护协会如何从一个地区性环保实体成长为具有全球行动力的非政府组织。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组织演化反映了其结构和功能的逐渐成熟。比尔·伯查德(Bill Birchard)认为大自然保

护协会的机构发展反映了其从一个小规模、机会驱动的组织向一个大規模、使命驱动和系统化运作的组织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大自然保护协会不断调整其结构以适应新的挑战，增强其功能以开展更有效的环境保护。^[1]而约翰·索希尔 (John C. Sawhill) 则将大自然保护协会成长过程体现在其科学基础的方法、非对抗性的市场策略、合作伙伴的广泛参与、对当地社区需求的关注，以及对经济和生态保护兼容性的探索上。此外，大自然保护协会还通过增强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项目来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挑战，并扩展其景观级倡议以确保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保护。^[2]

安娜·威洛 (Anna J. Willow) 通过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北美另一个著名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对比，意识到大自然保护协会从最初的科学生态学保护组织逐渐成熟为一个综合性的环境保护组织，这种成熟体现在其保护策略的扩展，即从单一的保护未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到接受和整合人类活动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使命陈述虽然变化不大，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强调保护对自然和人类都有益处的景观。而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实践也从过去的“活体博物馆”概念转变为现在的“工作景观”方法，体现了其保护工作的包容性和综合性。^[3]

策略适应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面对不同环境和管理挑战时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斯蒂芬·查普林 (Stephen J. Chaplin) 通过对协会自然区域项目的考察，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面对不同环境和管理挑战时，展现出了高度的策略适应性和创新性，这种适应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结构的转变上，还体现在保护措施多样性和与社区的合作上。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工作不仅仅关注生物多样性，还考虑到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力求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通过与当地社区的多层次合作，大自然保护协会得以更高效地实施其保护措施，在此过程中也提高了当地社区对保护工作的认识和参与度。^[4]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国际扩散展现了其如何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范围，在拉丁美洲、亚洲、欧洲与非洲都建立其分会或附属机构，并进而影响和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议程。环境非政府组织 (Environmental NGOs, 简称 ENGOs)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数量大幅增长，规模迅速扩大，影响力与日俱增。ENGOs 具有全球性、非政治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等特点，它们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聚焦跨越国界的环境领域项目，与不同社会部门合作，以及培养和吸引专业人才，有效地扩散其影响力。^[5]比尔·伯查德的研究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国际扩散不仅体现在其组织机构的扩张与保护范围的扩大，还体现在其对国际环境保护议程的推动和影响。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将其模式和影响力扩展到全球其他地区，在亚太地区 and 拉丁美洲，大自然保护协会注意适应当地文化和环境需求，通过与当地组织合作，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1]179-235}

罗伯特·莫斯利 (Robert K. Moseley) 和蕾妮·马伦 (Renée B. Mullen) 在对大自然保护协会国际扩散的积极性进行肯定的前提下，还看到了其受到的争议与项目实施的缺陷。此前，部分学者批评了包括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内的跨国保护组织，认为它们偏好“原始荒野”，而牺牲了发展中国家土著人民的文化和生计。而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将其保护工作深入到具体的地区性项目中，这体现了其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可以说，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国际扩散是一个不断适应和扩展的过程，它不仅将其保护理念和实践传播到全球不同地区，还面临着与当地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融合的挑战。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中国云南省的工作经验表明，它在国际扩散中既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也致力于整合社会和文化元素，以实现更有效的保护成果。^[6]

跨界合作则突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多元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的能力，这种合作是其全球环境保护活动成功的关键一环。小威廉·布莱尔 (William D. Blair Jr.) 以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合作保护项目为例，强调其实现保护目标的过程中，与各种利益相关者都建立了多维度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者包括与私人土地所有者、州和联邦政府、私人慈善机构、基金会以及国际组织和个人，这些合作关系对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活动至关重要。^[7]詹姆斯·格里菲斯 (James J. Griffith) 和查尔斯·克诺伯 (Charles R. Knoeber) 从企业捐款被视为购买有价值的输入、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广告效应、环境责任的形象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企业向大自然保护协会捐款的动机是多方面的，此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企业的捐款行为，他们假设了 1981 年里根政府上台后对企业捐款激励产生影响的可能性，预计新政府时期企业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捐助会有所下降，理由是政府更加宽松的环境政策会减少企业试图通过捐款来获得环境法规缓解的动机。^[8]

在与诸多利益相关者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环保合作的过程中，大自然保护协会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流程与策略，这体现了其在环保领域推动多方合作的领导力以及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大卫·威廉姆森 (David Williamson) 讨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与企业建立联盟的经验，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建立企业联盟时应当注意几个关键点：伙伴关系需要在组织的所有层面上建立、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来确保战略上的契合、成功的伙伴关系需要双方都做出妥协、管理好各方的期望以及强大的伙伴关系需要借助时间、承诺和资金的投入来维护。^[9]玛莎·平斯 (Martha Pings) 在其研究中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 (大自然保护协会) 与美国土壤协会 (ASA)、作物科学协会 (CSSA) 和土壤科学协会 (SSSA)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合作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

目标,即通过科学实践来增强美国种植者的土壤健康和营养管理能力。平斯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支持专业认证、计划会议和推动政策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促进土壤健康和农业土地的可持续性具有积极意义。^[10]

上述概念不仅揭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活动和影响力,而且展示了其在不同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些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又为大自然保护协会提供了一个不断进化和改进的框架,使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制定更具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并与各种合作伙伴建立和维护关系。对于学术工作的开展而言,这也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环境保护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同时也为我们本国涉及到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理解框架。

二、保护策略:跨学科、多领域的实践

保护策略是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展工作的基石,它决定了组织如何有效地应对全球环境挑战。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并非孤立,而是在广泛的学科领域内进行整合和创新。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体现了一种多维度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包括了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还包括了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见解。通过不断探索和应用多学科知识,大自然保护协会得以确保其保护措施既科学又具有可操作性,而这种方式还为其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使其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保护计划。

此外,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也展现了一种多领域的实践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了与政府、企业、社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专长,共同推进保护项目的实施。这种跨界合作不仅提高了保护工作的效率,也增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总体而言,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可以被划分为生态保护、社会参与和政策倡导等几个关键领域,其中,土地保护是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全面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社会参与指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促进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参与方面所做的努力。而政策倡导则主要关注的是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政策层面上推动环境保护的努力。这包括与政府合作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政策、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协议的谈判等。进一步,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还体现在其对创新技术的运用以及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上。可以看出,通过这种多维度的保护策略,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综合性、适应性、参与性、创新性、持续性等方面体现了其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的专业性和领导力。

在现有的关于大自然保护协会跨学科、多领域的实践的文献中,有几个关键点比较具备代表性:土地信托(Land Trust)、自然保护系统工程(Conservation by Design)、新技术运用。

(一) 土地信托

土地信托基金具体影响大都市地区的生长模式和农村土地景观的特征,不是通过分区和监管控制,而是通过直接的土地交易。在这方面,他们更像是当地的土地开发公司,而不是倡导更严格的土地使用控制和开发限制的典型环境组织。^[11]正如在大自然保护协会成立之初,工作人员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描述:“我们以传统的方式拯救土地——我们购买土地”。土地信托基金与塞拉俱乐部或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倡导组织截然不同。除了通过游说和宣传以获得资金(用于收购或管理)的行动外,早期的土地信托团体避免让人觉得他们与政府监管或权力有关联。私人土地保护活动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根植于美国土地信托运动的文化中。^[12]

理查德·布鲁尔(Richard Brewer)认为“土地保护和爵士乐一样,是美国的发明。”并且该想法是对19世纪下半叶自然景观迅速、持续破坏的回应。^[13]布鲁尔指出,到2001年,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美国已保护了超过1200万英亩的生态重要栖息地,并在全球其他地方帮助保护了超过6000万英亩的土地。一方面,他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成就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争议,如提到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创始人维克多·谢尔福德(Victor Shelford)对组织发展方向的担忧。布鲁尔展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土地信托的典范,其在推动土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and 影响力。同时,他也提出了对土地信托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和挑战。包括如何持续扩大保护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确保保护措施长期有效性。^{[13]185-216}

多米尼克·帕克(Dominic P. Parker)和沃尔特·瑟曼(Walter N. Thurman)在其研究中提到,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全国最大的土地信托组织,与其他1500多个小型信托组织在土地保护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在与土地信托联盟(LTA)的对比中,两人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一个大型的土地信托组织,与小型的LTA信托在目标和运作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大自然保护协会更侧重于保护和增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而LTA信托则更多地提供开放空间的景观保护。在土地保护策略上,大自然保护协会更倾向于主动购买土地和保护地役权,而LTA信托则更多依赖于接受捐赠。此外,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运作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其资金筹集和项目分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面对联邦土地计划时,大自然保护协会表现出了“Crowding in”(即联邦土地保护的增加促进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土地保护活动)的现象,他们认为这与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目标和运作策略有关。^[14]

通过采访调查、实例分析的方式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土地保护进行研究的学者,当属简·迪夫利(Jane Difley)。

她调查了大自然保护协会波士顿办事处的行为活动,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土地保护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提供科学支持和工具方面。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恢复力土地测绘工具被多个土地信托用来评估潜在的土地或地役权收购,这有助于土地保护工作更科学、更系统地进行。该工具还考虑到土地的恢复力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也表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土地保护工作中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15]

(二) 自然保护系统工程 (Conservation by Design)

与土地信托不同,大自然保护协会提出的“自然保护系统工程”旨在位于不同地区进行保护活动时确保有效性。大自然保护协会借鉴了生态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生态保护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具体可以划分为生态结构性保护、生态文化性保护以及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态政策性保护等。

在生态结构性保护中,大自然保护协会关注的是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栖息地完整性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护。里德·诺斯 (Reed F. Noss) 认为,虽然大自然保护协会已经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但为了更全面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完整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要将保护工作扩展到景观层面。这包括评估每个主要群落类型的干扰制度和再生模式,考虑群落类型和发育阶段的功能组合(景观马赛克),以及考虑场所周围的景观环境(如周围栖息地类型和连通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保护那些跨越不同栖息地类型的物种,以及那些依赖于特定生态过程和干扰制度的生态系统功能。^[16]布莱恩·里希特 (Brian D. Richter) 则更加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生态系统层面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评估物种和群落的稀有性、跟踪它们的位置和生态状况,以及为关键栖息地提供保护管理,已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的增加,大自然保护协会正在将其重点转移到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层面保护活动上。这种转移的挑战在于在可持续生态系统的背景下构建可持续的人类经济,这需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改善对系统相互依赖性和生态系统过程的理解,以及进行关键的生物-水文研究。^[17]可见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生态系统层面的保护活动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关键策略,并且这种保护活动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持和多方协作。多利亚·戈登 (Doria R. Gordon) 等人的研究更侧重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结构性方法,这包括确定生态区域组合、保护区域和保护目标,以及开发和实施保护策略。大自然保护协会特别关注生态完整性的概念,并通过关键生态属性和指标来评估保护目标的状态。此外,她们还提到了监测计划的重要性,这是确保保护行动有效性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这种结构化的方法,大自然保护协会能够更科学、更系统地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并确保其保护努力能够产生积极的变化。^[18]

约瑟夫·基塞克 (Joseph M. Kiesecker) 等人重点研究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地役权,认为这是一种在工作景观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它限制了特定的土地使用方式,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仍允许私人所有权和经济活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地役权大多数位于高保护优先级的区域,并且大多数与受保护区域相邻,几乎所有的保护地役权都有明确的生物保护目标。保护地役权的战略部署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动,即最近设立的保护地役权更可能是大型的,并且更可能是购买而非捐赠的。基塞克还强调到,为了确保公共资金和税收优惠得到妥善使用,保护地役权必须制定实用的监测准则,并战略性地考虑何时以及如何进行监测。^[19]

生态文化性保护是一种综合性的保护策略,其核心在于尊重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该策略倡导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同时,推动社会关怀的深化和地区包容性的发展,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性增长。此外,它还强调边缘化群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确保这些群体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回报。杰弗里·哈德斯提 (Jeffrey L. Hardesty) 等人对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案例进行研究,展示了其如何将生态系统的动态与机构规划相结合,以实现区域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表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生态保护中不仅关注生态本身的健康,也注重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克里斯汀·霍克斯 (Kristen Hawkes) 在其文章中讨论了资源所有权对资源使用的影响,提出了两种模式:“公地悲剧”和“公共物品问题”,这两种模式都与资源的非私有性质有关,但它们对资源提取水平有不同的影响。这强调了所有权在资源使用中的重要作用,大自然保护协会需要在生态保护中更多地考虑资源所有权的分配和管理。^[20]阿德里安娜·卡谢林 (Adrienne Cachelin) 等人通过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翅膀与水”计划的评估,指出环境教育项目的成功不应该仅仅基于参与者的认知成果,还应该包括情感反应的评估。她们发现实地学习经历可能对学生的情感反应有积极影响,包括培养保护情感和增强学习动机。因此建议未来的评估应该包括随机参与者选择、更少结构化的认知评估、不包括引导想象的情感评估,以及调整评估提示以适应没有实地经验的学生。^[21]

也有部分研究者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性策略持批判态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蒙特·伯克 (Monte Burke),他认为大自然保护协会在追求生态保护的同时,与商业利益的合作可能导致环保原则的妥协。通过引用不同人物的观点,展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环保主义者中的争议地位,暗示大自然保护协会可能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

了生态保护的纯粹性。他还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经营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保护,但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和符合环保原则,仍有待进一步讨论。^[22]

相比于传统的生态保护模式,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进步更多体现在其明确提出了生态政策性保护。这种保护视角认为,生态保护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来保障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凯伦·金(Karen N. King)和辛西娅·林奇(Cynthia V. Lynch)通过考察大自然保护协会俄亥俄州分会的志愿者,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志愿者主要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参与环保活动,特别是出于“为大自然做点什么”的愿望。尽管志愿者有着多种参与动机,但利他主义是主要的驱动力。志愿者管理机构应该了解每个志愿者的动机,并确定最重要的动机,以便更有效地分配任务和提供相应的支持。她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探讨环保组织的志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如何吸引更多非传统志愿者参与环保活动。^[23]

一份关于大自然保护协会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恢复中心(NOAA Restoration Center)十年合作的亮点报告详细描述了双方在生态恢复项目上的合作成果,包括湿地、河流、海草床、牡蛎礁和珊瑚礁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恢复工作。在这些项目中,大自然保护协会和NOAA的合作不仅关注于生态恢复的实践,也涉及到了生态政策的制定和推动。伊丽莎白·施拉克(Elizabeth C. Schrack)等人指出,在政策层面,这些项目提高了公众对健康海岸线的需求意识,并通过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社区参与,推动了更大规模的恢复工作。^[24]

(三) 新技术运用

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新技术的运用上主要聚焦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是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实施上。这些方案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服务来降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增强其韧性,并在具体实践上,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包括人工智能、遥感技术、生物声学等。

尼科尔·鲁斯马尼耶(Nicole Rousmaniere)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采取的创新策略和技术的重要性。通过运用新技术和工具,包括IHA软件、水文模型和经济激励计划等,大自然保护协会不仅在特定地点取得了成功,而且通过分享这些工具和策略,进一步促进了全球范围内更有效的淡水保护。鲁斯马尼耶还指出,面对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在满足人类对水的需求和保护不可替代的淡水生态系统之间找到平衡。通过合作和共享经验,大自然保护协会得以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25]

埃斯特万·穆尔达文(Esteban H. Muldavin)等人关注到了GIS和遥感技术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环保策略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通过遥感技术可以有效地评估和识别具有高保护价值的干旱生态系统中的草原地点。其开发的生物多样性指数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方法,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快速应用,并与保护规划直接相关。尽管在不同地质基质的时间限制下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校准,但这种方法为保护生物学实践中使用遥感图像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工具,有助于快速和高效地检测整个奇瓦瓦沙漠生态区的干旱和半干旱草原。^[26]

综上,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三个策略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自然保护框架。通过土地信托确保了关键区域的长期保护,自然保护系统工程实现了跨地域的生态修复,而新技术的运用则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创新的工具和方法。这种多维度、跨学科的保护策略,不仅提高了其开展保护工作的效率,也为全球自然保护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三、理论模式:源于“荒野”,超越“荒野”

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环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将“荒野”(Wilderness)视为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其保护不仅是对自然原貌的维护,更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捍卫。“荒野”概念与环保主义相结合,反映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对自然保护的全面和深入理解,也体现了其在实践中推动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平衡的努力。

关于美国历史上“荒野”概念的演变,可从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的文章中找到线索,即从早期定居者将其视为需征服的敌人,到逐渐认识到其美学和科学价值,再到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下的国家骄傲,直至20世纪对荒野保护意识的兴起和国家公园的建立。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公众开始重视荒野对现代生活的平衡作用和生态重要性,导致对荒野保护的认可和政策支持,反映出美国社会对自然环境价值观的积极转变。^[27]

莫斯利和马伦认为大自然保护协会起源于西方的“荒野”概念,其中自然和人类社区被视为是割裂的。1915年美国生态学会成立,一些领先的美国自然科学家不满意仅仅进行学术研究,他们组成了一个激进的分支,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脱离了该学会,决心采取“直接行动”来拯救受到威胁的自然区域,而不仅仅是研究它们的消亡,这才有了1951年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正式成立。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关注美国本土的私有土地购置和自然保护区管理,逐渐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保护策略也从单一的荒野保护转向了更加综合的方法,包括在不同地理和政治尺度上工作,以及将社会和文化因素纳入保护规划中。^[6]

艾比·金奇(Abby J. Kinchy)探讨了生态学家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和生态学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美国生态研究自然区域保护委员会如何在1945年因修改章程以限制部分成员对参与政府立法的讨论,从而导致次年委员会的分裂,这反映了科学界如何在内部辩论和外部压力下,重新定义其专业边界和与政府的关系。该委

员会还致力于推动立法以保护包括国家公园和纪念碑在内的自然荒野地区，冰川湾纪念碑 (Glacier Bay Monument) 的建立便是其保护荒野地区的一个实例。此过程显示了彼时生态学家对荒野保护这一概念的扩展及其实际行动，并为其后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正式创建奠定了理论与历史基调。^[28]

1950年的克利夫兰会议预告了次年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成立以及协会内的新官员和新成员，在协会的目标和工作议程上，会议提到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护每个独特自然区域内所有生物群落的足够样本，并鼓励对这些群落的研究，这表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初创阶段就将荒野保护纳入其重要议程。^[29]在大自然保护协会此后的发展中，对于“荒野”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其具体的环保实践中得以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自然保护协会逐渐认识到荒野不仅仅是未被人类触及的自然环境，它还包括那些即使受到一定人为干扰，但仍保持着自然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的地区。这种理解的拓展促使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保护策略上采取了更为包容和综合的方法。

卡伦·波阿尼 (Karen A. Poiani) 等人分析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保护荒野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综合性和动态性规划方法，即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规划流程是一个跨学科的、灵活的框架，旨在通过结合传统保护活动与新兴的生态系统管理概念，来识别和保护关键的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该流程不仅关注于保护目标的识别和保护，还包括了对威胁的评估、利益相关者的分析、保护策略的开发以及对规划实施的持续监测和修订。^[30]

彼得·拉森 (Peter B. Larsen) 讨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推动荒野保护方面的策略和行动，包括通过其项目和合作伙伴关系来保护和恢复荒野地区。拉森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荒野保护中的重要角色和影响力，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其项目和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荒野地区的恢复。同时，他还指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平衡保护目标与当地社区的需求、如何有效地管理其资源以及如何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秘鲁亚马逊地区的活动案例研究，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推动生物圈保护区建立和支持当地社区环境保护项目方面的做出了巨大努力，拉森认为大自然保护协会是一个在全球荒野保护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组织，但其策略和方法需要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31]

以上文献表明，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理论模式在起源上与对“荒野”的保护紧密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理论和实践已经超越了对荒野概念的传统理解，并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化，逐渐转变为一种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生态保护策略。

四、结语

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一个跨地域、国界的非政府组织，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践和理论贡献是显著的。现有的相关文献不仅展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不同文化和生态系统中的适应性和创新性，也彰显了其在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引领性作用。

(一) 对现有研究的评析

上述文献论述探讨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发展历程、策略实施以及理论构建，展现了其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的多维贡献。现有研究显示，学术界对其工作的评价呈现出多样化、跨学科和多角度的特点。已有文献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评价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跨越了不同的学科领域，并且从多个角度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进行了审视。尽管研究者们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理解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我们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深入分析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模式和成果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在理论探讨层面，研究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解析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效果，其中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和环保理念共同构成了其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中的核心优势。通过在土地信托、保护设计以及新技术运用上的不断努力，大自然保护协会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保护能力，也为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着眼于全球视野，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政策制度分析揭示了其如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环境中寻求合作与发展。大自然保护协会积极适应和利用各种政策框架，通过与政府、企业和社区的合作，推动了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种宏观层面的策略部署，使得大自然保护协会能够在多变的政策环境中保持灵活性和前瞻性，有效地推进其环境保护目标。

(二) 现实意义与思考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和理论模式为中国提供了环境保护本土化和跨领域合作的宝贵经验。在中国，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挑战，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实践启示我们需制定符合国情的环境保护政策，并通过跨学科合作，整合各方资源，形成环境保护的合力。同时，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政策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和国际合作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鼓励中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向世界展示中国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跨地域活动及其所引发的争议，为其他环保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警示。在开展跨国环保活动时，相关组织需深入进行本土化反思与前瞻性规划，积极探索适应不同国情的环境保护路径。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其跨国实践中虽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项环保议题，但也面临着一系列批评，主要集中在文

化敏感性不足、限制当地经济活动、与政府合作的动机和影响、对当地知识的代表性和认可不足、规模和影响力之忧、保护策略的适应性问题、社区参与度不足、项目持续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以及国家公园概念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可见，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文化代表性、知识权威性和社区参与度方面尚存有进步空间，尤其在实施跨国保护项目时需要更深入地考虑当地社会经济需求和文化多样性，确保其保护工作既有效又具有社会公正性。

展望未来，大自然保护协会将继续在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议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为了有效推动这一进程，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非政府组织，应充分利用其灵活性和跨领域的协作能力，发挥其在促进环境政策创新、实施和监督方面的独特优势，积极深化各方协作，促进跨学科的整合，在全球环境政策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开展跨国活动时，大自然保护协会需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发挥非政府组织的适应性优势，综合考虑地方实际情况与发展需求，坚决避免介入意识形态斗争或被用作政治工具。通过这些努力，大自然保护协会将为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共同塑造一个生态平衡与社会繁荣并重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 [1] Birchard B. Nature's Keepers: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How the Nature Conservancy Became the Largest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M]. John Wiley and Sons, 2005: 9-31.
- [2] Sawhill J C.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96, 38(5): 43-44.
- [3] Willow A J. The Shifting Topology of Environmentalism: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and Conceptual Trends in Two North American Organizational Histories[J]. Nature and Culture, 2015, 10(2): 157-177.
- [4] Chaplin S J. Natural Area Programs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Transactions of the Kansas Academy of Science, 1987, 91(1-2): 7-10.
- [5] 董史烈. 国际援助中的环境非政府组织: 运行机制与经验启示[J]. 国外社会科学, 2021(1): 76-84.
- [6] Moseley R K, Mullen R B. Mapping Shangrila: Contested Landscapes i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129-152.
- [7] Blair W D Jr. The Nature Conservancy: Conservation Through Cooperation[J]. Journal of Forest History, 1986, 30(1): 37-41.
- [8] Griffith J J, Knoeber C R. Why do Corpor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Public Choice, 1986, 49(1): 69-77.
- [9] Williamson D.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Experiences with Corporate Alliances[J]. Social Marketing Quarterly, 1999, 5(3): 13.
- [10] Pings M. Advancing a Shared Goal: Societies, The Nature Conservancy Sig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J]. Crops and Soils, 2017, 62(9): 28.
- [11] Konrad L, Duvernoy G. Land Trusts: 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our Nation[J]. Natural Resources & Environment, 2002, 17(2): 95.
- [12] Johnson L A. The Land Trust Movement in the US. in an Open Fiel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for a Global Private Land Conservation Movement[M].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14: 2.
- [13] Brewer R. Conservancy: The Land Trust Movement in America[M]. Dartmouth, 2003: 14.
- [14] Parker D P, Thurman W N. Crowding out Open Space: The Effects of Federal Land Programs on Private Land Trust Conservation[J]. Land Economics, 2011, 87(2): 202-222.
- [15] Difley J. Standing Tall: Forestry Practices on Lands Conserved by Selected New England Land Trusts[M].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21: 12-13.
- [16] Noss R F. From Plant Communities to Landscapes in Conservation Inventories: a Look at The Nature Conservancy (USA)[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87, 41: 11-37.
- [17] Richter B D. Ecosystem-Level Conservation at the Nature Conservancy: Growing Needs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Conservation Biology[J]. Journal of the North American Benthological Society, 1993, 12(2): 197-200.
- [18] Gordon D R, et al.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Approach to Measuring Biodiversity Statu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ervation Strategies[M].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12: 1-14.
- [19] Kiesecker J M, et al. Conservation Easements in Contex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ir Use by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7, 5(3): 125-130.

- [20] Changing Ecosystems: Natural and Human Influences[C]. Supplement to Bulletin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7 Annual Meeting Jointly with the Nature Conservancy, Albuquerque, New Mexico, 1997, 78(4): 15.
- [21] Cachelin A, et al. Using the 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 Framework to Inform Program Evaluation: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Wings & Water Wetlands Education Program[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09, 40(2): 2-14.
- [22] Burke M. Companies, People, Ideas-Creative Giving-Eco-Pragmatists-The Nature Conservancy gets in Bed with Developers, Loggers and Oil Drillers[J]. Forbes: Business and Finance, 2001, 3(9): 63-65.
- [23] King K N, Lynch C V. The Motivation of Volunteers in The Nature Conservancy-Ohio Chapter, a Non-Profit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1998, 16(2): 5-11.
- [24] Schrack E C, et al. Restoration Works: Highlights from a Decade of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Nature Conservancy and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s Restoration Center[M].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12: 1-71.
- [25] Rousmaniere N. Leveraging Our Learning From Freshwater Sites: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Freshwater Learning Center[C]. Proceedings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Federation, 2000(6): 2250-2261.
- [26] Muldavin E H, et al. Indices of Grassland Biodiversity in the Chihuahuan Desert Ecoregion Derived from Remote Sensing[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1, 15(4): 844-855.
- [27] Nash R. The American Wilder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Forest History Newsletter, 1963, 6(4): 2-13.
- [28] Kinchy A J. On The Borders of Post-War Ecology: Struggles over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s Preservation Committee, 1917-1946[J]. Science as Culture, 2006, 15(1): 23-44.
- [29] Program Cleveland Meetings December 27-30, 1950, Announcement Minneapolis Meetings September 5-9, 1951,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 New Officers, New Members[J]. Bulletin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50(4): 69-76.
- [30] Poiani K A, et al. A Scale-Independent, Site Conservation Planning Framework in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3(1-3): 143-156.
- [31] Larsen P B. The Good, the Ugly and the Dirty Harry' s of Conservation: Rethinking the Anthropology of Conservation NGOs[J]. Conservation & Society, 2016, 14(1): 21-33.

From Wilderness to Global Vision: A Review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TNC)

Research

Chen Lianghong¹

¹*School of Social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Abstract: As the world's leading environmental NGO,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global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Exploring TNC's trajectory across regions and borders can reveal how it has developed a set of innovativ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In the attributional explanation of TNC's success, institutional self-innovation and broad societal collaboration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addition, the concept of habitat conservation has been the guiding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NC's conservation practices, an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 has provided a clea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emporal clues.

Key words: The Nature Conservanc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systems; social cooperation

从“旁观者”到“守护者”： 初中校园欺凌治理中学生行为转变的机理

何文敏¹

(1.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 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行为转变对治理成效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 通过对80名初中生的访谈、田野观察等多源数据编码分析, 构建了学生从“旁观者”到“守护者”的转化模型。研究发现, 转化路径包括“个体内生驱动”与“外部环境赋能”两条主线: 前者遵循“责任认知觉醒-情感触动激发-行动能力提升”的自下而上逻辑, 后者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自上而下影响实现赋能, 二者形成动态交互的协同关系。研究揭示了责任认知、情感共鸣、行动能力等个体因素与环境支持的作用机理, 为校园欺凌治理提供了“内驱外塑”的双向干预路径, 丰富了青少年亲社会行为转化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校园欺凌; 学生行为; 校园欺凌旁观者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93

欺凌是指恃强凌弱、以多欺寡及属持续性的伤害他人的行为^[1]。校园欺凌(又称为校园霸凌、学生欺凌)是一种将欺凌主体限定于与校园活动相关的人群,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定义校园欺凌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包含但不仅限于学生, 还包括教职工和校园周边社区的其他成员, 校园欺凌的参与者包括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2016)、《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2017)、《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2021), 核心目的是通过系统性、制度化的手段, 全方位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与校园环境的安全有序, 同时对旁观者提出的不做“帮凶”、及时报告、给予关心、在能力范围内帮助等要求。

校园欺凌一般发生在校园及其周边, 但处于欺凌“漩涡”中心的学生只占少数, “漩涡”周边更多的还是旁观者, 旁观者的态度和行为会直接作用于欺凌的持续时间与严重程度。当旁观者选择沉默或附和欺凌者, 会在无形中助长欺凌行为, 形成“群体冷漠”的恶性循环; 而当旁观者主动制止或报告欺凌事件时, 能够显著降低被欺凌者的心理伤害, 甚至中断欺凌行为。因此, 本研究将探讨初中校园欺凌治理中学生从“旁观者”到“守护者”转变的影响因素, 以及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机理, 为校园欺凌的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进路

早期研究多聚焦于欺凌者和受害者, 近年来, 随着校园欺凌低龄化愈发明显, 恶性程度越来越高, 不断的挑战了社会的底线, 同时伴随着学者对校园欺凌问题认识的愈发深入, 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校园欺凌的发生、演变和干预机制^[2]。尤其是关注了“旁观者”的研究, 关注旁观者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3]。早期的研究发现旁观者的存在和行为会影响欺凌行为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 若旁观者对欺凌行为无动于衷, 欺凌者可能会因缺乏制止而更加肆无忌惮, 欺凌行为也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后续的研究则开始聚焦于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解释旁观者的行为, Latané和Darley提出的旁观者干预模型(BIM)备受关注^[4], 该模型认为, 个体要实施干预行为, 需经历注意到事件、将其解读为紧急情况、承担责任、知道如何做以及采取行动这几个步骤^[5]。国内学者更多探讨的是“旁观者”的干预因素, 同伴关系中旁观者作为同伴背景因素在欺凌事件发生时有重要影响, 促使消极旁观者向积极旁观者进行良性转化^[6], 良好的同伴关系会使个体形成更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 从而使其在目睹校园欺凌事件时更可能做出积极干预行为^{[7][8]}; 社会关系让旁观者角色选择受到个体认知、情感和相关情境评估的影

作者简介: 何文敏(1995—),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通讯作者: 何文敏

响^[9]；家庭功能与小学生的欺凌旁观者行为密切相关，功能良好的家庭中，亲密度、责任感、同情心和观点采择能力都得到了更好得发展，使他们更愿意采用积极的态度和行为面对校园欺凌事件^[10]；学校的道德氛围感知因素可以通过校园欺凌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和同情的调节作用对中学生冷漠旁观行为产生影响^[11]；除外还有良心^[12]、共情^[13]等因素。可见，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作为受到个体心理特质、同伴群体压力、校园文化氛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旁观者的行为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现有研究都从单一因素探讨对“旁观者”行动转化的影响，导致对校园欺凌中旁观者向守护者转变现象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机理揭示不足。运用扎根理论强调从实际现象出发，通过系统收集和分析资料，归纳提炼出理论，对初中校园欺凌场景下学生行为转变进行研究，能够深入挖掘影响旁观者向守护者转变的关键因素，揭示学生行为转变背后隐藏的心理机制与社会逻辑。

2 初中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行为转变的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由社会学家巴尼 格拉泽 (Barney Glaser) 和安塞尔姆 施特劳斯 (Anselm Strauss) 于 1967 年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中首次提出，作为质性研究领域的经典范式，其核心旨趣在于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与分析，从经验数据中自下而上地归纳理论，突破传“理论先行”的研究桎梏。其核心内容首先通过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的拆解，提炼出初始概念与范畴；继而借助主轴编码，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络—行动/互动策略—结果”的典范模型，梳理范畴间的逻辑关系；最后经选择性编码，确定核心范畴，并围绕核心范畴整合其他范畴，构建理论框架。在此过程中，通过持续比较法不断验证理论，直至达到理论饱和度，即新增资料无法产生新的概念与范畴。

扎根理论能够深度挖掘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潜在逻辑与作用机制，尤其适用于探索尚未被充分理论化的研究议题。扎根理论与本文所研究问题的适配性在于以下方面：一方面，校园欺凌场景下学生行为转变涉及个体心理、群体互动、制度环境等多元影响因素，其复杂性难以用现有理论完全解释，扎根理论的开放性与归纳性特质，可有效规避预设理论对研究结论的束缚；另一方面，通过扎根理论的逐级编码与理论构建，能够系统剖析旁观者行为转变的关键节点、驱动因素及其作用路径，为揭示行为转变的内在机理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进而为校园欺凌治理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2.2 样本选取与资料收集

在样本选取上，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目的抽样策略。基于理论抽样原则，综合考量学校的地理区位（城市/乡镇）、办学属性（公立/私立）、规模层级（大型/中型/小型）等维度，选取 8 所具有异质性的初中作为研究场域。在选定学校内，进一步按年级、性别、学业成绩分层，通过滚雪球抽样与教师推荐相结合的方式，重点选取经历或目睹过校园欺凌事件的学生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研究人员分为 4 组共访问了 80 名学生，以确保资料的丰富性与理论饱和度。资料收集采用三角验证策略，构建多元数据采集体系。其一，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的理论敏感性原则，围绕学生对欺凌事件的认知框架、行为决策时的心理冲突、行为转变的触发事件、校园环境对行为选择的影响等核心问题，设计访谈提纲，通过追问与互动挖掘深层信息；其二，实施参与式观察，研究人员以实习教师、社团指导者等身份深度融入校园生活，采用田野笔记、事件日志等方式，系统记录课堂、课间、课外活动等场景中的欺凌现象及学生反应；其三，收集学校反欺凌政策文本、班会记录、学生成长档案等文献资料，多源数据相互印证，提升研究结论的信度与效度。

3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3.1 开放式编码及主范畴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第一步，旨在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全面、完整的解读^[14]。该阶段是将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挖掘概念。即通过打散原始资料、赋予概念、重新组合的操作法过程凝练概念^[15]。首先将访谈的资料转译为文字，将访谈的文字资料导入 Nvivo12 软件建立案例库；其次，按照词频、中心句的句意等，借助 Nvivo12 软件提取关键词，通过对原始资料的逐步分析、整合获取原始语句 2865 条，通过合并、剔除重复后提取 132 个初始概念（参考点皆大于 2），最后将初始概念进行分类和聚拢形成 33 个初始概念，由于篇幅有限，仅列举其中几个初始范畴和其中的一个有效语句，如表 1 所示。

表1 开放式编码及初始范畴(摘选)

初始范畴	原始资料(初始概念)
恐惧退缩	A-15 那次在走廊看到有人被堵着要钱,我吓得躲在拐角,想喊老师又怕被报复,最后默默走开了,一整天心里都特别难受。
责任缺失	A-33 之前遇到校园欺凌,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责任觉醒	A-76 参加完学校的反欺凌讲座,我才明白旁观也是在纵容,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
情感共情	A-20 看到被欺负的同学躲在角落哭,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像自己受欺负一样难受,特别想帮帮他。
集体责任感	A-98 班级组织反欺凌主题班会,大家一起讨论怎么应对,我感觉我们是一个集体,得共同守护彼此。
沟通能力	A-55 想帮被欺负的同学,可又怕自己说不好话,反而让情况更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成功体验	A-49 尝试用学到的反欺凌技巧,悄悄联系老师,成功帮助被欺负的同学,特别有成就感,原来我也能做点什么。
家庭引导	A-80 爸妈知道学校有欺凌情况后,教我遇到危险先保护好自己,再想办法求助,还鼓励我勇敢面对。
校园组织支持	A-93 学校成立了反欺凌互助小组,我报名参加了,和同学们一起巡逻、宣传,感觉特别有意义。

3.2 主轴编码及主范畴

主轴编码是在再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对概念各自属性进行分析,按照逻辑关系对类属进行关联性分析,并且区分主、次类属,建立主范畴和副范畴之间的关系。利用 Nvivo12 软件对初始范畴进一步比较、归纳和抽象,建立主范畴和副范畴之间,共 4 个主范畴 19 个副范畴,4 个主范畴能够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对校园欺凌治理初中生行为转变的机理进行概括,如表 2 所示。

表2 主轴编码及主范畴和副范畴(摘选)

主范畴	副范畴	关系的内涵
责任认知	个体责任认知 集体责任认知 社会责任认知 责任意识强度	责任认知作为行动决策的前置因素,不同层面的责任认知构建起学生的责任框架。模糊的责任认知易使学生陷入行动犹豫,而清晰、强烈的责任认知则是推动其从“旁观者”迈向“守护者”的重要指引。
情感触动	同情心理 集体认同感 价值共鸣 情感联结深度 道德情感驱动	情感共鸣是激发学生行为意愿的核心力量。当学生产生同情心理,或是与集体、社会价值达成共鸣,以及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结时,道德情感驱动会增强,进而提升成为“守护者”的内在动力
行动能力	信息收集能力 沟通谈判能力 应急处理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计划执行能力	行动能力是将“守护者”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必备条件。若缺乏这些能力,即便学生有强烈的责任认知和情感共鸣,也难以有效应对实际问题,阻碍角色转化
环境影响	家庭氛围影响 学校教育引导 同伴群体示范 社区活动参与 社会文化熏陶	环境支持作为贯穿角色转化全程的关键要素,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各层面环境通过氛围营造、教育引导、活动开展等方式,全方位影响学生的责任认知塑造、情感体验形成和行动能力培养

3.3 选择性编码及核心范畴

选择性编码是指由数据分析者对那些所确定的、与中心变量在某一个理论中有充分且重要关联的变量所进行的编码^[16]。核心范畴具有统领性,能够把其他类属都囊括在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内^[17]。通过用 Nvivo12 软件对 4

个主范畴进行分析比对, 最终得出两个核心范畴: 个体内生动力、外部环境赋能 (见表 3)。

表 3 选择性编码及核心范畴

序号	核心范畴	主范畴
1	个体内生动力	责任认知 情感触动 行动能力
2	外部环境赋能	环境影响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在不断的增加新材料中判断是否还会发现核心类属的新属性, 如果没有, 则意味着数据分析的结束, 如果依然有, 则应该重新回到数据, 并查看所有编码类属的具体情况。将预留的 5 个访谈材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由另外一组编码人员按照上述的编码原则进行重新编码, 并没有出现新的概念, 由此得出学生从“旁观者”到“守护者”转化的机理的实现逻辑基本达到理论饱和。

4 学生从“旁观者”到“守护者”转化的学理阐释

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以及初始范畴、主范畴和核心范畴的凝练, 本文构建了在初中校园欺凌中学生从“旁观者”到“守护者”的转化的实践逻辑解释框架, 如图 1 所示, “个体内生驱动”与“外部环境赋能”二者相互交织、协同作用, 形成完整“旁观者”到“守护者”的转化的实践逻辑。

4.1

内生驱动路径以学生自身内在因素为起点, 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发展逻辑。首先, 学生通过自我反思、经验积累与知识学习, 逐步唤醒责任认知。从对个体责任的初步感知, 到将集体责任、社会责任纳入认知范畴, 责任意识不断强化。在对初中生小 A 的访谈中, 他分享道: “以前看到同学被欺负, 觉得和自己没关系, 直到有次班会老师讲了反欺凌的法律知识, 我才明白沉默就是纵容。后来再遇到这种事, 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这表明学生的责任认知可通过学习实现觉醒, 从个体责任延伸到对制止欺凌的社会责任。而责任认知的觉醒进而触发情感触动, 学生基于责任认知, 对他人困境产生同情、对集体荣誉形成认同、对社会正义产生共鸣, 个体如果能够理解和同情受欺凌者的不幸遭遇并产生共情, 就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出保护行为^[18]。学生小 B 在访谈中提到: “有次看到好朋友被几个同学嘲笑, 他当时特别难过, 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特别想帮他。”这种同情心理成为其后续行动的动力。最后, 为将情感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 学生主动学习、实践, 提升信息收集、沟通协调、问题解决等行动能力, 从而完成从“旁观者”到“守护者”的自我驱动式转变。小 B 后续表示: “后来我就去问老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还和其他同学商量一起支持他, 现在我们都会互相帮忙, 不让这种事再发生。”此路径中, 责任认知是根基, 情感触动是动力, 行动能力是保障, 三者自下而上层层递进, 构成紧密的内在驱动链条。

4.2 外塑赋能: 自上而下的环境影响与塑造

外塑赋能路径强调外部环境因素自上而下的影响力。家庭、学校、社会等外部环境作为主导力量, 通过教育引导、氛围营造与资源供给, 对学生产生影响。在田野笔记中记录到, 某班级长期开展“班级互助小组”活动, 课间氛围融洽, 当有新同学因口音被个别学生嘲笑时, 小组内成员立刻站出来制止, 并向嘲笑者说明这种行为的不当之处。这一现象表明, 良好的校园环境能够培育学生的集体责任认知, 促进学生从“旁观者”向“守护者”转变, 印证了外塑赋能路径中校园环境对学生责任认知的塑造作用。事件日志也记载了类似的影响过程。一次课堂上, 两名学生因小组作业发生争执, 其中一方言语过激, 出现侮辱性词汇。起初部分同学选择沉默旁观, 但随着老师及时介入引导, 强调班级团结的重要性, 一些学生开始主动调解矛盾, 安抚双方情绪, 这清晰展现了外部环境引导如何影响学生的责任认知和行为, 推动学生参与到问题解决中。家庭中, 父母言传身教传递责任意识, 营造充满关爱的家庭氛围, 为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奠定基础; 学校通过课程设置、活动组织, 系统培养学生的责任认知与行动能力; 社会则借助舆论宣传、政策支持, 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实践平台与价值导向。外部环境自上而下地将责任观念、情感导向与行为规范传递给学生, 助力其责任认知的构建、情感触动的激发与行动能力的提升。例如, 社会宣传的正能量事迹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共鸣, 学校的实践课程直接提升学生的行动能力, 家庭的鼓励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这些外部因素共同作用, 为学生角色转化提供支持 with 引导。

4.3 元素的互动关系

个体内生驱动路与外部环境赋能路径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外部环境赋能为内生驱动路径提供养分与支撑。通过对某班级一学期的事件日志跟踪发现，在学校开展反欺凌主题月活动（外塑赋能）后，班级内学生责任认知普遍提升，主动报告潜在欺凌隐患的情况增多。这体现了外部环境的教育引导能加速学生责任认知的觉醒，良好的氛围营造有助于强化学生的情感触动，丰富的资源供给则为行动能力提升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内生驱动路径的发展成果会反作用于外塑赋能路径。学生们在反欺凌主题月活动后积极的“守护者”行为，进一步促进班级形成互助氛围（反作用于外塑赋能路径），后续更多学生自发组织反欺凌宣传活动。如在学校组织的户外拓展活动中，学生小C主动承担起照顾身体不适同学的责任，并表示：“我觉得大家是一个集体，互相照顾是应该的，而且帮助他我自己也很开心。”这种基于内生动力的行为，也会影响周围环境，推动外部环境进一步改善。两条路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动态循环，共同推动学生从“旁观者”到“守护者”的持续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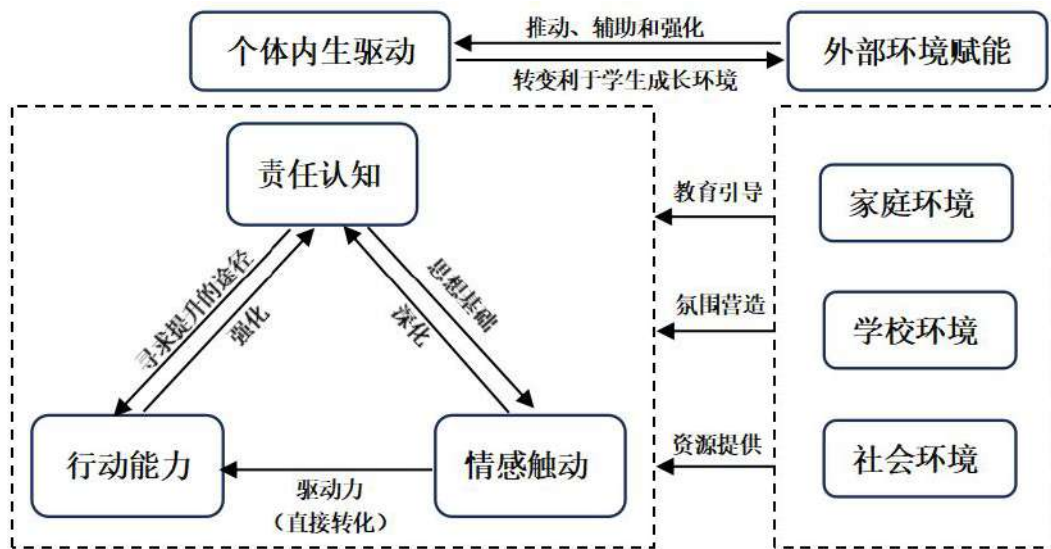


图1 学生从“旁观者”到“守护者”转化的实践逻辑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系统探讨了初中校园欺凌治理中学生从“旁观者”到“守护者”的转化机制，提炼出“个体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赋能”两大核心范畴。研究发现，内生驱动路径呈现“责任认知觉醒-情感触动激发-行动能力提升”的自下而上发展逻辑。外塑赋能路径则通过家庭引导、校园教育、社会支持等自上而下的影响，塑造学生的责任认知与行动意愿，田野笔记中班级互助小组对新同学的保护行为及教师课堂干预案例均佐证了这一点。两条路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动态交互关系：外部环境通过主题月活动、政策宣传等加速学生责任认知觉醒，而学生的“守护者”行为又反作用于环境，如自发组织宣传活动优化班级氛围。这种双向互动打破了传统研究中单一因素作用的局限，构建了“认知-情感—行为-环境”的协同转化模型。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突破了旁观者研究中个体心理特质或环境因素的单一视角，揭示了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机理；丰富了校园欺凌干预理论，为BIM模型补充了本土化的路径阐释；校园欺凌治理需兼顾学生内在动力培育与外部环境优化，既要通过课程提升责任认知，又要借助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机制提供行动支持。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覆盖范围，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转化差异，并开展干预方案的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1]刘晓梅.以复和措施处理校园欺凌问题[J].青年研究,2007,(07):25-31.
 [2]Spadafora N, Marni Z A, Volk A A. Should I Defend or Should I Go? An Adaptive,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Personal Costs and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Bullying Intervention[J].Canadia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2020,35(01):23-40.
 [3]苏林琴,刘新宇.“我”为什么不出手：校园欺凌局外人行为有调节的链式中介[J/OL].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1-17[2025-07-0]

- 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978.G4.20241121.1128.002.html>.
- [4] Latané B, Darley JM.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Why doesn't he help?* Englewood Cliffs, Ny: Prentice Hall, 1970
- [5] 邱小艳,唐君,李璐,等.欺凌旁观者干预量表在我国小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31(05):1150-1155. 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23.05.024.
- [6] 傅纳,朱春月,解晓晨,等.中学生校园欺凌旁观者角色及其同伴地位现状[J].中国学校卫生,2022,43(01):87-91. DOI:10.16835/j.cnki.1000-9817.2022.01.019.
- [7] 傅纳,丁翔宇.同伴地位对校园欺凌中旁观者防护行为的影响——社会自我效能感及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4,32(05):998-1006.
- [8] 石常秀,代晨辉,辛宇,等.初中生良好同伴关系对其积极干预欺凌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31(11):1730-1735.
- [9] 王芳,肖少北.校园欺凌情境中潜在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中国学校卫生,2021,42(10):1596-1600.
- [10] 马郑豫,苏志强,杨圆圆.小学生欺凌旁观者行为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联[J].中国学校卫生,2024,45(02):236-239+243. DOI:10.16835/j.cnki.1000-9817.2024009.
- [11] 王小凤,燕良轼,丁道群,等.学校道德氛围感知对中学生冷漠旁观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31(02):396-401.
- [12] 邱小艳,李璐,唐君,等.良心对中学生欺凌旁观者干预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4,32(02):381-386.
- [13] 张玥阳,张雪,徐伟.共情对青少年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影响: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和社会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31(05):1189-1193.
- [14] 叶嘉琪.高校教师职称评聘的制度逻辑、实践特征与优化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25,19(04):86-96. DOI:10.13316/j.cnki.jhem.20250606.009.
- [15] 刘兰剑,李丹.“双向互动”与“内外转化”: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实践逻辑——基于60个典型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5,(02):70-82. DOI:10.15993/j.cnki.cn35-1198/c.2025.02.018.
- [16] 刘超,夏湘玉.城市社区干部队伍“女性化”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J].领导科学,2025,(04):145-153. DOI:10.19572/j.cnki.lckx.2025.04.019.
- [17] 贾哲敏.扎根理论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方法与实践[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90-95.
- [18] Cuervo AAV, Nieblas CA, Ferrer BM, et al. Relations between restorative parental discipline, family climate, parental support, empathy, shame, and defenders in bullying.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8,95:152-159

From "bystander" to "guardian": The mechanism of student behavior change in addressing school bully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Hewenmin

1. Jilin Sport University, Changchun, China

Abstract: The behavioral transformation of bystanders in school bullying is crucial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This study adopts grounded theory and constructs a transformation model of students from "bystanders" to "guardians" through coding and analysis of multi-source data, including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from 8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includes two main lines: "individual endogenous driv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empowerment". The former follows a bottom-up logic of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 emotional arousal - enhancement of action ability", while the latter achieves empowerment through top-down influences from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The two form a dynamic interactiv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The study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action ability, as well as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support. It provides a bidirectional intervention path of "internal drive and external shaping" for the governance of school bullying and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rosocial behavior transformation among adolescents.

Keywords: Campus Bullying; Student Behavior; Bystanders of Campus Bullying

生成即上链：区块链视域下医疗纠纷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创新的逻辑与路径

王自力¹

(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 医疗纠纷诉讼证据保全领域应用区块链技术创新之必要性在于, 我国当前医疗纠纷诉讼复杂且具有高度专业性, 而证据作为此类案件审理的关键, 却存在过错原则下医患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和证据保全时间点过迟的局限性。现行区块链证据保全事后上链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催生出了生成即上链的新模式, 以破解这种技术应用与制度需求的矛盾。但实施过程中存在如何推广数据生成即上链模式, 加强病人隐私保护和保存庞大繁杂数据的挑战, 需要借鉴 SPChain 系统经验, 加强监管检测以及官方平台与第三方存证平台接入来应对。

关键词: 区块链; 证据保全; 电子病历; 医疗纠纷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58

一、问题缘起

为响应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关于区块链技术的指示精神, 落实“十四五”规划以及国家信息化规划的要求, 在司法领域,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日益普及。最高人民法院将其视为智慧法院 4.0 版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积极推动其发展。2021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建设的通知, 旨在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司法区块链平台, 为全国各级法院及民众提供统一的数据存证与验证服务。目前, 该平台已经实现了电子档案、执行查控等数据的区块链应用, 累计上链数据超过 22 亿条。^[1]北京互联网法院已利用区块链技术存证了大量的电子证据, 用于各类网络纠纷案件的处理。^[2]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领导下,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修订, 最终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正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区块链在司法领域应用的意见》。这标志着区块链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进入了新阶段。近年来,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其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多, 成为推动民事诉讼制度革新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

医疗纠纷诉讼作为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重要的一部分, 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涉及大量敏感个人信息的双重特点。^[3]其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事实认定难, 鉴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 病历资料成为无可替代的核心证据。然而,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病历资料的真实性常遭质疑, 特别是在患者怀疑资料被篡改或缺失的情况下, 事实认定变得更为复杂。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化改革亟需与医疗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保持协同推进。在此背景下, 区块链技术凭借其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优势, 为医疗纠纷解决提供了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当前实践中, 区块链技术已初步应用于医疗数据存证领域, 通过电子病历的链上存证有效提升了证据的可信度。然而, 现有“事后上链”模式仍存在显著局限性: 其一, 传统证据保全节点设置与医疗场景存在断层, 难以及时保存诊疗过程中的重要数据; 其二, 在过错原则主导的举证体系下, 滞后性的证据固化方式易导致医患双方的信息持有不对等地位加剧, 难以有效平衡诉讼双方的举证能力差异。这种技术应用与制度需求的矛盾, 催生了“生成即上链”的新型应用模式。该模式通过建立诊疗数据实时上链机制, 可实现医疗行为全流程的同步存证, 为构建更加公平高效的医疗纠纷解决体系提供新视野。

二、理论层次: 生成即上链模式之逻辑

(一) 法理逻辑: 过错原则下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在医疗纠纷诉讼中, 现行过错原则下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其核心矛盾在于法律要求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承担超出实际能力的举证义务, 而医疗机构却凭借对关键证据的绝对控制形成实质性的“证据垄断”。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八十一条, 患者需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及过错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但这

作者简介: 王自力(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民商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一规定忽视了医疗行为的专业性与封闭性特征。诊疗过程中的核心证据,如完整的病历档案、手术记录、会诊意见、护理操作细节等均被医疗机构单方保管。患者仅能获取零散的检查报告或简化的门诊记录,难以触及证明过错所需的关键材料。即便患者通过司法途径申请调取证据,也可能面临病历记录缺失、涂改或“技术性完善”等风险。

而《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虽规定了医疗机构隐匿或篡改病历等情形可推定过错,但患者往往因缺乏专业能力和调查手段,陷入“证明医疗机构篡改证据”的二次举证困境。更为突出的是,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判断高度依赖鉴定意见,而鉴定材料的选择与提交仍由医疗机构主导。若其刻意回避不利信息或提供不完整资料,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便可能被系统性削弱,患者却因知识壁垒难以有效质证。这种制度设计实质上举证责任转化为“难以完成的任务”,迫使患者在信息残缺、技术弱势的情况下对抗具备专业优势和资源支配力的医疗机构。这不仅违背了平等的基本原则,更导致大量患者因举证不能而被迫放弃维权或承担败诉后果,加剧了医患间权利救济的实质不平等。甚至患者及其家属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进行“私力救济”,亦或产生报复心理,加剧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 现实逻辑:保全节点过迟

医疗纠纷诉讼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在涉及复杂的医学知识和技术问题的同时,往往还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因素,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波动较大。且医疗纠纷的社会关注度高,易引发公众关注和社会舆论压力。加之赔偿数额较大,尤其是当涉及严重身体损伤或死亡时。因此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时对证据的要求极高,病历资料、检查报告等医疗文件是关键证据,这些证据材料必须真实、完整、无误,才能作为法庭上的有效证据。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保全具备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当事人认为现有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二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或者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证据保全。在医疗纠纷诉讼中以上两个要素无疑都与医疗纠纷的现状特性产生了冲突。具体而言,实践中的证据保全时间是在纠纷产生后进行,而医疗纠纷不同于其他纠纷的是医疗提供方在掌管证据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即重要的病历资料包括住院病历、手术记录等都由医疗服务提供方持有保管,而患者却仅持有部分医疗影像资料、药品处方以及费用票据,处于被动劣势地位。因此无论是纸质病历还是电子病历,都存在被人为修改的风险,导致证据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如果仍然依照传统证据保全方式,即使纠纷产生原告方及时的申请了证据保全,也不可避免的无法确保证据的原始性及真实性。因此医疗纠纷诉讼的证据保全既需要比照传统证据保全的规则,又要与传统的证据保全相区别。“现有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的条件已经不符合现实需求了,对于此类证据的保全节点应该逐渐向证据产生时靠拢。^[4]

三、实践层次:生成即上链模式的应用路径构建

在传统的医疗信息系统中,病历数据的管理往往依赖于集中式服务器,这种方式存在诸多不足,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易受人为因素影响的风险。如误操作或恶意篡改,以及数据安全性较差等问题。然而,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一种新型的数据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为病历数据的保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在目前实践中的做法是待病人的病历数据生成后再上传至区块链中,这种方式确保了病历数据上链后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但却不能很好的兼顾病历数据的原始性即无法解决病历数据上链前被篡改或误操作等问题。^[5]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构建病历数据生成即自动上链的模式,具体实践路径如下:

(一) 病历数据

当患者就医时,其基本信息(如姓名、年龄、性别等)、诊断结果、治疗方案以及其他临床相关信息将被数字化转换成数据格式。在这些数据被上传至区块链系统之前,它们首先会通过哈希算法处理,生成一个独特的哈希值,这一步骤确保了数据的唯一性和不可逆性。随后,这些数据及其对应的哈希值将被整合进一个数据包,并附上时间戳,然后通过网络广播至区块链网络中的各个节点。这些节点将对新加入的数据包执行一系列验证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完整性、一致性检验以及时间戳的验证。只有在大多数节点验证通过后,该数据包才会被正式添加至区块链中,形成一条不可篡改的记录。一旦数据被记录在区块链上,任何试图修改数据的行为都将被系统识别并阻止,从而有效防止了医疗记录的篡改。

病历作为医疗纠纷中最常涉及的证据类型之一,其准确性和完整性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处理结果。通过将病历数据上传至区块链,可以确保这些信息不会被事后更改或伪造。每一笔交易都带有时间戳,并且每个区块都链接到前一个区块,形成一条不可逆的链。当患者接受医疗服务时,从入院登记、诊断、治疗到出院的每一个环节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并永久保存在分布式账本中。这种透明度不仅提高了数据的可信度,也为医患双方提供了一个共同认可的事实基础。

(二) 手术记录

手术记录作为医疗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其准确性和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健康安全以及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因此,确保手术记录的准确无误显得尤为重要。区块链技术在这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复杂且风险

较高的手术来说,详细的手术记录是评估医生责任和患者知情权的重要依据。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创建一个包含手术前准备、手术过程、术后护理等各个环节详细信息的数字化记录来实现这一点。此外,该系统还可以集成物联网设备,如智能监护仪、生命体征监测器等,自动收集并验证实时数据,进一步增强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的生命体征监测数据、手术器械的状态以及手术团队的操作步骤视频,构成了手术记录的关键部分。这些数据在手术过程中被实时采集,并通过物联网设备传输至中央管理系统。随后,这些数据被整理成结构化信息,并在加密后上传至区块链网络。在区块链网络中,每个包含手术记录的新数据块都会被标记时间戳,并与前一个数据块链接,形成一个连续的链条。这种方法不仅确保了数据的完整性,还为手术过程提供了可追溯性。通过这种方式,手术记录的每一个环节都被安全地记录和保护,确保了医疗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和透明度,这对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和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四、完善进路:应用路径构建中的挑战与对策

(一) 如何推进数据生成上链无缝衔接—SPChain 经验的启发

当前,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操作模式是在电子病历生成后,再将其纳入区块链中进行存储与管理。然而,这种方式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有效保障病历数据上链之前的原始性和真实性。鉴于此,上文构想的最理想状态即病历数据应当在生成的同时立即上链,以确保其真实性与不可篡改性。然而,这一设想的实施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我国分布广泛的众多医疗机构中推广这一模式时,将面临诸如系统引入、人员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医院方额外的成本开支。

针对上述挑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的研究团队所开发的 SPChain 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SPChain 是一种创新性的区块链技术框架,专门用于电子健康信息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其主要目标在于促进医疗数据的安全共享与隐私保护。具体而言,该系统通过优化区块与链的结构设计,并运用变色龙哈希函数,为每一位患者建立完整且连续的医疗历史档案。重要的是,SPChain 还引入了一套声誉管理系统,通过设立激励机制鼓励医疗机构积极参与到这一共享平台中。^[6]

SPChain 中声誉系统的设置,不仅能够激励积极性较高的医疗机构获取必要的病历数据用于医学研究,而且还有助于加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因此,借鉴 SPChain 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推动各医疗机构建立起病历数据生成即上链的机制,以此增强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原始性。这不仅有助于保证医疗数据的质量与安全,同时也为未来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认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在经济方面,可以通过政府或行业协会提供财政补贴及奖励,以减轻医疗机构在初期投入上的负担,并对表现突出的机构给予额外的资金支持;在声誉方面,可以通过官方认证、发布排名以及行业内的表彰等方式来提升积极参与者的社会形象和专业地位;在技术方面,则可以赋予积极参与的医疗机构优先访问高级别数据资源的权利,并为其提供优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通过多管齐下,打通推广“生成即上链”这一模式的梗阻。

(二) 如何加强病人隐私保护—基于 51%攻击的担忧

在探讨区块链技术的安全性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区块链因其去中心化和加密特性而被认为是高度安全的,但它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 51%攻击的存在,51%攻击指的是当一个实体控制了超过网络一半的算力时,能够对区块链的交易历史进行改写^[7],例如,攻击者可以进行双重支付、阻止有效交易的确认、阻止新块的添加,甚至逆转先前的交易记录。这种情形无疑直接威胁到了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优势,即其安全性和去中心化特性。进而动摇用户对整个系统的信任基础,并可能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医疗行业,电子病历系统承载着海量患者隐私信息,若此类系统遭到安全性侵害,导致敏感数据泄露,将引发严重的伦理及法律责任问题。因此,在推进区块链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步强化个人隐私保护措施,以防止潜在的数据泄露风险。^[8]

但值得欣慰的是,51%攻击尽管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却并不容易实现。特别是对于像比特币这样具有大规模网络效应的公链而言,攻击所需的算力资源极为庞大。攻击者承担的成本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网络的安全性。但鉴于个人隐私保护的重要性,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还是在实际应用中,都应当对隐私保护给予高度重视。因此,除了持续优化区块链底层协议,提高其抵御攻击的能力外,还应通过制定相应的监管框架,建立有效的监管和检测机制,提高区块链技术的整体安全性和抗攻击能力,从而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与隐私以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三) 如何保存庞大的数据—中介节点的构想

在探讨病历数据生成及上链模式的过程中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如此繁杂庞大的数据如何保存。根据《中国电子病历行业发展趋势研究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2024-2031年)》,我国医疗机构对电子病历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以 14 亿人口基数计算,单日新增病历数据量可能达千万级,而影像数据(如 CT、MRI)的单个检查即可生成从几百兆到几千兆不等的文件。加之医疗法规规定的保存年限,传统中心化存储的硬件投入与维护成本将呈指数级增长。如果由国家统一创建平台,接入全国所有医疗机构,如此操作可以确保数据的合法性以及统一标准便于实践操作。但不得不考虑的是在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上,每天就医的人员产生的医疗数据已经是极为庞大,

更不论长年累月的积累,况且其中大多数数据是最终不会“走”上法庭的,如此会浪费许多的成本。鉴于此,建议采取医疗机构与第三方区块链存证平台协作的模式,即将医疗机构与官方认可的第三方区块链平台相连接。视第三方平台为数据流转的中介节点,利用区块链技术将数据安全存储于其中。当司法部门需要查阅相关数据时,再从第三方平台提取相应信息。此外,亦可通过各省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系统,并依据诉讼时效对数据库进行定期清理等措施,以减轻数据存储的压力。这种多维度的存储策略,既能满足医疗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需求,又能有效降低社会总体存储成本,为病历数据的高效存储与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五、结语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案件数量的攀升,各地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持续增长,反映出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随着医疗纠纷复杂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案件需要通过司法途径来处理。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们不禁要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缓解这一社会问题,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在此背景下,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它不仅为医疗纠纷的证据保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透明、公正、可信。在医疗领域,这意味着患者的权益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劳动成果也将获得应有的尊重。通过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实现医疗记录的透明化管理,确保每一环节的信息真实可靠,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和冲突,从而促进医患双方的信任重建。

但鉴于医疗纠纷诉讼的特殊性以及证据的存取方式,现行的事后上链的存证保全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现实的需要。生成即上链这一模式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了医疗纠纷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和证据保全节点过迟的问题。为解决医患纠纷带来了新的视野。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区块链有望成为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化数字化改革的关键支撑,助力构建更加公正、高效的医疗纠纷解决体系。为患者、医疗服务提供者 and 法律工作者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虽然区块链技术在医疗纠纷诉讼证据保全的应用中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其展现出的巨大潜力不容忽视。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社会认知的逐步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加公平、高效、人性化的医疗环境正在向我们走来。

参考文献:

- [1] 孙福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理解与适用[J].中国应用法学,2022,(04):31-42.
- [2] 唐诗.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互联网法院民事诉讼——以上海法院为研究样本[J].中国信息化,2024,(03):87-88+84.
- [3] 吴迪.谈医患纠纷的防范与处理[J].学理论,2016,(08):104-105.
- [4] 吴文妍.区块链技术下的电子数据保全探究[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6(03):73-78.DOI:10.16347/j.cnki.cn42-1742/z.2023.03.006.
- [5] 张宇.技术保障与规则建构:区块链视域下的电子证据适用[J].南京社会科学,2021,(10):93-99.
- [6] Renpeng Z ,Xixiang L ,Jingsong Z .SPChain: Blockchain-based medical data sharing and privacy-preserving eHealth system[J].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2021,58(4):
- [7] 刘峰,江佳齐,黄灏.面向加密货币交易介质及过程的安全综述[J].信息安全学报,2024,24(03):330-351.
- [8] 王雨.区块链赋能供应链金融的应用研究[J].中国市场,2022,(27):44-46.

Generation is on the Chain: The Logic and Path of Evidence Preser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in Medical Dispute Litigation under the View of Blockchain

Wang ZiLi¹

¹Institute of Law,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500

Abstract: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evidence preservation in medical dispute litig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China's current medical dispute litigation is complex and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the evidence, as the key to the trial of this kind of case, has the limitations of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fault, and the late time point of evidence preservation. The current blockchain evidence preservation mode of uploading the chain after the fact can no longer adapt to the needs of reality. On this basis, a new model of generation-as-uploading was spawned to break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i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needs. However,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how to promote the data generation-as-chaining model, strengthen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and preserve huge and complicated data, which need to be coped with b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SPChain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ory detection and access to official platforms and third-party evidence preservation platforms.

Keywords: blockchain; evidence preservation;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medical disputes

基于人工智能的家禽疾病预警系统研究与设计

马旭¹ 简蕊¹ 杨露露¹ 李广博^{1,2*}

(1. 淮北理工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2.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家禽产业面临传统生产模式的转型压力, 而人工智能技术为实现精细化管理与智能化决策提供了重要路径。本文聚焦基于人工智能的家禽疾病预警系统, 通过分析传统养殖模式的瓶颈及现有检测技术的局限性, 提出融合深度学习等技术的解决方案。系统设计围绕多维度监测功能展开, 包括实时环境监测(温度、氨气等指标)、实时声音监测(识别咳嗽等异常声音)、实时行为监测(基于图像识别分析饮食、活动等行为)、实时体温监测(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以及禽病智能诊断(结合专业数据库实现自动分析与建议)。系统架构采用“多源感知-智能分析-决策应用”模式, 通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采集数据, 经深度学习算法处理后实现异常预警与闭环管理。研究表明, 该系统能有效提升家禽健康监测的实时性与准确性, 降低疾病损失, 推动养殖向精细化、智慧化转型。未来可进一步整合可穿戴设备数据与微生物检测技术, 优化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 并与养殖设施深度集成, 构建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本文的研究与设计为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实践参考, 对保障家禽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家禽康养; 人工智能; 疾病预警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大)(2024AH040217); 基于人工智能下的家禽康养与疾病预警技术研究(S202413620055); 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2023jyxm1009; 2023xjzts117; 2023sdx14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81

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持续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家禽产业正面临传统生产模式难以突破的瓶颈。一方面, 市场对优质禽产品的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 另一方面, 传统养殖模式效率低下、资源消耗高、标准化程度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精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与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全球家禽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1]。

动物行为模式分析是识别异常状态的重要依据^[2]。已有研究^[3]表明, 当动物遭遇环境突变或健康异常时, 其行为模式往往会出现显著变化, 及时捕捉这些行为信号不仅是动物福利评价的核心指标, 更是实施环境调控和疾病预警的关键切入点。然而, 家禽养殖具有群体密集化饲养、个体外观同质化、躯体非刚性等典型特征^[4], 导致其行为监测难度远高于大型牲畜。在畜禽生产实践中, 行为异常通常是需要人工干预的重要预警信号^[5], 因此, 如何高效准确地实现家禽行为检测, 成为智能化养殖亟待突破的技术难点。

当前家禽行为检测技术主要包括人工观察法、传感器检测法和图像检测法^{[6][7]}。传统人工观察受限于主观性强、劳动强度大、监测连续性不足等缺陷, 难以满足规模化养殖的实时监测需求; 传感器检测虽能实现个体行为的精准捕捉, 但存在设备能耗高、安装维护复杂以及可能干扰家禽自然行为等问题。相较之下, 图像检测法通过对采集图像的智能处理与算法分析实现行为识别, 具有客观性强、运算效率高、信息处理量大且无损检测的显著优势, 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特别是随着深度学习技术在图像检测领域的快速发展,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笼养家禽行为检测方法不断取得技术突破, 为精准化行为分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基于上述技术发展趋势, 本文结合深度学习图像检测技术, 提出一种新型家禽行为图像检测方法。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家禽养殖向自动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更能通过智能化行为监测提升健康养殖水平, 对保障家禽健康、优化养殖环境以及维护管理人员职业健康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马旭(2003—), 男, 本科, 研究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简蕊(2004—), 女, 本科, 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

杨露露(2003—), 女, 本科, 研究方向: 农业人工智能。

通讯作者: 李广博(1997—), 男,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智能信号感知; 人工智能; 牲畜个体、行为识别与跟踪; 农业信息化等。

2. 人工智能概述及应用现状

人工智能 (AI) 作为计算机科学的重要分支, 旨在模拟、延伸人类智能。自 1956 年概念确立以来, 历经发展, 已成为驱动各领域变革的核心力量, 广泛渗透于社会生产生活。

其核心技术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强化学习。机器学习通过数据分析构建模型; 深度学习借助神经网络处理复杂数据; 自然语言处理实现人机语言交互; 计算机视觉赋予机器“看”的能力; 强化学习通过奖惩机制优化决策。

近年来, 人工智能发展迅猛, 大模型技术成为关键驱动力。我国已有 433 款大模型备案上线, 在金融、政务、医疗等垂直行业深度应用, 推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如制造业用其预测需求降本, 农业借其指导种植增产。

在应用层面, 人工智能已融入生活与生产。消费领域有语音助手、智能家居; 交通出行方面自动驾驶取得阶段性进展; 医疗健康领域辅助诊断与药物研发; 电商娱乐平台的推荐系统提升用户体验; 工业生产则实现智能制造升级。

3. 家禽疾病预警系统研究与设计

3.1 家禽疾病预警系统功能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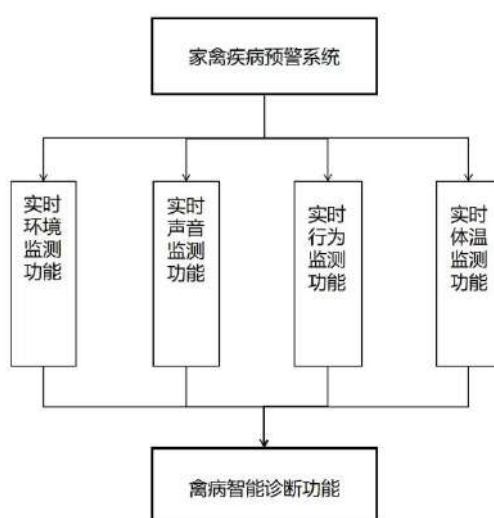


图 3-1 家禽疾病预警系统图

(一) 实时环境监测功能

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家禽养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智能化实时监控养殖环境, 确保家禽生活在一个适宜的环境。智能环境监控是利用传感技术对禽舍环境指标信息自动采集, 并利用无线网络传输技术对各路指标信息进行传输, 上传至服务器监控终端, 信息处理系统对信息数据进行储存和智能化分析处理, 实现电脑端远程监控和异常报警^[8]。Web 服务器还可负责响应和管理远程移动终端的访问, 可以实现智能手机用户的访问和监控。智能环境监控技术主要监控舍内温度、空气中氨气、粉尘、二氧化碳浓度、甲醛等环境指标。目前, 该项技术在集约化、规模化的养殖公司中广泛应用, 全天候实时监测养殖环境, 并通过环控设备合理地调控环境。但用于检测的某些参数的传感器如氨气、粉尘等传感器性能不稳定, 检测结果还不够准确,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优化。

(二) 实时声音监测功能

家禽是一个聚集的大群体, 本能性地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大多情况下这些声音都是正常的, 但在个体发病, 特别是家禽感染了呼吸系统疾病时, 会表现出咳嗽、打喷嚏、喘鸣、呼吸啰音等异常声音。实时声音监测功能是利用语音识别技术, 从繁杂的声音中监听和智能化辨别出异常声音, 并可予以定位和自动报警^[9]。

(三) 实时行为监测功能

家禽日常行为包括饮食、产蛋、性、啄异以及各种活动、姿势表现等, 以高清摄像头实时采集家禽行为信息, 通过行为信息提取到骨架结构, 进而提取特征, 通过无线网络把这些信息上传到服务器监控终端。利用图像识别技术, 智能化辨别家禽行为是否正常, 若识别为异常, 即可定位与自动报警处置。

(四) 实时体温监测功能

体温是家禽健康的重要特征指标之一, 个体体温升高预示着发病, 危害严重的禽流感、新城疫等多种传染病都会表现体温升高。体温检测技术是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 利用光学成像物镜接受被测家禽的红外辐射并将能量分布反映到红外探测器的光敏元件上, 从而生成红外热像图, 再通过图像处理技术实现非接触精准测温。将这些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监控终端, 服务器建立对鸡只正常体温和异常体判定标准的专家支持系统, 然后对大量的鸡只红外热成像图进行分析, 提出检测模型并进行验证、修正再验证, 直至对异常体温达到 90% 以上的识别率, 及时发现疑似病禽和死禽。

(五) 禽病智能诊断功能

禽病的诊断和治疗一直是国内养殖者非常重视的一环，因而禽病智能诊断系统开发得较早，系统较为成熟。本系统植入了禽病诊断专业知识数据库和专家经验数据库，根据实时监控产生的各种数据，如：红外热像图，行为信息，异常声音等，系统进行分值计算、自动处理，从而智能化地诊断疾病，并给出治疗建议。该系统方便用户进行自助诊断和在线查询^[10]，在生产实际中应用较多，特别是养殖专业户利用率较高，在疫情紧急的情况下通过简便的选项操作，初步诊断疾病，及时采取治疗措施。但系统的准确性随着禽病的复杂化还有待提高。

3.2 家禽疾病预警系统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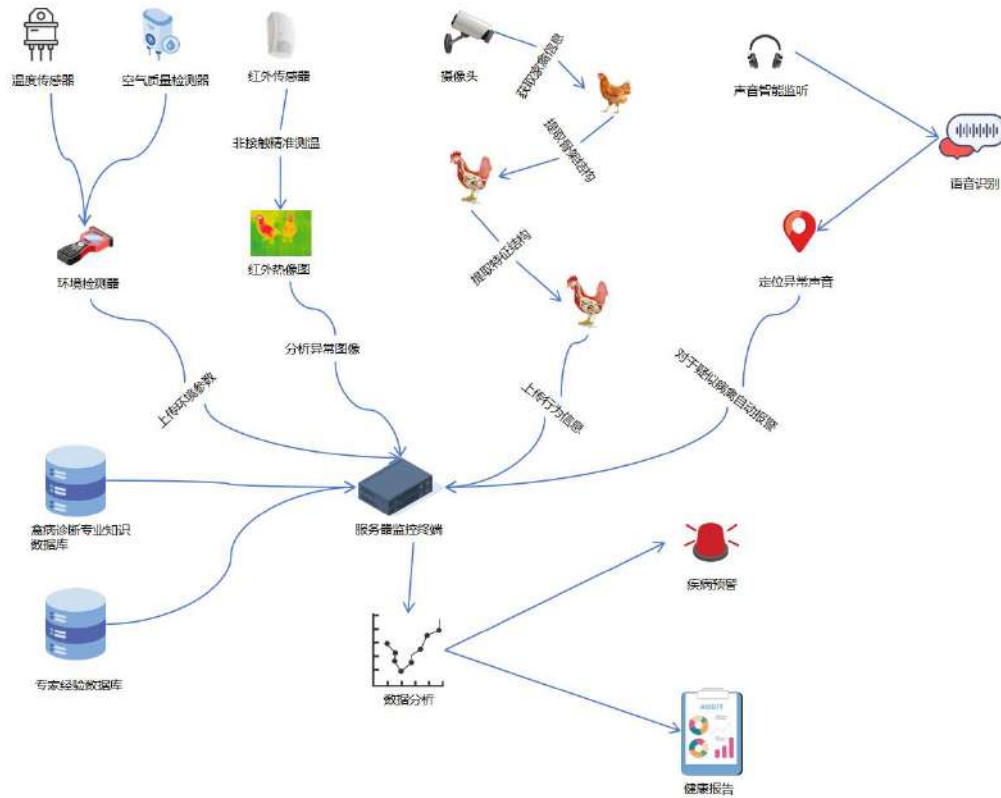


图 3-2 系统设计图

家禽疾病预警系统以实现家禽健康智能监测与疾病精准预警为目标，构建“多源感知-智能分析-决策应用”一体化架构。在感知层，利用温度传感器、空气质量检测器，经环境检测器整合上传；借助摄像头提取家禽行为特征、红外传感器生成热像图分析体表温度，结合声音智能监听设备采集音频并语音识别，多维度获取家禽信息。这些数据传输至服务器监控终端，与禽病诊断专业知识数据库、专家经验数据库关联。服务器通过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算法，一方面挖掘环境参数与家禽健康的关联规律，另一方面构建家禽正常行为和生理特征基线，识别异常模式。当监测到环境或家禽异常时，系统触发疾病预警，同时深度分析历史与实时数据，生成健康报告，为养殖人员调整通风、饲料等策略，以及疾病诊疗提供依据，形成从数据采集到健康管理的闭环，助力家禽养殖向精细化、智慧化转型，有效降低疾病损失，提升养殖效益。

4. 展望

当前的家禽疾病预警系统主要依赖环境参数、图像和声音等数据，未来将进一步纳入更多维度的信息。例如，引入可穿戴设备技术，为家禽配备轻便的生物传感器，实时监测其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生理指标，获取更精准的个体健康数据。同时，利用微生物检测技术，对养殖环境中的微生物菌群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了解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动态变化，为疾病预警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随着数据来源的日益丰富，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将成为关键。未来将深入研究更先进的融合技术，如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模态特征融合算法，能够更高效地整合不同类型的数据，挖掘数据间的潜在关联，提升对家禽疾病早期症状的捕捉能力。通过对环境数据、生理指标和行为特征的深度融合分析，实现对家禽健康状况的精准刻画和疾病的早期预警，降低误报和漏报率。

未来的家禽疾病预警系统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模块，而是与饲料供应系统、通风温控系统、粪便处理系统等养殖设施深度集成，形成一体化的智能养殖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根据疾病预警结果，自动调整养殖环境参数和养

殖操作。例如，当检测到家禽有呼吸道疾病风险时，自动优化通风系统，增加空气流通量，同时调整饲料配方，增强家禽免疫力，实现养殖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管理。

参考文献:

- [1] 孙加成.人工智能在家禽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发展趋势
- [2] 基于深度学习的蛋鸡行为检测方法研究与系统开发
- [3] 齐琳,包军,李剑虹.动物行为学研究在动物福利养殖中的应用[J].中国动物检疫,2009,26(9):68-69.
- [4] DAWKINS M S , CAIN R , ROBERTS J . Optical flow, flock behaviour and chicken welfare[J]. Animal Behaviour, 2012, 84(1).
- [5] CANGAR Ö, LEROY T, GUARINO M. Automatic real-time monitoring of locomotion and posture behaviour of pregnant cows prior to calving using online image analysis[J].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2008, 64(1): 53-60.
- [6] 沈明霞,刘龙申,闫丽. 畜禽养殖个体信息监测技术研究进展[J]. 农业机械学报, 2014, 45(10).
- [7] 闫丽,邵庆,席桂清. 家畜行为智能监测系统的研究进展 [J]. 家畜生态学报,2014,35(12):6-10.
- [8] 连京华,孙凯,李惠敏. 运用信息化提升家禽生产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J] . 中国家禽, 2014, 36 (7) : 60-61.
- [9] 连京华,祝伟,孙凯,殷若新,李惠敏.人工智能技术在家禽生产中的应用
- [10] 赵秀美,章明,周生,等. 家禽疾病远程诊断平台的构建 [J] . 中国家禽, 2017, 39 (24) : 53-55.

Research and Design of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Poultry Diseases

Ma Xu¹, Jian Rui¹ Yang Lulu¹ Li Guangbo^{1, 2*}

¹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235000, Huaibei, China

²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nhu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the poultry industry is facing pressure to transform its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l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vides an important path for achieving precise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poultry diseases. By analyzing the bottlenecks of traditional breeding model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detection technologies, it proposes a solution integrating deep learnin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system design revolves around multi-dimensional monitoring functions, including real-tim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dica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ammonia gas), real-time sound monitoring (identifying abnormal sounds like coughing), real-time behavior monitoring (analyzing behaviors such as eating and activity based on image recognition), real-time body temperature monitoring (using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diagnosis of poultry diseases (realizing automatic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a professional database).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adopts a "multi-source perception - intelligent analysis - decision application" model, which collects data through sensors, cameras and other devices, and realizes abnormal early warning and closed-loop management after processing by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is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al-time performance and accuracy of poultry health monitoring, reduce disease losse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eeding towards refinement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future, it can further integrate data from wearable devices and microbial detection technologies, optimize multi-modal data fusion algorithms, and deeply integrate with breeding facilities to build an integrate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platform.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in this paper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oultry industry.

Keywords: Poultry health ca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sease early warning

公共文化服务的合作供给路径探索 ——基于“村超”“苏超”的比较研究

肖欣语¹ 孙灵彬¹

(1.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针对传统单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局限性, 以“村超”“苏超”为例, 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高质量合作供给路径。采用扎根理论与机器学习, 基于媒体平台 18688 条文本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分析, 并结合扎根理论进行理论建构。“村超”代表了情感驱动、自下而上的共同体建构路径, 公众情感反馈更积极; “苏超”代表了行政与市场驱动、自上而下的区域联动路径, 通过整合理论框架研究, 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 合作供给; 村超; 苏超; 扎根理论; 文本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80

一、引言

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新需求。这一变革对以政府为单一供给主体、自上而下运行的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构成了新挑战。而传统模式因其内容同质化、运行效率有限等局限, 可能常导致服务与民众真实需求脱节。为此, 突破单一主体依赖, 构建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合作供给新模式, 已成为理论与实践界的普遍共识与改革方向。

然而, 合作供给的生成路径、运行逻辑、实现机制以及不同语境下的异质性问题仍缺乏系统性梳理与类型化比较。贵州“村超”与江苏“苏超”两个现象级文化实践为深入剖析合作供给的现实样态提供了分析样本。两者均以体育赛事为载体, 迅速超越赛事本身, 演化为集文化展演、社区凝聚与经济助推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事件, 但背后的资源动员方式与主体互动模式却呈现出鲜明差异, 映射出两种迥异的生成路径, 具有较高比较研究价值。

为了探析两种路径的内在机理, 本文首先运用机器学习对 18,688 条社交媒体文本数据进行分析, 以呈现两种现象在公众话语中的反响差异与主题分布。随后,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 建构能够解释两者路径差异的理论框架。本文旨在归纳并比较两种代表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路径: 1. 以“村超”为代表的“内生情感驱动的共同体建构路径”; 2. 以“苏超”为代表的“外生市场逻辑的区域联动路径”。通过辨析不同路径的动力机制、主体角色与社会效应, 深化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认知, 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地设计和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合作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从单一供给到合作供给: 理论转向与实践共识

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要求审视并超越传统的供给模式。这一进程根植于对政府单一供给局限性的深刻反思。传统上由政府作为唯一供给者的模式, 因其固有的科层化与单一性, 日益难以满足社会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 时常导致“供需失衡”或“供需错配”的困境^[1]。公共选择理论早已指出, 政府垄断易导致效率低下^[2], 而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相分离的理论^[3], 则为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这一理论共识推动了实践的转向, 即从单一行政供给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合作供给^[4]。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整合社会各方资源, 克服单一主体在信息、能力上的局限性, 从而更精准地回应公众需求^[5], 提升服务的“可及性”^[6]。这一转向在中国获得了政策与学界的广泛认同, 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供给体系被视为关键

作者简介: 肖欣语 (2004—), 女, 湖北襄阳人, 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网络与新媒体;

孙灵彬 (2003—), 女, 陕西安康人, 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所在^[7]。

（二）两条生成路径的理论分野

在合作供给的宏大框架下，实践中逐渐浮现出两条逻辑迥异的生成路径，它们分别拥有不同的理论根基，并直观地映射于“苏超”与“村超”的实践之中。

第一，“自上而下”的行政与市场驱动路径。该路径以行政逻辑为主导，其理论基石是新公共管理思潮^[8]与政策网络理论^[9]。NPM 倡导将市场导向的思维引入公共部门，推动政府角色从“划桨者”转变为“掌舵者”^{[8][10]}。在此理念下，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公私合作等方式构建供给市场，其运行机制则可通过政策网络理论得到解释，即政府凭借核心资源，在网络中扮演引导者与核心节点的角色^[9]。

这一路径在中国实践中多体现为“政府购买服务”^[11]和正式的“政社合作”项目^[12]。此类项目通常有明确的生命周期，政府在不同阶段扮演着谋划者、守护者和使能者等不同角色^[10]，并需进行系统的风险控制^[12]。“苏超”联赛便可视作此路径的典型样本，其由省级体育部门主导，联合市场力量进行专业化运营，以塑造区域品牌、促进体育消费为目标^[13]，鲜明地体现了政府“掌舵”与市场驱动的特征。然而，该路径也内含张力，即对效率的追求可能牺牲公平等公共价值，其工具性逻辑也未必能有效激发深层的情感认同^[8]。

第二，“自下而上”的社区与情感驱动路径。与行政驱动路径形成对照的，是一条植根于基层社会、以社群逻辑为核心的路径。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社会资本理论^[14]与多中心治理学说^[15]。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组织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够有效化解集体行动困境，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14]。丰厚的社会资本是激活基层活力、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资源^{[16][17]}。而多中心治理理论则为这种社群自组织提供了制度可行性，指出用户群体能够通过自组织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和可持续治理^[15]。

中国的“乡村春晚”^[18]、“乡村舞台”^[19]等实践，均是此路径的生动体现，它们依赖于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村民的自主参与。“村超”现象更是此路径的集中爆发，它并非源于顶层设计，而是发端于乡土社会深厚的足球热情与文化认同^[20]。其强大的社群凝聚力与组织动员力，正是本地社会资本厚积薄发的成果，完美诠释了社区如何能够不依赖外部强制，自发供给大型公共文化产品^[21]。

（三）合作治理与价值共创

为系统比较上述两条路径，需要整合性分析框架。合作治理理论^[22]为分析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模式提供了广泛而严谨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共同生产^[23]或称价值共创^[18]理论，则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透镜。该理论强调，公民不再是服务的被动消费者，而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合作生产者^[23]。其参与层次可从被动的“执行者”，到主动的“合作者”，乃至根本的“发起者”^[24]。运用此框架审视：在以“苏超”为代表的“自上而下”路径中，公众更多被定位为“文化消费者”或“共同执行者”；而在以“村超”为代表的“自下而上”路径中，公众则体现为文化“发起者”与核心“生产者”的角色，实现了从服务提升到主体建构，再到乡村社会重构的深度价值共创^[18]。这揭示了两种路径在权力关系、价值导向和公众角色上的根本差异。

综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已取得丰富成果。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其一，案例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因素或路径的组合效应，如多元参与和供需对接机制等^[24]，但缺乏对不同生成路径的系统性比较。其二，一个核心的现实张力尚未得到充分回应：即在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顶层设计下^[15]，如何与基层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社区自组织”实现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21]。

“村超”与“苏超”的并存，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比较样本。尽管已有研究对两者进行了解读，但尚无研究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运用严谨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剖析。本文旨在填补此项空白，以期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从单一的“行政主导”范式，向更加多元、包容、高效的“合作治理”范式转型。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研究的开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机器学习对大规模文本数据进行探索，其结果则为第二阶段的理论建构提供经验基础与分析起点。

第一阶段：量化文本探索。此阶段旨在对围绕“村超”与“苏超”产生的大规模社交媒体数据进行系统性内容挖掘。为量化两种现象引发的公众情感差异，本文采用基于 ERNIE 预训练模型的中文情感分析工具。该工具能够对每条文本进行分析，输出“积极”或“消极”的分类判断，并给出一个介于[0, 1]之间的连续情感倾向得分。本文将得分 > 0.65 的文本界定为积极情感，< 0.35 的界定为消极情感，中间为中性情感。此阈值设定参考了相关研究的普遍做法^[25]，并通过小规模人工校验确保了其在本文语料上的适用性。为探知公众讨论的核心议题，本文运用

(LDA) 主题模型, 通过计算主题一致性分数来确定最优主题数量, 确保模型可解释性与稳健性。为保证诠释的客观性, 每个主题的命名严格依据其下属的高频特征词进行归纳, 并由两位研究者交叉检验达成共识。为验证“村超”与“苏超”话语体系的独立性, 研究构建了一个逻辑回归文本分类器, 检验模型能否仅凭文本内容准确区分其讨论对象, 从而为两个案例的差异性提供证据。

第二阶段: 质性理论建构。此阶段旨在超越量化结果的表象, 向深层机制迈进, 其方法论基础为扎根理论, 并严格遵循程序化编码范式。本文采用计算扎根理论的思路, 即把第一阶段量化分析所识别出的高频词、情感倾向与核心主题, 作为第二阶段质性编码的初始“素材池”, 确保理论的生发始终植根于数据驱动的经验观察。整个编码过程严谨地划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开放性编码, 将文本数据进行解构, 赋予概念性的标签并聚合成初始范畴。其次是主轴性编码, 基于“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互动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 探寻范畴间的逻辑关联。最后通过选择性编码, 提炼核心范畴, 并整合所有发现, 直至理论饱和。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微博、抖音、小红书三大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围绕“村超”、“贵州村超”、“苏超”、“江苏足球联赛”等关键词, 收集了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的相关帖子、评论和标题。原始数据经过清洗后最终获得两个数据集: “村超” (9,662 条) 与“苏超” (9,026 条)。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情感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量化数据客观呈现“村超”与“苏超”在社会舆论场域中所引发的反响差异, 并以此检验将两个现象作为不同分析单元进行比较研究的有效性。为此, 本文从情感极性与话语结构切入, 运用情感分析与机器学习分类模型, 为后续的机制剖析提供实证基础。

情感是公众对社会事件最直接的态度映射, 其整体倾向性与强度, 可有效衡量一个公共文化事件的社会共鸣水平。对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分析后, 结果揭示出两者在公众情感反馈上存在显著差异: “村超”相关文本的平均情感得分为 0.6831, 显著高于“苏超”的 0.6122。

从情感分布的结构上看, “村超”的积极评论比例为 63.89%, 消极评论比例为 23.89%; 相比之下, “苏超”的积极评论比例为 55.35%, 消极评论比例则达到了 31.23%。这表明, “村超”在公众中不仅唤起了更为普遍的正面情绪, 也更有效地抑制了负面情绪的产生。这种情感反馈温差表明, 两者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动员逻辑可能存在本质不同, 或可推断“村超”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公众更深层次的情感与价值认同。

表 1 情感分析结果对比

指标	“村超”	“苏超”	差值
平均情感得分	0.6831	0.6122	+0.0709
积极评论比例 (>0.6)	63.89%	55.35%	+8.54%
中性评论比例 (0.4-0.6)	12.22%	13.42%	-1.20%
消极评论比例 (<0.4)	23.89%	31.23%	-7.34%

在情感分析揭示了公众对两个事件在“态度与认知”层面存在差异之后, 本文进一步探究话语“内容”异质性, 以此回答“村超”与“苏超”是否已在公众讨论中演化为两个在语言风格、议题焦点与叙事框架上均被区分为独立话语体系。为此, 本文构建了一个逻辑回归文本分类模型。

该模型的任务是仅根据一段文本的内在特征, 判断其讨论的对象是“村超”还是“苏超”。模型的测试结果总体分类准确率达到 85.42%。这一较高的准确率表明, 两个事件在公众话语中已经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定且独特的语言范式, 使得算法能够依据文本特征进行有效区分。在模型的预测中, 交叉误判的比例相对较低, 意味着, 公众在讨论“村超”时所使用的核心词汇、概念关联和叙事逻辑, 与讨论“苏超”时存在较明显的算法捕捉差异。这说明, “村超”与“苏超”并非同一性质事件在不同地域的简单复制或变体, 而是在社会互动中独立的文化现象。话语体系上的异质性为本文将二者作为两种不同合作供给路径进行比较分析, 提供了必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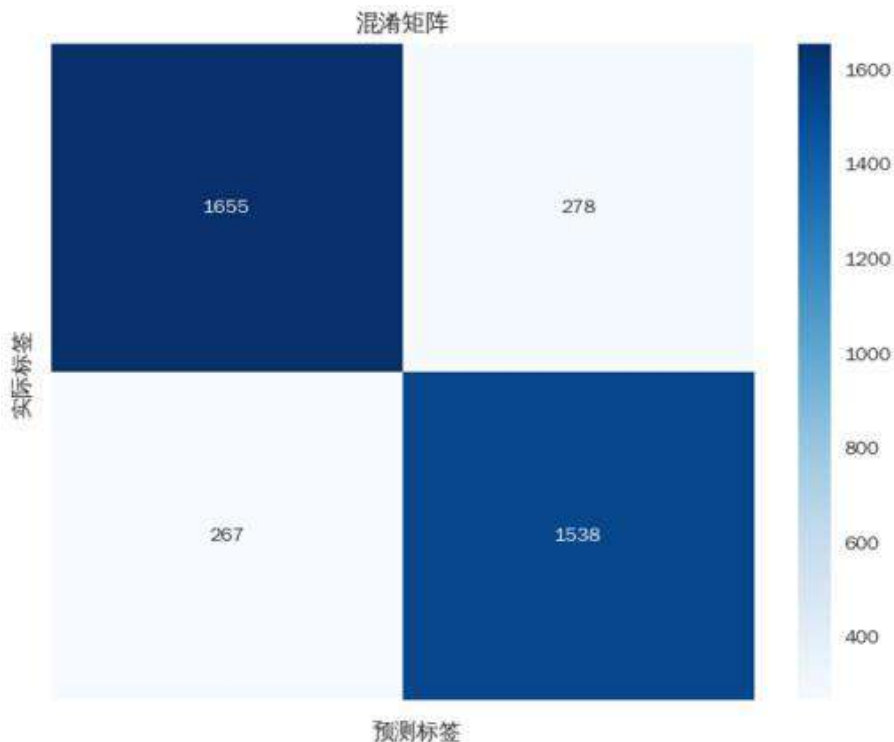


图1 文本分类混淆矩阵

(二) 主题建模

在确证“村超”与“苏超”的话语体系存在显著差异后，本文进一步探究公众对于“村超”和“苏超”的讨论内容，分析两种文化现象的内核差异。本文采用 LDA 主题建模探寻主题结构，为确保生成主题的可解释性与模型的稳健性，通过计算主题一致性分数来确定最优主题数量，研究发现对于“村超”与“苏超”两个数据集，当主题数设定为 8 时，模型均能达到最高的一致性分数，故后续分析均基于 8 个主题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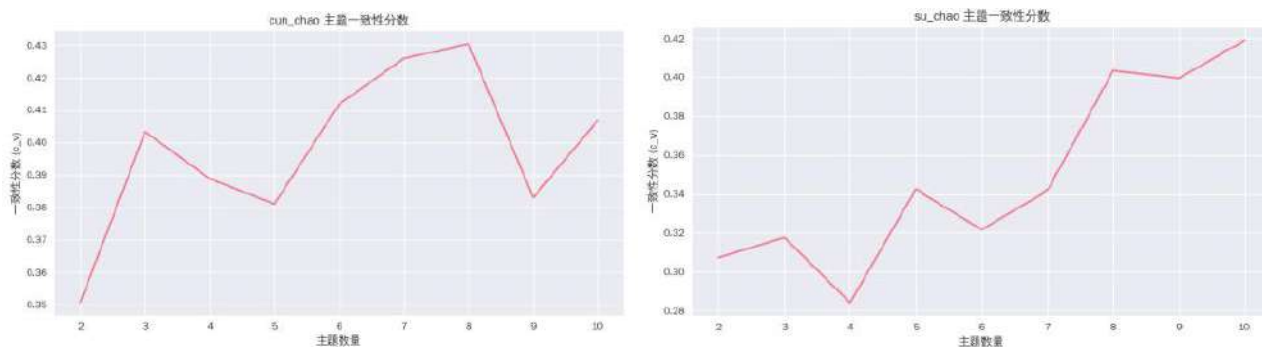


图2 主体一致性评分

对“村超”话语内容的分析结果表明，其核心议题高度围绕地方情感、草根认同与集体主义叙事，构建了以价值和情感为核心的意义世界。其中一个突出的元主题是“社区凝聚与地方认同”，在相关讨论中，“榕江”与“贵州”等地名作为高频词反复出现，并与“加油”、“家乡”等动员性词汇紧密相连，表明该事件被公众深度嵌入到特定的地理空间与文化情境中，成为激发地方自豪感、凝聚社区共识的强大载体。“纯粹足球与草根精神”构成了另一核心主题。公众话语频繁地将“村超”定位为对足球运动本真精神的回归，强调其“热爱”、“纯粹”的草根底色，并时常将其与备受争议的专业化足球体系（如“国足”）进行对比，从而赋予其超越胜负的象征意义。此外，“家国情怀与灾害关怀”这一主题的出现也值得深思。公众的讨论并未局限于赛事本身，而是与当时发生的“洪水”灾害产生了强烈的共情联动，话语中充满了“致敬”、“子弟兵”等情感词汇，使一场地方性体育赛事升华为承载民族情感的宏大叙事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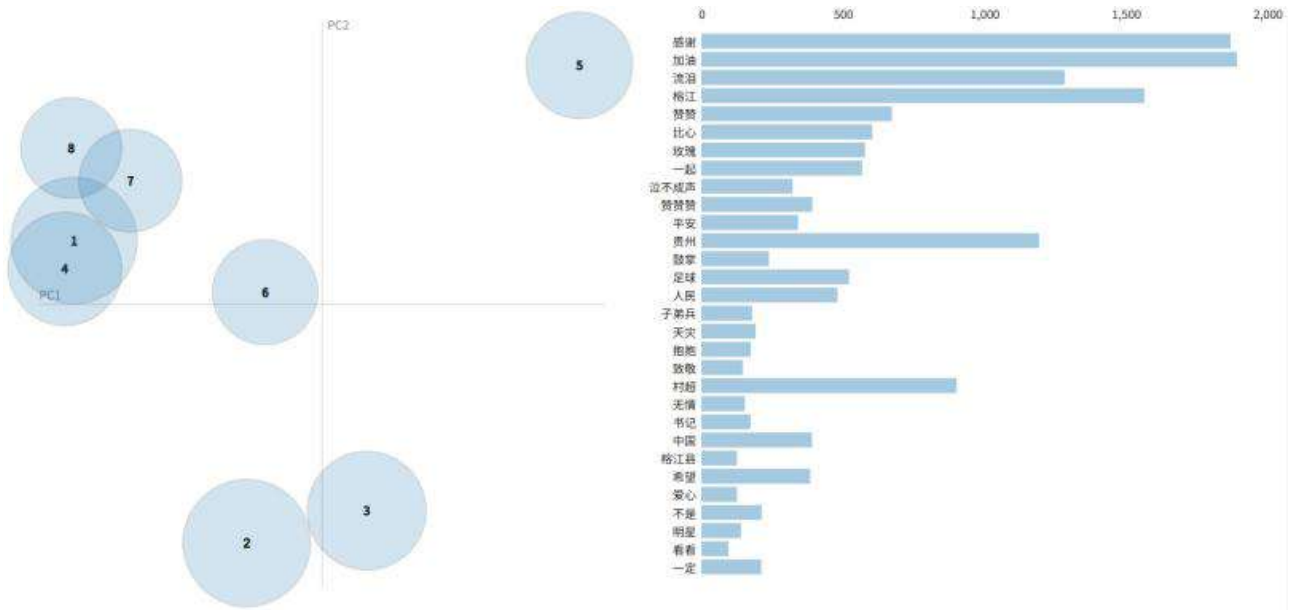


图3 “村超”话题模型可视化结果截图

与“村超”相比，“苏超”的公众讨论呈现显著异质性。其核心议题更多地围绕城市竞争、市场化运作与竞技体育本身展开，整体上体现出更强的外生性与组织化特征。关于“苏超”的讨论中，尤为突出的是基于江苏省内城市单元的地域竞争。多个主题下的高频关键词均被“盐城”、“宿迁”、“南京”、“徐州”等城市名称所主导，并与“十三太保”这一网络流行语紧密关联。这表明该事件的动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城市为单位的、具有一定对抗性的地域认同之上。公众讨论的另一大焦点则集中于赛事的组织与文旅营销层面。在相关主题中，“文旅”、“江苏省”等词汇的频繁出现，暗示了其背后由行政力量主导、以促进文旅融合为目标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这与“村超”的自发性叙事形成了鲜明对照。相较于“村超”对精神价值的侧重，“苏超”的讨论则更关注竞技本身与球迷文化。诸如“门将”、“守门员”等具体的赛事技术细节被更多地提及，表明公众及球迷群体对于比赛竞技水平和结果本身具有更高关注度。“苏超”的议题共同描绘出一个由行政规划与市场逻辑驱动、以地域竞争为主要动员方式的公共文化事件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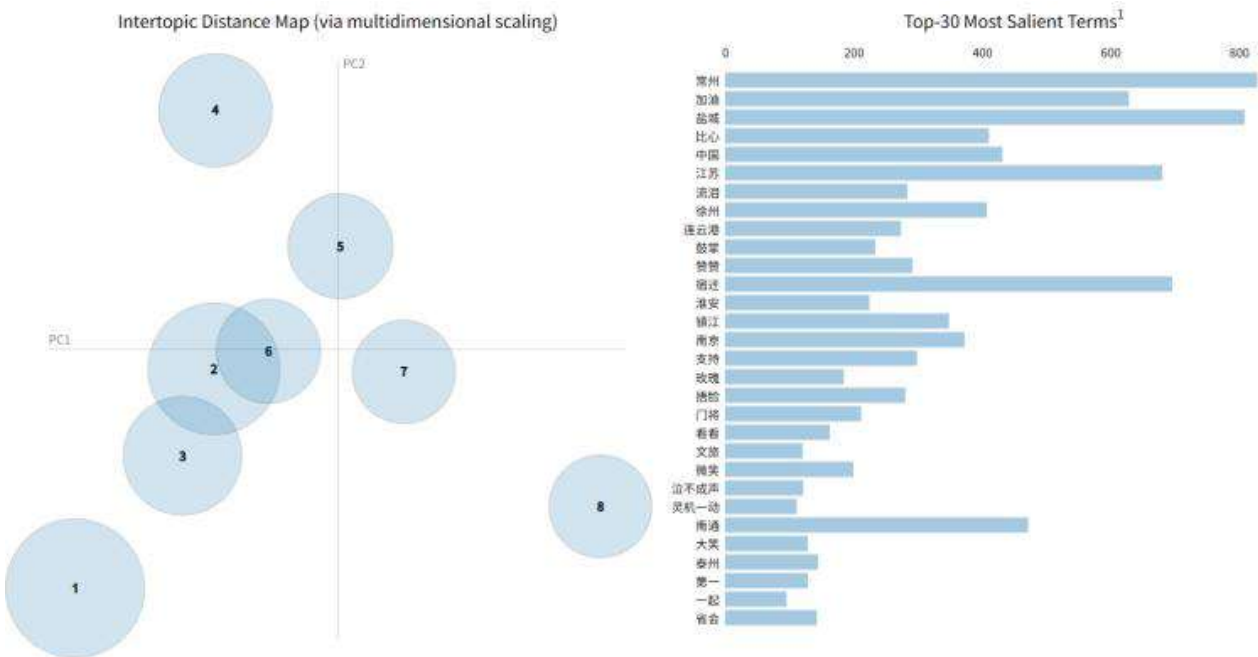


图4 “苏超”话题模型可视化结果截图

(三) 主题建构

前文客观呈现了“村超”与“苏超”在公众话语中的宏观图景，本文继而进入理论建构环节，通过扎根理论构建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本文以此前的情感分析和主题建模结果作为“初始素材”，在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的基础上，通过主轴编码在离散范围间建立逻辑关联。研究遵循斯特劳斯与科尔宾^[26]的编码范式，建构出两条分析路径：一条路径再现了“村超”这一全民文化盛宴的内生性演化过程，而另一条则描绘了“苏超”这项规范化城市联赛的外生性建构过程。

表2 主题建构

编码范式	“村超”故事线 (内生情感驱动)	“苏超”故事线 (外生市场逻辑)
现象	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	规范化的城市联赛
因果条件	长期被压抑的足球热情与深厚的乡土文化认同	提升城市活力与促进文旅融合由政府内在需求
脉络	贵州榕江经济欠发达但民风淳朴、社区关系紧密的社会环境	江苏省发达的经济基础与强烈的“散装江苏”式地域文化
中介条件	社交媒体的指数级传播与“洪水”等偶然事件激发的全国性同情	成熟的商业赞助体系与专业化的媒体宣传网络
互动策略	民众自发组织、政府顺势而为、媒体推波助澜的多方良性互动	省市体育局主导设计、市场化公司专业运营、各市球迷地域性响应
结果	形成了强大的社区凝聚力，提升了地方形象，并创造了现象级的文化品牌与“赛事经济”闭环	成功打造了一项区域性体育IP，促进了市间的品牌营销与体育消费

在主轴编码基础上，本文进入选择编码阶段，提炼核心范畴并形成整合性模型。经过系统归纳，本文确立的核心范畴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合作供给路径”，围绕这一核心，前述两条源于经验数据的“故事线”被进一步抽象形成了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理想类型。

第一种路径被概括为“内生情感驱动的共同体建构路径”，以“村超”为典型代表。其核心驱动力源自社区内部深植的文化认同与集体情感。该路径通过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来激发共同体意识，自下而上地吸引和整合资源。在此过程中，公众并非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是扮演着文化合作生产者与意义创造者的关键角色。

第二种路径则被概括为“外生市场逻辑的区域联动路径”，以“苏超”为代表。其核心驱动力来自外部的行政规划与市场激励。该路径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自上而下地进行资源配置与区域联动，公众则更多地是以文化消费者和城市支持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两种路径在动力来源、运行逻辑、公众角色和核心优势上均存在本质区别，共同构成了关于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的双路径比较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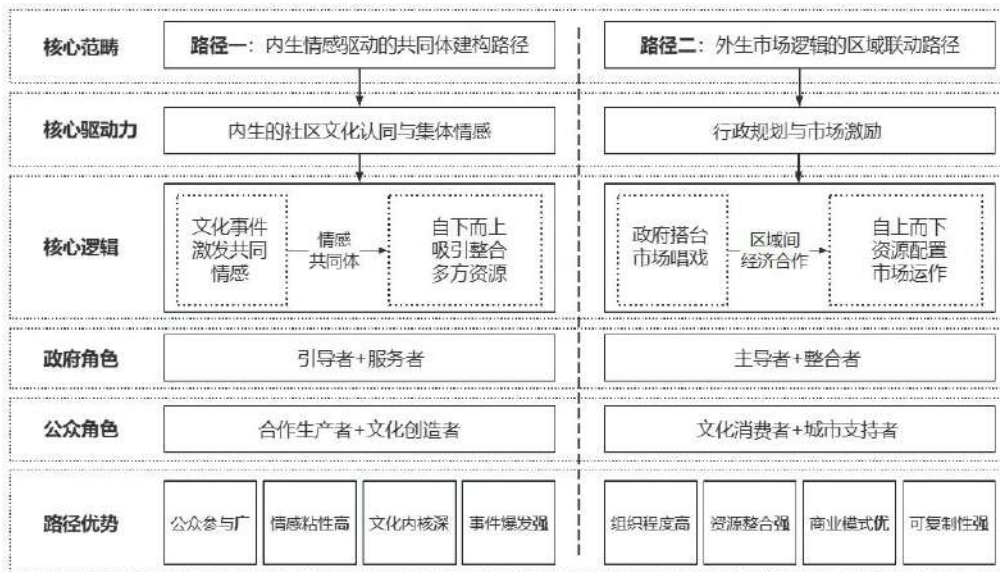


图5 主轴建模结果

(四) 整合讨论

研究发现,“村超”之所以能在公众中激发出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其原因或可归结于其内生情感驱动的共同体建构路径。该路径的起点是乡土社会中早已存在的文化认同与集体情感,赛事本身作为一种催化剂,激活并放大了潜藏社会资本。公众的参与动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对体育竞技本身的兴趣,而被视为一种表达社区归属感、捍卫家乡荣誉、重申传统文化价值的集体行动。因此,其所引发的情感,可被理解为一种超越赛事本身的价值共鸣。

与之相对,“苏超”所遵循的外生市场逻辑的区域联动路径,其动员机制更多地建立在由行政规划与市场激励所强化的地域认同和利益关联之上。公众的情感投入虽然也可能十分热烈,但其根源更多地指向对所属城市的直接支持、对区域竞争格局的关切以及对文旅消费体验的期待。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基于利益或地域认同的反应,其情感共鸣的性质与广度,可能与前述的价值共鸣有所区别。

为进一步确保理论饱和,本文进一步对主题模型与情感分析的结果进行了交叉验证。通过将每个主题下的文本平均情感得分进行计算与比较,两种路径在情感动员逻辑上的异质性得以清晰地数据化。结果显示,“村超”公众话语中情感评价最高的主题,均与超越赛事本身的宏大价值叙事紧密相关,如“感谢/平安/中国”和“玫瑰/爱心/希望”等主题,它们触及了公众对于家国情怀、人间温情与未来期盼等普适性价值的认同。“苏超”情感得分最高的主题则几乎完全被具体的地域标签所占据,如“盐城/滨海/观察”、“常州/南京/支持”等。这种鲜明的对比,为本文的核心论断——即“村超”的成功更侧重于价值共鸣,而“苏超”的动员更侧重于利益或地域认同——提供了有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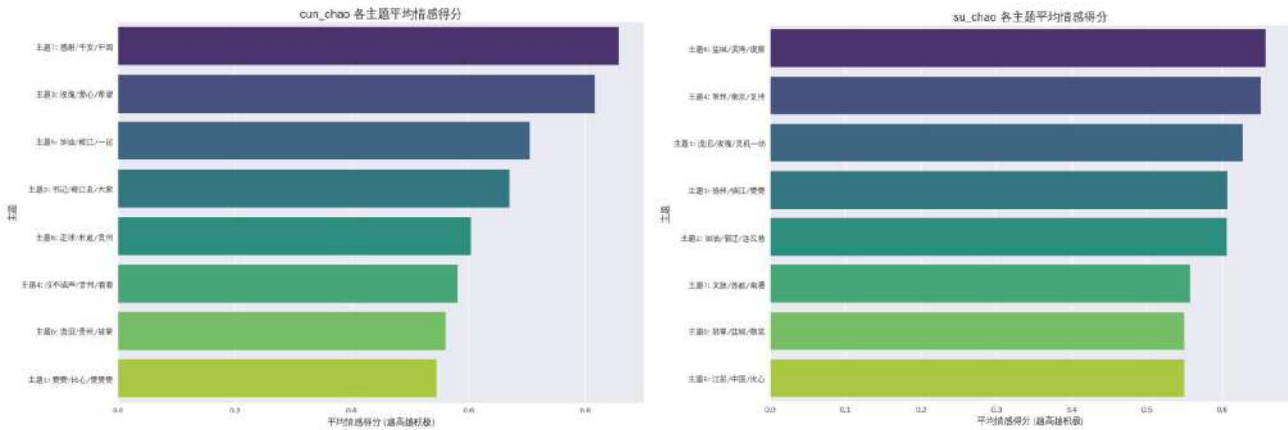


图6 “村超”与“苏超”各主题平均情感得分对比图

本文的发现对于深化既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合作治理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虽强调多元主体协同的重要性,但其分析往往更侧重于制度安排、资源交换关系与契约化治理。本文则通过对“村超”路径的深入剖析,有力地证明了非正式要素在公共价值共创中的核心地位。研究发现,“集体情感”与“文化认同”不仅是社会资本的构成部分,更能在特定情境下转化为一种强大的非正式驱动资源,有效降低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激发基于信任的内聚力,其动员效率和情感深度是正式制度和契约关系难以企及的。其为社会资本理论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依据,也说明在未来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理论的研究中,应给予情感、认同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同等的重视。

以“村超”为代表的内生路径,在其发展的后期,为谋求可持续性,不可避免地需要与政府的规范化引导和市场的商业化逻辑进行审慎的对接,这其中蕴含着“内生性”被“外生性”吸纳或改造的风险与机遇。反之,以“苏超”为代表的外生路径,若想提升其社会粘性与公共价值,也必须有意识地培育内生的社群文化与情感联结,避免沦为纯粹的商业或行政展演。因此,两种路径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构成了未来值得持续追踪的重要问题。

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应从单一政策工具应用,转向情境化的治理策略。政府的角色定位与干预方式应具备高度的适应性与差异性。在社会资本丰厚、内生动力强的地区,政府的适宜角色是赋能者与保障者。其政策重点应在于提供基础性的公共产品,如法律保障、设施支持,并致力于维护和激发基层社会的自主性与创造力,避免不当干预引致的制度性挤出效应。反之,在社群联结较弱、市场机制较成熟的地区,政府则可通过主动搭建合作平台、注入初始资源来启动供给进程。但此类干预的长期目标,应着眼于培育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与公民的有序参与,逐步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引导。经由这种依据地方条件动态调整的治理模式,方可更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从传统的行政主导范式,向更加多元、包容、高效的共识治理范式转型。

五、结论

“村超”与“苏超”并非同一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代表了当前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探索中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本文将它们分别提炼为“内生情感驱动的共同体建构路径”与“外生市场逻辑的区域联动路径”。这两种路径在核心驱动力、运行逻辑、主体角色分配及社会效应上均存在本质差异。

“村超”路径的核心机制在于，以深植于乡土社会的文化认同与集体情感为原始驱动力，通过体育赛事这一载体，自下而上地激活了社区的内生动力与社会资本。在此路径中，公众不仅仅是服务的被动接受者，更是文化内容的合作生产者与意义创造者，政府则更多扮演了顺势而为的服务者与保障者角色。与之相对，“苏超”路径的生成逻辑则以行政力量的顶层设计和市场资本的激励为双引擎，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自上而下地进行资源整合与区域联动。该路径有效地利用了区域内的城市竞争关系与成熟的商业网络，公众在此过程中则更多以文化消费者和城市支持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两种路径在社会反响上亦存在显著差异。公众对“村超”模式的情感反馈远比“苏超”更为积极热烈。这也反映出“村超”的成功更依赖于触及及广泛社会价值认同的价值共鸣，而“苏超”的动员则更多地建立在以城市为单位的利益或地域认同之上。

本文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构建了包含两种类型的分类框架。这一双路径模型不仅丰富和细化了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既有理论，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同时，研究突显了“集体情感”作为一种关键的、非正式的驱动资源，在特定情境下对于降低集体行动成本、形成强大社会凝聚力的核心作用，为社会资本理论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优化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研究表明了因地制宜、审慎选择合作供给路径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与文化机构应杜绝“一刀切”的模式照搬。对于拥有深厚乡土文化、社区认同感强的地区，可更多地借鉴“村超”模式；而对于经济发达、市场体系成熟的地区，“苏超”模式所代表的策略可能更具资源整合效率。这两种模式也揭示了价值并重、推动情感价值与市场价值良性互动的必要性。

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社交媒体平台，其用户群体的代表性可能存在偏差。同时，作为一个基于特定时间窗口的横截面分析，本文对“村超”与“苏超”的长期影响与可持续性的探讨亦有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从两方面进行深化。其一，采用多方法验证，引入民族志、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多源数据的交叉验证。其二，进行纵贯性追踪，对两种模式进行长时段的追踪研究，探究其在发展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路径依赖、路径转化甚至路径融合的现象，从而更动态地揭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模式的演化规律。

参考文献:

- [1] 陈立元, 孙守强, 孙守义.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协同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J]. 图书与情报, 2024(1): 112-120.
- [2] BUCHANAN J M, TULLOCK G.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 [3]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贺芒, 邹芳, 范晓洁. “三圈理论”模型下公共文化服务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12): 88-98.
- [5] 金栋昌, 王宇富, 徐梦真.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OL]. 图书馆论坛: 1-13.
- [6] 钱兰岚, 王建涛. 服务“可及性”视角下的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路径研究[J]. 图书馆杂志, 2022, 41(03): 41-47.
- [7] 孙捷.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1): 123-128.
- [8] HOOD C.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1, 69(1): 3-19.
- [9] RHODES R A W.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0] 李杨, 陆和建. 政社合作供给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与推进路径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24,(05): 96-105.
- [11] 赵晓雷. 政府购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价值向度、现实样态与实践路径[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4,(11): 83-90.
- [12] 李祝启, 陆和建.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社合作供给和运营全流程风险控制研究——基于 PDCA 方法的分析[J]. 图书馆建设, 2022,(06): 137-147.

- [13] 王家宏. 体育赛事促进体育消费的效应评估与路径优化研究——以“苏超”联赛为例[J]. 体育科学, 2025, 45(1): 10-22.
- [14]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 [15] OSTROM E.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3): 641-672.
- [16] 杨志玲, 赵阳.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因素、路径与发展策略[J]. 河南社会科学, 2022, 30(12): 104-110.
- [17] 杨嫒, 黄雅奥, 王家合.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协同治理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 H 省 X 县的实证分析[J]. 图书馆, 2021,(06): 35-43.
- [18] 袁硕. 价值共创: 合作生产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春晚的案例研究[J]. 图书馆建设.
- [19] 李少惠, 崔吉磊. 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互动机理研究——以 Z 市“乡村舞台”建设为例[J]. 图书与情报, 2021,(02): 99-107.
- [20] 王宁. “村超”的文化意蕴与实践逻辑[J]. 文化纵横, 2023(4): 128-135.
- [21] 耿达, 卫雅琪.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乡村文化自组织双向嵌入研究[J/OL]. 图书馆建设: 1-15.
- [22]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 18(4): 543-571.
- [23] 淳于森冷, 孟天广. 共同生产: 何以成为可能?——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9, 12(3): 83-107.
- [24] 李少惠, 邢磊.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 15 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 2020,(21): 13-22+82.
- [25] 李冠, 孙灵芝, 何明祥. 生成式人工智能话题下公众认知的“关注度—满意度”量化分析——以微博平台为例[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4, 20(10): 9-21.
- [26]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Explo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Supply Path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Village Super League" and "Su Super League"

Xiao Xinyu ¹, Sun Lingbin ¹

¹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singl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model, taking "Village Super League" and "Su Super League" as examples, we explore a high-quality cooperative supply path involving multiple subjects. Using grounded theory and 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18688 text data of media platform,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grounded theory. "Village Super League" represents an emotion-driven, bottom-up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ath, and the public's emotional feedback is more positive; "Su Chao" represents the top-down regional linkage path driven by administration and market. By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search,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ooperative supply; Murachao; Su Chao; Grounded theory; Text analysis

政府引导基金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理论与实践探究

黎银霞¹

(1. 广州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63)

摘要: 本研究结合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 探讨政府引导基金 (GGFs) 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作为政策驱动的金融工具, 政府引导基金旨在将社会资本导向战略性产业。研究发现, 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资源配置、信号传递和公司治理机制影响劳动投资效率。对 A 企业的案例研究表明, 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吸引人才和优化战略, 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润。然而, 研究也发现了投资决策不优、监管不足和宏观经济波动等挑战。最后, 研究提出了政策建议, 以增强政府引导基金在提升劳动投资效率方面的有效性。

关键词: 政府引导基金; 劳动投资效率; 资源配置; 公司治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3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 政府引导基金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关键工具。截至 2024 年, 中国已设立 2178 只政府引导基金, 总目标规模约 12.84 万亿元, 彰显其在塑造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清科研究中心, 2024)。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向重点领域, 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 (王力等, 2024)。

劳动投资效率作为衡量人力资源配置的核心指标, 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率和可持续发展 (李小荣、刘行, 2019)。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 企业亟需优化劳动投资效率以维持竞争力。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政府引导基金经济效应和劳动投资影响因素的文献, 实践中为政策制定者完善引导基金机制、企业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提供参考。

1.2 研究目标与方法

研究旨在探索政府引导基金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 具体包括: 1) 分析理论作用机制; 2) 通过案例验证影响效果; 3) 提出政策建议。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及定性与定量结合, 以确保结论的科学性。

二、文献综述

2.1 政府引导基金研究

政府引导基金是政府设立的政策性基金, 通过市场化运作撬动社会资本 (赵海龙, 2011)。主要运作模式包括参股、融资担保和跟进投资 (孟祥瑜等, 2024)。尽管规模快速扩张, 但存在投资效率低、债务风险上升和市场化不足等挑战 (王力等, 2024)。

2.2 劳动投资效率研究

劳动投资效率衡量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常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和随机前沿分析 (SFA) 等方法评估 (李小荣、刘行, 2019)。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管理 (培训、激励) 和外部环境 (市场竞争、政策)。

2.3 政府引导基金与劳动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 政府引导基金可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创新和改善经营绩效间接影响劳动投资效率 (孟祥瑜等, 2024)。但在具体作用机制和严谨验证方面存在空白, 需进一步研究。

三、政府引导基金与劳动投资效率的理论分析

3.1 政府引导基金概述

政府引导基金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GGFs) 是以财政资金为基础、市场化运作为手段的政策性金融工具, 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政策导向撬动社会资本流向战略新兴产业 (赵海龙, 2011)。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创新模式, GGFs 的设立源于市场失灵与产业政策需求的双重驱动, 旨在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早期融资不足、创新风险过高的市场缺陷 (Aghion & Howitt, 1992)。国际经验显示, 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 (SBIC)、以色列 YOZMA 基金均通过政府资金引导, 成功培育了高新技术产业生态 (Kortum & Lerner, 2000)。

GGFs 的三大核心特征使其区别于传统产业政策工具。政策导向性体现为基金投向严格遵循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 如中国“十四五”规划期间, 超过 60% 的 GGFs 资金流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清科研究中心, 2024)。资本撬动性依赖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 典型运作模式下, 政府出资 1 元可吸引 5-10 元社会资本 (王力等, 2024), 形成“财政资金 - 社会资本 - 产业发展”的传导机制。风险分担性通过结构化设计实现, 政府通常承担优先级损失或设置收益补偿机制, 降低社会资本的投资顾虑 (孟祥瑜等, 2024)。

在运作模式层面, 参股模式通过设立子基金实现间接投资, 政府作为有限合伙人不参与日常运营, 但保留重大决策否决权 (如投资领域限制、退出机制设定), 该模式在我国 GGFs 中应用占比达 78% (清科研究中心, 2024)。融资担保模式通过信用增级帮助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 例如深圳天使母基金的“20% 风险补偿”机制, 显著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跟进投资模式则在市场化投资机构决策后按比例跟投, 旨在增强市场信心, 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 (孟祥瑜等, 2024)。这些模式的协同运用, 使 GGFs 既能实现政策目标, 又能维持市场机制的主导地位。

3.2 劳动投资效率概述

劳动投资效率作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维度, 反映了劳动力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 (李小荣、刘行, 2019)。经济学理论中, 效率边界的概念强调企业通过优化要素组合实现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 (Farrell, 1957)。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 劳动投资不仅包括雇佣数量, 更涵盖技能培训、激励机制设计等质量维度 (Becker, 1964), 其有效性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TFP)。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和随机前沿分析 (SFA) 进行效率测度。DEA 通过构建非参数生产前沿面, 可同时处理多投入 - 多产出指标, 适合横向比较不同企业的相对效率; SFA 则基于随机生产函数, 能够分离技术效率与随机误差项, 更适用于纵向趋势分析 (Coelli et al., 2005)。在指标选取上, 劳动生产率 (产出 / 劳动投入)、人均利润、单位工资产出等财务指标被广泛应用, 而近年来学者开始纳入员工培训投入、技能结构等非财务指标, 以更全面反映劳动投资质量 (Bloom & Van Reenen, 2007)。

从宏观经济视角看, 劳动投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OECD 数据显示, 劳动生产率每提升 1%, GDP 增长率可提高 0.3-0.5 个百分点 (OECD, 2023)。微观层面, 高效的劳动投资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升创新能力, 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 (Lazear, 2000)。例如, 华为公司年均投入超百亿元的员工培训体系, 使其研发人员专利产出效率较行业平均水平高出 40%, 印证了劳动投资质量对企业绩效的显著影响。

3.3 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劳动投资效率的理论机制

资源配置机制: GGFs 通过产业政策信号重塑要素流动格局。在新兴产业发展初期, 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资本存在“逐利性”偏好, 而 GGFs 的定向投资能够降低产业进入风险, 吸引人力资本向战略性领域集聚 (Arrow, 1962)。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中国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宁德时代、蔚来汽车等企业, 带动电池研发、智能驾驶等领域人才流入, 使行业劳动生产率在 2015-2022 年间年均增长 18% (王力等, 2024)。这种要素集聚效应不仅体现在数量层面, 更表现为质量提升——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后, 通过高薪聘请海外专家、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等方式优化人才结构。

信号传递机制: GGFs 的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市场认证效应 (Stigler, 1961)。政府背书降低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向资本市场传递“优质项目”信号, 吸引风险投资、银行贷款等后续融资。同时, 这种认证效应延伸至人才市场, 使企业在招聘中获得“政策光环”。研究表明, 获得 GGFs 投资的企业, 其人才吸引力指数平均提升 35%, 更易招募到高技能人才 (Lee et al., 2018)。例如, 商汤科技在获得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后, 海外顶尖 AI 人才入职率提高 50%, 研发效率显著提升。

公司治理机制: 作为特殊股东, GGFs 通过治理结构优化影响劳动投资决策。政府通常要求被投资企业建立 ESG 评价体系, 将员工权益保护、技能培训等纳入考核指标 (孟祥瑜等, 2024)。这种外部压力促使企业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如建立股权激励计划、优化薪酬结构。实证研究显示, 引入 GGFs 的企业, 其员工培训投

入强度较未受资企业高出 2.3 倍 (Li et al., 2022)。此外, 政府代表参与董事会决策, 能够纠正管理层短视行为, 避免过度压缩劳动投资以追求短期利润。

四、政府引导基金对劳动投资效率影响的问题分析

4.1 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对劳动投资的潜在影响

GGFs 的投资决策偏差可能导致劳动资源错配。产业政策的顺周期性使基金倾向于追逐短期热点, 如 2016 - 2018 年区块链概念热潮中, 多地 GGFs 盲目跟风投资, 造成行业过度扩张。据工信部统计, 该时期区块链初创企业平均员工冗余率达 32%, 后续行业调整导致大量裁员, 劳动资源浪费严重 (王力等, 2024)。这种“潮涌现象”违背要素禀赋结构, 削弱了劳动投资效率 (Lin, 2009)。

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企业选择的非市场化倾向。部分 GGFs 为扶持本地企业, 降低投资标准, 导致资金流向低效主体。审计署 2023 年专项审计显示, 某省 GGFs 投资的 32 家本地企业中, 17 家未能实现预期产值目标, 劳动生产率低于行业均值 28%。这些企业获得资金后, 因缺乏市场竞争力, 无法有效利用资金提升劳动效率, 甚至将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支出, 形成“政策依赖”陷阱。

4.2 政府引导基金监管与激励机制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作用

监管缺位引发的道德风险严重影响基金效能。GGFs 的政策性目标与社会资本的逐利性存在内在冲突, 若缺乏有效监督, 企业可能将资金挪作他用。银保监会 2022 年专项检查发现, 某新能源项目企业将 GGFs 资金违规投入房地产开发, 导致技术研发停滞, 劳动生产率持续下滑 (李湛等, 2012)。此外, 劳动合规监管不足使部分企业通过压低用工成本维持盈利, 如拖欠工资、规避社保缴纳, 直接损害员工权益, 降低劳动积极性。

激励机制缺失削弱了 GGFs 的引导效能。现行考核体系偏重投资回报率, 忽视劳动投资效率等长期指标, 导致基金管理人倾向于选择短期见效项目。世界银行研究指出, 缺乏激励的 GGFs, 其资金投向劳动密集型创新项目的比例较市场化基金低 40%。对被投资企业而言, 缺少明确的劳动投资激励政策, 企业更愿意将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非员工培训, 抑制了人力资本积累。

监管缺位引发道德风险, 激励机制缺失影响投资导向。相关监管与激励机制问题数据见表 1。

表 1 政府引导基金监管与激励机制问题数据

具体内容	数据
经济增长率每下降 1 个百分点, 企业劳动投资规模平均缩减比例	2.7%
缺乏激励的 GGFs 投向劳动密集型创新项目的比例较市场化基金低比例	40%

数据来源: IMF 研究、世界银行研究

4.3 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对两者关系的干扰

经济周期波动显著调节 GGFs 的政策效果。在下行周期中, 企业为维持现金流, 往往优先削减劳动投资。IMF 研究显示, 经济增长率每下降 1 个百分点, 企业劳动投资规模平均缩减 2.7%。此时, 即使 GGFs 注入资金, 企业仍可能因市场需求不足而推迟产能扩张和人员招聘计划, 导致资金闲置。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 某获得 GGFs 支持的文旅企业, 因行业停摆被迫裁员 30%, 劳动投资效率骤降。

宏观政策调整通过融资成本与预期管理影响企业决策。货币政策收紧时, 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即使获得 GGFs 股权支持, 仍可能因债务融资受限而压缩劳动投资。美联储加息周期中, 新兴市场企业劳动投资增速平均下降 1.8 个百分点。税收政策变动直接影响企业可支配收入,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每提高 10%, 企业员工培训投入增长 6.3%。这种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 使 GGFs 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

五、案例分析

5.1 案例选择依据与背景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其发展面临技术研发高风险、投资回报周期长等市场失灵困境 (赵海龙, 2011; 王力等, 2024)。在此背景下, 人工智能企业 A 的发展历程极具典型研究价值, 且相关数据可获取性强, 成为本研究的理想对象。人工智能领域以计算机视觉技术研发为代表, 具有显著的高研发投入与长回报周期特征, 与政府引导基金 (GGFs)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企业 A 成立于 2010 年, 长期专注计算机视觉技术研发, 但受制于单一的融资渠道, 2017 年其研发人员占比不足 40%, 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65%) (清科研究中心, 2024)。这种人才结构失衡状况, 严重制约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优势的培育, 使其在产业发展浪潮中面临巨大挑战。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于 2018 年对企业 A 实施战略投资，注资 5000 万元获取 10% 股权，这一举措具有深刻的政策考量与科学的决策依据。该基金聚焦“人工智能 + 实体经济”应用，其投资决策经过技术成熟度评估、市场前景分析、团队创新能力评价等 7 个维度的量化考核（孟祥瑜等，2024）。投资协议明确规定，企业需将资金的 60% 专项用于研发团队建设和设备升级，并建立严格的季度报告制度，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资金使用监督，确保资金使用严格符合政策目标。这一投资行为充分体现了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资金支持与监督管理双轮驱动，引导企业优化劳动投资结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意图（李湛等，2012）。

5.2 案例企业在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前后劳动投资效率的变化分析

在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前（2017 年），企业 A 受资金约束的困境显著，劳动投资效率低下问题突出。从关键经济指标来看，人均产值仅 30 万元，显著低于行业均值（55 万元）；人均利润仅 5 万元，研发投入强度不足 8%。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劳动结构呈现严重失衡状态，行政人员占比高达 35%，而算法工程师缺口达 40 人，导致研发资源严重不足（李小荣、刘行，2019）。这种资源错配致使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迭代周期长达 18 个月，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地位。

2018 - 2020 年间，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为企业 A 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变革，推动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人均产值增长至 80 万元，年均增长率达 38%；人均利润突破 15 万元，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 18%。劳动结构得到明显优化，研发人员占比提升至 68%，行政人员精简至 12%，实现了人力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技术创新成果丰硕，产品迭代周期大幅缩短至 6 个月，市场份额从 3% 跃升至 12%。企业通过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显著增强了技术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优势，逐步在行业中站稳脚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企业 A 在投资前后的劳动投资效率相关指标变化显著，具体数据见表 2。

表 2 案例企业投资前后劳动投资效率指标变化数据

阶段	具体内容	数据
投资前（2017 年）	人均产值（行业均值对比）	30 万元（行业均值 55 万元）
投资前（2017 年）	人均利润	5 万元
投资前（2017 年）	研发投入强度	不足 8%
投资前（2017 年）	行政人员占比	35%
投资前（2017 年）	算法工程师缺口	40 人
投资后（2018-2020 年）	人均产值变化	增至 80 万元
投资后（2018-2020 年）	研发投入强度变化	提升至 18%
投资后（2018-2020 年）	研发人员占比变化	提升至 68%
投资后（2018-2020 年）	产品迭代周期变化	缩短至 6 个月
投资后（2018-2020 年）	市场份额变化	从 3% 跃升至 12%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5.3 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劳动投资效率的路径与效果分析

资源获取路径：5000 万元资金的注入，为企业 A 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支撑，成为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力量。企业利用这笔资金购置 GPU 集群、建设 AI 算力中心，使设备先进性提升 3 个代际。先进的设备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同等研发任务所需工时减少 40%，人均产出显著增长。同时，资金支持有力推动了市场扩张，企业新增华东、华南两大区域销售中心，带动销售人员规模增长 50%。销售网络的拓展有效促进了产品销售，增加了企业收入，进而为技术研发和生产投入提供了更多资金，形成“技术 - 市场 - 生产”的良性循环。这一过程充分印证了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资源注入，改善企业资源配置，提升劳动投资效率的核心作用机制（赵海龙，2011）。

战略调整路径：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促使企业 A 进行战略转型，确立“技术领先 + 场景落地”双轮驱动战略。企业通过设立联合实验室、与高校共建研发中心，积极整合产学研资源，在自动驾驶视觉算法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成功研发出 3 项行业领先技术。技术优势迅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2020 年中标智慧城市项目金额同比增长 210%。订单的快速增长带动劳动需求同步扩张，员工总数从 200 人增至 450 人，且新增岗位多为高附加值技术岗，有效优化了企业的人才结构与业务布局。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投资引导企业战略调整，推动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整体运营效率与市场竞争力（王力等，2024）。

人才吸引与激励路径：政府背书为企业 A 带来了强大的品牌提升效应，2019 年招聘季收到简历数量较上年增长 270%，成功引进 IEEE Fellow 2 名、海外博士 15 人，极大充实了企业高端人才队伍。企业同步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 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比例达 12%, 有效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力, 员工流失率从 18% 降至 6%。人才集聚效应有力推动了创新效率的大幅提升, 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 85%, 技术成果转化率提高至 72%。政府引导基金的介入, 不仅帮助企业吸引优秀人才, 还通过激励机制优化劳动投资, 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孟祥瑜等, 2024)。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资源获取、战略调整、人才吸引与激励等路径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相关效果数据见表 3。

表 3 政府引导基金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路径的效果数据

路径	具体内容	数据
资源获取路径	同等研发任务所需工时减少比例	40%
战略调整路径	中标智慧城市项目金额同比增长比例	210%
人才吸引与激励路径	招聘季简历数量增长比例	270%
人才吸引与激励路径	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比例	12%
人才吸引与激励路径	员工流失率变化	从 18% 降至 6%
人才吸引与激励路径	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比例	85%

六、研究结论总结

政府引导基金的政策价值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持工具, GGFs 通过政策导向有效缓解企业早期融资约束, 其资本撬动效应 (政府 1 元撬动 5-10 元社会资本) 和风险分担机制 (结构化设计降低社会资本顾虑) 对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尤为关键 (赵海龙, 2011; 孟祥瑜等, 2024)。企业 A 的案例表明, GGFs 注资可使研发投入强度从 8% 提升至 18%, 印证了其创新资源的配置作用 (清科研究中心, 2024)。

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路径

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可通过资源获取、战略调整与人才激励三条关键路径实现。在资源获取方面, 政府引导基金 (GGFs) 的资金注入为企业设备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人工智能企业 A 为例, 获得 GGFs 注资后, 企业购置 GPU 集群建设 AI 算力中心, 使得同等研发任务所需工时减少 40% (赵海龙, 2011)。设备的升级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还促进了技术研发的突破, 进而推动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增强, 形成“技术 - 市场 - 生产”的正向循环, 为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战略调整路径上, GGFs 引导企业确立契合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的战略方向。企业 A 在 GGFs 的影响下, 确立“技术领先 + 场景落地”双轮驱动战略, 积极整合产学研资源, 在自动驾驶视觉算法等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这一战略调整效果显著, 2020 年企业中标智慧城市项目金额同比增长 210% (王力等, 2024)。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 企业对高附加值岗位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高附加值岗位占比显著提升, 推动企业业务结构优化, 进一步提升劳动投资效率, 实现企业从技术研发到市场应用的高效转化。

人才激励路径同样对劳动投资效率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背书赋予企业强大的品牌提升效应, 使企业人才吸引力指数大幅提升 270% (孟祥瑜等, 2024)。企业 A 在获得 GGFs 投资后, 成功吸引了 IEEE Fellow 2 名、海外博士 15 人等高端人才的加入。同时, 企业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将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比例提升至 12%, 有效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力, 员工流失率从 18% 降至 6%, 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 85%。人才的集聚与激励, 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从根本上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

现存问题与挑战

尽管 GGFs 在提升劳动投资效率上具有积极作用, 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在投资决策层面, 存在顺周期投资现象, 如 2016-2018 年区块链概念热潮中, 多地 GGFs 盲目跟风投资, 导致区块链初创企业平均员工冗余率达 32% (王力等, 2024), 造成劳动资源的严重错配。监管机制层面, 部分企业存在资金挪用问题, 某新能源项目企业将 GGFs 资金违规投入房地产开发, 致使技术研发停滞, 劳动生产率持续下滑 (李湛等, 2012)。此外, 宏观经济环境对 GGFs 政策效果影响显著,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 企业劳动投资规模会随 GDP 增长率每下降 1% 而缩减 2.7% (IMF 研究), 削弱了 GGFs 对企业劳动投资的促进作用。

实践启示

针对上述问题, 可从基金运作、监管机制和政策协同三方面进行优化。在基金运作优化上, 应建立多维考核体系, 将劳动投资效率指标, 如人均产值、培训投入等纳入 GGFs 绩效评价, 避免基金管理人的短期逐利倾向, 引导基金更加注重企业长期发展与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监管机制完善方面, 需引入第三方资金监督与劳动合规审计, 加强对 GGFs 资金使用和企业用工情况的监管, 有效防范资金挪用与用工风险 (孟祥瑜等, 2024)。政策协同建议上, 结合货币政策与税收激励, 如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将 GGFs 资金使用与员工培训投入挂钩 (王力等, 2024), 强化 GGFs 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引导作用, 为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促进企业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清科研究中心. (2024). 2024 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研究报告. 清科研究中心.
- [2] 王力, 郭静, 李雪, 高杨. (2024). 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J]. 华北金融, (05), 52-57.

- [3] 李小荣, 刘行. (2019). 税收征管、产权性质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J]. 会计研究, (01), 74-80.
- [4] 赵海龙. (2011). 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J]. 改革与战略, 27 (07), 113-116.
- [5] 孟祥瑜, 谢获宝, 黄大禹. (2024). 政府引导基金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J]. 财经研究, 50 (09), 154-168.
- [6] Aghion, P., & Howitt, P. (1992).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2), 323–351.
- [7] Kortum, S., & Lerner, J. (2000).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to innov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1(4), 674–692.
- [8] Farrell, M. J. (1957).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General)*, 120(3), 253–281.
- [9] Becker, G. S. (196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0] Coelli, T. J., Prasada Rao, D. S., O'Donnell, C. J., & Battese, G. E.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2nd ed.). Springer.
- [11] Bloom, N., & Van Reenen, J. (2007).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4), 1351–1408.
- [12] OECD. (2023). *Productivity statistics database*. OECD Publishing.
- [13] Lazear, E. P. (2000). Performance pay and productiv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5), 1346–1361.
- [14] Arrow, K. J. (1962).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p. 609–62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5] Stigler, G. J. (1961).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9(3), 213–225.
- [16] Lee, J., et al. (2018).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and startup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9(2), 346–366.
- [17] Li, Y., et al. (2022).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73, 102318.
- [18] Lin, J. Y.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 李湛, 张少萱, 李奥博. (2012). 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模式比较与对策建议 [J]. 科学发展, (02), 42-50.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on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Li Yinxia¹

¹*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511363,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ombin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GGFs) on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As policy-driven financial instruments, GGFs aim to direct social capital towards strategic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GGFs influence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rough resource allocation, signal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 case study of Enterprise A shows that investment from GGF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profit per capita by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ttracting talent, and optimizing strategies. However,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s challenges such as suboptimal investment decisions,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Finally, the research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GGFs in improving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Keywords: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Resource Alloc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韧性：空间特征与发展路径

林牧楠¹

(1.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的内在关联, 结合相关理论与实践, 系统解析了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韧性的理论机制、空间特征, 并提出发展路径。理论层面, 数字经济通过渗透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生态四大维度直接提升城市韧性, 同时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形成间接赋能效应; 空间层面, 数字经济因数据流动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且其赋能效果在时间(政策强化期)、对外开放水平等维度存在异质性, 区域差异则呈收敛趋势。基于此,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创新-韧性”融合生态、空间协同治理及差异化政策等方面, 提出针对性建议, 为以数字经济提升城市韧性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城市韧性; 技术创新; 空间溢出效应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05

一、引言

城市作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 其韧性水平直接决定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 数字经济已成为重塑城市系统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的核心力量。从中国城市发展实践来看, 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区域协同等路径, 为城市韧性提升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本文基于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的内在关联, 结合空间经济学、创新理论等视角, 解析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韧性的理论机制, 阐释其空间溢出特征与异质性表现, 并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正文部分

二、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韧性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一) 核心概念的理论界定

城市韧性的概念源于生态系统韧性理论, 指城市系统在遭遇自然或人为扰动时, 维持核心功能、快速恢复并适应变革的能力。根据 Shi Y 的研究, 城市韧性可分解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社会韧性、经济韧性、基础设施韧性、生态韧性。这四个维度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互形成有机整体, 任一维度的短板都可能降低城市整体韧性。

数字经济则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形态。其核心特征为“高渗透性”“强协同性”“广辐射性”: 数字技术可渗透到城市各子系统, 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子系统协同, 并依托网络效应形成辐射带动作用。这种特征使其能够突破传统要素的地理限制, 成为提升城市韧性的“系统连接器”。

(二)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韧性的作用机制

1. 社会韧性: 数字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风险放大”循环

社会韧性的核心是维持公共服务连续性与社会协同效率。传统模式下, 信息传递滞后易导致风险扩散——如公共卫生事件中,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可能加剧区域恐慌。数字经济通过两种路径破解这一问题: 一方面, 互联网普及(缩短了公共服务的时空距离, 数字平台促进了政府、企业、居民的实时互动, 形成“风险预警-资源调配-反馈优化”的闭环。这种“信息透明化-响应协同化”机制, 本质是通过数据流动降低社会系统的“摩擦成本”, 增强抗冲击能力。

2. 经济韧性: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支撑

经济韧性依赖于产业结构的抗波动能力与要素重组效率。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轮驱

作者简介: 林牧楠(2001.7-)男, 汉族,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发展与管理。

动提升经济韧性：数字产业化（如信息传输、软件产业）本身具有低物理依赖、高灵活性特征，在传统产业受冲击时可维持经济基本盘；产业数字化（如工业互联网、农业物联网）则通过优化供应链、提升生产效率增强传统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3.基础设施韧性：数字技术重构“硬件-软件-服务”体系

基础设施韧性强调设施网络的连通性与应急响应能力。传统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因“物理隔离”存在单点故障风险，而数字技术通过“智能化改造”与“平台化协同”突破这一局限：一方面，物联网传感器实现设施状态实时监测（如智慧电网的负荷预警）；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整合跨区域设施资源（如城市群交通枢纽调度系统）。

4.生态韧性：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绿色转型”

生态韧性的核心是降低生态风险、提升环境承载力。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赋能生态治理：大数据可实现污染源、能耗监控，人工智能可优化环境治理方案。这种“数据精准性+技术优化性”的结合，推动生态治理从“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减少生态风险积累。

（三）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从“技术赋能”到“韧性升级”

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赋能并非直接作用，而是以技术创新为重要中介。研究揭示，知识与技术的溢出具有“地理邻近性”，而数字经济通过数据共享突破了这一限制——数据的非竞争性特征使创新成果能够快速扩散，激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体而言，数字经济通过两种路径推动技术创新：创新工具革新：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降低研发成本。知识溢出加速：数字平台促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知识共享。技术创新进一步通过应急技术强化基础设施韧性，绿色技术优化生态韧性，产业技术增强经济韧性。这种“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城市韧性”的传导链，本质是将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转化为创新的“动能属性”，最终实现韧性系统的迭代升级。

二、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韧性的空间特征：溢出效应与异质性

（一）空间溢出效应：从“单点韧性”到“区域韧性网络”

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具有“低流通成本”“高复用性”特征，这使得其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突破行政边界，形成空间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的形成源于三个机制：首先是技术扩散，核心城市的数字技术通过产业合作向周边转移，以长三角为例，指出上海的数字政务技术已通过“城市群联盟”辐射苏州、杭州等城市。其次是要素流动，数字经济降低了人才、资本的流动成本，高韧性城市的要素向周边流动。最后是标准协同：区域统一的数字标准减少了跨市协作成本，珠三角的“数字韧性标准”使跨市应急物资调配效率提升 25%。

这种空间溢出效应的本质，是数字经济将“单点韧性”整合为“区域韧性网络”，通过网络的“冗余性”与“连通性”降低局部冲击的扩散风险。

（二）异质性表现：时间、区域与开放水平的差异

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赋能效果并非均质，而是因时间、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呈现异质性，这种差异源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基础、政策环境的不均衡。

1. 时间异质性：政策驱动的效应强化

政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催化剂。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为时间节点，政策出台后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提升效应增强了 30%。这是因为政策通过两种路径发挥作用：一方面，政策引导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向韧性领域倾斜；另一方面，政策降低了数字技术应用的制度成本。这种“政策-技术-韧性”的传导，印证了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供给优化要素配置”的理论。

2. 区域异质性：收敛性趋势下的差异收窄

东、中、西部城市在数字经济基础上存在初始差距，但 Barro R J 的收敛理论表明，技术扩散会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实证显示，2011-2019 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 σ 收敛系数从 0.57 降至 0.42，说明区域差异在收窄。这种收敛性使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赋能效应呈现“中西部追赶”特征——中西部城市的数字经济韧性弹性系数与东部的差距从 2011 年的 0.15 缩小至 2019 年的 0.04。数字技术的“后发优势”使中西部可直接借鉴东部经验，降低试错成本。

3. 对外开放异质性：开放作为“技术吸收器”

对外开放水平高的城市更易吸收国际数字技术与经验，《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2023》指出，对外开放水平每提升 10%，数字技术的吸收效率可提高 8%。这种“开放-吸收-应用”的链条，使开放城市的数字经济韧性赋能效应更强：对外开放水平前 30% 的城市，数字经济对韧性的提升效应比后 30% 的城市高 40%。这本质是开放城市通过“技术引进-本土化创新-韧性应用”的路径，加速数字技术向韧性能力的转化。

（三）空间不平衡的成因：数字鸿沟与路径依赖

尽管存在收敛趋势，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仍客观存在，这种不平衡源于“数字鸿沟”与“路径依赖”的叠加。数字鸿沟表现为“接入鸿沟”与“应用鸿沟”：东部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是西部的1.6倍，而数字技能水平的差距更大。路径依赖则源于历史积累——早期数字产业集聚的城市（如深圳、杭州）通过“产业集群-人才集聚-创新迭代”的循环持续强化优势。这种空间不平衡直接导致城市韧性的“中心-外围”结构：核心城市通过数字经济形成高韧性，而外围城市因数字滞后面临韧性短板。破解这一问题，需通过区域协同打破路径依赖，推动数字资源的均衡配置。

三、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韧性的政策路径：基于理论的实践导向

（一）构建“全域覆盖、梯度衔接”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赋能韧性的物质基础，需兼顾“覆盖广度”与“协同深度”。根据《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的建议，可从三个层面推进：基础层，向中西部、中小城市倾斜数字基建投资，重点补齐5G基站、数据中心的短板，目标是2030年实现地级市千兆网络覆盖率100%，县域达90%以上。这一布局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基于的空间模型，在300公里半径内形成“核心-节点”结构，既保证覆盖又避免资源浪费。应用层，建设“韧性导向”的数字平台，如区域应急数据共享平台，打破“数字孤岛”。

（二）推动“数字-创新-韧性”的深度融合生态

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表明，数字经济赋能韧性需以创新生态为支撑。结合知识溢出理论，可构建“三位一体”生态。创新主体协同，建立“企业-高校-政府”创新联合体，企业提出韧性需求，高校与科研机构攻关技术，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创新要素配置，通过数字金融引导资本流向韧性相关领域，数字金融的定向支持可使绿色技术、应急技术的研发投入增长。创新成果转化，建设“数字技术-韧性应用”转化平台，降低技术落地成本。深圳的“韧性科技产业园”通过这种模式，使应急技术的商业化周期缩短至1-2年。

（三）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区域政策

基于异质性特征，政策需避免“一刀切”，分类施策。东部城市聚焦“数字韧性升级”，重点发展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应急决策）、强化国际合作（如引进海外韧性治理经验）。中西部城市，侧重“数字韧性追赶”，通过“东部技术转移+本地适配改造”提升基础能力，如借鉴东部智慧农业技术优化农村地区的经济韧性。同时，针对政策强化期的时间异质性，需把握政策窗口，在“十四五”期间加大数字经济与韧性建设的政策协同（如专项规划、资金倾斜），释放制度红利。

结论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韧性，本质是通过数据流动与技术创新重构城市系统的“抗风险基因”。从理论逻辑看，这种赋能是多维度、多路径的——既直接优化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生态的韧性能力，又通过技术创新形成间接支撑；从空间特征看，其效应既因数据流动产生溢出，又因发展不平衡呈现异质性。破解“数字赋能韧性”的核心命题，需立足这些特征，以基础设施为基础、创新生态为支撑、空间协同为抓手，推动数字经济从“技术应用”向“系统重塑”升级。

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的融合将走向更深层次——从“被动应对冲击”到“主动预测风险”，从“单点韧性”到“全域韧性网络”。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最终实现“数字赋能韧性、韧性支撑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Shi Y, Zhang T, Jiang Y.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rban resilience[J]. Sustainability, 2023, 15(12): 9250.
- [2]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 [3] 徐康宁.数字经济时代转型的理论逻辑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策略重点[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02):34-43.
- [4] 潘为华,贺正楚,潘红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和分布动态[J].中国软科学,2021,(10):137-147.
- [5] Li H, Zhang Y, Li Y.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4, 207: 123604.
- [6] 张玲,董成立,张伟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3,(06):20-30.

- [7] 苏岚岚,彭艳玲,周红利.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户数字经济参与的收入效应及作用机制[J].中国农村经济,2024,(08):145-165.
- [8] Barro R J, Sala-i-Martin X. Converg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2): 223-251.
- [9] Xu Y, Peng Z, Sun Z, et al. Does digital finance lessen credit rationing?—Evidence from Chinese farmers[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2, 62: 101712.
- [10] Cho M-H, Yi C-G. Adaptive Social Innovation Derived from Digital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Society and Policy [J]. Sustainability, 2022, 14(6): 3408.
- [11] Zhang X, Lin F, Wang Y, et al.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employment polar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J]. Labor History, 2022, 63(5): 636–651.
- [12] Zhao B, Xi X. Economic effects of conversion from county (or county-level city) to municipal district in China [J]. PLOS ONE, 2022, 17(9): e0272267.
- [13] Zeng G, Wu M, Yuan X. Digit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4, 84: 475–498.
- [14] 范剑勇,刘念,刘莹莹.地理距离、投入产出关系与产业集聚[J].经济研究,2021,56(10):138-154.
- [15] Lucas Jr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 [16] Tang Y, Chen Y, Wang K, et al. An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in China [J]. Sustainability, 2020, 12(7): 3021.
- [17] 刘文发,陆学峰.数字经济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统计与决策,2024,40(11):28-33.
- [18] Luo Q, Zhang D, Wang H.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Trade Dependence: Mechanism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City Data [J]. Sustainability, 2023, 15(17): 13055.
- [19] 郭庆旺,贾俊雪.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07):46-53.

Digital Economy Empowers Urban Resilienc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Paths

Lin Munan¹

¹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 resilience, and integrating releva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ow the digital economy empowers urban resilience, and proposes development path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digital economy directly enhances urban resilience by permeating four major dimensions: society, economy, infrastructure, and ecology. Meanwhile, it forms an indirect empowerment effec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intermediary. At the spatial level, the digital economy generate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due to data mobility. Its empowerment effect shows heterogeneity in dimensions such as time (policy reinforcement periods) and opening-up level, while regional differences present a converging trend.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from aspects such a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digital-innovation-resilience" integrated ecology, spati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urban resilience through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Urban Resili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银发经济视域下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现状研究

杨怡¹ 李宇^{1*} 黄仪¹

(1.成都大学体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 银发经济成为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 其中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现状备受关注。本文以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现状为研究对象,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 (N=287)、实地考察法及数理统计法分析老年人体育消费现状。研究发现金牛区老年人普遍保持较高的体育锻炼积极性; 体育消费场所多以免费场所为主, 体育消费水平偏低; 体育锻炼基础场地设施匮乏, 老年人参与率有待提高; 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动机多元化, 消费项目传统且单一, 亟须多样化以满足需求; 提出加大宣传力度, 培养老年人消费意识; 加强资源整合, 强化场地设施建设; 发展社区体育, 加强老年人体育人才骨干培养; 建立多元服务体系, 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发展。

关键词: 银发经济; 成都市金牛区; 老年人体育消费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2

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201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 为我国老年体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推进老年体育发展, 既是时代机遇, 又是健康养老举措^[1]。当前,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老年人体育健身与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持续推进, 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比例的攀升及健康意识的增强, 催生“银发经济热”成为撬动体育消费市场的新动能。据《2022 国民健身趋势报告》指出, 老年人体育消费不断提升, 2020 年人均体育消费已超千元,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为体育买单。在银发经济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业态下, 老年人体育消费不仅是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引擎, 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数据显示, 2023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有近 3 亿人, 面对如此庞大的“银发人群”, 如何应对老年人体育消费已成为银发经济亟须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

在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下, 发展老年人体育消费是推动我国银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 年 1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首次以“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专项政策, 发展银发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2019 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指出要激发体育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消费热情, 通过优化体育消费环境、出台鼓励消费政策等措施, 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为进一步展现恢复和扩大体育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 2023 年,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恢复和扩大体育消费的工作方案》。国家的政策和党高度重视老年人体育, 出台多项举措支持其发展, 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未来将持续加大投入, 优化体育设施布局, 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体育需求, 助力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

在银发经济迅速崛起的宏观背景下, 成都市凭借其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的优势地位, 为深入探究老年人体育消费现状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通过对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 存在缺乏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年人活动场所面积比例失调等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以期成都市老年人体育消费提供一定参考, 进而促进老年人体育高质量发展。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口概况

中国将成为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实施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重大的国家战略, 推动老年人体育消费升级是新时代推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群“主

作者简介: 杨怡 (2002—) 女, 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消费;

李宇 (1987—) 男, 讲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消费;

黄仪 (2003—)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体育消费。

通讯作者: 李宇

动健康”体育需求的关键着力点^[3]。截至 2022 年底,成都市户籍人口 1571.57 万人,老年人口(60 岁及以上)324.24 万人;7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173.48 万人。金牛区作为成都的中心城区一直是老成都人眼中的宜居之地,数据显示,目前金牛区 60 岁以上老人 19.6 万人,老龄化在成都市中心城区位居首位。金牛区 99%的老年人依托居家和社区养老,老年人口密集集中于老旧社区,如肖家村二巷、五丁社区、茶店子街道等,这些区域公共空间有限,适老化设施不足,导致老年人活动空间受限。

2.2 银发经济视域下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状况

表 1 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场所统计 (N=287, 多选)

场所	人数	百分比
社区健身场地	108	37.63%
公园	152	52.96%
学校	40	13.94%
户外空地	137	47.74%
体育场馆	85	29.62%
广场	144	50.17%
其他	23	8.01%

从表 1 可知,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场所社区健身场地 108 人,占 37.63%;公园 152 人,占 52.96%;学校 40 人,占 13.94%;广场和户外空地 144 人和 137 人,占 50.17%和 47.74%;体育场馆 85 人,占 29.62%;选择“其他”场所有 23 人,占 8.01%。说明金牛区体育场地丰富多样,但 40%以上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在公园、户外空地、广场进行体育锻炼。究其原因,金牛区老年人对开阔、环境优美且免费的户外场地更加青睐,使其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有助于老年人获得感与幸福感显现。

表 2 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过去一年体育消费水平统计 (N=287)

消费水平	人数	百分比
1000 元以下	72	25.09%
1001—2000 元	97	33.8%
2001—3000 元	78	27.18%
3001 元以上	40	13.93%

体育消费水平不仅能对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提高和人们消费结构改善有着重要意义,还对于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广泛普及、推动社会化体育发展、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有重要作用^[4]。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老年人对体育消费的认知与接受程度正稳步提升,体育消费已深度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表 2 可知,金牛区老年人过去一年体育消费 1000 元以下 72 人,占 25.09%;1001-2000 元 97 人,占 33.8%;2001-3000 元 78 人,占 27.18%;3001 元以上 40 人,占 13.93%。其中,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 1001-3000 元占比达 60.98%,突显出该消费段已成为金牛区老年体育消费市场的主流趋势。较成都市 2023 年人均体育消费水平(3000 元)仍有提升空间,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利用适老化服务、创新“体育+健康”模式,通过设施升级、政策激励及科学引导释放银发经济潜力。

表 3 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动机统计 (N=287, 多选)

消费动机	人数	百分比
强身健体	107	37.28%
娱乐身心	163	56.79%
促进人际交往	143	49.83%
调节情绪	139	48.43%
消磨时间	96	33.45%
对体育的兴趣	45	15.68%
随众心理	36	12.54%
其他	12	4.18%

消费动机是指引导消费者在实现消费需求时的内在动力^[5]。从表 3 可知,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动机强身健体 107 人,占 37.28%;娱乐身心 163 人,占 56.79%;促进人际交往 143 人,占 49.83%;调节情绪 139 人,占 48.43%;消磨时间 96 人,占 33.45%;对体育的兴趣 45 人,占 15.68%;随众心理 36 人,占 12.54%。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动机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以娱乐身心、促进人际交往、调节情绪为消费动机的老年人占比均超过 48%;强身健体占 37.28%,说明健康需求始终是老年人体育消费的重要驱动力。总体看来,金牛区老年人的体育消费动机紧密关联其生活需求和心理诉求。

表 4 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形式统计 (N=287, 多选)

体育消费形式	人数	百分比
购买运动用品	90	31.36%
健康监测	156	54.36%
体育赛事	119	41.46%
体育培训	102	35.54%
保健康复	49	17.07%
体育旅游	110	59.58%
其他	29	10.1%

从表 4 可知,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形式统计中,购买运动用品 90 人,占 31.36%;健康监测 156 人,占 54.36%;

体育赛事 119 人, 占 41.46%; 体育培训 102 人, 占 35.54%; 保健康复 49 人, 占 17.07%; 体育旅游 110 人, 占 59.58%。可知, 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以体育服务为主, 其中以健康监测、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为主, 占比均超过 40%, 说明金牛区老年人以体育这种形式关注自身健康问题越发明显; 购买运动用品、体育培训, 占比均超过 30%, 说明老年人在参与体育活动时, 对装备品质和个性化有追求, 优质运动用品能提升运动体验与安全性, 满足不同体育项目需求, 体现了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形式的多元化。

表 5 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渠道统计 (N=287, 多选)

体育消费渠道	人数	比例
电视	103	35.89%
报纸或杂志	174	60.63%
家人及朋友	177	61.67%
网络	147	51.22%
其他	72	25.09%

从表 5 可知, 获取体育消费渠道为电视 103 人, 占 35.89%; 报纸或杂志 174 人, 占 60.63%; 家人及朋友 177 人, 占 61.67%; 网络 147 人, 占 51.22%。说明金牛区老年人获取体育消费渠道主要以报纸、杂志、家人及朋友为主, 因为与老年人消费习惯相关;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金牛区老年人还通过体育类网站、淘宝 APP 等网络, 了解体育产品、赛事信息和健身知识, 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线上宣传模式, 以有效触达目标消费群体, 推动老年人体育消费市场发展。

表 6 制约成都市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的因素 (N=287, 多选)

制约体育消费的因素	人数	比例
经济收入	107	37.28%
消费观念	198	68.99%
质量与价格	160	55.75%
服务水平	137	47.74%
其他	68	23.69%

从表 6 可知, 制约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统计中, 经济收入 107 人, 占 37.28%; 消费观念 198 人, 占 68.99%; 质量与价格 160 人, 占 55.75%; 服务水平 137 人, 占 47.74%; 其他 68 人, 占 23.69%。这表明大部分老年人秉持传统消费观念, 在体育消费上较为保守, 更倾向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认为体育消费并非生活必需, 对体育消费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其次, 当前体育消费市场中, 商家服务意识较为淡薄, 服务细节不到位, 如缺乏专业指导、售后保障不完善等,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的消费意愿。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体育消费需求多元化, 健康导向显著

在全民健身的时代浪潮下, 体育消费市场正经历着深刻变革,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 金牛区老年人的体育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 且健康导向十分显著。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呈现“健康养生+社交娱乐”双重诉求, 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也为体育产业在老年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有望进一步推动体育与健康、养老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创造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体育消费产品和服务。

3.1.2 基础设施匮乏, 参与率有待提高

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 and 部门对社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重视和支持, 建设力度有所加强, 但随着社区老年人口持续增长, 现有设施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旧城改造前城区有众多小公园、小广场, 各社区内也有不少单位的小操场等场所, 方便晨练、晚练, 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快速推进, 房屋数量增加, 活动场所却日益减少。缺乏合适场地和设施, 许多体育项目无法正常进行, 老年人健身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为应对老年体育设施不足的现状, 政府应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环节, 全方位考量老年群体对体育设施的需求。通过合理规划布局, 扩大活动场地面积, 丰富设施类型, 提高设施供给数量。想要提升老年人体育参与率, 这些问题亟须得到妥善解决。对身体不便的老年人, 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或开发适合室内进行的体育项目; 对健身意识淡薄的老年人, 加强宣传教育, 普及体育健身知识, 提高他们对体育健身重要性的认识。

3.1.3 消费项目传统且单一, 亟须多元化以满足需求

从消费形式来看, 涵盖体育旅游、购买运动装备、健康监测设备、体育赛事、体育培训、保健康复等, 既追求休闲娱乐, 也关注健康管理和技能提升。在消费动机层面, 为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促进人际交往、调节情绪、消磨时间、出于体育兴趣等目的参与体育活动的老人都占一定比例, 这表明老年人体育消费动机复杂多样。而且在信息获取渠道上, 既有依赖家人朋友、报纸杂志等传统方式的老人, 也有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群体, 这意味着在推广体育消费相关内容时需兼顾不同渠道。种种迹象表明, 满足金牛区老年人多元化体育消费需求迫在眉睫。

3.2 建议

3.2.1 加大宣传力度, 培养老年人消费意识

鼓励适度的体育消费,培养老年人积极健康的体育消费观念。针对不同信息获取习惯的老年人,采用多元宣传方式。与纸媒合作开设体育消费专栏,利用社交媒体推送合适老年人信息,鼓励商家开展线下体验活动,走进社区宣传,通过口碑传播扩大影响力。

3.2.2 发展社区体育,加强老年人体育人才骨干培养

为满足老年人日益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不断创新和推广更多简便易行、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项目,丰富社区老年体育健身活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社区老年体育健身人才培养,逐步扩大骨干队伍。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体育人才资源,邀请退休的体育教师、教练员担任社区老年体育健身辅导员或教练员,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为社区老年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鼓励骨干人才创新体育健身项目,结合老年人兴趣爱好和身体状况,开发更多适合老年人参与的体育活动。

3.2.3 建立多元服务体系,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发展

建立金牛区老年人体育消费多元服务体系,要从多方面着手。平台搭建上,打造线上线下结合平台,线上方便老年人了解产品、预订服务,线下组织赛事活动,增强参与感与社交互动,全方位促进老年人体育消费。服务层面,开设运动指导课程,涵盖太极拳、健身操等项目,由专业教练指导;设立健康咨询点,提供运动康复、营养搭配建议。在产品供给上,提供从基础健身器材到特色运动装备的丰富选择,满足不同锻炼需求。

参考文献:

- [1] 舒刚民.“健康中国”背景下我国老年体育的发展路径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8,36(02):1-8.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外文出版社,2023.
- [3] 陶涛,周骞,贾琳.积极应对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体育消费升级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3,43(03):75-81.2023.03.009.
- [4] 雷朝阳.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研究[D].湖南:湘潭大学,2006.
- [5] 孙华飞.安徽省城市社区居民晨、晚体育锻炼现状研究 [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7, 37(5): 98 - 100.

Study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Sports Consumption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Golden District of Chengdu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lver-Haired Economy

Yang Yi¹, Li Yu¹, Huang Yi¹

¹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silver hair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rea to promote the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mong which the current state of sports consumption of elder citizens in the Golden District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sports consumption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the Golden District of Chengdu,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the literature and data metho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pproach, and field visits.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in Jinniu District of Chengdu City,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xercise, and the sports consumption situ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lderly in Jinniu District generally maintain a high enthusiasm for physical exercise; most places for sports consumption are free places, and the level of sports consumption is low. There is a lack of basic facilities for physical exercise, and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older persons needs to be increased; the motivations for sports consumption of older people in the Golden District are diverse, and the consumption items are traditional and single,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diversification to meet the demand. It is proposed to step up publicity efforts to cultivate consumption awareness among older people; strengthe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 site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develop community sports and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a cadre of sports talents for the elderly; establish a multi-service syste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for the elderly.

Keywords: Silver - Haired Economy; Golden District, Chengdu; Sports Consumption in Older Adults

基于 GIS 的喀斯特地区“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荔波县为例

高文平¹ 何燕军¹ 徐军^{1*}

(1.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根据荔波县 2012、2017、2022 年 3 期土地利用数据, 根据“三生空间”功能划分, 创建荔波县的“三生用地”分类系统。通过监督分类, 土地利用动态度(K)、土地利用转移矩阵(LCC)、标准椭圆差重心迁移, 研究荔波县 2012-2022 年土地利用时空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 (1)10 年来, 荔波县土地使用结构变动明显, 2017-2022 年度变动幅度比 2012-2017 年度大, 主要表现为: 林地、建设用地等用地不断增加, 耕地、草地减少; 各类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呈上升之势。(2)10 年间, 荔波县生态空间的面积先增加后减少, 生产空间面积先减少后增加, 生活空间呈不断扩大的态势。随着生产、生活空间不断扩大, 侵占了研究区的生态空间, “三生空间”结构逐渐趋向不稳定状态。(3) 从标准差椭圆和重心转移的角度来看, 生态空间迁移的重心是东南方向, 主要迁到朝阳市, 生产、生活空间重心转移的变化不明显, 这与研究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密不可分。

关键词: 三生空间; 土地利用转移; 标准差椭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40

绪论

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及繁衍的重要资源, 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1], 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是决定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2]。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快速发展, 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导致国土空间结构失衡、利用效益下降及生态环境恶化。“三生空间”理论将土地划分为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功能类型, 其中生态用地是维系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3][4]}。陈严武等提出, 通过“三生空间”的划分及优化, 可有效缓解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城镇化过程中人地矛盾问题^[5]。杨远瑶等构建以“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理念为指导的结构方程模型, 发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间存在显著相互作用, 造成居民生活与生态观念对山地户外旅游业发展态度的显著影响, 从而为推动地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6]。曾祥侠在城镇化背景下, 引入韧性理论构建乡村三生空间评价体系, 能够有效提高自然保护区周边乡村对于内外风险的应对策略^[7]。黄浩鹏通过深入剖析乡村“三生”空间发展现状, 并据此制定空间规划策略, 能够有效实现乡村生态、生产和生活的有机融合, 从而促进乡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8]。

全球喀斯特面积约 2200 km², 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12% 左右^[9], 喀斯特地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10%, 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中国境内碳酸盐岩类岩层纵横广, 喀斯特现象普遍, 类型繁多, 形式多样, 发育强烈。主要集中在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部^[10]。该区域生态敏感性强, 过度人为干预易引发石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问题^[11]。湛京华提出, 明晰喀斯特山区“三生”空间协调关系以及碳排放效应, 有助于喀斯特山区城市绿色发展规划, 其重点关注洞庭湖与环鄱阳湖“三生”空间演变, 优化区域国土空间格局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研究^[12]。杨建强等优化“三生”空间适宜性的 ANN-CA 模型, 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13]。刘志等通过探究贵州省喀斯特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关系, 发现人口密度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产生显

作者简介: 高文平 (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土地信息与应用;

何燕军 (1984—),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自然资源管理与乡村振兴;

通讯作者: 徐 军 (1979—), 男, 工学博士, 研究方向: 土地利用管理与土地信息技术。

著影响,进而造成区域经济绿色低碳和生态高效化发展的驱动性变化^[14]。遥感与GIS技术监测土地利用动态的提升,可为制定科学规划、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同发展提供依据,也为同类地区发展提供参考范式^[15]。贵州省作为喀斯特地貌的典型区域,其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变化剧烈。贵州荔波县的喀斯特地貌极具代表性,其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对区域生态修复具有重要意义。聚焦喀斯特地区“三生空间”冲突与耦合,可以有效缓解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恶化、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

研究区概况

荔波县东经 107°37'至 108°18',北纬 25°7'至 25°39',地处贵州省东南,广西丘陵区 and 云贵高原的交界处,西部与独山县毗邻,北接三都水族自治县,东北部分和南丹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毗邻,和榕江黔东南苗族县、从江县、侗族自治州接壤。荔波县的陆地主要形态是峰丛和峰林,是贵州高原与广西盆地过渡带圆锥形岩溶的典型代表,荔波县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两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16]。全县国土面积 2431.8km²,94 个行政村,总人口为 1.08×10⁵ 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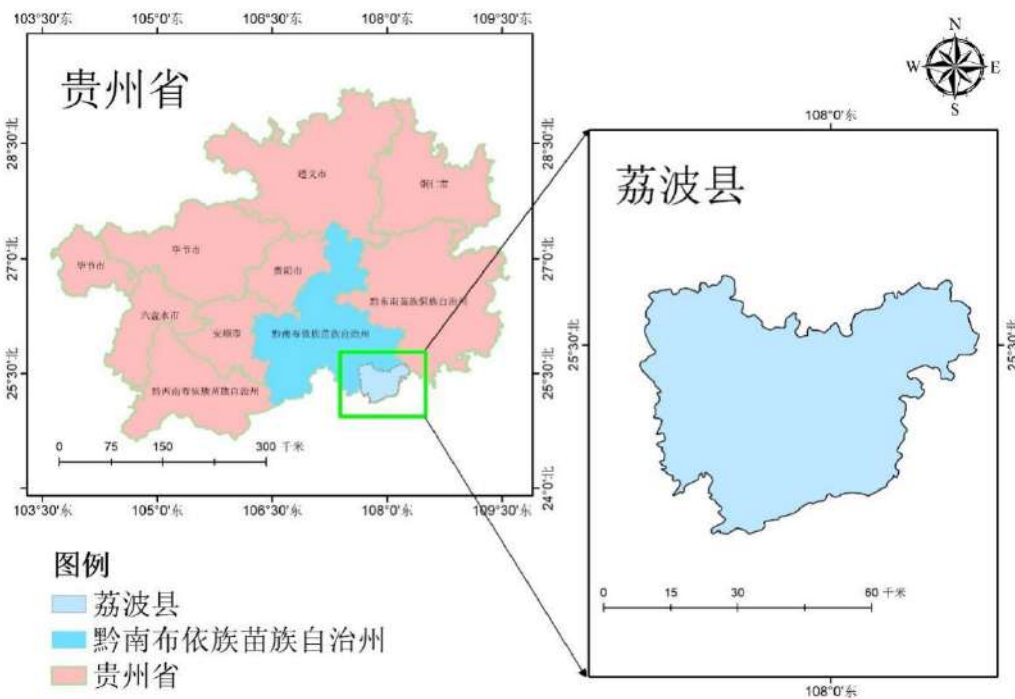


图 1 荔波县行政区划图

注:改图基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审图号为 GS (2024) 0650 的地图上制作,底图无修改

数据源与预处理

荔波县遥感影像数据 2012 年、2017 年和 2022 年分别为 Landsat 卫星,空间分辨率为 30m×30m 数据来自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使用 Arcgis 软件对研究区遥感影像进行几何校正、融合镶嵌、去云和大气校正等预处理,提高分类结果的准确性。荔波县土地利用分类是基于第三次全国土地利用调查结果和全国土地分类标准 (GB/TY21010-2017)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生空间”用地的划分方法,对其划分为六种土地利用类型,分别是耕地、林地和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的划分,对每一类别选取一定数目的样本,运用支持向量机的分类获得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分类结果并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具有生产生活生态等多种功能具,“三生空间”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生活空间、绿水青山为主的生态空间和具有规模经济的生产空间,合理的“三生空间”格局尊重生产规律,以人为本,尊重生态。在这些空间当中,生产空间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而获得产品与服务空间,生活空间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空间承载、保障人

居功能的空间,而生态空间是以调节、维持和保障生态安全功能的空间,它是前两类空间能够发挥自己功能的必要条件^[17]。本文的研究借鉴现有的“三生空间”的划分依据和划分方法,并根据研究区特定的用地条件,将其划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林地生态空间、农业生产空间、牧草地生态空间、城镇生活空间、其他生产空间以及水域生态空间^[18]。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三生空间”分类体系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三级地类
生产空间	农业生产空间	耕地
	其他生产空间	未利用地
生活空间	城镇生活空间	建设用地
	林地生态空间	林地
生态空间	牧草地生态空间	草地
	水域生态空间	水域

1. 土地利用的动态度(K),反映了某个时间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根据研究对象分别有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是指研究区在一定研究期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情况,用来表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速度和变化幅度^[19]。其表达式如下:

$$K = \frac{U_b - U_a}{U_a} \times \frac{1}{T} \times 100\%$$

式中: K 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U_a 、 U_b 分别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2.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LCC), 用于对在一个地区中, 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进行描述。在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转移矩阵中, 能够具体而全面地反映研究区各类用地的演变特点和演变趋势^[20]。本研究通过转移矩阵来刻画“三生空间”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数量关系, 反映在人类活动下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的方向及结构, 揭示荔波县土地利用转移结构特征和转移方向, 可以更好地解释研究区域的耦合协调关系。其计算表达式是:

$$A_{ij} = \begin{pmatrix} A_{11} & A_{12} & \cdots & A_{1n} \\ A_{21} & A_{22} & \cdots & A_{2n}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A_{n1} & A_{n2} & \cdots & A_{nn} \end{pmatrix}$$

式中: A_{ij} 表示研究期初第 i 类土地类型转为期末第 j 类土地类型的面积; n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其中 $i=(1, 2, \dots, n)$, $j=(1, 2, \dots, n)$ 。

3. 标准差椭圆是一种空间统计学方法, 用来刻画地学因素的分布形态。以重心、转角 θ 、X 轴及 Y 轴的方差为主要指标, 从中心趋向及离散性的角度, 对该地区地理学要素的空间分布特性进行分析, 标准差椭圆可以揭示数据的空间分析方向性^[21]。本文主要应用重心迁移, 方位角, 长、短轴四个方面来研究荔波县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形态和程度, 从研究区三个时期的土地类型的重心迁移方向来分析研究区“三生空间”的迁移路径。

结果与分析

1. 研究区“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基于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 基于 Arcgis 软件进行监督分类方法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六大类, 分类结果如图 2 所示。提取 2012-2017 年、2017-2022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对两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分类统计, 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分析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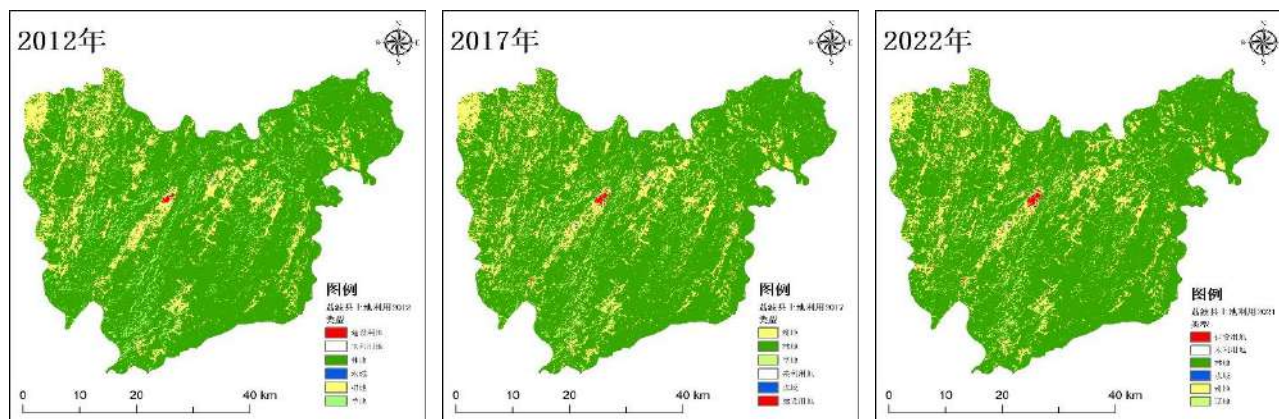


图2 荔波县 2012、2017、2022 土地利用现状图

在 2012-2017 年期间，林地、草、水域及建设用地面积都增加，其中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大程度最明显，该土地利用动态度达 13.56%；而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土地利用动态度分别为-0.68%和-3.06%。该变化特征表明区域城镇化进程加速，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安置房工程推进密切相关，同时林草植被恢复有效提升了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稳定性。

2017-2022 年阶段，林地、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张，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缩减，耕地面积的增加是由于该地的生态补偿。值得关注的是，区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由前期 10%跃升至 31%，反映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印证了荔波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研究结果揭示：荔波县在喀斯特脆弱生态系统背景下，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臵，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修复的双向促进，为类似生态脆弱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范例。

表 2 荔波县 2012-2022 土地利用面积及动态度

土地类型	2012 年	2017 年		2022 年	
	面积/km ²	面积/km ²	动态度/%	面积/km ²	动态度/%
草地	127.30	129.49	0.34%	92.54	-5.71%
耕地	321.18	310.34	-0.68%	315.65	0.34%
建设用地	3.46	5.81	13.56%	7.67	6.38%
林地	1908.86	1915.31	0.07%	1945.15	0.31%
水域	1.58	1.91	4.18%	1.93	0.25%
未利用地	3.06	2.60	-3.06%	2.50	-0.74%

2. 研究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变化分析

据表 3.2012-2017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显示，该阶段草地主要流向林地 (28.37 km²) 和耕地 (9.69 km²)，未利用地向草地、林地转移规模仅 0.27 km²，反映生态修复工程的主导作用。耕地扩张以林地转换为主 (48.66 km²)，少量转出至草地、建设用地及水域 (分别为 3.02 km²、2.12 km²、0.4 km²)。林地净转出量达 70.67 km²，(转入草地 37.36 km²+转入耕地 33.31 km²)，但仅 0.15 km²直接转为建设用地，表明生态红线管控对林地保护的有效性。水域向其他地类转化规模极低 (合计 0.10 km²)，印证喀斯特水文系统稳定性。未利用地转化呈现多向性，其中 1.02 km²转为耕地，支撑农业增产需求。此阶段土地流转模式与贵州省“十二五”扶贫生态移民工程 (2011-2015) 高度契合，安置房建设带动的 0.08 km²未利用地转建设用地，与基础设施投资驱动的林地向耕地转化 (48.66 km²) 共同构成城镇化加速标志。同时，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专项的财政投入和退耕还林补贴促进林草覆盖度提升，实现 31.4%的石漠化区域生态修复。

据表 4，2017-2022 年土地利用转型优化重组呈现显著的生态导向型调整特征：草地转为林地规模增至 42.94 km²，耕地退林化达 23.16 km²，草地与耕地双向转换仅 7.24 km²，反映耕地质量保护与石漠化治理的协同强化。林地功能分化加剧，26 km²转为耕地与 10.25 km²转为草地，与荔波县实行高产农田整理和生态缓冲区建设相关，

体现土地用途管制的精细化。水域向耕地转化微幅增加至 0.11 km²，与樟江流域灌溉工程体系完善相关。建设用地持续扩张（年均增长率 7.2%）。本阶段与《贵州省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2018）形成强关联，通过耕地轮作休耕补贴（每亩 800 元）和森林生态补偿（公益林每亩 16 元）机制，实现 23.16 km²低效耕地转为生态林。同时，新型城镇化 2.0 政策（黔府发〔2019〕1 号）引导产业集聚，工业园区集约用地标准提升至 0.85 容积率，使建设用地扩张强度较前期下降 18.6%。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动的 0.11 km²水域-耕地转换，支撑百香果、铁皮石斛等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

表 3 荔波县 2012-2017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2012 年	2017 年						km ²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总计							
草地	88.97	9.69	0.00	28.37		0.27	127.30
耕地	3.02	266.26	2.12	48.66	0.40	0.72	321.18
建设用地			3.44		0.02		3.46
林地	37.36	33.31	0.15	1838.00	0.00	0.04	1908.86
水域		0.06	0.01	0.03	1.48		1.58
未利用地	0.14	1.02	0.08	0.25	0.01	1.55	3.06
总计	129.49	310.34	5.81	1915.31	1.91	2.60	2365.45

表 4 荔波县 2017-2022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2017 年	2022 年						km ²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总计							
草地	80.68	5.70		42.94		0.17	129.49
耕地	1.54	283.37	1.64	23.16	0.15	0.48	310.34
建设用地			5.81		0.00		5.81
林地	10.25	26.00	0.10	1878.95		0.01	1915.31
水域		0.11	0.00	0.02	1.78		1.91
未利用地	0.07	0.48	0.12	0.09	0.00	1.83	2.60
总计	92.54	315.65	7.67	1945.15	1.93	2.50	2365.45

3. 研究区“三生空间”标准差椭圆变化分析

本研究采用标准差椭圆模型，通过计算椭圆轴长、方向角及重心迁移距离，定量解析 2012-2022 年荔波县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化特征。由图 3-图 11 结果显示，研究时段内，研究区生态空间的迁移重心为东南方向，主要向朝阳镇迁移，生产空间重心迁移变化小，生活空间 2012-2017 年由西偏南方向转为 2017-2022 年向西北方向扩张。

(1) 生产空间：椭圆长轴由西南-东北向（2012 年 72.3 km）收缩为东西方向（2022 年 58.9 km），离散度指数从 1.8 降至 1.2，表明农业用地向县域中部集中。耕地重心在 2012-2017 年西南向迁移 1.5 km，其中未利用地转耕地 1.02 km²，2017 年后转向中部，特色农业园区高标准农田面积增加，体现土地整理项目对零散耕地的整合效应，土地利用效益得到提高。

(2) 生态空间：椭圆面积持续缩减（2012 年 128.4 km²，2022 年 102.7 km²），重心沿东南方向迁移 3.2 km 至朝阳镇，草地迁移轨迹短而集中（平均 1.1 km），林地重心向东偏北方向迁移 7.6 km，水域空间稳定性最高，迁移距离小于 0.5 km，反映荔波县对生态环境的进行了系统性的管理，全面提高了重要环境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以及质量水平，并且还还对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继续推进，切实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

(3) 生活空间：研究区椭圆面积扩张 1.7 倍（2012 年 45.2 km²到 2022 年 76.9 km²），重心从西南部县城核心区

跃迁至西北生态移民安置区, 新增建设用地 3.76 km²中 78%源自耕地转化, 凸显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城镇扩张路径依赖。体现了荔波县在已有的发展基础上, 对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进行协调, 建设注重以县城为主体的城镇化, 构建出田园乡村与现代城镇各具特色、有机结合的城乡发展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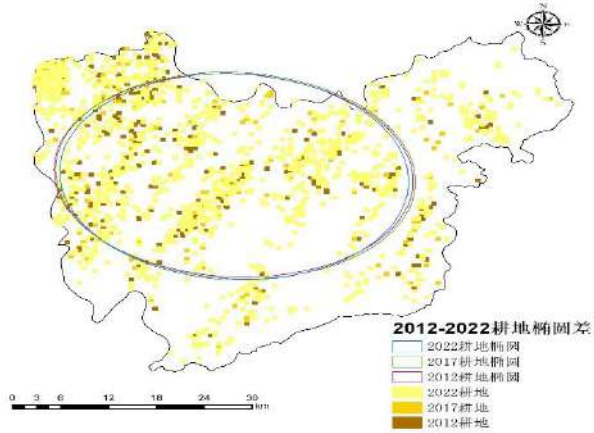


图 3 2012-2022 耕地椭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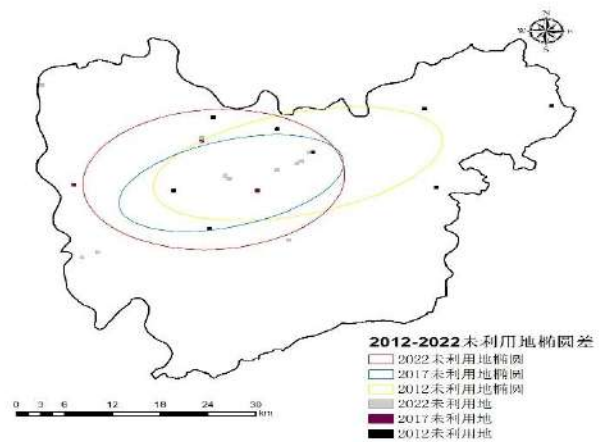


图 4 2012-2022 未利用地椭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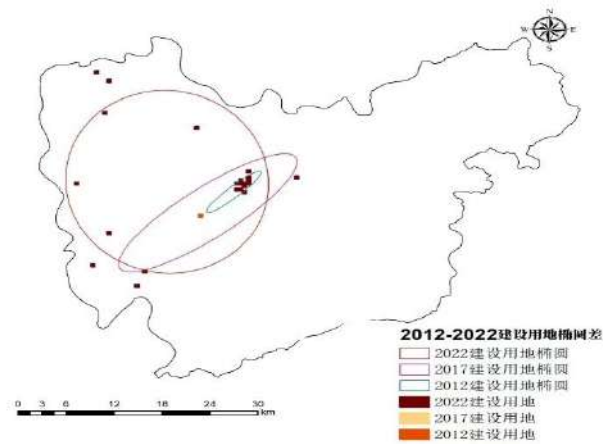


图 5 2012-2022 建设用地椭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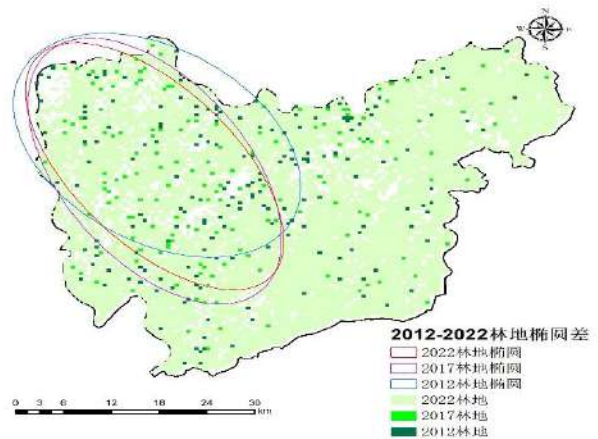


图 6 2012-2022 林地椭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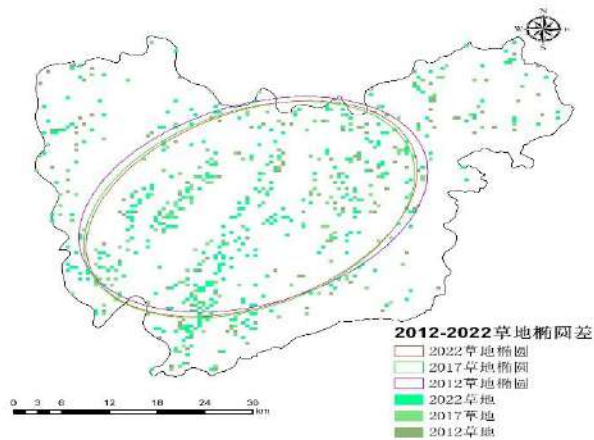


图 7 2012-2022 草地椭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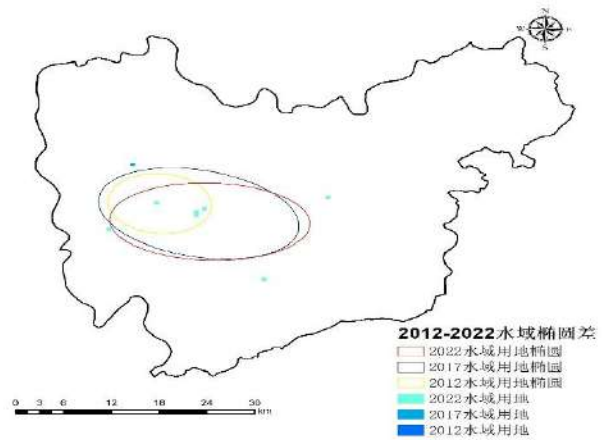


图 8 2012-2022 水域椭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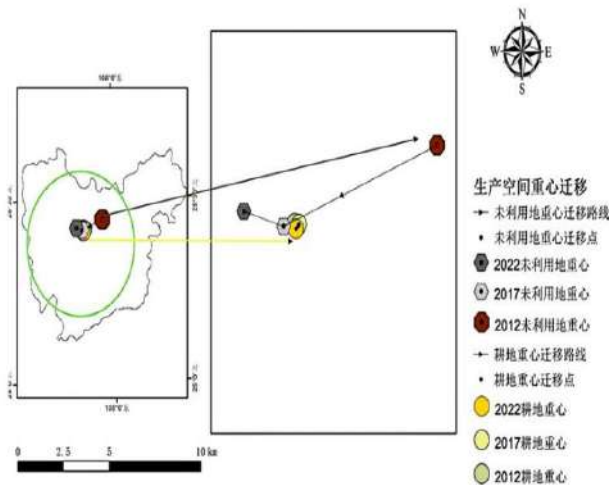


图 9 荔波县生产空间重心迁移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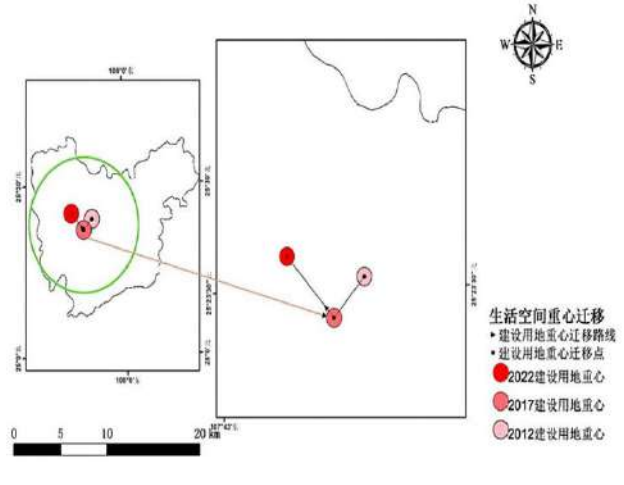


图 10 荔波县生活空间重心迁移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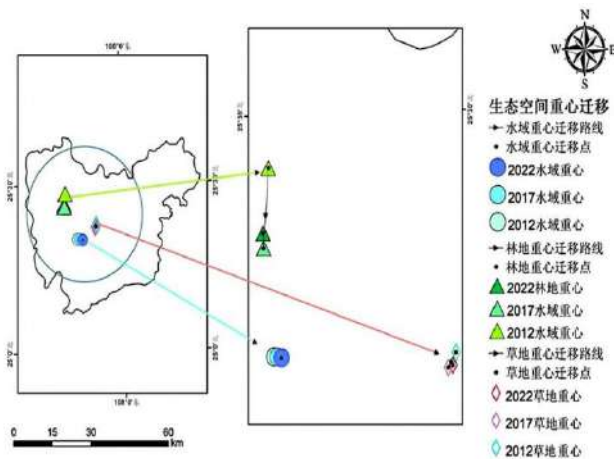


图 5.3.2.3 荔波县生态空间重心迁移路线

图 11 荔波县生态空间重心迁移路线

结论:

本文基于 2010-2022 年荔波县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土地利用变迁矩阵法以及典型的标准差椭圆形中心变迁模式，对 3 种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定量研究。本文对研究区用地面积变化和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类型迁移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过去 10 年来研究区六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研究表明，从研究区“三生空间”模式的时间和空间变化来看，其变化规律为：

(1) 荔波县的“三生空间”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很明显，主要是以生态空间为主导，次要的为以耕地为主导的生产空间，而面积最小的则是生活空间，但是其面积逐渐扩大。荔波县“三生空间”结构的整体结构是：核心区为以居住生活和生产空间为主，周边主要是生态空间。这表明，具有生态作用的绿色化、农业生产化绿色化程度在不断下降，但工业用地、建设用地、城乡生活用地却在不断上升。总体而言，城市住房的扩建将占用优质农业用地和生态空间，尤其是以玉屏街为中心，朝阳镇将向外扩张。

(2) 在荔波县，有利的土地利用经营空间是一个具有高度生态基础的生态绿地。从土地利用动态来看，城镇生活空间动态最高，草地生态空间动态最低。

(3) 荔波县“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方向是农业生产转化为城镇住房农村宅基地和产业发展，绿色生态空间转化为建制镇和生产，以及其他类型的土地利用空间会相互转换。

(4) 荔波县农业生产空间耕地重心迁移幅度变化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玉屏街道。城镇生活空间重心迁移方向大,由西偏南方向转向西北方向扩张。生态空间的迁移重心为东南方向,向朝阳镇迁移。

参考文献:

- [1] 王肖芳.基于 ArcGIS 的河南省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01):92-98.
- [2] 贺忠发,曹月娥,何浩天,等.2009 ~ 2020 年拜城县土地利用与“三生空间”时空变化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22,34(01):217-226.
- [3] 李伊黎,程严,付振华.广东省“三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J].地理空间信息,2022,20(12):104-109.
- [4] 张红旗,许尔琪,朱会义.中国“三生用地”分类及其空间格局[J].资源科学,2015,37(07):1332-1338.
- [5] 陈严武,余勇兵,覃照素,等.广西石漠化地区“三生空间”演化及情景模拟优化[J].环境科学与技术,2025,48(04):209-224.
- [6] 杨远瑶,王鹏,李梦灵,等.基于“三生空间”理念的居民感知对山地户外旅游发展态度研究——以四姑娘山为例(英文) [J].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25,16(02):569-579. [7]
- [7] 曾祥侠,周小恒.韧性视角下乡村三生空间评价研究[J].水利规划与设计,2025,(05):28-34.
- [8] 黄浩鹏,杨青娟.基于“三生”视角的乡村空间发展策略研究——以蒲江县铁牛村为例[J].城市建设,2025,22(07):34-36.
- [9] Li Y B , Hou J J , Xie D T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karst ecology in southwest China[J].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2, 22(3):365-370.
- [10] Hong song C , Yun peng N , Kelin W .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water and plant adaptation mechanisms in karst regions: a review[J].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3.
- [11] 李驭豪.喀斯特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下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研究[D].云南大学,2020.
- [12] 湛京华,杨志远.喀斯特山区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关系及碳排放——以铜仁市为例[J].绿色科技,2025,27(05):173-180.
- [13] 杨建强,简元菊,鲁媛媛.基于 ANN-CA 模型的喀斯特山区农村三生空间优化[J].农业与技术,2025,45(04):103-107.
- [14] 刘志,陈波,刘书璇.西南喀斯特“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以贵州省为例[J/OL].环境科学,1-17[2025-06-18].
- [15] 宋同清,彭晚霞,杜虎,等.中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时空演变特征、发生机制与调控对策[J].生态学报,2014,34(18):5328-5341.
- [16] 陈全,周忠发,闫利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以贵州省荔波县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09):1-6.
- [17] 欧惠,陈娟,戴文远.平潭岛“三生空间”格局演变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9,31(06):30-38+45.
- [18] 刘顺鑫,黄云.“三生空间”视角下万州区景观生态安全评价及其耦合特征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20,27(06):308-316.
- [19] 王秀兰,包玉海.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方法探讨[J].地理科学进展,1999,(01):83-89.
- [20] 徐岚,赵羿.利用马尔柯夫过程预测东陵区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J].应用生态学报,1993,(03):272-277.
- [21] 白雪,杜宾宾,姜亚莉.基于县域单元的广东省经济空间差异及演化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9,26(05):296-303.

GIS-Based Analysis of Land Us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in Karst Areas under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Framework: A Case Study of Libo County

Gao Wenping¹

¹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NanNing

Abstract: Based on land use data from 2012, 2017, and 2022 in Libo County,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PLES) classific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functional zoning principles. Utilizing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land use dynamic degree (K),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LCC),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alysis, we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land use patterns in Libo County during 2012–2022. Key findings include: (1) Significant structural shifts occurred in land use over the past decade, with more pronounced changes during 2017–2022 than in 2012–2017. Forest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expanded continuously, while cropland and grassland declined.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of land resources exhibited an upward trend. (2) Ecological space area initially increased before decreasing, production space decreased then rebounded, and living space expanded persistently. The encroachment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s upon ecological space has progressively destabilized the PLES structure. (3)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d centroid analyses reveal that the centroid of ecological space migrated southeastward, primarily toward Chaoyang Town*, whereas shifts in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 centroids were negligible. These dynamics are closely linked 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Keywords: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PLES); land use transition;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略论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

李碧波¹

(1.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有清一代, 广大晋商经商于新疆, 成为新疆历史上重要的商人群体。他们的活动成为新疆与中原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 是推动新疆经济的发展, 维护边疆安稳, 促进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清代; 新疆; 晋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14

明清时期, 晋帮商人活跃于中国商界。在明代, 晋商就与新疆地区的民族进行着茶马交易。到了清代, 晋商在新疆的贸易活动则进一步扩大。清代晋商作为新疆历史上重要的商人群体, 他们在推动新疆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就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进行重点论述。

一、清代晋商在新疆的主要活动

晋商作为清代较早进入新疆贸易的商人之一, 他们在新疆地区的贸易十分活跃。在新疆有战事的情况下, 晋商与官方合作, 负责运送粮草, 同时进行随军贸易。当新疆安定下来后, 晋商迅速投入到新疆的经济建设中来, 积极进行民间商贸活动。

(一) 晋商在新疆的随军贸易

在古代军事活动中, 粮草供应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而清代晋商最早在新疆的活动就是为清军运送粮草, 同时也为士兵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以便军需^[1]。

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在康熙朝便有记载, 彼时哈密清军的粮草供应就是“用山西、陕西小车三千辆, 每辆用车夫三名, 自嘉峪关至哈密”^[2]所述。到了雍正年间, 包括晋商在内的广大商民更是积极踊跃去哈密进行贸易。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时, 晋商范氏更是承担起清军粮草的运输任务, 并先后为清军捐输巨额财物。清政府为嘉奖范氏功绩, 特赐范毓麟“太仆寺卿, 章服同二品”^[3], 其弟范毓麟也得到重用, 先后担任千总、守备之职。同治三年(1864年), 绥远将军和山西巡抚受朝廷委派“宣谕口内商民前往伊犁等西北地区贸易, 以禅益军需”^[4], 晋商再次承担起为清军提供军需物资的重任。左宗棠收复新疆时, 许多商人便随军西征“赶大营”, 成群结队出西口, 而古城(奇台)“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 燕晋商人多出焉”^[5]。

(二) 晋商在新疆的民间贸易

除随军贸易外, 晋商也加大了在新疆地区的民间商贸往来。他们在新疆发展长途贩运贸易, 满足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对商品的需求。之后, 随着贸易的深入, 晋商又在新疆开展起了金融票号业务。

1. 发展长途贩运贸易

由于不同地区人民对物质有不同的需求, 晋商遂将丰富的中原商品运往新疆销售, 又将新疆的商品运回中原销售。据《新疆志稿》记载, 每年有价值二三百万元的商品从中原诸省运至新疆, 包括新疆所需的绸缎、茶叶、纸张及各类器物等。“燕晋商人多联结驼队, 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 其中由燕晋商从归绥所运至疆的货物就占十之六七^[6]。晋商用这些中原商品来换取新疆的皮毛、呢绒等农牧产品, 再运回中原进行贩卖, 极大满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需求。同时, 一部分晋商也抓住贸易机遇, 在新疆建设驼场, 大力发展驼运业。

在晋商所贩货物中, 茶叶是大宗货物。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 驻扎新疆的广大官兵, 还有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民, 每年都需要大量茶叶。道光年间, 仅南疆八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

作者简介: 李碧波(1996—),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喀喇沙尔、和闐八城)每年需茶至少二十余万封^[7],全疆对茶叶的需求量则更大。在众多商人中,晋商是将茶叶销往天山南北的主要力量。甘肃、新疆的茶叶一般由晋商承办,他们几乎垄断了整个天山南北的茶业,正所谓“昔承平之时,官茶引课,咸属诸晋商,谓之晋茶”^[6]。

除茶叶外,晋商还将大量绸缎布匹运至新疆售卖。因手工业落后,新疆各族人民普遍喜爱中原商人所贩的绸布,当地人称为“斜布”。当时晋商中的佼佼者“大盛魁”旗下的“天顺泰绸布庄”就经营各种绸缎布匹,分号遍及各地,远达新疆。它按新疆各少数民族对布匹的需要,购置了大量的斜纹布运往当地贸易,获利颇丰。除大的商行外,也有部分晋商小贩不远千里前往迪化贩布,山西县志里就记载曲沃的张本贯“贩布有积蓄,娶於迪,生子女”一事^[8]。另外,清政府也曾大量采购绸缎运至新疆,这其中还有不少是晋商所贩产自山西的绸缎。官方采购山西绸缎之事有惠于山西、新疆两地人民,“山陕所产绸缎纱绫,亦得于新疆一体销售,于该省等商民不无有益”^[9]。

2. 开办金融票号业务

嘉道时期,钱庄票号业务的开展作为晋商活动的坚实后盾,极大便利了晋商的商业往来,进一步开拓了晋商的经营版图,“新疆、满蒙诸地之贸易,鲜不为彼等所垄断”^[10]。随着晋商在新疆商业贸易的成功,金融票号业务在新疆也蓬勃发展起来。

早在票号设立之前,在新疆的晋商就经常帮各地驻军汇兑军饷。当时,各省的协饷必须先上缴至归化城交予转运局,再转发新疆各城。繁琐的交付过程造成军饷运解不及时,极大拖延了军饷的发放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各城驻军为了尽快拿到饷银往往会寻求商人帮助。他们提前在商人处获得银两,并开出票据,再由商人前往归化转运局领取。如同治四年(1865年),哈密驻军就与“古城镇广香义店商民兑支二千五百两”^[11],后由商人到归化粮厅收纳。光绪后期,山西平遥帮票号进军新疆商界,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蔚丰厚、天成亨、协同庆三家分号。分号经营民间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同时也承办“协饷”业务。至民国初年,迪化三家票号共存款113741两,放款852903两^[11],大大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除上述大宗商业活动外,晋商在新疆也开展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活动。他们通常在市镇开设店铺进行经营,且经营种类颇多,如开药店、饭庄、歇店、杂货店、酒铺等。除开铺经营外,部分晋商还开垦土地,贩卖瓜果蔬菜,伐木贩木等。总之,晋商在新疆的商业活动已经深入新疆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清代晋商在新疆活动的区域及其特点

清朝统一新疆地区后,越来越多的中原商人赴新疆贸易,天山南北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中原商人虽广泛分布于天山南北,但由于地形的阻隔,加之官方政策的影响,他们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晋商亦是如此。

(一) 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区域

在新疆的晋商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各个城镇,主要包括哈密、迪化、巴里坤、伊犁、叶尔羌、阿克苏等地。哈密作为新疆的东部门户,离中原较近,晋商一般从归化城出发,从蒙古南下到达哈密,“燕晋商人多出焉”^[6]。巴里坤一直都有晋商活跃,至清末“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12]。迪化城也有大量晋商活动,“山陕各处商贾之货,均聚迪化州城”^[13]。叶尔羌虽路途遥远,但它作为天山以南重要的商贸城市,也吸引了大量中原商人前来,“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14]。阿克苏亦是晋商在南疆经商的重要城市之一,山西介休人赵明珠就从阿克苏采购玉石到中原贩卖,忻州人卢英锐也“贾於阿克苏”^[15]。

此外,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区域也可以从他们入疆的商路上反映出来,晋商通过不同路线到达目的地后开始进行商贸活动。清代晋商入疆贸易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从太原过归化(今呼和浩特),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到达古城(今奇台)的路线被称之为北路;南路则是从归化出发,过乌里雅苏台到阿尔泰,再经哈密、吐鲁番到达喀什噶尔;西路则是从西安出发经兰州,由敦煌进入新疆到达于阕、叶尔羌。

(二) 晋商在新疆地区的活动特点

清代晋商广泛分布于天山南北,他们通常聚集在天山南北重要的商业市镇或屯田中心,并呈现出“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

1. 分布的广泛性

晋商作为新疆历史上重要的商人群体,他们一般活跃于哈密、伊犁、迪化、叶尔羌等著名商业市镇或屯田中心。事实上,晋商所踏足的远远不止这些地方,为了获取利益,他们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山西忻州商人是晋商赴新疆贸易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自乾隆时开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闐、叶尔羌等处”,行程万里“联肩接踵,毂击车驰”^[16]。商人在外经商通常会设立会馆,而清代晋商在新疆地区所设山西会馆就有六处,分设于迪化、巴里坤、奇台、焉耆、伊宁、塔城等地。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迪化、奇台、玛纳斯、绥定、塔城、承化等地依然建有山西会馆。清乾隆时,在交通不便的“南八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和闐八城),“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商民是南八城商民队伍的主体”^[17],亦可见当年晋商贸易深入之广泛。

2.呈“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

清代的晋商在新疆的地域分布呈“北多南少”的特点，即在天山北路经商者较多，在天山南路的则相对较少。一方面，受制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因素，天山南路较之于北路来说，与中原距离更远。北有天山，境内又有大漠，交通更为不便。无论晋商是从嘉峪关抵达哈密，还是从蒙古到达古城，再到新疆地区，都必须经过天山北路。要想抵达南路进行贸易，则需跨越天山或越过沙漠，这无疑增加了经商的风险。所以大部分商人止步于天山北路贸易，前往南路经商者相对较少。另一方面，造成“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更是与清政府的政策分不开。清朝在新疆的治理上呈现出“重北轻南”的特点，对于天山南路的治理重在维持社会的稳定，而非经济发展。乌什事变后，清政府认为在新疆“内地贸易商民渐多，所居与官兵相近，尚可弹压，不令生事。若与回人相杂，易滋事端”^[18]，所以下令商民只能在驻兵处进行交易，不得与回人杂处，满汉官民与当地回人分城而居。虽然减少了事端发生的机率，但也阻碍了晋商在天山南路经营活动的发展。

四、清代晋商对新疆发展产生的影响

清代晋商往来于天山南北，积极投身到与新疆有关的各类商业贸易活动中，成为沟通中原和天山南北的桥梁。他们既推动了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文化交流，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疆的安定。

（一）推动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在清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多伴随战争。天山南北的经济遭受了战争的破坏，城镇沦为片片废墟。但在清政府的苦心经营下，经济得以恢复，一座座繁荣的城市又被建立起来。随着城镇的重建恢复，晋商等中原商民在新疆的商业活动又推动了新疆城镇的发展和经济建设，带动了新疆地区的人口增长，加速了边疆城镇由政治军事性质向商业性质的转变。

从中原商人开始进入新疆以后，新疆各城镇经济发展迅速。巴里坤“城厢内外，烟户铺面，比节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11]。迪化作为北疆著名的商业城市，“市廛迤迁相属，肩磨毂击，比于吴会之盛”^[12]。伊犁则从昔日荒凉的边疆之地逐渐变成一大商业城市，“商民阗阗，民乐田畴，轮蹄懋迁，货殖平准”^[19]。阿克苏处于新疆南北交通要道，“内地商民，藩外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14]。喀什噶尔“商务之繁，人烟之庶比于省城”^[20]。叶尔羌城“市廛栉比，商务至盛”，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原商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14]。

（二）维护了新疆社会的安定

清朝在收复天山南北过程中，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原商民通过为军队提供、运输粮草和进行随军贸易，为清军的后勤保障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当天山南北收复后，叛乱偶有发生，边疆的安定受到威胁。进入新疆经营贸易的晋商则与当地人民风雨同舟，共同抵御外敌。他们也积极组织捐款，并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齐心协力保卫共同家园，维护了新疆社会的安定。

晋商巨贾范氏在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中多次承担运输粮草的重任，耗费颇多，“前后十年，运米凡百余万石，所节大司农金钱六百余万”^[21]。由他们所承担的运粮活动不仅让清军及时获得粮草支援，还节省了国库开支，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道光年间，张格尔在南疆发动叛乱，因清军未能及时赶到，当地的商人、民众自发组建商民团进行坚决抵抗。当叛众围困叶尔羌城时，晋商荆中璞兄弟二人担任商民团团团长，“制造战攻器械，率领数百人昼夜登陴巡城，固守相持数十日”^[8]，城破就义。他们用生命捍卫了祖国的统一，彰显了晋商维护新疆社会安定的决心。除了直接参与抗击侵略活动中外，晋商还积极组织捐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新疆社会的和平稳定。咸丰年间，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原商民纷纷慷慨解囊，捐助军饷。据相关档案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的叶尔羌捐输活动中，捐饷者三十二人，其中晋商有十六人，占比百分之五十。咸丰四年（1854年），又有六人为叶尔羌捐饷，晋商五人，占比百分之八十三。咸丰四年，晋商共五人为阿克苏捐饷，占当次捐饷者的百分之七十二^[22]。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清政府财政拮据，军饷往往得不到保证，晋商票号便源源不断地接济西征军，数额高达八百余万两^[23]。

（三）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既带来了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所需的各种商品、货物，又将其本身文化、习俗传至新疆；既满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需求，又丰富了边疆地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随着晋商在新疆商业活动的开展，中原与新疆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发展。

迪化富庶甲于西域，“故四方商贾，云集而麇至者日着众，大抵山右之客为尤多”，为“敦信义，而昭诚敬”，晋商聚集的商业重镇迪化、奇台等地均建有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会馆内奉祀关帝，也成为当地最大的关帝庙。于是，关帝信仰也随着晋商的活动得以进一步传入新疆，在新疆得到蓬勃发展。每逢节庆日、关帝生辰忌日，无论羁旅的人身在何方，在外的晋商都会按家乡的风俗习惯焚香祭拜一番，并在会馆外搭台献戏以供娱乐，借此以“敦桑梓之谊，庚雍睦之休者”^[24]，还逐渐演化出了“庙会”这一形式。每逢春节和一些节日，山西会馆都会组织本帮人进行社火表演，有汾阳大套、秧歌、高跷、高台，花鼓、龙灯、狮子、大头和尚、旱船等，这些精彩的活动深受各族群众欢迎。“社火作为一种春节期间表演的民间风俗活动，体现了中原汉族在新疆定居后的文化认同和聚合”^[25]。另外，山西的特产如陈醋、汾酒，还有如刀削面、过油肉等山西的美食也备受新疆人民青睐。正是晋商在新疆的重大贡献，促进了中原与新疆文化上的交流、交融，使得新疆社会生活深深打上了晋商和晋文化的烙印。

结语

有清一代,晋商频繁活动在天山南北与中原之间,加强了天山南北与中原的经济联系,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晋商在新疆的活动一方面活跃了新疆的经济市场,推动了新疆城镇的发展;另一方面,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文化上的交流、交融。此外,晋商对新疆的捐款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疆的安定。虽然晋商在向近代化转型中走向衰落,但他们在天山南北的稳定和巩固中的历史功绩不能磨灭。

参考文献:

- [1]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98,100-101.
- [2] 官修.清实录.清圣祖实录:卷 267[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620-621.
- [3] 赵尔巽.清史稿:卷 317[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734-10735.
- [4] 米镇波.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90.
- [5] 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卷 2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578.
- [6] 钟广声.新疆志稿:卷 2[M].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61-63.
- [7]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20.
- [8] 艾绍谦修,姚东济纂.续修临晋县志:卷 1[M].光绪六年刻本:85,77.
-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89-90.
- [1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8.
- [11] 史若民.票商兴衰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336.
- [12] 马大正、华立.新疆乡土志稿[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206.
- [13] 官修.清实录.清穆宗实录:卷 120[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649.
- [14]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 2[M].道光七年刻本:13-14.
- [15] 王轩、杨笃等.山西通志:卷 137[M].国家图书馆藏本:33—34.
- [16]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卷 63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04.
- [17] 华立.清代新疆社会变迁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103.
- [18] 官修.清实录.清高宗实录:卷 746[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213.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罕见史料汇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65.
- [20] 谢彬.新疆游记[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30.
- [21] 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04.
- [22] 郭娟娟,王泽民,刘建生.清代塞外贸的山西忻代商人[J].历史档案,2016,(03):80-87.
- [23] 史若民.票商兴衰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233.
- [24] 戴良佐.西域碑铭录[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380.
- [25] 张金晶.会馆与奇台社火[J].昌吉学院学报,2014,(05):14-19.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ctivities of Shanxi Merchants in Xinji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i Bibo¹

¹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Shanxi merchants engaged in business in Xinjiang, becoming an important business group in Xinjiang's history. Their activities served as a vital bridge for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Xinji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y we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Xinjia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taining border stability, and facilitat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Keywords: Qing Dynasty; Xinjiang; Shanxi merchants

“双减”政策下新东方战略转型的绩效研究

郭周琪¹

(1.河北地质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 2021 年 7 月, 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双减政策”。这一政策的发布, 无疑对众多教培行业造成了影响。新东方是深受这一政策影响的企业之一。为减轻这一政策对企业的冲击, 新东方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转型措施。鉴于此, 本文基于 SWOT 分析法, 总结新东方的战略转型措施, 根据新东方 2018 年至 2022 年财务数据, 从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两方面对其战略转型效果进行了研究。最终提出把握机遇、构建多元化收入、拥抱数字技术三条建议。

关键词: 双减政策; 新东方; 战略转型; 企业绩效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1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 随着社会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教育消费的持续增长, 教育培训行业经历了一段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 伴随而来的是课外培训负担过重、教育公平性问题日益凸显。2021 年 7 月, 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双减政策”——《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旨在减轻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 促进教育公平和高质量发展。这项政策的出台, 对以学科类培训为主的教育培训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迫使行业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重构。新东方作为教培行业的领军企业, 其业务模式和经营战略受到直接冲击, 不得不重新审视发展方向, 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以应对政策带来的挑战。

本文聚焦于“双减政策”背景下新东方的战略转型与经营绩效, 旨在通过分析新东方的转型路径、策略选择及其绩效变化, 补充和完善教育培训机构战略管理与绩效评价的理论框架, 为新东方及其他同类企业如何在政策压力下有效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适应性提供实践参考。

1.2 文献综述

自战略成本管理理念提出以来, 学者们对战略转型方面的研究颇多, 对战略转型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分布于各行各业。例如, 李淑楠等研究的是物流行业, 其以顺丰控股为例, 分析其战略转型的动因, 详细梳理了多元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绿色物流转型的战略转型路径, 分析了企业的财务绩效^[1]。胡查平等研究制造业行业, 其从网络嵌入性视角出发, 以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以及华中地区 225 家服务化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深入分析与制造企业不同接触程度的增值服务提供保持相对适应或匹配的特定价值嵌入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张瑞琴研究物联网行业, 其以小米集团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在物联网的时代下, 进行战略转型的动因和具体策略, 并对其战略转型策略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3]。

目前对于新东方战略转型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较少。其中, 徐菁利用事件研究法和财务指标法对其战略转型经营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度解析, 总结出新东方战略转型的成效, 并针对不足及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4]。李宁运用 PEST 和 SWOT 战略管理分析工具, 对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进行了分析, 最后结合企业的愿景和使命, 对企业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实施及保障措施提出了建议^[5]。

2. “双减”背景下新东方战略转型案例介绍

2.1 新东方简介

作者简介: 郭周琪 (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财务总监。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以下简称新东方），由俞敏洪先生于1993年在北京创立，起初以英语及海外考试培训起家，逐步成长为集教育培训、教育产品研发、在线教育于一体大型综合性教育集团。历经近三十年的稳健发展，新东方已从单一的语言培训学校扩展至覆盖学前教育至成人教育全年龄段的多元化教育服务体系。旗下品牌包括但不限于泡泡少儿英语、优能中学、新东方在线、东方优播等，不仅深耕英语培训，更在K12教育、国际教育、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等多个领域广泛布局，构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生态。

市场地位方面，新东方作为中国教培行业的领头羊，长期以来以优质的教学资源、卓越的教学成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占据行业前列。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在美上市的教育机构，标志着其国际化进程的里程碑。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新东方亦在国内多个城市设立了教学中心，影响力辐射全国，成为万千学子信赖的教育品牌。

面对2021年实施的“双减”政策，新东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调整业务结构，缩减K-9学科类培训，同时加速向素质教育、成人教育、直播电商等新兴领域转型，特别是“东方甄选”电商平台的推出，标志着新东方在教育与科技、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创新步伐，展示了企业强大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继续引领教培行业转型升级的新风尚。

2.2 “双减政策”对新东方的影响

2021年7月，中国正式实施“双减政策”，旨在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对校外培训行业尤其是K12学科类培训进行严格限制。这对于以K12学科培训为核心业务的新东方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政策实施后，新东方的主营业务受到重创，面临营收急剧下滑、市值缩水、人员裁撤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为应对政策冲击，新东方必须进行战略转型，寻找新的增长点。

2.3 新东方战略转型的过程及策略

面对“双减政策”带来的行业剧变，新东方迅速调整战略，启动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进程，以适应教育市场的新常态，以下是新东方战略转型的关键步骤与策略：

2021年，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新东方首先对旗下的K-12学科辅导业务进行了大幅调整，积极响应政策要求，有序终止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与此同时，新东方迅速调整业务布局，将发展重心转向不受政策限制的领域，如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国际教育及素质教育等，以减少政策影响，维持企业运营。

2022年，新东方在战略转型上迈出重要一步，利用自身教育品牌和师资优势，积极探索教育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推出“东方甄选”直播电商平台，将教育与电商直播相结合，不仅销售教育相关产品，还涉足农产品带货，借助教师团队的教育背景，打造知识性直播风格，实现业务模式的创新。这一转型策略不仅帮助新东方开辟了新的收入渠道，还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增强了用户粘性。

同年，新东方进一步强化线上教育平台，加大对数字教育产品的投入，优化在线课程内容，推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非学科类课程，如语言培训、职业技能提升、艺术与科学素养课程等，同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学个性化与学习体验，以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2023年，新东方深化教育科技融合，推出教育智能硬件产品，如智能学习设备、教育软件等，旨在通过科技赋能教育，提升教学效率与学习体验。同时，新东方加强与国际教育机构的合作，拓展海外教育资源，为有意向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更多服务与支持。

通过这一系列战略调整，新东方成功从传统的学科辅导业务转型为多元化的教育服务提供商，不仅在财务上实现了新的增长点，也构建了更广泛的业务生态，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4 新东方在“双减”背景下战略转型的SWOT分析

2.4.1 优势分析（S）

市场认可度高，品牌影响力强，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团队优秀，培训体系成熟。新东方凭借多年的教育经验，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知度。这为其新业务的推广和市场接纳提供了极高的信任基础，使得新东方在线在转型过程中能够迅速获得客户和市场的认可。新东方成立多年，机构培养出了许多为人所熟知的名师，例如王江涛、郑晶、李哲、董宇辉。也为新东方在成人教育、海外留学咨询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资金实力雄厚，财务状况健康，管理者风险管理意识强。新东方作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其资金实力较为雄厚。根据表1可知，新东方资产负债率水平处于正常水平，几乎没有长期应付款，应付账款均在一亿以下，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偿还债务绰绰有余。另外，自2003年新东方的财务危机之后，新东方创始人就决定公司账户的钱要足够退还学生的学费。可见新东方的风险管理意识较强，负债压力很小，财务状况较为健康。这为

新东方在战略转型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务支撑。

表1 新东方财务状况情况表

财务指标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资产负债比率	45.66%	56.23%	50.56%	37.14%	40.3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6.63 亿	11.49 亿	16.12 亿	9.151 亿	14.14 亿
应付账款	6976 万	2229 万	3844 万	3315 万	3406 万
长期应付款	0	0	0	1.179 亿	9646 万

2.4.2 劣势分析 (W)

新东方在“双减”政策背景下的转型过程中，其劣势主要体现在对传统 K-12 培训业务的过度依赖，这部分业务的缩减对公司收入和利润造成了直接影响。在企业转型期间，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和业务模式往往需要发生较大的变动。这些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运营效率下降和员工士气波动，进而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新业务领域的开拓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新东方在这些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尚未稳固，存在一定的市场适应风险。最后，家长和学生对新东方传统培训业务的认知根深蒂固，品牌形象的重塑和市场定位的调整也是其面临的难题之一。

2.4.3 机会分析 (O)

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大智移云”时代的到来为教育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其不仅优化了学习平台，增强了用户体验，还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学习方式的多元化。国家对高等教育、素质教育的重视，以及全球中文学习热度的提升，为新东方的留学咨询与中文教育业务开辟了广阔市场，尤其是海外华人教育需求的增加，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此外，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和经济的逐步复苏，教育支出和成人继续教育需求回升，也为新东方的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4.4 威胁分析 (T)

市场竞争加剧，行业内诸如好未来、猿辅导等竞争对手也在积极寻求转型，加之众多新兴教育科技企业和跨界企业家的涌入，使得如素质教育、成人教育等新业务领域市场迅速变得拥挤，竞争压力陡增。此外，电商直播领域虽然为新东方打开了新的业务窗口，但该领域同样竞争激烈，且产品同质化严重，若不能持续创新内容和模式，很容易陷入价格战和流量争夺的红海。另外，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直播电商中假冒伪劣商品和盗版课程的盛行，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也对正规企业品牌信誉构成威胁，增加了新东方在线在电商领域的法律风险和品牌维护成本。

3. 新东方战略转型前后绩效变化分析

3.1 财务绩效分析

3.1.1 盈利能力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自“双减”政策后，新东方的盈利能力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其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率分别由 2020 年的 5.38%、8.75%、16.23% 下跌至 2021 年的 -39.30%、-27.56%、-14.68%。而后，在 2022 年，其盈利能力由有所回升，又分别恢复至 7.85%、4.85%、2.85%。根据新东方年报可知，新东方的大学教育及直播电商业务在 2022 财年取得了显著增长，其中直播电商的 GMV 达到 48 亿元，自营产品收入超过 10 亿元。可见，新东方业务结构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绩效，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见新东方的战略转型取得了初步成效。

表 2 新东方盈利能力变化

财务指标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收入	29.98 亿	31.05 亿	42.77 亿	35.79 亿	30.96 亿
毛利	15.88 亿	13.51 亿	22.40 亿	19.90 亿	17.20 亿
销售净利率	7.85%	-39.30%	5.38%	9.92%	7.36%
净资产收益率	4.85%	-27.56%	8.75%	16.23%	10.94%
总资产净利率	2.85%	-14.68%	4.00%	7.38%	5.52%

根据表 3 可以发现，同行业的好未来企业，2018 年后其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一直先呈现负值，且同样在“双减”政策后出现断崖式下跌，至 2021 年，其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跌至 -26.52%、-24.61%。虽然在 2022 年有所回转，但相比于新东方的由负变正的增幅来看，好未来要逊色于新东方。可见，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新东方的战略转型较为成功。

表 3 盈利能力同行比较

	新东方	好未来
--	-----	-----

	销售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销售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2022	7.85%	4.85%	-12.94%	-3.44%
2021	-39.30%	-27.56%	-26.52%	-24.61%
2020	5.38%	8.75%	-3.18%	-3.01%
2019	9.92%	16.23%	-3.90%	-4.41%
2018	7.36%	10.94%	14.22%	17.89%

3.1.2. 偿债能力分析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来看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越高,其短期偿债能力越强。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表4可知,新东方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指标在2019至2021年成上升趋势,在2020年有所回落,但高于2018年至2020年。其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可见新东方短期偿债能力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在2021年短期偿债能力最强。其长期偿债压力有所减轻。新东方在合理范围内确保了企业在转型期间的偿债能力的稳定,为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务基础。

表4 新东方偿债能力变化

财务指标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流动比率(倍)	1.96	2.62	1.89	1.52	1.73
速动比率(倍)	1.94	2.6	1.88	1.5	1.71
资产负债率	40.32%	37.14%	50.56%	56.23%	45.66%

根据表5可知,好未来的短期、长期偿债能力均逐年递增。且同样在2021年实现较大的能力跨越。对比两家企业可知,新东方的偿债能力虽然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偿债能力要低于好未来。

表5 同行偿债能力比较

	新东方			好未来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2022	1.96	1.94	0.4032	4.42	4.37	0.1912
2021	2.62	2.6	0.3714	4.02	4	0.2125
2020	1.89	1.88	0.5056	2.42	2.41	0.5703
2019	1.52	1.5	0.5623	1.38	1.37	0.5433
2018	1.73	1.71	0.4566	1.47	1.47	0.3225

3.1.3. 营运能力分析

应收账款周转率反映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水平、对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存货周转率反映企业销售能力及存货管理水平。总资产周转率则反映企业投入产出的利润周转率。新东方的存货包括教材以及出版的书籍,加入电商平台后的农产品,不包括课程资源。

由表6可知,新东方的应收账款周转率逐年递减,且在2021年呈现较大的跌落。其存货周转率波动较大,在2020年达到峰值,说明存货在2020年最多。存货周转率在2022年出现较大的下降,下降至34.97次,这可能是因为公司在采购和生产环节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过度采购或生产过剩等。其总资产周转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且在2021年出现较大跌落,在2022年又有所回升至0.48,虽然这个数值仍然较低,但至少说明企业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运营效率。总的来看,新东方在过去几年里的营运能力出现了下滑迹象,主要表现为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存货周转率降低和总资产周转率偏低等问题。

表6 新东方营运能力分析

财务指标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21.11	247.46	665.87	957.12	955.85
存货周转率(次)	34.97	59.37	65.18	52.64	39.76
总资产周转率(次)	0.48	0.38	0.51	0.64	0.72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2.97	1.45	0.54	0.38	0.38
存货周转天数	10.3	6.06	5.52	6.84	9.05
总资产周转天数	746.18	938.23	703.24	563.51	501.33

3.1.4. 发展能力分析

本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来衡量新东方的发展能力。由表7可知,新东方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从2018年至2021年呈下降趋势,其中在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变为负值,而后在2022年,其营业收入增长率又缓慢回升。营业利润增长率在2020、2021年为负,且在2021年有较大的跌落,而后在2022年又迅猛回升。总资产增长率同样是在2021年跌至最低点,而后在2022年逐步回升,由负转正。由此可见,2021年的双减政策对新东方造成了较大的营销,致使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全部跌至低谷。新东方开辟的企业新赛道——素质教育、国际教育、电商直播领域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新东方在2022

年扭亏为盈。由此可见，从发展能力来看，新东方公司的战略转型也较为成功。

表7 新东方发展能力分析

财务指标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营业收入增长率	-0.03	-0.27	0.20	0.16	0.27
营业利润增长率	1.19	-9.38	-0.71	0.31	0.16
总资产增长率	0.06	-0.41	0.55	0.41	0.17

3.2 非财务绩效分析

3.2.1 市场地位与品牌影响力

新东方在“双减”政策实施后，通过快速调整战略方向，涉足电商直播领域，特别是“东方甄选”平台的推出，成功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不仅体现在短期内的市场关注度提升，更重要的是，新东方的品牌形象从传统的教培机构转变为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品牌转型期间，新东方借助直播带货的热度，尤其是双语直播的独特模式，以及董宇辉的满腹诗书的直播带货方式，有效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这种正面的品牌重塑对非财务绩效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3.2.2 业务模块拓展创新，提升客户满意度

在战略转型过程中，新东方调整服务内容，推陈出新，推出新的业务模块。例如加强成人教育、海外留学业务及素质培养课程，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再如“东方甄选”电商平台销售，以新颖的教学带货模式销售直播，销售高质量好货。这些新业务的推出都赢得了新客户群的青睐，让新东方跨界抢占市场，拥有了更多的客户群体，提升了新东方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

3.2.3 优化人才结构，培育电商人才

新东方在转型过程中，注重核心人力资源的培养与补充，例如其在电商直播领域，积极构建“电商学院”以培养专业人才，进而增强了内部团队的凝聚力，并达到提高企业对外界的吸引力的作用。通过优化人才结构，新东方提升了整体团队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为转型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3.2.4 技术与创新

新东方在转型中展现了较强的创新能力，比如在线教育平台的持续优化、直播电商的探索以及教育技术的研发投入，这些都提升了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和市场适应性。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和产品迭代，新东方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持续创新，满足了市场的新需求。

总的来看，新东方的战略转型在财务绩效、客户满意度、人才团队建设和市场适应性等方面均显现了积极成效，尤其在电商直播等新业务领域的成功探索，为公司开辟了新的增长点，也对教培行业其他企业的战略转型提供了宝贵经验。尽管转型过程中面临财务风险、业务模式调整等挑战，但新东方通过及时调整策略、优化资源配置，展现了良好的转型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为其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未来，新东方还需持续关注新业务的稳定性与成长性，加强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以进一步稳固转型成果。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在复杂的内外部竞争环境中，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面对“双减”政策的严峻考验，其战略转型不仅是对市场压力的积极响应，也是企业求生存、谋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国内教培市场的急剧变化和国际教育品牌的竞争加剧，新东方通过战略调整，成功地从传统学科培训向素质教育、成人教育、海外留学服务及新兴的电商直播领域拓展，这一系列变革有效抵御了政策冲击，扭转了业务萎缩的不利局面。

根据财务绩效分析部分可知，自2021年实施战略转型以来，新东方的财务绩效显著改善。通过财务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新东方的财务结构得以优化，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如业务重心的转移带动了新的收入增长点，如直播电商板块的快速增长，为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盈利渠道。此外，新东方在非财务绩效方面的提升也不容忽视。通过战略转型，新东方成功重塑了品牌形象，从单一的教培机构转型为教育与科技、文化相结合的多元化企业，提升了公众和市场的认可度。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的提升，加之新业务的创新性与市场接纳度，都显示了新东方在战略转型中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和快速适应能力。

可见，新东方的战略转型不仅在财务绩效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改善了盈利结构，增强了企业的财务健康度，而且在非财务层面也实现了品牌重塑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这一系列积极的变化，不仅为新东方自身开辟了新的

发展空间,也为教育行业其他企业提供了战略转型的成功范例,验证了在面对外部环境剧变时,企业主动求变、积极转型的战略决策对于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4.2 启示与建议

把握机遇,创新发展,乘风而上。正所谓“站在风口,猪都能飞上天”。在如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行业以及直播行业发展如火如荼的情况下,新东方打破以往的传统教育形象,让名师带货,以边学知识边购物的逗趣方式,吸引消费者目光,为新东方带来一大波流量。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流量便是财富。董宇辉满腹诗书的带货方式也为新东方打造了独特流量,在一众直播间中脱颖而出,形成新东方的独有特色。当然,主播的销售口才只是辅助,真正的让消费者买单的还是直播间的品质质量。正是流量与质量的完美结合、机遇的把握、创新的直播方式,才让新东方在直播带货赛道转型成功,最终在电商领域乘风而上。

适应政策,构建多元化收入来源。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新东方积极求变。主动适应政策变化,灵活调整业务布局,迅速调整业务结构。从传统的学科辅导企业转变成为包含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直播电商等多元化赛道的企业。多元化的战略方式,不仅帮助新东方抵御了“双减”政策对教培行业的冲击,还帮助新东方更上一层楼,帮助企业扭亏为盈,提升了自身的盈利能力。

紧随互联网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完善企业服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数字化”、“智能化”等名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新东方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仍然积极拥抱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打造了使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的“东方科创”、“东方慧教”品牌,加大了在线与数字化课程开发,构建了OMO教学模式。紧随时代变化,才能助力企业拥抱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 [1] 李淑楠,张国富.战略转型视角下企业财务绩效研究——以顺丰控股为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4(08):163-165.
- [2] 胡查平,冉宪莉.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转型绩效——网络嵌入性视角的解释[J].科技与经济,2021,34(02):71-75.
- [3] 张瑞琴.物联网背景下企业战略转型及其评价研究[D].内蒙古财经大学,2023.
- [4] 徐菁.“双减政策”下新东方战略转型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D].南昌大学,2024.
- [5] 李宁.“双减”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战略转型发展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24.

Performance Study on New Oriental'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Zhouqi Guo¹

¹Hebei University of Geolog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China

Abstract: In July 2021,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jointly issued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issuance of this policy undoubtedly impacted numerou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dustries. New Oriental is one of the enterprises deeply affected by this policy.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this policy on the enterprise, New Oriental adopted a series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measures.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summarizes New Oriental'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measures and studies the effects of it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from both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perspectives, using financial data from 2018 to 2022. Finally, thre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seizing opportunities, building diversified revenue streams, and embracing digital technology.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New Oriental;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基于天文与物候的二十四节气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

宋婷杰¹ 王惠¹ 杜泽鑫¹

(1.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二十四节气, 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达了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的时间观念, 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 对它的传承和发扬, 不仅是对文化自信与自觉的践行, 也为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机遇。本文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文化载体, 围绕“天文密码”与“物候新语”双重主题, 展开对节气文化在当代信息可视化语境下的设计实践与理论研究。通过天文历法中的节气划分逻辑与物候物种对应规律进行可视化转译, 结合现代图表语言、视觉图形、色彩表达和文创延展, 旨在提升传统节气的传播效率与文化感染力, 实现节气文化由“知识传播”到“视觉体验”的跨越。设计中融合数据图谱、动物象征、节令演化及动态信息转换, 以图形结构讲述时间与自然的互动逻辑, 探索中华文化的时空智慧。

关键词: 二十四节气; 天文; 物候; 信息可视化设计; 文化内涵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49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 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增添了自信和自豪。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增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还能增强民族认同感, 加强民族团结, 对促进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它是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地域文化、情感寄托、哲学观念和科学知识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 也是指导古人生活、耕作、养生的行为准则^[1]。

在数字媒体环境不断演进的背景下, 传统文化面临转化传播的现实需求。如何通过可视化设计手段将“二十四节气”这样具有结构逻辑和知识密度的文化体系进行有效表达, 已成为视觉传达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信息可视化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作为一种以数据结构和图形语言表达为核心的跨学科设计方法, 在提升信息表达效率、增强用户理解力和美学体验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2]。

当前二十四节气的传播主要集中在插画、民俗节庆活动、文创产品等图像叙事层面, 信息逻辑性较弱, 难以系统体现节气的天文结构、物候链条与生态节律。因此, 构建具备科学性、系统性与传播性的节气信息可视化表达体系, 不仅是设计学科对传统文化转译的一种回应, 也是一种知识视觉化与文化再生的创新实践路径。

一、相关概述阐释

(一) 二十四节气的天文基础

二十四节气的确立基于古代中国对太阳周年视运动的长期观测, 是以黄道坐标系统为基础构建的科学时间体系。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所形成的黄道在天球上划出 360 度的轨迹, 古人将其划分为 24 等份, 每 15 度对应一个节气节点。这种划分方法将太阳黄经与时间结构直接关联, 精确地反映出一年四季的气候变迁与自然节律。

早期的天文测时技术, 如“土圭测影”和“昏旦中星”等手段, 使古人得以较为准确地推算出“二至二分”四个关键节点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根据《尚书·尧典》与《淮南子·天文训》的记载, 二十四节气不仅具有时间定位功能, 也蕴含着古人“观象授时”“顺天应时”的宇宙观与时间观。西汉时期, 通过北斗七星的方位、恒星中天位置等标准进行节气定标, 最终形成系统化的节气体系。其结构既是历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古代农业社会对自然节律的时间编码方式。

作者简介: 宋婷杰(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可视化视觉传播;

王惠(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杜泽鑫(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二）二十四节气的物候体系

物候作为二十四节气的核心组成，是古人通过长期自然观察总结出的自然物象变化规律，是反映天地气候与生命活动相互作用的动态指标。《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夏小正》等文献对物象与时令的记录，为我们理解节气与物候间的复杂耦合关系提供了丰富文献支持。节气不仅仅作为时间节点，更承担着物候观测的基本单位，使人们能够通过自然万象的变化掌握农事时机与生活节律。

每一个节气按照“五日为一候”的方式，细化为三候，统称“七十二候”。每候记录典型的生物或自然现象，如“白露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惊蛰三候：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这些候应内容从动植物行为、天象变化、水气气候等方面，全方位刻画出自然节奏与生态变迁的对应关系。其背后承载的正是古人“以观自然而调生息”的实践智慧。

（三）信息可视化相关概述

信息技术的发展，用可视化设计的方式，通过将丰富的数据图表结合优秀的图形创意表现，可以将信息更好将进行传达。首先需要了解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基本信息、分类，然后明确其基本原则与表现形式与方法。信息可视化设计是以视觉的方式表现信息、数据的关系，将大量复杂信息和枯燥的数据进行可视化转化，形成丰富的视觉语言的一种设计形式^[3]。

日本木村博之在《图解力：跟顶级设计师学作信息图》中将信息可视化的形式分为图解、图表、表格、统计图、地图和图形符号。

按信息与数据关系，信息可视化主要分为两类：信息图设计与数据图表设计。前者侧重图形创意，适用于信息维度多、需强化视觉表达的情境，如图解、地图和符号图；后者则以图表、表格、统计图为主，适用于大数据量的信息结构表达。信息图设计直观、易读，但受限于编码容量；而数据图表虽在美学上较弱，却能承载更多复杂数据。

（四）二十四节气天文与物候与信息可视化设计

二十四节气天文与物候文化信息可视化设计聚焦文化内涵与视觉符号的构建，结合图形创意与艺术表现，探索节气文化的现代转译与传播路径。其主要特征包括：

(1) 信息架构的丰富性：通过灵活组织视觉元素，构建多样化的版式结构，使不同节气信息以差异化方式呈现，增强视觉节奏与艺术表现力，避免视觉疲劳。

(2) 信息解读的流畅性：合理划分节气内容的从属关系，建立清晰的信息逻辑，优化阅读流程，提升文化信息的整体传达效率。

(3) 信息感知的创新性：转化传统文本阅读方式，通过图形转译、留白设计与视觉引导等手段，增强受众的信息体验与趣味性，提升文化信息的接受度与吸引力。

同时，节气可视化设计在文化承载量大和信息语言丰富上有显著优势，第一，通过图形整合大量节气相关知识，增强文化表达深度，提升其现实意义与传播价值；第二，借助多样化的视觉手法与图形语言，构建信息与视觉的融合表达，拓展节气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渠道。

二、二十四节气天文与物候信息的可视化设计策略

二十四节气凝结了中华传统对天文运行与自然生态的深刻认知，其视觉表达不仅承载文化信息，还应传达时序逻辑、生态节律与文化意象。将节气的“天文密码”与“物候新语”进行信息可视化，必须在设计策略上形成体系化的处理路径，以实现科学性、艺术性与传播性的统一。本章从整体设计构思出发，系统探讨节气天文与物候信息的图形转译逻辑、结构设计原则与视觉语言构建策略。

（一）天文编码策略：从时间节律到视觉编码

二十四节气的核心基础源自对太阳周年视运动的精确观测。中国古代通过测定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置，确立了“以黄经十五度为一节”的时间划分方式。每年太阳自春分点起始运行一周，历经 360 度，共分为二十四个节气节点。节气因而成为具备天文学基础的时间制度系统，具有高度规则化、周期化和秩序化的节律特征^[4]。

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节气所体现的“时间节律”是构建视觉语言体系的重要逻辑依据。设计策略的关键在于将这一连续、循环、分段的时间体系转化为清晰、可读、可识别的视觉结构，实现“时间—视觉”编码之间的转译关系^[5]。

第一，在结构形式上，可采用环形时间模型或螺旋轴线结构作为视觉基础框架。环形结构能够有效表现节气

的周期性与对称性，将全年 24 节气沿黄经顺序排列于圆周之上，突出其天文逻辑的均等性与循环性。螺旋结构则更适合表达节气与时间推进的线性叠加关系，强化视觉上的节奏感与时间延展感。

第二，在节点设计方面，每一个节气可作为一个独立的信息单位进行编码，包含节气名称、对应黄经角度、公历时间以及天文特征。通过图形化的标识（如太阳运行轨迹、昼夜比例示意等）呈现节气时间点在一一年中的具体位置与天文特性。例如，“夏至”节点可使用最长日照、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图像表达；“春分”则用昼夜均分的图形语言体现时间平衡感。

在视觉语言系统中，应依据天文属性设计统一的编码方式，例如采用刻度线系统表示黄经角度变化，色彩渐变带表示光照强度变化，曲线图叠加气温或日照时长变化趋势，进而形成“定量+定性”的复合表达层级。这样的信息结构既科学严谨，又具备可视吸收的清晰路径。

总体而言，天文节气的信息可视化不仅是将时间节点图像化的过程，更是构建“时间—结构—视觉”三位一体表达系统的过程。通过合理的图形设计策略，可将复杂的黄经节律转化为清晰直观的视觉语言，进而实现节气文化中“观天知时”的智慧传承。

（二）物候编码策略：节气中的生态可视语言

在二十四节气信息可视化中，动物作为物候观测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象征性、生动的视觉特征以及清晰的时间指向性。将节气与动物行为进行视觉关联，不仅有助于直观传达节令变化，还可构建出富有文化意味与教育价值的图形系统。

节气中的动物物候信息主要来源于《七十二候集解》《月令七十二候集注》等古籍。例如，“惊蛰”之初候为“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白露”之三候为“群鸟养羞”；“大雪”候中出现“虎始交”与“荔挺生”等动物行为。这些具体行为反映了古人对生物活动与气候规律间高度敏感的观察力^[6]。

可视化设计中，应当将这些动物物候行为信息转译为图形识别度高、符号化程度强、形象感明确的插图体系。具体策略包括：

1. 图形样式：采用写实风格插画表现节气动物（如蚂蚁、白鹭、青蛙、燕子等），强调其外形特征与行为动态，增强生态真实感；

2. 图形动作：根据“鸣叫、迁徙、蛰伏、求偶”等候应行为，设计具有动作感的姿态，增强信息识别的时间性与故事性；

3. 组合展示：以“节气+三候+三种动物”构建一个小型视觉单元，便于在年历、长图、互动界面等中嵌套使用；

4. 通过对动物形象进行系统化图谱设计，构建起一套具备知识性、系统性与延展性的节气动物视觉库，为教育传播、科普展示与文创衍生提供图形资源基础。

这种基于动物行为的物候视觉转译，不仅延续了节气文化中“以动观时”的传统智慧，也为可视化设计赋予更多生态观察维度与文化温度。

三、二十四节气天文与物候信息的设计实践

基于前文对二十四节气天文节律与动物物候特征的可视化策略研究，本章将重点探讨信息转译在视觉创作中的具体实践路径。从设计语言的提炼、视觉元素的构建，到图形系统的应用与整合，均围绕“天文密码”与“物候新语”的主题展开视觉化设计实验，力求在科学性、文化性与艺术性之间取得平衡，实现二十四节气文化在当代表达语境中的创造性转译。

（一）二十四节气天文与物候信息的设计理念与流程

1. 设计理念

本设计以“天文密码与物候新语”为核心概念，意在通过可视化方式呈现二十四节气的天文结构与动物物候信息，建立起兼具知识性与审美性的视觉表达体系。整体设计理念融合了科学逻辑、文化解读与艺术表达三重维度：一方面，以节气所承载的黄经节律为时间骨架，构建严谨的时间编码系统；另一方面，围绕每个节气中的三候物象，特别是候应动物行为信息，提炼其生态特征与文化象征进行视觉化表达；最后，在图形风格上采用写实插画与图形符号相结合的方式，平衡信息准确性与审美感染力，强调知识的趣味化转译与系统化组织。

2. 设计流程

设计流程依循从文化解读到图形系统构建的层层递进路径。首先，广泛查阅并整理《七十二候集解》《月令七十二候集注》《淮南子·天文训》等古籍资料，提取出节气所对应的天文定位与候应动物行为信息，形成初步

的信息架构模型；其次，围绕节气时序逻辑构建统一的视觉框架，确定以圆环时间轴呈现节律结构，以“节气+三候+图解”构成信息展示单元；再者，结合每个节气中代表性动物的生态特征进行写实插画创作，通过生动的动作设计和色彩表达增强节令辨识度；最后，进行整体的页面排版与模块组合，确保视觉节奏与内容层次的统一，并针对不同媒介进行适配设计，为后续的数字传播与文化衍生提供基础。

这一设计路径不仅注重信息的整理与归纳，也强调视觉语言的系统构建和创作过程的文化嵌入，体现了传统节气文化在当代表达语境中的设计再生可能。

（二）二十四节气天文与物候信息的可视化呈现

1. 天文信息主图设计

天文信息主图以“节气时间节律”为核心线索，通过构建可视化时间轮廓，呈现二十四节气的天文逻辑与循环秩序。整体设计采用环形时间轴结构，将太阳黄经 360 度轨迹分为 24 等分，每 15 度为一节气节点，构建出一年周期的时间闭环。该图作为“天文密码”的可视表达载体，意在传达节气制度中“以天为令、观象授时”的科学理念。

视觉中心布置为太阳运动轨道示意，外环为节气节点分布与名称标识，每一节点配有黄经数值、公历时间、昼夜时长变化趋势等天文参数信息。通过色带渐变与动态箭头强化太阳运行路径感，同时以对称设计突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四季节律节点，体现节气系统的平衡美与结构理性。

色彩方面，选择红、绿对比配色，环绕布置，形成清晰的时序节奏感。此外在细节处引入“光照时间曲线”“昼夜比值图形”“阴阳转折图式”等可视辅助元素，使天文数据更加直观生动，既满足科学准确性，又增强信息吸收效率。

整体图面逻辑清晰、节奏严谨，既适用于教育场景的科普传播，也具备展览展示的美术表现力，是节气时间信息在视觉语言中的系统性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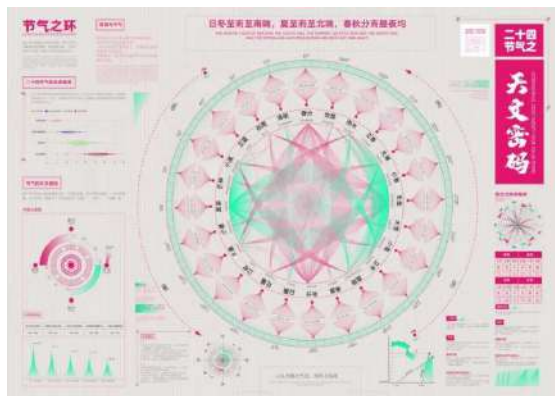


图 1 天文密码信息可视化设计

2. 物候信息主图设计

动物物候信息主图聚焦于二十四节气中的典型候应动物，通过图形化方式表达节令变迁与生态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该图作为“物候新语”的图形化表达平台，旨在呈现“天时变化—物类应时”之间的文化逻辑与视觉关系。

图面结构同样以时间环为框架，但重点由天文数据转向动物行为信息的视觉分布。每个节气以模块化信息单元呈现，内容包含节气名称、三候动物图示、候应行为说明与图形符号构成。每组三候信息均附有写实风格插图，表现动物的典型生态动作（如鸟鸣、南飞、蛰伏等），强化物象与时间节律之间的直观对应。

中央主体部分绘制大型代表性动物（如白鹭、仓庚、黄鹂、松鼠等），作为视觉焦点元素。图像采用数字手绘技术，风格偏向科学插图与文艺插画的融合，强调真实生态形态的同时保留文化表现力，增强画面的故事性与感染力。

色彩系统统一延续天文图色谱逻辑，不同节气配以差异化底色背景，增强辨识度。构图上借助放射状视觉引导线，将观者视线引入每一个节气节点，使“节气—候应动物—文化寓意”构成有机信息链。

该主图既作为生态知识图谱，也具备独立视觉表达能力，适用于文化年历、儿童教育图册、展览图墙等多种形式的传播与应用，是本项目中文化性与美术性高度融合的代表性成果。



图2 物候新语信息可视化设计系列一



图3 物候新语信息可视化设计系列二

(三) 二十四节气天文与物候信息可视化的衍生推广设计

在完成核心信息主图设计的基础上，本项目围绕“二十四节气天文与物候视觉系统”的核心视觉资产，进行了一系列衍生产品的开发与传播策略延展，意在实现节气视觉信息的跨媒介输出与文化价值传播。这些延展设计不仅拓宽了节气可视化成果的应用范围，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科普教育、公共传播与文创市场中的实用性与社会价值。

1. 日历推广设计

节气日历作为日常时间载体与文化传播媒介，是本项目的重要衍生方向。设计采用单页式模块化排版结构，每页对应一个节气，包含节气名称、日期、公历/农历对照、三候动物插图与简要物候信息说明。主视觉部分选用写实插画表现候应动物，以生态动态与节令对应行为为核心线索，构建出时间与物象的双重叙事逻辑。

日历设计在色彩上延续主图色谱系列设计，增强整体的系列感与视觉记忆力。整体形式可作为挂历、翻页台历或数字滑动日历等多种形态进行呈现，具备高度可适配性与使用频率，适合办公、家庭、校园等多元场景使用。



图4 日历文创设计

2. 邮票推广设计

在文化传播路径中，邮票作为具有收藏价值与传播广度的国家媒介，其视觉表达承担着高度文化符号功能。本设计以“物候新语 × 节气节点”为基本单位，创作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邮票插画系列，每枚邮票对应一个代表动物形象，搭配简约文字说明与文字元素，形成“节气信息-动物”二维信息图谱。

插画延续写实风格，使用统一的红绿主调对比增强整体性与印刷适应性。邮票边缘以齿孔图框处理，增强真实感与媒介象征性。整套邮票不仅适用于集邮文创，也可应用于文具、包装、纪念品等拓展品类，满足文化消费场景需求。



图5 邮票创设计

参考文献:

- [1] 祁亚洁.传承节气价值, 彰显文化底蕴[D].天津美术学院,2023.DOI:10.27361/d.cnki.gtmsy.2023.000010.
- [2] 贺少雅,孙英芳.二十四节气研究述评[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06):27-36.
- [3] 刘雷.二十四节气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D].苏州科技大学,2022.DOI:10.27748/d.cnki.gszkj.2022.000604.
- [4] 隋斌,张建军.二十四节气的内涵、价值及传承发展[J].中国农史,2020,39(06):111-117.
- [5] 刘霜.二十四节气文化的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D].兰州大学,2020.DOI:10.27204/d.cnki.glzhu.2020.002921.
- [6] 刘煦.品味二十四节气中的人文意蕴[J].全国新书目,2023(01):90-93.

Research on the Visualization Design of the 24 Solar Terms Based on Astronomy and Phenology Information

Song Tingjie¹, Wang Hui¹, Du ZeXin¹

¹ 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Abstract:The 24 solar term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ong-stand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y express a unique concept of tim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al universe, and contain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24 solar terms not only embody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elf-awareness but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24 solar terms as the core cultural carrier and focuses on the dual themes of "astronomical codes" and "new language of phenology" to conduct design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solar term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By visualizing the logic of solar term division in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 and the corresponding laws of phenological species, and combining modern chart languages, visual graphics, color expression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extensions, it aims to enhance the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and cultural appeal of traditional solar terms and achieve a leap from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to "visual experience" in solar term culture. The design integrates data maps, animal symbols, seasonal evolution, and dynamic information conversion, using graphic structures to tell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time and nature, and exploring the spatio-temporal wisdom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The 24 solar terms; astronomy; phenology;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cultural connotation

从技术到情感表达——流行音乐声乐训练的核心要素

涂成超¹

(1. 韩国西京大学, 首尔 02713)

摘要: 探讨流行音乐声乐训练中声乐技术与情感表达的互动关系, 强调两者在实现真实、感染力强的表演中的互补性, 要求演唱者在掌握呼吸控制、音准、音色调节等核心技巧的同时, 增强情感传递能力, 以增进听众的共鸣。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录音室与现场演出的不同需求, 提出通过系统训练实现技术内化和情感释放, 以实现声乐表演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 声乐技巧; 情感表达; 流行音乐演唱; 呼吸控制; 声乐训练

DOI: doi.org/10.70693/rwsk.v17.1153

一、引言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类型之一, 流行音乐的鲜明特点在于强调歌手的个性化嗓音和真实的情感表达, 与古典声乐更注重技术规范 and 统一性不同, 流行音乐要求演唱者在技术的把控和情感的呈现之间达到高度的平衡²。

情感表达对流行音乐演唱具有决定性意义。Juslin 与 Laukka 学者在 2019 年指出, 音乐中情感的有效传递显著影响了听众对演出效果的感知³, 这种传递离不开音量变化、音色处理与语句表达等技术元素的支撑。因此, 流行歌手不仅需要掌握技术与情感表达的独立技能, 更需在实际表演中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由于流行歌手现场表演频繁、风格多样化且情感强度高, 歌手极易出现嗓音疲劳甚至损伤的情况⁴。科学的嗓音训练方法及有效的嗓音护理策略, 成为流行歌手维持长期职业生涯的关键保障。

另外, 录音室演唱和现场演唱对于技术的要求以及对于情感表达的呈现程度均有所不同。录音室演唱注重声音的精准度和细节的处理, 歌手可以反复进行尝试, 得到最佳的声音效果, 现场演唱则侧重与观众的互动, 对演唱者技术的稳定性以及情感的即时反应性要求更高⁵。因此, 探讨技术与情感融合的方式, 对技术与情感的融合以及流行音乐实践都有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 本研究旨在探讨流行音乐演唱中声乐技术与情感表达的辩证关系, 并分析其在演唱中的协同与平衡性, 最后针对流行音乐演唱中声乐训练提供建议, 为歌手的表演与职业生涯提供指导。

二、流行音乐声乐训练的技术基础

流行音乐演唱高度依赖于扎实的声乐技术基础, 以保证演唱效果和声音的健康, 流行声乐不同于古典声乐, 要求演唱者具有动态表达、宽广音域、灵活音色的特点, 同时又能达到情感传达强烈的特点⁶。核心技术要素包括呼吸控制、音准、音色塑造、音域扩展以及健康的声音维护等。

作者简介: 涂成超 (1997—),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流行音乐演唱。

2 Cohen, S. M., Manternach, J. N., & Simpson, K. N. The essentials of voice pedagogy: A holistic approach to singing and teaching [M]. Plural Publishing, 2020.

3 Juslin, P. N., & Laukka, P. Emotion in music performance [M]. In R. Ashley & E. Timmers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ic cognition. Routledge, 2019: 354-364.

4徐元勇. 论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0(06): 21-25.

5 Björkner, E., Sundberg, J., & Grape, C. Physiological and acoustical correlate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singing [J]. Journal of Voice, 2020, 34(4): 522-530.

6邢威. 音乐剧作品中流行声乐演唱技巧的运用策略[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4, (02): 64-66.

表1 流行音乐声乐训练的关键技术基础

技术要素	描述	关键训练方法	在流行演唱中的重要性
呼吸控制与支持	通过有效的呼吸管理维持声音输出与动态调节	横膈膜呼吸、吸气与呼气控制	对于长乐句、强声 (belting) 及动态变化的演唱尤为关键
音准与音色塑造	发展具有辨识度的嗓音特质, 使歌手在同质化中脱颖而出	共鸣控制、元音调节、喉位调整	赋予声音个性, 是流行音乐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音域与灵活性	拓展音域并提升声乐灵活性, 以适应多变的演唱需求	音阶练习、琶音训练、混声训练	有助于声区转换与装饰音的顺畅演唱
嗓音健康与可持续性	通过规范技术防止声带疲劳或损伤	发声热身、充足饮水、定期嗓音休息	防止嗓音过劳, 保障长期演唱活动中的健康与稳定性
风格适应能力	调整声乐技巧以适应多种流行音乐子类型	呼吸控制、语句处理、声区运用	支持歌手演绎多种风格作品 (如抒情歌曲与节奏感强的曲目)

(一) 呼吸控制与支持

呼吸控制是流行音乐声乐技术的基础, 良好的呼吸管理可以帮助歌唱家维持音色, 支持长句演唱, 并实现有力的动态表达, 而隔膜呼吸作为古典和现代声乐训练中大量采用的方法, 为减少声带负担提供了必要的声带支持。在情感表达强烈、常包含拖长句的流行音乐演唱中, 确保演唱质量的一致性, 呼吸控制尤其关键⁷。

(二) 音准与音色控制

音准对于流行音乐演唱至关重要, 尤其在现场演出中, 这种精准度决定了听觉效果。歌手需经过听觉训练、音程识别、音高匹配等专业训练, 以减少对技术修正的依赖, 确保现场演唱的稳定性和清晰度⁸。

在竞争激烈的流行音乐领域, 音色的独特性使歌手脱颖而出。流行歌手需掌握共鸣调节、元音修正和喉位调整技巧, 通过多样化的音色变化表现不同的情感, 如明亮的音色表现欢快, 柔和的气声表达忧伤或亲密情绪⁹。

(三) 音域与灵活性

流行歌手常需演唱涵盖宽广音域并包含快速声区转换的作品。音阶滑奏与琶音练习等训练可有效拓展音域与提升声乐灵活性。现代流行歌手必须在胸声、头声与混声之间流畅切换, 尤其是在高能量歌曲中, 需要快速完成旋律转换与复杂装饰音的演唱¹⁰。

(四) 嗓音健康与持久性

鉴于流行音乐演出强度较高, 声音健康成为演唱训练中的核心关注点, 规范的发声热身、充足的水分摄入与合理的声音休息等技巧是预防声带疲劳与损伤的重要手段¹¹。流行歌手常因频繁巡演而面临较大的嗓音负荷, 尤其是涉及强声 (belting) 等高强度演唱方式时, 更易对声带造成压力, 因此, 定期进行声音休息和良好的声音卫生习惯, 对于保持长期的声音健康尤为必要。

(五) 风格适应能力

流行音乐风格多样, 歌手需具有优秀的风格适应能力, 以应对不同风格之间的技术切换。歌手需要根据歌曲风格, 灵活调整呼吸、语句处理以及声区运用, 以配合强烈高亢的高音区技巧或柔和气声演唱等情感表达需求, 以达到与情绪表达需求相匹配的目的¹²。以上这些技术的系统掌握为歌手实现技术与情感表达的高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最终成就了更富表现力、更具感染力的演唱, 可谓是一举多得。

7 Thurman, L., & Welch, G. Bodymind and voice: Foundations of voice education [M]. National Center for Voice and Speech, 2017.

8 Bourne, T., & Garnier, M. Physiological and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ale music theater voice [J]. Journal of Voice, 2012, 26(1): 44-53.

9 Garnier, M., Henrich, N., Smith, J., & Wolfe, J. Vocal tract adjustments in the high soprano range [J].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17, 141(4): 145-151.

10张释月. “中国风”流行歌曲演唱技法探析[D].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2.

11赵玲. 声带息肉术后注意事项及饮食护理[N]. 甘肃科技报, 2024-03-18(007).

12白奉玄. “探究流行唱法的演唱技巧训练及情感表达.”参花(上). 11(2022):77-79.

三、流行音乐中的情感表达

流行音乐的核心特点在于突出情感表达，而歌手传递情感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直接决定了演出效果，与古典音乐偏重技术的严谨性不同，流行音乐在演唱中更强调歌手的个性化，更强调真实的情感流露¹³。所以，流行歌手要保证歌曲中所蕴含的情感能够有效地传递给听众，形成情感共鸣，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声乐技术，更需要有细腻丰富的情感表达能力。

（一）情感表达在流行音乐中的作用

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广泛吸引听众，正是因为它有效地捕捉到了爱情、失落、喜悦、肯定自我等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¹⁴。这些情感通过歌词和演唱者的演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尤其是人声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观众的心目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歌手通过声音的变化，精准地将歌词中的情感传递给听众，让每一首歌都在情感上既有个性，又有共鸣。尤其在现场表演中，情感表达更为重要，现场演出强调歌手与观众之间的即时互动，观众的反馈往往能增强演唱的情绪感染力。这种演出特点要求歌手在排练好的演唱基础上，仍然能够即时表达真实的情绪状态，使表演更富即兴感和感染力。

（二）情感传达的技术手段

流行歌手运用多种技巧实现有效的情感表达，涵盖了声音与非声音的表达方式，具体包括：①音色与音质：音色的调节是最直接有效地传递不同情绪的方式之一，歌手可以通过变换声音色彩的方式，将从欢乐到悲伤等各种情绪表现出来。例如，亮音色常用于表现喜悦或兴奋，而暗淡、气声的音色更容易传递悲伤或反省的情绪，流行歌手通过音色的变化，在歌曲中顺利地演绎出情感的轨迹，从而使声线的表达与歌词中的情感内容达到一致。②力度与音量：情感强弱的差异通过声音的强弱变化表现出来，如低落、内省的情感表现为柔和细腻的处理，激烈、高亢的处理则强调情绪爆发在高潮段。③语句处理与节奏控制：歌手在歌词的语句处理上稍有提前或延迟，就能在歌曲中突出特定的情感节点，使表达更具个性，更具真实感。④装饰音色技巧：合理运用滑音、颤音、花腔技巧，可以增加演唱的情感张力和表现力，但过度使用可能会削弱情感的真实感，因此歌手需要在技巧的展现和真挚的情感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¹⁵。⑤非声乐线索：如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舞台表现力，这些肢体语言能有效强化声音所表达的情感，使表演更立体、更生动，更让人回味无穷。

（三）情感真实与情感表达的实现

情感真实是流行音乐表演的核心要求之一，听众通常能敏锐地察觉歌手所表达的情感是否真挚，任何刻意或虚假的表演都会影响情感共鸣的达成。因此，歌手必须深刻理解歌词的情感内容，并将其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相联系，以保证演唱中的情感真实可信。为此，情感演绎练习常被加入现代流行音乐声乐训练中，如歌词深度剖析、个人经历回忆和情感调动等训练方法¹⁶。这种训练既促进了演唱者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又避免了程式化、机械化的情感表达倾向，是一种对情感表达的一种强化。

（四）不同演出语境中的情感表达

不同的演出环境对情绪表达的要求不同，录音室演唱为了寻求技术与情绪呈现效果的最佳，让演唱者可以多次尝试，精准与掌控都很高。但这种高度的准确度，可能会减弱情感表达的即时性，容易出现唱得太细腻、没有真正的情感经历的情况。

而现场演出则要求歌手实时表达自己的情绪，观众即时的反馈和现场的氛围，进一步强化了情感表达的真实需求，歌手需要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情感状态，在技术稳定性的基础上，保证真实的情感表达，并且是即兴的。这种状况下技术和情绪的平衡要求更高，同时也更加严格地挑战了演唱者的整体素质。

（五）情感表达中的文化考量

13 Davidson, J. W., & Coimbra, D. Expressive singing: Linking technique and emotion [M]. In G. Welch, D. M. Howard, & J. Nix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ing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3.

14 Frith, S. *Performing rites: On the value of popular music* [M]. 2n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5 Zangger Borch, D., Sundberg, J., Thalén, M., & Ternström, S. Phonatory characteristics of "belt" and "neutral" qualities as functions of musical pitch [J]. *Journal of Voice*, 2004, 18(3): 329-343.

16郭日斌. 声乐表演艺术中的情感诠释提升研究[J]. *黄河之声*, 2024(12): 82-85.

随着流行音乐的全球传播,不同文化背景对情感表达的期望存在差异,一些文化倾向于情感表达的内敛含蓄,而另一些文化则更喜欢直接外放的情感表达¹⁷。因此,为了有效地调整演唱方式,确保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都能产生情感共鸣,跨文化演出的歌手必须了解并适应这些文化差异。

综上所述,流行音乐中的情感表达不仅依靠声乐技术,还涉及技巧运用、真实表达、演出环境适应和跨文化理解等综合能力,这种全面的情感表达能力,使流行歌手的表演更具感染力和持久影响力。

四、流行声乐演出中技术与情感的融合

流行音乐演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声乐技术与情感表达的有效融合,技术与情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撑的,共同构成流行歌手的核心表现力基础,这是流行音乐的一种技术与情感的相互支撑。声乐技术保证演唱的稳定性、可控性和持久性,而情感表达则赋予了演唱的深度和感染力,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成为流行声乐演唱实践中的一个关键课题。

(一) 技术作为情感表达的基础

扎实的声乐技术为情感表达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使歌手能更准确地表现情绪细节,呼吸控制确保歌手能自如地完成长句演唱和动态变化,避免因气息不足而影响情感表达的完整性。音准的稳定性保证了情感传递过程中的清晰度,避免了因技术瑕疵而干扰情感的表达,同时音色的变化使演唱者能够准确地表现歌曲所需要的不同情绪色彩,如柔和的气声表达出内敛脆弱的情感,明亮的共鸣表达出喜悦或激昂的情感、声音的稳定性和表现力。这些技术要素只有在高度熟练后内化为本能反应,才能有效支撑歌手的情感自由表达。

(二) 情感作为流行演出的核心

情感表达是流行表演的核心特征,歌手在表达歌曲中诸如爱情、心碎或自我成长等带有普遍性的主题时,必须在演唱中融入自己的情感体验,以达到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¹⁸。通过动态对比、节奏处理、语句修饰等细节处理,歌手在演唱中能够精准地表现出歌曲的情感轨迹,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尤其重要,因为观众在表演中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虚假和刻意,从而影响到整体的共鸣效果¹⁹。

(三) 技术与情感的平衡

将声乐技术与情感表达相融合是流行歌手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过度地注重声乐技术会使表演显得冷漠、生硬,仅仅注重情感而忽略声乐技术的控制,又会导致嗓音疲劳、音准的偏差以及表现的不稳定,要处理好技术与情感之间的平衡,让技术的发挥不抑制情感的表达,而成为其助力。

实现这两者的平衡的关键是让技术服务情感,比如好的呼吸能帮助歌手把长句或低音的细腻部分唱得流畅,也可以把高音区唱得很有力但不影响音色;音准稳定,避免技术上的缺陷影响情感内容的表达,歌手可以更专注于歌词所表达的情绪²⁰。

熟练技术为歌手留下情感自由发挥空间,歌手将呼吸控制、音准调节、声区变化、共鸣转换等技术转换为自身习惯后,才有可能在演唱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情绪细节的呈现上,让声音成为情感的载体,增加演唱中情绪的深度。技术与情感的巧妙结合,决定了优秀表演和生硬排练或者死板演唱的区分。

(四) 技术与情感融合的训练路径

实现技术与情感的融合需要系统而有针对性的训练,声乐指导通常从建立技术基础开始,着重培养呼吸支持、音准控制和音色调节等重要技能,经过充分训练之后,使这些技能能够在演唱过程中成为本能,歌手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表达情感上来。

技术熟悉到一定阶段后,声乐教师会引入以情感为目的的训练方法。例如,“故事化演唱”练习,让歌手将歌词拆分成故事,从音色、力度、语句处理等不同声乐处理方法上体会不同的情绪效果。通过不同元素的尝试,让歌手学会用技术提高演唱内容的情感感染力。

17 Matsumoto, D. Cultural influences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music [M]. In S. Hallam, I. Cross, & M. Thaut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psychology*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571-583.

18 汤媛."声乐演唱技巧与情感表达的内在关系." *戏剧之家*. 31(2024):94-96.

19 Thompson, W. F. *Music, thought, and feeling: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music* [M].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0 Sundberg, J. *The science of the singing voice* [M].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8.

此外,除了让歌手表演时有更强的共情力,情感训练还有助于歌手调动内在情绪,即通过冥想、想象或情绪回忆等正念技巧提升歌手的共情力。歌手更要注重嗓音的健康,发声时不要对嗓子过度负荷,合理的发声热身、多补充水分、适当的嗓音休息等都是可以让嗓音持久并保证情感力度表达的重要因素²¹。

(五) 语境考量—现场演出与录音演出

技术与情感的融合呈现出不同演出语境下的差异,演出环境的差异对技术与情感融合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录音室环境让歌手在技术与情感表达上进行了多次的尝试,精准的把控,却可能因为这样而缺少即时性,也缺少情感自然流露的现场表现。现场演出则要求歌手实时将技术与情感融合,以应对观众互动和环境变化带来的情绪波动,而技术的稳定性与情感的灵活度同等重要,这种差异要求歌手在技术熟练度和情感敏感度上都要高超,才能灵活应对不同的演出状况。

五、结语

从声乐技术角度来讲,呼吸控制、音准掌握、音色变化、音域拓展等是歌手必须掌握的技术⁶。首先良好的呼吸支持可以让歌手在演唱的过程中保持声音的稳定性,实现有效的动态控制,不至于因气息问题而出现声音质量下降和嗓音疲劳的现象,其次精准的音准掌握可以避免因技术瑕疵而出现情绪传达失误,有利于歌曲的准确表达,此外音色音域的灵活调节,可以为歌手演唱提供更多的表现手段,使其能够精准的表达歌曲的内在情感,如脆弱、兴奋、忧伤等。

本文强调技术基础固然关键,但仅凭技术无法实现流行音乐演唱的完整表达。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和深度是决定流行演出能否引发听众共鸣的关键所在。流行歌曲多以个人情绪或普遍化的情感体验为主,歌手只有深入理解歌词背后的情绪脉络,并结合自身经历进行情绪表达,才能创造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表演¹³。在此过程中,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尤其重要,因为观众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歌手情感表达中的虚假与刻意。只有真实且自然的情感流露,才能有效激发听众的共鸣与情感互动。

技术与情感之间的平衡对于流行歌手而言至关重要。单纯强调技术容易导致演唱表现机械生硬,而一味强调情感表达则可能造成缺乏对声音技术的把控,进而影响到声音的健康,也影响到表演的稳定性。为了实现技术与情感的最佳融合,歌手需要系统而有目标的训练。技术训练要达到自动化和本能化的程度,使歌手在表演时不必刻意去关注技术动作;而情感表达则需要通过深度分析歌词内容、唤醒情感记忆和诠释个性化等方式来训练和强化,而这一点,需要在歌词表达上加以完善。通过这种双重导向的训练方法,歌手们才能真正实现技术的可靠性与情感表达的真实性之间的和谐统一。

另外,不同演出语境下对技术与情感的融合要求各有侧重,在录音室演唱环境里,注重技术细节与情感的精准把握,但往往缺乏现场环境中的互动性、即时性;现场演唱语境下,歌手在演唱技术稳定性的基础上需要实时回应听众的情绪,做到技术与情感的更灵活、更即时的融合。

以上这种强调技术与情感的协同融合,不仅体现了流行声乐艺术的内在特质,也为歌手实现更加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支撑。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在不同文化背景与具体演唱风格下,技术与情感融合机制的异同及其对声乐训练的具体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 [1] Cohen S M, Manternach J N, Simpson K N. The essentials of voice pedagogy: A holistic approach to singing and teaching [M]. San Diego: Plural Publishing, 2020.
- [2] Juslin, P. N., & Laukka, P. Emotion in music performance [M]. In R. Ashley & E. Timmers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ic cognition. Routledge, 2019: 354–364.
- [3] 徐元勇.论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0(06):21-25.
- [4] Björkner E, Sundberg J, Grape C. Physiological and acoustical correlate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singing [J]. Journal of Voice, 2020, 34(4): 522–530.
- [5] 邢威. 音乐剧作品中流行声乐演唱技巧的运用策略 [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4(02): 64–66.
- [6] Thurman L, Welch G. Bodymind and voice: Foundations of voice education [M]. Iowa City: National Center for Voice and Speech, 2017.

21李士龙. 艺术嗓音医学在声乐教学中的应用[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20.

- [7] Bourne T, Garnier M. Physiological and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ale music theater voice [J]. *Journal of Voice*, 2012, 26(1): 44–53.
- [8] Garnier M, Henrich N, Smith J, Wolfe J. Vocal tract adjustments in the high soprano range [J].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17, 141(4): 145–151.
- [9] 张释月.“中国风”流行歌曲演唱技法探析 [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2.
- [10] 赵玲.声带息肉术后注意事项及饮食护理 [N].甘肃科技报,2024-03-18(007).
- [11] 白奉玄. 探究流行唱法的演唱技巧训练及情感表达[J].参花(上), 2022(11): 77–79.
- [12] Davidson J W, Coimbra D. Expressive singing: Linking technique and emotion [M]. Welch G, Howard D M, Nix J.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ing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3.
- [13] Frith, S. *Performing rites: On the value of popular music* [M]. 2n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4] Zangger Borch D, Sundberg J, Thalén M, Ternström S. Phonatory characteristics of “belt” and “neutral” qualities as functions of musical pitch [J]. *Journal of Voice*, 2004, 18(3): 329–343.
- [15] 郭日斌.声乐表演艺术中的情感诠释提升研究[J].黄河之声, 2024(12): 82–85.
- [16] Matsumoto D. Cultural influences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music [M]. Hallam S, Cross I, Thaut 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psycholog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571–583.
- [17] 汤媛. 声乐演唱技巧与情感表达的内在关系[J].戏剧之家, 2024(31): 94–96.
- [18] Thompson W F. *Music, thought, and feeling: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music* [M].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9] Sundberg J. *The science of the singing voice* [M].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0] 李士龙.艺术嗓音医学在声乐教学中的应用[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2020.

From Technique to Emotional Expression — Core Elements of Vocal Training in Pop Music

Tuchengchao¹

¹ *Depart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s, Seokyeong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l technique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pop music vocal training, emphasizing their complementarity in achieving authentic and emotionally engaging performances. It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for singers to master core skills such as breath control, pitch accuracy, and tone modulat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enhancing their emotional delivery to foster audience resonance.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differing demands between studio recordings and live performances, and proposes systematic training as a means to internalize technique and liberate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reby achieving a deeper integration in vocal performance.

Keywords: vocal technique; emotional expression; pop singing; breath control; vocal training

赫哲族鱼皮技艺的数字化视觉传播研究

刁涵¹ 高梓蒙¹

(1.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赫哲族鱼皮技艺作为寒地渔猎民族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承载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图腾信仰与民族美学。该技艺在视觉图案上形成了以自然元素、动物形态和植物意象为核心的符号体系, 体现出“曲线构图、女性审美、象征表达”等鲜明特征。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传播需求, 传统鱼皮纹饰的表达方式亟需转译与重构。本文以视觉传播为切入点, 综合运用图像语义分析、符号解码、人工智能图像生成等方法, 探索赫哲族鱼皮图案的数字化视觉重构路径。研究构建了从“图形元素提取—视觉编码转译—多模态传播设计”的传播模型, 结合当代设计实践, 提出基于文化语义还原的图像生成策略。通过图案数字建模与传播实验, 验证了赫哲族鱼皮图案在视觉识别、传播适应与文化表达上的多重价值。本文旨在为寒地民族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范式, 推动传统技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赫哲族; 鱼皮技艺; 数字化传播; 图像转译; 视觉语义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寒地非遗数字化艺术传播策略研究 (批准号: 23BXW08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48

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已成为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数字化记录、数字化展示”, 并在寒地民族文化、边疆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方面投入专项资源支持。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大数据可视化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 也为非遗技艺的数字化表达提供了全新的路径与媒介。传统工艺不再仅仅依赖实体传承与口耳相传, 而开始走向视觉编码、媒介重构与跨文化传播的多元语境中。

在此背景下, 拥有独特材料系统与图腾纹饰传统的赫哲族鱼皮技艺, 作为寒地渔猎民族的代表性非遗项目, 亟需在数字时代中寻找新的视觉表达机制。如何基于其原生图案体系进行视觉解构、语义转译, 并借助数字媒介实现有效传播, 不仅关乎一种技艺的生存形态, 也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再认知与当代表达。本文以此为研究起点, 从视觉文化与图像传播的视角出发, 探讨赫哲族鱼皮技艺的图形语言与数字化传播路径。

一、赫哲族鱼皮技艺的文化根源与图案表达

1.1 赫哲族的渔猎文化与物质文明背景

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典型的渔猎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 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 “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新开流文化。也是世界上穿用鱼皮服饰最久的民族之一, 古称“鱼皮部”“鱼皮鞣子”^[1]。该族群长期依赖江河资源为生, 形成了以捕鱼、狩猎、采集为主的寒地渔猎经济体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 赫哲族构建起以鱼皮、兽皮、骨器为代表的独特物质文化结构。特别是鱼皮的运用, 在服饰、日用品与仪式性器物中都占据核心地位。

在赫哲族文化中, 鱼皮不仅是生存材料, 更是连接自然、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媒介性物质”。赫哲族鱼皮画, 这一蕴含着深厚历史底蕴、独特文化韵味与精湛艺术造诣的传统工艺, 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更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鱼皮经过脱鳞、晾晒、捶软、缝制等多道工序后, 制成服饰、鞋帽、背袋等生活用品。在世代相传中逐步形成具有共同审美特征的手工图案体系。鱼皮服饰不只是遮体御寒之

作者简介: 刁涵(1998—),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数字化创意设计;

高梓蒙(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数字绘画设计。

物,更是身份标志与文化表达,它所承载的图腾信仰与生命观念在视觉图案中得到具体体现。此外,赫哲族尚无本民族文字,因此视觉符号在其文化传播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鱼皮纹样便成为“非文字性知识”的核心载体之一,承载着该民族关于生存智慧、信仰观念与审美经验的集体记忆,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

1.2 鱼皮图案的原始形态与视觉叙事功能

鱼皮图案最初源于对自然物象的观察与抽象,是赫哲族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视觉化表达。常见的原始图形包括鱼、鸟、鹿、太阳、水波、藤蔓等,这些图案元素通过简化、变形、组合形成一种高度凝练的视觉语言。例如,鱼鳞纹作为重复铺陈结构,象征繁衍与守护;波浪纹暗示江河之力与生命起源;鸟形象则代表通天的精神媒介,具备神圣性质。

这些图案不仅具象,而且具有符号特性。它们往往出现在功能性构件的边缘,如袖口、领口、衣摆,构成一种视觉“边界”与“保护”逻辑。与此同时,图案的排布顺序也具有“叙事性”:从下摆的水波开始,到腰间的鱼形,再到胸口的太阳或羽翼,构成一种从自然—生命—神灵的文化层级转译。这种视觉叙事不仅表现在二维图案中,也通过鱼皮服饰与身体的结合,成为一种“移动的视觉文本”。在缺乏书写文字的文化系统中,赫哲族通过鱼皮图案完成了族群记忆、自然敬畏与信仰结构的可视化构建。

二、鱼皮纹饰的视觉特征与象征内涵

赫哲族鱼皮纹饰不仅是手工技艺的结晶,更是族群视觉美学与文化信仰的外在体现。从造型语言、色彩构成到象征系统,赫哲鱼皮图案体现出高度复杂的视觉表达结构,其审美倾向、符号逻辑与文化叙事功能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视觉传播价值。

2.1 图案造型特征:曲线构成与女性美学倾向

赫哲族鱼皮图案以柔性曲线为主导线条,鲜少出现严格的几何线性构图。这种曲线化的造型倾向一方面源于所用材料(鱼皮质地柔软、不适合直角裁剪),另一方面与赫哲族女性主导的制作系统密切相关。女性在长期的服饰制作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一种以“弯曲、缠绕、自然流动”为特征的造型系统,形成“女性视觉逻辑”的独特表达方式。

图案造型中常见的曲线元素如羽状线条、波浪形边饰、螺旋状藤蔓等,不追求精确比例与对称性,而更强调视觉节奏与形态柔美。这种不对称、非几何、边缘自然过渡的构图方式,在视觉上传达出一种非制度化的、有机化的艺术感,体现出渔猎民族审美中的“自由秩序”。

2.2 色彩风格与材料肌理的审美关系

赫哲族鱼皮服饰的色彩选择,建立在天然染料与材料本色的基础上,形成温润、质朴且极具层次的色彩风格。传统鱼皮经过晾晒、手工捶软后,其天然色泽多为灰白、淡黄、褐棕等中性色调。图案部分多使用桦树皮灰、植物汁液、木炭粉等天然染料进行点染,形成黑、棕、暗红等对比色调。

赫哲族并不追求强烈的色彩对撞,而是强调“色与皮之间的融合感”。图案色彩往往与底材产生柔和过渡,使整体服饰呈现低饱和度、柔对比的美学特征。这种色彩风格与材料肌理之间形成审美互动,使得鱼皮服饰在视觉上既具朴素之美,又不失工艺的精致感。在现代数字化图像生成过程中,这种“低对比—强肌理—朴素调”的风格特征为再设计提供了重要方向——不应简单强化色彩,而应保留其材质美与自然感,使其在现代视觉体系中依然保有原生态气质。

2.3 图腾象征与精神意涵的视觉化表达

赫哲族作为无文字民族,其图腾观念、自然崇拜、萨满信仰等精神系统主要依赖视觉图像进行代际传播。鱼皮纹饰便是这种象征系统最核心的表达媒介之一。例如,鱼图象征生命循环与繁衍、鸟图象征灵魂通天与女性自由、鹿图象征力量与狩猎荣誉。这些动物形象不仅是自然观察的产物,更是赫哲神话体系中重要的“精神角色”,它们构成一种族群与神灵之间的象征性对话系统。

除具体图形外,图案的构图形式也带有仪式意味。如圆形中心纹饰常出现在背部,象征宇宙核心与祖灵守护;边缘连续波纹代表水的庇佑与循环;飞鸟向上腾跃的构图则暗示灵魂升腾。这些象征性视觉表达,不仅服务于装饰功能,更参与了族群的信仰实践与精神叙事,是视觉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三、传统图案的数字化视觉语言重构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图案研究与设计领域有广泛应用，尤其是神经风格迁移技术的出现，极大推动了传统图案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3]。非遗资源的数字治理过程在于变革数字化的信息资源传递方式，通过优化非遗传播流程以提升其自身的传播效率，建立与非遗产品相适配的数字治理平台，面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方式的革新，传统鱼皮图案作为一种民族视觉资源，亟需从手工纹样走向可识别、可再生、可传播的数字语言系统。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语义与视觉结构的“编码—转译—再造”过程。本章将围绕图形提取、数字化流程、视觉模型构建与传播策略，系统探讨赫哲族鱼皮纹饰的数字化视觉重构路径。

3.1 图形符号的提取方法与视觉语义编码

传统鱼皮纹饰由于长期以手工方式制作，存在造型不规范、样式差异大、图案边界模糊等问题，直接导致其在数字化转译中的“符号识别困难”。因此，图形提取的第一步是建立一套科学的符号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参考符号学与图像学理论，将鱼皮图案作为“文化视觉符号”进行处理。以“元素-结构-语义”三位一体的框架，对传统图案进行图形分层与语义标注。具体方法包括：

矢量重绘：通过手工描摹或 AI 边缘识别技术（如 Adobe Illustrator、Photoshop 路径工具等），提取图案线条并标准化为 SVG 或 AI 格式。

语义分组：按图案含义分类为“鱼类、鸟类、鹿类、波纹、太阳、藤蔓、齿纹”等类别，建立视觉语义数据库。

图形简化：利用最小图形单位提取“形素”（如翎羽、鱼鳞、角状结构等），形成基本图形元素库，便于模块化拼接与再生成。

此类编码工作作为后续数字重构和 AI 图像生成提供了清晰的结构与语义输入基础，使传统图案不再是“视觉素材”，而成为“视觉语义语言”。

3.2 传统图案的数字化重构流程与样式分类

传统图案的数字重构不只是造型复制，更是图形逻辑的系统重建。本研究将鱼皮纹饰的重构流程归纳为以下五个步骤：

图像采集与归档：通过高清扫描、博物馆采样、田野照片与影像文献，收集原始图案图像。

线稿化与矢量化：采用数字描边与 AI 边缘识别方式，将手绘或照片图案转换为清晰线稿。

图形模块提取：依据图形结构进行元素拆解，按构图规则划分“中心图形、边饰图形、填充图形”。

样式分类建库：将处理后的图案按形态风格划分为“线性型、轮廓型、块面型、连续型”等四类，构建数字纹样样式库。

再设计模板生成：结合现代设计应用场景，生成可供平面设计、交互界面、插画、纹样文创使用的标准化图形文件（SVG、PNG、AI 格式）。

通过以上流程，传统鱼皮图案得以从具象的文化遗存，转变为具有“标准输入”的数字图形语言，实现符号化—样式化—应用化的转译过程。

3.3 风格统一化与传播适配化的视觉设计策略

传统图案因来源多样、年代久远，在视觉上存在风格松散、表现形式不一的现象，难以形成统一的视觉传播识别系统。为此，在图形重构的基础上，需要进行“风格统一化”与“传播适配化”设计处理。

风格统一化策略：在图形结构重构后，通过一致的线条粗细、配色体系、图案尺度比，建立统一的视觉系统，适配多终端展示需求。色彩方面可统一为“赫哲鱼皮五色系”：鱼皮本色、炭黑、桦黄、赤红、羽蓝，构成民族风格的核心调色板。

根据传播场景将图形分别适配为：屏显型图像（如公众号头图、H5 界面、微动画）：线条清晰、层次分明、色彩鲜明；实物应用图像（如文创品、展览设计）：强调材质肌理感、图案连贯性；教育传播图像（如儿童绘本、非遗课程插图）：图形简化、符号显性、色彩对比强。

四、图像生成实验与视觉传播设计应用

经过对赫哲族鱼皮纹饰图形结构的数字化重构与视觉语言编码,进一步开展 AI 图像生成实验与视觉传播设计实践,验证传统图案在当代媒介系统中的适应性与再生力。通过设计实验、应用评估与用户调研,探讨图形语言如何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现文化内涵与传播效率的双重提升。

4.1 数字插画与 AI 图像生成在鱼皮图案再现中的实践

本研究采用数字插画绘制与 AI 图像生成(如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双路径方法,将传统鱼皮图案进行当代表达实践。赫哲族鱼皮元素涵盖内容广,很多元素结构复杂,但其外形轮廓写实性很强,如赫哲鱼皮剪纸中的很多动物形象,裁剪过程中并未选用赫哲族常用的对称手法表现,其目的是便于准确识别^[4]。这一特征也有助于我们进行 AI 生成图像。

在插画路径中,选取典型的鱼形、波纹、鹿角、羽毛等元素,结合当代插画技法进行重构设计。强调图形风格统一性、视觉辨识度与色彩还原度,通过图层叠加与边缘柔化等技法,使原生态图案获得新颖视觉表现,形成一组文化主题插画作品,可广泛应用于新媒体传播、展览视觉主图等。

在 AI 图像生成方面,先将处理后的图素、语汇与图法规则输入生成模型,通过 Prompt 设定生成“拟鱼皮风格插画”“民族图案装饰性图像”“寒地图腾符号集合”等图像,得出具备赫哲族文化特征的高质量可用图像。通过对 AI 生成图像的筛选与微调,形成了一个兼具文化识别性与艺术创新性的“AI 生成图案图库”。这一过程也印证了现有研究所强调的“传统图案经过编码结构与情感意象的提取后,具备良好的人工智能转译适应度”,图案的构图合理性、色彩风格与文化属性是生成质量与公众认知的关键因素。

4.2 不同媒介场景中的传播适应度分析(H5、展览、AR等)

数字化后的鱼皮图案被分别投入到不同媒介场景中进行传播适应性测试,以验证其视觉传达效果与场景兼容性。在鱼皮图案的数字化传播实践中,不同媒介场景中的适配度不仅体现在图像形式的视觉兼容性,还体现在媒介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关系结构。数字化媒介不仅是传播的工具,更参与到品牌形象构建的语境之中,品牌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被嵌入了技术平台与传播语义的双重逻辑中。

H5 页面设计:将数字图案作为头图、分栏背景、动态加载元素,整体风格清晰统一,用户识别度高、接受度良好,尤其适合公众科普类传播项目。**展览导视系统:**在非遗主题展中,鱼皮图案用于背景墙、导视牌、图说标签装饰,增强沉浸感与文化氛围,获得策展人高度评价,显示出空间适配力。**增强现实(AR)互动:**将图案与 AR 程序绑定,在移动端触发图案识别后生成虚拟动画效果,如鱼纹游动、鹿角扩展等,提升传播的互动性与趣味性,尤其受年轻群体欢迎。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鱼皮图案经过数字重构后,在静态视觉与动态媒介中都具有良好兼容性,具备跨媒介的传播延展潜力。毋庸置疑,数字技术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然,“数据和技术不是冰冷的存在,和人工智能方法的结合,就会体现出人性的一面^[5]”。

4.3 传播设计在文旅融合、非遗教育中的实际潜力

随着文旅融合与数字非遗政策的持续推进,数字化的鱼皮图案作为“可用可再生的视觉资源”,在文化创意、教育传承与视觉公共性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实际应用潜力。在文创产品设计中,鱼皮图案可广泛用于服饰印花、饰品雕刻、家居用品包装等,既能体现民族特色,又能适配现代审美需求,推动非遗从展示走向“生活化应用”。

在非遗教育中,结合插图绘本、交互动画、AR 图谱等形式,鱼皮图案成为儿童、青少年进入赫哲文化世界的重要视觉通道,增强趣味性与文化浸润力。在乡村振兴与文旅空间打造中,可将图案作为“视觉 IP”应用于村落标识、旅游景观、沉浸剧场等场景,实现文化体验一体化设计。

五、结语

赫哲族鱼皮技艺作为寒地渔猎民族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图案系统承载着民族的生存经验与美学智慧,构建了一种独特而复杂的视觉符号语言。显然,“数据和技术不是冰冷的存在,和人工智能方法的结合,就会体

现出人性的一面”随着数字化传播生态的持续演进，这一传统技艺正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在尊重文化本源的前提下，借助技术手段完成视觉语言的再造与媒介适配，成为推动非遗“活化”的关键议题。

本文基于视觉传播视角，聚焦鱼皮图案的图形构造、文化语义与象征体系，提出“图形提取—视觉转译—传播应用”三位一体的研究框架，并通过数字插画与AI生成实验，构建鱼皮纹饰的结构化视觉模型，探索其在多媒介场景中的传播策略。研究表明，赫哲族鱼皮图案不仅具备良好的数字重构潜力，更在视觉识别性、用户情感共鸣与传播适配性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为传统图案的当代表达提供了系统路径。

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不仅是对鱼皮技艺的数字再生尝试，更是一种基于文化语境与视觉机制的非遗传播方法论探索。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可视化设计、交互媒介等技术的不断融合，赫哲鱼皮图案有望在更广阔的文化场景中获得更新的生命力，也将为寒地民族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创造性发展提供借鉴经验与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杨眉. 天赐文锦与渔家——赫哲族鱼皮纹饰审美意蕴探赜[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4, (04): 146-154.
- [2] 董智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的鱼皮画艺术研究[J]. 中国皮革.
- [3] 于雷, 冯鑫, 彭文博, 陈国强. 人工智能转译传统美术图案的公众情感认知解构[J]. 包装工程, 2023, 44 (12): 68-76.
- [4] 吴星. 赫哲族鱼皮文创设计研究[D]. 苏州大学, 2020. DOI:10.27351/d.cnki.gszhu.2020.003038.
- [5] 牛金梁. 非物质文化遗产智能化传播的数字技术赋权逻辑[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49 (05): 150-156.

A study on the digital visual communication of Hezhe fish skin techniques

Han Diao¹, Zimeng Gao²

¹ 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fishing and hunting people in the cold region, the fish skin skills of the Hezhe people carry rich ecological wisdom, totemic beliefs and national aesthetics. This technique has formed a symbol system with natural elements, animal forms and plant imagery as the core in the visual pattern, reflect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urved composition, feminine aesthetics,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In the face of the demand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e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fish skin ornaments needs to be translated and reconstructed urgently. Taking visual communi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image semantic analysis, symbol deco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age gener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o explore the digital visual reconstruction path of Hezhe fish skin patter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munication model based on "graphic element extraction, visual coding and translation, and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proposes an image generation strategy based on cultural semantic restor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contemporary design practice. Through the digital modeling and communication experiments of the pattern, the multiple values of the Hezhe fish skin pattern in visual recognition, communication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were verifi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digital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old regions, and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kills.

Keywords: Hezhe; fish skin skills; digital communication; image translation; Visual semantics

元宇宙视域下传统戏曲艺术范式创新路径探究

张蕊¹

(1.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433)

摘要:随着科技进步及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全面推进,传统戏曲想要获得长足发展,数字化是其创新的必经之路。元宇宙作为艺术创新的产物应运而生,并在多类艺术领域中渐成焦点。本研究深入探索元宇宙视域下戏曲发展,旨在剖析其在艺术再现手法、观众感知体验、以及技术融合应用等方面的独到之处与潜在价值。通过详尽解析具体案例,将其与传统戏曲实践进行系统比照,力图揭示传统戏曲的艺术范式的革新,尝试为戏曲艺术的跨界融合与长远发展奠定理论基石。

关键词:元宇宙;超现实主义;艺术创新;观众体验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4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川剧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川剧经典剧目影像数字化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CJYB09)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54

中国戏曲的成长轨迹中,创新与守旧、理智与感性、古典与前卫等对立观念持续交织,这些二元思想深刻参与到了戏曲创作表演的各个维度、相互争鸣,导致戏曲历经多次深度探讨,却依然未能从根基上消弭戏曲内在的冲突。正如学者田本相所论述:“中国话剧所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戏曲文化深层次的挑战,归根结底触及的是戏曲理念的根本性危机。”^[1]当前,元宇宙这一新兴理念及视角正成为引领思考的前沿,催生了戏曲领域的思维模式与传播手段的革新。

一、激荡与契合:元宇宙与戏曲本体的交互关联

在谭霏生所著的《戏剧本体论》中,他通过探讨戏剧的根本构成手法及其诸如“结构”“对白”和“情境”等核心组成元素,界定了戏剧本体与非戏剧性特征的界限。谭霏生描绘了一幅画面,其中戏剧的本质被视为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受到时代变迁、新兴语境、规范演进、技术革新及意识形态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内在本质”与“固有特性”随之调整 and 变化^[2]。因此,戏曲理论学者与实践者应当时刻保有前瞻性的视野及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戏曲艺术的创新实践中融入新鲜元素。现今,将元宇宙理念融入戏曲范畴,已成为推动戏曲创作与研究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趋势^[3]。

尽管作为一种新晋技术平台的元宇宙登上了舞台,其本质是作为一种工具与表达媒介,旨在丰富戏曲形式而非全面颠覆戏曲艺术的传统根基。作为融合高强度虚拟现实、交互特性和沉浸感的新型技术界面,元宇宙为文化与娱乐领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疆域^[4]。从特定视角审视,元宇宙无疑对戏曲构成的核心要素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戏曲依托实体舞台、即时表演及精妙构思的场景与视听效果,营造艺术情境,传递情愫与思想。对比来说,元宇宙能够创设全然虚拟的戏曲空间,演员化身“数字角色”^[5],观众则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获得身临其境的参与与经历,这种开创性的观演模式或许可重塑公众对戏曲的传统认知与期待,对如今既有的剧场形态产生重大影响^[6]。

1992年,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其科幻力作《雪崩》中首度描绘了元宇宙这一概念。回转至中国,2005年上海戏剧学院创建了多媒体演艺虚拟空间合成的重点实验室,并孕育出《爱情简书》《红楼幻境》等佳作。2021年被标记为“元宇宙元年”^[7],中央戏曲学院的传统戏曲数字化领域的高精尖研究中心,运用表演仿真及创意科技的力量,精心重现了京剧巨擘“梅兰芳数字人”^[8],从形体、容颜乃至声线均实现了高度还原,使现代观众得以实现与梅兰芳跨越时空的“对话”。此外,全国政协委员张建国在两会期间发声,倡导构建“戏曲元宇宙”的发展蓝图。在元宇宙建构的虚拟舞台之上,戏曲的创造与演绎挣脱了现实空间与时间的枷锁。剧作者得以无拘无束地驰骋想象,编织出既魔幻又错综的剧情与景观;演员则能凭借动作捕捉科技,展现出更为细腻且真实的演技;观赏者依

作者简介:张蕊(1989—),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

据个人偏好选取多种视角与互动路径,剧场内无人再是单纯的“观察者”,悉数化身“介入者”——戏曲内容也由此实现了从“他们之事”到“我们之事”的过渡,标志着演员与观众界限的消融、幕线的突破,以及深度沉浸体验的达成,这样一种极富自由度及个性化色彩的戏曲展示模式,或将会促使传统戏曲的叙述架构、表演手法乃至审美准则产生相应的变革^[9]。作为人类情愫与思绪传达的艺术载体,戏曲之精髓植根于对人性的揭示、情感共鸣的激发及思想交流的促进^[10]。元宇宙为戏曲赋予了新颖的表现手法与传播媒介,却不会撼动戏曲的根本内核。诚然,元宇宙环境下的虚拟情境与角色能呈献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然而,真正触动心弦的依旧是那些深刻描绘人性及真挚情感流露的故事。即便演员表演经由数字技术获得增强,其情感传达与艺术感染力——戏曲之灵魂依旧岿然不动^[11]。再者,传统剧场戏曲独有的现场氛围与即时交互性,当前元宇宙尚难以全然复制。剧场中观众与演员及彼此间的情感交流,这一独特体验非元宇宙所能轻易取代。故而,当再次考量前述问题:元宇宙是否会根本性地颠覆戏曲的本质?笔者是持否定立场的。元宇宙概念的融入,实则是为戏曲开辟了一条新的探索与创新之道,此乃一种新兴艺术趋势,绝非对戏曲核心特质的根本性颠覆或拆解。

二、戏曲融合元宇宙的现代性探寻

面对5G时代融媒体与短视频的蓬勃兴起,个体的精神世界在技术与电子设备的重重包围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异化过程。中国传统戏曲市场遭受显著冲击,大量观众流量流失,导致观众多度萎缩,专业戏曲人才梯队断裂,高质量戏曲作品供不应求,戏曲艺术核心价值面临模糊,众多演出场所濒于生存困境。在此情境下,对戏曲经典的重释与创新成为戏曲界亟待解决的任务,通过新颖的演绎手法激活经典,吸引现代观众目光,使戏曲珍品在新纪元中重获生机,从而确保戏曲能以独一无二的艺术风貌,在多样艺术形式的竞争中独树一帜。戏曲正处在一个变革与转型的紧要关头,引入元宇宙概念显得尤为迫切,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探讨其在戏曲领域的应用,视为一个充满创意的视角,促进艺术门类间的互鉴与启迪,驱动戏曲向更高层次的创新迈进。因此,从元宇宙维度剖析戏曲与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关联,成为了衡量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指标。

戏曲艺术的发展在元宇宙这一新兴场景中,如同一场心灵深处的旅行,在个人情感世界中激起强烈共鸣,为观众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现代体验。本雅明曾经对“机械复制时代”这个概念进行过深刻的剖析。然而,戏曲所表现出来的感染力,却远不是这个理论框架所能比拟的。观众们能够沉浸在一种艺术氛围中,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温暖是前所未有的。观众从一个静态的观察者,变成一个与戏曲共生共长、创造个性化艺术旅程的活跃的共创者和探路者,这也正是对观众当下社会心理诉求的直接回应,折射出的是人们渴望快节奏生活背后的从容。

此外,媒体形态的瞬息万变和层出不穷的新思维模式,要求剧作在这个信息海量爆发的时代背景下,不能停留在过去那样的框框里。回溯戏曲的历程,每一步的变革都是对媒介进化的积极回应,从最初的露天剧场,经过室内剧场的繁荣,直至如今多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数字时代的当下,“元宇宙”概念的兴起,开辟了一条新的戏曲发展之路。虚拟现实领域在拓展戏曲的创意边界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更丰富的表现手法,帮助观赏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戏曲场景并与演员进行深度互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像沉浸式戏曲这样的新观念也在颠覆既有的观剧模式,使观众在参与戏曲叙事的过程中有更个性化的互动体验,满足了广大公众对多样化互动需求的渴望。

元宇宙赋予了戏曲在新兴领域绽放光芒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对观众进行多维度体验革新的同时,也为戏曲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三、非接触时代戏曲虚拟共同体的筑造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飞速演进,为非接触式交互时代灌注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其特有高速度数据传输及低延迟属性,为多样化的非接触应用场景铺设了稳固的技术基石,不仅保障了高清视频会议的流畅实施,亦实现了大规模数据的瞬时交流,展现了5G技术出类拔萃的性能表现。

真实性作为戏曲引人入胜的精髓,传统剧场凭借演员的高超演技、舞台的精妙布置以及现场营造的独特氛围,构筑起观者间的“社”联结,使人们沉浸在饱满真挚的情感海洋。通过肢体语言、声线演绎及情感交流,演员与观众建立直接深刻的关系,这种真切体验成为戏曲艺术跨越时代的不朽魅力。然而,非接触时代的到来,对这一经典的真实互动模式提出了挑战。物理隔阂的增加与现场氛围的缺失,似乎削弱了戏曲的真实感知度。但在另一维度,虚拟技术的融入为戏曲开辟了新天地,创造超越现实边界的虚构世界。此间,场景浩瀚无垠,角色设定超越常规,剧情波澜壮阔。观众借由虚拟现实装备,亲历其境地踏入这片戏曲虚拟领地,与剧中人物共历冒险,感受情感波动。由此,虚拟体验不仅未削减戏曲的魅力,反而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创意与想象空间。

戏曲虚拟社群的构建源于真实与虚拟的交织融合,它为观众、表演者、创作团队和技术人员之间建立了一座紧密联系的桥梁。在这个框架下,观众角色跃升为社群中的活跃参与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与其他观众交流心得,

共同构建一个生机勃勃的戏曲交流圈，同时借助互动技术与演员进行即时互动，参与到剧情的走向中来。而演员们则能从传统表演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在虚拟舞台的赋能下，对新颖的表演模式和技巧进行探索。创作者为了满足观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利用虚拟现实的广阔天地，创作出更多具有深度的作品。不过，虚实交融也不是没有挑战的，比如：泛滥的虚拟科技或许会冲淡戏曲的本真质感；受众者沉浸于虚境之中或与现实生活疏离；技术的局限性也可能对观众的综合观感造成一定的伤害。尽管如此，这些难题并没有遏制戏曲虚拟社群的成长步伐，反而驱使我们对于现实与虚拟的边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并探索如何将虚拟技术的积极效用最大化，建立在维护戏曲核心精神的基础上。

四、过往与将来潜在嬗变

自从“元宇宙”概念问世，关于其的辩论便在社会各界持续发酵，使得元宇宙处在一种既缺席又失序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有人借鉴伽达默尔的“当前视域”理论，将现今的认知与经验投向未来，他们以积极进取的目光审视元宇宙的介入，此时的元宇宙成为了集体想象力的关键汇聚点，标志着数字智能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亦被视为开启未来科技新纪元的神秘契钥。另一方面，则有另一群人从“新奇视域”出发，通过“未知性”与“异质化”的棱镜回望当下，他们扮演着某种程度上的谨慎批评者角色，忧虑元宇宙的耀眼光芒可能会蒙蔽人们的双眼，忽视潜在的危机，而过分的乐观情绪可能导致包括戏曲界在内的诸多领域，在元宇宙的浪潮冲击下失去其固有的真实面貌。

在过往与未来之间的剧烈交锋之中，我们常受限于“当前认知的局限”而难以超越，习惯性地预期未来将持续线性展开，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过程，程式化的思维模式不经意间将我们的视野囚禁于一个“迷茫领域”。借由“预见性”视角的运用，我们能重新探索与拓宽高质地戏曲内容的边界。“预见性”意指个体在完全理解某对象之前，依据既有经验和知识对该对象形成的预设理解。此并非纯粹主观猜测，而是解释者在探求文本深层意义前做出的一种客观性评判。尽管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多为既定前提，解释者却往往对此缺乏自觉，“预见性”实则是客观条件与主观理解的深度融合。

五、“元宇宙+戏曲”的融合

元宇宙观念的渗透，在现阶段很大程度上给剧场领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特别体现在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上，进而对剧场艺术的延续和革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以超越现实的展现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探索实现“元宇宙+戏曲”的融合，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创作与演出的体验之法

为了构建无与伦比的身临其境体验，包括尖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技术的运用在内的庞大资金与先进技术力量的投入成为必然，这些手法被巧妙地运用在各种戏曲情境构建中，从古朴恢宏的宫殿到奇异幻境的未来世界的场景跨度，保证了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戏曲的闪光色彩。比如，在演出历史剧时，过去的场景借助AR技术得以重现，既能让观众亲眼目睹古代建筑的壮观和人物服饰的考究，又能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演员的表演通过动作捕捉与脸部辨识技术的融合，被赋予更细腻真实的质感，精准捕捉到演员的每一丝表情变化与动作，并将其投射到与观众高强度互动的虚拟场景中，让演员的表演更具细腻真实的质感。通过采用多线索、交互式的叙事策略，探索叙事手法和表演艺术的创新路径，超越经典的线性叙事模式，让观众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主导剧情的走向，而每一次的观影体验，都有可能是千差万别的风格呈现。此外，融入AI创作辅助，借力大数据分析洞悉观众喜好，以创造剧情和人物设定更加贴近观众期待。

（二）传播与推广的有效之策

构想并实现集演艺、社交、教育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元宇宙剧场领域，用户不仅可以观看到丰富多样的戏曲表演，还可以与其他剧迷进行交流和沟通，分享观看心得。平台特设虚拟剧场、剧社、演员Live专区，保证每个用户都能在这里找到与个人兴趣相符的剧作空间。通过推出网络戏曲节、大赛等活动，吸引世界各地观众踊跃参与。平台设置丰厚的奖励机制，激励创作者的积极性，提升戏曲的可看性。为提升用户对戏曲的鉴赏力，还可以邀请业内著名剧评人和学者入驻，进行专业点评和知识讲座。加之在社交网络上激发热烈讨论的剧作亮点、预告视频、幕后花絮，将有效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对元宇宙戏曲发展的关注。

开拓线下体验的新途径，在商业枢纽和文化地标内设立元宇宙戏曲互动区，运用VR技术，让观众在精选的戏曲高潮片段中免费身临其境地感受元宇宙戏曲的独特韵味，加深对元宇宙戏曲的认知，并通过互动展示板块深入浅出地介绍元宇宙戏曲背后的技术逻辑和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增加公众对元宇宙戏曲的兴趣和认识，最终与知名旅游景点合作推出元宇宙戏曲主题旅行计划，将戏曲表演艺术与自然景观及地域文化的精髓相融合，在塑造独

一无二的文化旅游体验的同时，为游客带来与众不同的体验感受。

六、结语

元宇宙与戏曲艺术的交汇碰撞，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科技洪流中，开启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元宇宙+戏曲的超现实主义远不止简单的技术堆砌那么简单，它实际上引发了艺术形式的一次深刻变革。尤其是融入了超写实的手法，更为跨界融合平添了几分别具一格的味道。元宇宙为戏曲搭建了一个让观众身临其境、亲身感受戏曲无限魅力的无限想象空间。戏曲场景越来越逼真，叙事层次大大丰富，观众的互动体验也趋向深度和多元，为触动更广泛的观众群体、推动话剧艺术的普及和欣赏拓宽了戏曲的传播路径。当然，技术稳定性不佳、虚实界限模糊等问题也必须正视伴随着元宇宙的诸多考验，迫切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妥善应对。坚守戏曲艺术的核心精神和审美价值，防止技术对创作过程的过度支配，是我们在这条深度融合的探索道路上不可动摇的底线。

参考文献：

- [1] 田本相.还百年话剧史以综合性艺术本体的面貌——〈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本)序[J].美育学刊, 2014,(5):1.
- [2] 张弛.元宇宙与戏剧艺术融合发展路径[J].大众文艺,2024,(2):77-79.
- [3] 马潇婧.元宇宙剧场或数字新形态：重思数字媒体时代的戏剧创作[J].戏剧文学,2023,(11):4-13.
- [4] 王绍军.元宇宙背景下戏剧导演创作的发展愿景[J].戏剧,2023(04):50-52.
- [5] 彭涿.电子游戏戏剧探析[J].四川戏剧,2022(09):85-90.
- [6] 蒋陈涛、马双.重塑戏剧：20世纪80年代探索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J].戏剧之家,2024(19):18-20.
- [7] 刘祯.“三大体系”与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地位意义[J].戏剧,2024(06):36-38.
- [8] 文硕.痛定思痛：戏剧改良运动的再次反思[J].戏剧,2024(05):46-47.
- [9] 赵建新.2023年中国戏剧艺术发展述评[J].四川戏剧,2024(02):14-22.
- [10] 胡安忍.戏剧创作的大小之辩——在戏剧奖·梅花表演奖创办40周年暨“陕西戏剧”特色文化品牌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J].当代戏剧,2024(02):7-10.
- [11] 胡志毅,周宏亮.新世纪以来中国话剧研究综述[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4(01):25-38.

Exploration of the Innovative Paths of Artistic Paradig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taverse

Zhang Rui¹

¹ 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Chengdu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ogress of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era, digit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path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The concept of the metaverse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a focal point in various artistic field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metaverse, as a product of artistic innovation, has come into being at the right time. This study delves deep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taverse, aiming to analyze its unique features and potential value in terms of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techniques, audience perception experiences,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pecific cases and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opera practices, this study endeavors to reveal the innovation of the artistic paradig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laying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ross -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long - term development of opera art.

Keywords: Metaverse; Hyperrealism; Artistic Innovation; Audience Experience

满族说部英雄史诗的信息可视化研究

——基于 AIGC 剪纸艺术与岫岩皮影风格的视觉重构

赵伟强¹ 曹宇欣¹ 郭俊傲¹ 李奇^{*}

(1.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满族说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它的口传叙事现在遇上了现代传播方面的难题困境。本论文选取在黑龙江地区广为流传的经典说部《招抚宁古塔》与《完颜阿骨打与海东青》, 以英雄史诗为题材的满族说部作为研究样本。将其内容提取整合, 探索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可视化技术的融合路径, 并进行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本论文以满族岫岩皮影风格与剪纸艺术为核心, 并且通过系统的文献调查, 深入挖掘并精准提取二者独特的视觉效果, 进而将这些民族特色的艺术元素融合于创作实践之中, 打造出既传承传统又富有新意的艺术作品。并且结合 AIGC 技术辅助剪纸纹样生成, 呈现出从口传叙事到视觉符号的跨媒介转化。传统艺术语言与数字技术的协同创新, 能够有效激活非遗文化的当代阐释空间, 为非遗活化、民族叙事可视化传承提供方法论参考。

关键词: 满族说部; 信息可视化; 皮影艺术; 剪纸纹样; AIGC 技术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资金项目《数字化艺术作品数据库与版权平台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KYYWF-1637);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34

一、满族说部的文化内涵

(一) 黑龙江满族说部的历史渊源

满族说部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其内容涵盖创世神话、英雄传说与历史纪实, 1999 年, 富育光发表的《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一文, 是国内最早关于满族说部的学术观点, 该文中记述民间将满族说部称为“乌勒本”, 可分为“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2]在 2006 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追溯其起源, 探究满族在黑龙江地域的形成与演变, 结合满族历史, 进行从努尔哈赤、女真至满族的发展, 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说部的特点与传承脉络。

(二) 英雄传说故事相关概述

通常讲述的都是英雄人物如何克服困难, 保卫家园, 凭借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去成就自己的理想。梳理黑龙江满族说部英雄传说的核心内容, 参考满族文化中的英雄崇拜与历史记忆, 分类呈现题材特点。

《招抚宁古塔》: 招抚宁古塔讲述了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 派大将军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出征以宁古塔为中心的东海女真窝集部的故事, 涵盖了天地生成、民族聚散、古代征战等内容。聚焦清初民族融合事件, 具有历史叙事的冲突性与场景丰富性, 适合动态视觉演绎。

《完颜阿骨打与海东青》: 传说完颜阿骨打的母亲临盆时, 辽国元帅率军追杀, 其父亲劼里钵在逃亡途中受

作者简介: 赵伟强(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遗传播、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曹宇欣(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遗传播、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郭俊傲(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遗传播、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通讯作者: 李 奇(1980—),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伤。危急时刻,一只海东青(大白雕)在空中鸣叫“阿骨——打”,唤醒山神引发山洪击退辽兵。为感恩,新生儿被命名为“阿骨打”(满语“像鹰一样勇猛”),并将海东青奉为守护神。这一情节将英雄诞生与图腾崇拜结合,赋予完颜阿骨打“神选之人”的合法性。

将完颜阿骨打与海东青围绕图腾崇拜与英雄神话,蕴含符号化叙事特质。通过剪纸这种民间艺术的视觉呈现,结合AIGC技术探索传统工艺的数字化创新路径,旨在构建“原真性传承到现代性表达”的将民族故事的可视化设计。

(三) 图腾文化与“海东青”崇拜

满族图腾文化中,“海东青”(满语称“雄库鲁”)是极具代表性的神圣图腾,被视为通神的“神鸟”,象征着勇敢、敏捷与智慧。体长52-63厘米、体重1310-2100克,属中型猛禽科。放飞时,它搏扶摇羊角而上,直入云际,在空中飞行发现猎物后,迅速将两翅一收,急速俯冲而下,就像投射出去的一支飞镖,径直的冲向猎物。^[3]

满族说部《阿骨打传奇》中有阿骨打对海东青的描述:阿骨打对海东青情有独钟。哪知契丹皇帝与贵族也酷爱海东青,本来大家都是从草原上来的,喜好打猎也没错,但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每岁大寒,必命女真发甲马数百至五国界取之,往往争战而得,国人厌苦”。^[4]

海东青是一种体型矫健的猎鹰,在黑龙江寒冷的自然环境中,其捕猎能力被满族先民视为征服自然的力量象征,逐渐融入民族精神与文化记忆。在满族说部中,海东青频繁出现于英雄传说与神话故事,如《女真谱评》《完颜阿骨打与海东青》等说部中。

海东青常作为英雄的助手或图腾化身,承载着族群对自然的敬畏与抗争精神。例如,部分说部讲述海东青引领先民寻找栖息地、战胜天敌的故事,体现了满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态观念,成为满族文化中极具辨识度的符号。

(四) 说部“乌勒奔”文化内涵

满族说部满语称“乌勒奔”(ulinben),意为“长篇叙事诗”或“世代相传的故事”,满族说部的形成与传承,植根于历史悠久的满族及其先民“讲古”的传统习俗,用来记录族史家传,“诵唱祖宗创业艰难”的口头叙事传统。^[5]“乌勒奔”不仅是故事的载体,更是满族历史记忆、族群认同的重要媒介。

其传承方式严格遵循“讲古”传统,内容涵盖祖先迁徙、战争英雄、民俗禁忌等,具有“以口传史”的文化功能。在黑龙江满族说部中,“乌勒奔”的叙事结构常融合神话、传说与历史,形成独特的“亦史亦诗”风格,例如《尼山萨满传》《西林安班玛发》等经典说部,通过宏大的叙事脉络展现满族先民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成为研究北方民族口述史的重要文本。

(五) 满族服饰纹样文化内涵

满族传统服饰以其独特的形式语言展现了满族人民的审美思想和性格神韵,是中国璀璨服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6]研究满族服饰的分类、色彩与图案的应用场景,蓝、白、红、黄等色彩的寓意,龙、凤、云纹等图案的象征、满绣的精湛制作技艺。分析服饰特点,绘制出尧舜禹到清代满族服饰的款式的演变过程可视化,这些特点反映满族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

满族传统服饰刺绣纹样承袭了本民族骑射服饰特有元素。满族传统服饰刺绣纹样在表现内容上,主要以天然植物纹样为主,动物为辅;以写实形象为主,神话传奇形象为辅;以天地云海为主,人造器物为辅。^[7]

二、《满韵乌勒奔 龙江一脉传》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实践

(一) 信息可视化设计呈现方式



图1 《萨大人传》



图2 腾讯游戏《尼山萨满》

将数据整理与分析,对收集的黑龙江满族说部文本、音频、视频等资料进行筛选与分类,提取关键信息,同时整理满族服饰、民俗文化的相关信息。

运用采用图表、图形、等可视化形式,选择结合满族文化元素设计可视化界面,增强文化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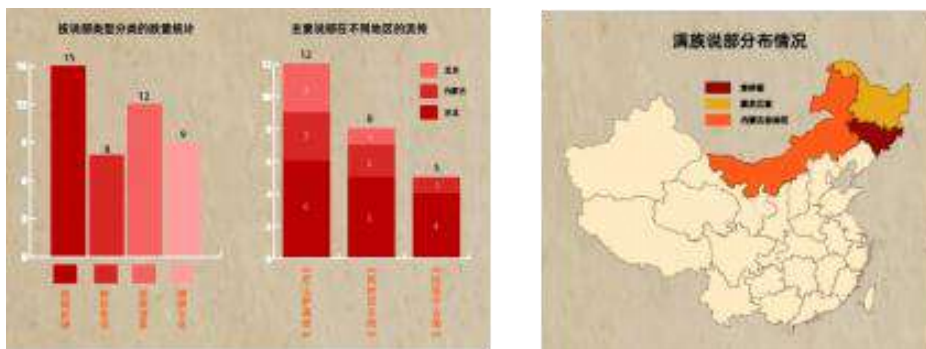


图3 信息可视化图表

设计一系列信息图表,如以时间轴形式展示黑龙江满族说部的历史发展脉络,标注重要历史节点与文化演变;运用地图可视化呈现说部在黑龙江及周边地区的流传分布,结合地域特色标注满族聚居地的文化特征。

(二)《招抚宁古塔》皮影风格设计创作过程

1.皮影造型的构建

皮影戏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形象不仅是艺术表现,更承载着历史叙事与民俗文化。2008年,岫岩满族皮影戏收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隶属于传统戏剧类别。^[8]其夸张的造型、鲜明的色彩,体现了民间艺人对角色的塑造智慧,以及传统艺术中“写意”与“写实”结合的审美追求。



图4 《招抚宁古塔》场景搭建

努尔哈赤造型塑造:

人物造型上头戴华丽盔帽,饰有彩色纹样,彰显角色的武将身份。面部轮廓分明,眉眼夸张,嘴角上扬露出牙齿,表情威严且富有动感,体现皮影戏“以形传神”的特点。在服饰细节方面,身着棕色戏服,衣袖和裤腿饰有白色、蓝色的传统纹样,色彩古朴且富有层次感,反映民间艺术的装饰美学。腰间束带,增强人物立体感,展现戏曲服饰的程式化设计。用道具与动态生动体现场景画面,努尔哈赤右手持长枪,枪杆系红色飘带,枪头锋利,配合跨步奔跑的姿势,营造出战斗或出征的动态场景,传递出强烈的戏剧张力。

反派角色形象:

将反派人物造型进行丑化处理,头戴小帽,发髻高束,面部表情夸张,眉眼上扬、嘴角大张,露出戏谑或挑衅之态,典型“丑角”造型,传递出活泼或狡黠的性格。在服饰细节上,身着黄色为主的戏服,上衣饰白色、红色纹样,腰间系棕色腰带,下装是黑白格子图案长裤,色彩对比强烈,装饰纹样体现民间艺术的程式化审美。并且让角色右手高举戟杆黑的三叉戟,武器造型简洁,呈现出仰头的动态效果,暗示角色的战斗属性或威慑力。

女性角色形象:

将女性头饰进行华丽且富有层次感的设计,并且饰有羽毛、花朵,长发披肩,发间点缀红色小花,尽显典雅,典型旦角装扮。女性服饰以橙黄色为主,颜色色彩丰富,衣袖、裙摆绘精美花卉玫瑰纹样、卷草纹,领口、袖口配蓝红边饰,腰间红带束身,服饰华丽细腻,体现皮影服饰的装饰性与程式化。左手持八角鼓,鼓面红饰、鼓边金点,右手握带彩飘鼓槌乐器,表演功能。侧身站立,身体微前倾,持鼓与乐器的姿态优雅,似正进行表演,展现皮影角色动态的生动性与节奏感。

2.皮影场景的搭建



图5 皮影场景的搭建

右侧松树,枝叶繁茂,翠绿欲滴,藤蔓垂挂,树枝上海东青站在上面,伸出双翅,呈现出战斗姿态,彰显生机与坚韧,象征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左侧山水形成视觉焦点对比。

连绵山脉中,近处棕褐山体以简洁线条勾勒纹理,远处渐次淡化为青绿、灰调,山间白色线条增强层次感与空间感,整体颜色为棕黄色,更符合皮影风格。体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山水意境。

画面色调古朴和谐,构图疏密有致,既展现自然山水的雄浑壮阔,又通过松树的灵动增添生机,体现传统艺术中“刚柔并济”的美学特质,给人以宁静、悠远的视觉享受与文化熏陶。

(三)《完颜阿骨打与海东青》剪纸风格设计创作过程

1.AIGC 辅助剪纸风格绘制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的兴起,为传统工艺的设计与创作提供了新的手段,使得艺术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与便捷化,此项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推动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转型,还能提升其在当代社会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9]



图6 豆包 AI 生成图片



图7 哩布哩布 AI 转绘风格图片

剪纸艺术作为中国民间传统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积淀,剪纸是通过纸张的简单裁剪,反映出生活理念、社会风俗和民族信仰,每件剪纸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常与节庆、婚嫁、祝福等主题密切相关,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10]

在哩布哩布 AI 输入 prompt 进行 AI 生图，由于 AI 生成具有随机性，所以一次尽量多生图，再寻找合适的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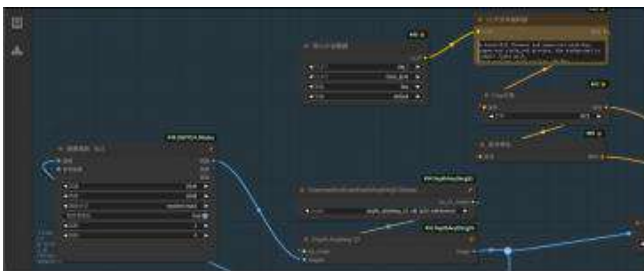


图 8 哩布哩布 AI 提示词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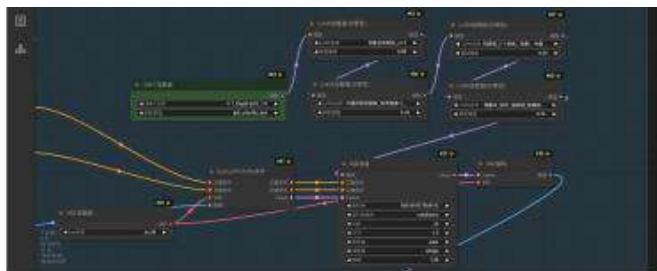


图 9 哩布哩布 AI 采样器、Lora 模型生图区域

左侧女子头戴花饰，怀抱婴儿，跪地凝视，流露不舍与牵挂；右侧男子身披铠甲，手持长剑并且背挎副剑，姿态挺拔，似即将出征或守护，彰显英勇与责任。二者形成“家庭与使命”的情感对峙，传递离别或守护的复杂情绪。

上方海东青展翅，象征自由、勇气与命运的莫测。远处山峦巍峨，一群拿着武器的人物沿山径逼近，营造紧张氛围，强化画面的戏剧性与叙事性。

2. 手工修正与二次创作

突破 AI 平涂局限，增强立体感；表情细节手工刻画（如女子的牵挂眼神、男子的坚毅神态），深化情感叙事。将雄鹰翅膀与剪纸线条结合，进行二次创作创新、元素重构，手工修剪远景山峦轮廓，使自然景物更具野趣，与近景精致人物形成对比，拓展叙事空间，去除多余的画面，使其更能突出所表现的画面情节。



图 10 AI 生成图片进行二次创作过程

继承剪纸艺术的民俗基因，融合 AIGC 的创意生成与手工剪纸效果的个性化调整，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赋予“英雄与家庭”等传统题材新的视觉语言。既保留民间艺术剪纸的程式化线条的质朴，又注入手工与现代 AI 技术的材质融合创作的灵动，展现非遗在数字时代的跨界生命力，将传统技艺进行 AIGC 辅助的呈现创作。

剪纸的镂空线条与红色主调，既体现民间艺术的装饰美感，又通过强烈色彩对比凸显人物情感，将红与白的冷暖碰撞，象征热血与纯洁、使命与牵挂。构图上，近景人物的细腻与远景山水的粗犷形成层次，海东青的动态打破静态，增强画面张力。

四、归纳总结

本研究旨在构建个性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可视化设计方法，其核心在于提出并实施“民间艺术语言提取—叙事场景解构—技术工具适配”的三阶段设计流程。

该流程首先致力于深度挖掘与提炼特定非遗项目所蕴含的独特视觉元素、象征意义与文化基因，进而剖析其承载的历史事件、神话传说或生活习俗背后的叙事结构与核心场景，最终基于前两阶段的语义理解与叙事需求，精准匹配并应用恰当的可视化技术与交互手段。有助于提升该领域设计的系统性和效率。

同时，本研究聚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在非遗传承与创新中的应用边界。AIGC 在此过程中应扮演的核心角色是“辅助者”而非“主导者”。其应用必须严格遵循并深刻理解非遗的文化内涵与语义规则，其作用是在设计师的引导下，高效拓展创意可能性、辅助完成基础构型或提供多样性参考，绝不能脱离文化语境或僭越人类的文化判断力与审美决策权，以确保生成结果的文化真实性与价值延续。

参考文献:

- [1]戚娜,朱立春.满族说部的传承与变迁[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4,(05):1-7.
- [2]关志英.满族说部“唱段”的艺术特征及文化内涵[J].黑河学院学报,2023,14(10).
- [3]宋晓君.飞翔的图腾——海东青[J].黑龙江史志,2014,(20):26-29.
- [4]杨峰.满族说部中的猎鹰文化记忆[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06):133-136.
- [5]刘红彬,官月丽.瑗琿富察氏家族满族说部“乌勒本”研究[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4,45(11):15-20.
- [6]杨柳,宁俊.满族传统服饰刺绣纹样构成形式研究[J].满族研究,2021,(02):100-107.
- [7]满懿.旗装奕服[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 [8]吴凤玲.民众生活中的岫岩满族皮影戏及其传承保护[J].民族研究,2018,(05):78-85+125.
- [9]王融涓.AIGC 在非遗手工艺剪纸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纸和造纸,2024,43(05):55-57.
- [10]张旭.中原民间剪纸艺术中的传统文化内涵研究[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3(04):10-16.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of the Heroic Epics of the Manchu Storytelling School——Visual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AIGC paper-cutting art and Xiuyan shadow puppet style

Zhao Weiqiang¹, Cao Yuxin¹, Guo Junao¹, Qi Li*

¹ Faculty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oral narrative of the Manchu speaking tribe is now facing difficulties in modern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the classic storytelling works "Zhaofu Ninggu Pagoda" and "Wanyan Aguda and Haidong Qing" that are widely circulated in the Heilongjiang region, and uses Manchu storytelling based on heroic epic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Extract and integrate its content,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art forms and modern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conduct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nchu Xiuyan shadow puppetry style and paper cutting art, and through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search, deeply explores and accurately extracts the unique visual effects of the two, and then integrates these ethnic characteristic artistic elements into creative practice to create artistic works that inherit tradition and are innovative. And combined with AIGC technology to assist in the generation of paper cutting patterns, it presents a cross media transformation from oral storytelling to visual symbols.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artistic languag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activate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spa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viding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visual inheritance of ethnic narratives.

Keywords: Manchu Speaking Department;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hadow Art; Paper Cutting Patterns; AIGC Technology

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体育品牌传播策略的优化路径研究

宁国宏¹ 马妮卡²

(1.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25, 2.庆一大学, 庆尚北道 庆山 38428)

摘要:在媒介融合与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为更好的推动中国体育品牌的发展。本文以传播学与品牌建构理论为基础,采用文献分析与典型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了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体育品牌传播的演进逻辑,揭示当前体育品牌在品牌叙事、平台运营与用户互动等维度存在的核心困境,并进一步提出“文化叙事重构、多平台差异化运营与社群共创机制”三位一体的优化路径。研究认为:中国体育品牌的发展,亟须打破内容同质化与策略单一的困局,应强化品牌文化内涵构建,提升用户黏性与情感认同,实现传播效能的系统性发展。本研究旨在为本土体育品牌,在新媒介环境中的传播策略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新媒体; 体育品牌; 中国体育品牌; 传播策略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64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推动下,新媒体已成为当前社会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呈现的高度互动性、去中心化传播结构与实时反馈机制,不仅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与分发的方式,也对品牌的传播逻辑、传播内容及用户关系产生了根本性影响^[1]。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体育品牌作为融合了体育精神、民族文化认同与消费功能的复合型社会文化资源,其传播方式正由“产品导向”,逐步演化为“文化主导、用户驱动、社群共创”的多维传播方式。

近年来,伴随“国潮”兴起与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国体育品牌加快了品牌传播的媒介转型步伐。“李宁”“安踏”“匹克”等国产品牌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直播电商等新媒体平台不断拓展品牌影响力,实现市场声量和销售转化的双重突破,体育品牌传播进入了内容创意与文化表达并重的升级阶段^[2]。然而,在商业热度和平台多元扩张的背后,也逐步显露出品牌传播的系统性短板。如品牌文化表达流于表层、缺乏深层价值叙事;内容创作存在趋同化倾向、创新能力不足;平台策略碎片化、缺乏差异化运营逻辑;用户互动机制薄弱,难以形成深度共鸣与持久忠诚^[3]。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品牌传播的可持续性,也制约着品牌文化影响力与社会认同度的进一步提升。

在新媒体传播范式深度演化的背景下,系统梳理中国体育品牌当前面临的传播问题,并基于传播学与品牌管理理论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已成为推动本土品牌健康成长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旨在从新媒语境下中国体育品牌传播的现状分析出发,深入探讨中国体育品牌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路径,以期体育品牌实现文化价值、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新媒语境下中国体育品牌传播的现状分析

1.1 媒介环境变迁与传播的变化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以移动终端、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为核心的新媒体生态。这一新媒介环境颠覆了传统体育品牌以电视广告、报刊杂志等为主渠道的“中心化、单向度、线性式”传播模式,取而代之形成了“去中心化、双向互动、多平台联动”的立体传播格局。新媒体传播强调受众的参与性与交互性,打破了品牌与受众之间固有的信息垄断结构,赋予用户“共同讲述品牌故事”的权力^[4]。与此同时,智能推荐算法机制的广泛应用

作者简介:宁国宏(1980—),男,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经营管理。

通讯作者:马妮卡(1990—),女,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场馆运营。

也促使品牌传播由“广撒网”式的大众覆盖向“精准触达”式的个性化传播转型。

对于体育品牌而言,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变革意味着其传播战略重构。传播重心正由“产品导向”转向追求“情感连接”和“文化共鸣”。品牌与受众的关系更为紧密,传播内容不再仅着眼于功能诉求,更注重激发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以建立持久的品牌忠诚关系。这一背景下,由新媒体带来的时间碎片化,信息爆炸和注意力稀缺现象,使体育品牌传播面临更大的挑战,品牌不仅要在海量内容中争夺受众的“第一眼效应”,更需要在整体传播机制中形成“内容、平台、用户”的高频互动闭环,以实现用户认知的沉淀和品牌记忆的累积。只有在内容创意和传播路径上同时发力,才能有效突破注意力稀缺瓶颈,提升传播效果。

1.2 中国体育品牌传播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潮”崛起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提升,中国本土体育品牌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李宁通过推出“悟道”系列产品,率先引领品牌的国潮化转型^[5];安踏借助奥运会契机和国际知名运动员代言,来强化品牌形象^[6];匹克则依托自主研发的“态极”科技,打造差异化的产品定位^[7]。这一系列传播举措,体现出了各品牌对“文化重构与技术平台”变化的敏锐响应。在具体传播方式上,本土体育品牌高度依赖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开展内容运营,并通过短视频“种草”、明星联名合作、话题营销等手段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

同时,直播电商、KOL营销、社群裂变等新兴传播模式,也日益成为提升品牌转化率的关键环节。然而,当前中国体育品牌的内容、形式与节奏上仍存在趋同化问题。缺乏持续而鲜明的品牌文化表达,品牌之间的传播同质化现象严重。一些品牌对新媒体平台的运用仍停留在追逐短期流量的层面,忽视了与用户情感共鸣和品牌长期建设之间的平衡。这种“流量至上”的策略导致虽然一时曝光率很高,但用户难以形成长期黏性,品牌的文化价值也难以沉淀。

1.3 新媒体推动下的传播特征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体育品牌传播呈现出诸多的时代特征。如互动性增强:传播模式由单向信息推送转向双向互动。品牌通过弹幕、评论、投票、用户生成内容等机制,构建起用户参与渠道,极大提升了用户的参与感和归属感^[8]。如内容视觉化与情感化,品牌传播更加依赖图片、短视频、表情包等视觉载体,同时注重叙事手法和情感共鸣的营造。通过视觉冲击和故事共情来打造用户的情绪连接,实现文化身份认同的强化。

以及传播平台碎片化与协同化并存,传播渠道日趋碎片化,品牌需要针对不同平台实施差异化策略,以实现信息风格、表达方式与用户喜好的精准适配。同时,各平台传播又要求形成联动协同效应,确保品牌形象和核心信息在多平台上传递的一致性。用户共创成为品牌资产构建的重要环节,用户不再仅是内容的接收者,更是品牌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品牌资产的积累开始呈现“共创式”特征。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和传播的程度,已成为品牌影响力和忠诚度提升的关键因素。所以,这些新特征推动了体育品牌的角色定位,从过去的“产品符号”转变为具有文化意义的“社会标签”,也对品牌传播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媒体语境下,体育品牌只有顺应这些特征调整传播思路,才能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打造独特的品牌价值。

2. 中国体育品牌传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

2.1 品牌叙事缺乏文化的内核

在新媒体语境中,体育品牌已不再只是产品的代名词,而是文化身份、生活方式甚至国家形象的象征载体。然而,当前多数中国体育品牌,在品牌故事和文化叙事的构建上仍存在明显短板,缺乏系统化的文化内核支撑。这使得品牌传播难以升华出更深层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共鸣,如独特文化符号与价值主张的缺乏。许多本土品牌的传播内容倾向于模仿国际大牌,缺少自身独有的文化符号和价值理念,难以形成与其他品牌区别开来的稳定品牌认知体系^[9]。品牌故事往往停留在表层卖点,缺乏深入的文化挖掘。“国潮”表达流于表面:不少品牌在传播中虽然尝试融入“国潮”元素或传统文化符号,但往往只是符号化地植入诸如中国风图案、传统IP联名等表面形式,缺乏对其背后历史渊源和精神内涵的深入阐释与持续耕耘。这样的浅层文化营销策略虽能在短期内激发话题热度,却难以沉淀为可持续的品牌文化资产。

缺少与年轻受众情感共鸣的桥梁: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体育精神方面,品牌尚未找到与年轻一代用户建立情感共振的有效途径。很多传播内容虽有一定话题流量,但由于缺乏能够打动年轻受众内心的情感元素和叙事角度,难以转化为用户对品牌的长期认同和忠诚。这导致品牌内容有传播声量却缺乏黏性,无法有效驱动受众

的复购和持续关注。

2.2 平台策略单一与内容趋同

目前,各体育品牌虽然广泛进驻了多个新媒体平台,但内容生产和平台运营策略上普遍较为单一,不同平台间缺乏差异化,导致传播内容趋同,难以精准触达细分受众。一方面,多平台内容简单复制,缺乏差异化运营。大多数品牌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和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采用近似的营销手段^[10]。不同渠道发布的内容大同小异,造成品牌之间及平台之间的传播同质化倾向,形成了所谓的“传播内卷”。缺乏针对各平台特点量身定制的内容策略,使得内容很难在不同圈层用户中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内容分发缺少数据驱动的精细策略。在平台选择和内容分发上,品牌普遍缺乏基于大数据的内容分层运营策略,难以及时根据不同平台的用户画像和偏好输出差异化内容^[11]。也就是说,缺少科学的用户细分和内容定位,导致要么“一刀切”地发布相同内容,要么盲目跟风热点,无法充分满足各细分受众的需求。

另外,忽视长期沉淀,追逐短期流量。部分品牌对新媒体平台算法机制缺乏深入理解,过度追求短期流量冲高,而忽视了品牌长期价值的沉淀与用户长期运营。例如,一些品牌热衷于打造所谓“爆款”短视频或刷话题热度,但由于缺乏配套的后续用户留存和转化策略,往往出现流量高峰过后实际转化率不佳的情况,难以将一次性流量积累转变为可持续的用户资产和内容生态闭环。

2.3 互动机制与传播深度不足

新媒体传播强调“用户即内容”,用户的参与、创作与互动能力已成为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然而,目前中国体育品牌在用户互动机制设计与社群运营方面整体较为薄弱,导致品牌传播深度和用户忠诚度均显不足。在用户互动层面,缺乏共创激励。在与用户的内容互动方面,许多品牌仍停留在“单向推送一点赞与评论”这一初级阶段,缺乏更深入的情感交互和用户共创的激励机制^[12]。用户虽然可以对品牌内容点赞、评论,但很难真正参与到品牌故事的创造中,无法切实感受到自己在品牌传播中的角色与价值。

社群建设乏力,核心用户缺少归属:在用户社区和粉丝经营方面,本土品牌普遍缺少长期经营的粉丝社群体系和成熟的社群文化。品牌鲜有官方组织的线上线下结合的用户社群活动,缺乏类似 Nike 的“跑步社区”、Adidas 的“训练营”那样有凝聚力的主题社区。国内品牌的用户组织通常结构松散、内容更新缓慢,互动机制薄弱,无法有效维护和激发核心用户群体的热情。

忽视用户内容共创,传播生态单一。许多品牌缺乏与用户共建内容的平台和机制,未能重视用户原创内容的激励与再传播。由于没有鼓励用户参与创作品牌相关内容,品牌的传播生态局限于官方单向输出,内容来源单一。用户的创造力没有被激发出来,也就无法形成多元丰富的内容生态,使得深度拓展和情感认同的形成受到限制。上述问题,使得体育品牌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用户的黏性不足、互动深度不够,品牌声量与用户忠诚度难以同步提升。因此,有必要针对品牌文化内涵、平台运营策略和用户互动机制等方面,全面优化体育品牌的传播策略,以解决这些瓶颈。

3. 中国体育品牌传播策略的优化路径

3.1 品牌文化表达的调整策略

文化内涵是体育品牌传播的灵魂。在新媒体语境中,体育品牌传播的关键不再是简单“讲清产品”,而是要“讲好文化”。品牌不仅需要呈现产品的功能价值,更需在传播中融入文化认同、精神符号与社会情感。首先,要明确品牌文化定位。每个体育品牌都应梳理自身的历史渊源,以及运动精神和时代诉求,从中提炼出独特的品牌精神内核。例如,可以围绕“民族自信”“挑战极限”“青春力量”等主题关键词,形成有别于其他品牌的核心价值主张,并将其贯穿于所有传播内容。清晰的文化定位有助于增强品牌的价值共鸣,使受众一提到品牌就能联想到特定的文化意涵。

其次,要打造系统化叙事体系。品牌传播不能仅依赖零散的热点事件,或单一的广告创意,而应构建具有内在逻辑的连续叙事体系。通过系列化、故事化、仪式化的内容设计,形成品牌自己的“叙事闭环”。例如,以品牌精神为主线策划连续的主题活动或故事篇章,逐步丰富品牌的故事世界。系统化的叙事有助于增强用户对品牌的记忆点和情感联结,在潜移默化中积累品牌认同。

最后,要深化文化符号建构与可视化表达。充分运用视觉、行为和产品等多元语言来塑造品牌的文化符号体

系。比如,通过统一的色彩风格、Logo 演绎、独特的文案语调等视觉语言传递品牌调性;设计富有参与感的品牌仪式、手动动作等行为语言增强用户互动中的仪式感;推出联名款、限量版等产品语言将文化元素融入产品体验。

3.2 多平台差异化内容运营策略

面对高度分化的媒体平台生态,中国体育品牌必须摒弃简单“一稿多投”的发布思维,转向“平台适配、内容定制与风格统一”的差异化传播策略。要通过实际调研,针对不同平台的用户特征和内容偏好,进行精细化运营。在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等)上,需要强化“爆点”内容策划,突出短平快的传播特点。在这类平台上,可侧重展示产品功能亮点的创意短视频、发起富有挑战性的体育动作话题、剪辑赛事精彩瞬间并配以激昂音乐,激发用户即刻关注和转发。在短视频平台打造一两个现象级的内容“爆款”,有助于快速聚拢品牌热度。

在社交社区平台(小红书、微博等)上,需要注重输出融入生活方式和文化叙事的内容,营造品牌话题讨论空间。在小红书等平台上,可通过明星、达人演绎品牌运动穿搭、场景化推荐“种草”品牌产品,分享运动生活方式笔记。在微博上,结合社会热点巧妙植入品牌态度和价值观,与粉丝进行话题互动,以构建用户对品牌的想象空间和情感连接。在长视频及深度内容平台(B站、微信公众号等)上,需要开展专业而深度的内容运营,塑造品牌的权威性与知识性。例如,在B站上传品牌纪录片、运动科普或训练教学视频,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深度长文或运动干货内容。通过这些富有专业含量的内容,一方面展示品牌在体育领域的专业积淀,另一方面满足核心用户深入了解品牌故事和理念的需求,增强用户黏性。

最后,要建立跨平台数据联动机制。通过整合不同平台的用户互动数据、内容传播效果数据,及时掌握各平台的运营状况和用户反馈。据此进行内容策划调整、投放优化和路径修正,实现各平台运营策略的动态优化与闭环提升。例如,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调整内容发布时间、频率或形式,在加强弱势平台投入的同时巩固优势平台效果,确保全网传播资源的最优配置。

3.3 用户共创与社群化传播策略

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用户已不再只是品牌传播的被动接收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内容共创者乃至“二次传播者”。要提升品牌资产的累积速度和传播的深度,中国体育品牌应当把培养用户社群,以及激发用户共创。一方面,搭建兴趣导向型用户社群。基于运动兴趣、生活态度或地域文化等维度,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品牌用户社群平台。例如,可以组织“跑步俱乐部”“高校篮球联盟”“国潮体验营”等不同主题的用户社区,通过定期的线上讨论和线下活动,强化用户之间以及用户与品牌之间的联系,培养用户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在这些社群中,品牌应扮演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提供话题、资源和平台,让用户自主参与互动,从而形成品牌粉丝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激励UGC内容创作。设计多样化的用户内容创作激励机制,鼓励用户主动生产品牌相关内容。比如,可以定期发起“挑战赛”“互动问答”“晒单故事”“打卡行动”等活动,引导用户分享自己的运动故事、产品使用体验或创意内容,并给予优秀UGC作品以官方推荐、积分奖励、限量周边赠送等正向激励。通过这些举措,将普通用户转变为品牌内容的贡献者,并借助社交平台的分享扩散实现用户内容的二次传播,放大品牌声量。

最后,还应该共建品牌内容生态。通过设置“品牌共创官”“用户大使”等角色,邀请核心用户深度参与品牌内容策划、新品命名、口号创意征集等环节,让用户真正参与品牌决策,在共创中强化主人翁意识。用户的创意被品牌采纳并展示后,不仅能增强其对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也能为品牌注入新鲜的创意元素。随着共创机制的成熟,体育品牌的传播将从单一主体的输出跃升为多主体协作——品牌 and 用户共同打造内容,形成强互动、高黏性的社群生态。这种由品牌与用户共建的传播生态将为品牌赋予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推动品牌传播从一次性的营销行为向可持续的传播系统转型升级。

4. 结语

在新媒体环境下,体育品牌传播模式由传统单向输出转向平台化、社群化、参与式的互动传播,传播目标亦由单纯曝光转变为文化建构、用户参与社群运营的多维协同。当前中国体育品牌在传播实践中面临三重困境,品牌叙事缺乏深层文化内核与价值主张,内容运营呈现高度同质化与平台策略单一,用户互动机制薄弱,难以形成

有效共创与社群黏性。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品牌影响力与长期竞争力的提升。为此,本文提出三项优化路径:第一,通过重构品牌文化表达体系夯实品牌软实力;第二,推进多平台差异化内容运营,实现精准触达与系统联动;第三,构建用户共创与社群化传播机制,提升用户参与度与品牌忠诚度。最后,三者协同发力,有助于推动体育品牌传播由分散行为向系统机制跃迁,提升品牌在数字媒介语境中的传播效能与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杨璐萌.水立方官方自媒体平台品牌传播策略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9.
- [2] 方辉樞.中国自主品牌体育用品企业竞争力国际比较研究[D].海南大学,2023.
- [3] 张福银.符号表意:优秀品牌文化的情感塑造[J].海南开放大学学报,2024,25(04):98-103.
- [4] 陈斌,韩小林.新媒体视域下新闻传播特点及发展方向[J].记者摇篮,2025,(07):39-41.
- [5] 邓伟.安踏公司的体育营销策略优化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23.
- [6] 石天野.匹克态极运动鞋产品营销策略研究[D].河北大学,2020.
- [7] 宁静远.李宁“悟道”归来[J].创新世界周刊,2019,(04):84-87+7.
- [8] 焦世文.价值共创视角下设计介入短视频平台品牌传播的触点研究[D].江南大学,2024.
- [9] 陈玉芳.新时代经济下国产体育品牌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J].营销界,2021,(38):197-198.
- [10] 张佳樾.互联网思维背景下的企业新媒体营销研究[J].营销界,2025,(02):13-15.
- [11] 石天野.匹克态极运动鞋产品营销策略研究[D].河北大学,2020.
- [12] 李天植,丑卉.新媒体时代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0,(02):51-52.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Chinese Sports Br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Ning Guohong¹, Ma Nika²

¹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Guangzhou City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China

² Graduate School, Kyungil University, Gyeongsan, South Kore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ed media convergenc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brands. Based on communication and brand construction theories, and employing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ypical case study method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ports brand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new media context. It reveals the core dilemmas in brand narrative, platform operation, and user interaction dimensions of current sports brands.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a three-pronged optimization path: "cultural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multi-platform differentiated operation, and community co-creation mechanism."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brands, it is crucial to break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content homogenization and one-dimensional strategies. It advocates for reinforcing br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enhancing user engagement, and emotional recognition to achieve the syste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or local sports brand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Keywords: New Media; Sports Brands; Chinese Sports Brand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三维重建技术在望奎皮影保护与传承中的应用研究

郭俊傲¹ 李晶源² 赵伟强³ 李奇*

(1.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本论文旨在针对望奎皮影所面临的传承与保护的困境难题, 深入的探讨了三维重建技术在望奎皮影的保护和传承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和优势。通过分析望奎皮影的风格特色、艺术特点以及发展到当今所面临的困境, 并结合三维扫描与三维重建的技术, 从传承到发展方面提出了皮影的建模、表现过程数字化整体性方案。旨在为望奎皮影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上的支撑, 助力国家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传播。

关键词: 三维重建技术; 望奎皮影; 数字化保护; 文化传承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35

一、望奎皮影的艺术特色与保护现状

(一) 望奎皮影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望奎皮影戏作为松花江以北“江北派”皮影戏的重要分支, 望奎皮影戏在文化传播学层面呈现出典型的涵化特征。^[1] 望奎皮影是黑龙江的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皮影的线条流畅、色彩丰富且融合了东北的地方特色和风格具有深刻的寓意, 望奎皮影主要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生动的唱腔表演以及丰富的剧目种类而闻名。在表演时, 艺人需要通过操纵杆控制皮影的表演, 在声音方面需要配合当地的二人转与地方方言, 讲述民间的故事, 历史传说。望奎皮影承载着大多数东北人民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精神。(如图 1、2、3)



图 1 笔者调研



图 2 笔者调研



图 3 笔者调研

(二) 望奎皮影面临的保护困境

望奎皮影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传承人老龄化严重, 传承体系濒临灭绝的情况。现在能够熟练掌握制作工艺和演奏方法的大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艺人。因为其学习周期长, 经济收益低等情况, 所以导致年轻一代参与传承的积极性较低。根据笔者团队赴望奎与望奎皮影第四代传人关海英老师的交谈中得知, 望奎皮影在近十年来专业传承班的招生人数下降超过 40%, 部分技艺面临着失传的风险。

当今, 以谷宝珍为首的老一辈艺术家还是望奎皮影的主要表演者, 在传承人的问题上, 对望奎皮影来说也是一大挑战。真正的望奎皮影传承人不仅仅要学习皮影的表演和演奏, 还要学习皮影的制作自己修补工作。皮影的

作者简介: 郭俊傲(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视觉传达与数字媒体设计;

李晶源(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视觉传达与数字媒体设计;

赵伟强(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视觉传达与数字媒体设计。

通讯作者: 李 奇(1980—),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制作看似简单,实则需要足够的耐心去进行雕琢。一个皮影人的制作包括制皮、描样、雕镂和上色等十几项步骤,其制作时间长并且需要足够的细心和耐心,因为在制作过程中有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会导致前功尽弃,一切又要从头开始。^[2]皮影戏是一种精神文化娱乐活动,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非生活、生存必须的艺术载体,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其生存空间很容易受到冲击。首先皮影戏表演需要的皮影生产工序繁琐,需要一个熟练的皮影加工匠人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机器生产很难全部取代皮影制作的手工艺流程。^[3]因此培养一名优秀的传承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传承人自身也需潜心钻研望奎皮影戏,把传承弘扬望奎皮影戏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其次就是望奎皮影的保护手段比较落后,目前为止望奎皮影的保护手段和方法大多依赖文字记录和照片的形式,皮影本身的细节和表演时的操作方法等不能够被完整保存。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系统性的保护方法和策略难以实施,这就导致望奎皮影只能在当地和周边地区传播,所以就导致在年轻的群体中认知性比较低。此外,在望奎皮影的保护和传承中几乎从未出现过先进的三维扫描与重建,动作捕捉以及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难以保证望奎皮影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与此同时,已有的少量数字化资料缺乏统一标准和规范管理,无法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难以发挥数字化保护的优势。

非遗通过数字化保护所得到的数据具有全面性,准确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为非遗的研究和传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产。学者可以借助数字化资产,从多个角度分析皮影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等。通过对三维非遗模型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与学习,能够探究其制作技艺和文化寓意;对数字化非遗进行数据挖掘,可以揭示其背后的变迁规律。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于非遗的认知,为非遗提供更加科学和稳定的保护和传承方法。

二、三维重建技术概述

(一) 技术原理

三维重建技术旨在将来自二维或三维输入数据源的信息转化为可视化的三维模型^[4],是融合了计算机视觉、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摄影测量学与数字图像处理理论,通过获取多视角图像或点云数据构建物体三维模型。其核心流程包括:首先,利用激光扫描或多相机阵列来采集物体表面信息,从而得到高精度点云数据;其次,通过特征提取与匹配算法(如 SIFT、ORB)计算图像间几何关系;最后,运用物体面重建算法(如 Poisson 重建、Ball Pivoting 算法)生成三维网格模型,并通过纹理映射的方法实现真实感渲染。其可应用在增强数据的可视化、实现自动化的规范制图、准确的医学造影处理、虚拟现实以及增强现实应用、促进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导航系统、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建筑的保护等众多领域。大大提升了数据分析和决策的实施效率等。当前,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因其高速度与毫米级的高精度,成为应用最成熟的方法。^[5]

(二) 技术优势

三维重建技术具有高精度,非直接接触,记录完整等特点。在非遗保护应用中,该技术可以毫米级别的实现传统工艺工具,工艺流程,表演动作等细节的还原,例如通过激光扫描可捕捉木雕作品 0.1mm 的纹理起伏;非接触式采集避免对脆弱非遗物体(如古籍、传统服饰)造成人为损伤;同时,结合多源数据融合(如影像、音频、动作数据),能够完整记录非遗的物质与非物质多种要素,构建具有空间形态、文化内涵的数字孪生体。

三维重建技术与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技术(AR)相结合生成的数字模型因其具有高精度的特点,可以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非遗体验。在虚拟现实环境中,用户可以全角度的自由观察非遗的作品细节,甚至可以“亲手”拆解传统非遗的构件,了解其穿插结构和原理;通过增强现实技术,用户通过扫描现实场景,即可触发虚拟非遗中的动态展示。如在景区内扫描特定的标识,便能看到传统非遗的制作和表演的虚拟再现的全过程。这种沉浸式交互式的方式,能够打破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极大的提升了非遗的吸引力和传播力,尤其能够吸引到年轻群体的关注。

(三) 技术发展趋势

当前,三维重建技术正在朝着智能化、轻量化与跨平台融合等方向发展。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如 Pix2Vox、

AtlasNet), 能够使单张图像快速生成三维模型, 降低了数据采集的门槛; 轻量化模型压缩技术 (如 Octree 编码、Mesh 简化算法) 使三维数据可在移动端流畅展示; 通过非遗与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 技术融合, 为用户沉浸式体验创造条件, 推动望奎皮影从静态记录向动态交互方向升级。

三、三维重建技术在望奎皮影保护中的应用路径

(一) 皮影道具的高精度三维建模

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倾斜摄影相结合的方式, 采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望奎皮影道具和人物模型数据。利用高分辨率摄影测量技术对具有高精度雕刻特点的头部和衣服等部位进行采集, 获取其纹理上的细节; 对于整体的结构, 可以通过激光扫描快速的获取点云数据。运用专业三维建模软件, 如 Maya, 3Dmax, blender 等; 将采集的数据进行整合处理, 生成包含几何结构与纹理信息的高精度三维模型, 并建立皮影道具数字数据库, 实现对皮影艺术造型的永久保存。最终, 这些三维模型导出为多种格式 (如 obj、.fbx、.stl 等), 以便于在虚拟现实 (VR) 或增强现实 (AR) 环境中进行展示和交互。^[6]

(二) 皮影表演过程的动态数字化记录

在皮影表演的现场布置多台相机和动捕设备以便于记录艺人的操作方法, 皮影的运动轨迹和舞台的灯光变化等。(如图 3-1) 同时结合音频采集设备, 获取完整的音频, 如唱腔, 配乐和旁白等。通过后处理技术, 绑定动作数据和三维皮影模型, 制作成为可交互的动态表演模型, 观众可以通过手势操作重现皮影表演的全部过程, 深入了解皮影的文化内涵和深厚底蕴。例如, 国内的影视飓风公司通过多摄像机扫描云冈石窟以及聘请专业舞蹈团队进行舞蹈来进行扫描, 记录整个舞蹈过程和云冈石窟的环境, 就是运用了动作捕捉和三维重建技术。

(三) 数字化成果的创新传播与应用

通过对望奎皮影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中的开发。在 VR 环境中(如图 4、5、6), 用户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皮影的表演, 甚至可以虚拟式的操纵皮影表演。通过 AR 技术, 用户可以使用手机 APP 扫描现实场景, 就可以触发皮影在现实空间的动态展示, 增强用户的体验趣味和传播性。此外, 还可以搭建望奎皮影的线上虚拟展馆, 将其三维模型和数字化数据进行整合处理, 这样有助于打破非遗的地域性限制, 极大的扩大传统非遗的影响力。



图 4 笔者体验 VR



图 5 笔者体验 VR



图 6 笔者体验 VR

(四) 个性化定制与创意衍生, 推动非遗创新发展

通过对三维模型的重建和数字化数据的分析, 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受众需求进行个性化的定制。设计师可以从传统的图案和造型中提取出所用的元素然后利用模型开发出各种文创产品, 结合现代的审美观念设计出各种饰品, 文具等。在影视和游戏产业, 可以根据非遗道具或场景设计出三维虚拟场景, 能为用户打造新颖的娱乐体验。这种个性化的定制和创意品的衍生品, 能够激发大众特别是当代年轻人对非遗的兴趣, 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 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推动非遗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

四、结语

笔者认为三维重建技术能够为望奎皮影的数字化传承和保护提供创新且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望奎皮影进行高精度建模与实时动态记录,能够实现望奎皮影艺术的完整保存。借助现代数字化传播手段,扩大了其文化影响力,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参与非遗的传承和保护。然而,在三维重建的应用过程中仍面临着众多问题,如数据标准不统一、技术成本难以控制以及与传统传承方式不易融合等。所以在未来,需进一步优化技术应用流程,加强跨学科合作,探索望奎皮影在数字化保护方面的新模式,推动望奎皮影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任浩砧.冀东皮影在黑龙江的在地化研究——以望奎皮影戏为例[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25,25(02):98-101.DOI:10.16792/j.cnki.1672-6758.2025.02.013.
- [2] 李钉钰,崔娜.黑龙江省非遗望奎皮影戏的保护与传承[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1,(04):16-18.
- [3] 谭艳超,由婧涵,高文利.皮影戏艺术的数字化应用——望奎皮影戏发展困境突破[J].绥化学院学报,2018,38(05):91-93.
- [4] 白琳.三维扫描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5,(06):125-128.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5.06.030.
- [5] 徐安冉.基于点云配准的三维重建技术研究[D].上海电机学院,2024.DOI:10.27818/d.cnki.gshdj.2024.000209.
- [6] 董三主.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非遗数字化虚拟场景制作中的应用[J].科技与创新,2025,(10):201-204.DOI:10.15913/j.cnki.kjycx.2025.10.055.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3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wangkui shadow puppetry

GuoJunAo¹, LiJingYuan², ZhaoWeiQiang³, LiQi^{*}

¹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inheritance dilemmas and protection challenges faced by Wangkui Shadow Puppetry,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s of 3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it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By analyzing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predicaments of Wangkui Shadow Puppetry, and combining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advantages of 3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 systematic plan is proposed, covering aspects from the 3D modeling of shadow puppetry props, the digitization of performance processes to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igital protection and dynamic inheritance of Wangkui Shadow Puppetry,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3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Wangkui Shadow Puppetry; digital prote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算法推荐机制下 2024 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的“去中心化”——基于抖音短视频平台的研究

刘骁¹

(1.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2024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于 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8 日在成都成功举办, 为举办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在互联网引起广泛专注。本文聚焦 2024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传播, 探究算法推荐机制下的“去中心化”现象。通过 app 漫游法的研究方法, 对收集的 3360 余条相关短视频数据进行分析。经研究发现, 在内容主题上, 运动员与赛事虽占主导, 周边内容也有较高曝光, 呈现去中心化; 传播主体方面, 主流媒体主导角色弱化, 自媒体积极参与, 形成多元格局; 用户个体端, 算法推荐导致关注差异, 用户行为引发体验差异, 内容消费偏好塑造圈层差异。短视频平台利用分布式算法重塑传播模式、挖掘市场价值, 用户借助去中心化实现个性化推荐与话语权提升, 为体育赛事传播与社交平台互动研究提供新视角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算法推荐机制; 去中心化; 体育赛事传播; 2024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6

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是乒乓球国际顶级赛事, 与奥运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称乒乓球“世界三大赛事”。2024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是中国主办的又一体育盛会。作为数字化参与度最高的一届混团世界杯, 大量用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以此获得混团世界杯相关信息。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54 次报告显示, 截至 2024 年 6 月, 中国网民规模近 11 亿人 (10.9967 亿人), 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56 亿, 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742 万人, 短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 95.5%^[1]。短视频作为当下最有影响力媒介之一, 拥有碎片化、即时性、情感化、娱乐性、社交性等传播特点, 进而影响并改变了中国传统传播生态, 为大众构建了一个自主叙事的空间。算法推荐作为支撑这一庞大体系高效运作的核心机制, 为平台用户建构一个多元且复杂的去中心化景观。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期间, 以抖音、微信视频号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 官方传播机构与普通用户生产共建混团世界杯内容生态, 此内容生态完整度上有欠缺, 部分发布内容都未能触及用户, 部分发布内容却又收获大量关注, 引爆流量, 成为平台推荐热门话题。短视频平台发布内容形式多样、参差不齐, 赛事信息、运动员信息、主办方信息、举办地周边信息均是内容生态构建重要元素。以 2024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作为具体研究对象, 讨论抖音平台用户短视频去中心化实践模式, 短视频平台系统运行用户推动机制, 用户参与行为与互动模式差异性, 短视频平台抖音用户个体端的去中心化差异关联, 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更涉及到体育赛事传播与社交平台互动新趋势和现实价值。学界现有关于国际乒联世界杯的传播研究甚少, 因此, 本文尝试从“算法如何影响国际乒联世界杯”出发, 结合“去中心化”视角, 以抖音平台为例, 分析 2024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中的去中心化现象。研究将重点探讨去中心化如何与抖音平台的推荐算法相互作用, 用户通过内容创作、互动与分享如何推动赛事内容的传播, 进而影响平台上赛事议题的去中心化。

一、去中心化

长期以来, 报纸、广播、影视等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传统媒体通常采用集中化传播模式, 即主要通过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进行信息筛选, 采取议程设置的方式来发布信息, 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指出新闻媒介呈现给大众的信息环境, 是媒介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后的世界^[2]。媒体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哪些新闻值得报道, 哪些议题可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种由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意味着普通观众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 是单向的集中化传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短视频平台如抖音 (TikTok)、

作者简介: 刘 骁(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艺术学。

快手、YouTube 等成为了信息传播的新兴力量，打破单一传播格局，社交媒体的大众型、开放性、互动性、娱乐性等属性，推动信息传播的民主化与个性化。与传统媒体由少数机构控制信息发布不同，短视频平台的低门槛、开放性和实时性为去中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平台支持（表 1）。去中心化一词源起于计算机语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1997）中，对去中心化概念做出进一步阐释，后信息时代将使得中央集权的信息传播模式向个人转移，即作为中心意象的媒介向个体分散话语权，使得人人都可以作为信息传播的焦点^[3]。短视频平台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赋予了每个用户内容创作、发布与传播的权利。普通用户不仅可以成为内容生产者，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互动方式影响信息的传播路径。短视频平台另一显著特点是基于用户行为数据进行的个性化推荐机制，平台通过算法分析用户的观看历史、兴趣爱好、社交互动等数据，为每个用户推荐相关内容，与传统媒体的信息过滤与议程设置不同，短视频平台让用户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内容的筛选者和组织者，这种推荐机制不仅增强了信息传播的精准性，还推动了内容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使得每个用户的观看体验都独特。去中心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就在于通过社区结构内部的转型带来人们彼此之间交往方式的转变^[4]，在抖音平台上传播 2024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相关内容，同样受到算法推荐下“去中心化”这一机制的影响，但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因有明显比赛周期性，其去中心化逻辑与一般体育信息有明显差别，其传播特征及用户与平台间的互动关系，这些都值得探讨与研究。

表 1 传统媒体与短视频平台的对比

传播模式	传统媒体	短视频平台
信息控制权	集中化，由少数媒体机构决定	去中心化，用户可以自由创作和传播内容
传播方式	单向传播，观众接收信息	双向互动，用户参与传播反馈
内容选择机制	编辑、记者筛选，新闻价值判断	算法推荐，基于用户行为数据
观众角色	被动接收，有限反馈	主动创作、互动，决定内容传播路径
信息多样性	内容同质化，有限的议题设置	内容多样化，个性化推荐
传播效率	低频次传播，传播范围有限	高频次传播，内容传播迅速
平台反馈机制	间接反馈（信件、电话等）	实时反馈（点赞、评论、分享等）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内容社交平台抖音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 app 漫游法(App Walk-through Method)对抖音平台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去中心化”方法，以 2024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相关传播内容为研究范围进行研究。app 漫游法是 Light 等学者在 2018 年提出的观察社交媒体平台的新方法^[5]，针对数字化时代的特有实地调研法，通过研究者的亲身体验来验证技术与文化符号间的关系，展现互联网平台与用户日常生活的嵌入关系，具体针对某个 app 界面、功能、行动路径等观察与研究。app 漫游方法源于文化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展现文化塑造的路径与影响机制，研究者依据数据结论诠释应用功能中的文化嵌入价值，以此反观用户的互联网使用价值观。

app 漫游法将观察员视为体验者，通过对平台用户、内容生成、数字技术、网路文化及平台经济等全方位观察，为研究提供全面分析。为更好使用 app 漫游法，本研究小组共有 4 位成员，其中 2 位从未使用过抖音，另外 2 位卸载重新下载抖音，并以新账户登陆，完全以新用户姿态使用抖音，以此避免原有用户行为带来的互联网使用记忆影响。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在 2024 年 12 月 1 日开始后，4 位观察员于每日 9 点打开抖音，观察并记录平台给每位用户分发的混团世界杯相关报道内容，每人每日刷 120 条，在这一过程中体会抖音平台的互动策略与算法机制。观察持续到 2024 年 12 月 8 日，共观察收集 3360 余条有效信息数据（下文表述中 4 个观察员均使用 A、B、C、D 来指代），4 位观察员还结合文本分析与深度访谈等方式，以此更好观察抖音平台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去中心化”，对 2024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相关内容生产与传播影响的研究目的。

三、去中心化了什么：抖音平台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的内容与传播主体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主要涉及传播内容与传播主体两个层面。剖析其“去中心化”的实质，有助于深入挖掘现象级传播案例背后的底层逻辑，尤其是其中蕴含的“逻辑价值”。本部分着重分析抖音平台上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的多角度去中心化，当传播内容去中心化时，可通过多主题视频促使多元内容进入受众视野，引发长尾效应。当传播主体去中心化时，意味着用户积极创作 UGC 内容，与官媒合力共筑传播格局，实现传播生态的多元共生与繁荣。

（一）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的内容主题分布去中心

在观察者所接收到的 3360 余条有关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的短视频中,按内容可分为以下 8 类。虽然内容分布以运动员与混团赛事为主,约占总数一半以上。但其他内容包括“球迷助威”“跨界合作”“成都旅游”等约占总数一半(图 1)。

1. 热门话题与核心内容呈现去中心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作为一项“现象级”体育赛事,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有丰富的运动员及赛事相关短视频内容,此类信息在观察者接收信息中占比约 52%。抖音平台作为视听展演的数字空间,于体育赛事而言,运动员及其竞技过程构成视听展演主体,作为世界乒乓球领域的第一主力,中国队本就具备较高国民关注度,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的成功举办必然吸引中国观众广泛关注。经观察发现,孙颖莎、王楚钦、王曼昱、林高远、林诗栋等运动员在相关视频中出现频率颇高,对运动员的关注涵盖赛场表现、赛后采访以及运动员个人社交媒体信息发布。运动员作为体育赛事视听展演主体,借助语言、肢体动作、正面话语等叙事方式在平台上进行意义重塑。故而,无论是媒体机构还是运动员个人社交媒体发布的相关内容均备受瞩目。

以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运动员相关短视频为例,抖音“算法价值”推送机制优先运用图像、文字等识别技术提取视频特征并予以标签化,例如识别出孙颖莎比赛相关标签。其次,依据用户浏览、内容点赞等构建用户兴趣模型并实施匹配,定向推送。当短视频的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完播率达到一定数值,即可激发“算法价值”推送机制,进而加大流量推送至更广泛群体。从传播路径来看,乒乓球赛事借助传统媒体,受众主要集中于国乒球迷,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依据互联网推送机制,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成功引爆话题热度,频霸热搜榜,成为体育赛事大规模传播的又一成功标本。

在赛事信息层面,主要包含赛程预告、比赛过程、比赛结果与赛后采访四个部分,与运动员紧密相连。中国香港乒乓球队凭借其团魂相关赛事广受瞩目,此外,孙颖莎、王楚钦等人作为国乒团队“热门球员”,其参与赛事也备受关注。上述案例充分证明,在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赛事中,以运动员与赛事本身作为传媒营销载体成效收获颇丰,并成为此次活动的热门话题与核心内容。力证抖音平台在算法推荐机制下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相关内容传播的“去中心化”特征,即多元主体与内容均有机会获得广泛传播与关注,突破传统单一中心传播模式局限。

2. 赛事周边内容曝光与关注

在抖音平台上,除运动员相关动态与赛事信息外,“成都旅游”“混团开票”等词条同样具有较高曝光。据第一届成都混团世界杯相关报道显示,它作为一项大型世界级体育赛事,其成功开展对举办地经济起到正向相关作用^[6]。从 4 位观察者接收信息来看,“成都旅游”出现频率占比达 15%,具体涵盖武侯祠锦里、春熙路太古里、大熊猫基地、东郊记忆等重点旅游地。据相关报道可知,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举办期间带动消费 3.8 亿元,增长率达 52%^[7]。此外,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传播效应已超越体育新闻范畴。“球迷助威”词条占信息总数的 12%,国乒球迷会借助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开展相关活动,以表达对运动员与赛事的热爱与支持,故而在视频内容中常能看到球迷自主发起的活动。球迷群体在浏览到此类内容后,借助点赞与转发视频等行为对视频传播予以助力,使得小众内容曝光速度得以提升,逐步拓展视频的受众范围,引发更广泛的群体关注。

(二)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的传播主体去中心

在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的传播案例中,传播主体去中心也是一个重要元素。抖音短视频平台包括 UGC(用户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和 OGC(职业生产内容)多种内容生产方式。在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相关视频传播进程中,呈现出以各类专业传播机构为核心引领,用户自发创作传播为补充协同的传播格局。

1. 主流媒体角色去中心

传播势能的大小对传播声量的高低起决定性作用^[8]。“主流媒体”本质上是指有广泛影响力、强大传播力和高度公信力的媒体。从偏向国家层面来说,许多国家媒体机构是主流媒体的关键部分,像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它们受政府管理或资助,是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这些媒体代表国家立场,在国内外新闻传播、引导舆论、传播政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体现国家意志和主流价值观,在社会系统中占据特定位置。因其特殊社会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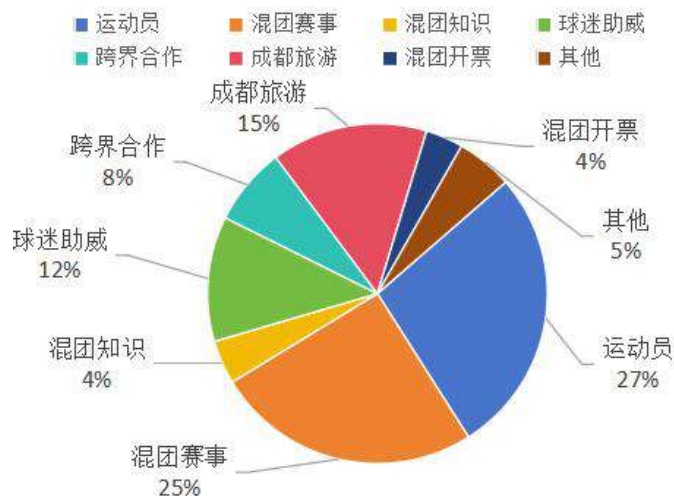


图 1 观察者接收的抖音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短视频主题内容分布

主流媒体牢牢把控传播话语权，在信息传播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四位观察者所接收到的信息中，机构媒体推送内容合计占比 60%，其中中央级主流媒体占比 22%（图 2）。主流媒体较机构媒体及自媒体在资源获得、可信度构建及受众基础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但从数据显示，主流媒体主导角色已呈现去中心化趋势。在体育赛事报道中，主流媒体与赛事主办方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提前获取赛事安排、运动员动态等独家信息，第一时间进行报道。观察发现，央视网、人民网等国家级媒体多以国家视角呈现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相关内容，经由他们所生产的短视频在文案、色彩、配乐、标题等方面，于体现体育赛事的同时，亦传递出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彰显了主流机构媒体在信息交往中的舆论引导功能。例如“央视网”所发布的带有“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词条的短视频，皆以国家视角进行呈现，注重情绪感染力与传播力，体现了强国精神。

2. 自媒体参与与 UGC 内容创作

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受众话语权日益增强，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已然成为大众参与热点事件、表达个人见解的重要媒介。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赛事期间，自媒体的参与和创作也是构建传播矩阵的重要一环，在传播进程中扮演信息浏览者与内容创造者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路人、国乒球迷等群体，抖音平台依据“算法价值”推送机制为其推送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自媒体博主借助观看、点赞、收藏以及转发等行为，有效提升作品点击率，助力视频内容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身为内容创作者，自媒体博主凭借娱乐性与个性化特点，贴近流量热点在信息网络传播空间谋得一席之地，与机构媒体分庭抗礼，在时代洪流中彰显其独特地位，体现了信息传播主体去中心化特征。观察数据显示，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相关内容里个人用户生产部分占比约 40%。自媒体通过对相关赛事信息进行混剪、创作“同人文”等，开展相关话题营销，丰富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抖音短视频内容生态。与主流媒体国家视角有所差异，自媒体多从微观视角展开叙事，此类 UGC 式参与对机构媒体的宏观叙事予以补充与完善，为打造事件流量持续注入不竭动力。

四、去中心化有何不同：抖音用户个体端的去中心化差异

（一）算法推荐驱动用户关注差异

抖音平台的视频推荐机制基于个性化推荐算法，主要通过用户行为数据进行精准推送^[9]。平台会根据用户使用习惯，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评估视频吸引力和用户兴趣，从而提高推荐准确性。在此机制作用下，用户接收到的内容高度定制化，形成了明显的关注差异。长尾内容源于长尾理论，指受众少但覆盖广的小众、个性化内容^[10]。参考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相关内容引发的传播效果，半数以上用户更多关注赛事本身和运动员，其余用户则被长尾内容吸引。以此次调查的四位观察者为f例，A 是一名青少年国乒球迷，主要“打卡”国乒周边，曾现场观赛 20 余次，参与国乒运动员应援活动 10 余次，因此在他的个性推荐中多次出现带有“孙颖莎”“混团开票”等词条的内容；B 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年国乒球迷，更关注赛事本身，除少量运动员视频外，一半以上内容是赛事相关，主要涉及赛后采访、高光时刻、香港队获胜等内容；而 C、D 二人作为听说过但未曾深入了解国乒的代表，推荐视频内容更符合主题分布的一般比例，以运动员和赛事为主，其余长尾内容为辅。这种差异化关注视角有利于促进个性化信息流动，进而推动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信息传播内容生态的分层化与去中心化。

（二）用户行为参与引发体验差异

用户行为包括观看时长、点赞、评论、收藏和转发等行为，是平台数据提取与影响力判断的重要衡量因素，直接影响大数据算法对用户兴趣的判断^[11]。平台会根据这些数据，充分了解用户行为习惯，构建用户画像，进行个性化推荐。高频率互动用户活跃于网络空间，通过完播、点赞、评论、收藏、转发等方式积极使用互联网，上述用户习惯便于平台算法对其观看数据精准捕捉，推荐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反之，低频率互动用户点赞、评论、收藏、转发等行为频率不高，其完播率不足以平台生成对应用户画像，随机推送相关内容机率较大，导致低频率互动用户接受视频内容具有随机性。使用“词云图生成器”总结 4 位观察者接收内容的热评词汇（图 3）发现，“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世界杯”、“孙颖莎”、“比赛现场”、“中国香港乒乓球队”等词条是抖音推荐的主要内容。而 4 位观察者的观看习惯，导致接受内容各异。A 在讨论时曾说，他是孙颖莎、王楚钦等运动员的“忠实球迷”，看到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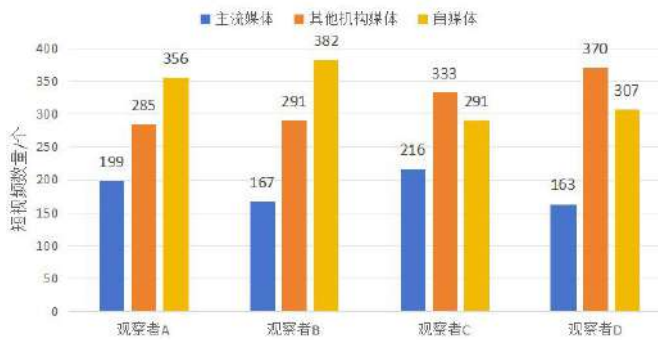


图 2 观察者所接收的抖音 2024 成都混团世界杯短视频生产者分布

等性与开放性。据统计,在2024成都混团世界杯活动的传播过程中,约40%的内容来源于UGC创作。球迷或路人通过独特视角对已有内容进行二度创作,为赛事注入独特趣味性和社交属性。这种创作者群体的去中心化不仅丰富了平台内容多样性,还有效减弱了因头部流量波动对平台运营稳定性造成的影响,显著增强了平台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生态系统奠定坚实基础。

(三) 用户借助去中心化实现行为互动塑造个性化推荐

数字时代,去中心化理念逐渐渗透,为用户赋予了更多角色和权力,使其在算法推荐系统中不仅是信息接收者,更成为内容调节者^[1]。传统推荐系统通常以用户为中心,基于既定规则推送内容,但在去中心化模式下,用户的行为互动深刻影响推荐机制的运作。当用户通过浏览、评论、分享或点击等方式进行互动时,这些行为成为算法调整的重要依据,直接影响后续推送内容的方向与多样性。例如,在2024成都混团世界杯期间,赛事相关内容推荐展现出明显的动态适应性。依据本文实验,随着用户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度提升,平台实时推送相关内容;当赛事正式开始后,用户互动则引导算法重点推送赛场亮点、选手故事及赛事解读等丰富信息。这一过程彰显了用户行为在算法推荐中的调节作用,通过与内容持续交互,推动推荐系统逐步精细化、个性化。这种以用户行为驱动的去中心化推荐方式,相较于传统模式更能精准响应用户需求。用户不再被动接受内容,而是通过自我意识的筛选和行为参与,塑造个性化信息获取流程。与以往宽泛且缺乏针对性的内容推荐不同,去中心化让用户成为推荐系统的重要调控者,不仅提升了信息获取效率,还使用户在数字空间中拥有更大的信息自主权,构建了以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信息视界。

(四) 抖音2024成都混团世界杯议题去中心化使受众传播话语权提升

社交媒体崛起背景下,短视频平台特有的“去中心化”机制赋予用户更高话语权,展现独特传播优势^[4]。以2024成都混团世界杯的传播为例,去中心化机制突破传统由平台推荐主导的传播模式,为普通用户提供了平等创作和传播的机会,使其从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信息传播者,助力媒介事件实现更广泛和持续的曝光。在赛事传播过程中,不少用户通过记录赛事亮点、分享个人解读或创意视频等方式,获得极大关注,甚至引起“名人”或官方机构的二次传播与讨论。这种双向互动不仅提升用户对媒介使用的参与感与满足感,还进一步强化平台内容生态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去中心化机制通过平台强大算法支持,实现了内容创作与传播的民主化,突破以往由专业媒体、政府等少数群体主导的话语垄断。具有新颖创意和独特视角的内容,借助平台的扩散效应,迅速从小众走向大众,引发多层次的传播效应和情感共鸣。在赛程中穿插的训练场相关内容中,赛事观众拍摄的相关短视频内容展现了赛事背后的体育精神、地域文化或团结氛围,这些内容引发广泛讨论,进一步增强用户在数字媒介使用中的存在感与满足感。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打破了信息发布的壁垒,形成了用户与平台共同推动内容繁荣的新格局,为赛事传播注入了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

借用短视频社交媒体算法推荐机制,进行大型体育赛事传播中的“去中心化”特征分析,从内容与传播主体的多元分散,到用户个体端的差异分化,再到平台与用户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重塑与价值挖掘,充分展现了短视频平台为体育赛事传播带来的新变革。这不仅丰富了体育赛事传播理论,也为未来体育赛事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推广提供了实践指导。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探索如何在去中心化传播中优化内容生态、提升用户体验、促进赛事影响力的深度拓展,将成为体育传播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助力体育赛事与新媒体平台实现更高效、更具活力的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EB/OL].(2024-08-29)[2024-11-22].<https://www.cnnic.cn/n4/2024/0828/c208-11063.html>
- [2]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林珊译,第1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 [3]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7:158-179
- [4] 李欣窈.数字游民社区去中心化现象研究[D].吉林大学,2024.
- [5] LIGHT B,BURGESS J,DUGUAY S.The walkthrough method: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J].New Media & Society,2018,20(3):881-900.
- [6] 四川省人民政府.2023年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带动体育产业、住宿业等方面产值达2.6亿元赛事“流量”变为投资消费“增量”[EB/OL].(2023-12-19)[2024-12-15].<https://www.sc.gov.cn/10462/10464/10465/10595/2023/12/19/22ffa365382241a787f980b4a427069f.shtml>
- [7] 陈浩.带动消费3.8亿元增长52%[N].成都日报,2024-12-11(002).

- [8] 栾轶玫,苏悦.“热呈现”与“冷遮蔽”——短视频中的中国新时代“三农”形象[J].编辑之友,2019,(10):38-48.
- [9] 葛庆坤.短视频推荐机制效果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20.
- [10] 李彬.长尾理论对电视节目传播的启发[J].中国电视,2018,(03):90-93.
- [11] 晏齐宏.算法推荐对网民意见极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舆论可见性视角的多层次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08):12-25.
- [12] 四川新闻网.以赛事促销费 2024 成都“混团黄金周”正式启动[EB/OL].(2024-11-29)[2025-01-09].<http://scnews.wssc.org/system/20241129/001492096.html>
- [13] Elad Segev.Information and Power:Popular and Personal Storytelling in the Digital Age[M].Taylor&Francis: 2024-12-03.DOI:10.4324/9781003605683
- [14] 倪琳,刘雨欣,孟恭杰.“去中心化”传播时代我国大学生英雄观现状与媒介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2021,(12):63-71.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2024 ITTF Mixed Team World Cup under the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 -- Research based on Douyin short video platform

Liu Xiao¹

¹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China*

Abstract:The 2024 ITTF Mixed Team World Cup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Chengdu from December 1 to December 8, 2024, which not only brought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host city, but also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on the Interne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2024 ITTF Mixed Team World Cup on the Douyin short video platform, and explores the "decentralization" phenomenon under the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app roaming, more than 3360 related short video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athletes and events dominate the content theme, the surrounding content also has high exposure and presents decentralization; In terms of the main body of communication, the dominant role of mainstream media is weakened, and we media actively participates, forming a diversified pattern; For individual users,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leads to differences in attention, user behavior leads to differences in experience, and content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shape the circle differences.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uses distributed algorithms to reshape the communication mode and tap market value, and users realiz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nd discourse power improvement with the help of decentralization,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sports event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platforms.

Keywords: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 Decentralization; Sports event communication; 2024 ITTF Mixed Team World Cup

新时代现实主义影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

徐礼莹¹

(1.英国桑德兰大学, 新加坡莎顿国际学院 098888)

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创作在经历了穿越、宫斗等题材的热潮之后,愈发倾向能够戳中社会痛点、贴近人民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而藏于其中的家国情怀、人物刻画与意境构造都深刻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并以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完成与时代连接的现代化表达。近年来,我国现实主义影视创作佳作频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天人合一”“文以载道”等传统美学思想,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艺术创造,并与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紧密关联。现实主义影视作品内容从多个维度展现传统文化内涵:在家国情怀层面,通过《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作品,将家庭与国家情感紧密结合,以小人物视角诠释爱国精神;在人物刻画上,塑造出如《人世间》周秉昆、郑娟等具有自强自立品格的典型人物,实现有勇知方的男性叙事与坚韧美好的女性表达;在意境营造方面,凭借《漫长的季节》《山海情》等剧作,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东方意境。这些影视作品以现代化表达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表达,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又结合时代发展赋予其新的活力与内涵,展现出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现实主义; 家国情怀; 人物刻画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82

回顾近些年来我国的影视创作,现实主义题材层出不穷。事实上,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已有多年的历史。“天人合一”和“文以载道”这两个主要影响中国人核心艺术观的观念,自始至终使中国人的艺术创造与现实主义紧密相连^[1]。除了传统美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影视创作的影响还包括许多方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取自中国神话传说、《人间烟火》中火出圈的“新中式霸道总裁”是观众对于中国传统儒雅的审美追求,还有一系列古装偶像剧将中国传统服饰融入其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立足于传统文化,结合时代元素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是影视创作的重要任务。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诸多优秀现实主义影视作品在立足传统文化根基、融合时代元素以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与创新性表达方面,展现出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探索与艺术成果,为传统文化在当代影视语境下的现代化表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一、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家国情怀”的形成源于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表层意义上理解,“家国情怀”是没有国哪有家、众多家汇聚成国的家国一体、家国同源。在深层意义上,“家国情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秩序。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家国情怀”都与爱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离骚》开始,爱国主义已经在文艺作品中留下深深的烙印,随着传播方式与技术的革新,现如今,爱国主义也体现在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电视剧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打动每一位观众。

(一) 用坚毅书写生命的不屈

提到“家国情怀”,不得不让人想到近几年在国庆节期间上映的几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2019)可以算是“国庆档”拼盘电影的开篇之作,该片以小人物的视角展开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的叙述,片中的几个重要时间点无一例外都蕴含着浓浓的爱国之情。在此之后的《我和我的家乡》(2020)、《我和我的父辈》(2021)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影片中包括张北京、老范、马亮等在内的众多人物,以不同的身份和坚韧的执着,诠释追逐生命意义的倔强和守卫家国的决心。

这种将家庭单位与国家情感紧密结合的电影还包括《长津湖》系列。《长津湖》(2021)第一部的开头部分

作者简介: 徐礼莹(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影视制作。

以伍万里是否能够参军走上抗美援朝战场，讲述了陪伴家人与守卫国家的戏剧冲突，表达了有国才有家的民族大义。《长津湖》的故事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彼时国内时局刚刚趋向稳定，面对美国的无端威胁，我们选择奋起抗敌。然而战争是残酷的，由吴京扮演的伍万里历经厮杀活了下来，可他却只能带着哥哥伍百里的骨灰回到家乡，这是对家庭的眷恋。战争尚未结束，还没真正与家人团聚的伍千里再次踏上保卫国家的奋战，这是对于国家的责任。影片在短短几分钟内，将中国人崇尚家庭温馨的同时更具有家国大局意识的情怀展现的淋漓尽致。《长津湖》第二部《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延续了第一部的叙事手法，将民族大义融入到普通的家庭单元之中，用现实主义与浪漫情景相结合的方式，让伍万里带着哥哥伍千里的信件，迈向祖国光明的未来。无论是伍千里、伍万里，还是雷老爹、谈子为等多位战士，他们都是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用坚韧的人物性格书写不轻易屈服的伟大生命力量，呈现出感染新时代观众的家国情怀所蕴藏的时代价值。

（二）以人民诉说平凡的力量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新时代文艺的使命，中国的文艺作品从来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摒弃束之高阁的孤傲，紧扣触手可及的生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平凡而又无穷的伟大力量，这是影视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分别在今年和去年春节期间热播的两部现实主义电视剧《狂飙》（2023）、《人世间》（2022），都是当之无愧的“开年爆剧”，两部剧都做到了将普通人民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相连接，展现人民群众平凡而又伟大的力量，完成了以小人物为切入点诉说家国情怀的使命。

《狂飙》的主题是“扫黑除恶”，以一个小人物走向黑暗为开端，诉说一线公职人员与黑恶势力斗争时的不畏困难，彰显了党和国家扫黑除恶的坚定决心。该剧把对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的解读融入到电视剧中，不仅降低了广大群众理解政策的难度，更有助于将相应政策取得的重要成效传递给每一个普通人，于动人的情节中讲述国家为保卫人民权益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在去年春节时播出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人世间》，打破央视近八年收视率最高纪录，实现了多平台收视时期将年轻人和老年人凝聚在同一接收终端的突破，更在去年年底包揽金鹰奖、白玉兰等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该剧以出生在平民社区“光字片”的周家三兄妹为主角，分别从普通工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四个视角切入，讲述五十年发展变革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百姓的生活史，剧中周秉昆、周秉义等主要人物的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展现出中华民族“家国天下”的胸怀与质朴的人格。

二、自强自立的人物刻画

恩格斯曾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无论是《人世间》中的周秉昆、郑娟，还是《长津湖》中的伍千里、伍万里，他们的身上凝聚着小人物自强自立的美好品格。儒家思想认为，“人应该以天地宇宙为精神渊源和效法对象，用‘天人合一’精神，培养自己刚健有为、自强自立的主体精神”^[3]。前面提到的这些人物共同具备的特征是一种坚韧不拔、与民族命运抗争的意识，以及由此激发出的勇敢奋斗、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而这些精神状态又分别成就了有勇知方的男性叙事与坚韧美好的女性表达。

（一）有勇知方的男性叙事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以男性为主的父系社会占据着相当大的分量，而父系社会中男权思想又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地位也映射在电视剧的创作中。《人世间》着力刻画了多位事业有为的男性形象，周秉义从知青到考上北大，再到走上仕途，成为一名为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用自己的担当一次次解决棘手的难题。相比周秉义的为国家鞠躬尽瘁，周秉昆的事业则始终以家庭为重，他从一个小小的工人做到独当一面的饭店老板，孝顺父母、爱护妻儿，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形象展现给观众。此外，周家父母、郝省长夫妻以及马守常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都与周家兄弟相似，体现出中国传统两性关系中的互敬互爱。“对比近年来在言情类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所谓霸道总裁，本质上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现象，是长期以来的‘男性权力’叙事的表征”^[4]，《人世间》则是基于两性平等思想所传达出的崭新叙事视角。

而《长津湖》中的伍千里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将一身热血挥洒在守卫祖国家园的战场上。影片中有一段“主观视角”的长镜头，真实的再现了战争的残酷，这也是伍万里跟着哥哥伍千里经历的第一场“战斗”，虽然这次两人都幸运的活了下来，但是在第二部《长津湖之水门桥》的一次战斗中伍千里最终光荣牺牲。生命有终，意义无止，伍千里的英勇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二）坚韧美好的女性表达

“中国电影中女性常常被赋予德性之身的光芒”^[5]，这种光芒同样辐射至电视剧作品。从中国第一部引起万人空巷的《渴望》（1990）中慧芳收养弃婴、一心为家庭付出，到《媳妇的美好时代》（2009）围绕女护士毛

豆豆的感情生活对婆媳相处展开情节叙述,再到《人世间》中刻画出充当家庭主心骨的周母、在职场中游刃有余的曲主任以及为周家无私付出的郑娟等等,其中郑娟身上所具有的圣洁与坚韧值得歌颂。作为一个被收养的弃婴,郑娟的命运十分坎坷,但她从未屈服于现实,而是用坚韧、美好的品格应对被弃养、被侵犯等一系列挫折。

而《人世间》中的另一位主要女性角色周蓉则与郑娟的默默奉献截然相反,她的生活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年少时,周蓉为爱情抛下父母。成年之后,她为了事业选择抛下女儿去北大读研。在进行这一系列选择时,周蓉始终以自我为中心,这种不顾及他人的“自私”一方面被一些观众所厌弃,但另一方面也象征着知识女性追逐自由的突破。另外,近几年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性题材剧”不再以家庭为主要叙事场景,而是聚焦于女性在整个社会的生存状况。比如《欢乐颂》(2016)“五美”以五个不同家庭环境生长的女孩为主要人物,讲述年轻女性在都市生活的起伏。《我在他乡挺好的》(2021)则以“北漂”女性为切入点,传达出时代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小城市女孩们在大城市打拼的不易。两部剧中的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有着鲜明而又独特的性格特征,促使她们在应对生活的残酷时采取各种不同的措施,但相同的是她们身上都彰显着传统文化中的坚韧不拔与至纯至善。

三、情景交融的意境营造

“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以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最有生命力和最具现代意味的重要范畴”^[6],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历经千百年,意境的深刻内涵不仅体现在中国传统文艺作品中,也沉淀于中国的影视创作。《人世间》汇集了最为真挚的爱情、友情和亲情,其中感人的情节有很多,但最动人心扉的当属周父、周母相继去世时,周家三兄妹和郑娟跪在父母面前泣不成声的场面。使观众深刻的体会到“生同衾死同椁”的默然相守之情,这是属于中国人特有的、含蓄的浪漫爱情。

回顾近些年广受好评的影视作品可以发现,它们都做到了传达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意识与深远意境。近期热播的高分悬疑网剧《漫长的季节》(2023)以一名普通出租车司机王响为主,采取三条时间线交叉叙事,讲述了一宗碎尸案背后所隐含的命运的力量。该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已经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王响,对着年轻时意气风发还是国企火车司机的自己喊“往前看别回头”,他一边奔跑一边重复的喊着,伴随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和悠扬的汽笛声,仿佛让老年王响和观众对儿子王阳、妻子罗美素、好友龚彪等人的骤然离世逐渐释怀,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镜头语言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境塑造的独特呈现。

当然,“现实主义文艺必有的客观性、典型性和批判性等特征同以‘心功’为代表的中国式心性智慧相结合,才能发生奇妙的化合反应”^[7]。作为一部“命题作文”,《山海情》(2021)交出的答卷令许多观众十分满意。该剧主要呈现脱贫攻坚政策实施以来带给广大群众的改变。剧情在时间安排上跨度较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讲起,将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这种“历史化”叙事也正是我国当代文艺的一个重要传统^[8]。当漫天的黄沙逐渐变成一排排住房,当金灿灿的夕阳与黄土地汇聚为一体,村里少年、少女们自由奔跑的身影代表着涌泉村的村民乃至全中国的人民一起拥抱未来幸福、美好的生活。

四、结语

从近几年的现实主义影视创作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可以发现,无论是影视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还是其所讲述的故事的内涵与叙事结构的外延都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并以带有中华文明烙印的内容传递中国古典情怀与现代精神,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当然,影视作品中承继的人物性格特征、社会道德风尚以及传递出的家国情怀、丰满的形象刻画、极致的意境塑造,无不取自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同时,这些特质并非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制或继承,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历史变革之中,与时俱进地展现出一种现代化的崭新表达,为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

参考文献:

- [1] 陈林侠. 天人观念与中国电影的美学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J].2023(2), 30 - 39.
- [2]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35.
- [3] 顾玉萍.高期待性文化的精神渊源——自强不息、刚健有为[J].文化学刊,2015(02):221-223.
- [4] 周根红.霸道总裁:男性形象的影像塑造与文化反思[J].当代电视,2021(09):50-53.
- [5] 冯果.当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身体[J].当代电影,2019(11):174-176.
- [6] 张训涛.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境的哲学审视[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9):28-30+48.
- [7] 王一川.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道路——兼以《人世间》为个案[J].中国文艺评论,2022(04):51-72.
- [8]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0.

The Modern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New Era Realistic Films and Television Works

Xu Liying¹

¹*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Singapore Shelt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after the upsurge of themes such as time travel and palace intrigue,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has increasingly inclined towards realistic themes that can touch on social pain points and be close to the real life of the people. The patriotism,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construction hidden within deeply reflect the infinite cha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chieve modern expression connected to the times through forms such as movies and TV drama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excellent works in China's reali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it. Traditional aesthetic ideas such as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using literature to convey Tao" constantly influence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Chinese people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ali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The content of reali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showcases the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 terms of patriotism, through works such as *My People, My Country* and *The Battle at Lake Changjin*, the emotions of family and country are closely combined, and the patriotic spirit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dinary people; in terms of character portrayal, typical characters with self-improvement and independence, such as Zhou Bingkun and Zheng Juan in *A Lifelong Journey*, are created, achieving male narration of being brave and knowing righteousness and female expression of tenacity and beauty; in terms of artistic conception construction, relying on works such as *The Long Season* and *Minning Town*, the technique of blending scenes with emotions is used to present the oriental artistic conception of "where words are finite but meaning is infinite". Th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novatively express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modern expressions. They not only inherit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comb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o endow it with new vitality and connotations, demonstrating the enduring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alism; national and familial sentiments; character portrayal

远程在场：媒介论视角下的小红书云自习研究

王海燕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本文研究小红书“云自习”现象, 探讨用户如何通过媒介技术创造“远程在场感”及其对学习与社会关系的影响。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发现: 用户利用平台功能营造虚拟学习空间, 感知与他人“共在”, 从而提升学习动机、效率与积极性。同时, 借助多元媒介互动, 用户建立社会关系, 形成归属感乃至友谊。研究亦指出用户面临隐私让渡等挑战。这证明云自习是新兴媒介实践, 既展现技术在教育中的潜力, 也对媒介素养与伦理提出要求。

关键词: 媒介论; 远程在场; 云自习; 小红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95

一、绪论

本文旨在运用媒介论视角, 深入探讨小红书云自习直播过程中“媒介”的关键作用, 以分析云自习用户如何通过媒介技术实现远程在场, 以及这种在场感对用户的学习行为和心理状态的深刻影响。

小红书作为一款以内容分享为主的社交平台,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创作空间, 涵盖美妆、旅行、美食等多个领域。近年来, 小红书上涌现出一种创新的内容形式——云自习。云自习指的是用户通过小红书直播的方式, 展示个人学习场景和学习过程, 与其他用户进行互动, 实现共同学习的社交体验。云自习的内容常常包括用户的学习环境、学习用品(如桌面、书籍、笔记本、电脑等), 以及用户的语音、手势、表情等身体特征。通过观看、评论、点赞、打赏等多种互动方式, 受众可以积极参与到云自习中, 与发布者建立联系, 形成共鸣与互动。

在这一背景下, 媒介技术扮演着云自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将深入研究云自习用户如何通过媒介技术创造虚拟学习空间和氛围, 以及这种远程在场感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行为、心理状态以及社会关系的建立。通过对云自习的媒介机制进行深刻剖析, 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在虚拟社交环境中, 媒介对用户学习体验产生的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 从慢直播到学习直播

慢直播作为传统“快直播”的对立和补充, 具有长时性、原生性的特征。可以分为电视慢直播和网络慢直播。电视慢直播起源于2009年的挪威“慢电视”, 具有非事件性、原生态性, 主要提供观察窗口和感受场景的功能。网络慢直播是以网络为载体的直播形式, 在2020年初得到关注, 尤其在疫情期间, 央视频通过《疫情二十四小时》直播火神山与雷神山的建设, 吸引了大量观众^①。

学习直播作为网络慢直播的衍生形式, 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学者们通过多维度的深入分析, 深刻探讨了其独特特点及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李嘉颖运用互动仪式链分析揭示了“学习直播热”背后的现象, 强调通过虚拟共同在场的互动仪式, 学习直播成功实现了群体内的情感共鸣^②。范岳亚以社会空间理论为基础, 将学习直播定位为线上公共学习空间, 巧妙地将媒介空间与物理空间相融合^③。吕雅欣则聚焦于学习主播的表演化现象, 尽管直播学习形式积极, 却需警惕其可能导致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偏差的潜在风险^④。党亚茹透过详实的历程阐述, 深度挖掘了“学习直播热”现象所反映的青年亚文化认同与抵抗、窥视与仪式化表演^⑤。

这些研究丰富而深刻地揭示了学习直播在社会中的多元角色, 不仅是情感共鸣的媒介, 更是社交行为的重要推动者, 深化了我们对学习直播影响的全面理解。

作者简介: 王海燕(1999—), 女, 成都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学习直播作为慢直播的演变形式,以其独特的互动仪式、社会空间融合和主播表演性质,成功打破了传统学习的时空限制,为观众提供了更为灵活和丰富的学习体验。这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传递,更是一场情感共鸣的体验,使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研究者深刻剖析了青年在学习直播中的身份认同、抵抗与窥视行为,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一媒介形式展示和构建理想的自我形象。这为我们理解当代青年群体的文化心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而对于社交互动和连接的研究更是引人深思。孙文峥指出,学习直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交行为,通过虚拟陪伴和数字归属,弥合了现实中的孤独感。这种“在一起独处”的连接文化重新定义了人际交往的方式,使距离不再是社交的障碍,而是媒介发展的契机。^⑥

综合而言,学习直播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新型学习媒介的认识,更揭示了其在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丰富意义。这不仅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更对教育、媒体和社会管理等领域提出了挑战和启示。未来,我们有必要继续关注并深入研究学习直播,以更好地理解 and 引导这一新型媒介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二) 媒介具身与远程在场

在过去的几年里,身体问题在传播研究中的缺席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在学术界催生了一系列深入的讨论。传播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传播研究领域过去在涉及身体问题方面存在的空白,不仅限制了对于社会交往中身体角色的理解,还影响了对于信息传递中身体元素的分析^⑦。这一认识的深化推动着研究者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传播理论,使其更加贴近和解释人类社会互动的复杂性。

传统上,传播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语言、符号和媒介,而对于身体在交往中的作用较少予以重视^⑧。然而,身体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媒介,更是交流的本质之一。在这一认知的推动下,学者们开始关注身体语言、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元素,试图深入挖掘这些元素在社会交往中的角色和影响。^⑨

身体问题的回归不仅仅是对于传播研究的弥补,更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一次挑战。通过重新审视传播理论,研究者们意识到身体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其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种重新审视为传播研究注入了新的思维,丰富了学科的内涵,也为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这一学术路径下,学习直播作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交流互动成为一个备受研究关注的话题。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学习直播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广,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景,以观察和分析身体在信息传递中的具体表现。在学习直播中,直播者的肢体语言、观看者与手机界面的接触等不仅仅是简单的交际元素,更是直接影响信息传递效果的关键要素。更为重要的是,直播者与观看者的身体分隔两地,意识却相遇于同一片虚拟空间,实现了身体之于直播间的远程在场,共同构成一个实时互动的虚拟自习室。这个新型虚拟远程在场,并不局限于直播的视觉感,而是整个身体各种感觉器官的卷入。更进一步地,不但虚拟远程在场有着即刻的大量互动,而且在场与远程在场也同时性地交融在一起^⑩。因此,学习直播的兴起为身体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场景和实践基础。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身体问题在传播研究和直播中的应用,深入研究不同文化、社群和背景下身体在信息传递中的特殊作用。通过这一努力,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身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价值,促进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身体问题的回归将为传播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学科向更为综合和深入的方向发展。这一演变不仅仅是对于传播学领域的一次挑战,更是对于社会交往本质的一次深刻反思。

三、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运用媒介论视角,从媒介技术、身体特征和社会关系三个维度,探索在小红书云自习传播过程中“媒介”的重要性,分析云自习用户如何通过媒介技术实现远程在场,以及这种在场感对用户的学习行为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媒介论强调媒介在传播中的作用,强调技术工具、社交平台等在信息交流中的中介地位。在媒介论的框架下,笔者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1、云自习用户如何通过媒介技术实现远程在场?即,用户如何利用小红书平台的功能和特点,以及自身的身体特征,创造出一种虚拟的学习空间和氛围?

2、云自习用户的远程在场感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行为和心理状态?即,用户在观看或发布云自习内容时,是否会产生一种与其他用户同在一个空间内学习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否会促进或阻碍他们的学习效率和效果?是否会改变他们对学习的态度和情感?

3、云自习用户之间如何通过远程在场感建立社会关系?即,用户在参与云自习时,是否会认识和交流其他用户?他们之间是否会形成一种社区或团体的归属感?他们之间是否会产生友谊或其他情感?

通过这三个维度的深入研究,本研究旨在全面理解媒介在云自习传播中的作用,为深入解析虚拟学习环境中

媒介对用户学习体验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持。

(二)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专注于小红书平台上活跃的云自习直播用户，首先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全面剖析其直播行为。研究不仅聚焦于直播内容和形式，还关注用户互动、反馈及社交互动的方面。通过这种深度挖掘，旨在揭示用户在学习分享平台上的行为模式和社群互动，为进一步理解线上学习社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然后运用深度访谈法，对选定的 20 位使用者开展深入的个体访谈及集中讨论（详细的受访者信息见表 1）。访谈将基于核心研究问题展开，并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即时的深层次追问，即运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技巧，主要收集他们的基本资料、探讨参与云自习的初衷、经历过程以及个人感受等详细信息（采访的基本问题见表 2），并对访谈结果进行充分分析。每位访谈者的受访时间不低于半小时。

表 1 20 位受访者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教育水平	使用小红书的时长	每日云自习的平均时间	自习主要时间段
1	女	20	大学生	本科	2 年	2 小时	晚上
2	男	23	研究生	硕士	1 年	1.5 小时	晚上
3	女	19	高中生	高中	6 个月	3 小时	中午
4	男	26	初创企业员工	本科	3 年	2 小时	凌晨
5	女	20	自由职业者	本科	2 年	4 小时	随时
6	男	22	大学生	本科	1 年	5 小时	晚上
7	女	25	教师	硕士	1.5 年	1 小时	晚上
8	男	22	大学生	本科	1 年	3 小时	中午
9	女	22	大学生	本科	3 个月	2 小时	随时
10	男	24	研究生	硕士	2 年	3.5 小时	晚上
11	男	23	研究生	硕士	1 年	2 小时	中午
12	女	27	销售	本科	1 年	1 小时	凌晨和晚上
13	女	18	高中生	高中	4 个月	3 小时	中午
14	女	25	研究生	硕士	半年	2 小时	晚上
15	女	21	本科生	本科	1 年	3 小时	中午和晚上
16	男	20	专科生	专科	1.5 年	2 小时	随时
17	女	23	大学生	本科	1.5 年	3 小时	随时
18	男	21	大学生	专科	3 个月	2 小时	中午
19	女	22	大学生	本科	4 个月	4 小时	随时
20	女	24	研究生	硕士	1 年	1.5 小时	晚上

表 2 采访基本问题

序号	问题主题	采访问题	旨在探索的内容
1	参与动机	您最初是如何知道小红书云自习的，您参与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动机和参与的初衷
2	云自习过程	您通常如何安排您的云自习时间？在云自习过程中都做了哪些？	日常使用模式和行为
3	交互体验	在云自习中，您通常与他人互动吗？可以分享一些具体的互动体验吗？	社交元素和同伴学习的体验
4	感受与效果	您能分享一下云自习给您带来的感受和改变吗？有没有感觉云自习提高了您的学习效率？	个人收益和学习效果
5	社区归属感	在小红书云自习中，您是否感到自己是某个学习社区的一部分？	社区归属感和集体认同
6	技术与环境	您认为小红书平台的哪些功能对云自习特别有帮助？您在云自习时的环境是怎样的？	平台功能利弊和学习环境
7	改进建议	您觉得小红书的云自习功能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功能？	用户反馈和产品优化建议
8	未来预期	您预期未来会如何继续参与云自习？有没有考虑过尝试其他平台类似功能？	持续参与意向和平台忠诚度

四、虚拟学习空间：云自习用户的远程在场感与学习体验

(一) 虚拟学习环境的构建

云自习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学习方式，其学习环境呈现对观众的学习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④。本文以云自习直播的两种主要形式：单人直播和多人同时连麦直播为例，分析其学习环境建构的特点和作用。单人直播是指一位主播在自己的学习空间中进行直播，展示自己的学习过程和环境。多人同时连麦直播是指多位主播在同一平台上连麦同时进行直播，形成一个虚拟的学习社群。

单人直播的学习环境呈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其他呈现要素。学习用品是指主播在直播中使用或展示的与学习相关的物品，如书籍、纸笔、电脑、平板、计时器等。这些物品不仅可以反映主播的学习目标、内容和方法，也可以激发观众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例如，有些主播会在直播中展示自己正在阅

读或准备阅读的书籍, 或者在电脑或平板上打开自己正在学习的资料, 从而引起观众的关注和探索。生活用品在此指的是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展示或使用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物品, 如水果、零食、水杯、摆件等。这些物品不仅有助于提升主播的知名度和亲和力, 同时也能缓解观众在学习中所面临的压力和疲劳。主播在直播中食用水果或零食, 以创造一种轻松宜人的氛围, 向观众传递出真实和可爱的形象。这种直播策略旨在促进与观众之间更为亲密的互动, 提升用户体验。其他呈现要素包括主播在直播中展示的与学习环境无关但有助于营造氛围的元素, 如学习科目展示、考试倒计时、励志话语等。这些元素旨在提升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共情和互动, 同时加强观众的学习信心和动力。举例而言, 一些主播可能在直播中展示自己正在备考的科目, 并显示倒计时, 以鼓励自己和观众一同奋斗; 另一些主播可能会在直播中分享一些励志话语或名言警句, 以激发自身和观众的积极情绪^⑨。

多人同时进行学习直播的环境表现主要在平台界面和观众互动两个方面。首先, 平台界面涵盖了学习直播平台的设计和平台的功能, 如分屏模式、弹幕功能、礼物功能等。这些设计元素不仅能够塑造观众对多人学习直播的认知和评价, 同时也在调节观众对不同主播的关注和喜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 采用分屏模式的平台让观众能够同时观看多位主播的画面, 而且还允许他们根据个人喜好灵活调整画面大小。弹幕功能则能够实时展示观众的评论, 促使互动和参与感加强; 礼物功能则成为观众表达对喜欢主播支持和感激之情的虚拟手段。

观众互动涵盖了主播与观众之间、以及观众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包括评论、点赞、送礼等。这些互动手段不仅有助于强化主播与观众之间的联系和信任, 同时也能够激发观众之间的竞争和协作。比方说, 一些主播通过积极回应观众的评论, 实现更深层次的互动和沟通; 在直播中设定小目标或挑战, 既激励了主播自己, 也促使观众积极参与; 与其他主播进行友好竞争或合作, 则有助于扩大与其他主播的联系和信任。这种多维度的互动设计不仅使学习直播更具趣味性, 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全面的参与体验。

(二) 部分隐私让渡

云自习直播是一种新兴的网络直播形式, 通过网络平台, 主播将自己的学习过程实时展示给观众, 从而形成一种虚拟的共同学习氛围。这种直播形式在疫情期间受到了很多学生的欢迎, 因为它可以缓解学习孤独感, 增强学习动力, 提高学习效率。然而, 云自习直播也需要让渡自己的部分隐私, 包括学习目标、个人喜好、学习习惯等, 这些信息可能会被观众或平台方收集、分析、利用, 甚至造成不良的影响或风险。^⑩首先, 云自习直播需要公开自己的学习目标, 例如考试科目、考试时间、复习计划等, 这样才能吸引和留住观众, 形成一种共同进步的心理契约。然而, 这也意味着主播需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和责任, 如果不能达到自己或观众的期望, 可能会受到质疑、嘲讽、鼓励或同情等不同的反馈, 影响自己的情绪和信心。同时, 主播的学习目标也可能被其他竞争者利用, 进行不公平的比较或竞争, 损害主播的利益或声誉。

其次, 云自习直播需要展示自己的个人喜好, 如音乐、食物、服饰、装饰等, 以打造独特个性和魅力, 从而吸引并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和审美需求。然而, 这一展示也带来了主播需要公开生活细节和个人品味的挑战, 因可能面临来自观众或平台方的不同反应, 包括评价、赞美、批评或攻击等, 这会对主播的心态和形象产生影响。同时, 主播个人喜好的展示也可能被平台方或其他商业机构利用, 导致不合理的推荐或广告, 进而干扰主播的选择或消费。这意味着主播需谨慎把握个人信息的披露度, 以平衡自身需求与外界期望, 以免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负面后果。

此外, 云自习直播在展示个人学习习惯时, 需呈现诸如学习时间、学习方法和学习效果等方面的细节, 以为观众提供可参考的参考, 同时成为一位可借鉴的学习典范。然而, 这一过程也暗示着主播可能会受到来自观众和平台方不同形式的监督、支持、建议或干预等多重影响。这种多方干预既可能为主播提供指导和改进的机会, 又可能对其学习过程中的自由和舒适感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这种复杂的交互影响关系需要主播在平衡个体表达和外部期望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以确保学习传播的有效性和共享性。

五、虚拟社交空间：云自习用户间的社会关系建立

(一) 多重媒介组合

本文认为, 云自习用户通过多重媒介组合的方式, 实现了云自习的功能和目标, 同时也促进了与其他用户的交流和互动。通过小红书平台、微信群和 B 站等多个媒介的有机结合, 云自习用户构建了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虚拟社交空间。

小红书平台成为用户分享自习心得和学习资源的主要场所。用户在平台上不仅发布自习计划、自习环境和成果, 更通过话题讨论建立起基于共同兴趣和目标的社会认同。例如, 一些用户通过展示自己的自习过程吸引关注, 形成了一种“学霸”文化, 激发其他用户的学习动力。用户还在平台上表达对学习话题的看法, 引发其他用户的回复和讨论, 形成了一种知识分享和交流的氛围。这种在小红书平台上的多元媒介使用, 使用户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增强了学习的社交性, 进一步激发了学习动力和信心。

微信群作为用户间密切互动的媒介, 起到了监督、激励和互助的作用。用户通过微信群定时打卡, 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 接受其他用户的评价和建议。群内用户相互监督、鼓励、竞争, 提高了学习效率和质量。通过分享困难和问题, 用户获得了来自其他群成员的支持和解答, 减轻了学习压力和孤独感。微信群的存在不仅提供了一个实时的学习交流的平台, 更建立了一种基于互助和合作的社会支持系统, 为用户提供了更为立体和温暖的社交体验。

此外, B 站等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学习专业课知识的资源共享平台。用户通过观看专业课视频教程, 学习新知

识或复习旧知识。同时，他们在平台上收藏、评论优质的专业课视频，通过微信群和小红书直播间推荐给其他用户，与其他用户交流心得。有的用户甚至积极参与知识共享，上传自己制作的专业课视频，传播自己的知识或展示能力。这种基于知识共享和学习的社会资本构建，使得云自习用户在B站等平台上拓展了学习内容和方法，进一步提升了学习水平和能力。

这些多重媒介的组合使用，在实现云自习功能和目标的同时，也为云自习用户提供了一个虚拟社交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们可以与其他用户建立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满足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对认同、支持、资本等方面的需求，也促进了他们在个人、群体、社会等层面上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云自习用户是一种具有主体性和选择性的媒介使用者，他们通过多重媒介组合的方式，在虚拟社交空间中构建了一种多元化和有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意义。

（二）复杂互动机制

云自习用户之间的互动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交流，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涉及到认同、情感、动机、规范等多个层面。云自习用户通过打卡学习计划、起床时间等内容，展示自己的学习目标和进度，从而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他们也通过互相通过励志话语激励彼此、在微信群@没有上自习的同学、截屏开小差的行为等各种形式进行互动，以提高云自习的效率。这种复杂的互动机制展现了他们充分调动媒介功能的自主性，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云自习这一新型学习方式的适应和创造。^⑤

云自习用户之间的认同感主要来源于他们共同的学习目标、学习方式和学习态度。他们通过打卡学习计划、起床时间等内容，向其他用户展示自己的学习情况，从而获得他人的赞扬、鼓励和支持。这些正向的反馈增强了他们对于云自习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可感，也促进了他们与其他用户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同时，他们也通过参与云自习群体的各种活动和规范，如定期分享学习心得、遵守学习时间表、参加学习竞赛等，来表达自己对于云自习群体的忠诚和尊重。这些行为不仅增加了他们在云自习群体中的地位 and 声望，也加深了他们与云自习群体的情感联系和价值共鸣。

云自习用户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展现了他们充分调动媒介功能的自主性，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云自习这一新型学习方式的适应和创造^⑥。他们不仅利用媒介的基本功能，如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来进行信息交流和情感表达，还创造了一些特有的媒介符号和规范，如打卡、@、截屏等，来进行认同建立和规范遵守。这些媒介符号和规范不仅具有简洁、直观、有效的特点，还具有独特、有趣、富有个性化的特色。这些媒介符号和规范不仅增加了云自习用户之间的互动趣味性和多样性，还增强了云自习用户之间的互动深度和广度。

综上所述，云自习用户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交往方式，它涉及到认同、情感、动机、规范等多个层面，也展现了他们充分调动媒介功能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种复杂互动机制不仅有利于提高云自习的效率和质量，还有利于促进云自习用户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三）私隐关系的缺失

云自习是一种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在线学习的模式，它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能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学习需求。然而，云自习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私隐关系的缺失。私隐关系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建立的基于亲密度、信任和互惠的人际关系，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保障。本文从媒介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云自习平台上用户之间交流的媒介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隐私关系形成的影响。

云自习平台上用户之间交流的媒介特征主要包括异步性和低联结性。异步性是指用户在虚拟学习环境中的交流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步，而是通过非同步的方式进行，例如留言评论、发布内容等，这种时间上的非同步性可能源于用户在不同地点、不同时段参与云自习，导致信息的时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与此同时，低联结性突显了用户之间交流的信息不是通过强烈的实时连接而产生的。虽然云自习平台提供了多样化的交流方式，但这种非线性和非层级性的交流模式也可能导致交往关系的表面化。用户通过评论、点赞等简短而碎片化的互动方式建立联系，这可能使得私密人际交往变得缺乏深度和连贯性。深层次的情感和经验分享可能受到限制，导致人际关系更倾向于表面上的社交而非真实的情感互动。

从媒介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异步性和低联结性模式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方式，更是在虚拟社交环境中共同构建的社会现实。在这一媒介环境中，私密人际交往不再依赖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方式，而是通过符号化行为在虚拟社交环境中构建。然而，异步性和低联结性模式可能使得信息传递更加复杂，从而增加了私隐关系的建构难度。在理解这一媒介环境中的私隐关系时，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虚拟社交模式如何塑造了人们之间的新型互动方式，以及这对于私隐关系的塑造和维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⑦。

六、结论

本文以小红书平台上的云自习内容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云自习用户如何通过媒介技术实现远程在场，以及远程在场感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体验和社会关系。本文发现，云自习用户通过虚拟学习环境的构建，部分隐私让渡，多重媒介组合，复杂互动机制等方式，创造出一种既有学习功能又有社交功能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用户可以感受到与其他用户同在一个学习场景中的感觉，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增强学习动力和信心，改善学习情绪和态度。同时，用户也可以通过云自习内容和互动方式，认识和交流其他用户，建立一定程度的社会关系，形成一种社区或团体的归属感。然而，本文也指出了云自习用户面临的一些挑战和风险，如私隐关系的缺失，过

度依赖媒介技术,媒介技术的不稳定性等。本文认为,云自习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不仅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学习方式,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案例。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和层面,深入探讨云自习用户的媒介使用行为和心理过程,以及云自习对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曾抒羽.对慢电视、慢直播陪伴性功能的解读[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07):62-64.
- [2] 李嘉颖.基于互动仪式链视角透视学习直播热[J].青年记者,2020,(14):79-80.
- [3] 范岳亚.“直播自习室”:新媒介技术下的空间组合与超人际互动[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9(06):86-95+122.
- [4] 吕雅欣.大学生学习直播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化现象研究[D].河南大学,2020.
- [5] 党亚茹.“学播热”现象的文化思考[D].华中师范大学,2020.
- [6] 孙文峥.“在一起独处”:视频时代的数字化管理与陪伴——以青少年直播学习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2,(11):71-80.
- [7] 黄典林;马靓辉.身体问题的传播研究路径刍议[J].新闻与写作,2020,(11):12-19.
- [8] 芮必峰;孙爽.从离身到具身——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J].国际新闻界,2020,42(05):7-17.
- [9] 牡丹;陈霖.与“物”交融:技术具身理论之于传播学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3):82-86.
- [10] 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40(12):83-103.
- [11] 范岳亚.“直播自习室”:新媒介技术下的空间组合与超人际互动[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86-95+122.
- [12] 李晓蔚.“权力的眼睛”:全景敞视主义视域下的网络围观[J].国际新闻界,2015,37(09):70-79.
- [13] 陈翔.论媒介系统与身体之关系——基于A·哈特的媒介系统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9).
- [14] 凯瑟琳·凯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9,46.
- [15] Duffy, B. E. & Chan, N. K. “You never really know who’s looking”: Imagined Surveillanc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 [16] Minna Ruckenstein & Mika Pantzar. Beyond the Quantified Self: Thematic exploration of a dataistic paradigm[J]. *New Media & Society*, 2017.

Remote Presence: Research on Cloud Self-study of Red No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Theory

Wang Haiyan¹

¹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loud study" phenomenon on Xiaohongshu, exploring how users create a sense of "remote presence" through media technology and its impact on learning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t was found that users utilize platform features to create virtual study spaces, perceiving a sense of "co-presence" with other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efficiency, and enthusiasm.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multi-media interaction, users establish social relationships, form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even friendships. The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users face, such as privacy trade-offs. This demonstrates that cloud study is an emerging media practice that not only showcases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but also poses requirements for media literacy and ethics.

Keywords: media theory; Remote presence; Cloud self-study; Xiaohongshu

模仿、再现与传播：书评人工智能内容生产(AIGC)交互中的用户体验影响因素分析---以微信读书 APP 为例

金智英¹ Payam Ghavibayan¹

(1.马来西亚泰莱大学, 吉隆坡 雪兰莪 47600)

摘要: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 技术正日益渗透到职业、平台、AI 机器运行等领域, AIGC 书评也成为与用户互动, 增进 app 使用体验的方式。本文探讨了外部信息接触、AIGC 书评的情境内容、情感色彩、表达技巧、互动频率等因素对用户共情能力的影响。本文通过对 350 名微信阅读用户进行问卷调查, 并使用 Amos.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的实验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 探讨了外部信息暴露、情境内容、情感色彩、表达技巧、互动频率等因素对用户共情的影响, 以及用户共情与评论意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AIGC 书评的情境内容、情感色彩、表达技巧、互动频率等是引起用户共鸣, 从而提高用户沉浸式参与评论的重要路径。本研究丰富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相关研究, 也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进一步科技探索提供了方向。未来, 在文化领域, 人类通过相互模仿和传播将思想或学说代代相传的模式将有可能打破人机交互的界限, 形成人机互动、人机共生、人机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 AIGC 书评; 模态理论; 传播与互动; 文化信息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5

一、引言

"人工智能" (AI) 是指机器执行智能任务的能力, 如图像和模式识别、计划行动、解决问题、理解语言、识别物体和声音 (Nedadur et al., 2021) 人工智能是由开发人员和程序员开发的算法和技术的组合, 用于创建可长时间工作的系统 (Mijwil & Abttan, 2021)。而模因理论 (memetics) (道金斯, 1976) 认为模因出自“相同或相似文化传播信息的”文化基因, 通过模仿而传播。人类文化与信息的传播是模因的传播, 通过模因的拷贝而得以实现, 这也让 AI 通过算法与技术设计相应的模因, 从而破解了文化与信息传播的密钥, 模拟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实现人机之间日常的文化与信息交流。我们以微信阅读为例, 探讨用户与 AI 评论接触体验的影响因素。由于模因理论关注情感、情境和互动, 因此我们将模因理论应用于本研究中。

二、文献综述

(二) AI 评论

人工智能 (AI) 因其可能给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和伦理的影响已在文献中得到广泛讨论。Miller (2019) 强调了可解释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强调有必要让人工智能算法更容易理解, 从而为这一讨论做出了贡献。此外, Han et al (2020) 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探讨了人工智能对社会发展、就业和未来社会的影响。

围绕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Wang & Zhang (2022) 讨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 为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和成员国的监管建议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此外, 文献还探讨了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例如, Krittanawong et al (2017) 关注人工智能在精准心血管医学中的应用, 强调了人工智能在模仿人类思维过程和加强知识存储方面的潜力。同样, Bathla et al (2022) 讨论了与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自动化中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挑战和机遇, 强调了与人工智能集成系统相关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综上, 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献综述涵盖了广泛的主题, 包括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和实际影响。所选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金智英(1992—),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媒介伦理;

Payam Ghavibayan(2000—),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媒介经济。

中的讨论强调,有必要全面了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潜在影响,从伦理和治理到不同领域的实际应用。但迄今为止,有关 AI 与评论方面的研究还在少数,研究的对象在 AI 电子书受众评论的文本分析喜马拉雅(熊梦越, 2024),将 AI 视作人所产生的评论,用户的接受度与体验感方面暂时还鲜有涉及。

(二) 机器启发式

至今为止,人们对机器启发式算法的使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工期和优化任务分配。这些启发式算法已被应用于各种场景,包括相同并行机器调度、流程-车间排序和批量处理机器。例如, Idrissi et al (2023) 探索了用于相同并行机器调度的贪婪启发式, Ho & Chang (1991) 研究了用于最小化平均延迟的启发式。此外, Al-Qerem & Hamarshah (2022) 模拟并讨论了云计算中独立任务调度的启发式模式,强调了启发式在现代计算范式中的实际意义。

此外,这些启发式方法的影响还扩展到多个领域,如柔性加工生产线(Yue et al, 2021)、作业车间调度(Jia et al, 2022)和机器人单元调度(Kamoun et al, 2024)。这些启发式方法的开发和应用为复杂制造和计算过程的高效任务分配、资源利用和优化做出了贡献。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启发式方法的有效性受到机器异质性(Al-Qawasmeh et al, 2011)、工作特征和所要解决的具体调度问题等因素的影响。然而, Melo 和 Gratch (2021) 探讨了启发式思维和对机器的利他主义,揭示了人机交互的心理层面,尤其是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根据这些参考文献,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关于语境内容的假设:

H1: 机器启发式与用户产生共情性之间存在正相关。

(三) 语境内容

语境内容对共情性的影响是模因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Gill 和 Price (2021) 为管理和组织研究提出了一个基于模因的研究计划,强调理解模因在组织语境中的积极影响的重要性。此外, Chvaja (2020) 讨论了模因学的失败,并强调了语境因素在理解该理论局限性方面的相关性。关于语境内容(Context Content)的相关文章是 Brown et al (2018) 撰写的《内容分析中的语境因素》。该研究探讨了可能影响内容分析的各种语境因素,如文化、历史和社会语境。作者强调,要准确解读和分析内容,就必须考虑到这些语境因素。此外, Johnson (2017) 所著的《语境对内容感知的影响》是另一篇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可以为语境内容假设的提出提供参考。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语境如何影响人们对内容的感知和理解,强调了语境-内容关系的动态性和互动性。此外, "语境分析: 加西亚和马丁内斯 (2019) 所著的《语境分析: 理解内容的框架》为进行内容语境分析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作者提出了一种系统的方法来影响内容的语境因素,内容所处的语境会对其解释、意义和影响产生重大影响。考虑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对于进行准确而全面的内容分析至关重要。为了解语境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根据这些参考文献,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关于语境内容的假设:

H2: AI 的语境内容与用户产生共情性之间存在正相关。

(四) 情感色彩

雷德里克森 (2001) 的积极情绪拓宽和构建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在人类繁衍生息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这表明体验积极情绪的能力是幸福的核心。这与 "音乐诱发情绪" (Koelsch, 2015) 的研究相吻合,该研究为理解音乐诱发情绪的原理和大脑相关性提供了一个框架,强调了情绪诱发原理与治疗的相关性。此外, Qoidbach et al (2015) 提出,积极情绪可以通过各种策略进行调节,表明管理情绪体验以促进积极共情性的潜力。

在人际关系方面, Dyck (2024) 借鉴复杂性理论和近期情绪研究的概念,讨论了共振和不和谐在有效的医患关系中的作用。这凸显了情感共情性在促进个体间积极联系方面的重要意义。此外, Plate et al (2023) 证明了儿童的知识 and 情感是如何与情感音乐相一致的,从而揭示了情感共情性在没有直接社会信号的情况下所发挥的作用。根据这些参考文献,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关于 AI 评论情感的假设:

H3: AI 评论的情感色彩与用户产生共情性之间存在正相关。

(五) 表达技巧

表达技巧 (expression skill) 在文本内容的呈现上多种多样,对于表达技巧的研究,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也在多方面深入探索。Parker et al (2021) 研究了感知到的教师自主支持、自我决定技能表达和学生参与之间的关系。这一文献强调了自主和自决在技能表达中的重要性,可应用于教育环境中表达技能的培养。此外, Aslan & Cakmak (2022) 研究了低视力、视力障碍学生及其视力正常的同龄人的书面表达能力。这项研究对视障人士书面表达能力方面的挑战和策略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有助于全面了解不同人群的表达能力。总之,这些参考文献的综述强调了技能发展和表达的多面性,包括认知、心理和交流领域。了解影响技能习得和表达的因素对于促进有效沟通和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 AI 表达技巧和用户产生共情性之间存在正向显著关系。

(六) 互动频率

网络平台上的评论频率一直是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交媒体分析等多个领域关注的话题。Zhou et al (2023) 强调了高频词的使用反映了评论者关注的焦点,指出在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背景下,球队表现对球迷忠诚度的潜在影响。Noviardi et al (2020) 也强调了评论数量对在线参与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政府传播背景

下。此外，微生物缓解-加剧连续体框架强调了压力对微生物组内积极和消极相互作用频率的影响，强调了不同环境条件下相互作用的动态性质 (David et al, 2024)。此外，在运动控制领域，复杂物体控制中的可预测性、力和 (反) 产生共情性研究显示，参与者的运动频率与系统的产生共情性频率一致，表明运动频率与受控物体的物理特性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Maurice et al, 2018)。这些参考文献共同支持了互动频率受环境条件和物理特性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的假设。这些多学科证据强调了不同领域中相互作用频率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为我们深入了解形成相互作用模式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总之，这些参考文献的综合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设，即互动频率是一个受遗传、认知、环境和物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多层面现象。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 互动频率与用户产生共情性之间存在正向显著性关系。

(七) 评论意愿

Thelwall (2017) 讨论了使用词频分析检测评论中的情感，指出其在理解评论情感内容方面的相关性。此外，Forman et al (2008) 和 Meza & Koyama (2022) 分别以评论者身份披露和词频分析为重点，深入研究了评论分析。这些研究揭示了持续标签和词频对理解在线行为和用户参与的重要意义。此外，Vaughan & Garrison (2021) 强调了评论频率对群体凝聚力的影响，指出了评论频率与网络社区内交流性质之间的关系。在社交媒体方面，Kalogeropoulos et al (2023) 深入分析了参与在线评论和分享的个人概况，强调了与性别和年龄相关的差异。此外，Sheriff et al (2023) 强调了评论在客户参与中的作用，突出了评论超越单纯购买活动的表达性质。因此，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

H6: 读者的共情性性与评论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八) 概念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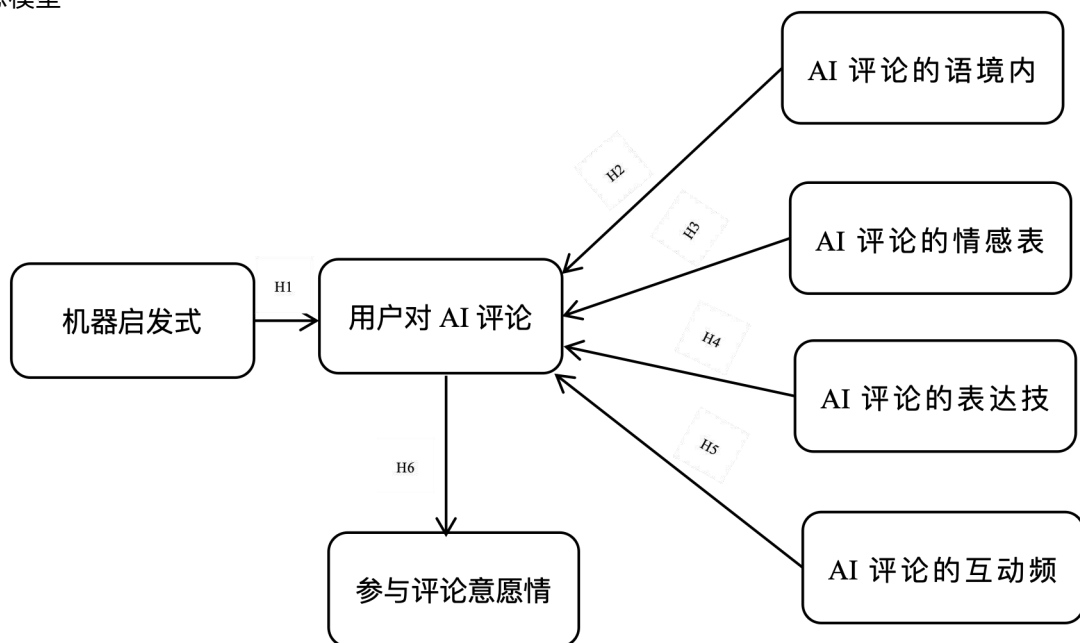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概念框架模型

三、方法论

(一) 研究 1：“机器启发式”对用户产生共情性的影响

研究 1 中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控制变量为是否知道这是一篇 AI 书评。实验组被告知这是一篇 AI 书评，并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被试者会阅读一篇 AI 书评，随后向被试者随机发送一个问卷链接，问卷内容包含该篇书评的表达，情感，是否产生共情性等内容进行量表化处理。而控制组不被告知，直接参与书评的阅读与问卷的填写并打分。研究 1 两组各发问卷 350 份，共收集问卷 700 份，其中剔除答题 1.8 分钟以下与 30 分钟以上问卷，最终有效问卷实验组 350 份，控制组 342 份，共收有效问卷 692 份。在研究伦理方面，所有的实验及问卷均在签署了知情同意后书后进行，并且参与研究的人员及其资料进行了匿名处理。

随后，两组数据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以及 P 值测算。P 值均<0.05，该数据表明书评的表达，情感等因素均能令用户产生共情性。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H1 不成立，机器启发式对用户产生共情性无显著相关。

(二) 研究 2：语境内容、情感色彩、表达技巧以及互动频率对用户产生共情性的影响

1.材料和方法

自填式问卷由五个量表和人口统计学问题组成，这五个量表均来自现有文献。调查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格式，1 表示 "非常不同意"，5 表示 "非常同意"。五个量表的项目分别评估语境内容、表达技巧、情感、互动频率、共情性和评论意愿。

语境内容改编自 AC Carpenter 的研究 (2021)。语境内容由 3 个项目组成，包括感染力 (3 个项目)、逻辑性 (3 个项目) 和可读性 (3 个项目)。表达技巧改编自 RD Costigan(表达技巧包括 3 个项目，旨在衡量用户社交行为的方法和准备情况。在情感方面，有 4 个构念来自于 T Brandão 的研究。T Brandão(2016) 的研究中已采用的 4 个构念，包括内容 (两个项目)、和阅读感受 (两个项目)。在互动频率方面，采用了 Z Li et al (2023) 的研究成果，包括 4 个项目。共情性量表由 6 个项目组成，用于评估用户评论意愿的意向程度。G Jiménez(2021)。

2.样本和数据收集

调查时间为 2024 年 8 月至 2024 年 9 月。本研究的目标人群为微信阅读用户。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式，综合考虑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因素，选出微信阅读用户。为了计算 为计算各配额的百分比，采用了统计数据在计算各配额的百分比时，使用了人力资源公寓的统计数据。共有 350 名生产者参与了调查。根据 HAIR, Black, Jr., et al. (2019) 的观点，对于具有 7 个或更少构念、适度的公共性 (0.5) 以及没有识别不足的构念的模型，最小样本量为 200 个。在本研究中，有 6 个构念，约 24 个参数。因此，350 个样本已经足够。

在数据收集之前，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至 2023 年 9 月 17 日进行了试点研究。为了对问卷项目和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估，我们对 Cronbachs alpha、缺失数据百分比、平均值、标准差、项目区分度、偏斜度、峰度、相关系数和因子载荷进行了检验。八位 Tiktok 制作人和两位在社交媒体运营方面具有专长的学者就问卷项目的可理解性提供了反馈意见，用于进一步评估问卷的内容效度。

利用基于方差的 PLS-SEM 技术，我们选择使用 Smart PLS 4.0 软件来检验假设。做出这一选择主要有两个原因。PLS-SEM 优于基于协方差的 SEM 技术，因为它可以分析形成性测量的构念 (如自我表达)，而无需额外的修改。其次，PLS-SEM 可以处理包含多个构念的复杂结构模型 (HAIR, 2017 p.15)。

四、结果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分为两部分：(a) 结构模型的结果分析和 (b) 测量模型的结果分析。这种分析包括决定系数 (R)、路径系数、预测相关性 (b)。测量模型涉及对指标的信度和效度的测量，考察的指标包括反映性测量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形成性测量的信度和效度。

(一) 测量模型评估

对质量标准的评估首先是评估因子载荷，然后是确定构念信度和构念效度。

1.因子载荷

因子载荷指的是 "相关矩阵中每个项目与给定主成分的相关程度。因子载荷的范围为 -1.0 到 +1.0，绝对值越高，说明项目与基本因子的相关程度越高" (Pett et al, 2003.p.299)。表 1 列出了因子载荷 (外载荷)。

表 1. 外载结果

Items	Out loading
A1	0.846
A2	0.854
A3	0.844
B1	0.856
B2	0.856
B3	0.848
C1	0.834
C2	0.813
C3	0.826
C4	0.862
D1	0.865
D2	0.854
D3	0.892
E1	0.874
E2	0.867
E3	0.888
F1	0.863
F2	0.857
F3	0.884

表 2. 测量模型的结果

Constructs	Cronbach's alpha	rho_A	CR	AVE
Comment willness	0.837	0.845	0.902	0.753
Context Content	0.805	0.809	0.885	0.719
Emotion	0.855	0.863	0.901	0.695
Expressional skills	0.814	0.814	0.89	0.729
Interaction Frequency	0.84	0.847	0.903	0.757
Resonance	0.849	0.849	0.909	0.768

2.可靠性分析

根据 Mark (1996) 的定义, "信度是指测量工具的稳定和一致程度。信度的本质是可重复性。(表 2 列出了克隆巴赫阿尔法和综合信度的结果。克隆巴赫阿尔法的信度范围为 0.837 至 0.849, 综合信度的信度范围为 0.845 至 0.849。这两项信度指标的信度统计量都超过了所需的阈值 0.70 (HAIr et al 2011) 。

3.收敛有效性

"收敛效度是指对同一概念的多次测量结果的一致程度。当 AVE 值大于或等于推荐值 0.50 时, 项目就会趋同地测量基本构念, 从而确立了趋同效度 (Fornell & Larcker, 1981)、表 2 显示了每个构念的 AVE 值。

4.区分有效性

判别效度是指不同概念的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程度。其概念是,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是独特的, 那么对每个概念的有效测量就不应该有太高的相关性 (Bagozzi et al.)

5.福奈尔和拉克尔标准

根据 Fornell 和 Larcker (1981) 的标准, 当某一构念的 AVE 平方根大于其与所有其他构念的相关性时, 判别效度即成立。在本研究中, 发现一个构念的 AVE 平方根 (黑体和斜体) 大于它与其他构念的相关性 (表 2)。

6.异质-单质比 (HTMT)

HTMT 是基于建构之间相关性的估计, 根据 HTMT 比率确定判别效度。然而, 现有文献对 HTMT 的阈值存在争议; Kline (2011) 建议阈值为 0.85 或更低, 而 Teo et al (2008) 建议阈值为 0.90 或更低。

表 3. 异方差-单方方差比 (HTMT)

	HeterotrAIIt-monotrAIIt ration
Context Content <-> Comment willness	0.488
Emotion <-> Comment willness	0.531
Emotion <-> Context Content	0.475
Expressional skills <-> Comment willness	0.525
Expressional skills <-> Context Content	0.495
Expressional skills <-> Emotion	0.497
Interaction Frequency <-> Comment willness	0.47
Interaction Frequency <-> Context Content	0.443
Interaction Frequency <-> Emotion	0.502
Interaction Frequency <-> Expressional skills	0.456
Resonance <-> Comment willness	0.542
Resonance <-> Context Content	0.47
Resonance <-> Emotion	0.507
Resonance <-> Expressional skills	0.467
Resonance <-> Interaction Frequency	0.472

(二) 结构模型评估

对结构模型的评估包括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决定系数 (R²) 值、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和效应大小 (f²) 。

表 4. 假设 R² 和 f² 的结果

假设	R 平方 = 0.3	效应大小 (f ²)
H2 语境内容->共情性		0.031
H3 情感色彩->共情性		0.051
H4 表达技巧->共情性		0.026
H5 交互频率->产生共情性		0.036

表 5. 假设检验结果

Hypothesis	Path-coefficient	T-statistics	intervals (95%)	Bias	P values
H2 Context Content-> Resonance	0.171	3.281	0.269		0.001
H3 Emotional -> Resonance	0.225	4.306	0.323		0
H4 Expressional skills-> Resonance	0.158	3.087	0.255		0.002
H5 Interaction Frequency -> Resonance	0.184	3.33	0.287		0.001
H6 Resonance-> Comment willness	0.46	11.109	0.535		0

假设检验

H2: 语境内容对共情性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H2 评估了语境内容是否会对共情性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结果显示, 语境内容对共情性。因此, H2 成立。

H3: 情感对共情性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H3 评估情感是否会对共情性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结果显示, 情感对共情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B = 0.225$, $t = 4.306$, $p < 0.05$)。因此, H3 成立。

H4: 表达技巧对共情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H4 评估表达技巧是否对共情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结果显示, 表达技巧对共情性有显著影响 ($B = 0.156$, $t = 2.674$, $p < 0.05$)。因此, H4 成立。

H5: 交互频率对产生共情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 评估交互频率是否对产生共情性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结果显示, 交互频率对产生共情性有显著影响 ($B = 0.184$, $t = 3.33$, $p < 0.05$)。结构模型见表 5。因此, H5 成立。

H6: 用户产生共情性对评论意愿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H6 评估了用户产生共情性是否会对评论意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结果显示, 用户产生共情性对评论意愿有显著影响 ($B = 0.46$, $t = 11.109$, $p < 0.05$)。结构模型见表 5。因此, H6 成立。

五、讨论与展望

在解释对共情性的支持方面, 除了机器启发式, 其余所有的构面都起了正面作用。语境内容对共情性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Gill & Price (2020)、Johnson (2017)、Chvaja (2020)、Garcia (2019) et al 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情感对共情性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这一点得到了以下研究的支持: Redrickson (2001)、Qoidbach (2015)、Dyck (2017)、Plate (2023) et al 的研究证实, 表达技巧对共情性有积极影响, 这一点得到了 Aslan (2022)、Parker (2021) 等研究者的支持。互动频率对共情性有积极影响, 这一点得到了周 (2023)、Noviardi (2020)、Maurice(2018)等研究者的支持。然而, 关于机器启发式对共情性无显著作用, 其背后可能有多层面的原因。一方面 AI 的声情并茂, 娓娓道来在形式上给受众置身的沉浸式情境感同身受, 另一方面 AI 的内容输出如同本人的经历再现, 能够在瞬间引起共情性情感。与此同时, 在拥有小说文化、电视文化以及真人秀表演等多元化体验的现代社会, 人们或许不那么在乎故事的陈述者是谁, 是人还是机器, 只在乎演绎出来的故事本身是否足够打动人心。而 AI 书评恰好能够较好地触动到受众心绪, 在某种程度上已忘却它本身是机器启发式亦或是其他。

本研究的建议是, 研究者需要获得更多关于公众为什么会接受 AI 评论的知识, 开展更多关注 AI 评论的研究, 不仅是微信阅读领域, 在贴吧提问、微博舆论与情应对、危机公关、青少问题、心理咨询等方面对 AI 评论的实践进行探索, 进一步丰富 AI 评论在其他各方面的研究, 并进一步促进 AI 评论走进日常生活, 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 [1] 闫桥 & 陈昌凤. (2023). 数智化融合:逻辑、特征与未来战略. 青年记者 (19), 9-12+17. doi:10.15997/j.cnki.qnjz.2023.19.032.
- [2] 李伟锋. (2024). 数字化推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探究. 新闻战线 (11), 83-84.
- [3] 李赛红 & 李立坚. (2023).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精准化的实践路径探究. 新闻研究导刊 (20), 64-66.
- [4] 李鹏. (2023). 深融进化论: 技术逻辑与智媒体未来. 中国记者 (08), 68-71.
- [5] 何霞. (2023). 媒体传播中人工智能大量运用的风险、成因及未来路径. 新闻世界 (11), 23-26. doi:10.19497/j.cnki.1005-5932.2023.11.016.
- [6] 杜立喜, 祁童语 & 段艳红. (2021). 智能再造, 媒体嬗变格局下的新闻生产. 新闻战线 (22), 23-25.
- [7] 沈春宁. (2021). “小屏”时代如何打造融媒精品——以扬子晚报 5G 智媒体平台“紫牛新闻”APP 为例. 新闻战线 (10), 102-105.
- [8] 洪孟春, 彭培成 & 刘先根. (2023). 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体融合中的应用场景与创新范式. 中国记者 (11), 125-128.
- [9] 杨振斌. (2023). 蓄力人工智能 助推媒体融合. 传媒 (21), 14+16.
- [10] 杨为学. (2023).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角下数字媒体的转型策略分析. 新闻爱好者 (10), 48-50.

doi:10.16017/j.cnki.xwahz.2023.10.007.

[11]杨傲. (2023). 媒体融合背景下 AI 绘画技术的应用. 新闻前哨 (14), 9-11.

[12]陆小华. (2023). 包容监管与规则博弈: 与人工智能如何共生. 青年记者 (15), 78-81.

doi:10.15997/j.cnki.qnjz.2023.15.019.

[13]胡钰 & 杨鹏成. (2024). 人工智能提升新闻媒体舆论引导力浅议. 新闻战线 (11), 43-46.

[14]陈露菡. (2023). ChatGPT 赋能新闻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图景. 传媒 (22), 40-42.

[15]胡泳 & 刘纯懿. (2023). UGC 未竟, AI 已来: “内容”的重溯、重思与重构. 当代传播 (05), 4-14.

[16]桂家新. (2024). 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 新闻战线 (14), 4-7.

[17]郝冠南, 刘星宏, 李璨 & 孙云龙. (2023). 以人工智能之力, 赋全媒体宣传报道之能——人民日报社 AI 编辑部创造新兴技术赋能全媒体新闻生产新范式. 中国传媒科技 (10), 7-10.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3.10.001.

[18]徐延章. (2023). AI 赋能: 数字时代广电融媒体智慧服务设计模型. 视听界 (05), 60-63+126.

doi:10.13994/j.cnki.stj.2023.05.025.

[19]龚荣生, 刘海繁 & 雷晴. (2023). 以“视频+”构建全新传播体系. 新闻战线 (13), 13-16.

[20]Shneiderman, B.(2020).The AI based on Human: Three Fresh Ideas[J].AIS Transactions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3),109-124.

[21]Fujita,H(2020).Computer-Aided diagnosis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CAD).Radiol Phys Technol .(13),6-19.

[22]Alejandro Barredo Arrieta, Natalia Díaz-Rodríguez, Javier Del Ser, Adrien Bennetot, Siham Tabik, Alberto Barbado, Salvador García, Sergio Gil-López, Daniel Molina, Richard Benjamins(2020).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AI): Concepts, classific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chieving 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formation Fusion.(58),82-115.

[23]Fan W., Liu J., Zhu S., Pardalos P. M(2020).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dop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medical diagnosis support system (AIMDSS).annu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294),567-592.

Imitation, Recreate and Transmission: An Analysis of User Experi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 Book

Reviewing Interaction---Take Wechat Reading app as an example

Jin Zhiying¹, Payam Ghavibayan¹

¹ *Taylor's University, Kuala Lumpur, Malaysi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penetrating into the fields of occupation, platform, AI machine operation, etc., and AI comments have also become a chatting method that users take for grant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information exposure, contextual content of AI comments, emotional color, expression skills, frequency of interaction, etc. On users' empath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s' empathy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comment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the questionnAIr of AI survey on 350 WeChat reading users and data analysis by software Amos.26.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extual content, emotional color, expression skills, and interactive frequency of AI comments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arouse users' empathy and thus increase their immersion participation in comments. It is a process of imitation, recreate and transmission for AI com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al theory.This study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nd also provides a direction for furth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plorations of AI.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of human-technology interaction will be possible in the future, within the cultural sphere, the pattern of human beings passing on ideas or doctrine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through mutual imitation and dispersal may cross the border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machines, creating a trend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human-machine symbiosis, and human-technology fusion.

Keywords: AI comments; modal theory;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cultural information

迷失在大英博物馆——《青春》的空间叙事与身份书写

古帆¹

(1.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本文从库切的自传体小说《青春》中大英博物馆作为实体阅读空间和象征性符号空间的特质出发, 讨论文本的空间叙事与身份书写。大英博物馆在约翰的想象中是象征权威与孤独的实体乌托邦, 而在其个人经验中又被重新塑造为解构权威、联结孤独者的符号异托邦。这一过程所隐含的对故乡、自我、权威的认知心路进一步体现在库切对《青春》这一文本的叙事策略中。本文通过具体的阅读空间、再现的符号空间以及再生产的小说文本空间, 进一步探讨库切对后殖民与后现代背景下空间叙事与身份书写的回应。

关键词: 空间叙事; 身份; 《青春》; 库切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92

引言

库切 (J. M. Coetzee) 的第二部自传体小说《青春》 (*Youth*, 2002) 以他 18 到 24 岁在英国的生活经历为原型, 记述了主人公约翰的成长与蜕变。彼时他怀着伟大的诗人梦, 模仿偶像庞德 (Ezra Pound) 和艾略特 (T. S. Eliot), 从文化“落后”的边缘南非来到文化中心英国朝圣, 却意外以失落告终。伦敦没有为他开启文学创作的新世界, 反而埋葬了他的一腔创作激情; 没有帮助他彻底逃离过去, 反而把过去融入了他的血液; 没有让他摆脱南非的阴影成为正宗的英国人, 反而让他在英国与南非的夹缝中无所适从。这一段辛酸经历在库切一生的创作与自我身份认知道路中都意义非凡。而落笔之时, 他却放弃了颇具感伤主义的第一人称“我”, 选择了略带距离感的第三人称“他”。关于这种叙事方式的探讨颇丰, 《青春》中约翰的身份书写也备受关注, 但鲜有人将其中的身份书写与阅读和写作联系起来。《青春》不仅是一本成长小说, 也是一本关于读书和写作的元小说。书中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约翰的阅读感悟、对写作的认知和文思枯竭的痛苦。同很多逗留伦敦的作家一样, 约翰的阅读写作活动也在大英博物馆进行。大英博物馆既是实体的阅读空间, 又是库切笔下再现个人体验的符号空间。它所扮演的帝国权威代表和知识圣殿的官方角色与少年约翰对英国的幻象不谋而合, 而约翰身临其境的私人经验又展示了大英博物馆作为身份重塑和人际交往平台的另一面。而作为符号的博物馆又成为身处伦敦的南非白人约翰窥视自我的一面镜子。对博物馆阅览室的认知推动着约翰对自我的认知。尽管 24 岁的约翰并未因此顿悟, 反而招致了写作困境。但临近耄耋之年的库切却通过他的文本空间《青春》重现了这一空间与身份的交互影响, 为 24 岁的约翰失败的诗人梦画上圆满句号。本文从大英博物馆这一阅读空间出发, 探讨关于这一空间叙述与身份书写在《青春》中的关系。通过具体的阅读空间、再现的符号空间、以及再生产的小说文本空间, 探寻空间与身份的相互影响。

一、大英博物馆阅览室: 作为镜像的乌托邦

图书馆作为约翰在南非的主要生活场所, 承载着他对自己身份的隐秘渴望与含蓄表达。虽然彼时的他尚未提及有关大英博物馆的只言片语, 但其所代表的文明最高权威和知识圣殿的身份已经隐藏在约翰对伦敦的想象之中。

《青春》开篇就暗示了约翰在构建自我身份之时对于图书馆的依赖。他以“图书馆管理员”的假冒身份租房, 把工作单位写作“大学图书馆”。他在开普敦大学的主要生活空间是图书馆, 因为那里收集了艺术的顶峰之作; 图书馆也是他想象中浪漫爱情的肇始, 因为女人在这里透过“男人古怪木讷的外表, 看到他心中燃烧的烈焰” (Coetzee, 2002:3)。值得注意的是, 约翰对艺术顶峰的认知中潜藏着作为“野蛮人”的深切自卑。他之所以痴迷阅读, 是因为他想“在出国前把值得一读的书都读完, 这样等他到了欧洲, 就不会是个外省的土包子了” (Coetzee, 2002:25)。少年约翰头脑中形成的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与他的教育经历息息相关。约翰早年的阅读书目包括庞德、艾略特、蒲柏、莎士比亚、斯威夫特等等。这份全部由英国文人组成的书单, 恰好代表了帝国在南非意识形态殖民的最高成就。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是以帝国建立殖民地作为标志的: “英语学习与帝国壮大产生于同一个意识形态顶峰。” (Ashcroft, et al., 2004:3) 二者的发展相互依存, 导致了“人为建构价值观 (如文明、人文) 等的自

作者简介: 古帆 (1991—),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后殖民文学, 20 世纪英语文学。

然化，将野蛮、本土、原始作为其对立面”（Ashcroft, et al., 2004:3）。英国作为文明的权威与殖民地作为野蛮的边缘这一二元对立就在英国文学教育中得以内化，约翰也受到知识这一原罪的侵蚀。而大英博物馆所标榜的“文明守护者”这一称号，本身也成为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展台。被展览的物品与观看者不能平等对话，因为“无声而被动的展品被置于观看者的凝视下，而观看这一行为又受到官方意识形态规则的制约”（Bohrer, 1994:198）。大英博物馆代表了英国丰富的殖民掠夺结果，其丰富的展品多半是战争的胜利品。这些掠夺自东方古文明的展品被置于大英博物馆之初就带着失败者的沮丧，不可避免的因其异域情调被划分为他者。作为战利品的他者与帝国文明的并置无疑衬托出帝国文化的优越感，而参观者在大英博物馆的教化下也继承了帝国文明之优越这一意识形态。由此，大英博物馆的官方意识形态与约翰的朝圣愿望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在约翰眼中，图书馆也是一堵隔绝艺术家约翰和俗世的高墙。少年约翰投入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阅读。图书馆是他的孤岛，保障他通过阅读体验与自身对话。约翰对文学符号有强烈的依赖性，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与杰奎琳同居的不适感上。当杰奎琳偷看他的日记，发现他的不快要提出分手时，他勃然大怒，认为“没人可以阅读别人的隐私文字”（Coetzee, 2002:8）。这句话充分表明了约翰对阅读和写作的理解：写作是一种保持孤独和自我的方法，读写活动本身应该是一项隐私、幽闭、孤独的工作。这种理解也体现在他对伦敦的艺术幻想中：“伦敦也许如石头般冷漠、如迷宫般复杂，让人觉得寒冷，但在它那令人生畏的高墙后面，男男女女都在忙着写书、绘画、创作音乐。”（Coetzee, 2002:41）高墙之内的男男女女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路人猜不到他们的秘密。而大英博物馆，那个将要作为约翰学习研究的主要场所的地方，更是有一堵堵高墙保护他那颗脆弱的心灵，为他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孤独而富有的空间。而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作为知识工厂用于学术研究，则是其开放之始的官方意志。一份于1835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投资博物馆的申请中提到：“希望这个国家的穷学生也能和富人一样，通过同样的阅读途径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跟随理性的追求，有同样权威的资料做参考，探测最复杂莫测的疑问。我力主政府理应在这方面给他们最自由而不受约束的援助。”（“Select Committee.” 1835:4795）这份申请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重点开放对象锚定为学生，将其重点用途视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大英博物馆面向学生开放的初衷是给他们提供权威的参考资料，启发他们发掘悬而未决的思想难题，帮助他们勇攀智慧高峰。这份申请和约翰对艺术创作的设想一样，都强调了读书、写作作为一门内心活动的性质。图书馆的高墙成为公平和孤独的保证，期待着智慧的花朵开放在每个人的孤岛上。

尚未踏入伦敦的约翰早已把英国视为艺术理想的乌托邦。而他对读书写作和图书馆的依赖，也为此后大英博物馆作为他创造个人艺术空间的主要场所奠定了基础。更可贵的是，大英博物馆给少年约翰的镜像并非是无的。恰恰相反，这一镜像也正是大英博物馆苦苦树立的官方形象：来自五湖四海的藏书汇聚于此，在他者同自我的冲突中凸显自己的卑微，展示帝国作为艺术中心的权威；阅览室被打造成严肃的学术场所，知识的生产工厂，以保障智慧与灵魂孤独的自我对话。然而这种官方形象的打造过程又出现矛盾，从而使得大英博物馆在约翰的私人体验中展现了其身份的另一面。镜像乌托邦转变为符号异托邦，约翰对大英博物馆的亲身体验也促使他重新思考南非与英国、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二、约翰的阅览室：作为补充的异托邦

福柯通过镜子的隐喻描述了“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一概念。福柯指出，镜中呈现的镜像本身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人看到镜子中的环境，会意识到自己在镜子中的不在场。而从人的镜像对本体的凝视角度来看，它证实了本体所处空间的真实性。人要意识到所处空间的真实性，则需要凝视不存在的镜像，由此，镜像让自己所处的空间变得既真实又不真实。反过来，镜子本身也兼具了在场与不在场，实体与想象并存的性质，这就是异托邦。（Foucault, 1986: 24）

大英博物馆作为库切笔下的符号空间，也兼具了在场与不在场、实体与想象并存的特质。这主要通过约翰的阅读经验得以再现。《青春》中从来没有过对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藏书量的正面描写，但我们依旧可以从约翰的阅读经历中窥斑见豹。与他在南非时英国作家雄踞其书单的状况相比，身在伦敦的约翰阅读范围显然扩大了许多。他不再局限于18到20世纪的英法文明，而是广泛涉猎了各国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如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智利诗人巴勃罗·聂努达（Pablo Neruda），奥地利作家英格堡·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荷兰诗人西蒙·温肯努格（Simon Vinkenoog）等。由此，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成为福柯笔下“收集所有物品，建立普遍档案，将所有的时代、时期、形式、品味”（Foucault, 1986:26）都汇集于此的空间。而这一用于粉饰自己权威的空间，却在约翰的经历中解构了自我权威。福柯指出，建造一个包含了所有时间的地方，其“本身就被置于时间之外”（Foucault, 1986:26）。换言之，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这一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书籍都搜集展览于此的行为本身，就打破了时间的线性顺序。时间在这里被空间化，过去与现在得以并置。当过去被呈现为一种现在的在场，过去就很难从现在中割裂出去，一切时空的集合变成当下的在

场。这一时空并置也在悄然改变着约翰对南非的认知，当他坐在阅览室无力继续自己的论文时，他“允许自己享受一头扎进有关旧日南非书籍的奢侈里”（Coetzee, 2002:136）。坐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在书中阅读曾经走过的街道给了约翰一种怪异的感觉。他被进入南非腹地的冒险故事深深吸引，感到他正在阅读的是“他的国家，他心中的国家”（Coetzee, 2002:137）。大英博物馆作为异托邦的身份通过南非的在场与不在场、实体与想象并存表现出来。18世纪的南非穿越时空，成为此时此刻约翰思绪的背景。约翰明知那样的南非已经过去了，可是《伯切尔游记》（*Burchell's Travel*）在他眼中却有“真实的光环”（Coetzee, 2002:138）。他并不在乎时间是否过去，总觉得这就是他心中的国家。他开始问自己：“是不是渴望回到旧日的南非，那个可能建立伊甸园的时代？”（Coetzee, 2002:137）阅读活动扭转了约翰一心要割断过去的渴望，他开始去思考，甚至思念他不愿承认的祖国。燕卜苏（William Empson）在讨论博物馆的展品时指出，过去的展品提供了过多过去的信息，过去的信息膨胀以至于涌入了现在的空间，“混淆了人们对现在的判断”。（2000:9）而对于原本就丢失了自我认知的主体而言，这种将时间空间化的阅读活动反而可能促进身份的重塑。约翰一改对荒蛮南非的厌恶，开始渴望像伯切尔一样写一本具有说服力的书，却苦于找不到素材：“他没有像历史学家一样受过训练，反正他要找的东西也不在历史书里，因为他们属于平凡单调的事物，平凡如空气。他去哪儿可以找到一个过去世界的常识呢，那些卑微到不知是否可以被定义为知识的知识？”（Coetzee, 2002:156）大英博物馆作为知识权威的角色就在一个少年的困惑中被解构了。丰富的藏书带来时空并置的体验，其结果是让约翰意识到过去对于现在的意义，过去之不可分割。于是对英国文学权威的至上崇拜转化为反求诸己的过程。他的关注点同很多流亡作家一样，“侧重于在艺术中对家园的描述”（Gurr, 1981:25）。而他家园的真相，不是历史书中的宏大叙事，而是最平凡的生活琐事。在描写家园面前，大英博物馆浩如烟海的书卷失去了它的力量。

大英博物馆遗世独立的官方形象也在文本的再现中被打破了。约翰所幻想的冷峻与孤独的代言人变成了暗藏人际交往机遇的平台。谈及阅览室作为异托邦所具有的“孤立且可渗透”的矛盾，伯恩施坦（Susan David Bernstein）认为阅览室的环形设计促进了“方便社交和联想的外部性”（2013:16）。环形的设计保证了个体的独立性，又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即可保证私人的阅读空间，又提供了社交的可能。由此可见，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既是保障个人隐私的空间，也是破坏个人隐私的空间。约翰将“每个周六下午和每周闭馆的两个晚上”（Coetzee, 2002:54）都耗在大英博物馆阅读福特的书。这种私人、隐秘的阅读体验终于在一个周六被打破了。约翰和邻座的读者聊了起来，甚至相见恨晚地到茶室喝茶。作为严肃学术领地的大英博物馆失败了，它不仅没有带给约翰研究的新思路，激起他深入探寻的好奇心，反而分散他的注意力。大英博物馆为约翰提供关于福特研究的大量素材，却只让他感到困倦，需要勉强自己才能读下去。而在大英博物馆邂逅波兰女孩安娜却让他找到了共鸣。他们谈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非洲的时光”，“他早年在波兰的生活和后来想成为英国乡绅的渴望”（Coetzee, 2002:54）。他开始怀疑在大英博物馆遇见的这个康拉德的同胞安娜是否是他的命中注定。大英博物馆在这里已俨然不是知识的神龛了，它变成一个异托邦，在这里除了阅读，还生产出无数“空间的可能性”（Bourdieu, 1990:177）。它“既是公共的，又是关闭的；既能保证私人的、安静的阅读，也能滋生广泛的知识信息网和政治运动”（Bernstein, 2013:1）。这个既开放又关闭的空间对于生活在伦敦的异乡人而言有着更重要的意义。约翰与安娜之所以对康拉德产生共鸣，是因为他早年在非洲，流亡到波兰，又渴望做纯正的英国人。康拉德的经历，如果不是安娜的，也正是约翰心路历程的写照。他们的共鸣都指向了康拉德的流亡身份。对比约翰在火车上或在 IBM 没有女孩愿意同他攀谈的经历，和安娜的这一次谈话就更加重要。他们之所以能够交流，是因为都在流亡，而之所以能够碰面，是因为都流亡在了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用途丰富，“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是生产作坊，对另一些人是休憩之所；有人用它作最高价值的研究，但在很多情况下他都仅仅是一个容身之处”（Bernstein, 2013:1）。而在约翰的个人体验中，这两种用途是兼具的。出于对知识的渴求来到帝国的博物馆往往产生超越预料的结果，而在保护他创作隐私的图书馆中主动打破这份隐私，帮助他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他想：“我和这些在大英博物馆深处孤独的游荡者……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报答吗？我们的孤独感会消失吗？还是这种精神生活本身就是报答。”（Coetzee, 2002:55）从坚信“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的自我隔离，到把这一批游荡者看作“我们”，约翰开始重新认识孤独。对文学艺术的执念可能并不能让他成为地道的英国人，只让他成为这些孤独的游荡者，这些处于夹缝中的人中的一个。

约翰在大英博物馆的个人经历打碎了他通过追寻正统文学实现身份转变的梦想。大英博物馆在约翰的个人体验中也不再是统一的以帝国意志为中心的镜像，他变成多元的、杂糅的结合体，容纳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在敬畏帝国权威的同时解构了权威，在隔离自我的同时找到同伴，在挣脱孤独的努力中理解孤独。如果说 24 岁的约翰尚未能将这一系列私人化体验转变成诗，从而招致了写作困境，那么写作《青春》之时，库切显然已经将这些中心——边缘、过去——现在的时空体验与身份转变内化成了其创作方法的一部分。

三、库切的《青春》：构建文本空间的叙事策略

《青春》与大部分自传体小说的不同在于，时态上使用一般现在时讲述过去的回忆，人称上采用第三人称代替第一人叙述青年的经历。这两个突出的特点并不能被割裂开来。因为传统自传体写作应该普遍使用第一人叙述和一般过去时。小说在这两点上均有突破。如果仅仅把重点放在第三人称写作上（即大多数批评的做法），就很容易将一般现在时视为理所当然，因为第三人称叙事从表面看就是客观的，即时的。如果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小说在叙事方面的张力便显现出来。

阿特里奇 (Derek Attridge) 指出，一般现在时“强化了被叙述事件的即时性，并拒绝对文本进行任何意义上的回溯处理，拒绝从任何可能的位置回忆或表达对所叙述行为、态度的悔恨之情” (2004:143)。这确实呼应着库切在《青春》中力图形成的关于“当下”自我的真相。但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感觉到隐含作者对过去那个自我的审视，这是通过改变聚焦者实现的。热奈特 (Gérard Genette) 在视角 (point of view) 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聚焦 (focalization) 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分清谁看和谁说，也就是强调叙述视觉与叙述声音的分离。热奈特将聚焦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并用近乎数学公式一般的方法阐释了三种聚焦的含义，就叙述者与对人物获取信息的状况而言，若叙述者 (narrator) > 人物 (character)，则为零聚焦；叙述者 = 人物，则为内聚焦；叙述者 < 人物，则为外聚焦。热奈特提出分辨内外聚焦的标准是，由第三人称叙事的文本，如果可以改为第一人叙述，则叙事方法为内聚焦。(1990:129) 青春中只有一个叙述声音，却有两个聚焦者，即从南非游荡到英国的少年约翰和隐含作者老年库切。少年约翰是苦闷急躁的，他渴求一个正统的英国身份而不得，急切效仿先贤的朝圣之路而不能，最终陷入再也无法写作的境地。而老年的库切已有了丰富的流亡经历，他从南非到英国，辗转美国，回到南非，最后在澳大利亚安定下来。他已经习惯一个流亡者的无家性 (not-at-homeness)，不再期待安定和永恒。这两种态度在青春中通过两个聚焦者表现出来。在涉及南非的问题上，少年约翰执着地拒绝自己的故土，他坚持认为：“非洲是你们的。” (Coetzee, 2002:121) 他急切地撇清自己与非洲的关系，苦苦思索怎样做一个英国人：“他还要在英国住多久才能真正地变成英国人？拿到英国护照够吗？还是这个听着古怪的外国名字会将他永远排除在外？‘做个英国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Coetzee, 2002:103) 此刻的叙述者与少年约翰分享一样的心情，无比向往一个正宗的英国人身份，得不到又无比茫然。这里通过内聚焦的方式展示了一个求而不得的少年极端绝望而悲苦的内心独白。而作为隐含作者的库切对这一身份的认知则要理性的多。面临身败名裂的危险时，少年却丧失了他该有的惊慌，一个理智的聚焦者代替了少年的聚焦：“他属于两个互相隔绝的世界。在南非他只是个幽灵，一缕迅速散去的轻烟，马上就会永远消失。而在伦敦，他也同样不为人知。” (Coetzee, 2002:130-31) 这句话的冷漠多过了少年的绝望，是隐含作者通过外聚焦展示了库切多年后对活在夹缝中这一生存状态淡漠的认知。由此，通过内外聚焦的转换，文本实现了第一人叙述过去时的传统自传产生的反思录效果，将少年约翰的绝望与老年库切的理智并置起来，从而在一般现在时的基础上将文本变成将时间空间化的异托邦。

一个共识是：一般现在时用客观的眼光再现了过去的事件，过去时与现在时之间的转换将叙述者从“事件的见证者”变成“历史学家”。(刘江, 2011:53)。但自传与一般小说的不同在于，叙述者、隐含作者和作者其实是三位一体的身份，叙述者并不能像历史学家一样客观地重建事件现场，所以自传体中一般现在时的使用实质是同步叙述过去的事件，类似于临时新闻播报。叙述的我把读者拉向经验的我，从而将读者拉近他回忆的长河，把一段回忆性的讲述变为读者可知可感的故事。在自传中使用一般现在时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把读者从被动的听者变为参与到故事中的人，“有效地缩短叙述者(自传者)和读者之间的叙事距离，从而使读者更容易沉浸在自传作者重构的真实世界之中，也更难以察觉自传者潜藏于文字之下的真实意图” (刘江, 2011:53)。通过一般现在时拉近距离的同时，库切又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写作策略，这是一种“默许作者与自传的经验主体保持距离感” (Lenta, 2003:168) 的方式。在《青春》中，这种方式在约翰与母亲的关系中体现极为明显。小说中有一段他与母亲关系的总结：“他知道，他的冷漠让母亲沮丧，他这一生都在以这种冷漠回应她的爱。她一直想悉心照料他，而他一生都在抵抗。尽管他一再坚持，她仍然不相信他有足够的钱生活下去。一见到他她就往他的口袋里塞钱，或一英镑或两英镑的钞票。她说这‘只是一点点’。只要给她一点机会，她就会缝补他公寓里的窗帘，给他洗衣服，他必须硬起心肠对待她。现在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 (Coetzee, 2002:18)

在这段描写中，叙述者显然与少年约翰采取了不同态度。少年约翰对母亲的爱充满敌意，这种敌意来源于他想把这段属于南非的过去连根拔起的渴望。而叙述者却更加客观，从他的细节描述中，我们看到一个一心为儿子付出却得不到理解但依然对儿子关怀备至、不求回报的慈母形象。在库切早期论文《阿赫特贝尔的〈煤气管道工人之歌〉》 (Achterberg's "allade van de gasfitter": The Mystery of You and I) 中，库切总结了“我”“你”“他/她”的指称关系。他指出传统忏悔录样式的自传体小说采取的是“我——你”的话语关系，即“我”作为中心陈述主体，“你”作为目的物，作为独白中心的“我”凌驾于作为受话者的“你”身上，不具有对话性。(庄华萍, 2013:55) 而第三人称的植入，打破了这一“我——你”的权威结构，使得被动的听众变为主动的评论者。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叙述声音和叙述意识被分隔开来，使读者在参与主体经验的同时也看到了经验主体无法看到自己的一面，即他年少轻狂时代的傲慢、偏见与自私，从而对母亲产生同情。由此可见，一般现在时与第三人称叙事的结合，使得文本本身成为既孤立又可穿透的异托邦。读者既走入了人物的亲身经历中，又与人物拉开距离，与人的经历产生对话；既聆听了叙述者的讲述，又解构了叙述者的权威。

结语

作为一部讲述库切青春的小说，《青春》并没有回溯少年成长之路的方方面面。它致力于描绘一个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得意之前的失意之路，他对艺术的幼稚的幻想，他对身份求而不得的惊惧。因此这本书也成为一本关于

读书写作的小小说。约翰因对文学与创作的热忱与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结下不解之缘，而荷兰南非裔的身份又将英国与南非隔断在他的世界之外。大英博物馆是约翰高山仰止的权威，承载着他孤独的梦想，即借艺术重塑身份的渴望。而独特的身份又干扰了私人阅读经历，于是作为符号再现的大英博物馆解构了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既生产孤独感，又联合孤独者。这一符号空间所体现的囊括时空也搅乱时空，遗世独立又滋生联系的双重身份促进了约翰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消解掉他个人对于过去——现在、南非——英国在文明——野蛮的框架中的二元对立。于是小说不再只是关于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还是对所谓文化的中心与边缘这一持久博弈的回应。与此同时，对大英博物馆作为异托邦的再现也影响了《青春》这一文本空间的再生产过程。库切创造性的将第三人称和一般现在时用于回忆录似的自传体写作，将读者带入少年库切的心路历程，同时保证读者的客观性以便跳出约翰的经验自我做出评价。通过内外聚焦的转化，成功将叙述者的理性认知与经验自我的非理性冲动并置起来，又一次体现了库切要在写作中形成当下自我真相的观点。这种将读者邀请到文本之中又置于文本之外、将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在时空上的并置也为后现代写作的历史问题增加了一种可能。由此，《青春》通过空间叙事和身份书写实现了库切对后殖民视野下身份认知和后现代背景下文学创作的双重回应。

参考文献:

- [1] Coetzee J. M. *Youth*[M]. London: Vintage, 2002.
- [2] Ashcroft B,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3] Bohrer F N. The Times and Spaces of History: Representation, Assyria, and the British Museum[A]// Daniel J. Sherman and Itit Rogoff. Eds. *Museums Cultures: History, Discourse, Spectacles*. London: Routledge, 1994:197-222.
- [4]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ondition, Management, and Affairs of the British Museu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R]. London: Hansard, 1835.
- [5] Foucault M. Of Other Spaces[J]. Jay Miskowiec. Trans. *Diacritics*, 1984, 16(1):22-27.
- [6] Empson W. Homage to the British Museum[C]// Haffenden J. Ed. *The Complete Poems*. London: Allen Lane, 2000:9.
- [7] Gurr A. *Writers in Exile*[M].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1.
- [8] Bernstein S D. *Roomscape: Women Writers in the British Museum from George Eliot to Virginia Woolf*[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 [9]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M]. Richard Nice. Trans. London: Sage, 1990.
- [10] Attridge D. J. M. Coetzee & Ethics of Reading: Literature in the Event[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11]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 [12] 刘江. 自传中现在时的身份叙事向度——《富兰克林自传》的个案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1(07):52-56+61.
- [13] Lenta M. *Autrebiography: J. M. Coetzee's Boyhood and Youth*[J]. *English in Africa*, 2003, 30(1):157-169.
- [14] 庄华萍. 库切“自传三部曲”中的人称、时态与自我[J]. *外国文学*, 2013(03):53-60+158.

Wrestling with the British Museum: Spatial Narrativ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Youth

Gu Fan¹

¹*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d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 in J. M. Coetzee'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Youth*—as both a physical and symbolic space—and investigates its spatial narrative and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the protagonist John's early imagination, the British Museum appears as a concrete utopia symbolizing authority and solitude. However, in his lived experience, it is reconfigured as a heterotopia that dismantles authority and connects solitary individuals.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a cognitive trajectory in John's evolving understanding of homeland, selfhood, and authority, one that is further reflected in Coetzee's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Youth*. By examining the material reading space, the represented symbolic space, and the reconstructed textual space of the novel,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oetzee engages with the paradigms of spatial narrative and identification within postcolonial and postmodern contexts.

Keywords: Spatial narrative; Identity; *Youth*; J. M. Coetzee

论《色戒》中女性身体的政治化书写

叶琳¹

(1. 广州大学, 广东省 广州市 510006)

摘要:“身体写作”是评论界对文学作品中性别认知与描述的称谓, 是对文本叙事方式的一种变革和反叛。张爱玲在《色戒》中便以女性身体为叙事切口, 将个体肉身经验与政治规训、性别权力相勾连。王佳芝作为团队中容貌姣好突出的女性, 其身体在集体的规训下演变成为政治博弈的载体, 揭示出了特定历史语境下女性生存的困境, 及身体作为抵抗场域的脆弱性与悲剧性, 凸显张爱玲对宏大叙事中个体肉身经验与权力关系的深刻叩问。但在一定程度上, 王佳芝的情感本能展现出了对权力秩序的反抗, 为解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身体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王佳芝; 身体; 政治规训; 自我认知; 身体本能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04

一、引言

(一) 张爱玲的身体叙事传统与研究现状

张爱玲的创作始终以女性为核心, 将其作为透视社会规训与人性真实的棱镜。在现有的张爱玲文本研究中, 探究其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身体困境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张爱玲笔下的“身体”并不是单纯的生物属性, 而是承载着精神创伤、欲望博弈与身份困境的叙事载体。张爱玲的身体叙事传统打破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宏大叙事对个体经验的遮蔽, 在《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作品中, 她通过身体细节暴露女性在男权社会与物质压迫下的生存困境, 形成独特的“身体诗学”。

身体叙事的核心在于揭示身体如何被社会权力符号化、工具化。例如,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身体被“黄金枷锁”异化, 她“将那只碧绿玻璃镯子顺着胳膊往上推, 一直推到腋下”的动作, 成为物质对身体与精神双重奴役的象征;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 却仍选择用身体换取物质保障, 其“脂粉涂抹的脸”成为殖民地语境下女性身体被物化的隐喻。这些书写均以身体为切口, 展现个体在时代洪流下的被动性与主体性的微弱挣扎。

(二) 《色, 戒》对张爱玲身体叙事传统的延续

朱崇科在他的《重读张爱玲〈色, 戒〉》中提到, 在这部小说中, 张爱玲所写的身体并不仅指肉身本身, 而是一种“身体意识形态”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认为张爱玲在这篇小说中将身体与身份进行了复杂的编织, 因此在解读这篇小说时, 宜超越道德和政治的立场, 看到张爱玲对人性的洞察和她巧妙的艺术表达。^[2]

《色, 戒》之所以成为张爱玲身体叙事的集大成之作, 在于它既延续了其“以身体写灵魂”的传统, 又在政治语境中赋予身体新的叙事维度——将个体融入到了殖民统治与政治博弈的语境当。王佳芝的身体从“女学生的纯洁”被规训为“间谍的工具”, 最终在“钻戒”的光芒中回归了个体的本能情感。这种叙事不仅是对女性命运的微观书写, 更是对 20 世纪中国宏大历史中个体境遇的深刻反思: 在民族、政治、性别等多重规训下, 女性的身体或许终将被权力吞噬, 沦为政治、性别权力中的工具。

二、政治规训下对女性身体的物化

(一) 全景凝视对王佳芝的身体改造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 认为社会是由“惩罚”和“规训”两种机制编织成的权力网络, 其中监视是规训机制的核心内容, 每一个人都被一种不可见的权力组织到被隔离、被分割的空间之中。^[2]

在《色, 戒》中, 邝裕民等人组成的特工团队就如同福柯笔下“全景监狱”的监视者, 对王佳芝身体进行了系统性的规训。例如, 小说一开始就对王佳芝的外貌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脸上淡妆, 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

作者简介: 叶琳(2003—), 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3]Page1}

其中“旗袍”这一意象的书写与《茉莉香片》中冯碧落“绣着丹凤朝阳的锦缎旗袍”所象征的旧式婚姻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以服饰作为身体规训的外显符号。不同的是，《色，戒》中的旗袍更成为政治任务的“伪装道具”，其紧身剪裁不仅是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消费，更暗含特工团队对王佳芝“交际花”身份的强制赋予。

除了服饰以外，邝裕民等人还把王佳芝的身体贴上了“性经验是否丰富”“举止措辞是否像太太”等可量化指标。为了将“麦太太”这一角色演绎得更加真实，组织不顾及王佳芝的个人意愿，打着“革命”的借口迫使其与梁润生发生性关系，以塑造“已婚女性”的真实性。这种将王佳芝的身体与情感属性剥离的“实战练习”实质上是对个体身体的工具化改造。

（二）团队规训对个体价值认同的消解

组织对王佳芝的规训不仅停留在生理层面，更渗透到了王佳芝的精神领域。“她与梁润生之间早就已经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3]Page11}

在完成对王佳芝的身体改造后，组织并未对其展现出尊重与支持，而是以身体贞洁为核心的规训话语对其审判，认为“女人有了性生活就是不洁”，“躲着她”“不正眼看她”的群体行为，构成了隐性的精神霸凌。这种冷暴力的本质反映出了集体将王佳芝个体价值简化为工具属性的功利逻辑：有用时“起哄捧她出马”，无用则通过冷漠与回避，迫使她认同自身价值仅存于被物化的身体功能中。

“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对自己说。”“有很久她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3]Page11} 这种自我贬损实际暴露出了规训机制对王佳芝主体意识的拆解，曾经作为知识女性的她不再认同自我价值，而是转用这种自欺欺人的语态去评判自己，对于自身的身体健康失去了自主权和捍卫权。文本通过这些细节，揭示了“集体冷漠”对摧毁个体的情感价值认同的威慑力，当人际互动的基础从情感联结转化为利用关系时，个体的自我认知也将在集体权力规则中走向崩塌。久而久之，王佳芝也在这种规训中逐渐陷入了认同危机：作为“女大学生”的自我认知被消解，作为“革命工具”的身份却始终伴随着污名化与放逐，沦为革命话语下失去情感主体性的功能性存在。

福柯认为，规训社会中身体的生物性存在是让位于功能性价值的。因此在团队的政治逻辑中，王佳芝的身体价值完全取决于其对刺杀任务的效用，她在麻将桌上的每一个微笑、与易先生独处时的每一次肢体接触，都被设计为任务所需的“表演要素”。当王佳芝被迫用身体去执行任务时，她逐渐忘记了自己原本是个有尊严、有情感的女大学生，以前作为学生的自我认同感与价值感都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集体权力与任务支配、随时可能被抛弃的“工具化存在”。而当刺杀失败后，她立刻被处决，印证了身体作为“政治棋子”的可替代性和随意性。当刺杀任务失败后，王佳芝的工具化属性也不复存在了，原有和现有的自我认知体系都在顷刻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迷茫和认知困境：“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也跟她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3]Page21} 这段细节的环境描写刻画出了王佳芝与世界的联结随着任务的失败后被“玻璃”隔绝的状态，体现了身体被规训后个体情感主体性的断裂和认同感的确实。

三、女性身体被政治化后的生存困境

王佳芝的命运同样揭示了波伏娃理论中女性作为“他者”的生存困境：在政治权力与情欲权力的双重压迫下，女性身体对父权制的被动适应，也是其主体性丧失的必然结果。张爱玲通过王佳芝的悲剧，深刻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也暗示了女性解放的艰难性。

（一）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双重压迫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性作为他者”理论^[4]，深刻揭示了父权制下女性被客体化的生存困境。王佳芝身上所体现的政治权力与情欲权力的双重压迫，共同构成对女性身体的“符号殖民”。

政治权力的物化在王佳芝身上表现为以男性为主导的特工团队对其身体的工具化改造。作为抗日学生团体的诱饵，王佳芝被要求通过身体表演接近汉奸易先生。这种物化不仅体现在任务设计上，更体现在团队对其个体意志的忽视。邝裕民等男性成员将她的身体简化为“美人计”的载体，甚至安排她与梁润生发生性关系以塑造已婚女性的“真实性”。这种政治权力的暴力性在于，它通过集体名义将女性身体纳入意识形态规训，使其成为国家叙事中的牺牲品。王佳芝在执行任务时感受到的“积郁”，正是身体被工具化后的精神创伤。

情欲权力的改造则通过易先生的暴力性占有得以实现。

“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盯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3]Page12}

“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3]Page12}

“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宛若游龙游进玻璃门。”^{[3]Page14} 在与易先生的相处的日常中，张爱玲没有详细地描写两人的对话，而是用到了大量生物化的身体书写，突出了以易先生为代表的男性视角中女性被他者化后的形象。在易先生眼中，王佳芝完全是动物性的，完全是从属性的。她只能用男性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使自己的表现来迎合这种审视。这种迎合可以说不仅仅是王佳芝的作为间谍的任务，同样也是她作为那个时代语境下一个女人的任务。“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3]Page11}，在遭受到团队的排挤与

异化后，王佳芝以“麦太太”的身份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得到了所谓的“慰藉”，这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本质上是王佳芝身体被政治话语异化后的病态快感。易先生不仅通过肢体压制将其沦为欲望客体，还以物质诱惑（粉红钻戒）强化对王佳芝的控制，这种占有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具象化。王佳芝在与易先生的关系中，身体成为权力博弈的战场：她既是主动的诱惑者，又是被动的被占有者。当易先生为她戴上钻戒时，她短暂感受到的“被爱”幻觉，实则是情欲权力精心编织的陷阱。

这双重压迫使王佳芝陷入“身体不属于自己”的存在困境。政治权力将其身体工具化，情欲权力将其身体欲望化，两者共同剥夺了她的主体性。正如波伏娃所言，女性在父权制下始终处于“内在性”的束缚中，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超越。

（二）身体“他者化”使自我身份认知混淆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指出，个体的性别认同并非内在自发的，而是在他者的凝视和社会规范的压力下逐步建构出来的，性别并非个体的自由表达，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受到文化压制和欲望规范的影响。^[5]王佳芝在“女学生”“麦太太”“间谍”等多重身份间不断来回切换，正是身体“他者化”的具象体现，她的身份认知不再由自我定义，而是沦为外界需求的投射，最终导致自我认知的彻底混乱。

在扮演“麦太太”的过程中，王佳芝逐渐陷入身份混淆。作为间谍，她需要时刻保持清醒以完成刺杀任务；但作为情妇，她又不由自主沉溺于物质享受与情欲满足带来的虚幻慰藉。当易先生为她购买钻戒时，金钱与权力诱惑触达了王佳芝内心的真实需求，“英文有这话：‘权势是一种迷药。’对不对她不知道。她是最完全被动的。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真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3]Page19}

在小说购买钻戒这一高潮中，张爱玲用了大量细致温婉地笔墨去描写王佳芝的内心世界，这一刻王佳芝不再是“麦太太”，而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的本色出演。王佳芝误入了“非理性体验”的陷阱中，引发了“表演”与“现实”的混淆。这种身份的撕裂正是这种内化失败的结果——她无法完全将自己等同于任何一种角色，却又被所有角色所规训。她将易先生的金钱与肉体占有视为生存的依托。这种转变在钻戒场景中达到高潮：她将易先生的物质付出解读为“真爱”，选择放走刺杀对象。这一行为不仅是对男性权力的妥协，更是身体“他者化”导致自我身份认知崩塌的必然结果：当她的主体性被外界规训彻底消解，便只能在混乱的身份漩涡中，以否定自我、背叛使命的方式，走向悲剧结局。正如波伏娃所言，困于“内在性”牢笼的女性终将沦为父权制的牺牲品，王佳芝的命运，正是身体“他者化”扭曲自我认知、摧毁主体意识的深刻印证。

四、身体本能对规训秩序的反抗尝试

（一）钻戒的象征意义：情感对权力的突围

在《色，戒》的叙事中，六克拉粉钻戒是全文的一条暗线，也是“色，戒”中“戒”的维度之一，它以物质实体的形式颠覆了政治权力对身体的支配。当王佳芝在珠宝店中，目光落在那枚钻戒折射出的光芒上时，她的身体本能反应开始打破“特工任务”所构建的理性框架。原文写道：“她把那粉红钻戒戴在手上侧过来侧过去地看，与她玫瑰红的指甲油一比，其实不过微红，也不太大，但是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3]Page17}钻戒的独特魅力并不单单只是它那“十一根”金条的价格，而是成为了王佳芝在这场感情戏中最直接的温存，长期以来被政治与集体权力规训下的委屈与隐忍都在这枚物质符号的刺激下渐渐苏醒。

笔者认为钻戒的象征意义在文中具有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男性以及集体权力的物化代表，易先生擅长用财富来操控情感，试图通过赠送钻戒来维系他与王佳芝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然而在王佳芝眼中却成为了感知“被爱”的媒介。当王佳芝看着这枚钻戒，心中突然产生了“这个人真是真爱我的”的想法，“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3]Page19}。这一刻，钻戒不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而是被赋予了情感的意义，让王佳芝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被重视感。

另一方面，钻戒在政治任务中原本被预设为“诱杀信号”，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但在王佳芝的身体真实情感体验面前，它的这一预设功能被彻底消解。尽管王佳芝经过了两年特工训练，深知“美人局”的残酷逻辑，但她的身体却在钻戒带来的“被重视感”中背叛了政治指令。这枚钻戒在此就充当了身体本能突破权力牢笼的偶然缺口。它让王佳芝从被政治话语支配的麻木状态中惊醒，开始关注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和身体的感受。这一细节与香港时期“舞台照明余辉”的隐喻相互呼应。在香港时，王佳芝的身体献祭仿佛是在政治话语的“舞台照明”下进行的“表演性受难”，她的身体被政治话语所支配，成为完成任务的工具。而上海珠宝店中的这一时刻，钻戒作为一个物质符号，成为了身体本能觉醒的契机。

（二）从身体工具到自我的转变

在《色，戒》中，王佳芝的身体长期被革命、道德等外部话语所征用，成为了诱敌深入的武器，她的自我情感被压抑和抛弃，身体只是作为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而存在。然而，在与易先生的相处过程中，王佳芝的身体并未展现出政治工具化的彻底性，她的情感需求无法违背一个女性对真实情感的本能需求，“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3]Page17}身体的体验似乎给王佳芝带来某

种自觉意识和主体性，她因为身体(爱欲)而掉入一个更大的陷阱——男女的情欲之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身体反而是以其自身的“弱点”，解构了女性主义所谓的身體政治。尤其是在珠宝店的这一关键场景中，王佳芝通过身体感觉开始了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外部话语的反抗。“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3]Page17} 面对钻戒的刺激以及两年来爱欲的积累，王佳芝的身体感觉逐渐消解了外部力量赋予她的虚假身份。长期以来，她被赋予了爱国青年、“麦太太”等各种别人期望的角色，在这些角色中压抑了真实的自我情感需求。但在这一刻，她不再是为了政治任务而存在的工具，而是一个有着真实情感的女性。“这个人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3]Page17}。这一心理活动的突然转变，标志着王佳芝开始从被政治话语支配的工具角色中突然觉醒，作为一个女性的真实情感和需求最终战胜了“革命者”的身份。

“快走，”她低声说。^{[3]Page18} 至此，小说被推向了高潮，王佳芝最终放走了易先生，这也表明了刺杀任务失败。她的身体感觉成为了其解构原有的道德和政治工具的武器，让她从被压抑和规训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短暂地恢复了真实的自我。然而，王佳芝的这一被情感本能推动下所作出来的行为，也宣告了她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在身份暴露后，王佳芝很快就被处决了，她以一种破釜沉舟的方式、以自我的失败走向死亡结束了痛苦。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女性对男性、集体主义话语对女性身体压抑、剥夺和规训的反抗，也展现了张爱玲小说中身体叙事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

五、结语

《色戒》通过王佳芝的身体叙事，构建了一个政治规训、性别权力与个体本能相互博弈的复杂场域。女性身体在此既是殖民统治与男性霸权的“牺牲品”，也是抵抗异化的“前沿阵地”。在宏大历史叙事与性别秩序的学术对话中，张爱玲的身体书写彰显了独特的价值：女性身体常常被用作权力斗争的“工具”，但王佳芝对个体情感的本能需求和放走易先生的行为，这些看似“软弱”的本能反应，恰恰是她作为一个“个体”的体现。这种惨痛到付出生命的身体本能的“反叛”证明了在层层规训之下，个体的真实情感和身体本能从未被完全消灭。这种对“被规训身体的偶然突围”的书写，既延续了《金锁记》《第一炉香》中“物质异化身体”的叙事传统，更在政治伦理维度上拓展了女性文学的学术边界，为解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身体政治提供了“性别——权力——物质”的三维阐释模型。

参考文献：

- [1] 朱崇科. 重读张爱玲《色戒》[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2):133-146.
- [2]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3] 张爱玲. 张爱玲精品集. 色戒珍藏本[M].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
- [4]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 [5] 朱迪斯·巴特勒. 性别麻烦[M]. 宋素凤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 [6] 邹旭林. 《色戒》中王佳芝形象的多重解构意义[J]. 文教资料, 2020, (05):34-36.
- [7] 吴晓佳. 反“身体政治”的身体——张爱玲《色戒》中的双重解构[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6, (05)

On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female body in *The Spying*

YeLin¹

¹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Body writing" enables women to re-enter society through bodily expression, representing both a transformation and rebellion against textual narrative conventions. In her novel *Lust, Caution*, Eileen Chang employs female bodies as narrative focal points, intertwining personal physical experiences with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gender power dynamics. Wang Jiazhi, the team's most strikingly beautiful member, sees her body transformed into a vessel for political maneuvering under collective conditioning. This reveals the existential dilemmas of women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exposing the vulnerability and tragedy inherent in bodily resistance as a battleground. It highlights Eileen Chang's profound inquiry into individual physical experiences and power relations within grand narratives. Yet Wang Jiazhi's emotional instinctual expressions demonstrate defiance against power structures, offering fresh perspectives for interpreting bodily writing in 20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Wang Jiazhi; body; political discipline; self-awareness; bodily instinct

自我言说：华语女性题材电影的类型更新与主体转向

彭敏¹

(1. 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21 世纪之后，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展现出新的活力：从小成本文艺片中的边缘叙事到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重构再到当下多元类型创新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这一变化体现出电影市场与社会审美的调整，也反映了女性角色从被动书写到主动表达的变化。本文结合 21 世纪以来的经典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将梳理华语女性题材电影的发展脉络，并由此审视其在当代中国电影格局中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女性主体性；电影市场；性别表达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09

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双重驱动下，中国电影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电影市场上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女性题材电影：《你好李焕英》《找到你》《爱情神话》《好东西》等。可以说，当下女性导演与女性题材电影为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历时性维度考察，女性电影的叙事策略自新世纪以来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型，而这一演进轨迹下银幕女性角色完成了“被言说的他者”到“言说的主体”的女性身份话语重建。

1 从边缘叙事到类型融合：女性电影中的主体性探索

1.1 边缘叙事中的挣扎与反抗

在电影符号学的权力矩阵中，性别始终是意义生产的核心战场。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指出男权社会的无意识如何构成了电影的叙事模式以及女性如何成为男人的能指，她认为男性在父权制象征秩序中，“可以通过强加于沉默的女性形象的语言命令来保持它的幻想和着魔，而女人却依然被束缚在作为意义的承担者而不是制造者的地位”。^[1]穆尔维在后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电影既是女性被图像压迫的工具，也是通过改变惯例、重组形式以获得解放的工具”。^[2]

进入 21 世纪，华语影坛涌现了一批以女性为主角的优质影片，这些小成本文艺片将镜头对准了面对现实压迫的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不论是描写女性少年时期的压抑和无力，还是青年时期在迷茫与困惑中挣扎，抑或是老年时期的孤独与自处，观众都能从中窥见女性的主体性流动。从日常经验出发，导演以“挣扎的女性”和“反抗的女性”两种形象传递女性的自我话语。

“挣扎”是自我意志对现实困境的反抗，很好展现了主体与背后图景之间的关系。在欲望与道德、自我发展与奉献、话语权与沉默多重矛盾下，“挣扎”与“反抗”成为了一种必然。这是女性在面对自我与社会多方期待下的矛盾与选择。《春潮》中的郭建波作为一个女儿在出轨的父亲与满怀怨气的母亲之间挣扎，在母亲的咒骂声中她选择以仙人球自残，将肉体痛苦转化为对抗代际压迫的沉默宣言。《狗十三》中的少女李玩在大人的说教与指责中选择以喝酒、拒绝沟通行为链作为自己的反抗，但在父亲的暴力教育下她也只能屈服。自我意志对现实困境的反抗并不导向胜利，而她们在反抗之后不约而同选择了缄默。

这时期的女性题材电影呈现出“小而美”的影片特点，它们虽受困于艺术电影的市场窘境，却以“弱者的武器”在主流性别秩序中撕开裂隙，开创了华语电影性别书写的新范式。

作者简介：彭敏(2001—)，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艺术传播。

1.2 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重构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意识进步,小妞电影(Chick Flick)成为新世纪华语电影中的一抹亮色。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妞电影《非常完美》以低成本高票房受到市场关注,随后《失恋33天》《杜拉拉升职记》《北京遇上西雅图》等电影不断涌现,小妞电影迎来井喷式发展。

小妞电影源自欧美的一种电影类型,因重点讲述都市年轻女性的浪漫轻喜剧而受到女性观众的喜爱,具有浪漫喜剧型、女闺蜜片、现实成长型等分类。小妞电影的核心在于贯穿其中的新女性主义文化内涵。新女性主义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呼吁建构女性意识,力图重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非常完美》《整容日记》《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小妞电影将镜头对准女性特质,青春、追求时尚、爱消费乃至拜金是电影女主角们普遍具有的特质。这些被传统观念认为是缺点的特质却是女主角们迷人魅力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在小妞电影里,女性的欲望表达是直接肯定的,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始终是电影的中心。从小妞电影鼻祖《末路狂花》《律政俏佳人》《永不妥协》等电影不难看出,Thelma、Louise、Elle Woods等主角具有相似特质,她们爱美,追求爱情与幸福,甚至因此暂时迷失了自我。但在不断展开的人生旅程中,她们都实现了自我的真正成长,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与价值。

与好莱坞小妞电影相比,国产小妞电影在票房表现和文化内涵上仍存在明显差距。尽管国产小妞电影呈现井喷式发展,但许多作品存在角色塑造脸谱化、剧情严重同质化、故事逻辑薄弱等问题,影片的核心主题也逐渐偏离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过度依赖爱情叙事。《北京遇上西雅图》塑造的事业成功女性角色往往在情感生活中屡屡受挫,而第三者却被赋予“等待真爱”的合理性,这种叙事模式无形中传递了“女性无法脱离男性而独立生存”的陈旧观念。虽然小妞电影在女性角色的完整呈现、肯定女性的欲望表达等方面具有进步意义,重构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话语表达,但以上华语小妞电影表明,国产小妞电影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小妞电影也隐含着阻碍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因素。电影肯定女性的欲望表达,但女性表达自我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消费行为,在这时,女性也成为消费主义的商品之一。这种类似消费行为的后现代经验支撑起女性的主体性,同时却也成为更严重阻碍女性自由的因素。^[3]珍妮斯·A·拉德威在著作《阅读浪漫小说》中提出,有女性坚定明确表示阅读浪漫小说是一种让她们可以暂时拒绝为人妻子和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相关的种种要求。^[4]那些偏离女性自我价值实现、同质化的小妞电影似乎正是在营造一种浪漫幻象,而这一脱离女性自我价值实现、围绕爱情叙事的套路化小妞电影也很快引发观众审美疲劳,在票房与口碑不断下滑的同时走向沉寂。

1.3 多元类型创新下的主体性建构

电影视域下的女性主体是指创作主体还是观影主体是一个必须得到回答的问题。克里斯蒂安·麦茨认为观影主体认同机制对电影意义具有建构作用,“观影过程中角色认同的多重和游移,应看作是在多个银幕角色身上都发生了二次同化,即在观影过程中同时接受多个角色符号的所指,且这种同化是不稳定的,会随时发生变化的。”^[5]在创作主体与观影主体的合作下,女性的主体性才能得以显现。

近年来,中国电影持续发展,不同题材的电影遍地开花,更多女性进入到电影行业,在此背景下,女性题材电影迸发出新的活力。贾玲作品《你好李焕英》通过巧妙创造观众与电影角色之间的互动场域推动了电影角色主体性的诞生。电影镜头聚焦于母亲李焕英的形象,不论是青年时期还是中年时期,李焕英的形象细腻慈爱,充满了母性。而贾玲所饰演的女儿古灵精怪,并不让人省心在创造电影冲突的同时也让众多观众感受到了这一对母女之间生动的爱,生动刻画了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改编自现实原型“50岁自驾游阿姨”苏敏的《出走的决心》展现了一个中国式出走的“娜拉”的故事。电影女主自小迫于家庭原因失学,为了逃离家庭选择结婚却被迫成为家庭主妇由于经济失权进而话语失权,在女儿长大后为了女儿的幸福再次选择压抑自己想做的事。一次次的妥协和忍耐是无数在家庭中沉默牺牲的女性缩影,带动观众进一步思考女性自我与其承担的社会角色之前的动态博弈。

观影主体的私人化经验对于构建女性主体性具有重要作用。2024年底由邵艺辉执导的《好东西》一经上映社会好评如潮,而电影颇具好评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私人化经验的成功构建。在小叶为小孩王茉莉播放声音片段时,声音加画面的蒙太奇剪辑让声音接入到每个观众日常的生活之中:暴风雨的声音也可以是母亲打鸡蛋时的筷子搅拌声,海豚跃入大海时的浪花溅起也可以是母亲备菜时把彩椒扔进水池中。厨房忙碌的身影大多数时候似乎都是

女性，而这段电影描写唤醒观影主体对于母亲和厨房的记忆，塑造了女性的主体性。

2 她们为何被看见：女性题材电影崛起的多维动因

2.1 电影圈“她力量”崛起

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崛起原因之一在于近年来女性话语权崛起。女性华语权崛起是多维度的。一方面，女导演更多了，贾玲、邵艺辉、杨荔钠等女导演以优秀的电影作品进入电影市场，大众认为女性导演以思想为手术刀剖析世界，撑起了电影的半边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电影行业，她们是摄像师，是灯光师，是道具师，为电影生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24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新荷 NEWHER 女性电影单元以“讲好女性光影故事，传递巾帼向上力量”聚集了李少红、饶雪漫等专家及一线女性电影工作者。导演李少红认为，如今的青年女性电影创作者们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定位和深刻的感知，在把握女性题材以及女性特有的思维方式上更为坚定和自信。^[6]

2.2 “她消费”下的话语权追求

走出电影圈，还应重视的一个因素在于随着女性经济能力的提升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她们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获得了更多表达空间。李修杰与修倜提出，电影中女性续书人的叙述“话语”具有女性“言说”特点和情绪风格，这是男性叙述人无法替代的。^[7]当代女性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女性独立意识，同时拥有更多话语表达权。观众对电影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类型和题材，这为女性题材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女性观众不仅希望在银幕上看到真实反映女性生活的故事，更期待通过女性叙述者的视角来讲述这些故事，从而在文化表达中实现更深层次的共鸣与认同。

2.3 社会观念变迁推动电影多样化

2017年“Me Too”运动在美国兴起并逐渐席卷全球，这场反性骚扰运动推动了社会大众的意识觉醒，波伏娃提出的女性是第二性的言论即“他是主体 (the Subject)，是绝对 (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 (the Other)”^[8]也被大众熟知，促使女性开始探索从“他者”向“主体”转变的可能性。近年来，许多观众拒绝电影中的“虐女”场景，认为这些镜头并非“讲述女性的苦难”，而只是“展现女性的痛苦”。《酱园弄》中警察局长薛至武殴打詹周氏、《满江红》中被沦为牺牲品的瑶琴都引发了大量社会批评。显然，大众拒绝贬损、羞辱、物化女性的旧叙事模式，呼唤情绪有尊严的女性角色。

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下多元文化的冲击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更独特的视角和更丰富的素材，涌现出大批《芭比》《某种物质》等优质影片，它们以新颖的题材和深刻的内涵获得广泛好评。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电影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也为女性题材电影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3 自我言说的力量与边界：女性题材的突破与困境

3.1 从“被观看”到“自我言说”的性别话语重构

21世纪华语女性题材电影通过颠覆传统凝视机制，重塑了银幕性别权力关系。《送我上青云》中盛男直面欲望的独白打破了女性身体作为欲望课题的编码规则，而《春潮》三代女性的对峙和与和解则构建了女性代际经验的私语空间，而女性题材电影中诸如此类的创作转向解构了男性中心叙事，推动公共领域形成新的性别对话场域。如胡克斯所言，当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表征是不合理及平等的，那么就有必要颠覆这种语境，让非主流的声音也拥有自己的听众，要通过差异来显现事物的真正意义。^[9]至此，女性题材电影颠覆了以往“被观看”的境地，获得了银幕“自我言说”的权力。

3.2 社会共识形塑与困境透视

电影通过镜头语言展现女性生命经验，在促进社会两性的理解与和谐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好东西》中爱情和事业都想兼顾的单亲妈妈王铁梅引发大量观众讨论，这类角色关注女性现实处境，通过荧幕对话将个体经验升华为公共议题。然而，随着市场的持续关注，女性题材类型化趋势愈发明显，作品表达流于符号和情

绪消费，以至于宣发火热但口碑低迷。在追求商业逻辑时如何保持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内容的原创性与表达深度，有待未来女性经验影像表达创作者理清。

4 结语：当女性题材成为标签之后

21 世纪以来，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实现了从被凝视向自我凝视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使女性角色以更加复杂饱满、更真实的姿态出现在银幕上，体现着女性影像主体权力的觉醒。但标签化、商业化的压力让部分作品在迎合市场需求时陷入到刻板套路中，以至处于宣发火热票房口碑却十分冷淡的尴尬处境。

女性主体的真正崛起不仅是银幕空间和叙事主角位置的占据，更在于能否突破刻板类型模板，展现出复杂丰满且具有人性张力的女性形象。未来华语女性电影的发展需要坚持女性导演、编剧等创作者的参与，更需正视市场需求，保持对类型创新的敏感，在持续拓展类型边界的同时，也让银幕上的女性拥有更多讲述自我的尊严与可能。

参考文献：

- [1] 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A].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 [2] Laura Mulvey. Looking at the Past from the Present: Rethinking Feminist Film Theory of the 1970s.[J].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004, 30(1):1287.
- [3] 陈倩倩. 21 世纪中国女性导演青年题材电影的女性主体性建构研究[J].电影文学, 2023, (10): 127-130.
- [4] 珍妮斯·拉威特.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艺术与社会译丛）[M].译林出版社.2020.
- [5] 倪沫，李江燕.重构观影主体理论[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23-26.
- [6] 崔安琪.向世界展示中国女性电影人的风采与实力[N].中国妇女报,2024-04-26(004).
- [7] 李显杰，修侗.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J].当代电影,1994,(06):28-36.
- [8] 王宏维.论他者与他者的哲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4,(4).
- [9] 黄春燕.抵抗,关爱,换位——贝尔·胡克斯及其《越界的文化——抵抗的表征》[J].国外文学,2010,30(04):49-55.

Self-Expression: Genre Innovation and Subjectivity Shift in Chinese-Language Female-Themed Films

Peng Min¹

¹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language female-themed films have demonstrated renewed vitality: from marginal narratives in low-budget art films to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in postmodern contexts, and further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today's diverse genre innovations. This shift reflects adjustments in both the film market and societal aesthetics,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roles from passive portrayals to active expression. By examining classic Chinese-language female-themed film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will outlin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such films and explore their cultural significance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tic landscape.

Keywords: Chinese-language female-themed films; female subjectivity; film market; gender expression

从媒介融合到身份重构： 以《汉密尔顿》为例探析文艺作品的跨文化表达机制

孙毓含¹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本文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文艺作品的跨文化表达机制, 分析其在族裔叙事、媒介融合与文化再表征之间的多种关系, 以音乐剧《汉密尔顿》为核心分析案例, 结合当代流行文化里的相关实例, 剖析其在艺术创作里构建族裔身份、运用多元媒介语言的方式, 并揭示这类表征实践背后存在的文化矛盾与结构性冲突, 文章在肯定其进行多元尝试的同时, 也提及跨文化表达面临的困境及界限。

关键词: 跨文化表达; 媒介融合; 族裔叙事; 文化再表征; 汉密尔顿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19

在当今全球化与身份认同政治相互交错的背景下, 跨文化创作已然成为艺术领域必须应对的核心话题, 当代艺术作品正突破传统单一文化框架的藩篱, 以语言重新组合、族裔符号重新打造以及多媒体融合等方式, 重新厘定文化认同的边界, 以现象级音乐剧《汉密尔顿》当作例子, 此作品借助非传统选角手段, 不仅重新编排了历史的叙事模式, 还重塑了传统话语权的分配架构。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当种族表征变为用于营销的视觉符号时, 这种所谓的多元表达是在致力于实现“文化解构”这一目的, 还是仅仅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 本研究将音乐剧《汉密尔顿》作为切入点, 聚焦跨文化创作的内在机制逻辑, 经由分析艺术媒介、身份政治和社会争议等范畴, 揭示当代文艺作品跨文化传播中潜藏的矛盾性。

一、媒介融合与跨文化形式的多元建构

(一) 从风格拼贴到叙事混合: 解构西方传统的形式策略

作为当代戏剧历史阶段中的标志性作品, 《汉密尔顿》最引人注目的创新体现在对百老汇传统表演范式的解构与重构上。创作者 Lin-Manuel Miranda 富有创造性地把街头文化元素(如 hiphop、R&B)跟经典音乐剧唱腔进行有机整合, 赋予历史人物以现代的声音特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该剧让少数族裔演员借助说唱这门艺术演绎美国独立战争史, 这一选择扩大了音乐剧声音表达的范畴, 又对该类型长期依托的欧洲声乐传统发起了冲击。

就叙事方式层面, 该作品打破了传统历史剧既定的单一时间轴线, 采取碎片化场景替换、角色内心表白以及多线索并排等手法, 生成出仿若影视剪辑的舞台时空效果, 这种戏剧语言的改进不光强化了叙事的动态感, 更进一步采用反复出现的音乐动机、极具特色的视觉符号以及节奏较快的台词推进, 极大降低了历史题材的接受门槛, 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完成对复杂史实的解码。

从更深邃的文化维度去看, 这种艺术实验突破了仅仅是形式上的局限, 当非裔演员借助都市街头言语重新解读开国元勋的故事时, 舞台空间转化为文化话语权的比拼场地, 作品凭借表演形式做出颠覆性创新, 本质上营造出一个供边缘群体重新定义主流叙事的文化区域, 使长时间被排斥的族群拿到了历史解释的主体资格。

(二) 数字平台与“流动性戏剧”: 媒介重构下的全球传播策略

2020 年, 随着《汉密尔顿》舞台影像投放至 Disney+ 流媒体平台, 这部现象级作品完成了从实体剧场到虚拟空间的突破性过渡, 该媒介转换不仅打破了传统戏剧表演的时空界限, 更从根本上重构了剧场艺术的传播形式——曾经被视作神圣不可复制的“在场性”体验。如今依靠数字技术达成了大众化分享, 这种转变体现出表演艺术正慢慢冲破精英文化的场地枷锁, 在互联网的分布式传播网络内建立起别样的观众参与模式。

经由 Disney+ 的全球化分发途径, 这部以美国建国叙事为根基的作品迅速转变为跨国文化现象, 从东亚跨越到西欧, 从南美抵达非洲, 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有机会共同见证这场涉及种族身份与国家记忆的艺术试验, 值得注意的是, 作品触发讨论的主要焦点已超出其历史题材界限, 转而引起全球观众对民族叙事构建方式的反思, 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让原本具有特定政治语境的作品获得多重解读的机会, 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意义再产出模式。

作者简介: 孙毓含(2005—), 女, 在读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媒体技术与跨文化传播。

从更深一层的维度看,这种传播创新体现出文化软实力构建途径的范式变化,跟传统好莱坞模式的价值输出不一样,《汉密尔顿》采用音乐剧特有的情感动员策略——借助多元音乐风格的聚合、跨种族演员阵容引发的视觉刺激,以及极具娱乐感的叙事节奏,开辟更具渗透影响力的文化对话渠道,这种策略不再依赖文化霸权的单一灌输,而是通过催生共情体验,引发受众主动开展解读与意义重构,反映出数字时代文化外交的新层面。

(三) 文化混杂与美学“中性化”的风险

然而,在跨文化创作的光鲜表象之下,同样隐伏着文化内涵被消解的危机,当艺术表达过度倚重形式拼贴却漠视历史深度时,娱乐化叙事往往把那些具有批判性的政治议题掩盖掉,依旧以《汉密尔顿》为例,尽管此剧在音乐风格和演员阵容的整合上实现了突破性融合,却故意回避了美国建国时期的关键矛盾——奴隶制问题被简化成个人奋斗的背景板,殖民历史的暴力性借着激昂的嘻哈节奏被悄然美化。

类似的文化表征困境在近年的影视改编中屡屡出现,迪士尼真人版《小美人鱼》选角所引发的争议极具代表性:虽说采用非裔演员诠释经典角色似乎推动了银幕的多元表现,但故事的核心内容依然沿用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这种看似革新实则保守的创作方式,透露出当代文化生产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在追逐形式多元的同时,然而没有对既有的权力结构进行实质性的冲击。

这一现象警示着我们,任何跨文化实践都必定会承载特定的价值判断,当文化符号脱离原本的语境被肆意取用,当历史的复杂情形被简化成视觉奇观模样,所谓的“文化融合”也许会异化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收编手段,这期望创作者在追求艺术创新的阶段,得对文化权力关系有清醒且清晰的认知。

二、种族再表征的矛盾与身份政治的文艺实践

《汉密尔顿》采用的族裔选角策略好似一把双刃剑,有色演员诠释白人历史角色的“错位呈现”,既动摇了传统舞台的种族符号根基,又陷入了新的呈现困境,这种有意安排的种族翻转形成了戏剧张力,但并未真正打破历史里的权力关系——黑人演员说出口的依旧是白人先贤的台词,殖民历史中的结构性暴力被巧妙裹进多元化的外衣里面。当非裔演员借助扮演奴隶主获得主流认可时,这一“进步”表象说不定会强化文化体制的收编本事,该剧在打破种族偏见性印象的同时,也让当代文艺创作在族裔政治上的深层悖论得以显现。

(一) “种族换位”: 族裔代表性的表象化与功能性使用

《汉密尔顿》极具开创性的舞台表演实践,莫过于安排少数族裔演员集体演绎美国开国元勋,这种极具颠覆性的选角策略引发了一种视觉上的文化错位现象:有色人的身体诉说白人精英历史,这看上去实现了历史话语权的重新安排——让长久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群体得到了“出演历史”的机会。

然而认真考究一番,这种族裔换位更像是符号层面的表演政治,剧本一直未曾脱离传统建国叙事的既定框架,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物继续采用英雄化的塑造途径,正如文化研究者所点明的,当少数族裔演员被迫用白人的语言叙述白人的历史时,这种所谓的“进步”实际上还是文化收编的一种变体,实实在在的叙事权力结构未改变,仅仅套上了更能吸引当代市场的外壳。

类似状况在近年文化生产里屡见皆是,以《哈利·波特》伦敦初版舞台剧当作例子,黑人演员诠释赫敏激起的讨论,凸显出代表性政治的困局,当角色的社会背景和逻辑依旧完全依照白人中心的叙事模式时,肤色的更改仅仅是为旧内容套上新外壳,这种表征办法虽制造出视觉冲击,却未能触碰文化权力的深层结构处,最终也许将族裔差异简化成可消费的视觉表征。

(二) 主流系统的规训: 文化空间的边界与折衷

《汉密尔顿》的成功,恰恰让当代文化工业的某种运作逻辑得以揭示:它凭借温和的样子达成了一场看似激进的转变,剧里虽然大胆采用了像嘻哈音乐和少数族裔演员这类非传统元素,但整体叙事还是保持着对美国建国神话的浪漫化呈现方式,这种用心编排的“安全创新”,令其获得主流文化的赞同,又维持了充分的艺术新鲜感。

这种创作策略暗示了一个更隐秘的文化矛盾:边缘群体要跻身主流的视野,大多时候要先对自身表达进行“无害化”操作,作品内的说唱节奏跟棕色脸庞固然引发了视觉冲击,却躲开了种族问题的历史复杂特性,华盛顿身为奴隶主的身份被淡化下去,杰斐逊的殖民思想被美化——这种带有选择的呈现模式,本质上是用文化多元作外衣,藏纳着传统价值的内核。

这种现象反映出跟新自由主义时代文化生产逻辑的呼应:差异被允许存有,但必须把控在既定的叙事框架界限内,就好似超市里的“民族食品专柜”,异质性经精准度量后纳入消费体系里,《汉密尔顿》的灵巧之处在于,它让观众在感受“突破”之际,无需面对实在的历史创伤。这种“抑制冲突化”的多元主义,或许这正是它能同时拿到票房和奖项的关键环节。

(三) 跨文化创作的挑战: 身份再现与创作责任

跨文化创作面临的深层挑战是要同时去面对双重任务:既要闯过文化边界的限制,又得留意权力结构的隐形管控,这种艺术实践是一场对叙事主权的争夺——当不同文化符号在作品中交汇起来时,它们携带的不只是美学范畴的差异,还囊括着各自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诉求。真正的跨文化对话不能仅仅满足于符号的简单拼合,而是要建立可包容文化矛盾及历史创伤的表达空间,恰似霍尔(Hall,1996)专门强调的,文化身份从根本属性上是流动的、多层次的组建,于跨文化语境中,这种流动性的呈现尤为明显。

此刻全球文化生产场域里有明显的结构性矛盾：边缘文化若想觅得传播的机会，大多时候需要被迫接受主流话语的“翻译”与“过滤”。这种非对等的交流机制，让众多非西方叙事在跨文化传播时出现“双重失真”——有可能被异化成迎合东方主义想象的奇观，又有概率被简化为与西方价值观一致的进步寓言，巴巴哈 (Bhabha, 巴巴 (1994) 的理论同时也给予我们警示：跨文化创作要着力破除权力结构里的单向传递逻辑，营造真正互为主体地位的叙事伦理。

在当前所处的语境里面，负责任的跨文化创作得打造更具反思性的实践路径，创作者不只要成为文化符号的搬运者，更应成为权力关系的阐释者，这规定作品需维持两种自觉：既要呈现特定文化经验的独特特性，又要凸显全球文化生产里的不平等体系，唯有借助这种双重批判，跨文化艺术才可以真正冲破表面的融合，获取不同文明间开展深层对话的潜在机会，做到霍尔所言的“文化翻译”过程中的真正对等互动。

三、在悖论中探索：跨文化艺术创作的实践路径

(一) 超越表征的文化对话：去工具化的叙事策略

跨文化创作不应只停留在出演的这一层次，更关键之处是打造真实、多层面的文化对话，2019年的电影《别告诉她》(The Farewell)，其导演是中美导演王子逸，讲述一位在美成长起来的华裔女孩返回中国，面对祖母“临终不告知”的家庭伦理现象。这部作品赢取成功，不是靠其演员的亚洲人面容，而是其真的触及了文化情感系统的核心要点，即于冲突中揭示差异、于差异中探寻连接；再比如《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部电影里，身份的呈现不是那种符号式的“亚裔母亲”“女儿”标签，而是采用类型糅合、叙事解析，将移民经历、家庭裂痕、文化失语等问题变成精神维度的荒诞呈现，这种创作形式排斥简单的代表性拼贴做法，而是一种对文化经验内部的再度书写。

真正称得上有意义的跨文化创作，是从“赋权图像”走向“复杂文本”这样一个进程，这要求创作者得深入族群内部的相关经验，搭建非一致的叙事体系，并非为了迎合主流审美，弄出一种看似包容的虚假假象。

(二) 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自治：形式与内容的协同演化

跨文化创作的核心价值体现在能否完成文化经验的深度转译与重构，就以《别告诉她》为例证，影片凭借一个看似普通的家庭伦理抉择，精准找到中美文化在生死观、家庭责任等维度上的根本分野，导演王子逸没有停留在对东西方文化符号的浅层次对比，而是深入到情感逻辑的冲突地带——当美式个人主义遭遇中式家庭集体主义观念，那种无法弥合的价值观碰撞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这种创作方式冲破了肤色的表象政治局限，触及到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分野。

例如，《瞬息全宇宙》展现出别样的创新办法。影片将亚裔移民的生存焦虑演变为超现实的多重宇宙叙事，以类型混合的方式呈现出文化认同的碎片化情形，种族身份不再只是简单的视觉性标签，而是演变为叙事形式本身——跳跃的剪辑代表着离散族群的记忆中断，怪异的情节映照出移民的异化体验，这种把文化经验进行形式化的尝试，冲开了“少数族裔故事”的类型牢笼。

这些成功实例证明，深度跨文化创作必须达成三个层面的突破：首先从视觉表象过渡到情感结构的展示；其次把文化冲突升华为艺术形式的创新样式；最后在守住文化特殊性的同时建立起普遍共鸣。这种创作不只是让少数群体仅仅在荧幕、舞台上“露脸”，而是下功夫让他们复杂的生活经验被理解，就如同后殖民理论强调的，真正的文化对话需以承认差异性为基础，而不是硬性要求表面的和谐一致。

(三) 开放式认同的建构：从族裔标签到交叉经验

现今跨文化创作正在经历深度的范式转换，由死板的身份标签转向鲜活的经验叙事，这一转变打破了传统身份政治把文化认同简化为种族、性别等静态归类的局限，转而聚焦多重认同在特定情境里的动态交织状况。《汉密尔顿》虽借助族裔演员跟历史角色的视觉差异造成了强烈震撼，却仍陷入“种族--国家”的二元对立框架限制里。

新近出现的媒介形式为这种动态认同表达开辟了特殊空间，互动叙事作品如《黑镜：潘达斯奈基》，借助选择机制让观众亲身感受不同文化立场下的决策困境，独立游戏《1979 革命》把历史记忆变成可操作的认同体验，而碎片化的短视频全面瓦解了线性身份叙事的垄断格局，这种创作转向体现出双重解放意义：既把抽象的身份政治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活体验，还凭借媒介的特性模拟出认同的流动样子。

该转型契合着数字时代认同方式的重大改变，当年轻一代对自我的认知从本质主义的“存在”迈向实践性的“行动”时，跨文化表达同样要超越传统的表征政治，形成更贴合当代认知风格的动态叙事语法，这并非是否定身份政治的价值，而是要在保持文化特别属性的同时，为具有交叉性和流动性的认同经验开拓更丰富的表达空间，让跨文化对话着实触及生命经验的复杂纹理。

(四) 审美标准的重构：从主流视觉向边缘感知延展

当代当代跨文化创作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那些在主流平台赢取成功的作品，一般不得不将异质文化经验转化成为可消费的视觉符号，这种转变进程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收编机制，恰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阐释的，西方文化体系把“他者”异化为异域形象，以此维系其阐释霸权 (Said, 1978)。在这种机制的情境里，少数族裔文化被压缩为装饰性的成分，其内部的美学逻辑及认知方式却被系统性地无视，好比好莱坞电影中普遍存在的“东方元素”，老是被从原有的语境抽离，沦为迎合西方观众猎奇嗜好的视觉佐料。

若想突破这种困境，创作者要进行双重解构：既得对内容层面的表征政治加以挑战，还得冲破形式维度的美学标准，塞内加尔导演玛蒂·迪奥普所执导的《大西洋》，恰是这种实践的典型范例，影片借助非洲女性视角对电影时空进行重构：舒缓的叙事节奏颠覆了好莱坞那戏剧性的期待，飘忽不定的镜头语言破除了西方电影的视觉

惯例，现实与超自然的相互交织，挑战了理性叙事的主导霸权，这种创作并非只是在现有框架里“添加”非洲元素，而是让非洲文化自身的感知途径成为美学架构的核心 (Bhabha, 1994)，当观众被迫丢掉熟悉的观影习惯时，才有机会达成真正的跨文化对话。

这种美学革命的意义远超文化多样性的浅层诉求，正如肖哈特和斯塔姆明确强调的，真正的文化平等不是让边缘群体“进入”到主流叙事中，而在于重塑整个艺术表达的根本范式 (Shohat & Stam 肖哈特和斯塔姆)，当非洲叙事节奏、亚洲空间观念或原住民时间意识能平等参与艺术语言构建时，跨文化创作才可能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整合逻辑，成为不同认知体系之间真正能对话的场域。这种转变不只是牵扯到艺术表达，更是对全球化时代知识生产权力结构的核心性质疑。

四、结语

《汉密尔顿》的突破性意义与内在局限共同勾勒出当代跨文化创作的复杂图景。这部音乐剧确实开创性地将嘻哈等边缘文化形式注入主流历史叙事，通过族裔演员的身体政治改写了传统舞台的表演语法，然而这种突破仍然受制于新自由主义文化生产的根本逻辑。作品在吸纳边缘文化元素的同时，巧妙回避了奴隶制等结构性暴力问题，将复杂的种族历史简化为个人奋斗的励志故事。这种处理方式暴露出跨文化创作面临的深层困境：当差异被纳入主流文化市场时，其批判性维度往往被娱乐化机制消解。

未来有深度的跨文化创作需要超越《汉密尔顿》式的有限突破，要在三个维度开展更透彻的探索：不仅要变动“谁来说故事”，还要重新架构“故事怎样被讲述”的美学范式；要直面历史创伤，而不可把它浪漫化看待，在承认矛盾的状况下构建真正的对话；需要构建新的文化语法，来承载那些主流认知框架未容纳的经验，只有达成这项根本性的叙事转变，跨文化艺术才得以摆脱符号政治的禁锢，成为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创新空间环境。

参考文献：

- [1] 李建明. 跨文化表达中的文化混杂机制研究[J]. 民族论坛, 2020(3): 112-120.
- [2] 李建明.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文化再表征策略[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6): 78-86.
- [3] 张静. 种族再表征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 [4] McCool, Jason C. Radical Reclamations and Musical Resonances in *Hamilton: An American Musical*[D]. Bosto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2020.
- [5] 王璐. 迪士尼的多元困境：从《小美人鱼》谈起[J]. 传媒观察, 2023(5): 45-49.
- [6] Monterio, Lyra D. "Race-Conscious Casting and the Erasure of the Black Past in Lin-Manuel Miranda's *Hamilton*" [J]. *The Public Historian*, 2016.
- [7] Hall, Stuart. Culture Identity and Diaspora[A]//Rutherford J.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ited by Jonathan Rutherford, 222-23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6.
- [8] 李晓昀, 李晓红. 嘻哈、移民与多元文化——音乐剧《汉密尔顿》的“革命性”与“美国梦”解读[J]. 戏剧艺术, 2020(2): 120-131.
- [9]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 [10] Shohat, Ella & Stam, Robert.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Routledge, 1994.

Cross-Cultural Expression in Contemporary Performing Arts: A Case Study of Hamilton

Sun Yuhan¹

¹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Hubei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ross-cultural expression mechanism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analyzing their various relationships among ethnic narratives, media convergence and cultural re-representation. Taking the musical "Hamilton" as the core analysis case and combining relevant examples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it dissects the ways in which they construct ethnic identities and use multiple media languages in artistic creation. It also reveal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structural conflicts behind such representation practices. While affirming their diverse attempts, the article also mentions the predicaments and boundaries faced by cross-cultural expre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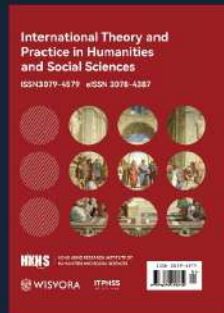
Keywords: Cross-cultural Expression; Cultural hybridity; Racial Representation; *Hamilton*



WISVORA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Online ISSN 3079-4560
Print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业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

学术赠阅